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選譯

第五輯

目　　錄

壹、基本權
一、平等權
㈠ 性別平等
1. Califano, Secretar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v. Goldfarb
鄭津津 節譯 1
2. Price Waterhouse v. Hopkins
劉靜怡 節譯 9
㈡ 種族平等
3. Gratz v. Bollinger
林利芝 節譯 20
㈢ 教育平等
4. Meyer v. State of Nebraska
王郁琦 節譯 37
㈣ 就業平等
5. Murphy v. 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焦興鎧 節譯 42
6. Albertson's, Inc., v. Kirkingburg
焦興鎧 節譯 45
7. Toyota Motor mfg. Co. v. Williams
焦興鎧 節譯 48
8. U. S. Airways, Inc. v. Barnett
焦興鎧 節譯 53
9. Chevron v. Echazabal
焦興鎧 節譯 57
二、隱私權

10. Eisenstadt v. Baird
劉靜怡 節譯 61
11. U.S. v. Chadwick
林利芝 節譯 68
12. Zablocki, Milwaukee County Clerk v. Redhail
王郁琦 節譯 80
13. Turner v. Safely
劉靜怡 節譯 93
14. The Florida Star v. B.J.F.
潘維大、程法彰 節譯 103
三、言論自由
15. Lakewood v. Plain Doaler Publishing Co.
劉靜怡 節譯 113
16.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
潘維大、程法彰 節譯 122
17. Madsen v. Women's Health Center, Inc.
劉靜怡 節譯 128
四、宗教自由
18. Reynolds v. U.S.
王郁琦 節譯 140
19. Watchtower Bible &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Inc.
v.Village of Stratton
黃義豐 節譯 150
五、刑事被告之基本人權
㈠ 死刑
20. Furman v. Georgia
王玉葉 節譯 160
21. Gregg v. Georgia
王玉葉 節譯 166
22. Atkins v. Virginia
王玉葉 節譯 172
㈡ 證據排除法則

23. Davis v. Mississippi
林利芝 節譯 177
24. Arizona v. Evans
蔡秋明 節譯 183
㈢ 傳聞法則–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
25. Willianson v. U.S.
陳瑞仁 節譯 191
㈣ 毒樹果實理論
26. Segura v. U.S.
林利芝 節譯 206
六、正當法律程序
27. Pate v. Robison
林利芝 節譯 218
28. Goldborg v. Kelly
史慶璞 節譯 227
29. Perry v. Sindermann
史慶璞 節譯 235
30. Washington v. Texas
林利芝 節譯 242
貳、權力分立
一、國會與總統
31.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a
蔡懷卿 節譯 249
二、總統民事免責權
32. Nixon v. Fitzgerald
黃義豐 節譯 264
三、行政協議之效力
33. U.S. v. Belmont
簡資修 節譯 276
四、行政徵收
34. Florence Dolan v. City of Tigard
謝哲勝 節譯 279

35. City of Montery v. Del Monte Dunes at Monterey, Ltd., and Monterey-Del Monte Dunes Corporation
謝哲勝 節譯 283
36. Anthony Palazzolo v. Rhode Island
謝哲勝 節譯 288
參、財產權（證券法、經濟管制、著作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問題）
一、證券交易相關問題
37. Blau v. Lehman
何曜琛 節譯 294
38. TSC Industries, Inc. v. Northway, Inc.
黃偉峯 節譯 299
39. Touche Ross & Co. v. Redington
林秋琴 節譯 318
40. Chiarella v. U.S.
黃偉峯 節譯 330
41. Herman & Maclean v. Huddleston
林秋琴 節譯 351
42. Landreth Timber Company v. Landreth
黃偉峯 節譯 360
43. Virginia Bankshares, Inc. v. Sandberg
黃慶源 節譯 377
44. U.S. v. O'Hagan
黃慶源 節譯 391
二、著作權相關問題
45. 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 v. Reid
林利芝 節譯 412
索引
一、判決名稱索引 423
二、關鍵詞英中索引 429
三、關鍵詞中英索引 458

1. Califano, Secretar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v. Goldfarb

430 U.S. 199（1977）

鄭津津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在「聯邦老年、死亡以及身心障礙保險福利計畫」的規定下，男性被保險人生前若為社會安全法所保障，其妻即可在丈夫死後請領死亡給付，不論該寡婦對其死去丈夫的依賴程度。然而，如果被保險人是女性，其夫若要在妻死亡後請領死亡給付，則該鰥夫必須證明其妻生前提供其一半以上的生活所需，該鰥夫方有請領死亡給付之資格。此種基於性別的區分是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正當程序條款下的平等保護原則，因為此種區分造成繳納相同社會安全稅的女性勞動者，相較於男性勞動者，提供較少的保障給予其配偶，故剝奪了女性勞動者保障其家人的權利。

（Under the Federal 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Benefits Program, survivors' benefits are payable to the widow of a husband covered under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regardless of the degree of her dependency upon the deceased husband, but survivors' benefits are payable to the widower of a wife covered by the Act only if the widower was receiving at least one-half of his support from the deceased wife. The sex-based distinction of the program violated equal protection under 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since, as a result of the distinction, female workers who were required to pay social security taxes produced less protection for their spouses than was produced by men, thus depriving women of protection for their families.）

關 鍵 詞

survivors' benefits（死亡給付）；due process clause（正當程序條款）；equal protection（平等保護）；social security（社會安全）；sex-based distinction（基於性別的區分）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Brennan 主筆撰寫）

事 實

漢娜・高德法女士（Hannah Goldfarb）在紐約市公立學校系統中擔任秘書將近二十五年，直到一九六八年死亡爲止。在她任職期間，高德法女士皆有根據「聯邦保險提繳法」繳納全額的社會安全稅。高德法女士死亡時，其夫里昂・高德法先生（Leon Goldfarb）仍在世，故提出死亡給付的申請，但卻遭到拒絕。高德法先生被拒絕給付的理由是「其不符合請領死亡給付的要件，爲符合請領死亡給付的要件，高德法先生必須證明在其妻死亡之前，其一半以上的生活所需皆係由其妻提供的。」

爲挑戰此種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規定（42 USCS 402（f）（1）（D）），高德法先生在美國聯邦地方法院紐約東區分院提起訴訟，該院判決此項規定歧視女性勞動者，係一項違憲之規定。

判 決

維持原判決。

理 由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主張系爭規定（42 USCS 402（f）（1）（D））違憲主要是依循 Weinberger v. Wiesenfeld 一案的判決，該院認爲不論高德法夫妻在工作時對於家庭支出的貢獻比例爲何，高德法女士皆有權知悉當他們夫妻兩人或是其中一人退休時，將享有因之前繳交之社會安全稅所帶來的福利，且若她先其夫離世時，其夫可享有因她繳納社會安全稅所帶來的福利。高德法女士和其他男性勞動者以相同的稅率繳納社會安全

稅，且女性勞動者與男性勞動者同樣關切其配偶在老年時的福利，42 USCS 402（f）（1）（D）這種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規定，課予鰥夫而非寡婦一項舉證責任，證明其在經濟上對其死亡配偶的依賴，係涉及有關平等保護的問題。

在 Frontiero v. Richardson 一案中，相關法律提供已婚男性軍人駐營加給、醫療以及牙醫保險，不論其配偶是否依賴其扶養，但如果是已婚女性軍人，其必須證明其提供配偶一半以上的生活所需，方有資格請領上述之津貼與福利，此法被判決違憲。爲證明此項性別差別待遇規定的合法性，國防部提出下列論點：「按實證經驗來說，在我們的社會中，妻子多是依賴丈夫扶養，少有丈夫在經濟上仰賴妻子。因此，爲節省成本與時間，國會可合理地推論男性的妻子在財務上是依賴丈夫的，而女性則需負舉證責任來證明其在經濟上供應丈夫的事實。」此項論點並未被法院接受，法院認爲此種爲了達成行政上的便利而對同是服役於軍中的男性與女性成員做出差別待遇的規定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

本案與 Weinberger 一案所呈現的問題是相同的。在 Weinberger 一案中，系爭法律拒絕提供相關保險給付給喪偶且育有子女的鰥夫，但卻准許給予同樣情況的寡婦相關的保險給付。寶拉·懷森弗得（Paula Wiesenfeld）是家中的主要經濟支柱，死於難產，留下甫出世的嬰兒及其丈夫史帝文（Stephen）。史帝文爲他自己與其子申請死亡給付，其子的申請得到批准，但史帝文的申請卻遭到拒絕，因爲該項給付只提供給女性。此項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規定被法院判決爲違憲，該院認爲雖然男性比女性更常成爲家中的經濟支柱的看法並非全然缺乏實證經驗的支持，但此種現象並不足以正當化該項規定否定職業婦女的努力以及她們對家中經濟所做顯著貢獻的事實；該院更進一步指出該項規定很明顯地剝奪了女性保護其家人的權利，而此項權利是男性只要有工作就可以享有的。事實上，在該案中所涉及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規定比 Frontiero 一案中的相關規定更爲惡質，因爲在寶拉工作的幾年中，她所繳的社會安全稅皆是由其薪資中直接扣除的，但她無法享有和遭遇類似情形之男性可以保護家人的權利，且必須忍受政府扣除其部分薪資繳納社會安全稅，之後再以其所繳的稅金提供福利給其他人的事實。

在本案中，系爭規定（42 USCS 402（f）（1）（D））剝奪了女性勞

動者保護其家人的權利，而此項權利是男性勞動者只要有工作就可以享有的。在漢娜・高德法女士二十五年的秘書生涯中，她所繳的社會安全稅皆是自其薪資中直接扣除的，但由於 42 USCS 402（f）（1）（D）的規定，她無法享有和遭遇類似情形的男性一般享有保護家人的權利，且必須接受其所繳納的社會安全稅被拿來作爲福利提供給他人的事實。Wiesenfeld 一案所作成的判決使得聯邦地方法院在審理本案時必須決定 42 USCS 402（f）（1）（D）此項規定會導致受薪女性雖依法繳交社會安全稅，但所能帶給其配偶的保護卻少於同樣依法繳交社會安全稅的受薪男性，此種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規定是違憲的，故應被禁止。

被告在第一審被判敗訴後提起上訴，並在上訴時將重點放在「平等保護」的爭點上，而不是放在對受薪女性的歧視問題上，或是受薪女性的鰥夫是否被違憲的規定（受薪女性的鰥夫必須證明其妻在生前對其有扶養之實，而受薪男性的寡婦則不需證明其夫在生前對其有扶養事實）歧視的議題上。上訴人認爲政府拒絕給付相關福利津貼給受薪女性的鰥夫其實是在反映國會對此項議題的看法，亦即受薪女性的鰥夫不太可能依賴其配偶生前的扶養，故拒絕給付此項福利津貼給受薪女性的鰥夫是合理適當的，除非受薪女性的鰥夫確有依賴其配偶生前扶養的事實。

在 Weinberger 一案中，上訴人的論點在於系爭法律應該自受益人的觀點來看，而非由實際上受薪者的角度來看;換言之，此種立法反映出國會在「經濟援助需求」的判斷是認爲有幼兒要扶養的寡婦比有幼兒要扶養的鰥夫需要更多經濟上的支援。然而，法院在該案中是由受薪者的角度來分析此種基於性別分類的法律規定，並認爲此種分類是違憲的，因爲福利津貼的給付不得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僅因受僱人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

社會安全制度長久以來皆是屬於社會保險的一環，在此制度下，被保障之受僱人與其雇主繳納稅金至一項獨立於一般聯邦稅收的基金中，用以購買保障來因應年老、失能及死亡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在高德法太太工作的二十五年當中，她和她的男同事以同樣的稅率繳交社會安全稅，但在 42 USCS 402（f）（1）（D）的規範下，其男同事能獲得的保險福利卻比她要多，故此項規定非法地歧視受薪女性。和受薪男性所能得的保障相比，該法提供受薪女性較少的保

障，儘管兩者家庭的需求可能是相同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受薪女性與其配偶皆因系爭法律規定而處於較爲不利的地位，故對本案中有關「平等保護」的爭點，不能僅將焦點放在系爭法律對於鰥夫與寡婦的差別待遇，而也應將該項法律歧視受薪女性一併納入考量。

在本案中，法院同意國會在社會福利計畫下，有相當大的權限在分配非契約性質的福利上做分類，尤其是在處理社會福利計畫下有關非契約福利的拒絕給付時。只有在法律缺乏正當理由，且明顯地以專斷的方式做分類時，法院才得以違反正當程序爲由來宣告此種法律規定違憲。

然而，這並不當然使社會福利相關立法得免於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的監督。國會制訂社會安全法來界定哪些人可以得到福利津貼的補助，在制訂此項法律時，國會與負責執行的政府部門，基於互爲競爭的政策與利益考量，可能會針對該法做出不同的判斷與認定，若是如此，國會所做的決定應被負責執行的政府部門所尊重，但爲能經得起憲法的挑戰，法律中基於性別的分類必須符合重要的政府目標，並且在實質上與成就這些目標有關。然而，國會此種分類常常被發現是建立在「過時觀念」以及「古老且過於廣泛」的概念上，故違反了平等保護的規定。

Wisenfeld 一案明白地否決一項論點—「被保險員工所享有未來社會安全福利的『非契約性』利益可以排除任何否定平等保護的主張」，但 Wiesenfeld 一案同時也主張，系爭利益是「非契約性」的利益並不代表「一個被保險員工沒有權利在就業相關利益上得到和其他員工相同的待遇，或是允許單以性別爲基礎而對被保險員工所做的差別保障規定」。反之，此種利益是與被保險人工作多年所賺取薪資有直接相關的利益，而非與被保險人的需求有直接相關的利益，故如須依法律所定之分類來分配利益時，且其分類的方式僅是基於被保險人的性別，則該項分類必須具有充分的正當理由。

在本案中，上訴人認爲 Frontiero 和 Wiesenfeld 兩案所涉及的法律與本案所涉及的 42 USCS 402（f）（1）（D）有不同的立法目的。上訴人認爲 42 USCS 402（f）（1）（D）提供男性被保險人的寡婦和能夠證明依賴被保險人生前撫養的鰥夫相關的福利津貼，該法基於鰥夫與寡婦對於社會福利的不同需求合理地定義了不同的申請津貼標準。換言之，國會可以基於女性在職場上受到較多歧視（尤其是

年長的女性），以及女性較有可能依賴其配偶扶養等原因，來合理推斷領取福利津貼且未在經濟上依賴配偶的寡婦比未在經濟上依賴配偶且未領取福利津貼的鰥夫更需要領取此項福利津貼。

42 USCS 402（f）（1）（D）並非單純爲了節省「決定哪一個被保險人的配偶才是眞正依賴被保險人」所需要花費的開支，並減少做成此項決定的麻煩而制訂的。42 USCS 402（f）（1）（D）本身是著眼於「經濟上的依賴」，而非「需求」。國會選擇給付福利津貼給予那些能証明自己受到配偶生前扶養的鰥夫，而非那些能證明自己有需要領取福利津貼的鰥夫。換言之，從此項法律規定的表面來看，「經濟上的依賴」，而非「需求」，才是眞正決定被保險人的配偶得否領取相關福利之標準。

此外，「聯邦老年、死亡以及身心障礙保險福利計畫」的一般性設計顯示出「對受薪者經濟上的依賴」是決定受益人類別的關鍵因素。此項計畫之目的在於保障被保險的受薪者及其家屬，使其免於因受薪者的退休、失能或死亡而失去該項所得，故而對其家庭造成經濟與社會上的衝擊，並藉由給付福利津貼來取代該項薪資的損失。因此，如同其他的福利計畫，此項計畫的福利津貼並不是單純地給付津貼給需要經濟支援者，而是將此項福利津貼給付予被受薪者生前扶養的家屬。此外，除非是被保險人的妻子或寡婦，被保險人其餘的家屬，只有在證明其爲被保險人生前所扶養，方有資格申領此項福利津貼。如果個人未在某個程度上依賴被保險人的扶養，則當被保險人因故離開職場時，該個人並不會蒙受經濟上的損失。因此，整個法律設計係以「眞正的經濟上依賴」作爲是否符合領取「聯邦老年、死亡以及身心障礙保險福利計畫」福利津貼的基本要素，該法明文免除被保險人之妻或寡婦的舉證責任，正是反映出國會認爲被保險人之妻或寡婦多是依賴被保險人扶養的推斷。總之，不論是何種情況，皆無法認定國會主張在經濟上不依賴被保險人的寡婦應該得到「聯邦老年、死亡以及身心障礙保險福利計畫」所給付的福利，只因爲她們比在經濟上不依賴被保險人的鰥夫更需要福利津貼的給付。

42 USCS 402（f）（1）（D）的立法史亦反駁了上訴人的論點。在原先社會安全法的老年條款中，退休金福利僅給付給受薪者本人，並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將整筆退休福利給付予其繼承人。在一九三九年修正社會安全法時，保險範

圍擴大及於其他家屬，男性被保險人的妻子及寡婦是首先獲得福利津貼的家屬。一九三九年社會安全法修正案的基本宗旨在於「將家庭視爲一個單位並提供其更充分的保障」，眾議院籌款委員會批評以往一次給付退撫金的制度，因其並未考慮死亡的被保險人是否有留下在經濟上依賴被保險人的家屬。社會安全局在一份由總統轉交給國會的報告書中首次提出社會安全法的修正案，建議採取「生存者福利」的政策，因爲寡婦與孤兒是在經濟上依賴被保險人的首要族群，對他們而言，按月給付的福利津貼會比一次給付的撫恤金提供更爲顯著的保護。除了建議採用「生存者福利」政策外，社會安全局還建議擴張老年退休年金福利的範圍至退休勞工的年老妻子。在參議院中，主要支持此項修正案的是參議員哈瑞森（Harrison），其批評當時的福利制度完全不考慮被保險受薪者是否有在經濟上依賴被保險人的妻子，或是在被保險人死亡時，是否留下孩子、寡婦或父母。然而，沒有任何文獻顯示國會在立法過程中有對於在經濟上不依賴被保險人的寡婦有任何的關注，或是認爲雖然這些寡婦在經濟上不依賴被保險人，仍應給予此項福利的給付，以補償她們因性別歧視所受到的不利益。誠如 Wiesenfeld 一案所認定的觀點，社會安全法的起草者是將該法建立在當時的社會通念上---男人應擔負起對妻子與子女的扶養責任。

直至一九五０年，生存者福利以及老年福利津貼的給付方才擴及至被女性保險人的丈夫與鰥夫，此項條款的立法史證明了國會並未以「補償性的意圖」來創設經濟上不依賴被保險人的寡婦與鰥夫之間的差別。此項改革的動力是來自於社會安全制度的諮詢委員會，其建議將福利津貼給付範圍擴及於「年老者、依賴配偶扶養之丈夫…以及鰥夫」。此項建議之目的在於「使得依賴配偶扶養的女性及男性能得到平等的保障，因爲在現行制度下，女性被保險人欠缺男性被保險人所能得到的某些保障。」從社會安全諮詢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其認爲原先的社會安全法對於依賴女性被保險人扶養之丈夫與鰥夫的保障規定與男性被保險人之妻子與寡婦的保障規定是相同的，並沒有刻意地因依賴女性被保險人扶養之丈夫與鰥夫需求較少就提供較少的保障。儘管原先的法案（後來成爲一九五０年社會安全法修正案）並未包含提供依賴女性被保險人扶養之丈夫與鰥夫福利的保障條

款，但參議院財務委員會之後增加了此項條款，因爲該委員會相信提供給女性及男性被保險人所扶養之人的保障應有相當性。在一九五０年，如同在一九三九年，沒有任何文獻顯示國會有任何意圖針對非依賴男性被保險人扶養之妻子創設任何不同的福利。

因此，我們可做出以下的結論，對於「非依賴被保險人扶養之寡婦及鰥夫的差別待遇」並非如同上訴人所主張的是源自於國會「刻意地認爲前者有較大的經濟需求而提供救濟」，而是源自於國會「意欲在經濟上援助死亡受薪者所扶養的配偶，並同時推定妻子通常是依賴其配偶扶養」的論點。此點精準地呈現了 Frontiero 和 Wiesenfeld 兩案所面臨的狀況，事實上，唯一能將「妻子對於配偶的經濟依賴」此項推論置入法條的理由只是單純地建立在一個「古老且過於廣泛」的一般性推論—「如果單純地將相關福利津貼給付給男性被保險人的寡婦，而不要求男性與女性被保險人的配偶提出被扶養的証明，如此的措施可以節省政府的時間、金錢和氣力」。在 Frontiero 與 Wiesenfeld 兩案中我們作此結論，如今在本案中，我們一樣認爲此種一般性推論不足以正當化本案中與僱傭相關的福利分配上之性別歧視。

2. Price Waterhouse v. Hopkins

490 U.S.228 (1989)

劉靜怡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當民權法第七章所規定的原告（受僱人）證明其性別乃是聘僱決定中所考慮的因素時，被告（雇主）可以藉由滿足民事舉證責任的方式，證明「在沒有考量原告的性別時，依然會做出相同決定」來避免有責的判決。

   （When a plaintiff in a Title VII case proves that her gender played a part in an employment decision, the defendant may avoid a finding of liability by proving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that it would have made the same decision even if it had not taken the plaintiff's gender into account.）

2. 透過民權法第七章所建立的員工權利和雇主特權兩者之間的平衡關係，乃是透過排除某些區別員工的基礎，同時保留雇主某程度決定權的方式，來取得這樣的平衡。民權法第七章 703(a)(1)所規定的「因為」（because of）此一用語，其目的乃是要禁止雇主基於員工個人的性別，做出不利於員工的聘僱決定；此一規定要求在審查繫爭決定時，應該考慮做成決定時所牽涉的正當理由和不正當的理由。

   （The balance between employee rights and employer prerogatives established by Title VII by eliminating certain bases for distinguishing among employees while otherwise preserving employers' freedom of choice is decisive in this case. The words "because of" in 703(a)(1) of the Act, which forbids an employer to make an adverse decision against an employee "because of such individual's . . . sex," requires

looking at all of the reasons, both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contributing to the decision at the time it is made.）

3. 本案中，上訴人無法僅僅藉由指出被上訴人的「人際關係問題」來滿足其責任，做為構成拒絕被上訴人 Hopkins 升任合夥人的合法理由，反之，上訴人必須證明其所持的理由，乃是可以拒絕被上訴人升任合夥人的唯一合法理由。

（Here, petitioner may not meet its burden by merely showing that respondent's interpersonal problems - abrasiveness with staff members - constituted a legitimate reason for denying her partnership; instead, petitioner must show that its legitimate reason, standing alone, would have induced petitioner to deny respondent partnership.）

4. 民事訴訟的一般規則，通常都可以適用於基於民權法第七章而起訴的案件，根據民事訴訟的原則，本案當事人只需要滿足優勢證據（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的舉證責任，來證明他們的主張即可。

（Conventional rules of civil litigation generally apply in Title VII cases, and one of these rules is that the parties need only prove their case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關 鍵 詞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一九六四年民權法）；Title Ⅶ（第七章）；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優勢證據）；employment decision（聘僱決定）；sex stereotyping（性別成見）；impermissible motive（不受允許的動機）；burdens of proof（舉證責任）；but-for causation（「若非因為」因果關係）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Brennan 主筆撰寫）

事　實

被上訴人 Hopkins 在一九八二年被提名爲上訴人會計師事務所合夥候選人時，是擔任上訴人會計師事務所 Price Waterhouse 的資深經理。在做成是否准許被上訴人的決定之前，該會計師事務所根據其所慣用的決定程序，向該會計師事務所的所有合夥人們要求提供有關被上訴人的評估意見，而這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幾乎都是男性。在那些評估意見中，針對被上訴人是否應該被升任爲合夥人，正反意見相當對立，支持被上訴人的合夥人，對於被上訴人的能力和爲該會計師事務所確保主要客户往來關係的紀錄，都有高度的評價；但是，有些評估意見則是尖刻批評被上訴人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尤其是對其粗率魯直的態度，頗有微詞。在支持和反對被上訴人的正反意見中，都分別有幾份評估意見暗指被上訴人的行爲舉止傾向於男性化。當時其合夥人候選資格，既未被接受也未遭否決，而是被延後到來年重新考慮。其中有一位合夥人在向被上訴人說明有關其合夥人候選資格的考量何以被保留下來，延至來年考慮時，則是建議被上訴人在言行舉止和衣著方面做比較女性化傾向的改變，以增加其獲得升任合夥人決定的可能機會。後來，上訴人這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決議否決其成爲合夥人，被上訴人乃基於一九六四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第七章（Title Ⅶ）的規定，向聯邦地區法院提出訴訟，控告這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在做成將其納爲合夥人與否的決定時，對其有性別歧視之舉。在經過一連串的訴訟程序之後，本案上訴至本院。

判　決

本院不同意下級法院的判決見解，本案發回下級法院。

理　由

被上訴人 Ann Hopkins 在一九八二年被提名爲上訴人會計師事務所合夥候選人時，是 Price Waterhouse 的資深經理，如前所述，她的候選人資格既沒有被接受也沒有被否決，而是被延後到來年再行考慮。後來該事務所的合夥人拒絕重新考量其合夥候選人的資格，被上訴人便向聯邦地區法院起訴，根據一九六四年民權法第七章的規定，控告該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在做成其是否應該成爲合夥人

的決定時，對她有性別歧視。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就責任問題，做出對 Hopkins 有利的裁判，而上訴法院也肯定此一裁判。本院同意受理此一上訴案件，來解決上訴法院間關於「根據民權法第七章所提起的訴訟，當發現聘僱決定是同時基於正當合法的（legitimate）動機以及不正當不合法的（illegitimate）動機而做成時，原告和被告各自應該負擔的舉證責任爲何」這個問題的爭議。

Price Waterhouse 是一所全國性的專業會計師事務所，Ann Hopkins 在 Price Waterhouse 會計師事務所的華盛頓特區政府服務部門工作，在這個部門的合夥人提名她爲合夥候選人時，她已在該部門工作了五年。當時整個事務所共有 662 名合夥人，其中只有七名是女性合夥人。在當年的 88 位合夥候選人中，只有 Hopkins 一人是女性。在這 88 個合夥候選人中，後來共有 4 位獲准成爲合夥人，其中 21 位遭到拒絕，另外則有 20 人（包括 Hopkins 在內）被決定延到來年再行考慮。在對 Hopkins 提出評估意見的 32 位合夥人當中，其中有十三位支持她成爲合夥人，有三位建議將其候選人資格先行保留，有八位是表示對 Hopkins 並無特殊意見可言，另外有八位則是建議拒絕她成爲合夥人。

在一份支持其候選資格的聯合聲明當中，Hopkins 服務部門的合夥人們，列舉了她如何成功地花費了兩年的努力，爲該事務所獲得美國國務院兩千五百萬美元的合約，那些合夥人將此稱爲「傑出的表現」，並且認爲 Hopkins 截至當時爲止的表現，實際上已經達到合夥人的程度。儘管 Price Waterhouse 事務所在審判過程中，企圖要儘量低調處理 Hopkin 在該計畫中的貢獻，下級法院 Gesell 法官的判決明確地指出，Hopkins 在 Price Waterhouse 贏得國務院兩千五百萬美元價值的契約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而且，在當年其他合夥候選人當中，沒有一個在爲該會計事務所獲取主要契約方面，有可以與之相比的紀錄可言。

Hopkins 服務部門的合夥人，同時也讚賞她的性格特質，在這份聯合聲明中，該部門合夥人形容 Hopkins 是一個具有靈敏反應能力、堅強性格、獨立且正直的傑出專業人士；客户似乎也贊同這樣的評價，在本案審判過程中，便有一名國務院的官員形容 Hopkins 乃是「極有能力且極聰明」、「堅強且直率，工作效率非常高、積極而且有創造力」，另一名國務院高層官員則是讚美 Hopkins 果斷、心胸寬大

及思路清晰，同時認爲 Hopkins 是個具有啓發性的溝通對話對象。這類的評價讓下級法院的 Gesell 法官認爲 Hopkins「跟客户相處並沒有困難，而且其客户似乎也相當滿意她的工作成效」，同時，Hopkins「普遍地被認爲是一個相當積極的工作計畫領導者，她工作時數長，積極督促大家能夠在期限前完成工作，並且能夠要求和她一起工作的各領域同僚做出更多貢獻」。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Hopkins 的積極進取似乎也變成是一種負面的粗率魯直特質，而其工作同仁則是首當其衝地必須面對 Hopkins 粗率無禮的態度。在她企圖成爲合夥候選人之前，評鑑其工作狀況的合夥人，就曾經建議她要改善她和工作同仁之間的關係。雖然，在嗣後的評鑑當中可以看出已有改善，但是，Hopkins 在這方面所呈現的缺點，終究註定她無法成爲合夥人。實際上，每個合夥人對 Hopkins 所提出的負面評價內容（即使是那些支持她成爲合夥人者也是如此），都跟她的「人際關係技巧」有關。Gesell 法官強調「不管是支持或反對其合夥候選人資格的人都指出，她有時候過於積極、過份嚴厲，難以共事，而且對工作同仁沒有耐性」。

儘管如此，還是有明顯的跡象顯示，有些合夥人只因爲 Hopkins 是個女人，因此就對她的個性做出負面評價。有一個合夥人形容她爲「男性化」，另一個合夥人則認爲她「實在不像個女性」，第三個合夥人則建議她「去美姿學校上課」；有些合夥人則批評她用詞不雅。而支持她的合夥人則認爲，那些反對她的合夥人之所以會這麼說，只是因爲他們認爲女性不應該用那種言語來表達罷了。不過，負責向 Hopkins 說明有關其合夥人候選資格的考量何以被保留下來，延至來年考慮的 Thomas Beyer，的確是在其說明中建議被上訴人在言行舉止和衣著方面做比較女性化優雅傾向的改變，也就是建議 Hopkins 應該要「走路像女人一點、談吐像女人一點、穿著有女人味一點，化點妝，做個頭髮，戴上珠寶」，以增加其獲得升任合夥人決定的可能機會。

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的社會心理學家，心理學副教授 Dr. Susan Fiske 在作證時指出，Price Waterhouse 這家會計師事務所選拔合夥人的過程，可能受到性別偏見的影響；Dr. Susan Fiske 的證詞內容，不止強調合夥人們過度以性別爲基礎的評論意見（sex-based comments），同時也強調合夥人們性別中立的

評論意見（gender-neutral remarks），而做出這類評論意見的合夥人們，對 Hopkins 並不熟識，但是卻對她做出嚴厲的批判。舉例而言，有個合夥人就很直接地指出，Hopkins 普遍受到全體員工的厭惡，而另一個合夥人則是形容她「始終使人厭惡且不愉快」，然而提出這些評論意見的人與 Hopkins 幾乎未曾有過接觸。根據 Friske 的說法，Hopkins 的獨特地位（也就是合夥候選人當中的唯一女性），以及這些評論意見的主觀性，都很可能是讓這些嚴厲的評論意見變成是性別偏見產物的原因，雖然，Friske 也的確承認她無法確切地指出哪些特定的批評才是這種性別偏見的結果。Friske 的見解，是以那些已經被提出來的評論意見爲基礎，她同時也解釋道：在未曾會見涉及決策過程者的情況下，社會心理學家一般而言都會做出這種結論。

在幾年前，其他女性合夥候選人也曾經遭到以性別爲基礎的言詞評論。Gesell 法官認爲，一般而言，如果合夥人們認爲這些女性候選人在成爲有效率的專業經理人時，還能保有女性氣質，那麼，對那些女性合夥候選人來說，會是有利的；在這個環境之下，被認定成「女性解放者」，是會被視爲負面評價的。事實上，Gesell 法官指出，在幾年以前，該會計師事務所有個合夥人就不斷地在他的評論意見中表示，他無法認眞地將任何一個女人當作合夥候選人看待，而且，他認爲女性甚至連資深經理的職務都無法勝任—不過，該會計師事務所並沒有對他所提出的評論意見，採取任何勸阻行動，並且還將該合夥人的投票紀錄在該評估的全文摘要中。

Gesell 法官認爲 Price Waterhouse 這家會計師事務所在合夥人升任決定中強調人際關係的技巧，是正當合法的作法，並且也認爲該會計師事務所並沒有將對 Hopkins 的人際關係技巧所做的抱怨，包裝成用來掩飾差別待遇作爲的藉口。此外，Gesell 法官也認爲，該會計師事務所並沒有因爲 Hopkins 是個女性，就特別強調人際關係技巧這個特質；雖然，有其他男性合夥候選人即使是缺乏人際關係技巧這項特質，依然還是成爲合夥人，不過，法官卻也同時認定這些男性候選人另外還擁有 Hopkins 所欠缺的其他正面特質。

然而，Gesell 法官繼續指出，有些合夥人對於 Hopkins 的印象，乃是來自於狹隘地對女性的適當行爲加以限定的看法，而這樣的狹隘看法，根本不該出現，但是 Price

Waterhouse這家會計師事務所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拒絕採信這些評論意見。Gesell 法官認爲，Price Waterhouse乃是藉由有意識地相信這些起因於性別成見(sex stereotyping)的評論意見，違法地對Hopkins 予以性別歧視。Gesell 法官指出，Price Waterhouse 大可提供清楚明確而且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即使在沒有差別待遇發生的情況下，Hopkins 的合夥候選人資格依然會被保留到以後才考慮，但是Price Waterhouse 並未負起這個舉證責任。

上訴法院贊同地方法院的最終結論，但是其所持的判決理由，則是和地方法院所採取的判決理由有些微的差異：上訴法院認爲，即使原告證明「歧視」在聘僱決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被告如果可以透過清楚明確而且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即使在沒有差別待遇發生的情況下，也會做出相同的決定，那麼，被告就不用負擔做成聘僱決定時進行差別待遇的法律責任。在這種處理模式下，雇主只要可以證明他在未具備不受允許的動機的情況下，也會做出相同的決定，就不會被認定爲違反民權法第七章的規定。地方法院所持的立場，是認爲雇主滿足了這樣的舉證責任之後，只能避免掉衡平性救濟（equitable relief）的責任而已。本院認爲，和地方法院所持的見解相較之下，上訴法院採取的判決態度是比較可取的，但是，這兩個下級法院在「要求雇主自己提出清楚明確而且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這方面，都犯了錯誤。

民權法第七章所規定的因果關係標準，其目的是爲了判斷何種行爲違反民權法的規定。根據 Price Waterhouse這家會計師事務所提出的抗辯主張，乃是認爲雇主只有在做成影響特定受雇者地位或升遷的聘僱決定時，將受雇者的性別、種族、原始國籍或宗教背景因素，當做關鍵性的考量因素時，才違反民權法第七章的規定。根據 Price Waterhouse 此一理論，即使原告證明其性別因素在聘僱決定中佔據一定的地位，依然不足以獲得勝訴，她還必須證明如果雇主未採取差別待遇的歧視作法的話，那麼該聘僱決定的結果便會有所不同。然而，相對地，原告 Hopkins 則是主張，只要雇主任由以上的性別、種族、原始國籍或宗教背景等因素其中之一，成爲聘僱決定的考量因素之一，那麼便構成雇主違反民權法的規定。根據 Hopkins 的主張，原告只要證明了上述情事的發生，那麼，雇主在證明了其即使在未採取差別待遇的情況下，也會做出相同

的聘僱決定之後，只能用來限制其所負擔的衡平性救濟的法律責任，而不可以用做全然避免掉法律責任的事由。本院則是採取介於兩者之間的判決立場。

在通過民權法第七章的時候，國會標舉了性別、種族、原始國籍和宗教背景等數個簡單但重要的因素，宣示在做成選拔、評估或薪給等聘僱決定時，不可將上述因素當做相關的考量因素。不過，國會也並未禁止雇主在做成聘僱決定時，考量其他資格和特質。簡言之，民權法第七章的立法宗旨，在於消除某些區別的基礎，但同時爲雇主保留某些選擇自由。此一在雇主權利和受雇者權益兩者之間維持平衡的處理方式，正是我們在眼前這個案件裡要做的決定。

國會的立法原意是要禁止雇主在做成聘僱相關決定時將性別列爲考量因素，從該立法的表面意義來看，應該便是已經相當明顯的了。本院認爲，該立法用語的意義，便是明示性別應該是聘僱決定做成時不相關的因素。將立法用語中「因爲」（because of）此一用語，解讀爲「若非因爲」因果關係（but-for causation），正如同 Price Waterhouse 這家會計師事務所主張者一樣，乃是誤解了法律用語的意義。

「若非因爲」因果關係乃是一種假設性的建構解釋方式，在決定某一因素是否屬於某一特定事件的「若非因爲」因素時，我們會先假設在該特定事件發生時，該因素是存在的，接著，我們要進一步判斷的是，即使該因素不存在的話，那麼，該事件還是會出現同樣的結果，系爭法律 703(a)(1)中所使用的用語時，應該是要求我們在審視爭議時，必須考量性別是否在聘僱決定做成當時的考慮因素。再者，由於我們都知道「因爲」（because of）此一用語，並不意味著「僅僅因爲」（solely because of），我們也知道民權法第七章的立法目的，也包括要去譴責那些在決定做成當時，混合了正當理由和不正當理由做爲基礎的決定，因此，當雇主在做成聘僱決定時，同時考量性別因素和其他正當理由，那麼該決定就是「因爲」（because of）性別因素和其他正當理由而產生的—即使性別因素沒有被列爲理由，還是會做成同樣的決定，依然不改變「因爲」（because of）性別因素做成決定的這個認定。

多數判決意見指出其針對法令用語中的「因爲」（because of）所採取的解釋，還可以從民權法第七章中並未規定任何一種情況，容許雇主將性別因素列爲聘僱決定

的考量因素，而獲得支持。換句話說，民權法第七章的規定，並不承認性別因素是聘僱決定中可以容許的「職業所需實際資歷」（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簡稱BFOQ）此種和雇主所經營之事業合理相關的條件。從民權法繫爭條文內容中唯一可以推演出來的合理結論便是：無論如何，一個人的性別不能構成影響其聘僱升遷的決定的因素。甚至，民權法第七章還禁止雇主使用性別此一因素，做爲阻撓聘僱機會的非直接障礙，這從聯邦最高法院過去的判決中，也可以推論出來。參見 Watson v. Fort Worth Bank & Trust, 487 U.S. 977 (1988); Griggs v. Duke Power Co., 401 U.S. 424 (1971).

不過，確定雇主不能將性別因素列爲聘僱決定的考量因素這一點，並不是終點，因爲這只說明了民權法第七章的其中一個面向而已。該立法的另外一個重要面向，是維護雇主的選擇自由；聯邦最高法院指出，要達成維護雇主此一選擇自由的目的，只要雇主證明：即使其不將性別因素納入考量，雇主還是會做成相同的聘僱決定，那麼便不該要求雇主負擔法律責任。至於此一立法對於受雇者權益的保護，從法律規定本身和立法史兩者，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無論是從國會或聯邦最高法院的紀錄中，都可以找到。

首先，國會允許「職業所需實際資歷」（BFOQ）的存在，代表國會在立法之初，並不願意要求雇主必須改變其所經營的行業本質上的需求，以回應該立法。其次，本院在其過去所做的有關差異影響（disparate impact）判決裡面，強調雇主的營業需求（business necessity）（參見前引 Watson 和 Grigg 兩判決），在有關差異待遇（disparate treatment）的案件裡面，則是強調正當的非歧視性理由（legitimate, nondiscriminatory reasons）（參見 McDonnell Douglas Corp. v. Green, 411 U.S. 792, 802 (1973) 和 Texas Dept. of Community Affairs v. Burdine, 450 U.S. 248 (1981)），這都是因爲本院深知民權法第七章的衡平立法原意所致的結果。

倘若雇主忽略民權法第七章的衡平立法原意的話，那麼，國會是希望能夠自然地將重點放在受雇者或申請工作者的個人條件上面。此一希望雇主將聘僱決定的重點放在受雇者或申請工作者的個人條件上面，而非基於性別、種族、原始國籍或宗教背景等因素做出聘僱決定，在國會立法史上，紀錄所在多有。本院認爲，這裡的重

點應該是：雖然雇主在做成聘僱決定時，不可以將性別因素納入考量（除非是在符合「職業所需實際資歷」此一條件的狹隘情況下），但是，若是基於性別因素以外的其他正當理由，雇主還是可以做出不利於特定性別的受雇人或工作申請人的決定。因此，基於以上所述的原則，一旦民權法第七章的原告證明性別因素在繫爭聘僱決定中，扮演動機性（motivating）的角色，那麼，被告只要證明即使沒有性別因素扮演此一角色，還是會做成相同的聘僱決定，就能免於負擔法律責任。此一舉證責任的平衡，是民權法第七章衡平權益的結果。

在上述的 Burdine 判決裡，即使原告已經基於民權法第七章的規定，證明了表面上具有歧視待遇的案件，舉證責任並不立即移轉到雇主身上，由雇主證明其所提出之所謂做成聘僱決定的正當理由，是眞正的理由。在本案中，原告針對性別因素是否在聘僱決定中佔有地位，依然負證明責任，所以，本案並非其述的單純「舉證責任移轉」問題，被告的負擔，毋寧說是積極提出抗辯的負擔。Price Waterhouse 這家會計師事務所主張，除非原告能夠提出相當實質的證據，證明 Price Waterhouse 所提出的有關 Hopkins 未能升任爲合夥人的辯護理由，都不是其聘僱決定背後「眞正的原因」，否則被告 Price Waterhouse 這家會計師事務不應該負擔任何舉證責任；Price Waterhouse 的主張，充其量只是在覆述，在多重動機（mixed-motives）的案件中，原告的舉證責任必須符合上述 Burdine 案判決所建立的架構而已。然而，當某一案件所涉及者，乃是同時包含正當合法的動機和非正當合法的動機這樣的多重動機時，針對何者才是做成聘僱決定的「眞正理由」這個問題發問，根本毫無道理。

本判決之作成，並未建立新的原則，過去的法院判決，已經一再確認，當雇主使用不具正當性的理由區別受雇者時，必須負擔爲其所做的決定提出正當化說明的義務。換言之，當原告證明雇主在做成對其不利的聘僱決定時，不受允許的動機的確扮演了角色，那麼，被告便應該積極證明即使沒有該等不受允許的動機扮演角色，依然會做成相同的聘僱決定。

簡言之，本院在本案中認，當民權法第七章的原告證明其性別因素在雇主的聘僱決定中具有動機性的地位時，被告只有在透過優勢證據（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方式證明其即使未將原告的性別因素納入考量，依然會做

成相同的聘僱決定時，才能免除法律責任。因爲下級法院在決定被告的舉證責任程度時，要求被告必須負擔明確且具有說服力（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係錯誤的，所以，本院推翻上訴法院對 Price Waterhouse 所爲之應負擔法律責任的不利判決，將本案發回該法院做進一步的審理。

（大法官 White 、 O'Connor 所提協同意見書；大法官 Kennedy 所提，大法官 Rehnquist，Scalia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均略）

3. Gratz v. Bollinger

539 U.S. 244（2003）

林利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因為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現行新生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中採用種族偏好，而該種族偏好並非是一種可以達成密西根大學所宣稱之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利益而採用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所以這樣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也同樣違反 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和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的規定。（Because the University's use of race in its current freshman admissions policy is not narrowly tailored to achieve respondents' asserted interest in diversity, the policy violates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it also violates Title V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and 42 U. S. C 1981. Accordingly, the Court reverses that por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s decision granting respondents summary judgment with respect to liability.）

關 鍵 詞

Caucasian（白種人）；admission guidelines（入學申請審核準則）；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class action（集體訴訟）；racial preference（種族偏好）；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美國憲法第十四條增修條文的平等保護條款）；rights to 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免於受到差別待遇的權利）；racial discrimination（種族歧視（差別待遇））；class representative（集體訴訟的代表）；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迫切的政府利益）；racial classifications（種族分類）；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針對個人的特質作出個別考量）；standard of judicial review（司法審查的標準）；strict scrutiny（嚴格審查標準）；educational diversity（教育多元化）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Rehnquist 主筆撰寫）

事　實

兩位上訴人 Gratz 和 Hamacher 皆向密西根大學的文學、科學和藝術學院（以下簡稱 LSA 學院）提出入學申請，兩位上訴人皆爲白種人。Gratz 申請進入 1995 年秋季班，但 LSA 學院在 1995 年 1 月通知 Gratz 她的入學許可將延緩至 4 月才能作最後的決定，Gratz 提早入學的申請被拒絕的理由是因爲 LSA 學院雖然認爲 Gratz 具有優異的入學資格，但是 LSA 學院認爲 Gratz 比初次審核就獲得入學許可的那些申請者較不優秀。Gratz 在 1995 年 4 月被告知其入學申請遭到拒絕，於是她進入位於 Dearborn 的另一所密西根大學就讀，並於 1999 年春天畢業。

Hamacher 申請進入 1997 年秋季班，他提早入學的申請也被拒絕，因爲 LSA 學院認爲 Hamacher 的學業成績雖然達到入學標準，但是 LSA 學院認爲 Hamacher 的學業表現程度仍不及那些初次審核就獲得入學許可的申請者。Hamacher 在 1997 年 4 月被告知其入學申請遭到拒絕，於是他進入密西根州立大學就讀。

在 1997 年 10 月，Gratz 和 Hamacher 在密西根東區的聯邦地方法院對密西根大學、LSA 學院，以及 LSA 學院的前後兩任院長 James Duderstadt 和 Lee Bollinger，提起了一個集體訴訟，控告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入學申請審核中採用種族偏好而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以及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等的規定。上訴人訴請補償性損害賠償和懲罰性損害賠償，以彌補他們憲法保障之平等保護權利在過去所受到的侵害，並要求聯邦地方法院以宣示性判決的救濟方式，裁決密西根大學侵害上訴人免於受到差別待遇的權利，同時也要求聯邦地方法院

核發禁制令，禁止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繼續進行以種族爲根據的歧視（差別待遇）行爲，並要求聯邦地方法院命令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讓 Hamacher 以轉學生的身分進入該校就讀。

聯邦地方法院核准上訴人所提出的聲請，允許這個包含自 1995 年以來曾經向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提出入學申請但遭拒絕並且受到該學院以種族爲根據之不平等待遇的所有申請者，組成一個訴訟集體。聯邦地方法院認爲 Hamacher 的種族歧視（差別待遇）訴訟足以代表整個訴訟集體，因此指定 Hamacher 爲該集體訴訟的代表。聯邦地方法院也核准上訴人所提出要求法院將訴訟程序分爲法律責任和損害賠償二階段的聲請，而在法律責任部分的司法程序，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將決定密西根大學在入學申請審核中採用種族偏好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法律平等保護條款。

爲了使得入學申請的審核能夠有一套一致的審核標準，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部門（以下簡稱 OUA）在每個學年都使用一套成文的準則，而這個入學申請審核準則在與本案有關的期間內也有多次的修正。OUA 在審核所有入學申請時會將許多因素列入考量：包括申請者的高中在學成績、申請者的學測成績、申請者所就讀之高中的素質、申請者在高中所修習之課程的難易程度、申請者住所的地理位置、申請者與該校校友的關係、申請者的領導能力，以及申請者的種族。在與本案有關的期間內，密西根大學認爲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人，以及印第安原住民是一群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而事實也明確顯示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幾乎允許每一位符合入學資格的上述族群申請者進入該校就讀。

在 1995 年和 1996 年之間，OUA 審核委員根據申請者的高中在學平均成績（GPA）結合所謂“SCUGA”因素，來審核所有申請者的入學申請。這些“SCUGA”因素包括：申請者所就讀之高中的素質（S）、申請者在高中所修習之課程的難易程度（C）、申請者的特殊狀況（U）、申請者住所的地理位置（G），以及申請者與該校校友的關係（A）。這些成績整合後便成爲“GPA2”成績。OUA 審核委員將每位申請者的（GPA2）成績垂直列在其申請入學準則表的（GPA2）項目，而將每位申請者的學測成績（ACT/SAT）水平列在入學申請準則表的（ACT/SAT）項目。每位申請者的入學申請準則表又被分成

好幾個項目，分別寫上 LSA 學院將要對申請者採取之入學決定，包括「允許申請者入學」、「拒絕申請者入學」、「延緩申請者的入學決定以等候申請者補交申請資料」，以及「再考慮申請者的入學申請」等項目。

在 1995 年和 1996 年，具有相同 GPA2 成績和 ACT/SAT 成績的申請者因爲其種族或人種不同，而有不同的申請結果。例如，身爲白種人又是密西根州居民的 Gratz，其 GPA2 成績和 ACT/SAT 成績使她的入學申請被歸類於「延緩入學決定」的項目下，而與 Gratz 的 GPA2 成績和 ACT/SAT 成績相同之密西根州居民或非居民的少數族群申請者的入學申請，卻通常被歸類於「允許入學」的項目下。

在 1997 年，密西根大學修改了它的入學申請程序，尤其是重新建構了計算申請者之 GPA2 成績的公式，在 SCUGA 因素之 U 項（申請者的特殊狀況）裡加入一項加分點數。在這個新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下，申請者可因其爲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的身份、經濟貧困狀況、其在高中亦爲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或因爲申請者爲其欲申請之學院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學生族群（例如，想要從事護理工作的男性），而獲得加分。在 1997 的入學申請程序下，Hamacher 的 GPA2 成績和 ACT 成績使他的入學申請被歸類於「延緩最後入學決定」的項目下，但是在密西根大學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申請者的入學申請即使被歸類於相同的「延緩最後入學決定」項目下，也通常會被允許入學。

從 1998 學年開始，OUA 不再使用入學申請審核準則表和 SCUGA 點數制度，而採用了申請者遴選索引制度。在申請者遴選索引制度下，申請者的分數最高可達 150 分。這個申請者遴選索引以校方將要對申請者採取之入學決定分類，可分成以下幾項：100-150 分（允許入學）；95-99 分（允許入學或延緩入學決定）；90-94 分（延緩入學決定或允許入學）；78-89（延緩入學決定）；74 分和 74 分以下（延緩入學決定或拒絕入學）。OUA 根據每一位申請者其高中在學平均成績、學測成績、所就讀之高中的素質、在高中所修習之課程的難易程度、是否爲該州居民、與該校校友的關係、自傳，以及個人成就或領導能力，計算出一個分數。在這個申請者遴選索引制度下最重要的，是申請者可在「雜項」裡因其爲在該校學生種族或人種比例中

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的身份，而獲得 20 分的加分。密西根大學解釋其於 1998 年所採用之申請者遴選索引制度只是審核技術上的改變，而不是本質上改變校方在審核申請者之入學申請時對於申請者之種族或人種的考量。

從 1995 到 1998 這幾年，密西根大學在入學申請審核準則中規定，凡是符合入學標準且爲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應立刻允許入學，因爲密西根大學認爲如果儘早通知那些申請者他們已被允許入學，則他們前來就讀的機率較高。從 1995 年到 1998 年間，密西根大學也在其入學申請審核制度中採用「保留名額」，提供給較晚提出入學申請的某些特定申請者，包括運動選手、外國學生、ROTC 候選人，以及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等。這些特定申請者都有資格爭取保留名額。密西根大學的入學就讀委員會（EWG）在每年都會預測該年申請入學之特定申請者的人數，然後調整校方的入學決定，好讓這些校方預期的特定申請者皆能被允許入學。如果在入學申請季節結束前，校方爲這些特定申請者保留的名額仍有空缺，才由其他符合入學標準的申請者（包括候補者）來遞補。

在 1999 年到 2000 年，OUA 採用遴選索引制度。在遴選索引制度下，每一位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都會得到 20 分的加分。然而，從 1999 年開始，密西根大學設立了一個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ARC），針對某些申請者提供另外的入學申請審核考量。在這個新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下，如果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認爲某位申請者：（1）未來在密西根大學將會有優異的學術表現；（2）已得到遴選索引的最低分數；（3）具備對密西根大學的新生組合有重大影響的特質或特性（例如優異的高中在學成績、獨特的生活經驗、特殊的歷練、特殊的生活狀況、興趣、天分、經濟貧困狀況，以及爲在該校學生種族、人種或地域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等），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可對此位申請者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然後決定是否允許入學、延緩入學、或拒絕該申請者的入學申請。

本案雙方當事人針對法律責任部分交互提出要求聯邦地方法院作出即決判決的聲請。上訴人主張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入學申請審核中採用種族偏好而違反憲

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以及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等的規定。密西根大學則依據 Powell 大法官於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的意見書中認爲在入學申請審核時考量種族因素在某些個案中有可能是爲了要達成某種迫切政府利益的觀點，辯稱其 LSA 學院正是爲了達成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的教育利益，而其所採用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也是一種能夠達成該教育利益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

在審愼檢視本庭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的裁決後，雖然聯邦地方法院認爲自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後再也沒有其他的案件像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一樣明白表示接受 Powell 大法官對於種族多元化的論點，但是聯邦地方法院也認爲自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後本庭並未否認種族多元化爲允許種族分類的一個正當理由。聯邦地方法院認爲密西根大學提出相當多的具體證據證明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所產生的教育利益，足以構成迫切的政府利益。

聯邦地方法院接下來要考量的是: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準則，是否是一種能夠達成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的教育利益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再次援引 Powell 大法官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的意見，聯邦地方法院認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準則，正是一種能夠達成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的教育利益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聯邦地方法院認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的入學審核申請方案並不是一種毫無彈性的配額，或是要允許已內定人數之少數族群申請者入學。聯邦地方法院認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對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自動加分 20 分的作法，並不等同是一種配額，因爲少數族群申請者即使被加計 20 分，其入學申請仍和其他申請者的入學申請一樣被審核。同樣地，聯邦地方法院以申請 LSA 學院的申請者並非在爭取不同種族申請者之入學名額的理由，否決上訴人認爲 LSA 學院入學申請審核方案的運作方式就像是 Powell 大法官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視爲違憲之雙軌機制的主張。聯邦地方法院也否決了上訴人認爲 LSA 學院目前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只是校方爲了達到校園學生種族平衡所採用之方法的主張。聯邦地方法院認爲 LSA 學院並非要錄

取某個比例的少數族群申請者，更不是要錄取代表該少數族群在社會中之比例的人數。

然而，聯邦地方法院卻也發現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從 1995 年至 1998 年所實施之入學申請審核準則涉嫌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平等保護條款。聯邦地方法院認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先前爲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申請者保留名額的作法，確實妨礙了其他非保護族群申請者去爭取那些名額。聯邦地方法院認爲這樣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的運作方式等同是一種配額，所以違背了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的見解。

因爲聯邦地方法院發現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從 1995 年至 1998 年所實施之入學申請審核準則的運作方式等同是一種配額，因而違背了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的見解，因此聯邦地方法院將關於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那幾年來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部分的即決判決判給上訴人。然而，因爲聯邦地方法院認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從 1995 年至 1998 年所實施之入學申請審核準則的運作方式並不是一種配額，而且正是一種能夠達成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的教育利益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因此聯邦地方法院否決上訴人提出要求聯邦地方法院核發禁制令禁止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繼續進行以種族爲根據之歧視（差別待遇）行爲的聲請。

聯邦地方法院依據其裁決作出命令，並根據聯邦程序法的規定同意雙方當事人提出中間上訴的聲請。聯邦上訴法院在審理 *Grutter v. Bollinger* 案的同一天也審理本案。當本案的中間上訴仍在聯邦第六巡迴上訴法院審理時，該法院已就 *Grutter v. Bolinger* 案作出判決，認爲密西根大學法學院所採用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並沒有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在 *Grutter v. Bollinger* 案中的上訴人提出要求本庭受理此案的移審令聲請。儘管聯邦上訴法院尚未對本案作出裁決，但本案的上訴人也要求本庭一併受理本案，讓本庭針對不同狀況下大學在其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中考量種族因素是否合憲作出裁決。

本庭同意受理此案，來裁決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入學申請審核中採用種族偏好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條增修條文的平等保護條款、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以及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

等的規定。

判　決

撤銷聯邦地方法院的部分判決，並發回更審。

由於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現行新生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中採用種族偏好，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也同樣違反 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和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因此，本庭撤銷聯邦地方法院關於密西根大學責任部分的即決判決，並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更審。

I

因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現行新生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中採用種族偏好，而該種族偏好並非是一種可以達成密西根大學所宣稱之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利益而採用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所以這樣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基於本庭今日在 *Grutter v. Bollinger* 案中所闡述的判決理由，本庭不同意上訴人認爲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不能構成迫切之政府利益的主張。然而本庭認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所實施之僅因申請者的種族便爲每一位來自「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代表之少數族群」的申請者自動加計 20 分或者自動加計得以使其獲得入學許可分數中五分之一分數的加分優惠政策，並非是一種能夠達成密西根大學爲其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辯護時所主張之教育多元化利益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大法官 Powell 認爲如果大學在其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中，「於特定的個案裡考量申請者的種族或人種爲允許申請者入學的加分（正面）因素，則此種考量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大法官 Powell 強調：校方個別地考量每一位申請者、評估每位申請者所具備的所有特質，以及評估每位申請者是否有能力貢獻自身的特質去營造一個獨特的高等教育環境，是相當重要的。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所描述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並不認爲申請者的任何一個特質，可以自動地對大學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保證有特定且可辨識的貢獻。反之，在大法官 Powell 所描述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下，在評估某位申請者的全部申請文件時，該申請者的每個特質均會被列入考量。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現行的入學申請審核政

策，並未針對申請者的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自動地爲每一位來自該大學自行認定「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的申請者加計 20 分。伴隨著這 20 分加分的唯一審核考量，僅僅是審核申請者的申請文件，以決定該申請者是否爲上述少數族群的成員。再者，與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所述之黑人申請者的種族並非是決定性考量因素的例子不同，LSA 學院自動加計 20 分的方法使得種族因素幾乎對每一位在入學資格邊緣且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產生允許入學的決定性效果。即使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已經提供了警示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要對某位申請者之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的機會，當 LSA 學院入學申請審查制度與先前大法官 Powell 所描述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相比較時，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給予審核委員的警示訊息反而突顯出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在整體上的缺失。記錄上雖未精確顯示究竟有多少申請者的情況警示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對申請者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但是密西根大學也承認，對申請者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是例外狀況，而非其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準則的運作常規。再者，針對申請者之個人特質作出的個別考量，也僅會在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對每一位來自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的申請者自動加計 20 分的加分優惠後進行，也使得種族因素幾乎成爲所有在符合入學資格邊緣且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獲得入學許可的決定性因素。本庭不同意密西根大學辯稱申請書的數量以及申請者在申請文件中所提供的大量資訊使得本庭今日在 *Grutter v. Bollinger* 案中裁決合憲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對於 LSA 學院而言是不切實際的。即便採用一個能夠針對申請者之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可能會產生許多行政方面的困難，也不足以使一個涉嫌違憲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被認定爲合憲。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大法官 Powell 的意見並未允許一個大學可以使用任何方法來達到其所意欲達成之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的目標，而無需顧及司法嚴格審查標準所加諸於其的限制。

由於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現行新生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中採用種族偏好，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也同樣違反 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和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因此，本庭撤銷聯邦地方法院關於密西根大學責任部分的即決判決，並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更審。

兩位皆爲密西根居民以及白種人的上訴人 Gratz 和 Hamacher，曾經分別先後向密西根大學的文學、科學和藝術學院（以下簡稱 LSA 學院）提出 1995 年及 1997 年的入學申請。雖然 LSA 學院認爲 Gratz 具有優異的入學資格，而 Hamacher 也是達到了入學的標準，但是兩人提早入學的申請均被拒絕，並且兩人的入學申請最後也都遭到拒絕。爲了使得入學申請的審核能夠有一套一致的審核標準，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部門（以下簡稱 OUA）在每個學年都使用一套成文的準則，而這個入學申請審核準則在與本案有關的期間內也有多次的修正。OUA 在審核所有入學申請時會將許多因素列入考量：包括申請者的高中在學成績、申請者的學測成績、申請者所就讀之高中的素質、申請者在高中所修習之課程的難易程度、申請者住所的地理位置、申請者與該校校友的關係、申請者的領導能力，以及申請者的種族。在與本案有關的期間內，密西根大學認爲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人，以及印第安原住民是一群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而密西根大學也承認其 LSA 學院幾乎允許每一位符合入學資格的上述族群申請者進入該校就讀。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現行的入學申請審核準則中採用了一種篩選方法，在該篩選方法下，上述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將自動獲得 20 分，而每位申請者只須獲得 100 分就能保證進入該校就讀。

二位上訴人以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入學申請審核中採用種族偏好而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以及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等的規定爲由，在聯邦地方法院對密西根大學提起了一個集體訴訟。他們訴請補償性損害賠償和懲罰性損害賠償，以彌補他們憲法保障之平等保護權利在過去所受到的侵害，並要求聯邦地方法院以宣示性判決的救濟方式，裁決密西根大學侵害上訴人免於受到差別待遇的權利，同時也要求聯邦地方法院核發禁制令，禁止

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繼續進行以種族爲根據的歧視（差別待遇）行爲，並要求聯邦地方法院命令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讓 Hamacher 以轉學生的身分進入該校就讀。聯邦地方法院核准上訴人所提出的聲請，允許這個包含自 1995 年以來曾經向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提出入學申請但遭拒絕並且受到該學院以種族爲根據之不平等待遇的所有申請者，組成一個訴訟集體。聯邦地方法院認爲 Hamacher 的種族歧視（差別待遇）訴訟足以代表整個訴訟集體，因此指定 Hamacher 爲該集體訴訟的代表。在交互聲請聯邦地方法院作出即決判決的訴訟過程中，密西根大學依據大法官 Powell 於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的意見書中認爲在入學申請審核時考量種族因素在某些個案中有可能是爲了要達成某種迫切政府利益的觀點，辯稱其 LSA 學院正是爲了達成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的教育利益，而其所採用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也是一種能夠達成該教育利益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在此方面，聯邦地方法院認可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準則，因此將這部分的即決判決判給密西根大學。然而，聯邦地方法院卻也發現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從 1995 年至 1998 年所實施之入學申請審核準則的運作方式等同是一種配額，所以違背了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的見解，因此聯邦地方法院將關於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從 1995 年至 1998 年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那部分的即決判決判給上訴人。當本案的中間上訴仍在聯邦第六巡迴上訴法院審理時，該法院已就 *Grutter v. Bolinger* 案作出判決，認爲密西根大學法學院所採用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並沒有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

本庭同意受理此案，來裁決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入學申請審核中採用種族偏好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條增修條文的平等保護條款、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以及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等的規定。本案適用嚴格審查標準，裁決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現行新生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中採用種族偏好（即 LSA 學院僅因申請者的種族便爲每一位來自「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代表之少數族群」的申請者自動加計 20 分或者自動加計得以使其獲得入學許可分數中五分之一分數的加分優惠政策），而該種族偏好並非是一種可以達成密西根大學所宣稱之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利益而採用

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因此這樣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也同樣違反 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和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的規定。

II

在整個訴訟的過程中，上訴人指摘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入學申請審核中考量種族因素，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第一項、人權法案第六條，以及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等的規定。本庭首先必須解決的爭議爲二位上訴人是否有向法院請求宣示性判決和禁制令等法律救濟的適格，因爲本庭裁決這二位上訴人有此適格，故接下來本庭要考量他們在訴訟上的請求是否具有正當理由。

二位上訴人的第一點主張也是最重要的主張，就是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入學申請審核中考量種族因素，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上訴人認爲本庭在其他案件中只核准爲補償已被普遍指認出之歧視（差別待遇）而採用的種族分類，而密西根大學從未用這個正當理由來爲己辯護。上訴人又主張，「以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這個理由作爲採用種族偏好的根據，實在太過於籠統、定義不清與含糊，不足以構成能用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所達成的迫切政府利益。」但是基於本庭今日在 *Grutter v. Bollinger* 案中所闡述的判決理由，本庭不同意上訴人以上的論點。

上訴人另外主張，即便密西根大學認爲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對學生有益，因而足以構成一個迫切的州政府利益，聯邦地方法院仍然錯誤地將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新生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中考量種族因素認定是一種能夠達成該迫切政府利益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上訴人認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於 1999 年開始實施的這個入學申請審核準則與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所認可之種族或人種的考量，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密西根大學則辯稱其 LSA 學院現行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是一種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並且能夠避免發生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所不認可的戴維斯加州州立大學醫學院當時採行之入學申請審核方案所產生的問題。密西根大學認爲其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與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所描述的二個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以及大法官 Powell 所認可的哈佛大學入學申請審核方案，十分相近。尤其密西根大學認爲其 LSA 學院所採用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會針對申請者的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而針對申請者之個人特質作出的個別考量正是「大法官 Powell 認爲合憲之入學申請審核方案的明證」。基於以下的理由，本庭不同意密西根大學以上的說法。

本庭至今已經確立了「涉嫌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平等保護條款的種族分類都必須受到嚴格審查」的法則，而這個『嚴格審查的標準並不會因爲系爭族群是否從該種族分類中得到利益或受到侵害而有所不同。』因此，「任何人皆有權要求受到美國憲法規範的任何政府主體所作出使人民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種族分類，接受最嚴格的司法審查。」

爲了通過嚴格審查標準的審核，密西根大學必須證明其 LSA 學院在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中所採用的種族偏好是一種「能夠達成迫切政府利益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因爲「種族分類實在是弊多於利，因此某種族分類與分類的正當理由之間必須有最精準的關聯，才能允許該種族分類」。本庭針對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是否具備上述要件，必須進行一個最徹底的審查。本庭認爲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所實施之僅因申請者的種族便爲每一位來自「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代表之少數族群」的申請者自動加計 20 分或者自動加計得以使其獲得入學許可分數中五分之一分數的加分優惠政策，並非是一種能夠達成密西根大學爲其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辯護所主張之教育多元化利益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大法官 Powell 重申「僅以種族或人種爲理由來偏好任何團體的成員，皆是爲了其自我的原由而爲之的歧視（差別待遇）。」然而他認爲如果大學在其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中，「於特定的個案裡考量申請者的種族或人種爲允許申請者入學的加分（正面）因素，則此種考量是可以被接受的。」他解釋，這樣的一個入學申請審核方案可以在下列情形被採用：「一名黑人（非洲裔美國人）申請者，當他與一名義大利裔美國人申請者相比較，且如果後者被認爲其所顯現出的特質極有助於教育多元化，則在評估此黑人申請者對於校

園學生種族多元化有多大的潛在貢獻時，校方可以考量種族爲允許該黑人申請者入學的加分（正面）因素，而非允許入學的決定性因素。」Powell 認爲，這樣的一個入學申請審核制度有足夠的彈性去依照每一位申請者的入學資格，來考量與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有關的所有因素。

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的意見強調校方針對每位申請者具備的所有特質，以及每位申請者是否有能力貢獻自身的特質去營造一個獨特的高等教育環境，作出個別考量，是相當重要的。然而，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所描述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並不認爲申請者的任何一個特質，可以自動地對大學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保證有特定且可辨識的貢獻。反之，在大法官 Powell 所描述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下，在評估某申請者的全部申請文件時，該申請者的每個特質均會被列入考量。

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現行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並未針對申請者的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自動地爲每一位來自該大學自行認定「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的申請者加計 20 分。伴隨著這 20 分加分的唯一審核考量，僅僅是審核申請者的申請文件，以決定該申請者是否爲上述少數族群的成員。再者，與大法官 Powell 前述黑人申請者的種族並非是決定性考量因素的例子不同，LSA 學院自動加計 20 分的方法使得種族因素幾乎對每一位在入學資格邊緣且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產生允許入學的決定性效果。

有助於本庭審查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之入學申請審核制度的另一個考量因素，是大法官 Powell 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的意見書中描述哈佛大學入學申請審核制度時所提供的範例。大法官 Powell 之所以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提供這個範例，是爲了說明種族因素在哈佛大學入學申請審核方案中所代表的意義。大法官 Powell 所提供的範例如下所述：「在僅剩少數名額的情況下，大學的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必須被迫在以下 A、B、C 三位申請者之間作選擇。A 申請者是一名在其學術界中相當有成就之黑人內科醫師的小孩，而其被看好未來將在學術領域中有優異的表現，而 B 申請者則是一名成長於市

中心的窮人區的黑人，有著半文盲的父母，而其學術表現較差，但是卻顯現出活力與領導能力，並且明顯且持續的對於黑人人權的議題有高度興趣。如果有一群像 A 而較少像B的相當人數申請者已被允許入學，則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可能會偏好選擇 B 申請者，反之亦然。又如果C申請者是一個具有非凡藝術天份的白人，同時也在爭取剩餘名額中的一個名額，他的特質可能給予他勝過前述 A、B 兩位申請者的優勢。因此，入學申請審核的決定性因素通常並非是根據種族但卻是與種族有關的個人特質或經驗。」

這個範例顯示出 LSA 學院入學申請審核制度的缺失。即便 C 申請者非凡的藝術天賦可與莫內或畢卡索相匹敵，在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下，該名申請者最多也只能因此而獲得 5 分的加分，然而每一位來自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的申請者將自動獲得 20 分的加分。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顯然無法提供前述哈佛大學入學申請審核制度中所描述之針對申請者之個人特質作出的個別考量給每一位申請者。在全然不考量A、B、C 三位申請者他們不同的背景、經驗，以及特質將會如何有利於該校的情況下，審核申請者之申請文件的 LSA 學院入學申請審核委員們，僅僅因爲 A、B 兩位申請者的申請文件中表明他們是非洲裔的美國人，就給那兩位申請者加計 20 分，而 C 申請者卻只會因爲他非凡的藝術天賦而最多加計 5 分。

密西根大學辯稱其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已經提供了警示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要對某位申請者之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的機會。本庭認爲，當 LSA 學院入學申請審查制度與先前大法官 Powell 所描述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相比較時，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給予審核委員的警示訊息，反而突顯出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在整體上的缺失。A、B、C 三位申請者的範例再一次說明這一點。首先，A 申請者的情況極不可能警示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要對該申請者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這是因爲（也正如同密西根大學自己承認的），自動地爲每一位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加計 20 分的結果，就是使得所有符合入學資格的少數族群申請者均獲得入學許可。在 A 這位被看好未來將在學術領域中有優異表現之黑人

申請者的情況，便不會警示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對該申請者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因此自動地爲 A 加計 20 分的結果，就是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將不會考量 A 申請者的背景、經驗，以及特質，以評估該申請者對於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究竟能有多少潛在的貢獻。反之，每位像 A 這樣的申請者將會在沒有考量其個人背景、經驗，以及特質的情況下，都會獲得入學許可。

假定 B 申請者並未因自動加計的 20 分而已經獲得入學許可，而 C 申請者必須至少再獲得額外的 70 分，才會使得在 B 和 C 這兩位申請者的情況，有可能警示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對他們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但是即便當某位申請者的情況已經警示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對他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且該審核委員會可以不理會申請者的分數而直接對申請者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但這樣的情況仍然不能通過本庭的嚴格審查標準。記錄上雖未精確顯示究竟有多少申請者的情況警示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對申請者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但是密西根大學也承認，對申請者的申請文件針對其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是例外狀況，而非其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準則的運作常規。再者，針對個人特質作出的個別考量也僅會在入學申請審核委員會對每一位來自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之少數族群的申請者自動加計 20 分的加分優惠後進行，也使得種族幾乎成爲所有在符合入學資格邊緣且在該校學生種族比例中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申請者獲得入學許可的決定性因素。

密西根大學辯稱申請書的數量以及申請者在申請文件中所提供的大量資訊，使得本庭今日在 *Grutter v. Bollinger* 案中裁決合憲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對於 LSA 學院而言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即便採用一個能夠針對申請者之個人特質作出個別考量的入學申請審核方案可能會產生許多行政方面的困難，也不足以使一個涉嫌違憲的入學申請審核制度被認定爲合憲。在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案中大法官 Powell 的意見並未允許一個大學可以使用任何方法來達到其所意欲達成之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的目標，而無需顧及司法嚴格審查標準所加諸於其的限制。

本庭因此作成以下的結論：由

於密西根大學 LSA 學院在現行新生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中採用種族偏好，而該種族偏好並非是一種可以達成密西根大學所宣稱之校園學生種族多元化利益而採用之最適切且侵害最小的方法，所以這樣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條款。本庭也認爲 LSA 學院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同樣違反 1964 年人權法案第六條以及 1981 年美國法典第四十二條的規定。因此，本庭撤銷聯邦地方法院關於密西根大學責任部分的即決判決，並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更審。

4. Meyer v. State of Nebraska
262 U.S. 390（1923）

王郁琦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憲法的保護及於所有的人，包括以他國語言為母語者以及以英語為母語者。也許讓所有的人都了解我們的語言是一件極有利益的事，但這不能透過和憲法相牴觸及禁止性手段達成。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extends to all, to those who speak other languages as well as to those born with English on the tongue. Perhaps it would be highly advantageous if all had ready understanding of our ordinary speech, but this cannot be coerced by methods which conflict with the Constitution-a desirable and cannot be promoted by prohibited means.）
2. 沒有任何迫切的理由証明兒童學習其他語言是明顯有害的，而得以使該禁止規定所致長期以來應享有之權利被侵害正當化。因此，我們認為該禁止規定是恣意或且和所欲達成之目的無合理關聯。
（No emergency has arisen which renders knowledge by a child of some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so clearly harmful as to justify its inhibition with the consequent infringement of rights long freely enjoyed. We are constrained to conclude that the statute as applied is arbitrary and without reasonable relation to any end within the competency of the state.）

關 鍵 詞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增修條文第十四條）；arbitrary and without

reasonable relation to any end within the competency of the state（恣意專斷且和州所欲達成之目的無合理關聯）；due process of law（正當法律程序）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McReynolds 主筆撰寫）

事　實

羅伯特・梅耶（Robert T. Meyer）於內布拉斯加州教授德文，被內布拉斯加州的最高法院判定違反該州於 1919 年 4 月 9 日通過之有關於教授外國語法案，該法規定沒有任何人，個人或作爲一個老師，可以在任何私立、宗教、教會或公立學校以英語以外的任何語言進行授課，只有在學生已上過課並通過第八級測驗、取得由該學生居住之郡的督察所核發之証明時方得對其教授英語以外的語言。

但梅耶認爲有誤審之情形，因此提出上訴。

判　決

內布拉斯加州之教授外國語法案是恣意且和所欲達成之目的無合理關聯，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規定，原判決發回更審。

理　由

漢彌頓郡的地方法院依據下列之事實判定有罪，於 1920 年 5 月 25 日時，一名猶太教區學校的教師非法地教授一名 10 歲、以前沒有上過課但已成功地通過第八級測驗的小孩德語。相關的適用法律爲於 1919 年 4 月 9 日通過有關於在內布拉斯加州教授外國語法案，相關的法條如下：

§1 沒有任何人，個人或作爲一個老師，可以在任何私立、宗教、教會或公立學校以英語以外的任何語言進行授課。

§2 只有當學生已上過課並通過第八級測驗、取得由該學生居住之郡的督察所核發之証明時方得對其教授英語以外的語言。

§3 違反本法任一法條規定者應被判以輕罪，課予 25 元以上，100 元以下的罰金或是 30 天以下的拘役。

§4 但如有突發事件或緊急狀

況，本法案應要在事件過後才發生效力。

州的最高法院判定有罪。107 Neb. 657, 187 N. W. 100.其指出犯罪行爲主要在於在由猶太福音馬丁路德教派所維持的教會學校“直接、故意地教授一位未通過第八級測驗的小孩德文”。且法院認爲州禁止教授外國語的規定並不和第十四增修條款有任何衝突，但卻是政策權力之有效運用。以下是從意見書節錄下來有關於支持此一結論的理由：

“本法之有利目的是很清楚的。立法機構已預見允許已於本國取得合法居任權的外國人教授他們的小孩子他們的母語是有負面效果的，即將有害於我們的安全。如果讓那些移民至此的外國人自小就學習其父母的母語那麼就該那些小孩以該語言爲母語。依此教育他們的情況會使他們依該語言的邏輯進行思考，如此一來，很自然的他們亦將會被反覆地灌輸與這國家最佳利益相違的看法與情感。因此，該法不只企圖要求所有的兒童教育都以英語進行教學，而且要求學校不得進行他種語言之教學，除非兒童已深諳英言此一語言且該語言已爲其生活中的一部分。很明顯地，該法之目的是要讓英語成爲所有兒童的母語。而此類法案的執行乃在各州之職權範圍內。”

“有人指出此法是一種適用於全州民且恣意地干涉祖先非外國人之州民之權利的不當限制以及在沒有任何理由下阻礙其子女於學校中學習外文”。此一論述是不充分的，因爲其假定每一位州民都受到此法之限制。於學校中兒童可以用以學習的時間相當有限，因此對於授課內容作選擇是明顯不可免的。無疑地立法者有考量到法律實際的運作狀況。除了那些具有外國血統者外，很少州民會受到此法的影響。除了極罕見的例子外，於學習的選擇上，其他居民從未認爲讓一名未達八年級的兒童學習外文是件重要的事。就立法者而言，無疑地法律的益處重於加諸於州民的限制，且該限制普遍來說並不會有現實重大的限制。

本案所需解決的爭點在於所適用的法律是否不合理地侵害到了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保障被誤審的原告應有之自由，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指出“沒有任何州...在未依正當法律程序下可以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

雖法院未企圖去界定自由的確切範圍，但自由一詞已被賦予很多的意義，且部分已被很清楚地指明出來。毫無疑問地，其不但包括

了免於人身拘禁，亦包括通訊權、工作權、受教權、結婚權、組織家庭及教養子女之權、依個人良知信仰宗教之權、以及享有習慣法長期承認一個自由之人追求生活幸福所需之權利。所建立的原則是除了公共利益的考量外，不得以恣意或和目的無合理關聯之法律干預自由。由立法者所界定的政策權力並不是終極的，乃需受到法院的監督。

美國人民已將教育以及受教育視爲一件須廣爲推行的極重要事項，1787 年命令（Ordinance of 1787）指出：

“學校及教育單位應鼓勵有利於人類美好生活之宗教、道德和知識”

與控制權相映對的，給予其子女適合其生活所需之教育是雙親的責任；幾乎所有的州，包括內布拉斯加州在內，都以強行法執行此一義務。

實際上，在學校中對兒童的教育只得透過有資格的人來完成。教師這個職業是重要且有益於公共福利的。僅是教授德文不能稱得上是有害的。直到現在，教授德文仍被視爲有益的且值得的。被誤審的被告其職業乃是在學校教授德文。被告的授課權及父母安排被告向其子女教授德文的權利在我們看來是受第十四條增修條文保障的。

系爭條文禁止於學校教授以英文講課以外的科目；亦禁止教授兒童其他語言除非學生有上學且已成功地通過第八級測驗，通常不小於 12 歲。該州之最高法院認爲所謂的古典語言（ancient or dead languages）並不在該法之規範目的範圍內。教授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都不被禁止；但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及其他外文的教授都是被禁止的。很明顯的立法者企圖干預現代語文教師的職業、學生受教的機會以及父母控制子女學習的權利。

立法者之目的乃在於藉由禁止兒童於習得英語和得知美國的理念前以及英文成爲他們的母語前教授兒童外文及其理念的方式促進文明發展。且可以確定的是外裔人口很多，部分社區甚至使用外文、追隨外國領導者、以他國的生活方式生活，他們的子女也因此不會變成一個典型的市民且因而有害於公共安全。

爲提升市民在精神上、道德上及形體上的品質，該州的作法太過了；但個人確實擁有一些須被尊重的基本權利。憲法的保護及於所有的人，包括以他國語言爲母語者以及以英語爲母語者。也許讓所有的

人都了解我們的語言是一件極有利益的事，但這不能透過和憲法相牴觸及禁止性手段達成。

基於理想國（Ideal Commonwealth）的想法，柏拉圖建議法律應該：

“管理人的妻子是很共通的（common），其子女也是共通的，父母親不認得其子女，而小孩子不認得其父母親…最合宜的管理者會帶走基因優良雙親的子女並將其另置於他處由專人教養，但基因較差雙親之子女或基因優良雙親的子女於教養過程中發生畸變時會被帶至另一個神秘、不知的地方”。

爲了默化（submerge）個人及發展理想市民，斯巴達將男人於七歲時送入軍營並教育他們成爲軍人。雖然這種方式爲很多偉人所採，但他對於人民和國家間的關係的看法和我們的完全不同。採用此種方式不侵犯憲法之精神及不違反其字面意義是很難的。

立法者想要形塑一群瞭解美國理念的同質性群眾是易得稱讚的。近代戰爭中的不幸經驗以及對於敵人殘酷人格的反感乃會加速、催化該種想法。但所採取的方式，在我們看來，超過了州的權限以及和被誤審之原告的權利相衝突。干預是明顯可見的且沒有展現任何適當的理由。

州能否強制兒童上學及對所有的學校進行合理規範包括要求以英語講課的權力在本案中並未被提出。而州是否有權力限制其支持之機構的授課課程在本案亦未被提出。本案只涉及州最高法院所涉及之禁止規定。Adams v. Tanner, 244 U. S. 594, 37 Sup. Ct. 662, 61 L. Ed. 1336, L. R. A. 1917F, 1163, Ann. Cas. 1917D, 973, 指出僅是附隨於原本有用之職業的濫權（abuse）是不足作爲廢棄判決的正當化理由，雖然法規可能整體上是適宜的。沒有任何迫切的理由可以証明兒童學習其他語言是明顯有害的而得以正當化該禁止規定對於長期以來被享有之權利的侵害。因此，我們認爲該法是恣意或且和所欲達成之目的無合理關聯。

5. Murphy v. 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527 U.S. 516（1999）

焦興鎧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在做受僱者之肢體或精神損害，是否會「相當程度限制」其一個或更多主要生活活動之決定時，有必要參考他所使用之減緩措施。
（ Determination whether employee's impairment "substantially limits" one or more major life activities is made with reference to the mitigating measures he employs）；
2. 受僱者在服藥後提供服務時，高血壓症並不會相當程度限制其主要生活活動，從而，他並不是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所規定之身心障礙者。
（Employee's high blood pressure did not substantially limit his major life activities when he was medicated for his position and thus he was not disabled under ADA）；
3. 雖然受僱者是因無法獲得聯邦政府交通部之證書之理由而被革職，但並不會被認為其從事工作之主要生活活動受當相當程度之限制，而被當做是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所規定之「被認為」身心障礙者之情形，因為他在技師此一職位上還是有可能會被僱用，而該職位並沒有駕駛商用汽車之必要。
（Employee was not "regarded as" substantially limited in major life activity of working by reason of his dismissal for inability to obtain DOT certification as he remained generally employable in mechanics positions that did not require driving commercial vehicle.）

關 鍵 詞

disability（身心障礙）；disabled persons（身心障礙者）；major life activities（主要生活活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即 ADA）；mitigating measures（減緩措施）；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交通部）；substantially limits（相當程度限制）；regarded as disabled（被認為身心障礙）；certification（證書）；impairments（肢體或精神損害）；summary judgment（即決裁判）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O'Connor 主筆撰寫）

事　實

本案之事實與 *Sutton* 一案大體近似，原告自十歲起即罹患高血壓症，如果不服藥治療的話，可以高達 250/160，然而，如果服用抗壓藥，則這種高血壓之情形並不會明顯影響到他的日常生活活動。在一九九四年，被告快遞公司僱用原告擔任機械師，而他重要工作之一是要駕駛商用汽車。根據美國交通部之相關規定，他必須符合若干有關健康之規定才能駕駛此類車輛，其中之一則是不能有經醫療診所所診斷出之高血壓病症，而會影響其安全駕駛這類商業車輛。在他被僱用時，血壓值是 186/124，仍高於該部證明所需之標準，但這種情形並未被發現，而他即開始駕駛之工作，後來公司有偶然之情況下發現有誤，即再度對原告進行血壓測試，而驗出其血壓值仍然高於交通部所訂之標準，因此該公司乃將他加以解僱，而原告即提出解僱之舉違反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第一章禁止對身心障礙者就業歧視之訴。

聯邦下級法院之判決

在本案中，在堪薩斯州之聯邦地方法院是以即決裁判之方式，判決原告勝訴，它認爲在認定原告是否屬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第一章所指稱之身心障礙者，其損害之情形應該根據接受藥物治療之情形來加以權衡，而本案原告在接受這種藥物治療時，僅被禁止舉起重物而已，至於其他之機能都屬正常，從而，不應屬該法所指稱之身心障礙者。此外，該院也拒絕原告所提被認爲是身心障礙者之主張，因爲被告公司並未認爲

他是身心障礙者，而僅認爲根據交通部之相關行政規定，他並未能通過認證合格之程序而已。

至於聯邦上訴法院第十巡迴法庭在一項未經出版之判決中，則維持聯邦地方法院此項判決。它引用其本身在 *Sutton v. United Air Lines, Inc.*一案之判決，認爲在判斷當事人是否有該法所指稱之身心障礙情形，應以其是否使用減緩或矯正措施爲基準，而在該案中，由於原告之醫生曾證明在經過藥物治療後，他得以機能正常，而做任何人每天所做之任何事。此外，該院也維持聯邦地方法院所做被視爲身心障礙之判決，它認爲被告公司將原告加以解僱之舉，並非基於無端之害怕恐懼而認爲他將會罹患心臟病或中風之緣故，而是因爲他血壓超出交通部所規定商業車輛駕駛人之規定而已。

判　決

維持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

理　由

本院與前述 *Sutton* 一案之判決情形完全相同，以七票對二票之多數維持聯邦上訴法院判決，首先，在判斷本案原告所遭受之身心損害是否會相當程度限制其重要之生活活動，必須要權衡其所使用之減緩措施。其次，由於本案之原告在使用藥物控制其高血壓後，雖然並未能完全控制其病情，而仍會有部分副作用產生，但其高血壓症狀並不會相當程度限制其主要之生活活動，因此，原告即不屬一九九◯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所指稱之身心障礙者。最後，本案原告亦非屬身心障礙者，因爲其被解僱之理由，純然是因爲無法取得交通部商業車輛駕駛之認證而已。

大法官 Stevens 與 Breyer 之不同意見書

本案原告應符合一九九◯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所明訂之身心障礙情形，因爲如果其非常嚴重之高血壓病症不作藥物治療的話，則將會在相當程度上限制其從事若干主要生活活動之能力，事實上，如果沒有藥物控制的話，原告非常可能必須要住院治療始可。此案與 *Sutton* 一案不同，因爲原告之病症很容易即可被認定是該法所適用之身心損害情形。

6. Albertson's, Inc. v. Kirkingburg
527 U.S. 555（1999）

焦興鎧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根據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規定，僅有獨眼視力之個人，並不會在本質部分被視為是身心障礙者，而必須依照個案審查之方式，來證明他們之身心障礙情形，而且還要提出證據，說明根據他們本身之經驗，這些情形在相當程度上會限制到一項主要生活活動。

（Individuals with monocular vision are not *per se* "disabled" within meaning of the ADA but, rather, must prove their disability on a case-by case basis by offering evidence that the extent of the limitation on a major life activity in terms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is substantial.）

2.雖然有一項實驗計畫存在，而且在個案之情形，聯邦政府交通部所訂之標準是可以被豁免掉，但原雇主仍得以根據其遵守交通部所適用安全規則之標準，來決定視力敏銳度之工作資格。

（former employer could use its compliance with applicable DOT safety regulations to justify its visual-acuity job qualification standard, despite existence of experimental program by which DOT standard could be waived in an individual case.）

關　鍵　詞

dvisual acuity（視力敏銳度）；amblyopia（弱視）；vision standards（視力標準）；waiver（豁免）；summary judgment（即決裁判）；regulations（行政規則）；*per se*（本質上）；job qualification（工作資格）；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

障礙人士法）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Souter 主筆撰寫）

事　實

本案之原告是一位具有十年經驗之卡車駕駛，他患有一種無法加以矯正之弱視症導致左眼僅有十分之一視力。根據聯邦交通部之行政規定，原告曾在一九九〇年八月做過一項視力測驗，而由於誤診之緣故，負責檢查之內科醫生居然發給他得以駕駛之認證。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原告因在職負傷而長期請假，直到次年十一月才恢復工作，而在復工前又接受一次視力檢查，結果被檢查出前述左眼弱視之情形，而負責檢查之醫生告訴他由於此項損害，必須得到交通部之免除證書，才能合法駕駛跨州之卡車。雖然原告向交通部提出這項申請，但被告公司卻以他未能符合交通部之基本視力標準而將他開除。在一九九三年，交通部發給原告此一免除證書，但被告公司仍然拒絕再度僱用他，而原告即提起違反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第一章之訴訟。

聯邦下級法院之判決

在本案中，在奧勒岡州之聯邦地方法院以即決裁判之方式，判決被告公司勝訴，認爲無論它是否對原告提供合理之措施，他都因無法達到交通部之視力標準而不適格成爲一卡車駕駛。此外，該院還認爲給原告時間去獲取交通部免除證書一事，並非系爭該法所規定之合理措施，因爲整個免除證書計畫是一項所謂「錯誤之經驗」，因爲它並無法更動交通部前述有關視力之要求。

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則推翻聯邦地方法院此一判決，而認爲由於原告在本案中是以「沒法駁斥之證據」，來證明其獨眼視力與其他絕大部分人有極其明顯之差別，因此，單純就獨眼視力此一事實加以分類的話，原告與一般大眾視力大不相同此點，即足以構成身心障礙之情形。

判　決

上訴法院原判決廢棄。

理　由

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廢棄。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過早做出原告具有身心障礙之情形，因爲它並未考慮到原告本身即具有補償其身心損害之能力。與 *Sutton* 一案之判決同，在權衡某位個人是否具有身心障礙之情形，必須要考量有無採用減緩措施，且並不必過問這些措施是否爲透過人爲協助，諸如服藥及使用輔具等，或是基於當事人本身身體系統所產生有意識或無意識之各種作爲。

在根據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來決定身心障礙時，並不應該根據身心損害之名稱或特質，來使用單純而分類式之測試標準，反而應該透過逐案審查之方式，來判斷這些身心損害到底會對當事人之主要生活活動造成什麼樣之影響。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並未妥當決定原告視力喪失之程度，因爲在僅有單眼視力當事人主張要受到系爭該法保護時，他（她）們必須提出證據來，證明根據其本身之經驗，這種限制是具有相當程度者，就像失去深度之感覺及在視覺領域一樣。

（大法官 Thomas、Stevens 及 Breyer 之協同意見書略）

7. Toyota Motor Mfg. Co. v. Williams

534 U.S. 184（2002）

焦興鎧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要符合一般體力活動受到相當程度限制之要件，當事人之身心受損情形，必須嚴重到防止或極度限制他從事絕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極為重要活動之情形。

（To be substantially limited in performing manual tasks, an individual must have an impairment that prevents or severely restricts the individual from doing activities that are of central importance to most people's daily lives.）

2.當個人企圖證明符合身心障礙之狀態時，僅僅提出一項身心受損醫療診斷之證據一事，是並不充份足夠的。

（It is insufficient for individuals attempting to prove disability status to merely submit evidence of a medical diagnosis of an impairment.）

3.要證明一項身心受損，將會相當程度限制從事一般體力活動之主要生活活動時，並沒有必要將一整個等級之一般體力活動都鉅細靡遺包括在內。

（It is not required that a class of manual activities be implicated for an impairment to substantially limit the major life activity of performing manual tasks.）

4.聯邦上訴法院在決定受僱者之腕骨隧道症候群，是否造成她在從事一般體力活動時，會相當程度限制其主要生活活動一事，是採用了錯誤之認定標準，因為它僅僅專注在受僱者沒有辦法從事與其工作職務有關之一般體力活動上。

（Court of Appeals applies wrong standard in determining whether

employee's carpel tunnel syndrome caused her to be substantially limited in major life activity of performing manual tasks, when it focused on her inability to perform manual tasks associated only with her job）

5. 受僱者沒有辦法將手及臂伸展到肩膀水平或以上，來做重複之工作一事，並不足以證明她在從事一般體力活動之主要生活活動時，也同樣受到相當程度之限制。

（Employee's inability to do repetitive work with hands and arms extended at or above shoulder levels was not sufficient proof that she was substantially limited in major life activity of performing manual tasks.）

6. 某些造成受僱者不得從事特定活動限制之醫療情況，並不構成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所規定之體力活動身心障礙情形。

（Medical conditions that caused employee to restrict certain activities did not constitute manual-task disability under ADA.）

關 鍵 詞

regulatory interpretations（對行政規則之詮釋）；legislative findings（立法發現）；medical diagnosis（醫療診斷）；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個別判斷）；carpel tunnel syndrome（腕骨隧道症候群）；reasonable accommodation（合理處置或措施）；permanent impairment（永久身心受損）；long-term impairment（長期身心受損）；disability status（身心障礙之狀態）；public transportation（公共設施）；public accommodation（公共運輸）；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即 ADA）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O'Connor 主筆撰寫）

事　實

在本案中，原告是在被告豐田汽車公司位於肯塔基州喬治城鎮製造廠工作，起先是在引擎裝配生產線，負責操作震動性壓縮工作，而三個月後即有手部、腕部及肩部疼痛之現象，經診斷證明是罹染腕骨隧道症候群及骨腱炎，而受限制不得舉重物超過二十磅、不得經常攜帶超過十磅之物品、不得從事重複或過頭之工作，以及不得使用震動性或壓縮性器具等。由於這些限制，被告公司因此在兩年內，將她調動至其他經修正之工作，然而，她的情形並未見改善好轉，乃開始請病假並提出職災補償之申請，而且還根據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提出控訴，指稱該公司並未就其身心障礙提供合理之措施。嗣後，雙方在一九九三年達成和解，而被告公司遵守一項醫生之指示，將被告調至較爲輕微之工作，擔任品管部門之油漆檢查工作，而且只擔任一般應負責四項工作中之兩項，包括目視檢查及戴手套來擦拭每部汽車。在嗣後三年內，原告工作表現良好，而且並沒有任何疼痛之現象。在一九九六年，被告公司決定增加原告之工作份量，另外規定她要以工具洗拭車輛，而此一工作讓她必須舉起手超過胸部達數小時來操作機具，結果在不久原告即感覺頸部及肩部極端疼痛，她乃請求公司將其調回原來之工作，但被告公司拒絕其請求，而原告之醫生通知她不能再從事任何工作。在此年，被告公司即以原告經常缺工爲由而將她開除，原告乃向聯邦地方法院再度提出違反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第一章之訴訟。

判　決

聯邦上訴法院第六巡迴法庭之判決撤銷並發回。

理　由

雖然原告所罹患之腕骨隧道症候群及骨腱炎等，確屬肢體損害之情形，但僅僅具有一項身心損害一事，並不即足以讓他（或她）成爲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所保障之對象。這種身心損害必須要相當程度地限制一項主要生活活動，才得以構成該法所指稱之身心障礙情形。根據一般字典之定義，所謂「相當程度」一詞，應是指「非常地」或「非常大程度」之情形而言。而該法在對身心障礙定義時特別將此一詞加入，其用意即

是很顯然要將那些僅僅會在很小程度內干擾用手操作活動表現之身心損害情形，排除在該定義之外。

何種情形構成主要生活活動？應是指那些活動對日常生活而言，是具有極端重要之情形而言。主要生活活動應包括走路、視覺及聽覺等在內，而如果用手操作之活動要列入此一類別的話，則它們必須是日常生活之一極端重要部分，或雖然個別之活動不足以獨立被認爲是一項主要生活活動，但如果結爲一體的話，則必須是如此始可。

前述這些用語必須要從嚴加以詮釋，藉以爲身心障礙者一詞設定嚴格之標準，因爲根據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前述之立法發現及目的，是明確指出「在美國約有四千三百萬人具有一種或多種肢體或精神損害之情形」。從而，如果國會希望將任何無法從事某些孤立、不重要或特別困難之用手操作活動者，也列爲身心障礙者的話，則身心障礙美國人之數量顯然即會劇增，而這種情形在處理本案之腕骨隧道症候群更屬顯然，因爲這種病症之效果無論是在嚴重程度及發病期間上，都會有極大之不同。舉例而言，在症狀輕微之情形，當事人只會感到斷斷續續之麻木及疼痛，但在極端嚴重之情形，病患往往是永久無法使用其手部及腕部。

本院認爲就本案之原告而言，聯邦上訴法院第六巡迴法庭之判決犯了一項基本之錯誤，也就是將調查重點僅僅專注在那些與她工作有關之活動上。本院認爲在審理用手操作活動是否爲一種主要生活活動時，整個調查重點應是原告是否無法從事對大多數人日常生活而言相當重要之許多活動，而並不是他（或她）無法從事與某一特定工作有關之活動。

根據前述之原則，本院認爲本案原告無法每日重複以手工來擦拭五百輛以上車輛一事，並不屬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之一個重要部分，反而應該探究原告雖然有身心損害之情形，但她是否會刷牙、洗臉、洗澡、照顧花園、做早餐、洗衣服及在房間內到處打雜等。雖然有證據顯示原告之身心損害狀態，尤其是在服藥時，確曾讓她其他生活活動受到某些限制，諸如拖地、跳舞、減少與孩子們玩耍互動、在花園中工作或長途開車等，但這些對原告活動之改變，並不會達到「對多數人日常生活極爲重要活動極端加以限制之情形。」從而，本院在本案判決聯邦上訴法院第六巡迴法庭不應以即決裁判來

判決原告勝訴，因爲它並未考慮所有與工作場所無關之證據，由於該巡迴法庭並未對原告身心損害對工作場所以內及以外之全面影響一併加以審視，因此，將全案發回由該巡迴法庭重作考量。

8. U.S. Airways, Inc. v. Barnett

535 U.S. 391（2002）

焦興鎧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雇主如能提出證據顯示，受僱者所提出之處置要求將會與該事業單位所採行之年資制度相衝突的話，則通常即足以證明該項處置並不具有合理性。
（Employer's showing that requested accommodation conflicts with seniority rules is ordinarily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accommodation is not reasonable.）
2. 受僱者亦得提出特殊情況之證據，藉以證明在特定之事實情況下，對年資制度採取例外之做法，也會使該制度變得具有合理性。
（Employee may present evidence of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makes exception to seniority rules reasonable under particular facts.）

關 鍵 詞

disability-neutral rule（身心障礙中立規則）；seniority system（年資制度）；reassignment（調職）；otherwise qualified individual（其他適格之個人）；undue hardship（不當困難）；fact intensive analysis（以事實為準之分析）；employee-management relations（勞資關係）；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一九七三年復健法）；employee expectation（受僱者期待權）；job security（就職安全）；advancement（晉升）；Americans with Disablities Act of 1990（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即 ADA）；summary judgment（即決裁判）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Breyer 主筆撰寫）

事　實

原告擔任被告航空公司之客服員長達十年之久，在一九九〇年曾因執行職務遭到背傷而請職災休假，在復工後因無法從事體力難以負荷之貨運事宜，乃利用其年資請調至較爲輕鬆之郵務室工作。在兩年後，另外兩位年資較長之同事想要取代其現職，原告寫信向經理部門請求留在郵務室工作，以作爲對待其身心障礙損害之合理措施，甚至還建議如果被調回貨運部的話，也希望該航空公司能提供一定之措施，來安置其障礙失能之情形。然而，被告公司卻拒絕這些請求，而讓原告請職災休假。在一九九三年，原告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主張被告公司未能根據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規定，爲其身心障礙情形提供合理之措施。該委員會嗣後作出被告公司因未提供合理措施，而違反該法第一章對原告在就業上有身心障礙歧視之決定。

聯邦下級法院之判決

在加州北區之聯邦地方法院則是以即決裁判判決被告公司勝訴。根據該聯邦地院之意見，由於該案無庸置疑之證據顯示，該公司所採用之年資制度已實施達數十年之久，並已規範該公司近一萬四千多名員工，而且這類年資制度在航空運輸業也是普遍存在之現象，更重要的是，該公司所有員工均已合理信賴此一制度，因此，如果遽然將此一年新制度加以大幅度之改變，顯然對沒有身心障礙情形之其他員工及該公司本身而言，都會構成一種「不當困難」，從而，被告公司根據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相關規定，自得提出這類抗辯之道。

在本案上訴至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時，雖然該院之專庭曾維持聯邦地方法院之判決，但在經過全庭之重新聽審後，卻做出部分維持、部分推翻及發回地院之判決。根據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之見解，由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立法背景、平等就業機會委員之詮釋，以及其他聯邦上訴法院之相關判決觀之，雇主應與身心障礙之受僱者透過一種所謂「互動之程序」，藉以達成一項有關合理措施之協議，並且在本身主動或受僱者提出請求之情形下，以誠信之態度來對該受僱者提供此類設施，若雇主未能從事此一程序，即不但嗣後有可能要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且還不能在即決裁判之程序中獲勝。在本案之情形，由於

被告公司並未主動與原告進行此一互動程序，而且也未讓他競標所希望之職位，因此，聯邦地方法院逕以即決裁判之方式來處理此案之做法即屬有誤。至於在年資制度本身即足以防止身心障礙受僱者提出調職之請求一事，該上訴法院則也認爲，聯邦地方法院在本案中並未能考量本案原告所提建議之合理性。

判　決

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之判決廢棄並發回。

理　由

本院認爲在此類案件中，如果雇主能夠證明一項由身心障礙受僱者所請求之措施，將會與年資制度相牴觸的話，則通常法院都會認定這種措施並非合理，然而，受僱者仍得以提出特殊情況存在之證據，藉以在特別之案件中，證明一種對年資制度例外之合理性。聯邦各下級法院通常都會以務實之態度，來設法將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中「合理措施」及「不當困難」此二重要概念加以調和，從而，當被告雇主提出即決裁判之訴時，這些法院通常都會允許原告受僱者主張所提出之措施在表面上合理即爲已足，而被告雇主隨後即需提出情況特殊之證據，來證明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確會造成不當困難之情形。然而，在本案中，不論是被告雇主所提之違反年薪制度之措施均屬不合理之主張，或是原告受僱者所提之合理措施授權法院僅僅考量所要求設施是否符合其與身心障礙有關需求之見解，都不是對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適當詮釋。

本案所要考量之重點，在於原告所提議之措施，在通常情況下會被認爲是合理者，卻會演變成不合理，因爲所提調職之結果，將會違反年資制度所樹立之原則，而通常對此一問題之答覆是肯定的，因爲在系爭之一九九〇年法律中，並未規定要以逐案審查之方式來決定這種調職將會使年薪制度失效。至於相關之案例也曾引用前述復健法之規定，承認年薪制度對勞資關係之重要性，而判決經由團體協商所達成之年薪制度，必須要較合理措施之需求來得重要。事實上，即使在由雇主所單方面實施之年薪制度（本案即屬此一情形），其情形也是如此。因爲一項典型之年資制度通常都會對受僱者有利，主要是因爲它會對受僱者創造及實現某些期待，而讓他（她）們得到公

平一致之待遇。舉例而言，諸如就業安全，以及根據客觀之標準，而有平穩而可預期之升遷機會等，而根據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規定，國會在制定該法時，並沒有要破壞此類年資制度之意圖存在。

然而，前述之原則也並非全無例外之情形存在，原告受僱者仍得以特殊情況爲由，主張雖然在事業單位中有年資制度存在，但基於特別事實之緣故，原告所請求之措施仍屬合理，而這種特殊情況將會改變一項年資制度所創造之重要期望。舉例而言，受僱者即得以舉證由於雇主片面創造一項年資制度，也保有隨時改變這種制度之權利，而且也經常行使這類權利，致使受僱者對此一制度之期待權相形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受僱者所提出合理措施之請求，即不致於對此一制度產生任何不同之處。此外，原告受僱者也可以證明，由於雇主之年資制度原已存在有甚多之例外情形，從而，再多一項例外，也不會有太多之影響。

最後，由於聯邦各下級法院是採用不同之見解，而讓兩造均無法有機會透過前述之原則來尋求即決裁判之機會，從而，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之判決應予廢棄，並發回該院重審。

大法官 Scalia 及 Thomas 之不同意見書

由雇主基於眞實情況所建構之年資制度，若已經行之有年，則在任何情況都不應另創例外情形，而破壞受僱者之期待權，在本案之情形，多數意見之看法不但會造成一種不確定之狀態，而且也是出於對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一種錯誤之詮釋，勢必會將所有雇主採取之規則及做法，置於該法合理措施規定之範疇下。

大法官 Souter 及 Ginsburg 之不同意見書

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並未如前述一九六四年民權法第七章及一九六七年就業年齡歧視法，對年資制度設有明確之保障制度，從而，本院多數意見推定該法合理措施之規定不應較年資制度優先之見解，即對當事人有保障不足之虞，況且雇主對本案所系爭之年資制度，堪稱竭盡所能讓其受僱者無法有任何高度之期待，從而，當原告主張其所提出措施請求具有合理性時，則被告航空公司即就違反年資制度將會造成不當困難一事負擔舉證責任。

（大法官 Stevens 及 O’Connor 之協同意見書略。)

9. Chevron v. Echazabal

536 U. S. 73（2002）

焦興鎧 節譯

判 決 要 旨

根據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頒布行政規則之授權，雇主得以拒絕僱用一位員工，如果其身心障礙情形在工作上將會危及到他本身之健康的話，則該行政規則並未逾越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所允許之制定行政規則範圍。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regulation authorizing refused to hire an individual because his performance on the job would endanger his own health owing to a disability did not exceed the scope of permissible rulemaking under the ADA.)

關 鍵 詞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rule-making（制定行政規定）；independent contracts（獨立承包商）；direct threat（直接威脅）；qualification standards（適格標準）；affirmative defense（負責抗辯）；business necessity（執行業務必要）；threat-to-others（對他人造成威脅）；threat-to-self（對本身造成威脅）；congressional intent（國會本意）；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SHA) of 1970（一九七〇年職業安全與衛生法）；administrative leeway（行政便宜之舉）；（workplace paternalism（工作場所父權思想.）；Americans with Disablities Act of 1990（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即 ADA）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Souter 主筆撰寫）

事　實

在本案中，原告自一九七二年起即在被告公司承包商之煉油廠工作，他曾兩度申請直接到被告公司工作，而該公司都承諾只要他能接受並通過一項體檢的話，就會正式加以僱用，然而，他卻兩次都未能通過，因爲檢查結果發現他的肝功能並不正常，而且還有C型肝炎之情形。由於擔心長期暴露在煉油廠毒素之下，將會讓其肝臟情況更形惡化，被告公司乃決定不再給原告任何就業機會，而且還要求其承包商將原告調職，以免繼續暴露在化學物質之下，或將其解僱，而該承包商即在一九九六年將原告解僱。

聯邦下級法院之判決

在本案中，原告除向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提出申訴外，並向州法院提出被告公司因其身心障礙緣故對其在就業上之歧視，而有違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第一章之規定。嗣後，被告公司請求將全案移送至在加州中部之聯邦地方法院審理，而該院以即決裁判之方式，判決被告勝訴。根據該院之見解，原告在本案中並未能根據重要事實提出眞正之爭點，來說明被告公司信賴其本身所僱用醫師之醫學上諮詢意見一事是否合理，而不問其正確性如何。

在原告提出上訴後，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首先即需處理之一項爭點，是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中前述雇主所謂對「直接威脅」之抗辯，可否適用於身心障礙者本身之情形。由於被告公司是引用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頒布之行政規則來做爲雇主防禦之道，而認爲如果讓身心障礙者對自己本身也造成一項直接威脅的話，則也會構成一項違反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第一章之情形，因此，聯邦上訴法院認爲既然該母法本身所明確規定者是指其他個人而言，從而，該被告公司所做之直接威脅抗辯，在事實上已逾越母法所允許之範圍。此外，該上訴法院還特別指出，如果對該行政規則採取尊重之態度，勢必也會與國會在一九九〇年制定母法時禁止在工作場所採取所謂「父權作爲」之理念有所違背。最後，第九巡迴法庭也拒絕接受被告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張之工作表現而不致於傷害個人健康一事，並非工作上極爲重要之一項機能的看法。由於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此一判決，與其他聯邦上訴法院巡迴法庭之看法有相當歧異之處，本院

乃決定聽審此案。

判　決

上訴法院原判決廢棄。

理　由

聯邦上訴法院第九巡迴法庭之判決廢棄。首先，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中所指稱之歧視一詞，包含許多雇主可以用來防阻身心障礙者在工作場所內得以發揮所長之行動在內，而採用所謂資格標準，即足以將身心障礙者排除在工作領域之外。然而，由於並非所有這些資格標準均屬不合法之舉，因此，如果這些標準是與工作本身有關，而且又屬營業上必要時，則某些具有歧視性之資格限制即有可能成爲一種阻卻違法之抗辯，本院認爲這種資格標準就有可能包括當事人不應該對工作場所其他個人之健康或安全，構成一種直接威脅之情形在內。

本院雖然在一九九〇年之母法中，並未訂有一項資格標準，來規定個人不得對自己本身構成一項直接威脅，但由於這種直接威脅只是雇主用來做爲與工作有關，而且又屬營業上必要各種防禦之道之一，因此，該法可說也並沒有排除雇主得以使用其他之標準，在這種情形下，行政機關（或在行政機關不作爲時，則是法院本身），即擁有極大之自由裁量權，來設定這些資格標準之可允許範圍。此外，由於在母法中並未將這些資格標準加以列舉，因此，國會很顯然是故意將對自己本身之威脅加以省略，而交由雇主日後做爲阻卻違法抗辯之用。

至於在有關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前述直接威脅之行政規則，是否爲一對母法合理之詮釋部分，本院認爲由於一九九〇年母法特別授權該委員會頒布行政規則，來實施該法有關就業之部分，而這些規則又是根據公告及評論之程序而頒布。因此只要它們是與工作本身有關，而且又屬營業上所必要時，自然即屬資格標準之一，而形成雇主在制定法上有效之防禦之道。

再者，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之行政規則明確規定雇主所主張直接威脅之防禦之道，必須基於合理之醫學判斷，而根據最新近期之醫學常識，及/或最佳可以取得之客觀證據，同時，還必須對個人現在能安全從事工作之必要部分，做個別之評量等，都是要擔保雇主將不會用這種防禦之道，來從事前述沒有根據之父權作爲。簡而言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此一行政規則，一

方面得以防制對身心障礙者刻板化印象而造成之「工作場所之父權作爲」，另一方面則是允許雇主採取與工作本身有關之行動，來防止某些身心障礙之受雇者會不顧及本身之安危而拚命冒險找工作。

最後，本院認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此一行政規則之規範目的，是與其他聯邦政府政策考量一致，也就是雇主應維持一安全之工作場所，諸如一九七〇年職業安全與衛生法一樣。根據該法之規定，是要雇主在儘可能之範圍內，提供全國勞工一安全而衛生之工作條件，而國會特別賦予雇主應對其受雇者提供一工作機會，以及一免於會遭致死亡或嚴重肢體傷害之工作地點。如果根據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之規定，要求雇主僱用一會造成本身傷害之身心障礙者工作，勢必會與一九七〇年職業安全與衛生法中所要求雇主必須保證每位受雇者安全之理念互相牴觸衝突。綜而言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所頒布行政規則中此一部分之相關規定，在國會故意將互相衝突目標交錯之處不做明確之區分，而又留給行政機關某些操作空間之情形下，堪稱是做出實體選擇之最佳典範。

10. Eisenstadt v. Baird

405 U.S. 438（1972）

劉靜怡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雖然被上訴人的身分並不是持有執業證照的醫師或領有執照的專業藥局，也不是無從取得避孕方法的未婚者，但是仍然具有主張未婚者取得避孕方法的權利的原告當事人適格。
（That law makes it a felony for anyone to give away a drug, medicine, instrument, or article for the prevention of concept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1) a registered physician administering or prescribing it for a married person or (2) an active registered pharmacist furnishing it to a married person presenting a registered physician's prescription. If, as the Court of Appeals held, the statute under which appellee was convicted is not a health measure, appellee may not be prevented, because he was not an authorized distributor, from attacking the statute in its alleged discriminatory application to potential distributees. Appellee, furthermore, has standing to assert the rights of unmarried persons denied access to contraceptives because their ability to obtain them will be materially impaired by enforcement of the statute.）
2. 系爭麻州州法對於相同處境下的已婚者及未婚者賦予不同的待遇，違反了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平等保護規定。
（By providing dissimilar treatment for married and unmarried persons who are similarly situated, the statute violates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3. 嚇阻通姦罪此一理由，即使通姦在麻州屬於犯罪行為，被當做系爭法律所追求的目的，並不合理，因為此一法律規定中充滿避孕用具

可以自由地使用於婚前性行為的例外情況，同時，此一法律所涵括的範圍，以及其刑罰結構，也和上述嚇阻通姦罪的目的不相符合。（The deterrence of fornication, a 90-day misdemeanor under Massachusetts law, cannot reasonably be regarded as the purpose of the statute, since the statute is riddled with exceptions making contraceptives freely available for use in premarital sexual relations and its scope and penalty structure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at purpose.）

4. 「藉由管制潛在有害物品的散佈，達成保護公眾健康的目的」此一理由，也不應該被合理地當做系爭法律所追求的管制目的，否則，系爭法律不但具有差別待遇的性質，而且規定過於廣泛；而且，其他聯邦法律及州法均已有管制危險藥品散佈的相關規定，毋須系爭法律另外規定。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ly harmful articles cannot reasonably be regarded as the purpose of the law, since, if health were the rationale, the statute would be both discriminatory and overbroad, and federal and state laws already reg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drugs unsafe for use except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licensed physician.）

5. 此一法律不應基於禁止避孕用具為由，繼續維持其有效性，因為，無論個人有無使用避孕用具的權利，此一權利應該對已婚者和未婚者都一致對待。倘若根據 Griswold 案所建立的原則，散佈避孕用具給已婚者是不能被禁止的行為，那麼，禁止散佈避孕用具給未婚者的規定，同樣也是不該被允許的。因為，憲法所保護的權利，其本質乃是屬於個人的隱私權，而非僅限於已婚夫妻的隱私權。再者，倘若 Griswold 一案不應該被當做禁止避孕用具散佈的根據，那麼，僅針對未婚者限制其使用避孕用具，不但規範對象的範圍不夠周延，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差別待遇措施。

（Nor can the statute be sustained simply as a prohibition on contraception per se, for whatever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to access

to contraceptives may be, the rights must be the same for the unmarried and the married alike. If under Griswold,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aceptives to married persons cannot be prohibited, a ban on distribution to unmarried persons would be equally impermissible, since the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 of privacy inheres in the individual, not the marital couple. If, on the other hand, Griswold is no bar to a prohibi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aceptives, a prohibition limited to unmarried persons would be underinclusive and invidiously discriminatory.）。

關 鍵 詞

privacy（隱私權）；equal protection（平等保護）；contraception（避孕）；premarital sexual relations（婚前性行為）；under-inclusive（規範對象範圍不周延）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Brennan 主筆撰寫）

事 實

被上訴人 William Baird 在麻州一審法院的訴訟中，因爲在一個涉及避孕方法的演講中，對一群波士頓大學的學生展示避孕物品，以及在演講結束後，交給一個年輕女性一組陰道避孕泡沫用品這兩個行爲，被判決爲違反麻州法律。經過上訴後，麻州最高法院以一致決的方式，駁回有關展示避孕用具這個罪名的初審法院判決，駁回理由爲此一結果將侵害 Baird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得享有的權利，然而，麻州最高法院卻以四比三的投票結果，維持針對交付陰道避孕泡沫用品此一行爲的有罪判決。此一訴訟上訴至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後，改變判決結果，由被上訴人勝訴，乃上訴本院。

判　決

基於隱私權保護和平等保護的理由，維持第一巡迴上訴法院原判，判決被上訴人勝訴。

理　由

被上訴人 Baird 被定罪的依據—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Ann., c. 272, 21—規定「任何人…分送…可以避孕的藥品、藥物、儀器或物品的人，最高可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若構成同法 21A 所規定的情況，則不在此限。根據 21A 的規定，持有執業證照的醫師，可以提供或開立處方箋給想要從事避孕行爲的已婚者；其次，實際從事配藥業務且領有執照的專業藥局，也可以根據合格醫師所開立的處方箋，提供或出售上述避孕藥品或物品給已婚者。根據麻州最高法院對系爭法律規定的解釋，上述法律規定會導致任何意圖散佈分送避孕物品的人（除了上述符合 21A 規定的醫師或藥師之外）都陷於重罪。針對上述規定，可以區別出三種收受避孕用品者的類型：（一）已婚者可以取得避孕用具來進行避孕行爲，但是只能從合格的醫師或藥師處取得避孕用品；（二）未婚單身者不得自任何人取得避孕用具來進行避孕行爲；（三）已婚者或未婚單身者可以自任何人取得避孕用具，以從事防止疾病傳播的行爲（非以避孕用途爲目的的行爲）。當然，上述州法的解釋，對於本院是有拘束力的。

本院認爲：上述法律規定最初的立法目的爲何，並不清楚。在 Commonwealth v. Baird 這個判決裡，麻州最高法院只指出州政府保護人民健康這個利益爲立法目的，在另一個判決 Sturgis v. Attorney General 中，則是進一步指出「規範未婚單身者的私人性生活」以保護道德，是另一個更具有迫切重要性的立法目的。然而，上訴法院並不認同透過禁止通姦來促進健康或保護道德，是上述法律立法之初所設定的立法目的。相對地，上訴法院認爲，上述法律的立法目的，乃是在於限制避孕行爲，而這個立法目的，違反了 Griswold v. Connecticut 案所肯認的基本人權。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案中，本院便認爲 Connecticut 州禁止使用避孕用具的規定，乃是侵害婚姻隱私權的違憲規定。

本院認爲：「嚇阻婚前性行爲」和「管制潛在危險物品的散佈」這樣的立法目的，不應該被合理地認爲是上述麻州州法 21 和 21A 的立法目的。同時，本院認爲，此一被

認爲是禁止避孕用品的規定，違反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平等保護規定賦予未婚單身者的基本權利。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平等保護規定的基本原則如何適用，眾所週知。在這個案子裡，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究竟是否有合理的理由，可以解釋 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Ann., c. 272, 21 and 21A 的規定，以已婚者和未婚者這兩種身分，做爲差別待遇的認定標準。根據以下所述，我們認爲這樣的理由並不存在。

首先，儘管州可以在不違背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平等保護規定的前提下，將婚姻外的性關係和婚前性關係視爲負面行爲，然而，我們卻不同意禁止婚前性行爲可以被合理地當做是上述麻州法律立法目的的主張。

禁止散佈分發避孕用具給未婚者此一管制手段的效果，和其所追求的立法管制目的（嚇阻婚前性行爲或保護公眾健康）之間的關係，即使有也僅只是相當疏遠的關係，Goldberg 大法官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中針對「Connecticut 禁止使用避孕用具以制止婚姻外性關係」此一問題所表示的意見，已經指出此這一點：正如 Griswold 一案中所爭執的 Connecticut 州州法規定，本案所爭執的麻州州法 21 和 21A 的規定，也並沒有全然禁止避孕用具的散佈分發行爲，基於預防疾病傳播的必要，還是可以從事避孕用具的散佈分發行爲。再者，上述麻州法律允許已婚者在一定條件下取得避孕用品的規定，也使得已婚者和未婚者相互之間從事非法婚姻外性關係的行爲，不列入上述麻州法律的處罰範圍內。即使是在「對懷孕的恐懼會對通姦行爲具有嚇阻作用」這樣的假設下，由於上述麻州法律中充斥著不少例外允許的規定，使得嚇阻婚姻外性行爲此一目的，根本難以被視爲其所追求的立法目的。

再者，系爭麻州州法 21 和 21A 的規定，從文字字義的表面來判斷，和麻州禁止通姦的立法之間，其關連性也是值得懷疑的。如同上訴法院所指出者，通姦行爲在麻州是屬於輕罪，僅需承擔三十元的罰款，或者三個月的有期徒刑（Massachusetts General Laws Ann. c. 272 18）的風險；相對地，違反麻州州法 21 和 21 規定的結果，卻是屬於重罪，可被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聯邦最高法院認爲，如此對照之下，實在很難讓人相信，立法機關會因爲這個法律有可能可以嚇阻九十天刑期的輕罪

的發生—很明顯地應該是絲毫無法發揮此一預想作用的—而接受這個規定可以處以五年以下刑罰的法律」。進一步言：即使我們肯認立法機關應有充分的裁量空間，用來決定採取何種手段去防止通姦行爲，也肯認州可能希望藉由對那些促成犯罪行爲的人施加更爲嚴厲的處罰（相較於眞正從事犯罪行爲的人）的手段，來嚇阻那些法律所禁止的行爲，但是，和上訴法院一樣，我們還是無法相信在眼前這個例子裡，麻州法律會選擇將那些僅僅是從事散佈分送避孕用具行爲的人，處以二十倍於通姦罪（九十天有期徒刑）的刑罰。

其次，Section 21A 是一個立法增修後的規定，此一增修立法的目的，是要藉由管制潛在有害物品的方式，達成保護公眾健康此一需求。我們同意上訴法院所認爲，此一增修立法規定是一個要規避 Griswold 案所建立的原則所做的調整之看法。不過，以公眾健康需求做爲理由，來區分已婚者及未婚者，採取差別待遇措施，是不合理的作法，因爲，無論是已婚者還是未婚者，公眾健康此一需求應該是相同的。因此，我們認爲，儘管系爭法律從表面上看來是個維護公眾健康的措施，但是公眾健康其實並不是這個法律的合理依據，其目的只是在於嚇阻婚前性行爲的發生。

如果此一麻州法律無法以「嚇阻通姦」或「維護公眾健康的措施」做爲理由，繼續維持其有效性，那麼，是否能夠僅僅以「禁止避孕用具的措施」做爲理由，繼續維持其有效性呢？本院認爲，不管個人有沒有使用避孕用具的權利，這樣的權利對於已婚者和未婚者都必須是一致適用的。

根據 Griswold 案所建立的原則，散佈避孕用具給已婚者是不應該受到禁止的行爲，那麼，禁止散佈避孕用具給未婚者的作法，同樣也是不應該被允許的。的確，Griswold 案中所討論的隱私權，乃是指存在於婚姻關係當中的權利，但是，這並非意味著已婚夫婦是結合之後才具有心靈和心智的結合體，相反地，婚姻是兩個具有獨立心智和獨立情緒的個體結合之後的產物。如果隱私權眞的具有任何意義的話，那麼就該是屬於個人的權利，而且不管是已婚或者未婚，都可以免於政府在未經正當程序授權的情況下，侵犯會影響個人決定是否願意受孕或者希望避孕這樣根本的事項的領域內。

另一方面，如果在 Griswold 案所建立的原則中，對於避孕用品散佈分送行爲的禁止規定而言，並不

是個障礙，那麼，根據平等保護條款，州法便不能既規定散佈分送避孕用品給未婚者是不合法的，又規定散佈分送避孕用品給已婚者是合法的。換言之，在上述任一個案中，州所認定的負面因素都必須是具有同一性的，否則，倘若因而出現規範對象不夠周延的情況，應該都是不容許的。

基於以上理由，維持原判，被上訴人勝訴。

大法官 Douglas 提出協同意見書，認爲本案被上訴人的行爲屬於憲法言論自由所保護的範圍；大法官 White 和大法官 Blackmun 兩人也提出協同意見書。大法官 Burger 則提出不同意見書，認爲系爭州法基於公眾健康所做的規定，應屬有效，並無違憲之處。

11. U.S. *v.* Chadwick
433 U.S. 1（1977）

林利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被告在其箱子裡之內容物的隱私權益被侵犯前，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搜索令條款所提供之必須先經中立法官評估後簽發搜索令政府才得進行搜索的保護。

（Respondents were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Warrant Claus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with the evaluation of a neutral magistrate, before their privacy interests in the contents of the footlocker were invaded.）

A.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主要目的，是在保障人民免於受到政府不合理地侵擾其合理期待的隱私權益，而不是僅限於保障人民在住所中的隱私權益。

（A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is to safeguard individuals from unreasonable government invasions of legitimate privacy interests, and not simply those interests inside the four walls of the home.）

B. 被告將個人物品放進上了兩道鎖之箱子裡，即表示希望箱子裡的東西不要受到公開的檢視。若有人以這樣的方法保護自己的東西，是應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搜索令條款的保護，如同該條款也保護為了防止住所被侵入而將門鎖起來的人一樣。在沒有緊急狀況下，聯邦探員沒有取得法官所簽發的搜索令就逕自打開並搜索搜索被告的箱子是不合理的。

（By placing personal effects inside a double-locked footlocker, respondents manifested an expectation that the contents would remain free from public examination, and no less than one who locks the doors

of his home against intruders, one who safeguards his personal possessions in this manner is due the protection of the Fourth Amendment's Warrant Clause; since there was no exigency calling for an immediate search, it was unreasona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conduct the search without the safeguards a judicial warrant provides. ）

C. 聯邦探員不能以「機動車輛的搜索」的理由，將無搜索令搜索被告箱子的行為合理化，因為一個人對於個人行李箱所期待的隱私權益，大於對汽車所期待的隱私權益。就此而論，行李箱的機動性也不是一個足以排除其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搜索令條款所提供之保護的理由。一旦聯邦探員在火車站扣押那個箱子並安全地將它移送波士頓聯邦大樓而使其處於在他們的專屬控制下，在取得有效的搜索令之前，那個箱子跟箱子的內容物並沒有任何可能被移走的危險。

（The footlocker search was not justified under the "automobile exception," since a person's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in personal luggage are substantially greater than in an automobile. In this connection, the footlocker's mobility did not justify dispensing with a search warrant, because once the federal agents had seized the footlocker at the railroad station and safely transferred it to the Federal Building under their exclusive control, there was not the slightest danger that it or its contents could have been removed before a valid search warrant could be obtained.）

D. 聯邦探員也不能以合法逮捕之附帶搜索的理由，將無搜索令搜索被告箱子的行為合理化，因為無搜索令之搜索的時間及地點與逮捕被告之時間及地點不同，也沒有緊急情況發生，而聯邦探員對被告箱子的搜索，是聯邦探員在沒收和扣押那個箱子超過一個小時且被告被嚴密羈押很久一段時間後才展開的。

（Nor was the footlocker search justified as a search incident to a

lawful arrest, where the search was remote in time or place from the arrest and no exigency existed, the search having been conducted more than an hour after the federal agents had gained exclusive control of the footlocker and long after respondents were securely in custody.）

關 鍵 詞

probable cause（相當事由）；narcotics（毒品）；automobile exception（機動車輛搜索的例外）；judicial warrant（司法搜索令）；neutral magistrate（中立的治安法官）；privacy interests（隱私權益）；personal effects（私人物品）；plain view（一目了然）；custodial arrest（為羈押嫌犯而對嫌犯進行的逮捕）；destruction of evidence（證據的滅失）；warrantless search（無搜索令的搜索）；search incident to a lawful arrest（合法逮捕的附帶搜索）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Burger 主筆撰寫）

事 實

在 1973 年 5 月 8 日，在聖地牙哥的 Amtrak 鐵路員工看到被告 Gregory Machado 和 Bridget Leary 搬運一個棕色箱子到前往波士頓的火車上。當 Amtrak 鐵路員工注意到這個小箱子不尋常地重，而且外漏著常被用來掩蓋大麻氣味的滑石粉，鐵路員工因此懷疑該箱子內藏有大麻。因爲 Machado 的特徵與鐵路員工所偵查之毒犯的特徵相符，所以鐵路員工馬上向聖地牙哥的聯邦緝毒探員報告，而聖地牙哥的聯邦探員也迅速將其所得之資訊及 Machado 和小箱子的詳細描述，轉達給波士頓的聯邦探員。

兩天後，這輛火車抵達了波士頓，而聯邦緝毒探員也已經在火車站待命。雖然聯邦緝毒探員並未取得逮捕令或搜索令，但是他們帶著緝毒犬一起行動。聯邦探員在 Machado 和 Leary 領取行李和箱子

時認出他們，並且持續跟監。Machado 和 Leary 用行李推車將行李和箱子推到車站出口，他們將箱子從行李推車上抬到地上後便坐在箱子上面。

聯邦探員在被告箱子附近放開緝毒犬進行偵查，在沒有驚動被告的情況下，警犬辨識出箱子內藏有違禁品。之後另一名被告 Chadwick 也前來與 Machado 和 Leary 會合，他們雇了一名腳夫幫忙搬運箱子到 Chadwick 開來停在車站外接應他們的車子上。Machado，Chadwick，和腳夫一起搬運這個 200 磅重的箱子到車子的後車廂，而 Leary 已經坐在前座等候。在後車廂尚未關上而引擎也未發動之際，聯邦探員逮捕了被告三人。聯邦緝毒探員搜索三人，並沒有發現武器，但是聯邦探員從 Machado 的身上取走了箱子的鑰匙。

被逮捕的三名被告及 Chadwick 的車和箱子，隨後都被聯邦探員帶到波士頓的聯邦大樓。聯邦政府坦承從被告在晚間 9 點左右被逮捕後，箱子就一直在聯邦大樓受到聯邦執法人員的專屬監管，且一位聯邦探員作證說：這個箱子內的物品沒有遭到被告或其同夥取出的危險。聯邦緝毒探員也沒有理由相信該箱子裡裝有爆裂物或其他危險物品，或是裝有如不立即搜索該箱子即有喪失其證據價值的證據。況且聯邦大樓內有可以安全存放箱子的地方，而聯邦探員也沒有主張當時有任何必須作立即搜索的緊急情況發生。

在逮捕三名被告的一個半小時後，聯邦探員在未得到三名被告同意，也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逕自將箱子打開。箱子是由箱子所附的鎖和另一個掛鎖雙重鎖著，箱子是聯邦探員以從 Machado 身上取走的那把鑰匙打開，或以其他方式開啓，無法確定。聯邦緝毒探員打開箱子後找出大量的大麻。

三名被告被控持有大麻並意圖銷售和共謀等聯邦罪名。在審判前，三名被告提出要求聯邦地方法院禁止聯邦政府(檢方)將聯邦探員從箱子內取得之大麻作爲呈堂證據的聲請。在聯邦地方法院的審判中，聯邦政府(檢方)試圖以美國最高法院在 Chambers v. Maroney 案中所制定的「機動車輛的搜索」和合法逮捕之附帶搜索這二項無搜索令搜索的例外情況，來合理解釋聯邦探員在未得到三名被告同意也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逕自打開並搜索箱子的行爲。聯邦地方法院裁決無搜索令之搜索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下是當然(本質上)不合理，除非該項無搜索令之搜

索是屬於法律所規定之無須搜索令也可以搜索的一些例外情況。因爲聯邦地方法院認爲箱子和 Chadwick 車子的關聯性純屬偶然，所以聯邦探員搜索被告箱子的行爲不屬於「機動車輛的搜索」；而被雙重鎖鎖上的 200 磅重箱子也不在三名被告可能取得武器或銷毀證據的範圍內，所以聯邦探員搜索被告箱子的行爲也不屬於合法逮捕之附帶搜索。聯邦地方法院因此否決聯邦政府(檢方)所提出的二項無搜索令搜索的例外理由，而准許被告所提出要求聯邦地方法院禁止聯邦政府(檢方)將聯邦探員從箱子內取得之大麻作爲呈堂證據的動議。

承審法官意見分歧的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確認聯邦地方法院禁止聯邦政府(檢方)將聯邦探員從箱子內取得之大麻作爲呈堂證據的判決，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裁決被告的箱子在聯邦探員合法逮捕三名被告後，被合法地帶到波士頓的聯邦大樓受到聯邦執法人員的專屬監管。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也同意當聯邦探員打開箱子時，有相當事由相信箱子內藏有違禁品。但是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認爲僅就聯邦探員有相當事由相信箱子內藏有違禁品的這個理由，不足以將無搜索令的搜索合理化。在無搜索令之搜索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下是當然(本質上)不合理，除非該項無搜索令之搜索是屬於法律所規定之無須搜索令也可以搜索的一些例外情況的前提下，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贊同聯邦地方法院的見解，認爲聯邦探員搜索被告箱子的行爲既不屬於「機動車輛的搜索」，也不屬於合法逮捕的附帶搜索。

聯邦政府(檢方)在上訴時首次主張，如果聯邦探員有相當事由相信在公共場所合法扣押的個人動產內藏有犯罪證據，聯邦探員應該不需要搜索令即可搜索該個人動產。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贊同聯邦政府(檢方)的看法，認爲個人動產的確也具備了讓美國最高法院因而制訂「機動車輛的搜索」無需搜索令的特質-- 機動性。然而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認爲除了機動車輛的情況外，本庭並不准許聯邦政府僅就相當事由即可搜索個人動產，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也亦未認可「僅就相當事由即可搜索個人動產」爲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搜索令狀規定的另一個無需搜索令的有效例外。

本庭同意受理此案，來裁決聯邦探員在有相當事由相信箱子內藏有違禁品的情況下是否需要搜索令才得打開被告被逮捕時所合

法扣押之上鎖箱子的爭議。

判　決

本庭確認聯邦上訴法院的裁決。

被告在其箱子裡之內容物的隱私權益被侵犯前，被告受到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搜索令條款所提供之必須先經中立法官評估後簽發搜索令政府才得進行搜索的保護。

理　由

上訴人從聖地牙哥坐火車抵達波士頓時，被事先告知他們可能攜帶違禁品的聯邦緝毒探員在前來接應他們的車上將上訴人逮捕。上訴人將用火車運送且上了兩道鎖的箱子放在接應車子的後車箱，而聯邦探員則有相當事由相信該箱子內藏有違禁品。被逮捕的上訴人及被扣押的那輛車和箱子，隨後都被聯邦探員移送波士頓的聯邦大樓，聯邦探員承認此後上訴人及那輛車和箱子都在他們的專屬控制下。在逮捕上訴人的一個半小時後，聯邦探員在沒有獲得上訴人同意和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將箱子打開並起出大量的大麻，後來上訴人就被以意圖販賣而持有大麻的罪行起訴。聯邦地方法院准許上訴人所提出要求法院禁止從箱子內取得之大麻作爲呈堂證據的審判前聲請，該法院裁決無搜索令之搜索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下是當然(本質上)不合理，除非該項無搜索令之搜索是屬於法律所規定之無須搜索令也可以搜索的一些例外情形，而聯邦探員搜索上訴人箱子的行爲既不屬於「機動車輛的搜索」，也不屬於合法逮捕之附帶搜索，因此無法以這二項無搜索令之搜索的例外狀況來合理解釋他們的行爲；聯邦上訴法院維持原判。

本法院同意受理此案件來裁決聯邦探員在有相當事由相信箱子內藏有違禁品因此打開上訴人被逮捕時所合法扣押的箱子是否需要搜索令的爭議。本法院確認聯邦上訴法院的裁決。

I

被告在其箱子裡之內容物的隱私權益被侵犯前，被告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搜索令條款所提供之必須先經中立法官評估後簽發搜索令政府才得進行搜索的保護。

(a)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主要目的，是在保障人民免於受到政

府不合理地侵擾其合理期待的隱私權益，而不是僅限於保障人民在住所中的隱私權益。

(b)被告將個人物品放進上了兩道鎖之箱子裡即表示被告希望箱子裡的東西不要受到公開的檢視。若有人以這樣的方法保護自己的東西，是應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搜索令條款的保護，如同該條款也保護爲了防止住所被侵入而將門鎖起來的人一樣。在沒有緊急狀況下，聯邦探員沒有取得法官所簽發的搜索令就逕自打開並搜索被告的箱子是不合理的。

(c)聯邦探員不能以「機動車輛的搜索」的理由將無搜索令搜索被告箱子的行爲合理化，因爲一個人對於個人行李箱所期待的隱私權益大於對汽車所期待的隱私權益。就此而論，行李箱的機動性也不是一個足以排除其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搜索令條款所提供之保護的理由。一旦聯邦探員在火車站扣押那個箱子並安全地將它移送波士頓聯邦大樓而使其處於在他們的專屬控制下，在取得有效的搜索令之前，那個箱子跟箱子的內容物並沒有任何可能被移走的危險。

(d)聯邦探員也不能以合法逮捕之附帶搜索的理由將無搜索令搜索被告箱子的行爲合理化，因爲無搜索令之搜索的時間及地點與逮捕被告之時間及地點不同，也沒有緊急情況發生，而聯邦探員對被告箱子的搜索是聯邦探員在沒收和扣押那個箱子超過一個小時且被告被嚴密羈押很久一段時間後才展開的。

II

聯邦政府(檢方)再次向本庭主張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搜索令狀條款傳統以來只保護住所裡的隱私權益。以殖民時期所核發之搜索私人住所的協助執行判決令狀爲依據，聯邦政府(檢方)主張制憲者制訂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搜索令狀條款，最主要是爲了因應在一般(概括)令狀授權下對私人住所不合理的侵擾。聯邦政府(檢方)認爲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制憲者在制訂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時，有意破壞制憲當時准許在住所以外的地方進行無搜索令之搜索的慣例，或是變更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首條條款賦予人民保障其身體、住所、文件、及物品免於受到聯邦政府不合理搜索與扣押之權利的規定。

依據其對歷史的解讀，聯邦政府(檢方)主張只有住所、辦公室和私人對話，才享有憲法增修條文第

四條所要保護的隱私權益。因此，聯邦政府(檢方)認爲唯有在上述這些情況下，搜索令或扣押令的取得與否，才是決定搜索或扣押是否合理的考量因素。聯邦政府(檢方)主張在其他的情況下，因爲較少的隱私權益受到侵害，因此聯邦政府侵擾人民的合理性，應該僅取決於聯邦政府是否有相當事由相信犯罪證據藏匿於要被搜索或扣押的物品當中。當個人動產在住所外被聯邦政府以相當事由合法扣押時，聯邦政府(檢方)不認爲未取得搜索令而逕行搜索的行爲是不合理的。

本庭不贊同聯邦政府(檢方)所提出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搜索令條款僅是在保護住所和其他特別指定地點的主張。正如本庭曾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保護的是人而不是地方，該增修條文尤其是保護人民之合理期待的隱私權益免於受到政府不合理的侵擾，在本案中，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中的搜索令條款正是提供人民這樣的保護。因此，本庭要解決的爭議是聯邦探員在本案的事實情況下對被告上鎖的箱子進行無搜索令的搜索是否爲不合理的搜索？

雖然殖民者所擔憂而制憲者所關心的搜索和扣押，皆與侵擾住所的搜索和扣押有關，但若像聯邦政府(檢方)的主張一樣，認爲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搜索令狀條款只限於保護住所免於受到政府不合理的侵擾，則這個推斷並非正確。首先，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搜索令狀條款中的文字用語，並沒有區分住所的搜索和非住所的搜索，而在歷史上與搜索令狀條款有密切關聯的該增修條文首條條款，對於人民的身體、住所、文件及物品均提供免於受到聯邦政府不合理搜索與扣押的相同保障。

在解決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爭議所要探討的基本問題，是聯邦探員在本案的情況下所進行的無搜索令搜索或扣押是否爲不合理的搜索或扣押?司法搜索令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爲司法搜索令是經過中立的治安法官仔細審查後才得簽發，在對抗不當的搜索上，中立治安法官的仔細審查，相較於爲了積極打擊犯罪而倉促行事的執法人員較能使人信服。一旦警方開始執行合法的搜索，若警方依照經過司法授權且詳載搜索地點和逮捕之人或扣押之物品的搜索令來進行搜索，則較不容易出現逾越搜索權限的情形。再者，搜索令是向被搜索和被扣押財產的人保證執行該搜索和扣押行動之警方的合法授權、搜索的理由和搜索的限制。

就如同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

提供不侷限地點的人身保障，司法搜索令所提供之對抗政府不當侵擾的保障也不侷限於人民的住所，因此本庭在不同案件中皆裁決無搜索令的搜索爲不合理的搜索，所以違反該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一百年前，在 *Expate Jackson* 案件中，大法官 Field 將在美國境內往返的郵件也納入除非有搜索令否則不得受到政府不合理搜索和扣押的保護範圍內：除了郵件的外形及重量外，郵寄中的書信以及密封的包裹，視同被寄件人放在住所裡一樣，完全不受到政府的檢視及調查。憲法保障人民的文件免於受到政府不合理搜索和扣押的規定，保護人民的文件不受到政府的檢視，不論該文件所在何處。就如同在某人住所中被搜索的物品一樣，郵件必須在警方持有經過宣誓、確認和詳載搜索客體之搜索令的情況下，才可以被打開檢查。

本庭在 *United States v. Van Leeuwen* 案中確認 *Expate Jackson* 的判決。在 *United States v. Van Leeuwen* 案中，政府取得搜索令才得搜索寄件人宣稱只裝有硬幣的郵寄包裹。本庭在不同的案件裡也曾裁決聯邦政府必須取得司法搜索令才得在住所以外的地方進行其他類型的搜索，例如 *Katz* v. *United States* (在公共電話亭外以電子監聽器監聽)，*Coolidge* v. *New Hampshire* (在私人住所裡的汽車)，*Preston* v. *United States* (受警方羈押的車輛)，*United States* v. *Jeffers* (旅館)，*G.M. Leasing Corp.* v. *United States* (辦公室)，*Mancusi* v. *DeForte* (辦公室)，這些案件說明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搜索令條款的適用範圍遠超過聯邦政府所主張的住所範圍。這些案件也反映出已建立的憲法原則，即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主要目的，是在保障人民免於受到政府不合理地侵擾其合理期待的隱私權益，而不是僅限於保障人民在住所中的隱私權益。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所賦予人民之隱私權益是這個案件的爭議。被告將個人物品放進上了兩道鎖之箱子裡即表示被告希望箱子裡的東西不要受到公開的檢視。若有人以這樣的方法保護自己的東西，是應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搜索令條款的保護，如同該條款也保護爲了防止住所被侵入而將門鎖起來的人一樣。在沒有緊急狀況下，聯邦探員沒有取得法官所簽發的搜索令就逕自打開並搜索被告的箱子是不合理的。

聯邦政府(檢方)並沒有主張因爲箱子是放在被告車子的後車箱，而將聯邦探員對箱子的搜索視

爲是對車子的搜索，但是聯邦政府(檢方)主張本庭在案件先例中允許搜索機動車輛的理由，證明了允許沒有搜索令搜索被告箱子的合理性；聯邦政府(檢方)認爲就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目的而言，被告的箱子可被類推跟車子是相同的情形。的確，車輛就如同這個案件的系爭箱子一樣，同樣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中所指的物品，因此搜索及扣押車子必須符合憲法所規定的合理標準。但是本庭也了解在某些情況下，車輛和其他財產的不同處可讓政府無搜索令搜索車輛的行爲仍屬合理。

本庭制定機動車輛搜索的例外規定，是根據車輛固有的機動性，因爲車輛的機動性往往讓取得法院搜索令的做法顯得不切實際。此外，本庭也允許「在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得以搜索車輛，即使車子被開走或車子裡的證據被銷毀的機率不大」。本庭爲何要制定機動車輛搜索的例外，理由是人們對於車內隱私權益的期待降低：「人們對於車內隱私權的期待較少，因爲車子的功能是交通運輸，而很少會被當成是住所或是個人用品的儲藏處。車子在公共道路上行駛時，車內的乘客和物品都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其他因素也降低了汽車內的隱私權益。「所有的州政府都規定汽車要申請行照，而駕駛人也要有駕照。州政府跟地方政府都制定廣泛且詳盡的條例來規範汽車在公共道路及高速公路上的行駛。」又汽車必須定期接受政府的檢查，並且也常基於公共安全的考量被警察扣留。

然而，那些降低汽車內隱私權的因素，不能適用於被告的箱子，除了在出入境或搭乘一般大眾運輸工具的時候以外，行李箱裡的內容物通常並沒有被公開在大眾的視線之下，也不受到例行檢查或政府的持續審查。不同於以交通運輸爲首要功能的汽車，行李箱是被拿來當作個人用品的儲藏處。總而言之，一個人對於個人行李箱所期待的隱私權益大於對汽車所期待的隱私權益。

行李箱的機動性也不是一個足以排除其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搜索令條款所提供之保護的理由。一旦聯邦探員在火車站扣押那個箱子並安全地將它移送波士頓聯邦大樓而使其處於在他們的專屬控制下，在取得有效的搜索令之前，那個箱子跟箱子的內容物並沒有任何可能被移走的危險。被告並未對聯邦探員最初沒收和扣押箱子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而聯邦探員對箱子最初的沒收和扣押也足

以防止犯罪證據的滅失。在箱子被安全扣押的情況下，聯邦探員沒有搜索令就對被告的箱子做出超越憲法保障範圍的侵擾是不合理的。

最後，聯邦政府(檢方)極力主張當聯邦探員有相當事由相信在公共場所合法逮捕之人所持有的動產內藏有違禁品或犯罪證據的情況下，美國憲法允許聯邦探員對該動產進行無搜索令的搜索。雖然聯邦政府(檢方)承認箱子不在三名被告立即控制的範圍內，但聯邦政府(檢方)認爲聯邦探員在逮捕三名被告的同時也將箱子扣押，並且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立即搜索該箱子，所以聯邦政府(檢方)堅持聯邦探員在未得到三名被告同意也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逕自搜索箱子的行爲是合理的。但是允許聯邦探員對羈押逮捕之人進行附帶搜索的理由與聯邦政府在本案所提出的理由，是大不相同的。當警方要逮捕嫌犯以便帶回警局羈押時，警方可能面臨嫌犯企圖使用武器拒捕或嫌犯將證據隱匿或銷毀湮滅的情況。本庭曾裁決警方在爲保護自己和他人且爲避免證據滅失的情況下，執行逮捕的員警對嫌犯的身體和嫌犯立即控制之範圍（意指嫌犯得以立即取得武器或將證據銷毀的範圍）進行無搜索令的迅速搜索是合理的。這樣的搜索是無需搜索令，且這樣的搜索也無需警方提出其認爲嫌犯可能持有武器或嫌犯將會銷毀證據的相當事由。警方爲逮捕嫌犯以便帶回警局羈押所隱藏的潛在危險性，使得警方對於在嫌犯立即控制之範圍進行無搜索令的迅速搜索是合理的，無需執行逮捕的員警評估嫌犯是否持有武器或嫌犯是否將會銷毀證據的可能性。然而假如無搜索令之搜索的時間及地點與逮捕嫌犯之時間及地點不同，或沒有緊急情況發生，則警方對於在逮捕嫌犯時已扣押之皮箱或其他物品進行無搜索令的搜索，是不能以逮捕嫌犯的附帶搜索做爲無搜索令之搜索的正當理由。一旦警方將嫌犯的皮箱或嫌犯身上的其他私人物品加以扣押保管，就不再會有嫌犯可以從接近該物品而取得武器或銷毀證據的危險性，因此搜索該物品就不再是逮捕嫌犯的附帶搜索。

在這個案件裡的搜索是聯邦探員在沒收和扣押那個箱子超過一個小時且被告被嚴密羈押很久一段時間後才展開的；所以這個搜索不能被視爲是合法逮捕的附帶搜索或被當作是其他緊急狀況的搜索。雖然在這個案件中能預期到法官會簽發搜索令，但是憲法賦予人民保障之界限還是要畫分清楚。本庭認爲，在沒有緊急狀況需

要立即搜索的情況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搜索令條款保護被告在警方專屬控制下之財產免於受到政府不合理的搜索。在被告箱子裡之內容物的隱私權益被侵犯前，被告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搜索令條款所提供之必須先經中立法官評估後簽發搜索令政府才得進行搜索的保護。

因此，維持原判。

12. Zablocki, Milwaukee County Clerk v. Redhail

434 U.S. 374（1978）

王郁琦　節譯

判　決　要　旨

當一法規分類明顯妨害基本權利行使時，除其具有充分、重要之州利益可為證立，且為必要且從嚴限縮適用範圍者外，該法規分類將無法通過合憲檢驗。

（When a statutory classification significantly interferes with the exercise of a fundamental right, it cannot be upheld unless it is supported by sufficiently important state interests and is closely tailored to effectuate only those interests.）

關　鍵　詞

Due Process Clause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正當法律程序條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s（平等保護條款）；right of privacy（隱私權）；right to marry（結婚權）。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Marshall 主筆撰寫）

事　實

威斯康辛州法第 245 條第 10 項第 1、4、5 款規定，有不在其監護下未成年子女，並依法院命令或判決負有扶養義務之威斯康辛州居民，於取得法院許可結婚之令狀

前，不得結婚；而法院須於申請者提出已履行其扶養義務，以及該未成年子女目前並未、將來亦不致須受公共照管（public charge）之證明後，方得發給許可令狀；且州亦僅得對領有許可結婚令狀之前開威斯康辛州居民，發給其所申請之結婚許可（marriage license）。未遵守系爭法第 245 條 10 項之婚姻將被宣告無效；違反前法取得婚姻許可者亦將受刑事制裁。而被上訴人 Redhail 乃威斯康辛州居民，因其積欠扶養費，且其未成年子女亦已領有福利給付受公共照管，而無法符合法令取得法院結婚許可令狀及婚姻證書，於威斯康辛州締結合法之婚姻。因此 Redhail 於地區法院對郡書記官 Zablocki 提起集團訴訟，主張前法違憲。地區法院判決系爭法因違反平等保護原則無效，並禁止其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本訴訟。

判　決

維持威斯康辛東部地區法院之判決。

理　由

本案爭點之乃在於威斯康辛州法第 245 條第 10 項第 1、4、5 款之合憲性。

系爭威斯康辛州法規定，凡有不在其監護下未成年子女，並依法院命令或判決負有扶養義務之威斯康辛州居民，於取得法院許可結婚之令狀前，不得結婚。同法並指出，法院須於申請者提出已履行其扶養義務，以及該未成年子女目前並未、將來亦不致須受公共照管之證明後，方得發給許可令狀。而除有法院命令外，不得依未領有許可結婚令狀之前開威斯康辛州居民之申請，對其發給結婚許可。未遵守系爭法第 245 條 10 項之婚姻將被宣告無效；違反前法取得婚姻許可者亦將受刑事制裁。

本案之被上訴人 Redhail 因無法符合第 245 條 10 項之規定，而被法院駁回其結婚許可請領之申請，是遂依 42 U.S.C. §1983 提起集團訴訟（class action），主張威斯康辛州法違反平等保護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條款，並請求確認賠償請求權與發給禁制令。威斯康辛東部地區法院判決系爭法因違反平等保護原則而違憲，並禁止其執行；而本院判決認爲本院就此案有管轄權（propable jurisdiction），並駁回上訴，維持威斯康辛東部地區法院之判決。

I

被上訴人 Redhail 乃威斯康辛州居民。而根據威斯康辛州法第 245 條 10 項，只要被上訴人維持其於威斯康辛州之住所，即無法於威斯康辛州內或州外任一地合法結婚。

1970 年 1 月當被上訴人尚爲高中生時，有名女子於密爾瓦基州郡法院對其提起親權訴訟（paternity action），主張被上訴人爲該訴訟案中非婚生子女之生父。於被上訴人出庭並承認其確爲該子女之生父後，法院便於 1972 年 5 月 12 日判決被上訴人乃該未成年子女之父親，並命令被上訴人每月應支付 109 元之扶養費直至該未成年子女滿 18 歲爲止。而 1972 年 5 月至 1974 年 8 月間被上訴人因無業且貧困，故無法支付任何扶養費。

1974 年 9 月 27 日被上訴人向上訴人密爾瓦基市之郡書記官 Zablocki 申請結婚許可，十天後因欠缺 245 條 10 項規定之法院許可令狀而遭駁回。雖被上訴人嗣後並未向州法院提出申請，但被上訴人之情況乃確實無法取得許可令狀—蓋無法符合法規前提要件。被告既未履行扶養義務，至 1974 年 12 月止已積欠達三千七百元；該子女亦自出生時起即已根據有未獨立子女家庭之協助計劃（the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program）領有福利金，接受國家照管；因此，由於其子女已領有前開社會福利，故即使已履行其扶養義務，被上訴人仍無法符合法規中未受公共照管之要件。

是被上訴人乃於 1974 年 12 月 24 日代表自己及所有因不符第 245 條第 10 項第 1 款，而曾被威斯康辛州中書記官拒絕發給婚姻許可之威斯康辛州居民，於地區法院對由 Zablocki 氏及其所代表之威斯康辛州中所有書記官，提起集團訴訟。被上訴人除主張系爭法剝奪被上訴人及其所欲代表之集團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一、五、九、十四條所享有之平等保護與正當法律權外，亦表示其與欲結婚之對象將於 1975 年 3 月間產下一子，希望得於子女出生前合法締結婚姻云云。

就實體法律主張方面，地區法院之三人合議庭於依平等保護原則分析後認爲，因系爭法之分類侵及類屬基本權之結婚權，故須加以嚴格審查。而法院於評價依該法所得促進之利益後認爲，系爭法所爲之分類並非達成立法目的所必要者，故判決系爭法無效，並禁止行政官員執行之。

上訴人根據 28 U.S.C. §1253 提起直接上訴，主張地方法院認威斯康辛州法第 245 條第 10 項第 1、4、

5 款無效之判決有誤。而被上訴人除捍衛地方法院之平等保護原則外，亦以系爭法亦未滿足實質正當程序要件爲由，要求確認地方法院之判決。而本院同意地方法院見解，亦即系爭法違反平等保護原則。

II

於依平等保護原則評價第 245 條第 10 項第 1、4、5 款時，吾人首須藉由究明此一法規分類之本質以及因之受影響的個人利益，來決定使該分類合憲所需之正當化程度爲何。由於法院過去判決已表明結婚權具有基礎重要性，而本案系爭法之分類又明顯妨害結婚權之行使，因此吾人相信須對系爭分類之立法目的爲一嚴格審查。

Loving v. Virginia, 388 U.S. 1 (1967)乃本院針對結婚權所爲最重要之判決—一對被控違反維吉尼亞州種族混婚法之異種族夫妻，以違反平等保護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爲由主張該法違憲。法院除判決該法中以種族爲基礎之歧視違反平等保護原則外，更表示該法已恣意剝奪人民受正當法律程序保護之基本自由權—結婚自由。法院稱：「結婚自由長久以來乃被確認爲，對人類追求有秩序之幸福而言，屬不可或缺的重要個人權利之一」；「婚姻乃人類基本權、私權之一，它對人類之存在與生存具有基本之重要性。」

雖然 Loving 案之脈絡乃主要在處理種族歧視，先前與後繼之判決仍更確立了結婚權對所有個人言具有基礎之重要性之見解。於較久遠之 *Maynard v. Hill*, 125 U.S. 190(1888)案中，法院將婚姻描述爲人類生活中最重要之關係，以及家庭社會之基礎。倘無婚姻，則文明與進步將無法出現。在 *Meyer v. Nebraska*, 262 U.S. 390(1923) 案中，法院確認：結婚、建立家庭與扶養小孩乃處於受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自由的核心。在 *Skinner v. Oklahoma ex rel. Williamson, supra*, 316 U.S. 535(1942)案中，婚姻則被描述爲種族存在與生存之基礎。

而近代之判決則確立，結婚權乃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正當法律程序中所指明之隱私權的一部份。在 *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 479(1965)案中，法院評論：「此處的隱私權，比權利法案、政黨政治、學校系統還要古老。婚姻是一種不管好壞的結合，且但願能神聖地親密長久。」而在 *Griswold* and *Loving* 後之案件，即將結婚決定歸類於受隱私權保護之個人決定中。例如在 *Carey v. 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 431 U.S. 678(1977)案中，法院表示：「雖然個人隱私之外部界線尚未被法院清楚標明，但與婚姻有關決定、生育、避孕、家庭關係與子女撫育與教育，確屬不受未正當化之政府介入的個人決定。」

結婚決定被認爲與生育、分娩、撫育教育子女等家庭關係有相同之重要性並不令人意外。而承認其他方面之家庭生活乃隱私權，卻不承認進入家庭生活之決定亦爲隱私權之一環，並無道理。被上訴人欲相婚之女子根據 *Roe v. Wade* 案有墮胎的權利，使其子女降生，體驗無盡世界的權利，而非婚生子女的狀態將使其獲致不利益，縱使非經濟上的意義而言。因此結婚決定以及在傳統家庭環境下撫育子女當然必須得到相同之保護。再者，倘被上訴人所指之生育權具有任何意義，則其必定包含一進入威斯康辛州唯一允許之合法性關係—亦即婚姻關係—中的權利。

於再次確認結婚權之基本重要性時，本院並未意指凡涉及婚姻要件或效果之規定皆須通過嚴格（rigorous）審查。相反的，並未明顯妨害進入婚姻關係決定的合理規定，可以被合憲地訂定。然系爭法所爲之分類確實已直接、實質地影響結婚權。

根據系爭威斯康辛法第 245 條第 10 項第 1、4、5 款，受規範之威斯康辛州居民於未取得法院令狀下不可能結婚；而違法之婚姻不僅無效且須受刑事處罰。某些受規範者例如被上訴人，不是欠缺滿足扶養義務之經濟方法，就是無法證明其子女未來將不會須受公共照管，因而永遠無法獲得必要之法院命令，而永遠無法合法締結婚姻。而其他理論上可滿足法規要件者，將會因要件負擔而使其事實上被迫使放棄結婚權。而即使對於那些可被勸服履行法規要件者，亦會因此而使其吾人認爲具有基本重要性之自由受到嚴重之侵擾。

III

當一法規分類明顯妨害基本權利行使時，除其具有充分、重要之州利益可爲證立，且爲必要且從嚴限縮適用範圍者外，該法規分類將無法通過合憲檢驗。上訴人主張用爲證立之利益亦即立法目的有二：利用申請法院結婚許可令狀之程序與申請人就關於履行過去扶養義務之必要性爲一諮商、勸告，因而可保護其未成年子女之撫育。此項目的雖爲一正當且重要（legitimate and substantial）之利益，然因其手段不必要地侵及結婚

權，系爭法仍無法被維持。

且自立法歷程觀之，系爭法最初提案時乃僅欲建立一機制，於申請人進入新婚姻關係、發生新扶養義務前，與其就過去之扶養義務爲一諮商。諮商雖屬要件，但於諮商完成後法院將會自動發給允許令狀。但系爭法於制定後並無有關諮商，以及一旦諮商完成法院即應發給允許令狀之規定，是上訴人此一主張難以成立。即使假設協商確實發生（但事實上紀錄中並無相關證據），一旦諮商完成，則此一主張亦無法支持法院繼續拒絕發給允許令狀之決定。

至於關於未受監護之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部分，上訴人之主張則未清楚表明其立法目的與法規手段—即其要求之要件—間之關連性。上訴人主張系爭規定提供申請人履行扶養義務之誘因，但此一收費機制論理並無法正當化該法之廣泛侵及結婚權。首先，對那些無力滿足法規要件者言，系爭法僅使其無法結婚，而並未對於申請者之子女提供任何實質之幫助。更重要者，不論申請者有無意願履行扶養義務，有許多至少與此一收費機制一樣可達使人履行扶養義務之效果，且卻又不會侵害結婚權的方法。例如薪水指派（wage assignments）、民事藐視法庭程序（civil contempt proceedings）與刑事處罰等。並且，假如州認爲無監護權之父母有責任使其子女不致須受公共照管，則亦可藉調整決定扶養義務數額標準之方式達成之。

雖有主張認爲，系爭法乃藉由申請人發生新扶養義務，以確保其履行原有扶養義務之能力。但就此一目的言，系爭法乃保護不足的，蓋其並未限制所有可能發生新財務義務之行爲；且亦屬過度規定的，因新伴侶有可能使義務人之財務狀況好轉，因此在許多情況下，系爭法反而可能避免申請人改善其履行扶養義務的能力。再者，雖然申請人確實將對出生於新婚姻關係中之子女負新生之扶養義務，但避免婚姻之締結僅使該子女成爲非婚生子女爾，而這即是被上訴人之情況。而由於對婚生或非婚生子女所負之扶養義務皆同，因此避免婚姻締結之總結果僅是使該子成爲非婚生子女。綜上，是系爭威斯康辛州法第 245 條第 10 項第 1、4、5 款無法爲上訴人主張之立法理由所證立，本院維持地區法院之判決。

首席大法官 Burger 之協同意見書

本席同意判決結果，但針對判決理由書中所提及之 *Califano v. Jobst,* 434 U.S. 47 案部分則有不同

之意見。本席認爲該案件中之社會安全法並未如本案般嘗試妨害如婚姻決定般重要之個人自由，而至多僅對該決定有非直接之影響。

大法官 Stewart 之協同意見書

本席認爲法院判決似乎誤解平等保護條款之意義。平等保護條款並非關於實質的權利或自由，而是關於令人不快的歧視性分類，而其典型乃依種族所爲之分類。

而本案中之問題並不是歧視性分類，而是對憲法保障之自由權爲未經授權之侵犯。而本人認爲系爭法規所以不合憲，乃因其已逾越吾人允許州法對婚姻所爲限制之範圍，並且侵害受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保障之自由權故。

I

本席並不同意法院之意見，認爲存在有憲法意義上之結婚權。此一權利，更精確言，此一特權，於我國聯邦體系下乃受州法所定義且限制者。州法規定不僅明顯妨害進入婚姻關係之選擇，更於許多情情況下更完全禁止之，例如禁婚親、最低結婚年齡、性病檢測或重婚禁止等規定。但對人類親密關係所爲之規定當有其憲法上界限。

憲法並未指明結婚自由權，但吾人對於受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自由權業有共識並不限於權利法案中所明示者。而法院之判決已清楚表明，婚姻與家庭生活中之個人選擇自由乃受保護之自由之一。

明顯地，系爭威斯康辛法已直接限制此一自由，因此本案之問題即在於支持此一限制之州利益是否優越於憲法之實質保護。

倘法律規定非繳清交通罰款者不得結婚，則其違憲性即爲明顯。蓋其目的雖正當，但手段不當且與目的欠缺關聯。但由於本案中之威斯康辛州法對自由所爲之限制，乃對於僅適用於那些過去曾濫用其同一自由者，故系爭法是否違憲並非十分明顯。

倘認爲系爭法之目的在於作爲扶養費之收費機制，則系爭法律藉其效果所顯示之立法判斷，乃於申請人履行過去之扶養義務前，不應被允許發生新的義務。雖然此一對於將來婚姻經濟狀態的家長式顧慮，得作爲一州之正當利益，但這並不代表全面剝奪合法婚姻帶來利益的規定可以因而被正當化。

過去法院於許多情況下之判決皆已表明，無法支付州所要求之金錢無法證立對於受憲法保護權利之完全剝奪。此一原則亦應適用於本案，然系爭法律並未考量到那

些貧困者—無法履行支付義務及避免其子女受州監管者，即無法取得婚姻許可。雖然吾人可假設州就收取拖欠之扶養費與減少其社會福負擔有正當利益；而於將系爭州法適用於有能力卻選擇不履行扶養義務者言，系爭法較其他手段確實更能促進其立法目的，但就確實無法滿足法規要求之財務負擔者言，拒絕發給其婚姻許可實乃以其能力所無法及爲由，對其施以懲罰。就此而言，此一手段是荒謬的。

倘認系爭州法乃一確保將來婚姻財務狀況健全之手段，則系爭法所反應之立法判斷則爲：那些無法履行扶養義務並確保其子女將來不致受州監管者，於未來亦較可能遇到相同問題。州法雖可就將來婚姻之財務健全爲考量，但無論如何不能告訴人民，因爲你們太窮或是比較可能維持其過去對財務上不負責任的態度，所以你們不可以結婚。此對受憲法保護之自由權的侵害過大，且其立法預設錯誤的可能性亦太高。如此之立法判斷極度偏離我們的傳統以及對公平享有之共同概念，對於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正當法律程序構成極大侵害。

II

本案中所涉及者僅爲正當法律程序爾。雖法院表示其必須檢驗法規分類之基礎，比較法規對不同團體之待遇，但事實上卻仍對州可加以立法的事項建立實質限制。因此法院之判決其效果並非要求州應對目前分類界限爲更細緻之規定，亦非要求對類似者應提供類似之待遇，而是認爲威斯康辛州不得藉其對婚姻之控制達到其立法目的，而此一對政府基本權利之限制即爲正當程序之核心。

吾人可以理解法院不願仰賴於實質正當程序的態度。但以平等原則之名擁抱實質正當程序，僅會造成困惑與混亂。「法院躲在標語與響亮之名詞後，偏離司法審查之適當之考量焦點—受影響之個人利益本質、受影響之程度、立法手段與目的間連結之合理性、其他可達成相同目的之手段是否存在，以及我們對這個狀態所反應出來立法者對目的是否能正當地支持所選擇手段的信心」。

大法官 Powell 之協同意見書

本席所以撰寫此協同意見書乃因認爲多數意見之論理方式對於此一傳統上受州法普遍管制之領域造成過寬之震盪。明顯地，法院認爲所有會對結婚決定造成直接與實質妨害之州法，均須接受嚴

格審查、或須有迫切的州利益。因此吾人可以推知，凡不會明顯地妨害進入婚姻關係決定之合理法規，即可以被合法地制定。但法院並未提出任何原則化之區分方式來區分這兩種法規，而由於各州相關法律之規定內容，往往係結離婚之前提或障礙要件，因此其影響結婚或離婚決定之程度將無法作爲立法準則或司法審查之基礎。

I

過去法院於許多情況下皆已認知，婚姻關係對於維繫組織化社會所不可或缺之價值的重要性。「本院早已確認，婚姻或家庭生活中之個人選擇自由權乃受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護的自由之一。」我們的判決指出，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對個人隱私或自治提供，使其不受未經證立之政府侵害的保護，可外延至與婚姻有關之活動。雖然此部分隱私權之外部界限尚未被法院明顯形成，然吾人仍可清楚確知與婚姻相關之決定屬一不受未正當化之政府侵害的個人決定。

因此吾人可謂有一婚姻與家庭隱私權存在，其並對政府管制權利設下實質界限。但法院並未認爲，凡碰觸婚姻之管制即涉及基本權，且須啓動最嚴格之司法審查。

多數意見中舉出之最主要判例爲 *Loving v. Virginia*, 388 U.S. 1(1967)。該案中雖提及結婚自由，但其判決之關注焦點乃在種族混婚法案之合憲性。其所涉及者，乃以完全無法被接受之分類基礎—亦即種族，來否定基本權利，已完全顛覆作爲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核心之平等原則，而並未提及對個人離婚或結婚等基本自由所爲限制之審查程度，或政府之正當化程度應爲何之問題。

因此本席認爲，本案之分析須自體認家庭關係自古來即爲一，幾乎受州所獨占管轄之領域開始。在 1877 年之 Pennoyer v. Neff, *95 U.S. 714(1878)*案中，法院已表明，州對婚姻關係發生、解消原因之描述，有絕對之權限；對於確保其家庭關係之法規可反應人民普遍持有之價值觀，具有不可否認之利益。

而婚姻總是在立法之控制下。例如對於結婚最低年齡要式性或婚姻要件、因婚姻產生之權利義務、對財產權產生之影響，以及婚姻解消理由等皆是。而州法亦包括了對亂倫、重婚、同性戀之禁止，以及許多結婚之前提要件，例如血液檢驗。類似的，證明一方過失傳統上亦爲法律就婚姻解消所規定之前提要件。而就國家過去對婚姻

與離婚所施管制傾向加以嚴格審查，要求須具有迫切之州利益，將使此一管制架構之合憲性產生問題。

II

國家對家庭關係之限制並非毫無憲法界限。依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當國家以與人民深信之傳統相反之方式侵犯有關家庭生活之選擇時，須證明法規之正當性。而當法律規定使眞正貧窮者無法使用程序時，正當法律程序亦限制州管制特定人類關係之獨占程度。此外，依平等保護原則，國家（the State）選擇之手段與其目的須有合宜與實質之（fair and substantial）關聯。

而本案中系爭法所採取之手段無法通過上述種種標準。上訴人指出其法規目的爲：1 諮詢功能；2 提供履行未支付之扶養義務的誘因；3 避免發生新的義務。因法院意見書已詳細指出第一項目的與手段間乃如何欠缺關聯性，此處即無再次說明之必要。

至於第二項收費機制，本人並不同意法院之意見，認爲因州尚有其他收取扶養費之方法，是即使州法絕對不能以滿足既有扶養義務作爲結婚之要件。對有能力支付，只想迴避其道德與法律上義務者言，憲法並不會限制此一額外之收費機制。但此一機制本質上之缺陷乃存在於未對於那些無法盡扶養義務者提供他法。且系爭案件中所顯示之獨占乃全面性的，因威斯康辛州法並不認可未滿足其規定之外國婚姻。

至就上訴人之第三項主張，本人之質疑乃就立法目的言，其乃包含不足的。因可能發生新財務義務之情況所在多有，因此系爭法所爲分類並未與其立法目的有合宜與實質之關聯。

系爭法要求婚姻申請者除須提出履行扶養義務之證明外，亦須證明其子女目前不是，將來亦不致成爲社會福利之負擔，因此系爭法不僅未對因經濟狀態之差異所造成之結果爲減輕，甚至告訴眞正之貧窮者，無論其是否履行扶養義務，只要其子女有成爲社會負擔之危險，他們就不能結婚。此種試圖降低社會福利負擔之手段乃前所未見，而由於該州並未對此一毫無前例、僅因個人之經濟狀態即封鎖其結婚可能之法規爲足夠之正當化，本人協同法院之判決結果。

大法官 Stevens 之協同意見書.

由於法院意見書中某些部分與 *Califano v. Jobst,* 434 U.S. 47

(1977)間存在之緊張關係，本人認爲有必要對系爭法所以違反平等保護原則之理由爲進一步探索。

當國家給付利益或課以義務時，具有可對已未婚者加以區別對待之實質理由。此乃於稅法、徵兵法(Selective Service rules)與社會安全規範等中被廣泛接受之特性。如同 Jobst 案中所表示者，因已未婚族群間確有相關差異，故即使此類規定明顯干涉人們進入婚姻狀態之決定，仍非使任何反映立法判斷之規定無效的充分原因。

而基於婚姻狀態所爲之分類，與決定何人得進入婚姻狀態之分類間有本質上之差異。獨自爲婚姻決定之利益足使憲法對其爲特別之保護，但該利益並未使其不受合憲之公平規定限制。因此禁止未成年者、禁婚親或染有性病者結婚即使已直接、實質影響個人之結婚權，仍不會被質疑。但系爭法則不同。

於系爭法下，個人經濟狀態將決定其是否得合法締結婚姻。而依系爭法，即使已履行其扶養義務，貧窮者仍不能結婚而富有者可。此一法規歧視不僅前所未有，且亦與吾人關於正義之傳統不符。

系爭者所反映之立法判斷，乃無法扶養其子女者不應被允許結婚與繼續生育子女。無論如何，其推理皆無法正當化系爭法對貧窮者之蓄意歧視。

系爭法亦使經濟狀況不佳，但可能因其將來配偶而提高其經濟狀況者無法結婚。吾人可以推知系爭法乃假設：只有父親受本法規範；而他們將不會與有工作之婦女結婚。第一項立法假設忽視父親亦可能係被判有監護權者，而第二項假設則與現今之工作狀態不符。其拒絕給予申請者一機會證明其所欲締結之婚姻將會舒緩而非加劇其經濟負擔，就此言，系爭法不但係建立在不可靠之前提上，且更反向打擊其所欲達成之目標。

而這些有問題之假設亦解釋了何以該法於其他方面展現之蒙昧。系爭法使享有監護權者不須經許可即可結婚，但因新生兒而加深經濟負擔之危險，對於持有監護權與否之父母並無差異；並且，由於法院不會對那些最爲貧窮之父母發出負擔扶養義務之命令，因此該法事實上無法規範到那些最不可能支持另一家庭者之婚姻。

假如州試圖藉系爭法阻止已無法扶養其子女者結婚，則其已明顯忽視了最明顯之目標。綜言之，由於避免未成年子女受公共監管，成爲社會福利負擔之條款適用於前述情況下時，除了不是毫無作用即是乖離常情外，即使我們假設

有時可以經濟之理由否定結婚權，但這樣以貧富爲粗陋、蓄意的立法歧視，於許多方面皆不合理，是其仍無法通過平等保護原則下之嚴格審查。

大法官 Rehnquist 之不同意見書

本席乃依傳統之有效性推定來觀察系爭法案所涉及之立法判斷。本席以爲，就平等保護原則，法規僅須通過合理基礎檢驗；而就正當法律程序，只須顯示手段其與憲法允許之目標間有合理關聯。依此，則儘管於協同意見書中所想像之極端情況中，可能發生不經精確之狀況，系爭法乃被認爲係州藉法律之適用來確保未成年者之扶養，乃一就家庭生活管制權受允許之行使。

這種傳統之審查原則已適用於過去之 *Califano v. Jobst,* 434 U.S. 479(1977)案中，儘管有主張認爲，該法對結婚權行使造成負擔。自 Jobst 案中吾人可知，審查立法分類時，須以受影響族群之典型狀況爲對象，而非專注於特選的、非典型者，而 Jobst 案之分析亦可適用於本案中。

本案與 Jobst 案同，亦乃於「建立複雜之社會福利系統之過程中，採用此一於處理親密家庭生活言具有必要性之規定。」而由於福利資源之有限性，是州對於確保父母盡其所能扶養其子女有強烈之利益。惟系爭法對受影響者所加諸之負擔，其增加之程度尚未使之足以偏離 Jobst 案，是本案亦不能因而出現與 Jobst 案不同之結果。蓋在某些狀況中，系爭法使申請者因財務原因無法合法締結婚姻；而在數量相類似之極端案例中，Jobst 案中之社會安全法案亦事實上使原欲締結之婚姻因相同之理由而無法達成，是本人無法認爲，兩案中存有之些微差異可正當化本案使用更嚴格之審查標準。簡言之，系爭法案雖不完美，仍已滿足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要求。

依本案中兩位大法官協同意見之觀點，其似同意，除適用於眞正貧困者之情形外，系爭法適用於那些蓄意不履行其扶養義務者並不違憲，仍可禁止其締結婚姻。然即使我同意一立基於大部分合法之假設下的法律，得因某些特殊、非典型之狀況而崩毀其合憲性，我仍不贊同本案之判決。蓋在本案中並無證據顯示被上訴人確屬貧困，因而使威斯康辛州不得以此爲由拒絕批准其婚姻。

雖然根據長久來已確立之規則，上訴人僅可於法規適用於其自身時主張法規無效，而不能以適用於他人之情況來主張法規無效。而

法院就此原則亦發展有一些根據增修條文第一條之有限度的例外，允許對明顯地過於廣泛會對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造成寒蟬效應的行爲加以宣告無效。但此處並無被上訴人可得主張者。

被上訴人用以爭執系爭法適用於其自身時之合憲性的主張，須以其於地區法院中提出之事實爲根據，進而爲討論。而州並未要求證據，即承認自 1972 年 5 月至 1974 年 8 月間被上訴乃無業、貧窮，而無法支付任何扶養義務。但事實上在紀錄中並無表明：被上訴人於 1974 年 9 月 30 日其婚姻申請被拒時；或其於 1974 年 12 月 24 日提出其控訴時；或地區法院於 1976 年 8 月 30 日下判決時，乃貧窮的。就吾人所知之被上訴人最新財務狀況，乃其律師承認被上訴人已於伊利諾市結婚一事，而這明顯表示，被上訴人已知如何爲那些他認爲夠重要的目的而獲取資金。直至目前，吾人仍不能確定被上訴人是否無法清償積欠之扶養費用，並且於將來提供足夠之資金，使其子女不致須受社會福利照管。因此即使根據協同意見書中之意見，被上訴人仍未證明系爭法適用於其自身時乃違憲。

再者，由於本人之結論乃認爲即使其可能適用於眞正貧困者，系爭法仍有效，故本席不須決定於被上訴人無法證明其貧困時，是否將排除法院對於其所欲代表之集團發給禁制令的可能。過去法院判決指出於集團訴訟之代表其主張無實際意義時，法院無駁回訴訟之義務，尚可考慮諸多情況以決定是否續行訴訟。但於集團訴訟之代表自始欠缺一有根據之主張時，是否亦適用前開原則，則尚無判決，因此本席於此即將此一問題留待將來解決。

本席認應撤銷地區法院之判決。

13. Turner v. Safley

482 U.S. 78（1987）

劉靜怡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當管制監獄受刑人的系爭規定侵犯受刑人的基本權利，而該等規定又不涉及非受刑人的權利時，該管制並不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同時，倘若系爭管制措施和正當的犯罪矯治利益具有合理連結關係時，也應該被認定為有效。

（The lower courts erred in ruling that Procunier v. Martinez （416 U.S. 396）, and its progeny require the application of a strict scrutiny standard of review for resolving respondents' constitutional complaints. Rather, those cases indicate that a lesser standard is appropriate whereby inquiry is made into whether a prison regulation that impinges on inmates' constitutional rights is "reasonably related" to legitimate penological interests. ）

2. 從規定的表面意義看來，密蘇里州禁止被拘禁在不同監獄的受刑人互相通信的規定，就憲法層次而言，並未侵犯受刑人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因為該等規定所追求的管制目的，和職司矯正任務的監獄所追求的安全目標，具有合理的連結關係。

（The Missouri inmate correspondence regulation is, on the record here, reasonable and facially valid. The regulation is 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of prison officials, who testified that mail between prisons can be used to communicate escape plans, to arrange violent acts, and to foster prison gang activity. The regulation is content neutral and does not unconstitutionally abridge the First Amendment rights of prison inmates.）

3. 就禁止受刑人互相締結婚姻關係此一管制措施而言，由於其和正當的犯罪矯治目標之間並無合理連結關係，所以其就字面意義而言，已經違背了受刑人結婚的憲法基本權利。

（Prisoners have a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 to marry under Zablocki v. Redhail（ 434 U. S. 374）. Although such a marriage is subject to substantial restrictions as a result of incarceration, sufficient important attributes of marriage remain to form a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elationship. The regulation is facially invalid under the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test. Although prison officials may regulate the time and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a marriage takes place, and may require prior approval by the warden, the almost complete ban on marriages here is not, on the record, reasonably related to legitimate penological objectives.）

關 鍵 詞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mates（受刑人互相通信）；inmate marriage（受刑人結婚）；fundamental right to marry（結婚的基本權利）；reasonable-relationship standard（合理關係標準）；freedom of expression（言論自由）；content neutral（內容中立）；logical connection（邏輯關連性）。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O’Connor 主筆撰寫）

事 實

被上訴人向美國西密蘇里地方法院提出一團體訴訟，挑戰密蘇里州犯罪矯正局（Missouri Division of Corrections）所發佈在密蘇里州監獄實施的兩個行政命令。這兩個行政命令的內容如下：（一）除了少數例外情況之外，禁止被拘禁在

不同的密蘇里州監獄的受刑人互通書信；（二）禁止受刑人互相締結婚姻關係。地方法院的判決針對兩個行政命令均適用嚴格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並且認爲基於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言論自由的規定，上述禁止通信的規定，在規範對象範圍上過於廣泛，而且在適用上述行政命令時，是以恣意獨斷而反覆無常的方式爲之，因此，判決上述禁止受刑人結婚的規定，違憲侵犯監獄受刑人結婚的基本權利。在上訴之後，聯邦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贊同該下級法院的見解，認爲應該適用嚴格審查標準，並且宣告上述禁止通信和結婚規定無效，同時認定下級法院對系爭兩個行政命令的事實認定，並無明顯錯誤之處。在同意該判決移審後所做出的判決中，本院部分維持，部分發回上訴法院。

被上訴人向美國西密蘇里地方法院所提團體訴訟，挑戰密蘇里州犯罪矯正局（Missouri Division of Corrections）所發佈的兩個行政命令。這兩個行政命令適用於密蘇里州犯罪矯正局管轄下的所有監獄，但此一訴訟集中於位在密蘇里州 Cedar 市的 Renz 矯正機構（Renz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簡稱 Renz）的作法。Renz 所收容的受刑人，同時包括男性受刑人和女性受刑人在內，並且適用各種不同等級的安全措施，Renz 內絕大部分的女性受刑人，是被歸類爲適用中間等級或者最高等級的安全措施，而其中絕大部分的男性受刑人，則是被歸類爲最低安全等級的犯罪人。同時，Renz 有時候也收容從密蘇里州的其他監獄移送過來的受刑人，提供保護性的監護措施。Renz 原先建造時，乃是設計成最低安全等級的監獄農場，而其目前依然保有沒有監看塔或圍牆的最低安全等級設施。

在本案系爭的兩個行政命令中，主要內容如下：第一個行政命令是規定除了少數例外情況之外，禁止被拘禁在不同的密蘇里州監獄的受刑人互通書信，當受刑人有最近親屬（immediate family members）同時被監禁在密蘇里州的其他監獄時，或者被監禁在不同監獄的受刑人之間的通訊是討論法律相關事務（concerning legal matters）時，則例外准許其通訊。然而，受刑人其他類型的通訊，則是只有在每個受刑人的分類和矯治團隊（classification/treatment team）都認爲其乃是基於通訊所涉雙方的最佳利益時，才得以准許。根據本案審判紀錄顯示，上述團隊通常是基於其對受刑人檔案中的矯治進展報告、違規行爲有無之表現以及心理分析報告的熟悉程

度，決定是否准許上述例外通訊行爲，而非基於對受刑人的個別通訊信件內容，決定是否准許其通訊。

至於禁止受刑人之間締結婚姻關係的管制措施，則是規定必須經過受刑人監獄主管的同意，方得爲之，而監獄主管在決定是否准許受刑人結婚時，則是必須基於相當重要之理由（compelling reasons），才可以做成准許受刑人互相結婚的決定。至於何謂相當重要，則未予以定義，根據監獄主管作證的證詞，受刑人懷孕或者未婚子女出生的事實，都可以構成相當重要的理由。在此一管制措施頒佈之前，相關規定並未要求密蘇里矯正局官員必須協助想要結婚的受刑人達成目標，不過同時也並未授權監獄主管禁止受刑人結婚。

判　決

聯邦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判決部分維持，部分發回。

理　由

本院認爲，當管制監獄受刑人的系爭規定侵犯受刑人的基本權利，而該等規定又不涉及非受刑人的權利時，該管制並不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同時，倘若系爭管制措施和正當的犯罪矯治利益具有合理連結關係時，也應該被認定爲有效。其次，從該規定的表面意義看來，密蘇里州上述禁止被拘禁在不同監獄的受刑人互相通信的規定，就憲法層次而言，並未侵犯受刑人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因爲該等規定所追求的管制目的，和職司矯正任務的監獄所追求的安全目標，具有合理的連結關係。最後，就禁止受刑人互相締結婚姻關係此一管制措施而言，由於其和正當的犯罪矯治目標之間並無合理連結關係，所以其就字面意義而言，已經違背了受刑人結婚的憲法基本權利。

本案爭點在於決定密蘇里州禁止被拘禁在不同的密蘇理州監獄的受刑人互通書信的行政命令，以及禁止受刑人互相締結婚姻關係的行政命令，是否合憲。聯邦第八巡迴上訴法院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審查上述行政命令，本院則是認爲：針對上述行政命令，應該適用比嚴格審查標準稍加寬鬆的審查標準。基於此一標準，密蘇里州上述禁止被拘禁在不同監獄的受刑人互相通信的規定合憲，至於禁止受刑人互相締結婚姻關係此一管制措施，則屬違憲。

本案從 Procunier v. Martinez, 416 U.S. 396 （1974）此一判決所

建立的嚴格審查標準談起。Martinez 案所確立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肯認法院必須正視監獄受刑人基於憲法所享有的基本權利，監獄所築起的圍牆，並不是隔開監獄受刑人和憲法的圍牆；所以，當監獄管制措施或作爲侵犯憲法基本權利的保障時，法院應該負起保護憲法基本權利的責任。

不過，Martinez 案所確立的第二個原則，則是主張「法院並不適合去處理越來越急迫的監獄管理和改革的問題」。正如做成 Martinez 案判決的法院所指出的，「美國的監獄問題是非常複雜而難以處理的問題，而且並不容易透過司法判決的方式解決」。管理監獄是個非常困難的任務，需要專業、規畫和資源的投入，而以上所謂的專業、規劃和資源投入，都應該是屬於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的領域。監獄的管理，已經被預設成是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的責任，而且，基於權力分立的考量，也隱含著在這個領域內，司法權應該自制的意義。當系爭爭議是涉及一州的刑事系統時，聯邦法院應該格外有理由去尊重適當的監獄主管機關所做的決定。

本案兩個下級法院判決都認爲，根據 Procunier v, Martinez 案和其後續的相關判決所確立的原則，對於處理被上訴人所提出的憲法挑戰，應該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審查系爭管制措施，本院認爲兩個下級法院此一見解都是錯誤的。本院在上述判決先例中所建立的，其實是一個比嚴格審查標準來得寬鬆的審查標準。

本院職責在於針對監獄受刑人的憲法權利，形成審查標準，而此一審查標準，應該能夠呼應司法在受刑人憲法權利事項上的司法自制政策要求。在 Pell v. Procunier, 417 U.S. 817 （1974）、Jones v. North Carolina Prisoners' Union, 433 U.S. 119 （1977）、Bell v. Wolfish, 441 U.S. 520 （1979）等幾個判決先例裡，沒有任何一個判決適用比較嚴格的審查標準，相對地，既然 Pell 案、Jones 案和 Bell 案並未解決 Martinez 案所提出的問題，那麼本院就目前這個案件對此問題做成的決定是：當一個監獄管制措施侵犯了受刑人的憲法基本權利時，只要該管制措施與正當的監獄刑罰矯正利益之間具有「合理相關」（reasonably related）的關係，就可以認定爲合憲。如果「必須對制度運作做出困難決定的，是監獄管理者而非法院」的話，那麼，這個合理相關性的標準，就是適當的審查標準。倘若針對監獄主管官員日常所做的決定，都適用少有彈性

的嚴格審查標準來進行分析審查，那麼將會嚴重動搖監獄主管官員在監獄管理上規劃安全問題和採用具有創意的解決方案的能力。倘若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將會扭曲監獄管理的此一決策程序，因爲，究其實際，每個監獄管理決策都極有可能被法院認定爲其有限制嚴格程度更低的限制方法可供採用。如此一來，法院將變成監獄管理問題的主要決策者，而造成「在不必要的情況下，讓聯邦法院在監獄管理事務上涉入太深」的結果，參見 Procunier v. Martinez, 416 U.S., at 407。

進一步言：正如其先前在 Pell 案、Bell 案和 Jones 案等幾個判決中所指出者，在判斷是否具有合理關連時，所需考量的因素有以下幾項：首先，法院會審視系爭行政命令或管制措施，和用來正當化該行政命令的或管制措施的政府利益之間，是否具有「有效的且合理的關連」（valid, rational connection）。所以，系爭管制措施與管制者所主張的管制目的兩者之間的邏輯關連，不能過於遙遠，遙遠到使系爭管制措施淪於獨斷或不合理的程度。再者，政府所追求的管制目標，必須是正當且中立的管制目標。在探究限制受刑人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基本權利的監獄管制措施，是否屬於內容中立的管制措施時，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用來考量管制監獄受刑人的措施是否具有合理關連的第二項因素是，在系爭管制措施之外，是否仍然有其他方法或管道（other venues），可以讓監獄受刑人行使其憲法權利。而在決定是否有其他的方法或管道可以扮演替代性方法或管道的角色時，司法權在這方面應該自覺到司法機關必須尊重犯罪矯正機關官員專業。

第三項應該予以考量的因素則是，受刑人所主張的憲法基本權利遭到限制之後，對於監獄管理者、受刑人的自由以及有限監獄資源的分配等層面，各自會造成何種影響。由於矯正犯罪者的監獄必然是個比較封閉的環境，對於監獄內其他受刑人的自由，以及受刑人如何使用監獄有限的資源，影響應該不大，當受刑人憲法基本權利受限制對於其他受刑人或監獄管理者的自由造成具有影響的漣漪效應時，法院更是應該尊重具有犯罪矯正專業的監獄管理者基於充分資訊和知識所做成的認定結果。

最後，欠缺替代性的方法或管道此一事實，可以構成系爭管制措施不具有合理關連的證據。基於同樣的道理，如果有明顯而輕易的替代管道或方法存在，那麼便不只是

具有合理關連而已，而是系爭管制措施對於對監禁受刑人所關切的考量，做出了「過度回應」（exaggerated response）。這並不是「限制最少的替代管道」（least restrictive alternative）檢驗標準：監獄管理者不必一一舉出可以想像得到的限制受刑人基本權利的管道或方法，並且一一針對這些替代管道或方法，證明其不適合之處並予以排除，不過，倘若主張其憲法基本權利遭到限制的受刑人，指出有既存的替代方法或管道，可以用更低的成本，達成和限制受刑人基本權利一樣能夠達成該監禁管制措施所追求的利益一樣的目標時，那麼便表示系爭管制措施不符合合理關連的條件。

基於以上分析，本院認爲：從本案審判紀錄中，可以明顯看出密蘇里州禁止監獄受刑人互相通信的規定，其所追求的管制目的，和正當的監獄安全利益之間具有合理關連。而禁止受刑人互相締結婚姻關係此一管制措施，由於其無從滿足合理連結關係此一條件，所以應屬違反受刑人結婚的憲法基本權利。

又根據本案紀錄所呈現的證據，對於密蘇里州監獄受刑人實施的通信管制，是合理有效的管制措施。該管制措施在邏輯上與監獄管理者基於安全考量的正當利益有合理關連，根據監獄管理者作證的證詞，受刑人彼此之間的通信，可能會被用來做爲商議逃獄計畫、安排暴力行爲、或者促進受刑人幫派活動等用途。再者，此一通信管制措施並未剝奪受刑人的所有言論表達基本權利，而只是禁止受刑人與特定的一小群人—其他受刑人—之間進行通訊而已，而且，針對這些受刑人之間的通訊，犯罪矯正主管機關有特別的理由，必須加以關切和管制。換言之，系爭管制受刑人通信的措施之所以合憲，是因爲受刑人之間的通信對於其他受刑人和監獄管理者的自由和安全，均屬影響重大；根據監獄管理者的證詞，受刑人之間互相通訊，會加速受刑人間的非正式組織的發展，而這種非正式組織會影響到監獄的安全。而且，目前並沒有其他明顯的替代方案，可以達成相同的管制目的，美國國內其他運作良善的監獄制度，例如聯邦監獄署（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針對受刑人通信的問題，也做成類似的結論，認爲採取和本案系爭管制措施類似的管制，應該是保護監獄秩序和安全的必要手段。最後，縱使監獄可以針對受刑人間的通信內容進行監控，但是，這種管制方式不但需要花費龐大的人力資源，而

非最低成本，而且會有漏失具有危險性的通訊此一可預見的風險在內。

至於密蘇里州限制受刑人互相締結婚姻關係的管制措施，本院則是認爲其違憲地限制了受刑人受憲法保護的結婚權利。

首先，基於 Zablocki v. Redhail, 434 U.S. 374（1978）和 Loving v. Virginia, 388 U.S. 1 （1967）這兩個判決，足以肯認受刑人具有憲法所保護的結婚基本權利。雖然受刑人的婚姻生活會因爲受監禁於監獄內此一事實而受到實質限制，但是，婚姻的重要價值仍然足以形成憲法所保障的關係。首先，受刑人的婚姻關係，和其他人的婚姻關係一樣，是情感支持和公開承諾的表達方式；其次，許多宗教都承認婚姻具有精神上的重要性。因此，對於一些受刑人及其配偶而言，對於婚姻所做的承諾，或許既是在實踐其宗教信仰，也是在表達其個人情感。再者，由於絕大多數的受刑人最終都會因爲假釋或刑期屆滿而獲得釋放出獄，因此，受刑人在締結婚姻關係時，是抱持著他們最終會圓滿地經營婚姻生活的期待而結婚的。最後，婚姻關係往往是得以申請或接受政府福利補助、取得財產權和其他比較不明顯的利益的先決條件，這些附帶考量，和婚姻關係所涉及的情感和宗教因素一樣，不會因爲受刑人身受監禁的事實，以及追求正當的犯罪矯治目的而受到影響。本院將上述因素放在一起做整體考量之後，認爲即使是在監獄受刑人的情況下上述因素已經足以構成憲法所保障的婚姻關係。

密蘇里州禁止受刑人之間締結婚姻關係的管制措施，規定必須經過受刑人監獄主管的同意，方得爲之，而監獄主管在決定是否准許受刑人結婚時，則是必須基於相當重要之理由，才可以做成准許受刑人互相結婚的決定。至於何謂相當重要，則未予以定義，根據監獄主管作證的證詞，受刑人懷孕或者未婚子女出生的事實，都可以構成相當重要的理由。本院認爲：以合理關連標準針對此一管制措施進行審查，可以得出該管制措施違憲的結論。雖然監獄管理者可以控制受刑人結婚的時間和地點，而且需要得到監獄主管的同意，但是，本案系爭管制措施對於受刑人締結婚姻關係的全面禁止，和正當的監禁矯治目標之間，並無合理關連可言。或有認爲系爭管制措施可以避免受刑人之間的「三角戀愛」（love triangles）關係，而三角戀愛關係會導至破壞受刑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所以系爭管制措施可以算是基

於安全的考量，才制定這種管制措施。

但是，無論是基於犯罪矯正的理由，或者是基於安全的考量，這種說法都是說不通的；首先，就安全考量而言，密蘇里州希望透過禁止受刑人結婚的方式，達到確保監獄安全的管制目的，是過度反應的結果，因爲很明顯地有一個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亦即系爭管制措施可以規定，原則上監獄主管必須同意受刑人結婚，除非其發現該婚姻關係對於安全、秩序或公共安全會造成威脅，才可以不批准此一締結婚姻關係的要求，這種替代方案，對於犯罪受刑人的基本權利所造成的限制較小。其次，從本案的紀錄內容來看，受刑人之間是否會出現三角戀愛的關係，跟結婚與否並沒有關係。聯邦最高法院指出：系爭管制措施是過於廣泛的禁止措施，有其不必要之處，尤其當受刑人的結婚對象是一般公民時，這樣的私人決定並不會影響到其他受刑人和監獄管理人員的安全。此外，根據監獄管理者的證詞，男性受刑人結婚一般來說比較不會對他們造成問題，而他們也不會反對受刑人跟一般素行良好的公民締結婚姻關係。然而，系爭管制措施，相對於所謂重建女性受刑人的自立自主地位，並沒有合理關連可言。因此，禁止與犯罪受刑人結婚的系爭管制措施，欠缺急迫重大的管制利益，其管制範圍超過了必要的範圍。

大法官 Stevens 主筆，大法官 Brennan、Marshall 和 Blackum 連署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針對追求安全而限制基本人權的監獄管制措施，探究其是否爲「不必要地廣泛」（needlessly broad），還是「與正當的監獄管理利益具有合理連結的關係」，而且不可以是對上述監獄管理考量做「過度的回應」，本席認爲其實這兩個標準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可言。但是，如果在適用這個審查標準時，只要該管制措施和任何謹慎的監獄主管所知的正當監獄管理考量兩者之間，具有「邏輯關連性」（logical connection），而不需要其他實質內涵的話，那麼這個審查標準其實是毫無意義的審查標準。在採用這樣的審查標準的前提下，倘若監獄主管機關可以找到一個看似有理的監獄保安考量，而尊重行政機關專業的事實審法院，也在監獄主管機關所提出的該等考量和被質疑的管制措施之間，找到邏輯上的關連性的話，那麼將極可能會導致完全漠視受刑人憲法基本權利的結果。例如，使用鞭條抽

打受刑人和維持監獄的秩序之間，的確也有邏輯上的關連性可言；甚至，完全禁止受刑人通信，在邏輯上也可以找出促進監獄安全的管制利益，因爲，不只是監獄間受刑人的通信，監獄外的人也可能會透過通信計畫劫囚或幫助逃獄。所以，本席不同意多數意見此一部分的看法。至於本席加入多數判決意見宣告系爭婚姻管制違憲的部分，是因爲多數意見在宣判婚姻管制違憲的理由上，並沒有否認其採用的是比上述審查通信管制措施的標準更爲嚴格的標準。

14. The Florida Star v. B.J.F.

491 U.S. 524（1989）

潘維大、程法彰 節譯

判 決 要 旨

佛羅里達州法第 794.03 條規定，任何媒體若將受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姓名公布，則應為其行為負責。佛羅里達州 Duval 郡的警察部門準備了一件性侵害的報告，該報告有受害者的全名，而且該份報告被放在警局的新聞室內。一個週報的實習記者，複印了該案留在新聞室的報告，並且加以刊載。該案依佛州法律而對報紙加以處罰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Florida statute §749.03 （1987） makes it unlawful to publish the name of the victim of a sexual offense in any instru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e Duval County, Florida sheriff's department prepared a report on a sexual assault. The report, which identified the victim by her full name, was placed in the department's pressroom. A reporter-trainee for a weekly newspaper copied the police report verbatim, including the victim's full name, and the newspaper published the information. The imposition of civil damages on the newspaper, pursuant to the Florida statute, violates the First Amendment.）

A.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合法獲得真實內容報導之新聞自由法益與各種法律與傳統習慣法中所保障個人隱私權之法益衝突是近年來的客題。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right which the First Amendment accords to a free press and the protection which various statutes and common-law doctrines accord to personal privacy against the publication of lawfully-obtained truthful information is a subject in

recent years.）

B. 警局違反法律要求不得公布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姓名的行為，不會因此讓媒體藉此取得資訊變為違法。

（Nor does the fact that the Department apparently fail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not to publish the name of a sexual offense victim make the newspaper's ensuing receipt of this information unlawful.）

C. 下列三方面說明在本案中適用該法是用太過的手段來達成其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隱私權的目的：

(1)取得資訊的情況：政府提供資訊的情況下，應可推論有其他的方法可達到州欲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隱私權的目的，而處罰媒體是最不好的方式，此種法律之規定將導致寒蟬效應的發生。

(2)對於被告是否有過失的問題：即規定只要報導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姓名就當然有過失，而不論其是否已為大眾所知，以當然過失（Per Se Negligent）作為標準是顯不恰當。

(3)該法律之實際效益：佛州該法律是否真能實現州的重要利益，令人十分懷疑。首先，法條中對於大眾傳播工具（Instru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的定義不明。其次，佛州法第 794.03 條僅處罰媒體不及於其他散播者（如具有惡意之個人），然欲達到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隱私權之目的，就應為一公平性之對待，對其他散播者亦應加以處罰。

（For three independent reasons, imposing liability for publica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ase is too precipitous a means of advancing these interests for Florida to take this step.

(1)Where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information to the media, it is most appropriate to assume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far more means of guarding against dissemination of the name of a sexual offense victim than the step of punishing truthful speech. If liability were to be imposed, self-censorship will result.

(2)Imposing of liability for publication of the name of a sexual offense

victim is the broad sweep of the negligence per se standar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identity of the victim is already known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

(3)The law raises serious doubt whether the significant interests is serving with the statute. The term, instru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is not defined in the statute. Section 794.03 does not prohibit the spread by other means（malicious individual）. It should apply its prohibition evenhandedly to both the smalltime disseminator and the media.）

D.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合法獲得之真實言論自由並非完全不可處罰，假使有更高的州利益存在，同時對言論自由以最小的限制來達成目的時，這種處罰是合憲的。在本案中雖然州有保護性侵害受害人姓名，或鼓勵受害人報案的州法益，然佛州該項法律並不能達其立法目的，故州法違憲而無效。

（Where a newspaper publishes truthful information which it has lawfully obtained, punishment may be imposed, only when narrowly tailored to a state interest of the highest order. Imposing liabilit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as not a narrowly tailored means of furthering state interests in maintaining the privacy and safety of sexual assault victim or encouraging such victims to report the offenses.）

關 鍵 詞

First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sexual assault victim（性侵害受害者）； privacy（隱私權）；negligence per se（當然過失）；narrowly tailored means（較低程度限制）；newspaper（報紙）。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Marshall 主筆撰寫）

事　實

佛羅里達州法第 794.03 條規定，任何媒體若將受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姓名公布，則應爲其行爲負民事責任。本案被告（佛羅里達星報）有報導當地正在調查中犯罪案件的短文專區，稱爲「警察報告」，該報固定派有記者在警察局的新聞室裡收集資料。本案原告（B.J.F.）遭到搶劫及性侵害後向警方報案並製作筆錄。在該筆錄中，記錄原告的全名，警方並將該筆錄放置於新聞室中，而警局本身並無嚴格控管進出人員。一名被告實習記者將筆錄抄錄後，在星報上的一個專欄中做一段關於本案的描述，其中包含該案受害者的全名。原告經由友人得知其姓名被刊出，同時其母親接到數通聲稱要再強姦她一次的電話，讓她承受莫大的精神壓力，要搬家、換電話號碼、申請警方保護以及心理諮詢。原告在佛羅里達州法院提起訴訟認爲被告報社及警察局過失違反佛羅里達州法令之規定。

1. 原告對警局之訴訟在審判前以二仟五佰元達成和解，而星報則主張該法案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的新聞自由，故法院應駁回原告之訴（Motion to Dismiss），但事實審法院拒絕之。星報在結案陳述時再提出直接判決（Direct Verdict）之主張，事實審法院亦拒絕之。法院認爲佛羅里達州法第 794.03 條是一個合憲的法律，其在個人隱私權與新聞自由的二個法益間取得一個非常恰當的平衡點，因爲其對新聞自由的限制僅針對某些敏感的犯罪案件。另一方面，事實審法院在被告結案陳述後同意原告（B.J.F.）要求，對被告行爲有過失之部分作出直接判決，認爲被告之行爲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爲當然過失（Per Se Negligent），但關於因果關係與損害賠償的問題則交由陪審團判斷，法官指示陪審團其不僅可對一般性的損害賠償作決定，亦可在其判斷被告的過失行爲是出於非常重大而幾近於故意的過失時，要求被告負擔懲罰性的損害賠償。陪審團決定給與原告 75000 元補償性的損害賠償與 25000 元懲罰性的損害賠償。法院將原告與警局之和解金在陪審團決定的數額中予以扣除。
2. 上訴審法院由全體法官一致出席確認事實審法院之判決，判決內容僅有三行文字。
3. 州最高法院拒絕審理，即維持原判。被告提出上訴。

判　決

原判決廢棄。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言論自由並非完全不可限制，假使有更高的州利益存在，同時對言論自由以最小的限制來達成目的時，這種限制是合憲的。在本案中雖然州有保護性侵害受害人姓名，藉此鼓勵受害人報案的州法益，然佛州該項法律並不能達其立法目的，故州法違憲而無效。

理　由

1. 本案法院推翻前審判決。法院認爲本案爲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新聞自由法益與傳統習慣法中隱私權之法益衝突。此二種法益之調和已被討論多次，而本案不同之處在於涉及性侵害犯罪案件時，州法可否處罰一個新聞媒體其正確合法報導但侵害個人隱私之行爲。此一問題尚未被詳盡的討論。雖然通常會犧牲隱私權以保障新聞自由，但此非一個通案考量後的結論，只是就個別的事實做單一案件的決定。雙方當事人皆引用聯邦最高法院關於此類型案件在 Cox Broadcasting 案、Oklahoma Publishing 案與 Daily Mail 案所爲之判決，作爲支持其主張之論據。以上案件之結論皆是支持新聞媒體自由的權利高於個人隱私權。
2. 上訴人（被告）主張本案事實與 Cox Broadcasting 案之事實相同。Cox Broadcasting 案涉及法院關於強暴殺人案中受害者姓名的紀錄，此一紀錄是一個公開的文件，新聞媒體將此文件作成新聞內容，而此新聞內容侵害到他人之隱私時，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應受到保障。法院審理的紀錄必須公開的原因，在於其必須讓大眾對其作嚴格的檢驗，以保障判決結果的公平性。被告主張法院應作出與 Cox Broadcasting 案相同的結論，否則將會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護的言論自由造成傷害，同時被告認爲新聞媒體只要是公布事實都不應受到處罰。被上訴人（原告）認爲 Cox Broadcasting 案與本案的事實不一致，其邏輯推理過程顯然對本案而言是不恰當的。因爲 Cox Broadcasting 案中的文件是一個公開性的文件，且其所要保護隱私權的程度與本案所要保護的程度並不能相比較。原告繼而主張如果法院不同意此種主張也應該推翻 Cox Broadcasting 案的判決，以一個絕對的法則

（Categorical Rule）代替之，即認定公開性侵害受害人姓名者，不受憲法的保護。

3. 本案法院認爲處罰被告將受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姓名公布出來之行爲的法律，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但其理由並非上述被告所持的理由。首先，本案與 Cox Broadcasting 案的事實並不相同，在 Cox Broadcasting 案中是媒體引用法院的審理紀錄，在該案中我們給予媒體新聞自由，這代表法院所有行使公權力的行爲都應受到媒體監督，以保障判決的公平性，故與本案之事實在於當事人只有一人而無相對人，且尚未進入司法審判程序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亦不同意被告認爲只要其所報導的內容是眞實的就應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之主張，因爲總有例外的情況，例如軍隊的移防、人數等事之報導，故就此一類型之案件只能作爲個案之認定，且 Cox Broadcasting 案亦拒絕承認只要是眞實的報導即可免除所有刑事與民事責任。我們所面對的是傳統習慣法中隱私權的權利與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新聞自由的權利間之衝突，而州是否有權力立法處罰刊登性侵害被害人正確姓名之新聞媒體，而此新聞媒體其所根據之資料係來自於一個司法單位所作成之公開紀錄，也就是說州是否可以對上述行爲加以處罰而不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我們應該以恰當的方法分析增修條文第一條所要保障的權利範圍，即增修條文第一條是否應有一定的限制。此問題在 Daily Mail 案曾討論過，當一個新聞媒體正確的報導一項消息時，其是否可受到處罰。在 Daily Mail 案中認定如果新聞媒體是合法的取得正確的新聞資訊，而此一資訊爲公眾所關切之事時，州法不應處罰此種行爲，除非有更高的法益存在於州法益之上。

4. 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之權利範圍如此寬廣的原因，除了基於憲法應保障將眞實的資訊散播出去，讓人民得以知道的公眾利益之外，從 Daily Mail 案可知尚有下列三項原因：(1) Daily Mail 案表述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護的是「合法取得」資訊的報導，州若認爲某一資訊應加以保密，法律可加以規範，即使資訊在私人的手中，亦須經他人同意方可將其資訊公開。因此將違反法律規定取得之資料加以公布之行爲，不受增修條文第一條之保障。此外，若資訊在政府手中

則其更有能力防止資訊的流通，在此情況下，若州法欲處罰媒體，認爲其應對公布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姓名之行爲負責時，就保護被害人的目的而言，法院認爲設計出更周延的保密機制比訂立此種處罰更爲有效。Landmark Communications 案認爲可藉由內部各式各樣的方法保密資訊：Oklahoma Publishing 認爲審理青少年案件應採秘密庭，若法官違反此一規定，卻反過來處罰媒體將青少年姓名刊出之行爲是不對的；Cox Broadcasting 案認爲若州認爲某資訊不應被公開，州有責任限制資訊的流通。(2) 州認爲被公布之資訊對州有更高的利益時，其可立法加以保護。若政府已將資訊公開卻又處罰媒體將此資訊報導出來，這是非常怪異的，既然已同意公開資訊即表示其公開合乎州之利益，故一旦一項正確資訊被公布後或資訊成爲公眾所有後，法院不得防止其散播，否則違憲。(3) 處罰媒體正確報導公開資訊之行爲，將產生寒蟬效應，因爲它會造成即使資訊是政府所公開的，媒體在報導時仍會反覆斟酌是否應該報導或應作如何之修改的問題，如此一來，增修條文第一條所欲保障之人民知的權利將無法獲得實現。

5. 當我們將 Daily Mail 案的原理原則適用到本案時，我們可以清楚的決定原審判決應被駁回。理由如下：(1) 首先，我們可以知道報社報導的內容是正確的，而且其是合法取得原告姓名的。原告主張依佛州法規定，因警局之筆錄並非公眾紀錄，故本案媒體將受性侵害之被害人姓名公布之行爲應受處罰，而不適用 Daily Mail 案中之原則，即被告不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保護。原告主張，因警局處理不當讓媒體有機會將不應刊登之資訊刊登出來，則此一資訊非公眾紀錄。本案法院認爲警局的違法行爲，不會因此讓媒體藉此取得資訊變爲不公開，而刊登的行爲變成違法，因新聞室的資料是開放給媒體公開查閱的，媒體無法分辨何者爲違法的資訊，亦無義務去分辨，故媒體的資訊是合法取得的。另外，此種刑事犯罪行爲是大眾所關切的事，人民有知的權利，應允許媒體報導，(2) 依原告主張佛州法第 794.03 法條之目的有三，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隱私權、身體安全與鼓勵被害人勇於出面控告加害人。我們可從下列三方面說明在本案中適用

該法是用太過的手段來達成其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隱私權的目的：(a) 取得資訊的情況：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可達到州欲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隱私權的目的，而處罰媒體是最不好的方式，佛州該項法律規定係針對媒體，但原告之損害，探索其源由乃因警局之過失，法律卻不處罰政府，僅對媒體信任政府而爲之行爲加以處罰，豈爲合理，另一方面而言，此種法律之規定將導致寒蟬效應的發生，損害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b) 對於被告是否有過失的問題：以當然過失（Per Se Negligent）作爲標準是不合理的，即規定只要報導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姓名就當然有過失顯不恰當，有些情況不能認爲媒體有過失，例如被害人之姓名早已爲大眾所周知或被害人自行向媒體控訴某人對其性侵害，媒體據此加以報導。州所要保護的法益會因個案事實不同而有差異，不應一概而論，在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案中，以前我們就注意到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護言論自由之法益並非是一種絕對不可討論的問題，即媒體之言論自由非絕對受到保障的，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在 Newspaper Co. v. Superior Court 案中認爲，若法律規定凡是有關青少年性侵害犯罪之案件皆應被排除報導，此規定無效，上述判決並不會減少州給予刑事犯罪被害人匿名保護與避免其姓名被刊登之責任，(c) 該法律之實際效益：佛州該法律是否眞能實現州的重要利益，令人十分懷疑。首先，法條中對於大眾傳播工具（Instru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的定義不明。其次，佛州法第 794.03 條僅處罰媒體不及於其他散播者（如具有惡意之個人），然欲達到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隱私權之目的，就應爲一公平性之對待，對其他散播者亦應加以處罰。

6. 我們並不是說只要是一個正確的報導都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保護，州仍有權立法保護個人的隱私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言論自由並非完全不可限制，假使有更高的州利益存在，同時對言論自由以最小的限制來達成目的時，這種限制是合憲的。在本案中雖然州有保護性侵害受害人姓名，藉此鼓勵受害人報案的州法益，然佛州該項法律並不能達其立法目的，故州法違憲而無效。

大法官 Scalia 之協同意見書

我同意多數意見，然其理由只需說明一點已足，即州法無法達到其所欲保護之法益，我們須了解不論是任何人將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姓名公布，對被害人都會產生傷害，故法律僅處罰媒體的規定並無法達到其立法保護被害人隱私權的目的。

大法官 White 主筆，首席大法官 Rehnquist 以及大法官 O'Connor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

多數法官根據三件前例來作成本案判決。因此，我針對各別前例加以說明。首先，本案事實與 Cox Broadcasting 案完全不同，Cox Broadcasting 案針對的是法院的審理紀錄，即使在早期的隱私權概念中，司法審判記錄亦不受隱私權之保護，因爲這是原本就應公開的記錄。但本案中原告（強暴受害者）的姓名出現在犯罪報案記錄中，該州法律規定其本不應被公布，雖然本案中州亦採取某種最低程度的防範措施，但卻因警局之過失而被公布。另外，Daily Mail 案中法律規定刑事訴訟過程中，加害人之姓名不得公布。但加害人的權利和被害人的權利應有所不同，且該案非隱私權的問題，而本案爲隱私權的問題，因此兩者不同。至於多數意見認爲本案導因於警局的過失，媒體信任政府而將原告姓名刊登的行爲，並不會因爲警局的過失而變成違法，媒體仍係合法取得資訊，我們認爲此種推論過程有誤，因其似乎暗指原告是否可獲得損害賠償要以警局是否有過失作爲判斷標準是不對的，同時在本案中新聞室中有禁止報導受害者姓名之標語，因此不應認爲被告信任政府，造成政府的公布使得被告行爲合法。且就本案事實可知被告有重大過失，不須討論當然過失的問題，其次，本案法院認爲法案中的當然過失太過嚴格。但實際上本案原告已證明被告有重大過失，雖然本案多數法官認爲當然過失原則，使得原告不須證明被告的揭露姓名是違反一般合理人的期待。但是，實際上此種當然過失中的一般合理人期待是由立法者決定的，而立法者代表公眾的想法，因此，當然過失原則仍是以一般合理人的期待作爲基準。再者，依多數見解，該佛州法律並未考慮受害者姓名已爲公眾所之的情況，我認爲這些情況在計算損害賠償數額時當然會加以考量，況且，本案並無上述情形發生。另外，雖然多數見解認爲佛州法第 794.03 條僅處罰媒體不及於其他散播者（如具有惡意之個人），然欲達到保護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隱私權之目的，就應爲一公平

性之對待，對其他散播者亦應加以處罰。但應說明的是，其他的散播者並非無法處罰，其亦受到佛州習慣法有關隱私權之規範，並非如多數意見所言，該法案無法達其立法目的。我們的法律從對人身與財產的保護，進一步發展到對人類精神層面的保護，但多數意見等於否定了這樣的歷史發展，如果連本案這樣的原告都無法受到隱私權的保障，還有怎樣的人可以受到隱私權的保障？

15. Lakewood v. Plain Dealer Publishing Co.

486 U.S. 750（1988）

劉靜怡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被上訴人可以直接針對上述法令提出挑戰，不須先申請許可且遭駁回後，才能起訴。
（Appellee may bring a facial challenge to the ordinance without first applying for, and being denied, a permit.）
2. 系爭法令賦予行政部門該市市長幾乎無限制的裁量權限，得以核發或拒絕發給執照，在核發上述執照附加條件方面，其裁量也幾無限制，已經違背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規定。
（The portions of appellant city's ordinance giving the mayor discretion to deny a permit application and authority to condition a permit on any terms he deems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are unconstitutional.）

關 鍵 詞

freedom of speech（言論自由）；freedom of press（新聞自由）；licenses and permits（執照和許可制度）；unlimited discretion（無限制的裁量）；severable（可分開處理且互不影響效力）。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Brennan 主筆撰寫）

事 實

在一九八三年之前，Lakewood 市透過立法禁止在公共財產（public property）上設置任何設施（structure），該市因而拒絕本案當事人 Plain Dealer Publishing Company

在該市的人行道上放置投幣式的報紙販賣機的申請。Plain Dealer Publishing Company 便在俄亥俄州北部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挑戰上述法令，該地方法院判決此一法令中所訂定的絕對性禁止措施是違憲的作法，但是其在判決中也決定暫時延後對該市發出永久禁制令（delayed entering a permanent injunction），而是賦予該市修訂該法令的機會。

在地方法院做成上述判決之後，儘管 Lakewood 市可以對地方法院的上述判決提起上訴，但是其仍然決定以通過兩個法律修正案的方式，在特定的條件下允許在市有財產上放置設施。該市通過的法令中，有一個法令特別是和報紙販賣機有關，該法令賦予市長針對報紙販賣機每年的設置申請擁有准駁與否的權力，如果市長駁回申請，依法須說明駁回理由，倘若市長同意准許其申請，則市政府在核准申請時，可以附加數項條件和附款，發給年度許可執照。上述條件和附款內容如下：（一）必須取得該市建築審查委員會就報紙販賣機設計型式所爲的許可；（二）報紙販賣機所有人須依約對該市負擔任何因爲報紙販賣機所引起的賠償責任，同時必須提出投保十萬美元的保險，來擔保此一賠償責任的履行；（三）市長認爲必要且合理的任何其他條件和附款。換言之，上述法令授權給該市市長有權准駁在公共財產上設置報紙販賣機的申請案件。換言之，上述法律所規定的申請准駁，和市長認爲哪些條件和附款是屬於必要且合理者，息息相關。

由於不滿此一新法令的內容，當事人 Plain Dealer Publishing Company 選擇不根據新法令內容去申請設置報紙販賣機執照的作法，而是修改其原先在地方法院所提出的控訴內容的方式，質疑該新法令的合憲性。地方法院在審理後認爲，上述法令整體而言是合憲的，因而做了該市勝訴的判決。經上訴後，上訴法院第六巡迴上訴法院則駁回地方法院的判決，認爲上述法令賦予屬於行政權的市長過於寬廣的裁量權，因此是違憲的法令。第六巡迴上訴法院所持的看法，是認爲上述法令在三個方面出現違憲問題。首先，第六巡迴上訴法院認爲上述法令賦予市長幾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權，得以准駁設置報紙販賣機的申請，並且可對許可的核發無限制地附加條件和附款，是違憲的。第二，在對報紙販賣機的設計型式沒有一套明確管理標準的情況下，上述賦予建築審查委員會針對報紙販賣機的設計

型式進行審查和發給許可的規定，實際上是給予建築審查委員會毫無拘束的裁量權去否決設置報紙販賣機的申請。最後，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的多數意見認爲，上述法令針對設置報紙販賣機附加必須所有人投保保險和負擔賠償責任的規定，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言論自由的規定，因爲，針對其他放置在公共財產上的設施所有人，並未施加此種類似的負擔。第六巡迴上訴法院認爲，由於前述法令各條款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not severable）性質，因此系爭法令在適用於管制商業區內的報紙販賣機的範圍內，都是違憲的，Lakewood 市政府針對第六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不服，提起上訴。

判　決

系爭法令違憲，本案發回上訴法院，由該法院審理決定系爭法律內容是否可分開處理，並且進而採取和本院的判決意見一致的判決結果。

理　由

第六巡迴法院判決的基礎，乃是在於認爲規範報紙販賣機設置地點的系爭法令，賦予市長過於廣泛而不受拘束的裁量空間，而本案首先面對的爭議，便是當事人 Plain Dealer Publishing Company 可否就系爭法令的表面字義逕行提出質疑要求釋憲。本院認爲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內容，對於言論發表者和新聞專業賦予明確的保護，本院的判決，長久以來都認爲，當規定核發給許可證（或執照）的法律（licensing statute），給予政府官員無限制的裁量權，可以決定具有表達性質的活動（expressive activity）的准許或駁回時，受此種法律規範者，不需要先踐行申請許可證的程序，以及其申請許可證的要求遭到駁回，就可以直接針對該等法令的表面文義提出挑戰（facial challenge），本院在諸如 Freedman v. Maryland, 380 U.S. 51, 56（1965）、Thornhill v. Alabama, 310 U.S. 88, 97（1940）、Shuttlesworth v. Birmingham, 394 U.S. 147, 151（1969）和 Lovell v. Griffin, 303 U.S. 444, 452-53（1938）等處，都表達過此一基本立場。

以上這一長串的判決先例，都是經過時間檢驗的知識，這些知識告訴我們，在言論自由的領域裡，如果規定核發給許可證的法律賦

予政府官員或行政機關無限制的裁量權，那麼就會構成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措施，並且可能會導致內容審查或內容檢查制度（censorship），本院在以上所述的 Shuttlesworth 案，以及 Cox v. Louisiana, 379 U.S. 536 （1965）、Staub v. City of Baxley, 355 U.S. 313, 321 22 （1958）、Kunz v. New York, 340 U.S. 290, 294 （1951）、Niemotko v. Maryland, 340 U.S. 268 （1951） 和 Saia v. New York, 334 U.S. 558 （1948）這些判決中，均採取此一看法，而本院也認爲，會造成言論自由危機的罪惡，只能藉由准許受系爭法令限制的當事人直接針對該等法令的表面文義提出挑戰的方式，予以緩和。首先，單單是由政府官員或行政機關做爲內容審查者而具有無限制的裁量權此一事實的存在，加上事前限制的力量，即使這些行政裁量權和力量實際上並未遭到濫用，便會導致迫使當事人自行檢查或自行審查他們自己的言論內容的結果。這種自我檢查或自我審查的作法，無從因爲針對系爭法令之適用（as applied）提出挑戰而得到紓解，因爲這種就內容做自我檢查或自我審查的行爲模式，是個人的行爲，而不是政府力量的濫用。我們不難想見一份非常仰賴單一發行銷售量的報紙，因爲感受到壓力之故，而採取爲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競選連任的市長背書的作法，或者避免批評這個市長，以便能夠在許可證的申請過程中獲得比較有利的考量，或者快速順利地取得發行許可證；所以，只有設定標準，去限制政府官員或行政機關無限制的裁量權，爲內容自我檢查或自我審查加上確定性此一致命因素，才能消除此一危險，而也只有允許受系爭法令限制的當事人直接針對該等法令的表面文義提出挑戰，才能有效檢驗系爭法令是否符合此等標準。

第二，如果缺乏明確的標準，我們便很難區分在適用層次上的「核發許可證者的正當否決權」和「核發許可證者不正當的濫用檢查內容權限的權力」兩者之間的區別。倘若有明確的標準，那麼這些標準便可以提供一些指引，讓我們去監督檢驗這些掌握許可證核發權限者，同時讓法院可以迅速且方便地判斷掌握許可證核發權限者，到底有無歧視其所不喜歡的言論。如果沒有這些可以拘束具有許可證核發權限者的裁量權標準的話，那麼，掌握許可證核發權力者可以在個案上予以事後的合理化，而且很容易地便可以運用變動不定或者不具有正當性的許可證

核發標準，會使得法院在個案上難以決定是否針對其所偏好的言論，賦予較優惠的待遇，而對其所不喜歡的言論，則是予以壓制。再者，必須等到法令在個案上適用（as applied）之後，才能針對該法令提出質疑和挑戰，從本質上來說，不但困難，而且在時間上將多所拖延，將會導致訴訟之提起受壓抑的結果。一份擁護不受歡迎的觀點而且經費拮据的報紙，可能成爲手握許可證核發權力者施以報復而拒絕許可證之申請的對象，但是卻沒有時間或財務手段，足以挑戰掌握許可證核發權力者懲罰該報紙的行爲。相對地，該報紙會發現去迎合和表達其所知悉的市長所喜歡的觀點，會比較容易，或者乾脆結束該報社的經營，也是比較容易的事情。即使該掙扎不已的報社願意奮力一搏去嘗試訴訟途徑，並且獲得勝訴，其最終所獲取的救濟卻可能「太少也來得太遲」，因爲，直到司法權對拒絕核發許可證的決定做宣告無效之前，該掌握許可證核發權力者所做的拒發決定都是有效成立的，在這段期間內，等於是已經無可挽回地剝奪了該報紙發表言論的機會。簡言之，倘若欠缺標準去拘束掌握許可證核發權力者的裁量空間，在舉證方面的困難，和透過個案方式針對系爭法令的適用提出挑戰此一本質所衍生的困境，會導致掌握許可證核發權力者絕大部分的權力行使作爲實質上不被審查的結果。

上述基本觀念形成了如何區分哪些法律容易受制於針對文字表面意義所提出的挑戰，哪些法律則否的核心所在。以上所述，乃是不受拘束的許可證核發制度爲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帶來的兩個危機：一是言論發表者會進行自我檢查或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以免無法取得執照，另一個危機，則是衡量掌握許可證核發權力者的行爲時欠缺標準的情況下，無法有效地發現、審查並矯正以內容爲對象的言論審查措施在適用層次上所出現的問題此一困境。當系爭立法相當程度呈現上述風險時，法院必須立即允許對系爭立法的挑戰，所以，只要是規定核發許可證權限的立法，賦予政府官員或行政機關可以針對言論所表達的內容或觀點進行差別待遇，壓抑其所不喜歡或厭惡的言論此一權限，那麼便可以允許針對文字表面意義所提出的挑戰。然而，這並不是說新聞出版業者或者是任何言論發表者不能主張規範其言論發表的法律所涉及的裁量空間，乃是屬於審查或箝制言論的措施，提出挑戰。至於系爭立法，和言論本身或通常

與言論表達有關的行爲，兩者之間必須具有緊密的連結關係，以致於會實質帶來其所主張的審查或箝制言論風險。

眼前的個案，在其管制架構上有兩個特徵，至少這兩個特徵結合之後，可以爲我們允許針對系爭立法文字表面意義提出挑戰的決定，找到正當化的理由：第一，這個法令規定每年要申請一次報紙許可證，因此，這種作法等於是允許掌握許可證核發權限者這個可以藉由過去一年裡已經發表過的言論內容，去估量申請許可證的報紙未來可能出現的言論內容或觀點。身受此種許可證制度規範的言論發表者，就「獲得許可證」而發表的言論，對於其未來繼續發表言論的能力，是不會抱持奢望的。然而，要證明「獲得許可證」而發表的言論，以及之後遭拒絕發給許可證的決定兩者之間的連結關係，或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雖然允許掌握核發許可證權限者去檢查獲得執照或獲得許可的言論內容，不見得是對於言論的直接威脅，不過，要求多重執照或定期換發執照，卻已經具有足夠的威脅性，是應該由司法權介入處理的關切。

許可證核發制度的第二個特徵是，許可證核發制度是明確而特定地針對和言論本身或者和言論表達有關的行爲—也就是報紙的發行—而設置的。這樣的管制架構，會出現特別負責審查言論或者和言論有關的行爲的行政機關或行政官員，而這種情況也會因而培養出一門偏好對言論內容進行檢查的「專門知識」。因爲系爭管制體系具有以上所述的兩個特徵，所以，本院認爲，在本案中，允許對系爭法令的文字表面意義提出挑戰，是適當的，而且，控制市長所擁有的裁量權的標準，也應該要加以規定。當然，市政府可以規定定期換照，甚至也可以對那些和言論表達有關的行爲，規定特別的發照程序，但是，憲法要求市政府必須建立一套中立的標準，以確保其發照與否的決定，不是基於申請執照者過去已經發表的言論內容或者觀點，做爲准駁依據的。

以上的分析，可以解釋何以本判決的不同意見書將報紙和飲料販賣機兩者互相比擬的看法，是不恰當的比喻。報紙所涉及的是意見的表達，而飲料販賣機則是以賣飲料爲目的，即使飲料販賣機也被用來從事言論發表活動，該言論也和飲料無涉，所以，禁止設置飲料販賣機可能會處罰到不相關的言論，但是卻不會發生直接導致該言論無從出現的結果。簡言之，一個

賦予市長不受拘束的裁量權限得以決定是否准許在公有財產上設置飲料販賣機的法令，其實並不會讓該市長常常有機會透過壓制言論或者直接控制飲料販賣言論發表能力的方式，去針對該販賣飲料者的言論內容或觀點，行使實質審查的權力。

比較適當的類比，應該是將報紙和傳單兩者互相類比。根據本院過去所累積的判決顯示，散發傳單者可以針對限制其散發傳單的法令，就其文字表面意義提出挑戰，例如 Tally v. California, 362 U.S. 60（1960）和 Lovell v. Griffin, 303 U.S. 444 （1938）兩個判決都是採取此一立場。本院此一既定的原則，乃是基於和平的傳單散發者「在根本意義上和報紙並無不同」這個正確的前提而產生的，因此，本案不同判決意見所持的理論，將會把本院的既定法則完全推翻，而這種結果卻無法透過本案中的報紙是經由機器販售，而非以人工方式發送這樣毫無意義的區別，予以正當化。

本案不同判決意見另外還針對以上所討論的跟隨檢查制度而來的危險，以及該風險和系爭法令之間的關係以外的問題，做了分析，在該分析中，不同判決意見指出：如果特定的言論方式可以遭到徹底禁止的話，那麼就沒有所謂的並未遭到徹底禁止的「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護的行爲」可言。於是，本案不同判決意見認爲，由於系爭法令並未涉及「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護的行爲」，因此也就不該允許就系爭法令的文字表面意義提出挑戰。

不過，不同判決意見這樣的說理，卻無異於是一場訴諸法律技巧的欺騙遊戲，完全將探討掌握許可證核發權限者不受拘束的言論檢查權力，誤導到系爭法令是否徹底禁止言論的方向。

上述不同判決意見內容的關鍵，在於它所採取的「多者包含少者」此一推論邏輯，然而，此一推論邏輯卻完全無視此一「多者」和「少者」的限制本身所蘊含的劇烈憲法傷害。假設有個法令完全禁止某種特定的表達方式，而從表面上的文字意義來看，該法令無論是內容或是觀點都是中立的。在分析這個假設性的法令時，法院會適用本院早已建立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審查標準（time, place, and manner test），例如 Consolidated Edison Co. v. Public Service Comm'n of N. Y., 447 U.S. 530, 535（1980）和 Police Department of Chicago v. Mosley, 408 U.S. 92 （1972）兩個判決都是採取此一立場。會引來憲法增修條

文第一條關切的危險，乃是在於政府會去封閉或限制某一言論表達管道，所以我們便應該探討某一和言論無關的利益，是否足以正當化政府去封閉或限制某一言論表達管道的作法。換言之，探究的重點應該在於「言論表達的方式，基本上是否和某一地點某一時間所出現的正常活動，不相符合」。

相反地，如果某一法令或政策允許只能以某種方式進行通訊，那麼便會引來進行內容和觀點檢查的陰影。當政府官員掌握了毫無限制的裁量權力，決定誰可以說話，誰不可以說話時，這樣的危險就會達到最高點。因此，即使政府對特定言論方式加諸內容中立的禁止措施，是合憲的作法，還是不能賦予行政官員或政府機關無限制的裁量權，決定是否可以取得許可證或執照。從根本上來說，本案不同判決意見所提出的主張，忽略了我們援用標準去檢驗某一言論表達活動是否完全遭到禁止，和檢驗某一言論表達活動是否可以受制於行政官員或政府機關，兩者的關切重點是有所不同的。

本案不同判決意見的錯誤，因爲其以系爭活動發生的時間、地點及方式，來定義何謂「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護的活動」，而顯得更加嚴重。事實上，本案系爭言論表達活動是報紙的發行，而這正是受憲法保護的活動。畢竟，發行的自由，無論是對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都是同樣必要的；的確，不能發行報紙，出版自由就會變得毫無價值可言。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肯定是和市政府所掌握的報紙發行限制權力有關的，因此，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護的基本權利，是否遭受到限制。

系爭法令賦予市長可以否決許可證申請的權力，也可以針對許可施加市長認爲必要且合理的條件，此一部份的法令規定，是違憲的。

市政府要求法院審酌假設市長只有在基於健康、安全或市民福祉等相關理由時，才會否決許可證的申請，而且，市長所附加的條款，也只會基於類似的理由，才附加上去。這個要求乃是假設市長會基於善意採取其准駁行動，並且，市長會遵守系爭法令表面上之明文所欠缺的標準。然而，諸如此類的假設，卻是禁止不受限制的裁量空間此一原則所不允許的作法，例如，本院在 Freedman v. Maryland, 380 U.S. 51 （1965）這個判決中，便表達了這個立場。禁止不受限制的裁量空間這個原則要求的是，市政府所謂的在其法令中已經隱含

的限制，必須明確地以明文方式納入系爭法令的條文內容裡，以拘束司法機關的法令適用和行政機關的法令解釋，或者拘束長期以來所建立的實務處理方式。

儘管本案不同判決意見否認他們想要使系爭法令能夠輕鬆通過檢驗，但是，很明顯地，不同判決意見無法不針對這個部分的問題，做出回應。首先，不同判決意見堅持認爲系爭法令中「要求市長表明其否決許可的理由」這個規定，使本案子不同於其他涉及執照或許可證申請的案件。但是，市長所陳述的否決理由，並不需要達到任何程度的具體性，同時，對於市長可以提出的陳述理由，也沒有任何限制可言。系爭法令如此簡單的規定，並無法提供一個足以確保合乎憲法要求的決策標準，也沒有讓最終的司法審查，得以獲得堅強的判斷基礎。

本案不同判決意見也因爲最終具有司法審查可以做爲救濟管道，所以感到無不妥之處。然而，司法審查只有在市長和市議會否決許可證的申請之後，才會隨之出現。在本案系爭法令中，無論是針對市長或者市政當局，都沒有規定其應該以何的合理時程和方式，處理許可申請案，申請案可能會在市政當局面前無限制地拖延下去，而申請許可的報紙只能訴諸司法救濟，就算針對系爭法令所做的司法審查，程序上進行得相當快速，但是，諸如此類的司法審查，還是不能取代那些足以指導行政機關決策者裁量的具體標準。

Lakewood 市的系爭法令賦予市長幾無拘束的裁量權，可以准駁許可證的申請，並且賦予市長幾無限制的權力，得以針對其許可附加任何其認爲必要且合理的的條件，此一部分的法令內容是違憲的。本院認爲自己並不需要去解決當事人所提出的要求要審查的問題，因爲，假設這部分的規定和系爭法令的其他部分，是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那麼，光是有關市長裁量權這個部分的判決結果，就足以支持上訴法院原先的判決結果。至於地方法令是否具有可分性問題，是屬於州法管轄的問題，因此，最好是由下級法院加以解決。

（大法官 White 主筆，大法官 Stevens 和 O’Conner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略）

16.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

433 U.S. 562（1977）

潘維大、程法彰 節譯

判 決 要 旨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四條無法免除電視台因全程播出表演內容所應負之賠償責任。

（The First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 do not immunize the news media when they broadcast a performer's entire act without his consent.）

A. 原告的訴因是基於該州承認表演者對其表演有公開的權利。但是被告也有憲法保障採訪播出的權利。因此，本案的重點在於是否原告公開其表演的權利，必須被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新聞採訪播出的權利所限制。

（Plaintiff's right of publicity was a right arising under Ohio law. It is also clear that defendant's claim of constitutional privilege to report was sustained. The crucial question of whether defendant had a privilege to film and televise plaintiff's performance.）

B. 公開表權（Right of Publicity）的本質，不僅在補償表演者所受的損害，亦有提供經濟上的誘因，以鼓勵其投資有益社會大眾的演出，如同著作權與專利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四條，從未表示要給媒體得以任意報導他人全部表演而不需付費的特權。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publicity rests on more than a desire to compensate the performer for the time and effort invested in his act; the protection provides an economic incentive for him to make the investment required to produce a performance of interest to the public. The same consideration underlies the patent and copyright laws. The

First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did not immunize the broadcast company from liability for televising the performer's entire act.）

關 鍵 詞

First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Fourteen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the right of publicity（公開權）；appropriation（竊用）；media（媒體）。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White 主筆撰寫）

事 實

原告是一個從事人肉砲彈表演的人，他把自己裝在砲管內，再發射出來，射程兩百英尺，表演時間 15 秒。在 1972 年的 8、9 月時，原告在俄亥俄州的 Geauga 郡園遊會中的園遊會作例行表演。原告在園遊會中圍籬的場所表演，觀看的群眾除了園遊會門票外，不另外收費。一位被告電視公司的記者要將表演節目拍攝下來時，被原告注意到而遭到原告的阻止，而該記者在當天也的確沒做任何拍攝。但因爲新聞製作人要求他要將節目拍攝下來，於是第二天他拍攝了整個表演。影片長 15 秒，在晚間十一點的節目中播出，播出時被告並稱讚該表演非常精采，要觀眾親自去觀賞。原告認爲他從事的是一個娛樂事業，該項技術是他父親首創並傳授給他的，全世界只有他們家族會，這樣的表演已有五十年的歷史，被告未經其同意逕行拍攝播出，侵害了他職業上的財產權，因此原告控訴被告竊用（appropriation）。

1. 事實審法院同意被告駁回原告之訴的主張。被告勝訴。
2. 上訴審法院廢棄事實審法院判決，多數法官認爲上訴人（原告）就侵占及侵害習慣法上著作權之事，具有訴因。其中一位持贊同意見的法官，認爲原告將表演行爲公開的權利被竊用。所有的法官均同意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並未給予被告在未補償原告之情況下公開原告表演的權利。
3.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雖然認爲原告有公開其表演的權利，但是由於電視公司有爲社會公益而報

導的特權，在其目的並非無關公益而爲剝奪原告的權利或是傷害個人，故電視公司的行爲應受保護。

原告提出上訴。

判　決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判決廢棄，發回州法院重審。

理　由

本案爭點在於是否增修條文第一條言論自由及第十四條的法律正當程序，使得本案被告得免於因侵害原告公開其表演的權利而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1. 本院不得給予諮詢性的意見。因爲本院任務應爲糾正州法院對適用聯邦法律的錯誤。假使下級法院的判決是基於獨立州法的基礎，則聯邦最高法院不得受理此一案件。由於本案並非上述之情況，在本案中，州法院援引本院增修條文第一條的案件，作爲判決基礎，因此可認爲本案的判決是基於聯邦法律。即使不認爲本案的判決是基於聯邦法律，至少州法院認爲在適用州法時必須要考慮到聯邦憲法，因此，本院有聯邦法律的管轄權聽取該案件。
2. 無疑的，上訴人（原告）的訴因是基於該州承認表演者對其表演有公開的權利。但是被上訴人（被告）也有憲法保障採訪播出的權利。因此，本案的重點在於是否原告免於受侵害的權利，必須被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公眾對公共利益知的權利所限制。
3. 假使今天被告只是報導表演的訊息，而非播出表演的畫面，則情況會有所不同。但是今天上訴人是主張被告播出表演畫面給公眾觀賞，竊用了其財產。表演者對其表演是否公開有排他性的權利。原告不因在園遊會中表演而喪失該權利。
4.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雖然認爲，若非播出目的在剝奪原告非關公益的權利或是故意傷害原告，則新聞媒體必須有選擇播出多少內容的權利。而此種選擇權無法用公式計算，因其可能不當的限制新聞自由。因此，被告有憲法上自由播出表演全部實況的權利。但同時，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亦認爲原告有是否公開其表演內容的權利。且該表演具有財產上的性質而需加以保護，保護此一權利同時，亦增加創造的動力而促進社會進步。本案有關原告

謀生的問題，此種情況就如同保護專利權人及著作權人的努力成果以提升社會利益一般，美國聯邦憲法並不禁止各州立法保護相類似的權利。同時原告也僅要求損害賠償，因而俄亥俄州的此種對於表演者公開其表演內容的權利保護，並不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護新聞自由的規定。亦即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關於媒體的新聞自由，不能使傳播媒體對關於表演者公開其表演內容的權利保護之規定免責。

5.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適用本院 Time, Inc. v. Hill 案而作出被告勝訴的判決。該案事實是生活雜誌（被告）介紹一齣新戲，其內容包括原告的家庭生活，原告認爲被告的不實報導讓他感到受到羞辱，是一種非毀謗的誤導（False-Light-Invasion of Privacy 的形態之一），請求損害賠償。該法院認爲一齣新戲是有新聞價值的，是公眾所關切之事，故媒體報導的行爲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保護，除非原告可以證明被告明知爲虛僞或有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爲虛僞，而爲報導時，被告才須負責。本院認爲，Time 案並未給予媒體未經表演者之同意即可將表演全部的內容播出的特權。且該案與本案事實不同。首先，Time 案所要保護的法益是個人的名譽，而本案所要保護的是個人將自己的成果公開發表的權利（Right of Publicity），這是一種財產上的利益，用以鼓勵個人創造自我價值。再者，誤導（False-Light）類型的案件欲取得的救濟，是要求被告儘量減少散播，而公開發表權（Right of Publicity）類型的案件是在確定何人有散播權，而得以收取散播所得之利益，即原告不反對他人散播，但要求散播人要付費給他。因此 Time 案不拘束本案。

6.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言論自由，讓新聞媒體得在某些情況下不受毀謗罪或侵犯隱私權的訴訟，然而，不論增修條文第一條劃定的界限爲何皆與本案無涉，因爲本案非侵害名譽的問題，而是侵害財產上權利的問題。被告將原告整個表演的內容播出，與媒體未經同意播出拳擊賽、棒球賽的整個過程，則比賽的組織者可要求付費的情況相同。原告從事的是需付費的表演，他必須有排他性的掌控權利才能向觀眾收費，被告未經其同意且明知其不同意而將表演節目全部拍攝下來，已經侵害到原告可能獲得的財產上利益，而直

接關係到原告表演者的生計，可以稱爲「竊用」。本案的事實與一般竊用（appropriation）的型態不同，通常竊用之標的是名人的姓名與肖像，紐約州早期認爲「竊用」必須與促銷商品有關。若只是人名或影片在媒體上播出而無關商業目的的報導非侵害隱私權。不同於一般竊用之定義，本案竊用的標的是表演內容，是原告藉以獲得名聲與財產的來源。公開發表權（Right of Publicity）的本質，不僅在補償表演者所受的損害，亦有提供經濟上的誘因，以鼓勵創新發明的目的，如同著作權與專利權。雖然原告表演的訊息本身，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下，媒體可以加以播出，但若是播出全部表演內容，則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並不適用，因此媒體並無免除州法可能的處罰之特權。

7.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四條，從未表示要給媒體得以任意報導他人全部表演而不需付費的特權。

大法官 Powell 主筆，大法官 Brennan、Marshall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

多數意見判決確認了一個原則，不論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劃定新聞媒體言論自由的界限爲何，只要其報導表演者全部的表演內容者，就無任何免責權。我認爲這樣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本案事實仍應有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適用。本案的事實與將整場拳擊賽、棒球賽拍攝下來播放的情況是不同的，因爲原告整個表演的時間絕對不只 15 秒，兩者無法相提並論，另一方面，被告以 15 秒的時間報導一個新聞是很正常的，若要求新聞媒體負擔責任，將發生新聞媒體自我設限的情況，因爲新聞媒體永遠無法確定拍攝下來的東西是否是全部表演，一旦有所懷疑就不敢報導。即便表演本身具有新聞價值，因新聞媒體自我設限的結果，使社會大眾知的權利受害，進而破壞整個民主的基礎。且竊用（appropriation）之請求權是在保障財產權，依多數大法官見解，被告負損害賠償的理由在於被告不公平的取得原告表演內容，依此理由，原告之損害賠償應以被告之利得加以計算，但其後法院卻以原告所受損害作爲損害賠償之依據。在本案中，我們不但沒有證據足以顯示本案被告可藉由報導原告的表演以獲得商業上的利益，同時原告是否受有損害亦有疑問，原告可能因爲媒體報導而增加知名度。我承認原告爲了表演所付出的智慧、心血與成本，但在增修條文第一條保

障言論自由的法益下，在沒有強力証據證明該例行新聞報導是爲該媒體私人或商業上的利用之前，個人的法益應該低頭。我認爲被告報導的內容具有新聞價值，且沒有證據證明被告藉由報導原告的表演而獲得商業上利益的前提下，被告應該勝訴。

【註 1】另一位反對意見的法官認爲從州法院的判決中，我們無法完全確定州法院判決的基礎是美國聯邦憲法，應先發回州法院，以確認其判決是否依據本院的判決。

【註 2】本案在發回州最高法院後，判決俄亥俄州憲法並無保障本案被告媒體之規定，因此發回地方法院決定損害賠償數額。

17. Madsen v. Women's Health Center, Inc.

512 U.S. 753（1994）

劉靜怡　節譯

判　決　要　旨

佛羅里達州州法院所發之系爭限制措施並非屬於事前審查（prior restraint）措施，而且是基於上訴人過去曾經出現過的行為而做出這些限制措施，並非基於上訴人所欲發表的言論內容而來，屬於內容中立的限制措施；但是，由於此種限制措施比其他類型的內容中立限制措施隱含更多的言論箝制風險，所以在審查標準的選擇上，可以選擇稍微嚴格的審查標準。

（The fact that this injunction did not prohibit activities by persons demonstrating in favor of abortion is justly attributable to the lack of such demonstrations and of any consequent request for relief. Moreover, none of the restrictions at issue were directed at the content of petitioners' anti-abortion message. The principal inquiry in determining content neutrality i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regulated speech without reference to its content. The government's purpose is therefore the threshold consideration. Here, the injunction imposed incidental restrictions on petitioners' message because they repeatedly violated the original injunction. That the injunction covers people who all share the same viewpoint suggests only that those in the group whose conduct violated the court's order happen to share that viewpoint. In evaluating a content-neutral injunction, the governing standard is whether the injunction's challenged provisions burden no more speech than necessary to serve a significant government interest. Thus, the injunction must be couched in the narrowest terms that will accomplish its pin-pointed

objective. Although the forum around the clinic is a traditional public forum,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a generally applicable ordinance - which represents a legislative choice to promote particular societal interests - and an injunction - which remedies an actual or threatened violation of a legislative or judicial decree, and carries greater risks of censorship and discriminatory application than an ordinance, but can be tailored to afford greater relief where a violation of law has already occurred - require a somewhat more stringent application of general First Amendment principles in this context than traditional time, place, and manner analysis allows.）

關 鍵 詞

picket（站崗糾察）；abortion clinic（墮胎診所）；public forum（公共論壇）；content-based regulation（基於內容的管制）；content neutral（內容中立）；narrowly tailored（經過嚴密設計）；alternativ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替代溝通管道）；heightened scrutiny（較嚴格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crutiny（中度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嚴格審查標準）；prior restraint（事前審查）。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Rehnquist 主筆撰寫）

事 實

1. 上訴人和其他反對墮胎的示威者，威脅要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墮胎診所四周以站崗糾察（picket）的方式從事示威抗議活動，佛羅里達州的州法院，發出一份永久禁制令，禁止上訴人封鎖和干擾進入該墮胎診所的公共道路，也禁止上訴人以任何物理方式騷擾進出該墮胎診所的人。後來，身爲被上訴人的該墮胎診所經營者希望擴大該禁制令的範圍，同時，法院也認爲進出該墮胎診所的道路還是遭

到嚴重阻礙，上訴人的活動，已經對該墮胎診所的病人造成嚴重的物理影響，嚇跑了某些潛在的病人，而且該墮胎診所的醫生和該診所員工的住家，也變成示威抗議的目標。所以，法院發佈了一個經修正的禁制令，該禁制令適用於上訴人以及和上訴人屬於「同謀共夥」（in concert）的人，該禁制的內容如下：禁止上訴人及其「同謀共夥」者，進入該墮胎診所出入口和車道；禁止進入該診所北邊和西邊私人土地等三十六英呎以內的緩衝區（buffer zone）；禁止其在特定時段和聽力所及範圍內以人力或其他設備製造大聲合唱、叫囂、嘶喊和鳴放喇叭等噪音；禁止其在特定時段使用讓診所內病人「可觀察到的影像」（images observable）；禁止其於診所附近三百英呎內，與行進中的病人或潛在的病人在未經該等病人同意的情況下與其交談；在該墮胎診所員工的住處周圍，劃定三百英呎的緩衝禁區。上訴人認為該修改後的禁制令，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言論自由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但是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卻認定其為合憲。

2. 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一方面承認為本案系爭的論壇（forum），性質上的確是屬於傳統的公共論壇（public forum），但是，其卻不認為需要採取 Perry Education Assn. V. Perry Local Educator's Assn., 此一判決中所建立的較嚴格審查標準（heightened scrutiny），做為系爭限制措施是否合憲的審查標準，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所持的理由，在於因為該限制措施是屬於內容中立（content neutral）的限制措施，系爭限制措施不僅是基於維護重要的政府利益（significant government interest）而經過嚴密設計（narrowly tailored）出來的限制措施，而且，依然留有相當多的替代溝通管道（alternativ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可供欲發表其意見的上訴人選擇。為了解決此一爭議，本院同意審理此一上訴案件。

判　決

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的判決部分維持部分推翻。

理　由

佛羅里達州州法院所發之系爭限制措施並非屬於事前審查

（prior restraint）措施，而且是基於上訴人過去曾經出現過的行爲而做出這些限制措施，並非基於上訴人所欲發表的言論內容而來，屬於內容中立的限制措施；但是，由於此種限制措施比其他類型的內容中立限制措施隱含更多的言論箝制風險，所以在審查標準的選擇上，可以選擇稍微嚴格的審查標準。

上訴人在中佛羅里達州經營墮胎診所，上訴人和其他反對墮胎的示威者，威脅要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墮胎診所四周以站崗糾察的方式從事示威抗議活動，佛羅里達州的州法院，發出一份永久禁制令，禁止上訴人封鎖和干擾進入該墮胎診所的公共道路，也禁止上訴人以任何物理方式騷擾進出該墮胎診所的人。後來，身爲被上訴人的該墮胎診所經營者希望擴大該禁制令的範圍，同時，法院也認爲進出該墮胎診所的道路還是遭到嚴重阻礙，上訴人的活動，已經對該墮胎診所的病人造成嚴重的物理影響，嚇跑了某些潛在的病人，而且該墮胎診所的醫生和該診所員工的住家，也變成示威抗議的目標。所以，法院發佈了一個經修正的禁制令，該禁制令適用於上訴人以及和上訴人屬於「同謀共夥」者，上訴人認爲該修改後的禁制令，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言論自由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但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對於下級法院的決定，卻是採取支持的立場。

本院認系爭限制措施不應該因爲其乃是限制到反墮胎者所發表的言論，便需要適用和基於內容或基於觀點所爲的限制措施一樣的較嚴格審查標準，審查該限制措施的合憲性。如果相對地接受上訴人的主張，那麼，必然會將所有的管制措施都當做是基於內容所爲的管制措施來看待。法院的禁制令，就其本質來說，本來就不是針對一般公眾而發的，而是針對特定的個人或群體而來，之所以發出禁制令，是著眼於特定個人或群體過去的所作所爲，因而決定限制其活動或言論。本案系爭限制措施，並不是針對上訴人所傳達的反墮胎訊息的內容而來的，在判斷某個政府管制措施是否屬與內容無關時，主要的判斷重點，在於政府在從事管制時，是否從未提及內容。參見 Ward v. Rock Against Racism, 491 U.S. 781,791。因此，政府的管制目的，便是關鍵性的考量。在本案中，系爭禁制令對於上訴人所要傳達的訊息施加了附帶的限制（incidental restrictions），其原因是出自於上訴人屢次違反原本的禁制令所規定的禁止內容。該禁制令

的內容，之所以會限制到擁有同樣觀點的一群人，只是因爲那些違反原先法院所發的禁制令內容的團體成員，剛好都擁有相同的觀點。

我們在檢視一個與內容無關的禁制令時，主要的審查標準在於，該禁制令遭到質疑挑戰的條款，有無爲了維護重大的政府利益，而在必要範圍之外，限制了過多的言論？請參見 Carroll v.. President and Comm'rs of Proncess Anne, 393 U.S. 175, 184。因此，系爭禁制令必須使用經過嚴密設計的管制手段，達成其管制目標。雖然，墮胎診所四周的論壇，的確是屬於傳統的公共論壇，但是，一個具有普遍適用效力的法規（ordinance）和禁制令兩者之間最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爲了促進特定的社會利益所做的立法選擇，而後者則是針對已發生或將發生之違反立法或司法命令的行爲予以救濟，而禁制令和一般性法規相較之下，比較容易產生言論箝制或差別化適用的危險。不過，在禁制令的情況下，比較能夠透過經嚴密設計的方式，針對已經發生的違法行爲，提供比較多的救濟。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所適用的言論自由原則，比起傳統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分析所要求者，應該是更爲嚴格的審查標準。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所認定的政府利益，包括保護懷孕婦女追求合法醫療或諮詢服務的自由，確保公共安全和秩序，以及促進公共道路和人行道的通行自由流暢，保護公民的財產權，確保居住者的隱私等政府所追求的目的，整體來看，確實足以爲一個經過嚴密設計的適當禁制令提供正當化的基礎。

首先，上訴人的站崗糾察行爲是以墮胎診所的病患和該診所員工爲主要對象，而上訴人以站崗糾察進行示威抗議的活動，其範圍也只侷限在墮胎診所四週，在墮胎診所的停車場仍然可以看見和聽到示威者的聲音和行動，加上第一次的禁制令又無法達成其目的，因此，對於該墮胎診所進出口和車道周圍三十六英呎設定緩衝區此一管制措施，衡平而言，不過只是由政府保護病患和員工進入診所的權利和促進道路交通秩序，是在必要範圍內增進政府利益，並未對言論自由施以必要範圍外的限制。是否有必要劃定一個完全的禁制區，或許可容爭辯，但是，即使要適用嚴格的審查標準，也應該多少針對州法院對該爭議之事實與背景的理解，給予尊重。上訴人在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中反對將事實記錄納入，而且從未肯證任何完整紀錄，因此本院必須接受州法院對

證據和證詞所爲的認定，而州法院的認定是認爲儘管早先已有禁制令，但是示威者在墮胎診所出入口附近的活動，仍然干擾了墮胎診所的病患和員工進出，本院對於此一認定，自然予以尊重。

不過，將三十六英呎緩衝區的管制措施適用於維護該墮胎診所北邊和西邊的私人土地的秩序，以便確保自由進出該墮胎診所的權利，則不能說是並未對言論自由施以必要範圍外的限制，而是對於言論自由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因爲，希望進入該墮胎診所的病人或員工，並不需要上述土地。而且，也沒有任何事實紀錄足以顯示，上訴人在該墮胎診所北邊和西邊的私人土地上所從事的活動，乃是阻礙了該墮胎診所的進出，阻礙了車輛行進的交通，或者是造成其他足以妨礙該墮胎診所營運的違法活動。

基於確保該墮胎診所病患的健康和福利的考量，系爭禁制令當中所爲之有限噪音管制措施，並未對言論自由施以必要範圍外的限制。畢竟，在病患接受手術和復原期間，針對醫療機構所在地周圍進行噪音管制，是特別重要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並未要求身在這類醫療機構的病患，應該自行耗費艱困無比的努力，來避免政治示威者所製造出來的噪音。

系爭禁制令針對「可觀察到的影像」所施加的全面性限制，其目的是爲了達成限制對到墮胎診所病患及其家人的威脅，以及減少病患身在墮胎診所期間的焦慮程度和高壓狀態等，就此而言，此一限制措施乃是對言論自由施加了超越必要範圍之外的過於廣泛的限制。本院認爲，針對那些可以被解讀爲威脅或者威脅暗示的標語展示，予以限制，就已經能夠達成上述的管制目的，同時，該墮胎診所也只要將診所的窗簾拉上，就足以保護病患不必受到未經過其同意的標語牌的影響，而無須動用到系爭限制措施。

在本案中，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示威者的言論可以被獨立當做一種應受禁止的言論（例如「挑釁性言論」（fighting words）或者威脅）來看待，本案中示威者也沒有採取任何挾帶暴力的行爲，以致於其行爲無法和物理性的傷害威脅加以區分，那麼，要求在墮胎診所周圍三百英呎內的禁區，不准和該墮胎診所的病患或潛在病患攀談的限制—尤其是必須得到攀談對象同意的要求—就爲了達到政府避免恐嚇和確保進出墮胎診所的自由此一管制目標來說，算是對言論自由施加了超越必要範圍之外

的限制。

再者，就針對墮胎診所員工的住家設定三百英呎的緩衝區，以保護墮胎診所員工住家安寧和隱私此一管制措施而言，系爭管制措施已經超過了要達成此一目的的必要範圍。從本案的記錄來看，並沒有充分的理由，足以對站崗糾察式的示威活動，做範圍如此廣泛的限制。劃定範圍比較小一點的緩衝區，針對站崗糾察式的示威活動做舉行的時間、活動延續時間的長短、人數多寡的限制，似乎就可以達到相同的管制目標了。不過，倘若是在該緩衝區域內利用擴音器進行示威活動，如果示威者的音量影響到鄰近區域的安寧，那麼，政府可以要求示威者降低其音量。

上訴人是系爭禁制令中所指明的當事人，不過，上訴人對於其他不屬於該團體而同屬系爭禁制令條款所提及之「同謀共夥」者，則是欠缺當事人適格。「同謀共夥」此一用語，並不屬於上訴人在質疑系爭禁制令「過於廣泛」時的對象，而且，系爭禁制令中「同謀共夥」的規定，也並未限制結社自由。所謂的「同謀共夥」者，並非被禁止與其他人進行結社行爲，或者加入其他人以表達某一特定的觀點，同時，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也並未保護人民可以利用加入其他人的方式，去剝奪第三人合法權利的這種權利。

總而言之，本院認爲針對反墮胎者在示威活動中施以噪音管制，以及對於墮胎診所進出口和車道周圍三十六英呎設定緩衝區此一管制措施，是在必要範圍內增進政府利益，並未對言論自由施以必要範圍外的限制，州法院所爲之禁制令應屬合憲。至於針對將三十六英呎緩衝區的管制措施適用於維護該墮胎診所北邊和西邊的私人土地的秩序，以便確保自由進出該墮胎診所的權利，則不能說是並未對言論自由施以必要範圍外的限制，就此一管制措施來說，多數判決意見認定爲違憲。最後，有關「可觀察到的影像」的管制措施，以及墮胎診所周圍三百英呎和墮胎診所員工住家周圍三百英呎內不得接近的管制措施，亦屬超乎達成管制目的必要以外的範圍，應屬違憲。基於以上理由，本案多數判決意見決定針對佛羅里達州法院的判決，予以部分維持和部份推翻的判決。

大法官 Stevens 主筆之部份同意部分不同意見書

主席同意多數判決意見認爲針對具有普遍性適用效力的法規，應該和本質上屬司法救濟的禁

制令，適用不同的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審查標準。不過，本席和聯邦最高法院多數判決意見的看法不同之處在於，和立法相比之下，性質上屬於司法救濟的禁制令，應該適用比較寬鬆的審查標準。如同本院先前所述，立法乃是以整個社會爲適用對象，不論個別的個人的可責性，相對地，法院的禁制令，本來就不是針對一般公眾而發的，而是針對特定的個人或群體而來。基於此一區分，禁止在三十六英呎緩衝區之內從事示威活動的法規，可能會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對言論自由的保護，這和一個直接禁止某些團體的成員在類似的緩衝區內從事非法活動的禁制令，可能是合憲的，是有所不同的。

本席認爲，審查禁制令的標準，有兩個主要的面向，首先，禁制令不應該比提供完全的救濟所需，要求更多的負擔，在憲法增修條文的脈絡下，和任何其他情況一樣，該禁制令適當與否，幾乎全然從違法行爲的性質及其重複發生的可能性來判斷，用來決定一般法規是否違憲的審查標準，不應該用來審查禁制令。另一方面，即使禁制令涉及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該禁制令也不應該僅僅描述其所禁止的行爲態樣而已，而是應該包括如何避免未來重複出現的違犯行爲以及如何避免其後果出現在內。在本案中，下級法院法官認定上訴人不僅從事具有侵權性質的行爲，而且也重複違背先前的禁制令內容，應該尊重對事實格外熟悉的下級法官所做的事實認定。

其次，就劃定墮胎診所三百英呎緩衝區的管制措施而言，上訴人針對墮胎診所的病人主動做意見諮詢（counseling）的行爲，是一種和勞工的站崗糾察式罷工示威活動類似的言論表達方式；既然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障站崗糾察式的示威活動，那麼，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應該也就保護上訴人在人行道邊對所有經過的行人主動提供意見諮詢的行爲。不過，上述對言論自由的保護，並不包括濫用對並未做好心理準備和受到俘虜而無逃脫可能性的聽眾的侵擾之嘗試在內，至少，在本案中應該做如此的認定。

至於下級法院禁制令中禁止上訴人從事物理空間上的接近行爲（physically approaching），這個管制措施並未逾越必要範圍。下級法院所頒佈的禁制令，目的是在使墮胎診所員工和病患，能夠免於上訴人對其做出其並不歡迎的接觸和阻撓，尤其是著眼於上訴人過去的行爲，曾經引發該墮胎診所病患比較高的焦慮程度和高壓狀態，對

於病患所要尋求的醫療過程來說因而提高風險此等因素，Stevens大法官認爲此一限制措施尤其適當。所以，此一針對墮胎診所劃定三百英呎緩衝區的限制措施，應該能夠通過基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提出的違憲挑戰。

大法官 Scalia 之不同意見書

本案記錄中有一卷錄影帶，是由該墮胎診所所錄製，而且是由該墮胎診所工作人員所剪接的錄影帶，該錄影帶的內容特別挑出了上述示威活動中最不好的一面。而下級法院正是由於看了這捲帶子，才作出該禁制令。

本席認爲，多數判決意見認定三十六英呎的出入口和車道緩衝區的管制措施爲合憲的立場，不值得贊同，同樣地，本席反對本案多數判決意見認定示威活動所製造的噪音施以管制乃屬合憲的意見。由司法權透過禁制令的方式，創設出三十六英呎的緩衝區，要求某些過去未曾違反任何法律規定的特定團體不得在該緩衝區內行使其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的權利，以及由司法禁制令要求某一特定團體不得違反噪音管制，都是和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基本宗旨相違背的。

根據聯邦最高法院所建立的理論，公共人行道區域是屬於公民通常可以在該處行使其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的權利的「公共論壇」，是毋庸置疑的。在本案中，上訴人主張應該採取針對基於內容所爲的管制措施所適用的嚴格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而墮胎診所則主張應該採取中度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crutiny），來審查系爭禁制令。墮胎診所主張只要該管制措施是屬於針對「時間、地點和方法」所爲的管制措施，而且是基於重要的政府利益而嚴密設計的限制措施，同時保留有其他替代性的言論表達管道，則應該可以認定其爲合憲。不過，本案多數判決意見在這個與墮胎有關的案件，卻是未採取以上兩個審查標準當中的任何一個，而是採取了一個比中度審查標準還要嚴格，但卻比嚴格審查標準還要寬鬆的審查標準，做爲審查本案系爭管制措施的審查標準。多數判決意見認爲對於禁制令不該採取中度審查標準，而根據多數判決意見的說法，本案所採取的新標準，和中度審查標準之間的差別，在於中度審查標準乃是「爲了達成重要的政府利益而予以嚴密量身設計」的，而此案的審查標準，卻是要求「不對言論做必要範圍以外的限制」（burden no more speech than necessary to serve a

significant government interest）。

本案眞正的問題所在，應該不在於中度審查標準，在面對法院禁制令的特殊性質時，是否應該予以修正補充，而是應該在於，基於政策和判決先例的考量，是否禁制令的特殊性質，不足以構成要求適用「基於內容」所爲的管制措施所適用的嚴格審查標準的理由。本案多數判決意見並未考慮此一可能性，本案系爭對象並非法規，而是禁制令，而一個透過禁制令對言論自由施加限制的管制，無論其從名目上看來究竟基於內容所爲的管制措施，抑或內容中立的管制措施，至少仍然應該適用和一般法規所適用的審查標準同樣嚴格的審查標準。

本席提出此一主張的理由有以下幾點：首先，基於內容所爲的管制法規，對於言論自由所造成的危險，在於這類法規可能被設計成正是用來壓抑系爭理念，而非用來促成任何適當的政府目的，而相同的危險，在禁制令的情況下，同樣也是會出現的。雖然，限制言論自由的禁制令，對於內容所帶來的攻擊，並不是直接將內容當做管制對象，而是讓禁制令隨時可以成爲壓制特定看法和理念的手段。當法官准許雇主所提出的聲請，發出禁制令，禁止在勞資糾紛的現場從事站崗糾察式的示威活動時，其所禁止的（法官也知道他是在禁止）是贊成工會立場的觀點。這種可以在特定意識型態的爭議中針對其中一種看法或觀點造成壓抑作用的效果，則不是僅具有一般性適用效力的法規可以達成的效果，除非具有一般性適用效力的法規，直接以基於內容的方式，進行管制，否則無以致之。然而，相對地，在限制言論的禁制令下，幾乎都可以達成此一目的，本案正是這種情形的典型，本案系爭禁制令正是針對以特定議題做爲訴求的個人和團體而發的禁制令，而其目的正是要壓制該等個人和團體的觀點。基於以上理由，本席認爲，禁制令既然是針對特定內容特定觀點加以限制，去壓制特定的觀點，便應該採用嚴格審查標準。其次，由於禁制令是由單一法官所核發，而不是透過立法者制定。通常，法官會因爲自己先前所核發的禁制令不被遵守，而感到不悅。言論自由的權利，不應該如此輕易地受制於單一法官的掌握。再者，由於禁制令的威力往往比一般的法律還要強大，所以應該有更強的安全閥扮演監控的角色。本案多數判決意見努力區分限制言論的禁制令和以內容爲限制基礎的法規兩者之間的差異，但是，多數判決意見卻錯認以內容爲

限制基礎的罪惡，在於其必然會壓抑特定的觀念或看法；究其實際，以內容爲限制基礎的法規，其罪惡之處並不在於其總是會被用來達成思想控制的目的，而是在於其隨時能夠被援用來針對特定觀念或看法，施加箝制作用，而限制言論的禁制令，其罪惡也不低於以內容爲限制基礎的法規。

雖然本席相信禁制令即使在技術上並非以內容爲限制基礎，但限制言論的禁制令，還是危險到足以適用嚴格審查標準，不過，本案系爭禁制令其實根本就是基於內容，甚至是基於觀點所做的限制措施。系爭禁制令只限制反墮胎者的言論，該禁制令把所有禁制令規制對象之外的「同謀共夥」人，也就是碰巧在該受限制的緩衝區中而且與受系爭禁制令規制的團體意見相同的人，全部都列爲禁制之列，這便顯示了法官本身對該立場的反感態度。

其實有許多判決先例，也可以用來支持針對內容中立的禁制令採取嚴格審查標準的立場。在NAACP v. Claiborne Hardware., 458 U.S. 886 （1982）這個判決裡面，本院就曾經說過，不能因爲示威活動會造成少數人的傷害，就禁止示威活動，示威活動中的非暴力因素，仍應該受到保護。

即使適用多數判決意見在本案所創造出來的新標準，在本案也是說不通的。多數判決意見所創造的新標準，指陳必須爲了「重要的政府利益」，才能限制言論。可是，本案中到底有什麼重要的政府利益可言呢？維持交通流暢可以算是重要的政府利益嗎？本案上訴人違反的，不是政府的法律，而是法院所發的最初禁制令。可是，就事實層面來看，上訴人眞的違反了最初禁制令的內容了嗎？本席認爲在本案中似乎都沒人好好檢討這個問題，就直接接受了下級原審法院的看法。其實，上訴人違反最初禁制令的情形，不過就是輕微地影響交通順暢而已，並沒有證據足以顯示，上訴人是故意或企圖製造阻礙，其只有在發傳單或進行站崗糾察時附帶地引起一些措施，那麼就不該用禁制令的形式，只針對特定的團體發布，而是應該適用於所有人。

最後檢討的，是該禁制令是否眞如多數判決意見所說的，並沒有對言論做出超過必要範圍以外的過多限制。如上所述，法院之所以會發出第二次禁制令，眞正的問題就只是在於上訴人的活動減緩病患和員工進出診所的速度而已，如果眞是如此的話，就三十六英呎緩衝區而言，其實法院就有很多其他

的替代方案可以採取，足以避免減緩病患和員工進出診所的速度此一問題的發生，而不需要設定三十六英呎的緩衝區。多數判決意見一方面主張不應該超過必要範圍而做過多的限制，另一方面主張在相關的限制措施上要尊重事實審法院的認定，這是自相矛盾。而且，多數判決意見還指出：因爲上訴人還是可以在離墮胎診所稍遠一點的地方示威，這是典型「時間、地點和方式」的中度審查標準的思考模式，但是，倘若是要採用這種思考模式，則其必須是針對一般人所採取的限制措施，而非如本案系爭限制措施，是針對特定群體所發布的禁制令。

18. Reynolds v. U.S.

98 U.S. 145（1878）

王郁琦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憲法給予被告有權利於審判中和指証他的証人/証物對質；但如果証人/証物的缺席是因為其個人不合法的程序，那麼他就不能投訴。憲法並未保障被告對抗其個人不法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憲法授予被告和指控他的証人/証物對質的權利，但如果他自願地使証人/証物遠離他，那麼他就不能說他有權利。因此如果當証人的缺席是因為被告個人的原因，且他們的証據的提供是透過合法的方式為之，那麼被告不能主張他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受到侵害。

   （The Constitution gives the accused the right to a trial at which he should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 but if a witness is absent by his own wrongful procurement, he cannot complain if competent evidence is admitted to supply the place of that which he has kept away.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guarantee an accused person against the legitimat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wrongful acts. It grants him the privilege of being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him; but if he voluntarily keeps the witnesses away, he cannot insist on his privilege. If, therefore, when absent by his procurement, their evidence is supplied in some lawful way, he is in no condition to assert that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s have been violated. ）
2. 美國主權所及領土的社會組織的法律是不允許多重婚姻的。一個人得否因為其宗教信仰而不用為其反社會行為負責？如果答案是可以，那麼將會使宗教信仰的教條凌駕於法律之上，且允許每個人將自己視為法律。而政府在於此種情況只是表面存在而已。

（As a law of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under the exclusive domi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provided that plural marriages shall not be allowed.Can a man excuse his practices to the contrary because of his religious belief? To permit this would be to make the professed doctrines of religious belief superior to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in effect to permit every citizen to become a law unto himself. Government could exist only in nam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關 鍵 詞

religious belief（宗教信仰）；polygamy（一夫多妻）；the four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the first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Waite 主筆撰寫）

事 實

被告以宗教信仰爲由於猶他州境內結第二次婚，當時他的第一個妻子仍活著，他被判重婚罪，但被告認爲法院有誤審的情況，因而上訴。

判 決

原法院判決並無任何錯誤，應予維持。

理 由

本案的爭點大致可以歸納爲下列幾點：

1. 原判決是否因陪審團人數少於16人而不生效力？
2. 被告針對陪審員所提出的異議是否被不當駁回？
3. 政府針對陪審員所提出的異議是否被不當維持？
4. 本案採用 Amelia Jane Schofield 於先前的審判案件中就同一問題所做成的証詞爲証據是否是不當的？
5. 得否因被告之重婚係爲了履行其宗教責任而判定其行爲無罪？

6. 法院將陪審團的焦點引導至一夫多妻可能造成之結果時，是否是不恰當的？

上列之爭點，以下將就其順序討論之。

1. 就大陪審團而言

本案發生於該州第三管轄區的地方法院。於 1874 年 6 月 23 日通過的「與猶他之法院及司法人員相關的」國會法案，雖有規定該州陪審員的資格以及陪審員的產生方式，但並未規定大陪審團的人數。Revised Statutes 第 808 條規定美國地方及巡迴法院所選定的大陪審團人數須介於 16 至 23 人間，但是猶他的法律則限制地方法院的陪審團人數爲 15 人。本案中的大陪審團共有 15 人，本案的爭點在於本案是適用 Revised Statutes 或是猶他的法律？

首先，按 Revised Statutes 第 1910 條之規定，猶他的地方法院對於與憲法和美國法律相關的案件和美國之地方及巡迴法院有相同的管轄權；但這不表示他們就是美國地方及巡迴法院。他們是猶他的法院，因某種原因被賦予和美國法院相同的權力。有些案子的訴狀（Writs of error and appeals）從該地方法院送至猶他的最高法院，再由該最高法院送至本法院來。其次，Revised Statutes 第 808 條非用以規範所有法院之大陪審團的選定方式，其僅規範巡迴及地方法院，所以，猶他有權力依其所制定的法規行事。

因此，我們認爲原法院在此一方面維持原判的決定並無誤審。

2. 就被告所提出的異議而言

按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規定，被告有權接受公正的審判，而這包括陪審團必須是公正的，一個陪審員的公正性在於其和其未宣誓時一樣的中立公正。本案中，被告質疑陪審員的公正性，即陪審員就待審議題已存有定見。

法院就什麼樣的意見會使陪審員不適格或是否意見該具有惡意或邪念在意見上並不一致；但對於必須有証據加以佐証以及不能純粹是一種印象則是具有共識。如果只是基於假設，不公正並不明顯，則無必要撤換陪審員。其次，有稱一個已形成一定意見的陪審員不可能是公正的。但是，每個陪審員所持的意見未必會造成該名陪審員的不公正。在近代的報業及教育普及的情況下，每個具公共利益的案子，例如必要事項，幾乎會被鄰近地區的居民所關注，幾乎不可能在其中找到之前未曾聽聞且對該事件未有任何印象或意見的陪審員。因此，很清楚地在此種情況下，法院所必須討論的是在法律

上，陪審員原先已形成之意見的本質和強度是否會造成該名陪審員於審判時有所不公正和偏頗。因此，所呈現的問題乃是一綜合法律和事實的問題，和其他爭點相同，就所關切的事實而言，應據証據做審判。事實審法院就該爭點的調查不應被上級法院所撤銷，除非有很明顯的錯誤。和其他申請的新審判聲請案相較，上級法院不應適用較不嚴格的規則，因爲判決乃是依証據所做成的。很明顯地，基於証據，法院已發現陪審團所形成的意見已致使其在法律上不能稱得是公正的。

本案的指控多有關於 Charles Read. 他在預審會上的証詞；他的証詞就整體來說顯示他相信他已形成了其未表明過的意見，但他認爲這不會影響他對証詞的判斷。証據給人的印象是陪審員已對本案有一些假設性的意見，但不會造成不公正的推論。在上級法院對於此類問題的考量上，我們不應該不顧我們依經驗經常觀察到的事實，即陪審員並不常因其已形成的意見而尋求退出，於審查會時，結果是沒有眞正的不適格存在。在此類案件中，當受測驗時，陪審員的行爲通常較其言語能說明其個人的個性。以下可見，但是不能夠總是按紀錄做延伸。因此，上級法院必須小心，除非是很清楚的案件，否則不要基於事實問題推翻判決。爭點的確定視異議者而定。除非他能夠証明此類意見確實存在於陪審員中而致使其不公正，否則陪審員不需被撤換，且法院的拒絕並無錯誤。一個人未表明其意見的事實只有當其意圖表示其未形成任何會其使其不適任的意見時才顯得重要。如果一個確定、具決定性的意見已形成，那麼他將不適任，即便他未表明該意見。

3. 就政府所提出的異議來說

本案的問題並不在於檢察官是否有權於預審會時審問陪審員有關於他們生活中一夫多妻的事項。針對該些問題並無任何人有意見，只有對法院就該些問題之回覆的異議所做成的判決有意見。從証詞來看，很明顯地所有受指控的陪審員他們正或曾經有過一夫多妻。不用說這一個陪審團將不可能完全沒有偏見，而這將是一個指控陪審員之公正性的有利原因。但是，判決不會因此而被駁回。當陪審員是不適格的且適當地被排除掉後，重點將不在於那一種形式的異議被駁回。在美國法院中所有的異議都有法院在沒有審查員的協力下進行的（Rev. Stat. sect. 819），而且未有人向我們提出猶他法院的作法有任何不同之處。

4. 就允許採取 Amelia Jane Schofield 在不同案件但就被告相同的違法行爲所做成的誓詞作爲証據一事而言

憲法給予被告有權利於審判中和指証他的証人/証物對質；但如果証人/証物的缺席是因爲其個人不合法的程序，那麼他就不能投訴。憲法並未保障被告對抗其個人不法行爲所造成的結果。憲法授予被告和指控他的証人/証物對質的權利，但如果他自願地使証人/証物遠離他，那麼他就不能說他有權利。因此如果當証人的缺席是因爲被告個人的原因，且他們的証據的提供是透過合法的方式爲之，那麼被告不能主張他爲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受到侵害。此一作法，就目前來說，很少被違背，它主要是基於共同的誠實原則，以及適當地管理下將不會傷及任何人。

規則如此，問題變成一個事實問題，主要被設定爲對次級証據的採用。就這方面，於文書內容的次級証據得被採用前，它如同是書面文書証據力喪失的問題。在 *Lord Morley* 一案，它似乎僅被事實審法院認爲是一個問題，而不受拘束於錯誤或上訴；但沒有認定它有必要在本案中談到那麼遠。我們並不急於說在以下法院的調查至少對於陪審團就事實問題的判定有影響，且不應該介入，除非錯誤很明顯。

証詞顯示缺席的証人是被告的第二任妻子；她曾於其他案件中就同一問題作証；她沒有家除了和被告所組成的以外；於法院的傳票發給她前，但基於錯誤，她被稱爲 Mary Jane Schobold；有一名私人地認識証人的公務員曾至被告的家中送傳票，且在到他家時，該名公務員不是稱 Mary Jane Schofield 就是 Mrs. Reynolds；被告告知他她不在家；然後他問被告，你可告訴我她在那裏嗎？被告的答覆是不；你自己找出來；然後該公務員談論到她給他製造麻煩，而她也會給自己製造麻煩；被告回答不會，因爲她沒有收到傳票，而在後面的談話中，提到她不會在本案出現。

在審判開始後法院發現傳票上的名字有誤，上記有正確名字的傳票於晚上九點發給該証人。該名公務員再次去該名証人的家，且見到被告的第一個妻子。她告訴他被告已不在長達三個星期。他隔天早上再度造訪且未找到地或者藉由尋問鄰居而取得她在那兒的訊息，並將結果告訴法院。當天早上 10 點案子開始後；事實很明顯，法院判定証人在先前所做成的証詞得做爲証據。

這並沒有錯誤。被告自己個人

在法院上表示當出席時，如果他有完全的機會說明証人的缺席或者於証詞中否認他隔離了証人。很明顯的，其負有舉証責任証明他並未故意地隱瞞或隔離証人。如果他可以做必要的說明且於訴狀中如此地做，那麼他認爲依據指控他的案件的缺點好過於嘗試發展他自己的強點是一項推論。就証詞來看，很明顯地判決不當被駁回因爲二手証據被採用。

這使我們必須考量先前所做的証詞的內容及呈現在陪審員面前的証據爲何。

那是在不同的案件中就同一人、同一違法行爲所爲的証詞。實質上是就相同的訴因所爲的証詞。被告於証詞所成時在場，且有機會進行交叉詰問。這使得案件明顯來看是合於規則的。案件被完全的引用在 1 Whart. Evid., sect. 177。

對於 Mr. Patterson 宣讀先前的誓言的異議似乎無必要因爲他所宣讀的內容並不是眞正的証據，但因爲採取二手証據的基礎未被提出。此異議雖已提出但並不可採。

5. 就以宗教信仰或責任爲抗辯事由而言

於初審時，被告証明當被控重婚時，他已經爲一般稱之爲摩門教的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教的教友多年且信奉他的教條；教會的教條認爲教會的男姓教友有義務在情況允許的條件下實行一夫多妻，…這個義務是爲教會的教友認爲神聖起源的書所命令的，且於其中聖經亦說明教友所信仰的一夫多妻乃是由與摩門教的創立者和先知 Joseph Smith 相關的 Almighty God 命令男姓教友應爲的；在情況容許下如果男性教友拒絕實行一夫多妻那麼他將會受到處罰，此種處罰主要是被罰下地獄。被告亦証明他已取得教會有關當局的同意才結第二次婚的；…… Daniel H. Wells，一個有權在該教會舉辦婚禮的人，上述的被告與名爲 Schofield 的一女子結婚，且這樣的婚禮儀式乃是按教會的規定舉辦的。

依據此証據，他要求法院告知陪審團，如果他是按教會的規定及其信仰而重婚時那麼他是無罪的。這個請求被拒絕，法院指出一定存有犯罪動機，但如果被告，在正確的宗教信仰的影響下，在受鼓舞之下，如果你要求，它是正確的，—故意地結第二次婚，但第一任妻子仍活著，邪惡意圖的良知欲望—想瞭解他已犯罪的欲望—並不會原諒他；但法律已無情地於此類案件中暗示了犯罪的意圖。

然而，宗教信仰是否得正當化一個人的違法行爲？這要求並不

有關於國會所制定的法律，而是有關於一個有過失、明知違反已執行多年的法律的人，且其持有一認爲法律有錯誤的宗教信仰。

國會不能通過法律規範一個地方的宗教自由。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明白地禁止此種立法。就國會的干預而言，宗教自由在全美各地是受到保障的。本案所要決定的問題在於現存考量下的法律是否爲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拘束。

憲法並無明定宗教一詞的意義，因此我們必須說明它的意義。正確來說，應該是宗教自由所保障的。

在憲法被採行之前，在美國及一些殖民地不止企圖去建立宗教，亦企圖建立原則和規則。人們因爲支持宗教或某特定教派而被不情願地課稅。未參加公開的禮拜或持有他種宗教意念則會遭受處罰。這個一般性主題的爭議在美國許多地方都有，但最後終於在維吉尼亞州達到高潮。在 1784 年，House of Delegates 考量制定有關於信仰天主教的教師的草案，使它延期到下一個會期， 且指示該草案應該發行及散布，且在下一個議會會期時要求人民表示意見尊重採行此一草案。

這引發一片反對意見。其中，Mr. Madison 準備了 'Memorial and Remonstrance'，於其中他指出宗教或者是我們對上帝的責任並不在政府權限內。在下一個會期時，該草案不僅未通過，反而，由 Mr. Jefferson 所擬的與宗教自由有關的草案通過了。在此一法案的前言中界定了宗教自由 ；且在朗讀“政府運用權力干預一個人的思想且在預設意圖爲惡的情況下限制原則或理念的發聲或宣傳是一件破壞個人宗教自由的謬見”後，宣布“當原則爆發破壞和平和善良秩序時則爲政府該介入的正當時機”。上述的話說明了教堂及政府的本份。

在該法通過一年後，會議集會以準備制憲。Mr. Jefferson 並不是該會議的成員，當時他乃是法國的部長。當他看見憲法草案時，作爲一個朋友，他表示他很失望沒有在條文中見到有關於宗教自由的規定。（2 Jeff. Works, 355）但仍然原意接受該草案之原貌，並相信人民的良知及誠信會是另一個好的機制。1 Jeff. Works, 79. 五個州於採行憲法時建議增修憲法。在第一次國會議會中憲法增補條款被提出來。它符合宗教自由提倡者的觀點，且之後爲 Mr. Jefferson 所接受，其言：“宗教只是人和上帝的關係；一個人並不因其信仰而對他人有責任；政府的立法權僅及於行

爲，而不及於思想，--整個美國人民的行爲主張他們的立法機構不能夠制定有關於設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的法律，因此在教會和國家間建立了一道區隔”。國會無權力立法規制思想，但卻得規制有違社會責任或秩序的行爲。

一夫多妻一直是北歐及西歐國家所憎惡的，且直到摩門教的建立，它一直是屬於亞洲及非州人的專利。在習慣法中，重婚是無效的，且從英格蘭的早期歷史來看，重婚乃是一種反社會行爲。在宗教法院建立後，且直到 James I.時, 重婚會遭到這些法庭的處罰，不只是因爲它違反宗教權，且是因爲根據宗教法庭自民事法庭分離而言，教會被認爲是最適宜審判婚姻訴訟及侵害婚姻權的行爲，就如同民事法庭被認爲適合解決遺囑訴訟及死者之不動產之問題。

根據 James I.法律（c. 11）, 如果於英格蘭或威爾斯犯法，則會在民事法院受審判，且刑罰是死刑。此法只限於英格蘭和威爾斯，在殖民地則受到修正。和目前我們正在受理的案件相關的很重要的事實是於 1877 年 12 月 8 日，通過的法案已建立宗教自由，且在維吉尼亞州的議會提出憲法增補案“每個人依良知之支配皆有平等、固有及不可剝奪之宗教自由”。該州的立法機關大大地執行 James I.法律，包括死刑，因爲如同於序文中所提的，是否大英國協的法律處罰重婚或一夫多妻曾一度被質疑。從那時至今，我們認爲較安全的說法是在美國的任一州未曾有過一夫多妻並不是反社會行爲的說法，且是在民事法院的權限範圍內且或多或少都會受懲罰。於上述的諸多証明之下，要相信憲法的宗教自由保障企圖禁止與和重要之社會生活相關的立法。婚姻，一種本質上非常神聖的義務，雖然在大多數的國家被視爲一種契約，且通常受法律規範。社會因其而建立且衍生出政府所必須處理的社會關係、社會義務和責任。事實上，如果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被允許，我們或多或少會發現人民的政府所倚賴的原則。Professor, Lieber 指出一夫多妻會產生宗教性的原則且當其適用於廣大的社會時，會將人們束縛於字典式的專制系統中，而一夫一妻則不會有此種原則。Chancellor Kent 觀察到這項言論的相當地突出及深切。一群一夫多妻論者有時在不干擾其周圍人的情況下存在；但不容懷疑的是除非受到某種形式規章的限制，否則政府是有正當理由有權力決定在其主權範圍內社會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制。

在我們看來，系爭條款乃是在國會立法權力範圍內，在美國主權所及的領土內乃是合憲的且有效。因此，本案所要決定的問題是一夫多妻制作爲宗教信仰之一部得否因此而免除國家法律的規範。如果是如此，那麼未將一夫多妻視爲宗教信仰之一部者，將會被判有罪並受到處罰，而那些將一夫多妻視爲宗教信仰之一部者則不會。這將會形成另一個新的犯罪構成要件。法律之目的在於規範行爲，它們不能干預宗教信念及思想，但可以干預宗教行爲。假定一個人相信活人祭是一種必要的宗教儀式，那麼政府是否就不能干涉此種儀式？或者一個妻子基於信仰相信在於其丈夫墓前自焚是她的責任，那麼政府是否就無權干涉其行爲？

美國主權所及領土的社會組織的法律是不允許多重婚姻的。一個人得否因爲其宗教信仰而不用爲其反社會行爲負責？如果答案是可以，那麼將會使宗教信仰的教條凌駕於法律之上，且允許每個人將自己視爲法律。而政府在於此種情況只是表面存在而已。

故意通常是犯罪的構成要件，但不必然預設每個人都需要知道他的行爲會產生什麼樣的法律效果。本案中被告知道他已經結過一次婚以及他的第一任妻子仍活著，他也知道重婚是法律所禁止的。因此，當他結第二次婚時，他是知道他的作爲是違反法律的。違法是犯罪。每個構成犯罪的要件都被實行且是明知故犯。不知事實有時可能會被視爲缺乏故意的証據，但是不知法律則不是如此。本案中被告唯一的抗辨事由是他認定法律不該介入。它關切的不是他的信念是他信仰的一部分：它仍然是信念，只是信念而已。

在 *Regina* v. *Wagstaff*（10 Cox Crim. Cases, 531）一案中，一個生病的小孩的雙親，因爲他們的宗教信仰告訴他們他們所爲的醫治方式是有效的而未尋求醫師的診治，被認定並不構成殺人罪，但結果將會是相反的。如果小孩因其雙親所實施的節食治療而死亡，該對雙親會實施節食治療主要是因爲他們的宗教責任要他們不要給小孩食物。但當如果是明知故犯的行爲，認定行爲得因爲一個人相信他所違反的法律不存在而不需受懲罰是危險的。我們相信沒有任何這樣的實例發生過。

6. 就關於引導陪審員對於一夫多妻之結果的考量的指控而言

投訴的內容如下：

“在本案撤銷你的責任方面，我不認爲你應該考量上當的無

辜者所面臨的情況是怎樣的這件事是不適當的（improper）。當本異議持續發燒時，他們增加，存在著單純的婦女和無辜的小孩。將會有受害者；當陪審員會盡到他們的責任時，這類的案子會發生在猶他州，這些証人會激增且散布於各地”。

當法院訴諸於陪審團的熱忱或偏見時，就當被責難且當上級法院的公正責任要求其必須注意到不該有該種錯誤，我們並未見到任何本案中投訴內容的正當理由。國會在 1862 年（12 Stat. 501）預見將重婚入罪化是合適的。會如此作的原因主要是因爲多重婚姻可能隨之而來的結果。法院所有的作爲只是要陪審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所爲的犯罪行爲的特點。並未訴諸於熱忱或偏見。根據被告所做的表示，他違反了他被指控的犯罪的法律規定並有罪；且法院的作爲沒有使陪審團偏離本案的爭點，而是有切中爭點；不是要使他們不公正，而是要使他們公正。

在經過仔細的思考後，我們認爲原法院並無任何錯誤。

維持原判。

19.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k Society of New York, Inc. v. Village of Stratton

_U.S._（70 USLW 4540）（2002）

黃義豐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史塔頓村的規約中規定：從事挨戶訪問活動者，若未事先向村長登記並取得許可，構成輕罪。此種規定，若適用於宗教的傳教行為、匿名的政治性言論，及分發傳單，違反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The ordinance of the Village of Stration's provisions making it a misdemeanor to engage in door-to-door advocacy without first registering with the major and receiving a permit violate the First Amendment as it applies to religious proselytizing, anonymous political speec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andbills. ）

關 鍵 詞

ordinance（鄉鎮市規約）；Jehovah's Witness （耶和華的見證人）；First Amendment（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canvasser（兜攬人員）；solicitation（招攬人員）；free speech（言論自由）；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宗教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出版自由）；intermediate scrutiny（中度審查）。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Stevens 主筆撰寫）

事 實

本件上訴人之一爲“紐約聖經瞭望台協會”（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Inc. ），它負責協調“耶和華的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教會在全美國的傳教活動，並出版聖經及宗教出版品，且廣爲傳發。另一上訴人爲“俄亥俄・威爾斯耶和華的見證人聚會所”（Wellsvill, Ohio, Congregation of Jehovah’s Witnesses, Inc.），它負責監督其下五十九個團體會員的傳教活動，這些會員屬於俄亥俄州的一部分，包括本件被上訴人之一的史塔頓村（the Village of Straton）。上訴人免費提供宗教刊物給有興趣的人閱讀。他們聲稱他們並不要求分攤或訂購任何商品或服務，但他們接受捐款。

上訴人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俄亥俄州南區）對史塔頓村及該村村長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禁止該村第一九九八之五號村規約中數條規定之執行。該號規約係關於在該村內私人財產未經邀請而自行招攬的管理規定。上訴人起訴狀主張：該村之該規約侵犯其憲法上的數種權利，包括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聯邦地方法院開庭審理，並就該規約如何執行及對上訴人有如何影響之證據，加以調查。

該規約第一一六・０一條規定：禁止兜攬人員或其他人，如未先依第一一六・０三條之規定取得許可，不得進入私人住居所，去推動任何事務（promoting any cause）。該條規定，任何兜攬人員，如有意要進入私人之財產從事促進某一事項，必須先向村長辦公室申請，取得“招攬許可”（Solicitation Permit）。取得此許可，並不收費。通常，任何申請人祇要填載詳細的“招攬人員登記表”後，就會發給招攬許可。如此兜攬人員就可以進入他在登記表所列入的私人財產，但兜攬人員必須隨身攜帶該許可證，且如果警察或居民要求時，應出示該許可證。該規定亦於第一一六・０六條詳列得拒絕發給許可或得將許可撤銷的六種事由，但由記錄顯示，在本院判決前，並沒有任何人被拒絕發給許可，或發給後又被撤銷。上訴人並未曾去申請許可。

該規約另有一條程序規定：縱使持有許可者，居民亦得禁止招攬。此條規定，上訴人並沒有加以質疑。如果居民向村長申請“不得招攬登記表”（No Solicitation Registration Form），並且掛上“不得招攬”（No Solicitation）牌子在他的財產上，任何未經邀請的兜攬人員即不得進入該財產，除非該“不得招攬登記表”上有特別授權容許。史塔頓村共有二百七十八

位居民，但僅三十二位申請“不得招攬登記表”。依記錄來看，每個登記表上列有十九種建議例外之人員。例如有一個登記表上，有一位居民勾選十七種例外之人員，因此，僅將“耶和華的見證人”及“政治性候選人”排除在受邀請之兜攬人員之外。雖然耶和華的見證人並不將他們自己視爲招攬人員，因爲他們對於他們的文宣品或教材並不收任何費用，但在審理中，教會的領導人表示，他們尊重村中“不得招攬”的牌子。他們亦表示，由於他們的行爲源自聖經中授權他們傳教，所以他們未去申請許可，他們在上訴狀中表示：“如果爲了傳教，而向村長申請許可，我們覺得幾乎是對神的一種侮辱。”

上訴人提出一些證據，用以證明該規約係村長敵視其等傳教行爲之產物，但聯邦地方法院卻採信村長的證言，村長證稱：該規約之設計，是要保護村內居民的隱私權，尤其是要保護居民免受歹徒的欺騙。聯邦地方法院判決認爲：該規約的規定，對於上訴人及商業或政治性的兜攬人員，一律適用。

聯邦地方法院維持該規約大部分的規定，認爲規約並非對於言論內容加以管制，並未侵犯上訴人於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權利，因此規約合法有效。但聯邦地方法院亦要求對於下列三點規定，於適用時應做限縮解釋。第一點：第一一六．0三條（b）項（五）款規定：任何申請人必須列明每一位他想拜訪的居民的特定地址。法院認爲此規定可能無效，但因爲村同意附加列明有意願之居民的表格，此缺點因此已補正。第二點：法院認爲：如果上訴人僅說明他們的目的爲耶和華見證人的傳教行爲，應得認爲已符合規約第一一六．0三條（b）項（五）款之規定。第三點：規約第一一六．0五條規定：限制兜攬行爲之時間在下午五點以前。聯邦地方法院認爲：此種規定形式上即爲無效，應改爲規定：“於日間的合理時間”。由於村亦同意照改，聯邦地方法院判決：此規約合憲有效，亦適用於上訴人，因而駁回上訴人之訴。

聯邦上訴法院（第六巡迴區）維持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聯邦上訴法院認爲：該規約並非針對言論內容、且對所有之招攬人員一律適用，因此僅受“中度審查”（intermediate scrutiny）。上訴人曾引用本院一九九0年的 Employment Div., Dept. of Human Resources of Ore, v. Smith 案中的意見，主張該規約影響到他們的宗教自由及言論自由。上訴人亦引用本

院，一九九五年 McIntyre v. Ohio Elections Comm'n 案的意見爲依據，主張該規約太過於廣泛，因爲它妨害上訴人得匿名散發小冊子的權利。但聯邦上訴法院均不予採信。對於上訴人前一主張，聯邦上訴法院認爲上訴人所引用之 Smith 案中之意見，僅爲該案中之附隨意見，不具有拘束力。對於上訴人後一主張，聯邦上訴法院之理由爲：對於每次挨户訪問的行爲，可以要求兜攬人員表明他們自己的身分。聯邦上訴法院因此判決：村所要促進之利益，即保護居民免於詐欺與不當的干擾，以及村所要避免的危害，即避免嫌犯藉名爲兜攬人員欺騙居民，雖非絕對無法予以抵擋，但已足以使該規約具有正當性。聯邦上訴法院亦將本案與以前保護耶和華的見證人傳教行爲案例加以區別。因爲以前的案例所涉及的，如：一九四三年的 Martin v. City of Struthers 案，涉及禁止理念的傳播；一九四０年的 Cantwell v. Connecticut 案，涉及規約中，讓許可證是否簽發，由地方自治團體之官員裁量。

判　決

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應予廢棄，本案發回後，應依本院之意見審理、裁判。

理　由

I

本案上訴人主張：上述村規約將其等從事挨户訪問活動者，如未事先向村長登記並取得許可，構成輕罪，侵害其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權利。經由此項質疑，關於挨户訪問兜攬之規則，我們不但要考慮它是否適用於宗教之傳教行爲，亦要考慮它是否適用於匿名的政治性言論及分發傳單。

本案的問題爲：村（或自治團體）之規約要求任何人因政治性事由，從事挨户訪問活動，須事先取得許可，且如對方要求時，即應出示含有其人姓名之許可。此種規約，是否侵犯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保障、所賦與之得匿名分發小冊子及匿名與人對話的權利？

II

過去五十多年來，對於從事挨户訪問、兜攬或分發小冊子者，若加以限制，本院判決認爲該限制無效。或許是歷史上的偶然，大部分此類質疑侵犯聯邦憲法增條文第一條之案件，係由“耶和華的見證

人”所提起，因爲他們的宗教強制要求挨户訪問兜攬。正如在一九四三年的 Murdock v. Pennsylvania 案，我們提到，耶和華的見證人主張：“他們要追隨保羅，公開傳教，挨家挨户去傳”，聖經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節說道：“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耶和華的見證人遵照聖經上述指示，他們如此做，他們相信這是服從神的訓誡。但是由於他們缺乏重要的財務來源，如果有關的規定對於他們挨户訪問活動造成負擔，將重大的降低他們的傳教活動。

雖然本院過去所涉及耶和華的見證人的案件，一大部分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或大戰期間所判決，該等案件與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不同，該類案件之判決，雖不能直接適用於本案，但仍可做爲本件上訴人主張史塔頓村規約違反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本院考量的歷史及分析上的背景。此類案件雖然所涉及的僅爲微罪，但卻觸及最重要的憲法問題，此等問題關係到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以往之判決，有些結論，可以用來指引本院審酌系爭之規約是否合憲。

第一，以往之案件，強調言論之價值。如前述之 Murdock v. Pennsylvania 案，本院提到：分送宗教性的小冊子，是一種古老的傳教方法，其古老的程度猶如印刷史。它亦是多少年來各種宗教運動中強而有力的活動。此種方式的宗教活動，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中所占之重要性，與在教堂中之禮拜及牧師之傳教，同等重要。它應受保護之程度，應與其他更正統或傳統的宗教儀式一樣。它應受保障之程度，亦應與保障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一樣。

其次，以往的案件亦廣泛的論及，挨户訪問、兜攬或分發小冊子，做爲傳播理念的方法，在歷史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例如：在一九三九年的 Schneider v. State（Town of Irvington）案，上訴人亦是一位“耶和華的見證人”，她因爲去挨户討問，並留下書刊及印刷品，且無許可，而被判罪。當時爲本院撰寫判決的大法官羅勃特（Justice Roberts）說道：“傳播意見，分發小冊子被證明是最有效的方式。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到人們的家中去分發小冊子。對於此種方式之溝通意見，如果規約要加以檢查，而濫用檢查在英國引發爭執，導致在我們的憲法中明文規定新聞自由之原則。如藉由執照許可制度而實施檢查，將使自由或無阻礙的分發小冊子變爲不可能，如此將打擊憲法所要保障的核心。”

上述早期的案件，雖然強調挨户訪問、兜攬及分發小冊子的行爲，在我們自由及公開討論的憲法傳統中，占有重要的角色，但上述早期的案件，另外亦承認：鄉鎮基於某些利益，可以訂立某些規定，特別是對於涉及金錢之招攬行爲。例如：一九四０年的 Cantwell v. Connecticut 案中，本院判決認爲：規約如果要求耶和華的見證人於挨户訪問、招攬前，須先取得執照，該規約應爲無效，因爲執照是否發給，由市政府官員裁量。我們在該案之意見承認：“州爲了避免其州民被詐欺性之招攬行爲所騙，得要求進入社區的陌生人，在准其以任何目的公開募款前，要表明其身分及其經授權而得爲該行爲。”同樣地，在前述之 Martin v. City of Struthers 案，本院承認：防止犯罪可以做爲此類規約的一種正當利益，本院亦提到：“竊賊經常喬裝爲兜攬人員，有時候，他們可以藉此去發現房屋是否爲空屋，如爲空屋則進而行竊，有時候，他們係爲探索房屋狀況，以備下次再來。”雖然承認此等利益具有正當性，但我的判決先例明確表示：對於上述之鄉鎮市的正當利益與規約對個人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權利之影響，須加以衡量。我們必須仔細檢查受質疑之規定其影響之情形，也必須衡量所有的情況並評價支持該規定之理由。

最後，上述的案件顯示，耶和華的見證人反對管制言論之各種努力，其爭執的不單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權利。如在前述之 Martin 案，將各種被廣泛利用做爲溝通的方法加以分類後，本院簡要的認爲：“挨户分發傳單，對於財務不佳之小老百姓非常重要。”

面對如史塔頓村這種規定，小老百姓（little people）可能要面臨沈默以對的危險，這樣的小老百姓，不僅耶和華的見證人而已，本院以往的案例，亦有許多涉及非宗教性的言論者。例如：一九四五年的 Thomas v. Collins 案，此案的問題爲：一位勞工領袖，要向其未來的工會會員發表演說，是否須先取得許可。經過審閱上述關於耶和華的見證人之案件後，本院說道：

“原則上，要公開演講，若須先登記，與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是矛盾的。

如果行使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之權利，不得被認爲犯罪，我們亦不認爲行使此等權利，可以藉由要求事前登記之設計做爲行使此等權利之條件，並以此條件做爲事前限制行使此等權利之基礎，且對於違反此限制命令者課以刑罰，而得以實現。祇要行爲人所爲者，不

超越行使其言論自由或集會自由的程度，他應免於受到限制。如果有人因爲勞工事由尋求支持，而被要求先登記做爲其公開演講的條件，同樣地，若有人因爲社會、商業、宗教或政治上之事由而集會尋求支持，亦會被要求先登記。我們認爲：要求任何人在他從事公開的演講，就其合法的運動，尋求支持，須先登記者，與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規定是相矛盾的。”

雖然此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案件，可以指引我們審理此案，但它們卻無法回答本件雙方一爭執的一個初步的爭點，此即本件應採取何種審查標準來判斷該規約是否合憲。但我們發現不必要去解決此一爭議，因爲由本件之規約所影響之言論之範圍及其規定之性質，可以很清楚的認定：聯邦上訴法院維持該規約有關之規定是錯誤的。

III

史塔頓村辯稱：其制定該規約，係基於三種利益：防止詐欺、防止犯罪及保護居民的隱私權。參酌我們以前的判決先例，我們並不難認定：上述三種重要的利益，村可據以制定某些—關於招攬行爲之規定。但我們亦要注意該規約所涵蓋之言論之範圍，及就受影響之言論及村規約所要維護的利益間，是否有適當的加以衡量。

史塔頓村規約規定：禁止兜攬人員爲了任何事由進入私人住居所，除非他領得許可，且被拜訪的居民並未掛上“不得招攬”的牌子。如果此種規定，解釋上僅適用於商業活動或募集金錢者，此種規定或許可說符合史塔頓村爲保護居民隱私權及防止詐欺之利益，但是，雖然史塔頓說明爲了上述利益而制定上述規定，但它亦不爭執此規定應做限縮解釋。相反的，史塔頓村在執行其規約時，無疑地，將此規定適用到許多非商業之兜攬人員，他們係從事各種不同的事由。實際上，因爲在提供給居民的“不得招攬表”中，兜攬人員包括“螢火女孩”（Camp Fire Girls）、“耶和華的見證人”、“政治性候選人”、“萬聖節時的湊熱鬧者”（Trick-or Treater During Halloween Season）、“史塔頓教會所屬人員”。史塔頓村的規約不但適用於宗教性之事由者，亦適用於政治性活動。它亦將適用於偶爾向其鄰居拉票的居民，或爲了僱請更有效率的垃圾收集員、徵求支持而來按門鈴者。

由於該規約所涵蓋的言論範圍非常廣泛，自然的會與憲法發生

關係。該規約實具有侵犯性，它不但侵犯了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所要保護之價值，亦侵犯了自由社會的理念，因爲，若依該規約，縱使涉及日常公共的話題，任何一位居民若有何話要對其鄰居談，他須先向政府告知，並取得許可，才可以說。縱使村長辦公室簽發許可證，是事務性的工作，發給亦非常迅速，申請人亦不用付費，但此種要求要發表言論者須取得許可之法律，嚴重背離了我們國家之傳承與憲法之傳統。以下三個事例，可以明確的說明此種許可要件之禍果。

第一：從我們以往的案件其中涉及分發未簽名之傳單者來看，顯示有相當大量的人他們匿名的支持某些事項。人們希望匿名的原因，可能懼怕遭到經濟或官方的報復、怕在社交上遭到排斥、或者祇想要儘可能的保持個人的隱私。如果要求兜攬人員在向村長辦公室申請許可時，要表明其身分，且如遇到公開的檢查時，要表明其身分及許可，必然的結果就是放棄匿名。聯邦上訴法院判決中提到，如果有人挺身而出來支持其一事項或分發傳單，且他們願意被居民所知，可以顯示他們對該團體或事項的忠誠，此雖爲事實，但聯邦上訴法院卻錯誤的認定：該規約與匿名之利益沒有關係。聯邦上訴法院（第六巡迴區）之理由，若從本院一九九０年 Buckley v.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Foundation, Inc. 案之判決來看，是不能成立的。在 Buckley 案，上訴之傳播人員，面對面的向人尋求簽名，但被要求要帶徽章，本院認爲此種須帶徽章之要件應爲無效。雖然傳播人員過去需要表明他們的身分，但此一事實，仍不會使我們就因此不審酌傳播人員維持匿名的利益。在史塔頓村，陌生人在面對居民，若一定要堅持隱匿其名，該規約可以阻止這些陌生人從事非普通性質事項的兜攬行爲。此種阻止，在某些情況下也許正當，例如：州有特別的利益，以保護創制權行使時投票程序的公正，又如：防止商業上詐欺行爲之利益。但本案中，史塔頓村的規約，其所涵蓋的太過廣泛，包括與商業行爲無關的非普通性質之事項，或與保護選舉程序無任何一點利益關係的非普通性質之事項。

第二：要求取得許可，做爲行使發言權之先決條件，係對於具有宗教或愛國觀點之人士某些言論課以外在的負擔。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一些案件，可以強烈的顯示，有許多人因爲宗教上的顧忌，阻止他們去申請這樣的許可。另外，有許多愛國的人士，他們雖

然確信他們有憲法上的權利，可以從事挨户訪問、不受拘束的討論，但若要向小小的官員申請許可才能發表言論，他們寧可選擇沈默。

第三：有許多自然發生的言論，將被該規約有效地加以禁止。一個人如果他決定利用假日或週末，去積極從事政治運動，通常不會等到先去申請、取得必要的許可，才去開始分發傳單。甚至於一自發性的決定，要誇過街道，去鼓勵鄰居投票反對村長，若未事先向村長取得許可，亦無法合法的實現。從這方面來看，該規約猶如本院一九三六年 Grosjean v. American Press Co. 案中，被宣告無效的爲發行刊物的執照稅（the circulation licensing tax）。在 Grosjean 案，當討論到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出版自由條款之歷史時，本院說道：“所要防止的弊端，不祇限於村新聞的檢查，亦包括政府的任何行爲，祇要該行爲可能阻止對公共事務之自由及全面性之討論者，均屬之。因爲要使人民能很理智的行使他們做爲公民的的權利，自由及全面性的討論公共事務，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件之規約，應被認爲無效，不僅係由於其規範對象太廣及其性質爲史無前例，我們的結論，主要的，認爲此規約不能通過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審查，係由於它並不符合史塔頓村所說的利益。縱使防止詐欺之利益，可以適當地支持該規約可以適用於商業交易或募集金錢之行爲上，該利益仍無法用於支持該規約可以適用於上訴人、政治運動者，以及其他因非普通事項而尋求支持者。

雖然史塔頓村另辯稱：該規約仍應認爲有效，因爲它還有兩種利益，即保障居民的隱私權與防止犯罪。

關於前者，該規約第一０七條規定，可以掛上“不得招攬”的牌子，此條在本案並沒有被質疑，再加上居民有權拒絕與不受其歡迎的訪客談話，如此，似乎對於無意願之聽者提供充分的保護。不論來訪者是否持有許可，若其爲未受邀請而來敲前門，所造成的困擾都是一樣的。

關於後者，或許有人認爲，由於沒有許可，可以阻止嫌犯來敲門及進行不在規約所涵蓋的談話，但此種看法，似乎不能成立。例如：嫌犯可能藉名來問路，或請求許其使用電話，或喬裝爲地政測量員或人口普查員。他們亦可能以假名登記卻免受處罰，因爲該規約中並沒有規定要查證申請人之身分或請其提出其所屬機關之文件。尤其甚者，在下級審，史塔頓村並未主張

防止犯罪之利益，亦缺乏證據或記錄，以顯示特定的犯罪與挨户訪問、招攬行爲有關。

由本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之判決意見，重複顯示，與本件上訴人相同之宗教人士，免於微罪之追訴。該等判決意見，反映本院對於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各種自由之評價，此與本案有關。以前具有價值之判決，當時激勵追求民主的人民，起而奮戰，防衛各種自由，以免於受極權主義的攻擊。此一現象，迄未改變。此激勵本院今日的判決。

20. Furman v. Georgia
408 U.S. 238（1972）

王玉葉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在大量死罪案件中只有極少數案件被判處死刑，且主要針對特定少數族裔，此種死刑之適用係武斷、恣意且具歧視性，因此構成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及第十四條。

（Death penalty constituted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and did violate the Eigh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becaus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nalty was discretionary, haphazard, and discriminatory in that it was inflicted in a small number of the total possible cases and primarily against certain minority groups.）

關 鍵 詞

capital punishment（死刑）； death penalty（死刑）；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Eigh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Fourteen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excessive and unnecessary penalty（過度且不必要之刑罰）；*stare decisis*（判例拘束原則）；judicial self-restraint（司法自制原則）。

〔法庭意見（Per Curiam）：無法官個人具名〕

事 實

本案將喬治亞州與德州三件死刑案件合併審理。三位上訴人 Furman, Jackson 與 Branch 均爲黑

人，分別依各該州法謀殺及強姦罪名被判處死刑。本法院核准移審令狀（certiorari），僅就此三案中有關判處及執行死刑是否構成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因而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及第十四條之問題作審查。

判　決

本案判處及執行死刑構成殘酷與不尋常的刑罰，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及第十四條。原判決有關死刑部分廢棄，發回更審。

理　由

大法官 Douglas 協同意見書

「殘酷與不尋常的刑罰」之意義，不只指野蠻的刑罰，還指選擇性與無規則性地使用刑罰，例如選擇性地適用死刑於少數族裔或不受歡迎之社會邊緣人等。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隱含著平等保護之旨意，不容許執法時有社會階層之區分。它要求立法者制定公平、非選擇性、非武斷性的刑法，並要求司法者不得恣意地、武斷地適用於一群不受歡迎的社會低階層身上。法律即使在表面上中性，如果實際執行後有歧視性的效果，仍屬違憲無效。

大法官 Brennan 協同意見書

一項刑罰是否構成「殘酷與不尋常」，可依四項原則來判斷。一、刑罰出乎尋常之殘酷，二、武斷科處之可能性極高，三、當前社會實質上拒絕此種刑罰，四、沒有理由可以相信此種刑罰比起較不嚴厲的刑罰（如終身監禁）能更有效地達成刑罰目的。依此標準審查，本三件死刑案由州武斷地使人遭受不尋常殘酷的刑罰，此刑罰社會不認爲可以接受，而又無證據顯示比其他較不嚴厲的刑罰更可以達到刑罰目的。此種刑罰由國家決定結束人的生命，否定了人類的尊嚴，死刑在今日屬「殘酷與不尋常」的刑罰。

死刑是一種非常嚴酷的極刑，犯人將喪失一切權利，包括生命，永遠不能回復。與其他刑罰相比，它是一種獨特性的刑罰，因此立法規定特別的審判程序，採二階段的裁判，並自動上訴，法院也視其爲不同種類的訴訟。美國自一九三〇年代起對此種刑罰已逐漸減少使用，雖然社會上謀殺、強姦等暴力犯罪仍大幅增加，每年大約有數萬件死刑犯罪，監獄中一直有數千死囚等待被執行死刑，但每年只有數十人被執行，其隨機取樣猶如抽中彩券一樣，並無合理客觀的標準來判定誰應被判處死刑。如果本

案上訴人 Furman 犯謀殺罪，Jackson 與 Branch 犯強姦罪（並沒有殺人）罪大惡極，其他犯同樣的死罪犯人也一樣罪大惡極。由此推論死刑並非規則性地、公平地科處，其中武斷性、選擇性、歧視性的可能性極高。在可以判處死刑的同樣情況下，只有微量案件被判處死刑，正表示我們當代社會對死刑充滿疑慮。死刑並沒有比終身監禁更具有嚇阻犯罪的的功能，及更能滿足民眾的報應觀念，它有可能讓人們更不尊重生命，刺激人性更殘忍。目前執行的死刑制度並非保護社會所必需。

大法官 Stewart 協同意見書

死刑與其他刑罰之不同不是程度的不同，而是種類的不同。它的獨特性在其無可回復性，及剝奪犯人更生的機會，並完全棄絕了人道的觀念。死刑之殘酷與不尋常猶如被雷擊一樣，在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有很多人犯了與三位上訴人同樣該受譴責的謀殺罪或強姦罪，而只有極少的犯人被隨機取樣似地判處死刑。本人認爲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與第十四條不能容忍一個判處死刑的法制可以如此浮濫與荒誕（so wantonly and so freakishly）。

大法官 White 協同意見書

在加入法庭意見時，本人無意認爲死刑本身違憲，或任何死刑制度都無法與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相符。這些問題都不必在本案決定。我所要考慮的是更狹窄的問題：（一）立法授權謀殺與強姦可處死刑，（二）立法並不規定絕對死刑，（三）法官與陪審團很少判處死刑以致於謀殺者與強姦者被判死刑的可能性越來越少，在此三種情況下，本案三位上訴人被判處死刑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

當死刑達到某種罕見程度，要達成嚇阻犯罪、滿足報應的需要或其他刑罰目的的功效會成爲問題。常識與經驗告訴我們絕少執行的法律成爲無效的控制人類行爲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判處死刑變成無意義與不必要。這種無甚功效的刑罰是顯然過度的（pantently excessive），是殘酷與不尋常的刑罰，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

大法官 Marshall 協同意見書

一項刑罰具有下列四項理由之一會被視爲「殘酷與不尋常」：一、刑罰本身引起肉體上巨大痛苦，爲文明社會所難以忍受。二、刑罰方式不尋常，以前不爲人所知。由於死刑並非近代產物，故無

需考慮此問題。三、刑罰過度且無法達成有效的立法目的。四、刑罰縱非過度且能達成立法目的，但若不爲社會大眾情感所接受，仍屬違憲。雖然本法院並無以此理由判定某刑罰無效之前例，但時代進步價值觀改變，應使吾人正視其存在之可能性。

死刑的立法目的綜觀有六：報應、嚇阻犯罪、預防再犯、鼓勵認罪、優生、及經濟等因素。憲法禁止「殘酷與不尋常」的刑罰，即在限制報復的手段，否則該條文即有被架空的危險。再者，許多證據顯示死刑的存在與降低犯罪率之間並無任何關聯，死刑不比終身監禁更具有嚇阻犯罪的效力。而就預防再犯的觀點來看，死刑犯再犯率並不高，極大部分都是初次犯罪，出獄後常成爲模範公民。而大部分犯死罪的人並沒有被判處死刑，而被判處死刑的人，在審判過程並沒有判斷其有無再犯的可能性。次就鼓勵認罪而言，若強制實施，可能侵犯被告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的權利而違憲。若由優生學的觀點出發，可能無法達到正義，末就經濟觀點而言，判處死刑的花費比終身監禁還大，反而較不具經濟效益。由於此六項立法目的事實上均無法達成，是故死刑爲一過度且不必要之刑罰。

大法官 Burger 不同意見書

死刑即使不被視爲過度的刑罰，倘若在道德上不爲當代美國民眾所接受，仍然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我相信美國人民如果能夠獲取有關刑罰目的與責任之充分資訊，將不會支持無目的性的報復，而會認爲死刑是不智的、可厭的、不公正的，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因此是違憲的。

然而在三權分立的政府，司法權應謹守司法自制的分寸。如果我有立法權，我也會主張完全廢止死刑，或至少嚴格限制使用死刑。但憲法要求法官解釋憲法必須將個人對死刑的道德觀與功效評估分開，僅限於尋求憲法不確定文字的意義及如何適用。追溯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之原有意旨係針對未經合法授權的酷刑，並不能被解釋成爲禁止死刑的適用。自從該增修條文訂定一百八十一年以來，沒有任何判例質疑死刑的合憲性。即使在去年之案件 *McGautha v. California* 亦沒有認爲死刑是殘酷的刑罰，而今日本案之死刑突然變成殘酷的刑罰，被宣判違反憲法修正條文第八條，此實有違判例拘束原則。

再者，前面多數法官認爲死刑無法達到立法目的，而成爲「不必要之殘酷」（unnecessarily cruel），因而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據

我所知，第八條絕無意圖禁止各州使用嚇阻犯罪功能有限的刑罰，這是刑事政策面的問題，已經在增修條文第八條之外的範圍，不宜由司法決定。而且第八條亦無意排除刑罰報應的因素，本法院多年來之案件都持續支持刑罰之報應與嚇阻功能。至於認爲目前判處死刑的程序武斷與不公平，不僅沒有經驗證據，而且實質上此應爲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正當法律程序問題，增修條文第八條只是禁止某種殘酷的刑罰，並不究問判罪程序。

本法庭多數意見並不認爲死刑本身違反增修條文第八條，而是認爲陪審團與法官判刑的方式不可接受，這使得死刑的將來呈不確定狀態。若各州及聯邦仍要保留死刑的話，立法部門勢必做更透徹研究，重新評估死刑的功效，由民主程序來進行修法，司法部門應謹守其界限。

大法官 Blackmun 不同意見書

本案帶給我精神上極大的痛苦。本人對死刑之厭惡及對其實用性之懷疑不下於任何人，如果我是立法者，我一定會因政策的理由投下反對死刑的票。但是我認爲死刑存廢問題應由行政或立法方式處理，不宜將此問題僞裝成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的爭議，而由司法機關便宜處理。

大法官 Powell 不同意見書

在本案中欲妥善行使憲法賦予本法庭之義務，吾人應建基在數點認知上：(1) 憲法肯認死刑之存在；(2) 本法庭過去一直維持有效的一致性判例，包括去年的案例，及二十九位大法官認可死刑的意見；(3) 司法自制原則對本法庭行使權力之限制；(4) 避免侵犯聯邦及州之立法權之義務。本案五位法官之協同意見書無法提供本案判決足夠的立論基礎，而且只有二位法官認爲死刑本身違憲而主張全面廢止死刑，法院不能隨便添加憲法的原意，本案判決破壞了判決拘束原則、司法自制原則、聯邦主義原則、以及權力分立原則。

大法官 Rehnquist 不同意見書

今日法庭將我國自建國以來全國立法機關認爲必需的刑罰，一舉宣判違憲，使聯邦及全國五十州中之四十州的法律無效，影響甚鉅。在本案首需探討的是，在民主社會中司法審查的角色，由與民意隔絕的聯邦法官如何宣判由民意選出的立法機關依正當法律程序所制定出之法律。法院應依憲法第三條有關司法權之規定，審查行政立法機關之行爲是否在憲法授權

範圍內，以防禦人民之個人基本權利受侵害，用以制衡行政、立法機關之越權。而司法權之制衡則完全靠司法自制原則（judicial self-restraint），法官在行使最後裁判權時，須深度謙卑且眞正尊重立法權。本人深覺本案裁判乖離此種正確態度，並非在做裁判（judgment），而是在行使決策的意志力（will）。

21. Gregg v. Georgia

428 U.S. 153 (1976)

王玉葉 節譯

判 決 要 旨

謀殺罪判處死刑並非必然在所有情況下均為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及第十四條。關鍵在於死刑不得武斷或恣意地適用，要符合這樣的要求，可以透過周密訂定的法律，確保審判機關獲得適當的資訊與指導。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for the crime of murder does not,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violate the Eigh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The concerns that the penalty of death not be imposed in an arbitrary or capricious manner were met by a carefully drafted statue that ensured that the sentencing authority was given adequate information and guidance.)

關 鍵 詞

death penalty（死刑）；murder（謀殺）；capital felony（處死重罪）；armed robbery（持械搶劫）；Eigh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statutory mitigating or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法定減輕或加重事由）；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excessive(過度)；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超越合理懷疑)；wantonly（恣意）；Fourteen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prejudice（偏見）；bifurcated procedure（雙階程序）；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進化中的正當行為標準）；disproportionate（顯不相稱）。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Stewart 主筆撰寫）

事　實

本案上訴人因持械搶劫並殺害二人而被以強盜及謀殺罪名起訴。在喬治亞州的雙階審判程序（bifurcated procedure）中，陪審團認爲二項強盜及謀殺罪名均成立。在量刑階段時（penalty stage），法官告知陪審團可以建議判終身監禁或死刑，並可自由考慮減輕或加重情節。若要判處死刑，則除非發現有下列三種加重事由之任一並超越合理的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1)謀殺罪是於犯人從事其他重罪行爲時犯下，如本案中持械搶劫屬重罪行爲。

(2)犯謀殺罪是爲了獲得被害人之錢財及汽車。

(3)殺人者惡性重大至喪心病狂、極端殘暴或毫無人性之程度。

陪審團認定本案構成第一項及第二項刑罰加重事由，因而判處死刑，喬治亞州最高法院認爲本案死刑的判決並非出於激怒、偏見，或有任何其他武斷因素，相較於該州其他類似案件也並無過度或不成比例之處，因此確認了殺人罪的死刑，但對於強盜罪的死刑則以在該州境內罕用爲由駁回。

喬治亞州的法律在 1972 年 *Furman* 案件中被本法院宣告違憲之後重新立法，仍然保留了謀殺及其他五種罪名之死刑，但是修改了其訴訟程序，改採雙階程序（bifurcated procedure）。

(1)第一階段爲有罪與否之裁定，由法官或陪審團爲之，如果是由陪審團裁決，則法官必須在有足夠的事證下，處以較輕的罪。（the trial judge must charge lesser included offenses when supported by any view of the evidence.）

(2)第二階段爲量刑階段，在陪審團有罪裁定之後，於判決前舉行聽證程序（hearing presentence），法官或陪審團聽取任何對被告有利與否的意見，以及其他另有減輕或加重處罰事由之證據。

(3)若要判處死刑，則必須在十個法定加重處罰事由中至少有一種情況發生，並且對之有超越合理的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4)若爲死刑的判決，則將自動上訴到州最高法院，而法院必須判斷：

(a) 判決是否出於激怒（passion）、偏見（prejudice）、或其他武斷因素；

(b)是否有法定加重處罰的事由存在；

(c)在考量犯罪及被告的狀況，死刑判決是否有比較類似案件過度或者不相稱者。

(5)如果最高法院維持死刑判決，則必須要證明其已考量類似案件之先例。

上訴人主張依據喬治亞州的新法律適用死刑，仍然不能去除武斷因素，因此仍然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及第十四條所禁止之「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

判　決

上訴駁回，原判決維持。

理　由

(1)謀殺罪判處死刑並非在任何狀況下均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以及第十四條：

(a)解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應以彈性及動態之方式，符合在成熟進步社會進化中的正當行爲標準（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該條禁止使用「過度」（excessive）的刑罰，指的是它任意加諸於人不必要之痛苦，或者是其犯罪的嚴重性與處罰顯不相稱。

(b)雖然立法者不得制定過度之刑罰，但若非不符合人性或與刑罰顯不相稱的處罰，立法者並無義務選擇最輕度的刑罰。

(c)死刑之存在被制憲者所接受，而且在近兩世紀以來，最高法院也重複的承認謀殺罪之死刑本身並非無效。

(d)由民選議員所制定之法律可以稽考當前正當行爲之標準。在 *Furman* 案判決四年之後，至少有三十五州修改法律，重新規定死刑之適用，由此可以反駁當前正當行爲標準要求增修條文第八條應作禁止死刑之解釋。

(e)立法機關在衡量是否適用死刑時，並非不允許考量死刑之報應功能以及對犯罪之嚇阻功能，因此無法判定喬治亞州之立法機關所認定死刑在某些案件是必要的判斷是顯然錯誤的。

(f)對謀殺罪判處死刑並不能被認定必與犯罪之嚴重性顯不相稱（disproportionate），相反的，針對極端之犯罪是爲合適的。

(2)要符合 *Furman* 案件中所關切的不得武斷地或恣意地判處死刑，可以透過周密訂定的法律條文，確保審判者是基於適當足夠

的資訊及指示，有一定標準而爲裁判。若透過雙階程序（bifurcated procedure）會較一般程序更能達到死刑不被濫用之要求。因審判者被告知有關於判刑的資訊，並提供如何使用資訊的標準。

(3)死刑的判決除要求陪審團考量犯罪情狀以及被告性格，並且要經由喬治亞州最高法院再審查，是否與其他與被告相類似情況之案件相當，以確保在此特殊案件之判刑非顯不相稱（disproportionate）。因此喬治亞州的新死刑判決程序爲合憲的，上訴人所主張喬治亞州新修正的法律仍沒有去除 *Furman* 案所譴責的武斷與反覆無常因素並不能成立。

(a)喬治亞州的法律不能僅因謀殺案件的訴訟程序中固有的提供個別被告有減刑免死的機會，無論是基於檢察官的裁量，或是由陪審團選擇宣告其他較輕度的刑罰，或是州長或州赦免委員會的減刑權，而被認爲違憲。

(b)上訴人主張喬治亞州的法定加重處罰條款過於寬鬆、模糊不能成立，因爲透過法院之限縮解釋，其中某條款已經被該州最高法院認定過於模糊。上訴人主張減刑程序過於浮濫是誤解了 *Furman* 案與忽視了州最高法院審查相類似案件是否相當之職權，上訴人亦主張審判前的聽證程序所使用的證據過於寬鬆，然而法院認爲爲確保陪審團在裁決時儘可能獲取足夠的資訊，應允許較寬鬆的證據使用。

(c)喬治亞州新法的程序規定，所有死刑案件均要自動上訴到州最高法院，由州最高法院作終審，以避免激怒、偏見以及武斷的判決產生。在本案中，州最高法院駁回強盜罪的死刑，認爲是過度的刑罰，僅確認殺人罪的死刑。

大法官 White 主筆，首席大法官 Burger 及大法官 Rehnquist 連署之協同意見書

(1)針對 Furman 案在喬治亞州舊法中所發現的憲法缺陷，喬治亞州修訂新法，不僅給予陪審團在一級謀殺案如何裁量判刑的指示，並賦予州最高法院權力及義務審查死刑在事實上是否有歧視、無標準或罕用的情況。倘若該法院善盡職守，即可避免此缺陷。上訴人並無證據可以主張喬治亞州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有虧

職守，或該院在所有案件中均無能力適當履行其任務，因此本案死刑之執行符合 *Furman* 案判決之要求。

(2)上訴人主張檢察官的認罪協商（negotiating plea）或者不求處死刑之裁量漫無標準，將構成 *Furman* 所禁止的浮濫與荒誕地適用死刑，此種臆測全無事實根據，因無法認定檢察官起訴除了考量案件嚴重性以及陪審團裁決死刑的可能性以外，尚有其他因素。檢察官是否求處死刑的標準，與陪審團裁決是否有罪的標準是相同的。

(3)上訴人主張死刑無論如何適用，或適用於何種犯罪，均構成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此說不能成立，原因已於 Roberts v. Louisiana 案本人不同意見書中說明。

首席大法官 Burger **及大法官** Rehnquist **意見書**

我們贊同該判決，並加入 White 意見，同意其有關喬治亞州就死刑審判程序符合 *Furman* 判決要求之分析。

大法官 Blackmun **協同意見書**

我贊同該判決，理由見 *Furman* 案本人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Brennan **不同意見書**

「殘酷且不尋常刑罰」條款必須要以成熟進步社會之正當行爲標準（standards of decency）爲斷。多數意見法官 Stewart, Powell 與 Stevens 卻認爲考量該標準非針對死刑本質，而主要是針對各州死刑適用程序能否避免武斷科刑之危險，是爲本末倒置。該條款內涵道德原則要求，國家對待人民要符合人類內在價值，即使是處罰也不能有損人類尊嚴。死刑存廢之爭，自本國開國以來即引起劇烈爭論。其中有個人尊嚴爲社會最高價值與達成刑罰目的之道德衝突。我仍然維持本人在 *Furman* 案之看法，本國的文明以及法律均已進步至死刑－與其他各種殘忍的肉刑一樣－在道德上已不再爲我們文明社會所接受。因此死刑不論在任何狀況下適用於何種犯罪，均構成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的狀況。

大法官 Marshall **不同意見書**

我仍然維持本人在 *Furman* 案之觀點，死刑是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禁止之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我認爲死刑違憲有兩個原因，死刑是過度的刑罰，而美國民眾如能獲取有關死刑的目的與責任之充分資訊，將會發現其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自 *Furman* 案之後，

有三十五州及聯邦重新立法，仍然保留死刑的適用，如果我不承認這些新發展多少代表美國民眾在道德上接受死刑，我就太不誠實了。但是依據最近一項在這些後 *Furman* 立法以後之調查，美國民眾對死刑資訊仍然所知甚少，有無獲知充分資訊之民眾，其對死刑之看法截然不同。然而即使民眾贊成死刑，過度的刑罰仍然是違憲的。死刑非達成嚇阻犯罪與報應等合法的立法目的所必須。雖然 Isaac Ehrlich 在 *Furman* 案後所發表之科學研究報告認爲死刑有嚇阻謀殺罪之效果，但其研究方法及結論遭受其他學者嚴厲批判與質疑，不爲定論。報應的觀念更不能支持死刑之正當性，死刑完全否定犯人之尊嚴與價值，不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要維護的人類尊嚴之核心價值。

22. Atkins v. Virginia

536 U.S. 206（2002）

王玉葉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對心智障礙人犯執行死刑為違憲的過度刑罰，屬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殘酷且不尋常刑罰」所禁止之範圍。倘若刑罰不依犯罪程度累進或不成比例，即是過度的刑罰，為憲法增修條文所禁止。

(The execution of offender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 is unconstitutionally excessive, as prohibited by the Eigh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banning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A punishment is "excessive", and therefore prohibited by the Amendment, if it is not graduated and proportioned to the offense.)

關 鍵 詞

mentally retarded（心智障礙）；the Eigh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culpability（可責性）；capital punishment（死刑）；life imprisonment（終身監禁）；the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doubt（憲法疑義原則）；excessive（過度）；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殘酷且不尋常處罰）；national consensus（全國共識）；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進化中的正當行為標準）。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Stevens 主筆撰寫）

事 實

上訴人與共犯持半自動手槍綁架、搶劫被害人，又脅迫被害人從銀行自動提款機提領現金，之後

並載被害人至偏僻處所射擊八鎗斃命。維吉尼亞州控以綁架、持械搶劫、謀殺等罪名，判處死刑。在量刑階段有一位法庭心理學家（forensic psychologist）測試上訴人之智商僅 59（約等於九至十二歲之智力），屬輕度心智障礙（mildly mentally retarded）。上訴人主張其爲智障不能判處死刑，但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根據本法院判例 *Penry v. Lynaugh*, 492 U.S. 302（1989），拒絕僅因智商數將其罪刑從死刑減爲終身監禁。有鑒於維州最高法院兩位法官在不同意見書所呈現出來問題之嚴重性，認爲對心智年齡只有九至十二歲之刑事被告判處死刑是過度的刑罰，以及 *Penry* 案之後十三年各州立法明顯的轉向，本法院核准移審令狀（*certiorari*），重新討論在 *Penry* 案所處理之議題。

判　決

對心智障礙人犯判處死刑爲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禁止之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原判決廢棄，依本判決意見發回更審。

理　由

心智障礙人士犯罪，如符合法律所要求之刑事責任標準，應受審判及處罰。但由於其理性、判斷、與控制衝動能力之缺陷，其道德上之可責性較一般成年人爲低。其能力上之缺陷可能會損及訴訟程序之可靠與公平。或許是基於上述理由，在 *Penry* 案十三年之後，美國民眾、立法者、學者、法官深思此問題所得之共識提供我們本案所呈現問題「對心智障礙人犯執行死刑是否爲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規定的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的答案。

(a)倘若刑罰不依犯罪程度累進或不成比例，就是過度的刑罰，爲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禁止，而刑罰是否過度應以當前進化中的正當行爲標準（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爲斷，此種標準應盡可能根據客觀因素，而最清楚可靠的即是全國各州之立法。除客觀之證據之外，憲法亦期許本法庭獨立評估是否有理由贊同或反對由全國公民及其立法者所作之判斷。

(b)在一九八九年 *Penry* 案判決時全國只有二州禁止對心智障礙人犯執行死刑，如果加上十四個完全廢止死刑之州，尚無充分證據足稱達到全國共識。但在其後有不少的州立法禁止此種死刑之執行。更具意義的不僅在於州的

數目之增加，而是此種改變方向臻於一致性的趨勢。此足以證明今日社會已經視心智障礙人犯比一般人較不具可責性，觀察議會中投票贊成禁止對智障人士執行死刑之壓倒性票數更加強了此種證明力。而且即使在容許執行死刑之州，實務上亦少見執行。

(c)本法院經過獨立評估此議題，顯示無理由不贊同此立法之共識（legislative consensus）。臨床上對心智障礙（mental retardation）之定義不僅是智商低於一般水平，而且其適應能力亦受相當限制。心智障礙人士雖能分辨是非，且能在訴訟中應訊，但其了解及處理資訊、溝通、從經驗中學習、從事邏輯思考、控制衝動、以及認知他人反應等諸種能力較差。這些缺陷雖不能使其免除刑罰，但其個人可責性（personal culpability）應減輕。有鑑於這些缺陷，本法院提供兩項理由以贊同立法共識：

(1)支持死刑正當性的兩項功能報應與嚇阻適用到心智障礙人犯能否有效頗受懷疑。有關報應功能，刑罰之輕重應依犯人之可責性來決定，假如一般的謀殺犯不應判處死刑，可責性較輕之心智障礙人犯更不應有此報應。關於嚇阻功能，由於心智障礙人犯認知上與行爲上之缺陷使其道德上之可責性減輕，同時也使其較不可能理解有關處決之資訊以控制其行爲。而免除心智障礙人犯死刑並不會降低對非智障人士之嚇阻功效。

(2)因爲心智障礙人犯較有可能不智的錯誤認罪，提供律師有利協助之能力不足，較弱的作證能力，缺乏反省能力，這種種因素加起來，將使其面對特別的被錯誤處決之危險。

大法官 Rehnquist **主筆，大法官** Scalia, Thomas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

本案所呈現的問題在於目前全國是否形成共識，可以剝奪維吉尼亞州對類似本案上訴人之被告科處死刑的憲法權力，也就是說這些被告毫無疑問地有能力在法庭上應訊，知道他們即將遭受的刑罰及原因，而其心智障礙不足以構成迫切理由得減輕其犯罪的個人責任。法院宣告此刑罰違憲主要是因爲最近有十八州通過立法禁止對心智障礙人犯處死，卻忽略了除了維州外還有其他十九州仍將此問題留給對特別被告與案情較熟悉的法官或陪審團來決定適當的刑罰。

我贊同大法官 Scalia 所言，法

院評估當前有關處死智障人犯之立法趨勢比較像在對其主觀喜好尋求事後合理化的證明，而非客觀地努力確定進化中的正當行爲標準之內容。我在此寫出不同意見，指出法院判決太過倚重外國法、職業與宗教團體觀點、與民意調查的缺陷。這些資料與憲法問題相關的觀點在往昔的判例中找不到根據。依我的觀點，它與聯邦主義所指示的原則剛好相反：「對任何民主政府單位永久的禁制必須經由人民核准之民主程序。」而法院全盤接受的民意調查是否符合科學方法頗受質疑，是以吾人無法接受其可信度及有效度。

我們曾經強調，要判斷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所規定的一項刑罰是否構成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其所根據的進化中的正當行爲標準，唯有各州之立法與陪審團之裁決可作爲客觀之指標。立法是當代價值觀最清楚最可靠之證據。在民主社會，是由立法部門，而非由法院，來反應民意及人民之道德價值觀。刑罰規定屬立法政策問題，由法院決定是藉「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條款之盾截斷了正常的民主程序。而陪審團之裁決亦是一項有意義及可靠的當代價值觀之指標，因爲陪審團接近個案熟悉案情，有聯結當前社會價值觀與刑事審判系統之功能。

如果要尋求全國共識，外國人之觀點完全不相干，私人團體只爲他們自己說話，民意調查又無可信度，法院倚重這些資料嚴重錯誤，只顯出法院對一個沒有達到全國共識的觀念卻要由法院下命令的意願。

大法官 Scalia 主筆，大法官 Rehnquist, Thomas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

本案之判決無論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之文義與歷史中或目前社會態度中都找不到根據。法院判決很少像本案這樣顯然地只是法官個人觀點而已。

我在此重述爲法院所刪減的案情，對瞭解本案很重要。上訴人與共犯在一整天飲酒與吸食迷幻藥後，開車至一便利商店，欲圖搶劫其顧客。他們綁架了被害人，開車至附近一處自動提款機，脅迫被害人提領美金二百元，然後載其至一偏僻處所，令被害人下車，即射擊被害人全身各處八鎗斃命。陪審團並聽證上訴人十六項重罪前科紀錄，包括搶劫、綁架、使用槍械、重傷害等罪名。各案被害人歷歷指證其犯案時之暴力傾向。上訴人除了測驗智商較低外，仍具有一般水平之智力。陪審團有見於其犯案之殘暴及長期暴力傾向，認爲輕微智

障不足爲免死理由，故裁決死刑，維吉尼亞州最高法院維持其判決。

在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制定時，只有嚴重的心智障礙，如白痴（idiot）或瘋子（lunatic），智商在25 以下，完全喪失理性或認知能力，無法分辨是非，無犯罪責任。較輕的心智障礙，所謂低能兒（imbecile），仍具有一定智力，雖比一般人稍低，仍須負刑事責任，包括死刑。對輕微智障人犯執行死刑是否符合代表成熟社會進步之正當行爲標準，在今日以前，本法院一致性地強調有關增修條文第八條之判斷應儘可能依據客觀因素，而非法官個人的主觀看法。客觀因素中首見於由民選議員通過之法律，而罕見法官對美國民意更有敏銳反應。法院依據三十八個保留死刑的州中有十八州禁止處死智障人犯（少於一半，只有47%，而且此數字是捏造的。），即稱獲得全國共識。【譯者註：如加上完全廢止死刑的十二州，百分比即達60%，超過一半。】就算是47%，怎能算是達到全國共識？我們以前的判例一般要求更高的比率。而十八州禁止處死智障人犯的新立法仍在嬰兒期，最長的只有十四年，有五州去年才新立法。法院誇稱改變方向趨於一致，在這麼短的期間，我們如何能看到其他方向之改變？如何能判斷趨勢？

我同意首席大法官的看法，即是全國共識與職業與宗教團體之觀點及民意調查結果無關，與國際社區之實務亦同樣無關，他們的正義觀念與我們不同。「我們不能忘記，這是我們在解釋的美國憲法。」在我們人民尚無確定的共識，即使外國的觀點本法院之法官認爲多有啓發性，亦不能透過憲法強加在美國人身上。難道，終究（in the end）全國人民關於正當行爲、刑事學、仁慈等觀念的共識是由這數個對社會無代表性的大法官個人直覺來決定？

今日法院之判決在一長串法院阻礙判處死刑之實質與程序要求名單中又加多了一項。這些要求在制定增修條文第八條時（只要求禁止酷刑而非死刑）並不存在，甚至有些要求也不獲當前道德共識所支持。如果是由民眾廢止死刑還有理可言，這種由法院所一項一項增加限制的廢止死刑就無話可說了。這項新發明將使死刑審判程序變成一項玩法遊戲，死罪被告很容易假裝心智障礙。本案正在審理時，就有死囚待一切訴訟程序完結後，才第一次聲請智障減刑。我們可預期將來會帶來很多實務上不易辨別之困擾。

23. Davis v. Mississippi

394 U.S. 721 (1969)

林利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指紋證據不是證據排除法則(即違反憲法之搜索和扣押而取得的所有證據皆不得被州法院採納為呈堂證據的法則)的例外。
   (Fingerprint evidence is no exception to the rule that all evidence obtained by searches and seizures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s inadmissible in a state court.)
2.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適用於警方在調查程序中對美國人民的非自願性拘禁，也適用於警方在控訴程序中對被告的非自願性拘禁。
   (The Fourth Amendment applies to involuntary detention occurring at the investigatory stage as well as at the accusatory stage.)
3. 警方為了採取指紋而對嫌犯所為的拘禁，同樣也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限制。
   （Detention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obtaining fingerprints are sub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4. 本庭在本案無需決定在犯罪調查中以嚴格規定的程序採取非法逮捕之嫌犯的指紋是否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因為本案的一些事實很清楚地顯示警方並沒有試圖去採用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所規定的程序。
   (It is not determined here whether Fourth Amendment requirements could be met by narrowly circumscribed procedures for obtaining, during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fingerprints of persons for whom there is no probable cause to arrest, since no attempt was made in this case to

employ procedures which might comply with the Fourth Amendment.)

關 鍵 詞

fingerprint evidence（指紋證據）；unlawful detention（非法拘禁）；exclusionary rule（證據排除法則）；interrogation（訊問）；comparison of fingerprint（比對指紋）；trustworthiness of the evidence（證據的可靠性）；investigatory stage（調查程序）；accusatory stage（控訴程序）。

（本案件判決由 Brennan 大法官主筆撰寫）

事 實

被告在密西西比州勞德戴爾郡的地方法院被陪審團以性侵害的罪名定罪，並判處終身監禁。本庭需要解決的唯一爭議爲被告在警方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及第十四條對他非法拘禁時所採取的指紋證據是否應予以排除？

1965 年 12 月 2 日晚間，被害人在位於密西西比州 Meridian 的家中遭到性侵害。除了指稱施暴者是一名年輕的黑人以外，被害人無法詳細描述施暴者的長相。警方在被害人家中的窗臺和窗緣上發現指紋和掌印，顯示施暴者似乎是從窗户侵入被害人的家。除了得知施暴者是一名年輕的黑人以外，警方在窗臺和窗緣上發現的指紋和掌印是警方開始調查此案後所掌握的唯一其他線索。從 12 月 3 日起大約十天的這段期間，Meridian 的警方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陸續帶回至少 24 名年輕的黑人到警局接受簡短的質問、採取指紋，然後就釋放他們。警方在警局、學校，或街上也訊問了 40 至 50 名年輕黑人。被告是個 14 歲的年輕黑人，偶爾替被害人擔任園丁的工作，他也在 12 月 3 日被警方帶去警局，經過例行質問並採取指紋後被釋放。在 12 月 3 日到 12 月 7 日之間，被告被警方訊問了幾次，分別在家中、車上和警局。這幾次的質問主要是要調查其他的嫌犯。在這段期間有幾次被告被帶到被害人的病房讓被害人指認。一位警察在法庭

上作證時表示，讓被告與被害人對質的目的是爲了使被害人記憶起施暴者的長相。但在這些對質中，被害人並沒有指認被告是對她性侵害的人。

12 月 12 日那天，警方載被告到 90 英哩遠的 Jackson 市，並將他拘禁在 Jackson 市的監獄中過夜。檢方在口頭辯論時也向本庭承認警方是在沒有逮捕令，也沒有相當事由的情況下將上訴人逮捕。隔天，被告在警方沒有提供律師協助的情況下接受測謊，並簽下一份陳述書，然後被移送回 Meridian 的監獄拘禁。12 月 14 日，被告在獄中再一次被採取指紋。同天，被告在 12 月 14 日當天被採取的指紋和其他 23 名有嫌疑的年輕黑人的指紋一起被送到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聯邦調查局，與警方後來在被害人家中窗户上發現的指紋比對。指紋比對的結果顯示被告的指紋與被害人家中窗户上的指紋相符。隨後被告被以性侵害的罪名起訴和審判，而被告的指紋在被告的異議下仍被勞德戴爾郡地方法院採納爲證據，被告認爲他的指紋是警方對他非法拘禁時所採取的，故應予以排除。密西西比州的最高法院認可勞德戴爾郡地方法院對於該項指紋證據的採納，並確認被告的定罪判決。本庭決定受理此案。

判　決

本庭撤銷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的判決。

理　由

指紋證據不是證據排除法則(即違反憲法之搜索和扣押而取得的所有證據皆不得被州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的法則)的例外。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適用於警方在調查程序中對美國人民的非自願性拘禁，也適用於警方在控訴程序中對被告的非自願性拘禁。

警方爲了採取指紋而對嫌犯所爲的拘禁，同樣也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限制。

本庭在本案無需決定在犯罪調查中以嚴格規定的程序採取非法逮捕之嫌犯的指紋是否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因爲本案的一些事實很清楚地顯示，警方並沒有試圖去採用符合增修條文第四條所規定的程序。

I

爲了調查一起性侵害案件，密西西比州 Meridian 的警方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帶回幾名年輕的黑

人到警局接受質問和採取指紋。被告也被警方帶去警局質問並採取指紋後被釋放。之後，在沒有逮捕令也沒有相當事由的情況下，警方載被告到 Jackson 市，並將他拘禁在 Jackson 市的監獄中過夜。隔天，被告又再度被警方質問，並簽下一份陳述書，然後被移送回 Meridian 的監獄拘禁。被告在獄中再一次被採取指紋，而這些指紋被送到聯邦調查局，與警方後來在被害人家中發現的指紋比對。指紋比對的結果顯示被告的指紋與被害人家中窗户上的指紋相符。隨後被告被以性侵害的罪名起訴和審判，而被告的指紋在被告的異議下仍被勞德戴爾郡地方法院採納爲證據，被告認爲他的指紋是警方對他非法拘禁時所採取的，故應予以排除。被告被定罪。密西西比州的最高法院確認被告的定罪判決。本庭決定受理此案，本庭撤銷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的判決。

II

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認爲因爲指紋證據具有高度準確性，所以指紋證據的採取不受限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及第十四條的規定，這樣的見解本庭並不認同。本庭以往的判決從未承認因非法扣押而取得的證據可以被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的例外，即使該證據與案情非常有關並且準確可靠。證據排除法則的形成是爲了彌補及嚇阻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所禁止之政府濫用公權力的行爲，若例外允許準確可靠但卻是因非法扣押而取得的證據可以被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就會嚴重地破壞了這些目的。因此本庭在 *Mapp v. Ohio* 案中制定以違反憲法之搜索和扣押而取得的所有證據皆不得被州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的證據排除法則。指紋證據亦不是此證據排除法則的例外。

本庭接下來要解決的爭議爲：在本案中警方取得被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之被告指紋證據所爲的拘禁，是否構成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中所禁止之對被告人身的不合理扣押?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的見解是根據一個錯誤的前提，即該法院以爲勞德戴爾郡地方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的被告指紋證據是被告在 12 月 3 日被警方短暫拘禁時被採取的。事實上，勞德戴爾郡地方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的被告指紋證據是被告在 12 月 12 日被警方逮捕後監禁於獄中直到在 12 月 14 日才被採取的。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並沒有對警方在 12 月 12 日逮捕被告的行爲是否合

法做出裁決，不過檢方承認警方在12月12日將被告逮捕和將被告監禁在獄中直到12月14日的行爲，不但沒有逮捕令也沒有相當事由，因此警方逮捕被告和監禁被告的行爲均屬違憲。然而密西西比州檢方主張，即使警方逮捕被告和拘禁被告的行爲均屬違憲，本庭也無需因此撤銷被告的定罪判決。密西西比州檢方主張警方在12月3日所採取的被告指紋證據是合法取得的，因此就實際上或法律上而言，不論警方將12月3日的指紋證據或12月14日的指紋證據送去聯邦調查局比對，比對的結果皆不會有任何不同。然而就證據排除法則的目的而言，12月3日的指紋證據與12月14日的指紋證據並不相同，但是本庭無須解決此項爭議，因爲本庭認爲警方在12月3日所採取的被告指紋也並非合法取得。

密西西比州檢方並沒有主張被告在12月3日是自願與警方回到警局並且同意警方採取指紋，密西西比州檢方也承認Meridian警方在逮捕被告時對於被告一切的所知，不足以構成得以逮捕被告的相當事由。然而密西西比州檢方基於兩點理由認爲警方在12月3日將被告拘禁是不需要相當事由的：第一、被告在12月3日的拘禁是發生在調查程序中而非控訴程序中，所以不構成需要相當事由即可進行逮捕。第二、若拘禁被告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採取被告的指紋，則警方不需要相當事由即可拘禁被告。

的確，警方在12月3日拘禁被告時並沒有以性侵害的罪名起訴被告，也沒有要將被告視爲是他們調查的重點。但是若主張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並不適用在警方的調查階段，便是嚴重地誤解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目的。爲了調查犯罪而對人民所爲的拘禁，會使無數無辜的人在非自願的拘禁中遭受騷擾和羞辱。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目的在於防止政府對美國人民的人身安全進行大規模的侵擾，不論那些侵擾是被稱爲“逮捕”或是“調查性拘禁”。

警方爲了採取指紋而對嫌犯所爲的拘禁，同樣也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限制。然而檢方主張，因爲採取指紋之程序的獨特性，在一些嚴格限制的情況下，即使沒有相當事由，這樣的拘禁是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檢方也主張，相較於警方的其他種搜索，爲了採取指紋而對嫌犯所爲的拘禁對人身安全的侵擾較小，因爲採取指紋的程序並不構成會侵擾到個人私生活和思想的訊問和搜索。爲了採取指紋而對嫌犯所爲的

拘禁也不會被警方一再地用來騷擾任何人，因爲警方只需要那個人的一組指紋即可。再者，檢方認爲採取指紋是一種比證人指認嫌犯或嫌犯招供自白更可信也較有效的辦案工具，也較不會像另一種已被警方濫用的方法，也就是將嫌犯排成一列讓被害人指認。最後，因爲指紋不會有被消滅的危險，爲了採取指紋而對嫌犯所爲的短暫拘禁，不需要在沒有預警或在不適當的時候發生。然而，正因爲這些理由，採取指紋似乎更不應成爲警方必須事先取得法官的合法授權才得拘禁嫌犯之規定的例外。

然而，本庭在本案尚無機會去決定在犯罪調查中以嚴格規定的程序採取非法逮捕之嫌犯的指紋是否符合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因爲本案的一些事實很清楚地顯示警方並沒有試圖去採用符合增修條文第四條所規定的程序：(1)警方在警局對被告和其他年輕黑人所爲的拘禁，並沒有得到法官的授權；(2)被告在不必要的情況下被強迫採取二次指紋；(3)被告在 12 月 3 日不但被採取指紋，又被警方訊問。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確認被告的定罪判決因此被撤銷。

24. Arizona v. Evans

514 U.S. 1（1995）

蔡秋明　節譯

判　決　要　旨

證據排除法則並不要求排除因法院受僱人員之事務性錯誤所生錯誤資訊導致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扣押所得之證據。排除法則係為達到防免未來有關增修條文第四條權利遭受侵害之遏止效果，由司法機關以判決創立之救濟途徑。然而，證據應否排除，與是否違反增修條文第四條，並非同一問題。增修條文第四條並未明示一律排除違反該條規定所取得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證據排除僅於最能適當達成該條規定之補救功能時，始見合適。

（The exclusionary rule does not require suppression of evidence seized in violation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where the erroneous information resulted from clerical errors of court employees. The exclusionary rule is a judicially created remedy designed to safeguard against future violations of Fourth Amendment rights through its deterrent effect. However, the issue of exclusion is separate from whether the Amendment has been violated. The Amendment does not expressly preclude the use of evidence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its commands, and exclusion is appropriate only where the rule's remedial objectives are thought most efficaciously served.）

關　鍵　詞

exclusionary rule（證據排除法則）；clerical errors（事務性錯誤）；deterrent effect（遏止效果）；judicially created remedy（司法機關以判決創立之救濟途徑）suppression hearing（審判前之證據排除聽審）。

（本案判決由首席大法官 Rehnquist 主筆撰寫）

事　實

緣一九九一年一月間，鳳凰城警察局 Bryan 警官發現被上訴人 Evans 駕車在一條警局前的單行道逆向行駛，遂將該車攔下查驗駕駛執照。上訴人表示該駕照已被吊銷，Bryan 警官乃將其資料輸入巡防車中之電腦資料終端機。電腦資料示，上訴人之駕照已被吊銷，且因另一輕罪罪名刻被通緝中。Bryan 警官依此通緝資料將上訴人逮捕。在拷上手拷之際，被上訴人身上掉下一支手捲香菸，警官因爲該香菸聞起來有大麻氣味，遂在其車內進行搜索，而在駕駛座下面發現一包大麻。

州政府以被上訴人持有大麻之罪名移送法辦。警方將被上訴人被逮捕之事情通知治安法院，治安法院發現該通緝書已被撤銷，並將此事告知警方。被上訴人因而辯稱，由於其逮捕係依據已於十七天前被撤銷之通緝書所爲，故逮捕後所搜獲之大麻乃是非法逮捕之結果，依毒樹果實理論，應予排除。被上訴人並辯稱，善意例外於本案並無適用餘地，因爲此一無效逮捕係肇因於警方所犯之錯誤，而非法院所犯之錯誤。

於證據排除聽審程序中，治安法院書記官長證稱：由於被上訴人未能應傳到庭爲多項交通違規案件應訊，治安法官於一九九〇十二月十三日簽發通緝書。同年月十九日，被上訴人於一名臨時治安法官前應訊，由該名臨時法官於被上訴人檔案中註記「撤銷通緝」。

該書記官同時證稱關於法院撤銷通緝之標準程序。依該程序，治安法院書記官於通緝書被撤銷後，將致電郡警察局令狀科知會此事，由郡警局自其電腦紀錄中將通緝記載刪除。致電郡警局之後，書記即於將於個人檔案中註明打電話之書記官及郡警局受話者之姓名。書記官長亦證稱，於被上訴人之檔案中，已有一名書記官打電話通知郡警局，告知該通緝書已被撤銷。一名郡警察局記錄人員則證稱：郡警局並無通知被上訴人之通緝業經撤銷之來電紀錄。

於證言程序結束之後，被上訴人辯稱逮捕之後所取得之證據應予排除，理由爲「排除證據之結果，將使法院事務人員、郡警察局受僱人員，或任何應爲此一錯誤負責之人員，於確保通緝事項已自紀錄中刪除一事，更爲小心。此一結

果將使排除法則之目的得以實現。」事實審法院因爲認爲州政府當局於未能撤銷通緝一事有所錯誤，因此認可被上訴人一方排除證據之聲請。也許由於「無法明辨該州政府機關之行爲，究竟是否警察機關之行爲」，事實審法院未就業經撤銷之通緝仍然留存於警方紀錄中究應由治安法院或郡警察局負責一事爲事實認定。

亞利桑那州上訴法院合議庭以多數決，將事實審法院之判決撤銷，其理由爲：該院「相信證據排除法則創立之用意，不在遏止與逮捕員警或逮捕警察機關無直接關連之治安法院受僱人員或郡警察局受僱人員的不當行爲」。因此，該院認爲「排除法則之目的，不因本案所取得證據之排除而得以達成。」

前開上訴法院之判決，復爲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所撤銷。該院拒絕「上訴法院所爲，有關執法機官人員所犯事務性錯誤與法院受僱人員所犯類似錯誤間之區分。」該院並稱，排除法則之適用，「可望達到改善司法行政系統中記錄人員工作效能的目的」。該院最後認爲「縱然假設遏止功能爲適用排除法則之主要理由，本院亦不同意上訴法院所稱，於法院事務人員之疏忽導致非法逮捕之案件中，無法達成此等目的之見解」。）

判　決

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所爲判決應予撤銷發回原審法院。

理　由

本院裁定受理本案，以審酌於電腦紀錄不正確所導致之逮捕後所扣押之證據，是否應以證據排除法則排除，不論警方人員或法院人員對於警方紀錄未經消除一事應否負責。

本件所呈現之問題爲：依照顯示有效通緝書存在之警方紀錄（該紀錄其後被證明有誤）執行職務而違反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所扣押之證據，是否不論其錯誤如何發生，均應依證據排除法則予以排除。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認爲若該不正確資訊係由法院書記處受僱人員所犯錯所導致，即應依排除法則排除該證據。對於此一見解，本院不表同意。

首先必須考量者，爲本院是否有審判權據以審查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所爲之判決。被上訴人主張，由於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之判決並未觸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問題，而係依據該州之善意規定

所爲，後者乃該判決適當而獨立之州法依據。被上訴人另提預備聲明，主張逕將本案發回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重新澄清爭議。

在 Michgan v. Long 案判決（463 U.S. 1032 (1983)）中，本院曾經採行一項標準，用以認定州法院是否依據適當而獨立之州法規定作爲裁判基礎。若州法院之判決主要係依據聯邦法律所爲，或適用部分聯邦法律所爲，而任何可能之州法基礎之適當性與獨立性，自判決理由表面觀之並不明顯時，本院將認爲其最合理之解釋，爲該州法院係以其相信州法院認爲聯邦法院可能要求之方式而爲裁判。本院採用此一實務標準，其部分理由在於避免「迫使州法院澄清其裁判至使本院滿意之不令人滿意且具干預性之實務做法」。本院亦認爲，此一做法將提供州法院法官更清楚之機會，以發展不受聯邦法律阻擾之州法法學，同時維護聯邦法律之內部完整性。

本院以爲，Michgan v. Long 案判決已經適當達成其目的，不應再受干擾更易。依該判決，州法院擁有詮釋州憲法規定之絕對自由，而賦予個人較諸聯邦憲法所規定者更多之權利保障。依本院之見，亞利桑那州固然得以自由選擇電腦化所肇致執法問題之解決方式。但若該州能去除其對於聯邦憲法規範意旨所存之錯誤觀點，則其自由範圍自將更大。

在適當情況下，州法院不僅「得」且「應」詮釋聯邦憲法。然於爲此詮釋之際，彼等並無自外於本院最終權威見解之自由。此一原則業經本院於 Cohens v. Virginia 案判決中表述甚明。在 Minenesota v. National Tea Co.案判決（309 U.S. 551 (1940)）中，本院亦認爲本院作爲聯邦憲法問題最終裁判者之地位，可能遭受有欠明確之州法院判決所侵蝕。州法院得自由而不受本院干預，以解讀其州憲法一事，殊屬重要。然同等重要者，州法院模糊不明之裁判，亦不得構成本院依聯邦憲法規定判斷州訴訟裁判有效與否之障礙。爲期上訴審權限之明智行使，本院必須要求模糊不明之現象，由此等案件中去除。既然除此以外，再無其他程序足以確保重要聯邦法律問題（例如本案所爭執之問題）進入本院審理範圍，而州法院亦非重要聯邦憲法問題之最終裁判者，本院所爲自無侵越州憲法審判權範圍之情形。

本院因此認應繼續採行前述 Michigan V. Long 案中判決所採之標準。

適用該標準，吾人認爲本院對於本案應有審判權。亞利桑那州最

高法院於撤銷亞利桑那州上訴法院之判決時稱：「於治安法官簽發一份根據錯誤之事宜評估而於表面有效之令狀（裁量性之司法作用）時，或許不宜引用證據排除法則或法律，但於紀錄登載有所疏忽而導致非法拘提逮捕（純粹之事務性作用）之情形，援引排除法則即屬有用而適當。」以此言之，亞利桑那州最高院排除證據之判決，其實正是基於其對聯邦法律所作之解釋。該判決亦未提出任何說明，以表明其引述聯邦法律之目的「僅在以之作爲引導之用，而其所爲引述亦非必然導出該判決結論」。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雖然規定「人民確保其個人、住家、文件、財物不受不合理搜索與扣押之權利，不得予以侵犯；除有相當事由，並經宣誓或切結擔保，且以具體方式描述應被搜索處所及應被扣押之個人及物品外，不得簽發搜索或逮捕之令狀。」但吾人亦須承認，該條文並未明文一律排除違反該條誡命規定所取得之證據。該判決引述 U.S. v. Calandra 案判決(414 U.S. 338, 354 (1974))所言：「增修條文第四條所譴責之不當，於從事非法搜索或扣押本身時，即已『充分』完成。」（同前判決）使用之前非法搜索或扣押所得之物之舉，並未因此另生與該條有關之不當。」

Illinois v. Gates 案判決（462, U.S. 213, 223 (1983)）亦稱「於特定情事中宜否使用排除法則救濟之問題，長久以來即被認爲，應與試圖援用排除法則之當事人的增修條文第四條權利是否受到侵害之問題，分別以觀。（同此見解之判決：United States v. Havens, 466 U.S. 620, 627-628 (1980); Stone v. Powell, 428 U.S. 465, 486-487 (1976); Calandra, supra, at 348）證據排除法則乃透過該法則之遏止效果，以資保障增修條文第四條權利未來不受侵害之司法創設救濟途徑。與其他救濟途徑相同，該法則之適用範圍，以該救濟途徑最能有效達成目的之情況爲限。排除法則若無法達到顯著之遏止效果，其使用方法即顯有不合（United States v. Janis, 428 U.S. 433, 454 (1976)）。

在 Leon 案判決，本院將此等原則適用於警察客觀合理信賴一名立場中立之治安法官所簽發而事後被認爲無效之搜索票而爲搜索之情形。基於以下三個主要理由，本院認爲以排除法則作爲遏止負責簽發搜索票司法人員之不當行爲之舉，並非恰當。（Illinois v. Krull, 480 U.S. 340 (1987)案判決於分析 Leon 判決時所論）首先，本院指出依排除法則出現之歷史脈絡觀之，該法則創設之目的「係在

遏止警方之不當行爲，而非處罰司法人員之錯誤」。其次，並無證據顯示司法人員常有忽略或破壞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之慣習；亦無證據顯示，此等人員之違法行爲有施以此一極端排除制裁之必要。第三，最重要者，吾人無法相信排除執行搜索票扣押所得證據之排除，對於簽發該搜索票之司法人員有何遏止效果。

本院接著在 Leon 案中檢討排除法則之適用是否可望改變執法人員之行爲。本院認爲，執法人員之行爲在客觀上若屬合理，證據之排除即無法適當達成排除法則之目的，因爲本案之執法人員顯然已依合理人員於類似情況下所應爲之方式而行爲。證據之排除除非足以降低其爲類似執法行爲之意願，否則即無影響執行人員未來職務行爲之效用可言。

Massachusetts v. Sheppend 案判決（468 U.S. 981, 990-991 (1984)）亦稱，由於法官未能糾正所有事務性錯誤（即使法官已保證將更正此等錯誤）而將證據排除，並無法達成證據排除法則所擬發揮之遏止功能。職是之故，本院認爲，排除因於客觀上合理信賴事後被作廢之搜索票所搜獲證據之邊際利益或不存在之利益，並不能合理化證據排除所生之實質成本。

被上訴人援引 United State v. Hensley 案判決（469 U.S. 221 (1985)），主張於其逮捕之後所扣押之證據應予排除，因爲伊係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違反行爲之被害人。（見被上訴人之補充理由狀）在 Hensley 案判決中，本院認定攔檢搜身（Terry stop）時所搜獲之系爭證據資料，具有證據能力，因爲該搜索係執行攔檢搜身之執法人員，客觀合理信賴持有合理可疑事由進行攔檢搜身之其他單位警察人員所簽發之通告書所爲。由於本院於 Hensley 案中認爲該案事實不構成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之違反，故該案審理庭從未考慮遭扣押之證據應否排除之問題。Hensley 案判決與本院於其他案件所表明之原則並無矛盾，此一原則已如前述。

被上訴人另援用 Whitely v. Warden, Wyoming State Penitentiary 案判決（4401 U.S. 560 (1971)），辯稱本案所扣押證據應予強制排除。在 Whitely 案中，警察根據無線電通報指稱兩名嫌疑人涉及兩宗搶劫案，遂將 Whitely 逮捕而起出不利於 Whitely 之證據，本院認爲該執法行爲已違反增修條文第四條之規定。本院在該判決中認爲，雖然警察有權得依無線電通報所述內容而爲執法行爲，但因法院

之拘票（逮捕令）及其後無線電通報所根據之被害人初步指認，並不足以構成相當事由成立之獨立司法評量。本院因此認定「執法人員非法逮捕之行爲，與其他執法人員同僚所爲促發逮捕行爲決定所遭受之違憲爭執間，不得強予割裂。該逮捕之後取得之證據，既然違反 Whitely 之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所享有之憲法權利，即應於審判中排除之。（Mapp v. Ohio, 367 U.S. 643 (1991)（Whitely, 568-569）

雖然 Whitely 案判決於判斷警方行爲是否違反增修條文第四條時，明白肯認其關聯性，但該判決作爲排除法則適用先例之價值則十分可疑。Whitely 案判決顯將增修條文第四條之違反與違反增修條文第四條後之排除法則適用，視爲同義詞。然而本院其後所爲之判決，已經拒絕再採此等反射性的排除法則適用。（Krull,同上；Sheppard, 同上；United States v. Leon, 468 U.S. 897 (1984); Calandra 同上）此等出現在後之判決強調，證據排除之問題，應與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違反之問題分別以觀；只有在排除法則最能達成其救濟目的之情況下，證據之排除始見適當。

本判決關於此一問題之立場。與 Krull 案判決之不同意見書一致。該案係處理與善意例外有關問題之 Leon 案及 Sheppard 案之後之唯一重要案件。在該案中，本院認爲執法人員於客觀上合理信賴事後被宣告違憲之法律規定爲合憲時，即有善意例外之適用。（Krull, 480 U.S. 346）即使提出該案不同意見書之大法官亦同意：Leon 案判決已爲排除法則應否適用問題之分析，建立了適當的架構。彼等只不過認爲「Leon 案判決所持理由之適用導致了相反結果。」（O'Connor 不同意見書）總之，被上訴人並未能說服本院放棄 Leon 案判決所建立之架構。

將 Leon 案判決之說理應用於本案事實後，本院認爲亞利桑那州最高院之判決應予撤銷。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以爲，該院無法「支持執法人員所犯事務性錯誤與法院聘僱人員所犯類似錯誤，二者之間應有區分之見解」。「縱然假定此等錯誤應由法院負責，亦不應定認爲排除法則於該案事實無其適用。」

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上開判決意旨，適與前述 Leon、Sheppard 及 Krull 等案判決之說理相反。質言之，若法院聘僱人員應爲錯誤之電腦紀錄負責，審判中即使將證據排除，亦無法充分遏止未來的錯誤，從而此一嚴厲制裁即有欠合理。首先，如同本院於 Leon 案判決所指出，由歷史角度觀之，排除

法則設計之目的，本在遏止警方人員之不當行爲而非法院僱用人員所犯之錯誤。第二，被上訴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法院僱用人員有忽視或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之傾向，抑且無法說明何以對於法院僱用人員此一不適法行爲，有施以證據排除之極端制裁的必要。相反的，本案事實審法院之書記官長已經證稱，在證據排除聽審程序中，此種錯誤三、四年才發生一次。

最後，亦爲最重要之一點，吾人並無理由足以相信排除法則於本案情況之適用，對於負責向警方通知通緝書已被撤銷之法院事務人員有何重大效果。由於法院事務人員並不隸屬積極從事犯罪偵查之執行機關，彼等對於特定案件之偵辦結果如何，並無利害關係可言。吾人實無法期待證據排除之威脅，對於此等人員未向警員通報通緝書已被撤銷之消極行爲，有何防制作用。

如果應爲警方電腦系統錯誤登載負責之人確爲法院之事務人員，則吾人亦無法期待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有何等改變執行逮捕之警察人員行爲之效果。正如本案事實審法院所言：「我們認爲警察人員（在此情形下）必須予以逮捕；如果不爲逮捕，將有怠忽職守之嫌。」（如同 White 大法官於 Stone v. Powell 案判決之不同意見書中所言：「證據排除須有抑制警察人員從事同類行爲意願之效果，否則，於其未來之執法行爲即無法有所影響。」）如前所述，事實審法院之書記官長已經證稱，在證據排除聽審程序中，此種錯誤三、四年才發生一次。實際上，法院事務人員於發現此一錯誤時，立即予以更正，並且蒐尋其電腦檔案，以確認並無其他類似錯誤存在。亦無跡象顯示，執行逮捕之警員於行逮捕之際，並非客觀合理信賴警方電腦紀錄據以執行職務。本院適用 Leon 案判決所建立之架構，肯定法院僱用人員之事務性錯誤，足以成立排除法則之無條件例外。

據上論結，於茲判示：最高法院判決應予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就不符本案判決意旨部分，另行審理程序。

25. Willianson v. U.S.

512 U.S. 594（1994）

陳瑞仁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聯邦證據法 Rule 804(b)(3)規定「一項陳述於做成時…明顯將置陳述人於刑事責任，致一般立於陳述人地位之有理性之人，若非信其為真，將不會為該陳述者，該陳述有證據能力。」對此條文之最忠實之解讀，應該是「非對己不利之陳述」應無證據能力，縱使該陳述是包含在一段整體而言是對己不利的廣泛陳述當中，亦然。雖然該條文字「陳述」有可能指廣泛之表示，亦有可能指單一之言詞，但從該條文字所能顯示出之基本原則，係指向狹義的解讀，因此應該只有一項自白中個別對己不利之特定詞句為該條所涵蓋。本條之法理基礎在於依據普通常識，縱使這些不是特別誠實之人，除非信其為真，不會說出對己不利之陳述。但此種觀念並不能延伸至非對己不利之自白部分，亦不能延伸至事實上對己有利之部分或是附隨於對己不利陳述之陳述，縱使這些附隨陳述在利與不利間是中立的。地方法院不得僅因某項陳述是一段較完整自白的一部，即假定該陳述是對己不利，尤其是該陳述是牽連他人入罪時。本條文之文義已非常清楚，足以超越起草委員會立法說明之模糊解說。

   (The most faithful reading of Rule 804(b)(3) - which renders admissible "statement[s] which . . . so far ten[d] to subject the declarant to . . . criminal liability . . .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 . . would not have made [them] unless believing [them] to be true" - is that it does not allow admission of non-self-inculpatory statements, even if they are made within a broader narrative that is generally self-inculpatory. Although the statutory term "statement" can mean either an extended

declaration or a single remark, the principle behind the Rule, so far as it is discernible from the text, points clearly to the narrower reading, so that only those remarks within a confession that are individually self-inculpatory are covered. The Rule is founded on the common sense notion that reasonable people, even those who are not especially honest, tend not to make self-inculpatory statements unless they believe them to be true. This notion does not extend to a confession's non-self-inculpatory parts - to parts that are actually self-exculpatory, or to collateral statements, even ones that are neutral as to interest. A district court may not just assume that a statement is self-inculpatory because it is part of a fuller confession, especially when the statement implicates someone else. The policy expressed in the Rule's text is clear enough that it outweighs whatever force lies in ambiguous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e Advisory Committee Notes to the Rule.)

2. 前述之解讀方式，並不會使違反刑事利益傳聞例外之規定空洞化，仍有許多情況下 Rule 804(b)(3)會容許入被告於罪之陳述的證據能力。被逮捕之共犯的自白如果真的是對己不利，而不是因推卸責任或討好當局而來，仍有證據能力。本條下之問題自始至終是在於系爭陳述是否充分地違反條文所稱之陳述人之刑事利益，而此問題之解答也只能依個案之具體情況認定之。

   (The foregoing reading does not eviscerate the against penal interest exception. There are many circumstances in which Rule 804(b)(3) does allow the admission of statements that inculpate a criminal defendant. Even the confessions of arrested accomplices may be admissible if they are truly self-inculpatory, rather than merely attempts to shift blame or curry favor. The question under the Rule is always whether the statement at issue was sufficiently against the declarant's penal interest under the Rule's language, and this question can only be answered in light of all the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關 鍵 詞

self-inculpatory statements（對己不利陳述）；self-serving statements（對己有利陳述）；collateral statements（附隨陳述，即附隨於不利陳述之陳述）；neutral statements（中立陳述，利與不利之間中立）；the against penal interest exception（違反刑事利益陳述之傳聞例外）；admissible（有證據能力）。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O’Connor 主筆撰寫）

事 實

一位副警長因雷吉諾·哈利斯在公路上蛇行而將他盤查攔阻，哈利斯同意搜索該車，結果在行李廂的二個手提箱內發現有十八公斤的古柯鹼，哈利斯因而被逮捕。

在哈利斯被捕後不久，緝毒局探員多納德·華爾頓曾以電話詢問他，哈利斯陳稱該等古柯鹼係來自羅德岱堡一位不知名的古巴人，而其所有人係本件上訴人威廉森，當晚其本來要將毒品送到一個大型垃圾桶。另有一些物證指向威廉森：行李箱上列有威廉森姊妹的英文姓名縮寫；租車契約書記載威廉森爲額外駕駛人；在前座置物櫃中發現有一紙信封其收件人爲威廉森，另有一張收據載有威廉森女友之地址。數小時後，華爾頓探員當面與哈利斯面談，哈利斯供稱他是在數日前租到該車並開至羅德岱堡與威廉森見面。依據哈利斯，他是從威廉森的一位古巴友人拿到該等古柯鹼，而該古巴人將古柯鹼放在車上時有留一張紙條指示其應如何交付毒品。哈利斯再次供稱其所獲之指示是將毒品放在某一大型垃圾桶內，然後回到車上離去，不用等人來取貨。

華爾頓探員於是開始安排控制下交付，但當華爾頓正要離開訊問室時，哈利斯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向華爾頓說「你不能做」，「那不是眞的，我不能讓你白忙一場」。哈利斯接著向華爾頓說，有關古巴人、紙條與垃圾桶之事都是虛構的，實情應是他正幫威廉森運送古柯鹼至亞特蘭大，而威廉森當時就開一部出租車在他前面，哈利斯還說當他的車子被攔下時，威廉森還

繞回來經過攔車地點，有看到哈利斯的行李廂被打開。哈利斯解釋說，因爲威廉森顯然已看到警方搜車，控制下交付已不可能。哈利斯告訴華爾頓說他對於毒品來源說謊，是因爲他很怕威廉森。雖然哈利斯是自願爲對己不利之陳述，他並不要講話被錄音，且拒絕在書面紀錄上簽名。華爾頓證稱他確有承諾向聯邦助理檢察官報告哈利斯的合作態度，但兩人間並無有關回報或報酬之約定。

威廉森最後被判決有罪，罪名爲意圖散布而持有古柯鹼、意圖散布而持有古柯鹼之共謀不法罪及爲販賣古柯鹼而從事州際旅行罪。當哈利斯被傳喚至威廉森之審判案中作證時，雖然檢方提出豁免承諾，甚至法院命令其做證不成後再論其藐視法庭罪，哈利斯仍拒絕之。聯邦地方法院於是裁定，依據聯邦證據法 Rule 804(b)(3)華爾頓探員得出庭將哈利斯對所爲之陳述引進法庭：「本院裁定該等陳述有證據能力，依據有關違反利益之陳述之規定〔Rule 804(b)(3)〕。第一，被告哈利斯之陳述明顯置其本身於刑事責任中，係違反其刑事利益。第二，被告哈利斯，即陳述人，確實未能出庭作證。第三，如本席於昨日發現者，本案有充分旁證足以擔保其陳述之可靠性，因此，依據[United States v. Harrell, 788 F.2d 1524 (CA11 1986)]，此些由被告哈利斯所爲，置威廉森於刑事責任之陳述，應有證據能力。」

威廉森對有罪判決提起上訴，主張原審認哈利斯之陳述有證據能力，係違反 Rule 804(b)(3)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之面對證人權。第十一巡回上訴法院維持原判，本院裁定受理上訴。

判　決

原判決撤銷，發回重審。

理　由

本院對傳聞例外中之「違反刑事利益陳述」的範圍做一澄清。

A

傳聞法則（聯邦證據法 Rule 802）是建立在一項基礎上：庭外陳述通常是危險有害的。陳述人可能說謊；他對其所陳述之事件可能觀察錯誤；他有可能記憶錯誤；他的言詞可能被聽者所誤會或斷章取義。而在庭內陳述時所有能夠將這些危險降至最低的方法：宣誓具結、讓證人感受到訴訟程序的嚴肅性、讓陪審團能夠親眼觀察證人之

行爲舉止，以及最重要者，對造之反詰問權之行使，在庭外陳述時均未行使。不過，聯邦證據法亦承認確有某些庭外陳述較少有傳聞危險，因此將之排除在傳聞無證據能力之原則之外。其中之類型之一便是「違反陳述人利益之陳述」:「該陳述於做成時明顯置陳述人於刑事責任中，足認除非相信爲眞，任何一個處於同於陳述人地位之人，均不會爲此陳述」，參聯邦證據法 Rule 804(b)(3)。

爲了要決定哈利斯之自白得否依據 Rule 804(b)(3)賦與其證據能力，我們首先須決定該條所稱之「陳述」(statement)意義爲何。同法 801(a)(1)對陳述之定義係「一項口頭或書面之主張」(an oral or written assertion)，另一可能是韋氏第三版新國際字典第二二二九頁定義 2(a)（一九六一年）所下之定義「一項報告或說明」(a report or narrative)，其內涵係廣泛之宣示。依此廣義解讀，哈利斯之全部自白，雖然部分不利於己，部分非不利於己，只要加總之後足夠不利於其本人，即有證據能力。另一個「陳述」之意義則係「單獨一項宣示或說詞」(a single declaration or remark)，同上定義 2(b)，即有可能使 Rule 804(b)(3)僅包含自白中個別不利於己之宣示或說詞。

雖然這種說文解字並不能眞接解決問題，但該條文背後之原則，從條文所得引申者，亦均指向狹義的解讀方式。Rule 804(b)(3)的理論基礎在於：依據普通常識，有理性之人，縱使不一定特別誠實，通常不會說出對己不利之陳述，除非他們相信其內容爲眞。此種觀念應不能延伸至廣義的「陳述」，一個人所爲大體上對己不利之自白，並不會使該自白中非對己不利之部分更加可信。最有效的說謊方式之一，本來就是將不實中滲進若干眞實，尤其該眞實是對己不利時，更有其說服力。從此方面言之，就如同哈利斯在第二次偵訊時所承認者，其第一次陳述事實上後來被證明爲虛僞。而當自白中有部分事實上是卸除自己責任時，Rule 804(b)(3)所立之一般性基礎將更形薄弱。卸責陳述是最有可能的謊言，自不能僅因其與對己不利陳述並列在旁，即增加其可接受度。

因此我們並不同意大法官 Kennedy 之意見。他認爲本條可以解讀爲宣示一項政策，即所有的附隨陳述（collateral statements），甚至含未違反陳述人利益者，均有證據能力。然不論 Rule 804(b)(3)之條文或傳聞法則之一般理論，都未提到證據能力可以視該陳述是否附隨於某項不利於己的陳述而定。一

項會使自己負起責任之陳述，確實較爲可靠。但一項陳述是某項不利於己的陳述之附屬物，並不能說明何以該附隨性陳述可靠性亦較高。我們實在無理由將附隨陳述，縱使它們在利與不利間是中立的，與其他無證據能力的傳聞性陳述做區分。

國會當然可以在憲法之面對證人條款（the Confrontation Clause）之範圍內，以某些陳述與對己不利陳述非常接近爲由，立法讓這些陳述取得證據能力。但我們絕不會輕易認爲現在這種模糊的語言，會有與該條文之基本原理大相逕庭之任何意涵在。地方法院不得僅因爲了要適用 Rule 804(b)(3)，即假設該自白中之任何一段陳述都是對己不利，尤其是該段陳述係指向他人犯罪時。「共犯被捕後之陳述一向在傳統觀念裡是特別可疑，基於其將被告扯進刑責並推卸自己責任之強烈動機，一位共同被告有關被告過去如何說以及如何做之陳述，比一般之傳聞證據更不可信，請參 Lee v. Illinois, 476 U.S. 530, 541 (1986) 及 Bruton v. United States, 391 U.S. 123, 136 (1968); Dutton v. Evans, 400 U.S. 74, 98 (1970) (大法官 Harlan 對結論表示贊同)。

大法官 Kennedy 指出起草委員會對 Rule 804(b)(3)之立法說明（the Advisory Committee Notes），應可做爲我們所反對之見解之背書，亦即，如果總括起來整段說明對己不利，則包括非對己不利的陳述部分（但其中明顯屬對己有利部分除外，閱後十一頁）均應有證據能力。該立法說明如下：「第三者之自白可能包括對被告不利之陳述，依據違反利益之一般理論，該些陳述得被引進做爲證據。… Douglas v. Alabama, 380 U.S. 415 (1965), 以及 Bruton v. United States, 391 U.S. 123 (1968)二件判例，絕對沒有要求所有會使他人負責的陳述，都必須從違反利益之陳述的範疇中排除之。一項陳述是否事實上違反利益，必須從個案的情況認定之。因此，一項在拘禁狀態中坦承犯罪，且同時指出他人犯罪之陳述，其動機確有可能是想要討好當局，因此即喪失被列入違反利益陳述之資格。但另方面，在不同情況下所爲之相同內容之陳述，例如向熟識者所爲，則顯有資格被列入。…對己有利陳述與證據能力否定之問題，在 McCormick 256.有被討論過。」以上見 28 U.S.C.App., p. 790。

但上述詞句並非明確，且有些部分甚至指向另一端—尤其是 McCormick 院長之著作中經起草

委員會背書之部分：「有些利益中立之詞句，對違反利益的陳述有其意義者，或許可保留一些彈性。但一字不漏引進對己有利的陳述則似乎問題重重。在對己有利與非對己有利兩部分可以分開之時，接受陳述中非對己有利部分，而排除對己有利部分，似乎是調和證據容許性與可靠性之最實際的方法。」，參閱 McCormick, Law of Evidence 256, pp. 551-553 (1954)。

在對於應否給予立法說明多少份量之問題不做決定之情形下（比較 Schiavone v. Fortune, 477 U.S. 21, 31 (1986) (立法說明應給予某些尊重) 與 Green v. Bock Laundry Machine Co., 490 U.S. 504, 528 (1989) (Scalia 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立法說明應無庸列入任何考量)），本判決之結論是法條之立法政策已明白地指出其條文之份量已超越立法說明。雖然 Kennedy 大法官相信本條條文可以被持平地解讀爲容許附隨性陳述之證據能力，但基於以上理由，我們並不同意。

B

我們亦無法認同大法官 Kennedy 之擔憂，即我們對本條之解讀方式會使違反利益陳述之傳聞例外規定成爲空洞化，或令其喪失實質意義。因爲 Rule 804(b)(3) 在不少情形下，仍會容許牽扯刑事被告之陳述的證據能力，如果被逮捕之共犯之自白眞正是對己不利，而非僅是想要移轉責任或博取好感，仍然有其證據能力。例如，陳述人單純地對己不利自白稱：「是的，我殺死某某人」，仍有可能依據 Rule 804(b)(3) 引進做爲與其共謀不法之共犯之證據，參 Pinkerton v. United States, 328 U. S. 640, 647 (1946)。同理，經由指出陳述人知悉某些事情，一項對己不利陳述，亦能使陪審團推論其同夥亦知情。此外，若與其他證據共同列入考量，一個共犯的對己不利陳述亦得直接置被告於刑事責任之下：「我在星期五上午搶銀行」，若與某位證人所述陳述人與被告在星期五上午有一同開車離開，仍得做爲被告有參與搶劫的證據。

進而言之，一項陳述是否對己不利必須從整個案情來看。有某些陳述表面上是中立，實際上是違反陳述人之利益。「我把槍藏在喬尹的公寓中」或許不是犯罪自白，但它有可能讓警察找到凶器，從而變成是對己不利之陳述。「山姆和我一起去喬尹的家」會違反陳述人的利益—如果任何一位處於陳述人地位的有理性之人，都知道只要與

喬尹與山姆有所牽扯，就會被捲進喬尹與山姆之共謀不法罪中。而任何詳細向警察說明犯罪細節之陳述，在某些情況下，亦有可能違反陳述人之利益。Rule 804(b)(3)之問題總是在於該陳述是否足夠對陳述人產生刑事上之不利益，「致一般與陳述人處於相同地位之有理性之人，除非相信爲眞，不會有此陳述」，而此問題僅能由所有之具體情況認定之。

C

不過，在本案，我們並不能下結論稱哈利斯之全部陳述均能得取得證據能力論。部分哈利斯之自白很明顯地得依據 Rule 804(b)(3)取得證據能力，例如，當他說他知道手提箱裡放有毒品時，他基本上就已喪失持有毒品罪之惟一抗辯：不知內容爲何物。但其自白之其他部分，尤其是牽扯威廉森入罪之部分，卻很難讓其本人負起刑事責任。任何一位處於哈利斯立場的有理性之人，都應該會想到將別人拉扯入罪就能減低自己的刑責風險，至少在量刑更是如此。在一項大陰謀裡，小魚總會獲判比跑全場的大角色較輕之刑期，例如美國量刑委員會所編之指導手冊 3B1.2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版)，尤其是該小角非常樂意幫助當局逮獲大魚時，更是如此，參前述手冊 5K1.1.。

本件從紀錄上看不出聯邦地方法院或上訴法院對於哈利斯的自白，有去探討每一段是否屬「對己不利」。如上所述，這或許是一項事實面之密集探索，亟需對所牽涉的犯罪行爲之各種具體情況做仔細檢視。我們因此將本件發回給上訴法院去指導第一審的調查。

基於這處置方式，我們無庸對威廉森的主張，即該等陳述亦得依據憲法之面對證人條款認定爲無證據能力（其泛論可參 White v. Illinois, 502 U.S. ___ (1992)），發表任何意見。特別是我們無庸決定違反利益陳述之傳聞例外，是否爲面對證人權之「根深柢固」的傳統傳聞例外，比較例如 United States v. Seeley, 892 F.2d 1, 2 (CA1 1989) (認爲本例外是根深柢固之傳統例外)與 United States v. Flores, 985 F.2d 770 (CA5 1993) (看法相反)。但我們在此強調，某項陳述事實上確實是對己不利（我們認爲這是適用804(b)(3)的前提要件），是可靠性的特別擔保，也使得該項陳述在面對證人權時仍能取得證據能力，參 Lee v. Illinois, 476 U. S. 530, 543 -545 (1986)。我們在此也無庸決定，如同某些上訴法院所主張者，804(b)(3)的第二句：「其陳述有置陳

述人於刑事責任之虞，但是用來卸除被告之刑事責任時，除非另有旁證足認該陳述之可靠性，否則無證據能力」是否也要求「對己不利」的陳述，也須要有其他旁證，參例如 United States v. Alvarez, 584 F.2d 694, 701 (CA5 1978); United States v. Taggart, 944 F.2d 837, 840 (CA11 1991)。

上訴法院之判決應予撤銷，本案發回，以進行與本判決一致之程序。

謹判決如上。

大法官 Kennedy 主筆，首席大法官 Thomas 連署之協同意見書

本席贊同判決結論（發回更審），但提出不同理由。

I

聯邦證據法 802 條概括規定傳聞證據在聯邦法院之訴訟程序中無證據能力，但有很多例外。本案之爭點在於：Rule 804(b)(3)規定一項陳述於做成時明顯違反陳述人之金錢或財產上利益，或明顯置陳述人於民事或刑事責任，或造成陳述人對他人之權利失效，致一般立於陳述人地位之有理性之人，若非信其爲眞，將不會爲該陳述者，該陳述有證據能力。但該陳述得置陳述人於刑事責任而免除被告之刑事責任時，除非有其他旁証足以指出其可靠性，並不得爲証據。

違反利益陳述之傳聞例外的法理基礎在於，一般人很少會說出對己不利之陳述，除非有理由相信其爲眞實，參起草委員會對本條之立法說明。當然，陳述人有可能在說出對己不利陳述（例如「我開槍射殺銀行員」）之同時，又說出附隨但相關之陳述（例如「逃逸時車子是約翰開的」），這些附隨陳述在 Rule 804(b)(3)之下有無證據能力？是本案所要探討者。

在學者間，對於附隨陳述之證據能力問題本就爭論已久。Wigmore 院長是肯定說之最有力支持者，他說：「這種陳述所得採用者，並不限於違反利益部分，尚應及於該陳述內之每一項事實」，參 5 J. Wigmore, Evidence 1465, p. 271 (3d ed. 1940) ; 5 J. Wigmore, Evidence 1465, p. 339 (J. Chadbourne 一九七四年重編)及英國判例 Higham v. Ridgway, 10 East. 109, 103 Eng.Rep. 717 (K.B. 1808)。依據 Wigmore 的說法，因爲「該陳述係在陳述人具有相當之誠懇性與正確性之情況下被說出來」，所以整段陳述均應有證據能力，參 5 J. Wigmore 1465, p. 271 (3d ed. 1940)。McCormick 院長對於附

隨陳述之態度則較保守，他是贊成帶有中立色彩的附隨陳述應有證據能力，而主張排除那些對己有利者。例如，「約翰與我一起搶銀行」，「約翰與」這段話是中立的（先略掉共謀不法罪之可能），另方面「是約翰，而不是我開槍射殺銀行員」則某些程度是對己有利，因此應無證據能力，參 C. McCormick, Law of Evidence 256, pp. 552-553 (1954) (下稱 McCormick)。Jefferson 教授則採最狹義說，其認爲違反利益陳述之可靠性單純來自於陳述中對己不利之部分，所以其使用應僅限於「用來證明對己不利之事實」，參 Jefferson, Declarations Against Interest: An Exception to the Hearsay Rule, 58 Harv.L.Rev. 1, 62-63 (1944)。依 Jefferson 教授之看法，不論是中立的附隨陳述，或對己有利的附隨陳述，都沒有證據能力。

一九七五年國會透過 Rule 804(b)(3)建立起傳聞法則之一個例外，即違反刑事、財產、金錢及法律利益之陳述（對該等利益並不做區分）。不過，其條文卻未指明附隨性之陳述是否有證據，見前第五頁，另參 Federal Rule of Evidence 804(b)(3) and Inculpatory Statements Against Penal Interest, 66 Calif.L.Rev. 1189, 1202 (1978)（「Rule 804(b)(3)條文本身幾乎沒有提供任何指示，甚且對肯定說或否定說都提供依據」）。本院對此問題之解決，就我對多數意見之了解，應是採極端之立場，即沒有任何的附隨陳述可以依據 Rule 804(b)(3)取得證據能力。（採「較狹義的解讀」而認爲 Rule 804(b)(3)僅包含自白中個別不利於己之陳述）；前第一頁（大法官 Ginsburg，部分贊同，對判決贊同）；但比較前第一至二頁（大法官 Scalia 協同意見）。本院達成該結論之依據是「條文後之原則」即有理性之人不會說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非他們相信爲眞，且認爲條文所含之立法政策「就是不包含」附隨陳述。雖然承認國會固得「因爲該等陳述與對己不利陳述之接近性而賦與其證據能力」，但又說「我們絕不會輕易認爲現在這種模糊的語言，會有與該條文之基本原理大相逕庭之任何意涵在」。

就此而言，本人並不同意這種分析。所有人都同意違反利益之陳述之所以有證據能力，過去與現在都是「有理性之人不會有此陳述，除非信其爲眞」。但這點並不能解決對附隨陳述有無證據能力之長期爭論，權威著作對此並未有一致之見解。如果眾說有較趨於一致的地方，應是他們都贊同某些附隨陳

述應有證據能力。既然該傳聞例外之基礎原則並未能將附隨陳述之爭論定於任何一方，本人謹建議我們不必去認定對此問題保持緘默的 Rule 804(b)(3)條文事實上是支持互相衝突說法中之何者，該條文之緘默既未支持 Jefferson 對於附隨陳述的說法，亦未支持 McCormick 或 Wigmore 的說法。

II

因爲 Rule 804(b)(3)的條文並未對附隨陳述的證據能力表示任何立場，我們就必須決定對此問題是否有其他之權威見解。依我的看法，有三種來源足以顯示出 Rule 804(b)(3)確實容許某些附隨陳述的證據能力：起草委員會之立法說明、普通法（common law）下不利於己陳述之傳聞例外，以及國會應不會立一個毫無用處的法條的一般假設。

首先，起草委員會之立法說明指出有一些附隨陳述有證據能力。事實上，它有以特定名詞提及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通常第三人之自白均會被認爲是在卸除被告之刑責，但情形並非絕對如此，第三人之自白亦有可能包含牽扯被告入罪之陳述，而依不利於己陳述之一般原則，這些陳述得以「相關陳述」（related statements）之地位取得證據能力。」參 28 U.S.C. App., p. 790。這種詞句看起來是直接講明附隨陳述依據 Rule 804(b)(3)是有證據能力，但本院卻認爲「法條之立法政策已明白地指出其條文之份量已超越立法說明」，參前第八頁。但多數意見這種看法仍是以問答問，所謂法條對附隨陳述證據能力之立法政策到底爲何？如前所述，該條文之文字並未回答附隨陳述有無證據能力這個問題。當證據法之條文無法回答適用法條所必有之問題時（就如同現在這個情形）；當起草委員會之立法說明剛好可以回答問題時，我們過去的實務告訴我們，應該對立法說明加以注意。在解釋證據法時，我們一直有在援引這些立法說明，我實在看不出何以現在必須拋棄這種確定已久的作法。參 Huddleston v. United States, 485 U. S. 681, 688 (1988); United States v. Owens, 484 U. S. 554, 562 (1988); Bourjaily v. United States, 483 U. S. 171, 179 , 註解二 (1987); United States v. Abel, 469 U. S. 45, 51 (1984)。

第二，縱使起草委員會之立法說明對附隨陳述保持緘默，我也不會採用一個排除掉所有附隨於違反刑事利益言詞之所有陳述之證據能力的原則。在缺乏相反指示

下，我們應該可以假設國會之眞意應在於，聯邦證據法中之原則與名詞均得像它們在普通法中一樣地被適用，參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 ___, ___ (1993); Green v. Bock Laundry Machine Co., 490 U.S. 504, 521-522 (1989); 另 United States v. Abel, at 51-52; Midlantic Nat. Bank v. New Jersey D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474 U.S. 494, 501 (1986)（「如果國會意圖立法去改變一個司法既有的觀念，它會明文指示」）。依此法律解釋原則，附隨陳述應有證據能力，蓋「從有此觀念以來，違反利益之陳述不僅可用來證明不利於己的事實，亦可用來證明包含於附隨陳述中且與不利於己陳述相關連之其他事實」，參 Jefferson, 58 Harv. L. Rev., at 57; 並參 McCormick 256; 5 J. Wigmore, Evidence 1465 (3d ed. 1940)。起草委員會之立法說明在指出附隨陳述應有證據能力時，確有提到「依據一般理論」相關陳述應有證據能力，此即是對當時立法時之法律狀態之描述。Rule 804(b)(3)並未對該問題有所指示，但國會是在容許附隨陳述之證據能力的背景下去立法的，而我實在無法相信國會會給普通法原則一個無聲的葬禮。

第三個可用來反對本院解釋的理由，與違反刑事利益且將被告牽扯入罪之陳述有關。毫無爭議的，Rule 804(b)(3) 之條文顯然有將這種類型的陳述的證據能力列入考慮。在缺乏反對規定之明文下，我們應可認定不利於被告之陳述在違反利益陳述之傳聞例外中多少有其效果。參 American Paper Institute, Inc. v. American Electric Power Service Corp., 461 U.S. 402, 421 (1983) (「法院不應以一隻手去癱瘓的另一隻手所想提昇的東西」) 這種觀念教導我們應該反對採取一個排除所有附隨陳述的法則。就如同論者所言「附隨陳述的排除，將導致幾乎所有的不利陳述都被排除」，參 Comment, 66 Calif.L.Rev., at 1207; see also Note, Inculpatory Statements Against Penal Interest and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83 Colum.L.Rev. 159, 163 (1983)（「大部分不利於被告之陳述，都只是不利於陳述人自己利益陳述中之一部分而已，而陳述中特別不利於被告之部分，很少會被直接歸類爲違反陳述人本人的利益。」）另參 Davenport,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and the Co-Conspirator Exception in Criminal Prosecutions: A Functional Analysis, 85 Harv. L. Rev. 1378, 1396 (1972)(「指名另一個人是其同夥，幾乎不可能會違反陳述人本人

之利益」)。誠如另一位論者所言，若採無任何附隨陳述可以有證據能力之結論，即本院今日達成之結論，「勢將使違反利益之例外規定空洞化」，參 Comment, 66 Calif.L.Rev., at 1213。

爲了確定起見，在本院所採之解讀下，本條規定在某些情況下確仍有其適用。例如當陳述人說他曾偷了某些物品時，該陳述得在被告贓物罪之追訴時用來證明被告所收受者確爲贓物。參 J. Weinstein & M. Berger, Weinstein's Evidence 804(b)(3)04., p. 804-164 (1993)。但如同不少論者所指出者，陳述人對己不利之詞句本身，若不再加任何東西，是很少會同時牽扯被告入罪的。我並不認爲國會會把違反利益陳述之傳聞例外規定，對於不利於被告陳述所產生之效果，限縮到如此之微小。

最後，我注意到本院判決不僅適用於不利於被告之陳述，也適用於有利於被告之陳述。如此一來，如果陳述人說「我是一個人搶商店」，就只有「我搶商店」這一部分能被引進被告之搶劫罪之審判，參 Note, Declarations Against Penal Interest: Standards of Admissibility Under an Emerging Majority Rule, 56 B.U.L.Rev. 148, 165, n. 95 (1976)，這豈非違反常理？本院對此法則並未提任何正當化的理由，也未解釋國會何以會對有利陳述之法律效果限縮至此。(「採用排除所有附隨陳述之證據能力之法則，將會導致對極有價值的證據咨意拒卻的後果」)。

III

雖然我願下結論稱 Rule 804(b)(3)應容許附隨於違反利益詞句之陳述的證據能力，此種結論當然仍未回答剩下來的問題：是否附隨於違反利益陳述之所有陳述均有證據能力？如是否定，那麼該採何種有限原則？起草委員會之立法說明主張並非所有的附隨陳述都有證據能力，例如該說明提及 McCormick 而非 Wigmore 的著作來做爲「在對己有利與對己不利陳述求取平衡點」之指導原則，參 28 U.S.C.App., p. 790。如前述第二頁所指出者，Wigmore 之處理方式會容許同一陳述內之所有內容之證據能力，但 McCormick 之方式則沒有這麼廣泛。McCormick 說「有些利益中立之陳述詞句，對違反利益的陳述有其意義者，或許可保留一些彈性，但一字不漏引進對己有利的陳述則似乎問題叢叢。」，參 McCormick 256, p. 552。McCormick 更進一步指出，當一個陳述包含對

己有利與不利兩部分時，應僅容許不利於己之部分之證據能力，而排除掉對己有利之部分—至少在有利與不利分得開時應該如此。由起草委員會提及（並明顯採納）McCormick 這件事來看，其應該是排除附隨陳述中之對己有利部分，但應容許附隨之中立陳述之證據能力。

在刑事案件中，一項對己有利之陳述，是指足以減低陳述人所須負擔之罪名或刑期者，參 M. Graham, Federal Practice and Procedure 6795, p. 810, n. 10 (1992) 例如，二個蒙面持槍者強劫銀行，其中一人開槍射殺銀行出納員，當其中一名搶匪說是另一個搶匪扣板機時，該陳述應屬對己有利而無證據能力，參前揭文（附隨的對己有利陳述是「是約翰開槍的」）（本案檢方亦承認這種陳述應無證據能力，閱檢方理由書第十二頁）。相反地，當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犯罪，而陳述人僅提及涉案人之姓名時，該陳述應被認爲是中立而非對己有利，參 Graham 前揭文 at 810, n. 10 （「約翰與我一起搶銀行」應屬於附隨之中立性陳述），參 Note, 56 B.U.L.Rev., at 166, n. 96。（「檢視這些法院判決後，可知附隨陳述是違反利益陳述之一部時，通常幾乎沒有例外，是中立，而非對己有利」）此問題之一般論述參 United States v. York, 933 F.2d 1343, 1362-1364 (CA7 1991); United States v. Casamento, 887 F.2d 1141, 1171 (CA2 1989)。

除了附隨且對己有利之陳述之證據能力有其限制外，另有些情況下，陳述人對當局所爲之陳述亦有其限制，此限制不僅對附隨陳述有適用，對違反刑事利益之詞句本身亦有適用。一個陳述人或許會相信其向當局所爲之有罪陳述，其實對其本人是有利的，例如爲了換取較好的處置，或是單純爲了良心之使喚。立法說明有將此潛在之可能性列入考慮，所以才會說：法院應該詳細檢視該陳述之具體情況以決定該陳述之「動機是否在討好當局」28 U.S.C.App., p. 790。看起來這點似乎與 McCormick 的看法相同：「縱使一項陳述在某方面言之是違反利益，但如果看得出來陳述人另有其不論利己與否的動機，而使其有說謊的可能性時，該陳述即應被排除。」McCormick 256, p. 553。

當然，由於陳述人在定義上就已是未能出庭做證，聯邦證據法 804(a)，因此也就無法加以詢問其陳述之眞正動機爲何。法院曾被迫嘗試去類型化何種陳述應在這種考慮下被排除。法院曾判定，例

如，向當局所爲承認犯罪之陳述，若是在放棄其他追訴或減低刑期之明顯交換條件下做成時，得因其太不可靠而加以排除，見 United States v. Scopo, 861 F.2d 339, 348 (CA2 1988) （「如果…一位認罪的被告與檢方或法院有約定在被定罪後不會被處罰，不會有刑責，則該陳述即非違反其刑事利益。」）但在另一極端，當檢警沒有減輕的承諾，且有告知陳述人其有保持緘默之權利，其任何陳述都可能被當做不利於其之證據時，法院通常即不會排除陳述人違反利益陳述之證據能力，見前述 348-349; United States v. Garcia, 897 F.2d 1413, 1421 (CA7 1990)（陳述人並非基於討好的動機，而是「在被告知米蘭達警語後，且未與檢方達成任何認罪協商下，自願性地陳述」）。這種劃線工作是適當且必要的，否則在陳述人換取寬容的可能意圖下，所有向警察所爲之違反利益陳述都會被排除，此結果應是法條本身與起草委員會均不願樂見的。

以下之結論，是我對違反被告刑事利益之陳述的處理方式之意見。法院首先應決定陳述人之陳述中是否包含一項違反刑事利益的事實，大法官 O’Connor 之意見（「哈利斯之自白中，有些部分顯然依據804(b)(3)有證據能力」）。如果有，法院原則上應該容許所有與該段違反刑事利益詞句有關連之所有陳述，但有下列二個限制：法院應該排除那些對己有利之程度已高到使其成爲不可靠的附隨陳述，此點起草委員會看法亦同（例如，被告將他自己可能犯罪之責任推給另外一個人）。第二點，當該陳述是在陳述人有高度動機去討好當局之情況下做成時，例如檢警有提出明確寬恕處置以換取陳述人之有罪自白時，整段陳述之證據能力均應被排除。

有關依據 Rule 804(b)(3)有無證據能力之裁定，依 Rule 104(a)屬前提問題，應由地方法院的法官來決定。這種必要性方面之決定，當然須視個案之具體情況認定之。因此，本判決所描述出來的一般原則之適用，須經一個困難且受事實拘束的決定過程。而地方法院之法官遠比上訴法院更接近案件之事實面，更能評估各種不同之狀況，也因此應給予寬闊的裁量空間去檢視一項特定的陳述究竟應全部或部分有證據能力。從而，同本院判決，我也認爲本件應發回重審，不過重審時應適用之原則本意見有所不同。

26. Segura v. United States
468 U.S. 796（1984）

林利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即使因為最初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為，聯邦地方法院無須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將根據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前已接獲之線報而取得合法搜索令進而對上訴人公寓進行搜索所查獲的證據予以排除。

(Notwithstanding the earlier illegal entry, the Fourth Amendment did not require suppression of the evidence seized later from the private residence pursuant to a valid search warrant because the warrant was issued on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the police before the initial entry.)

A. 證據排除法則不僅適用於從政府非法搜索或扣押而直接取得的初始證據（毒樹），也同樣適用於從非法取得之初始證據所衍生發現和查獲的衍生證據（毒樹果）。然而，證據排除法則並不適用於當警方的非法行為與發現證據和扣押證據之間的關連性非常薄弱，致使該證據因警方先前非法行為而沾染的毒性被稀釋的情況，例如當警方因獨立消息來源而發現或扣押某項證據，則這項證據不會被排除。

(The exclusionary rule reaches not only primary evidence obtained as a direct result of an illegal search or seizure, but also evidence later discovered and found to be derivative of an illegality or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The exclusionary rule does not apply, however, i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llegal police conduct and the discovery and seizure of the evidence is "so attenuated as to dissipate the taint," as, for example, where the police had an "independent source" for

discovery of the evidence.)

B. 在本案中，系爭證據是根據一個依據獨立消息來源而取得之搜索令所查獲和扣押的。治安法官核發搜索令所依據的資訊是來自於與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完全無關的消息來源，並且這個消息來源在探員非法進入該公寓前就早已得知。所以，不論探員起初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為是否違法，該行為與系爭證據能否被聯邦地方法院採納為呈堂證據並無關連，因此在本案不能援引毒樹果實理論來排除系爭證據。

(Here, there was an independent source for the challenged evidence; the evidence was discovered during a search of petitioners' apartment pursuant to a valid warrant. The information on which the warrant was secured came from sources wholly unconnected with the initial entry and was known to the agents well before that entry. Hence, whether the initial entry was illegal or not is irrelevant to the admissibility of the evidence, and exclusion of the evidence is not warranted as derivative or as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關 鍵 詞

drug trafficking（毒品交易）；cocaine（古柯鹼）；plain view （一目了然）；drug paraphernalia（與毒品交易有關的配備）；administrative delay（行政延誤）；probable cause（相當事由）；narcotics（毒品）；suppression of evidence（禁止證據呈堂）；the exclusionary rule（證據排除法則）；derivative evidence（衍生證據）；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毒樹果實理論）；independent source（獨立消息來源）；possessory interests（佔有權益）；privacy interests（隱私權益）；status quo（現狀）；stakeout（警戒盯梢）；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證據可採納性）；contraband（違禁品）。

（本案件判決由 Burger 大法官主筆撰寫）

事　實

在 1981 年 1 月，紐約緝毒組接獲線報指出上訴人 Andres Segura 和 Luz Marina Colon 可能在他們位於紐約的公寓裡進行非法古柯鹼交易。按照這個線報，緝毒組的探員持續跟監上訴人，直到上訴人在 1981 年 2 月 12 日被逮捕爲止。在 2 月 9 日那天，探員看到 Segura 和 Rivudalla-Vidal 見面。從後續發展的情況看來，這兩個人這次的會面可能是在商討 Segura 販賣古柯鹼給 Rivudalla-Vidal 的事。三天後，即 2 月 12 日，Segura 打電話給 Rivudalla-Vidal 並同意販賣古柯鹼給他。兩人約定於當天下午 5 點在紐約市皇后區 Segura 所指定的一家速食餐廳進行古柯鹼交易，Rivudalla-Vidal 和 Esther Parra 於約定時間下午 5 點到達那家餐廳。當 Segura 和 Rivudalla-Vidal 在餐廳裡時，探員看到 Colon 交付一個大包裹給當時坐在 Rivudalla-Vidal 停在餐廳停車場的車裡的 Parra。在 Colon 交付包裹給 Parra 不久後，Rivudalla-Vidal 和 Parra 便離開餐廳，準備回到他們自己的公寓。緝毒組的探員尾隨在後，當這兩人正要進入 Rivudalla-Vidal 的公寓時，探員將他們攔下來。探員搜查 Parra 後發現 Parra 持有古柯鹼，便立即逮捕 Rivudalla-Vidal 和 Parra。

在探員告知 Rivudalla-Vidal 和 Parra 他們在憲法上的權利之後，Rivudalla-Vidal 同意與探員合作。他承認向 Segura 購買古柯鹼，並證實 Colon 在當天稍早時曾在速食餐廳交付古柯鹼給 Parra，如同當時探員所看到的情形一樣。Rivudalla-Vidal 告訴探員 Segura 將在當天晚上 10 點左右打電話問他是否已把古柯鹼賣掉，如果已經賣掉，Segura 會再補貨給他。

同一天大約下午 6 點半到 7 點之間，紐約緝毒組的探員請求聯邦助理檢察官授權逮捕 Segura 和 Colon，而聯邦助理檢察官也核准了。聯邦助理檢察官告訴探員由於時間已晚，所以搜索上訴人公寓的搜索令可能要等到隔天才能取得，但是聯邦助理檢察官建議探員應該封鎖那間公寓以防止證據被毀滅。

大約晚上 7 點半，探員來到上訴人的公寓，並且從外面監視屋內的動靜。在晚上 11 點 15 分，Segura 獨自一個人進入公寓大樓的大廳

時，就立即被探員逮捕。他起先宣稱他不住在這棟大樓裡。探員們帶他前往他三樓的公寓，當探員敲門時，有一位後來被指認爲 Colon 的女人前來應門，然後探員們就在沒有請求進入或被允許進入公寓的情況下，和 Segura 一起進入公寓。除了 Colon 之外，上訴人的公寓裡還有另外三個人在客廳裡，探員告訴那些在場者 Segura 已被逮捕並且搜查那間公寓的搜查令正在申請當中。

探員與 Colon 及三位在場者在客廳短暫對話後，探員就對上訴人的公寓進行有限度的安全檢查，以確保沒有其他人躲在公寓裡會對他們的安全產生威脅或者有毀滅證據的疑慮。在安全檢查的過程中，探員在寢室裡一目了然地看到許多與毒品交易有關的配備，但是探員都沒有移動這些物品。在安全檢查之後，Colon 被探員逮捕。在合法逮捕的附帶搜索中，探員在 Colon 的皮包裡發現一把裝有子彈的左輪手槍和超過兩千美元的現金。Colon、Segura 和公寓裡的其他人都被探員帶回緝毒組的總部。

兩名緝毒組的探員留在上訴人的公寓裡等候搜索令。因爲行政上的延誤，搜索令的申請書直到隔天下午 5 點才交給治安法官。治安法官隨後核發了搜索令，緝毒組的探員在隔天下午 6 點左右對上訴人的公寓進行搜索，此時離探員最初進入上訴人公寓的時間相隔大約 19 個小時。在依據搜索令的搜索中，探員在上訴人的公寓裡發現將近 3 磅的古柯鹼、18 顆零點三八口徑左輪手槍的子彈（而這些子彈所適用的手槍與探員在 Colon 皮包裡所搜到的手槍相符）、超過五萬美元的現金和毒品的交易紀錄等。探員將這些物品和前一天晚上安全檢查時所看到的物品全部扣押。

聯邦檢方以共謀散布古柯鹼和散布及持有古柯鹼並意圖販售這兩項罪名起訴上訴人，紐約東區的聯邦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在審判前，上訴人提出要求聯邦地方法院將紐約緝毒組探員從上訴人公寓扣押的所有證據排除的聲請，這些證據包括探員在安全檢查中從上訴人寢室一目了然看到的那些與毒品交易有關的配備，和探員後來根據搜索令而首次查獲並扣押的古柯鹼等。經過證據聽證會後，聯邦地方法院核准了上訴人的聲請。聯邦地方法院認爲紐約緝毒組的探員在進入上訴人公寓當時，並沒有發生任何的緊急狀況以做爲他們沒有取得搜索令也沒有獲得許可就得以逕自進入上訴人公寓的正當理由。因此，聯邦地方法院裁決緝毒組探員逕自進入上訴人

的公寓、逮捕 Colon 和對 Colon 的附帶搜索，以及在寢室一目了然看到並在後來扣押的那些毒品皆屬違法。聯邦地方法院認爲這些證據爲非法搜索的果實（衍生證據），所以命令將這些證據排除。雖然聯邦地方法院裁決治安法官所核發的搜索令是根據足以構成相當事由的線報，但是聯邦地方法院將 *United States v. Griffin* 的判決闡釋爲即使是根據合法搜索所扣押的毒樹果證據，該證據仍應予以排除。聯邦地方法院認爲若非緝毒組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的公寓和佔據該公寓，這些證據也許會被 Colon 移走或毀滅而不被探員在根據搜索令搜索時查獲。因此聯邦地方法院裁決在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的公寓和佔據該公寓的情況下，即使探員後來根據合法搜索令所扣押的毒品，也是屬於毒樹果，應予以排除。

上訴時，本案的爭議侷限在使上訴人入罪的證據是否應予以排除。聯邦上訴法院確認聯邦地方法院的部分判決，但也撤銷聯邦地方法院的部分判決。聯邦上訴法院確認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的部分爲：聯邦地方法院裁決紐約緝毒組探員沒有緊急狀況可以做爲他們得以逕自進入上訴人公寓的正當理由，以及在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後探員在寢室裡一目了然看到的那些毒品應予以排除。對於聯邦檢方認爲那些毒品在探員佔據上訴人公寓時尚未被扣押，而是直到探員取得搜索令搜索該公寓時才眞正被扣押，因此「探員在寢室裡一目了然看到的那些證據不應被排除」的這個主張，聯邦上訴法院並不贊同。另一方面，援引聯邦上訴法院的先例案件 *United States v. Agapito*，聯邦上訴法院撤銷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的部分爲：聯邦地方法院裁決探員在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後的隔天，依據合法搜索令所扣押的那些毒品應予以排除。對於聯邦地方法院僅因若非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否則那些毒品可能已被 Colon 毀滅的理由，就做出將這些證據排除的決定，聯邦上訴法院認爲聯邦地方法院的這個決定並不明智。

上訴人 Segura 和 Colon 被以共謀散布古柯鹼和散布及持有古柯鹼並意圖販售這兩項罪名定罪。在複審這些定罪判決時，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對於上訴人認爲「紐約緝毒組探員捏造重大虛僞不實資訊向治安法官騙取搜索令」，且認爲「聯邦檢方在審判中所呈堂的證據在法律上不足以將他們定罪」的這兩點主張，均不贊同，因此確認兩位上訴人的定罪判決。本庭決定

受理此案，來裁決是否因爲最初紐約緝毒組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爲使得聯邦地方法院必須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將根據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前已接獲之線報而取得合法搜索令進而對上訴人公寓進行搜索所查獲的系爭證據予以排除？本庭確認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

判　決

聯邦上訴法院判決應予維持。

理　由

即使因爲最初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爲，聯邦地方法院無須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將根據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前已接獲之線報而取得合法搜索令進而對上訴人公寓進行搜索所查獲的證據予以排除。

(a)證據排除法則不僅適用於從政府非法搜索或扣押而直接取得的初始證據（毒樹），也同樣適用於從非法取得之初始證據所衍生發現和查獲的衍生證據（毒樹果）。然而，證據排除法則並不適用於當警方的非法行爲與發現證據和扣押證據之間的關連性非常薄弱，致使該證據因警方先前非法行爲而沾染的毒性被稀釋的情況，例如當警方因獨立消息來源而發現或扣押某項證據，則這項證據不會被排除。

(b)在本案中，系爭證據是根據一個依據獨立消息來源而取得之搜索令所查獲和扣押的。治安法官核發搜索令所依據的資訊是來自於與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完全無關的消息來源，並且這個消息來源在探員非法進入該公寓前就早已得知。所以，不論探員起初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爲是否違法，該行爲與系爭證據能否被聯邦地方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並無關連，因此在本案不能援引毒樹果實理論來排除系爭證據。

據線報，上訴人 Andres Segura 和 Luz Marina Colon 疑似在他們公寓裡進行非法古柯鹼交易，紐約緝毒組的探員便開始跟監上訴人。之後，探員看到 Segura 和 Rivudalla-Vidal 出現在約定會面的餐廳裡，而 Colon 交付一個大包裹給當時坐在 Rivudalla-Vidal 停在餐廳停車場的車裡的 Parra。緝毒組的探員尾隨 Parra 和 Rivudalla-Vidal 回到他們自己的公寓，並將他們攔下來。探員搜查 Parra 後發現 Parra 持有古柯鹼，便立即逮捕 Rivudalla-Vidal 和 Parra。在探員告知 Rivudalla-Vidal

其憲法上的權利之後，Rivudalla-Vidal 承認向上訴人 Segura 購買古柯鹼，並證實上訴人 Colon 在當天稍早時曾在速食餐廳交付古柯鹼給 Parra。然後聯邦助理檢察官就授權給緝毒組的探員逮捕上訴人 Segura 和 Colon，並且告訴探員搜索上訴人公寓的搜索令可能要等到隔天才能取得，因此建議探員應該先行封鎖那間公寓以防止證據被毀滅。同一天稍晚，探員在 Segura 獨自一個人進入公寓大樓的大廳時逮捕了他，並帶他前往他的公寓。當探員敲門時，上訴人 Colon 前來應門，然後探員們就在沒有請求進入或被允許進入公寓的情況下，和 Segura 一起進入公寓。然後探員就對上訴人的公寓進行有限度的的安全檢查，在安全檢查的過程中，探員在寢室裡一目了然地看到許多與毒品交易有關的配備。在安全檢查之後，上訴人 Colon 被探員逮捕，上訴人 Segura 和 Colon 都被探員帶回緝毒組的總部羈押。兩名緝毒組的探員留在上訴人的公寓裡等候搜索令。因爲行政上的延誤，搜索令直到距離探員最初進入上訴人公寓的時間相隔大約 19 個小時後才核發。在依據搜索令的搜索中，探員在上訴人的公寓裡發現古柯鹼和毒品的交易紀錄。探員將這些物品和前一天晚上安全檢查時所看到的物品全部扣押。在聯邦地方法院審判前，上訴人提出要求聯邦地方法院將紐約緝毒組探員從上訴人公寓扣押的所有證據排除的聲請，聯邦地方法院核准了上訴人的聲請。聯邦地方法院裁決紐約緝毒組的探員在上訴人公寓寢室裡一目了然看到許多與毒品交易有關的配備證據必須排除，但是裁決探員後來根據合法搜索令所扣押的毒品應予採納爲呈堂證據。上訴人 Segura 和 Colon 被以共謀散布古柯鹼和散布及持有古柯鹼並意圖販售這兩項罪名定罪，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確認兩位上訴人的定罪判決。

本庭決定受理此案，來裁決是否因爲最初紐約緝毒組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爲，使得聯邦地方法院必須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將根據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前已接獲之線報而取得合法搜索令進而對上訴人公寓進行搜索所查獲的系爭證據予以排除？本庭確認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

即使因爲最初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爲，聯邦地方法院無須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將根據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前已接獲之線報而取得合法搜索令進而對上訴人公寓進行搜索所

查獲的證據予以排除。

(a)證據排除法則不僅適用於從政府非法搜索或扣押而直接取得的初始證據（毒樹），也同樣適用於從非法取得之初始證據所衍生發現和查獲的衍生證據（毒樹果）。然而，證據排除法則並不適用於當警方的非法行爲與發現證據和扣押證據之間的關連性非常薄弱，致使該證據因警方先前非法行爲而沾染的毒性被稀釋的情況，例如當警方因獨立消息來源而發現或扣押某項證據，則這項證據不會被排除。

(b)在本案中，系爭證據是根據一個依據獨立消息來源而取得之搜索令所查獲和扣押的。治安法官核發搜索令所依據的資訊是來自於與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完全無關的消息來源，並且這個消息來源在探員非法進入該公寓前就早已得知。所以，不論探員起初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爲是否違法，該行爲與系爭證據能否被聯邦地方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並無關連，因此在本案不能援引毒樹果實理論來排除系爭證據。

證據排除法則是法官藉由案件所制定的司法救濟方式。本庭曾在一些先例案件中裁決證據排除法則不僅適用於從政府非法搜索或扣押的行爲而直接取得的初始證據（毒樹），也同樣適用於從非法取得之初始證據所衍生發現和查獲的衍生證據（毒樹果）。證據排除法則適用在從政府違憲行爲直接取得的證據，也同樣適用在從政府違憲行爲間接取得的證據。

從政府違憲的搜索或扣押而直接取得的證據無庸置疑地一定要被排除。但是當上訴人主張探員後來依據搜索令所查獲的證據已因探員先前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爲而沾染毒性或是成爲毒樹果時，本庭所要解決的爭議即爲系爭證據究竟是因探員先前的非法行爲而直接取得的證據，抑或是從與探員先前之非法行爲區隔，且其薄弱的關連性致使系爭證據之毒性被稀釋的方式而取得的證據。

長久以來，本庭對於毒樹果證據已建立了一個法則:如果警方的非法行爲與發現證據和扣押證據之間的關連性非常薄弱，致使該證據因警方先前非法行爲而沾染的毒性被稀釋，則該證據不會被排除。例如，如果警方因獨立消息來源而發現或扣押某項證據，則這項證據不會被排除。禁止法院採納以非法方式取得之證據爲呈堂證據的證據排除法則，其眞意不只是該項證據不得被法院採納爲證明被搜索人有罪的呈堂證據，而是應該

完全不得利用該項證據。當然這並不代表因非法搜索而得知的事實完全無法利用，假如對該事實的知悉是得自於獨立消息來源，則該事實如同其他事實一樣仍可被採納爲證據。總之，本庭先例案件的裁決很明確地宣示：當政府是由獨立消息來源而知悉某項證據，則證據排除法則不適用於該項證據。

上訴人主張其公寓內的所有物品（不管是探員看到還是沒看到的物品），包括系爭證據，都在探員進入該公寓並且在合法居住者均被探員帶去緝毒組的總部羈押後持續留守於該公寓時被「扣押」。上訴人認爲，由於上訴人公寓內的所有物品均在探員的監控下，且沒有任何人能從上訴人的公寓移動或銷毀那些使上訴人入罪的證據，因此上訴人公寓內的所有物品（包括系爭證據）均被探員「扣押」。

本庭無須決定當紐約緝毒組探員進入上訴人的公寓和封鎖該公寓時，探員是否對上訴人公寓內的毒品、現金、槍彈以及毒品交易紀錄等做出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中所規定的「扣押」。就條文內容而言，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只禁止「不合理」的搜索和扣押。假設緝毒組的探員正如上訴人所主張，扣押了上訴人的公寓和公寓內的物品，就整個情況看來，探員對於上訴人公寓和公寓內物品的扣押並非是不合理的扣押。

警方「扣押」人民物品所侵擾人民的權益與警方「搜索」人民物品所侵擾人民的權益並不相同。警方扣押人民物品時所侵擾的是人民的「佔有權益」，而警方搜索人民物品時所侵擾的是人民的「隱私權益」。因爲認爲警方在扣押人民物品時比在搜索人民物品時對人民所作出的侵擾程度較小，因此本庭在先例案件裡雖不允許無搜索令的搜索，但是對於警方基於相當事由而在申請搜索令的同時逕自作出無搜索令之扣押仍表示認可。

本庭尚無機會裁決：當警方有相當事由相信在嫌犯住所內有嫌犯違法的證據，因此爲保全證據而暫時封鎖該住所，是否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的規定？然而，本庭已在兩個先例判決中指出，至少當封鎖嫌犯住所是爲了保持現狀且搜索令正在申請當中時，警方在這樣的情況下封鎖嫌犯的住所並沒有違反美國憲法第四條增修條文的規定。在 *Mincey v. Arizona* 案中，本庭對於警方爲了保全證據起見，在申請搜索令的那段期間派遣一名警員駐守在命案發生之公寓入口的行爲表示認可，即使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在這段期間內證據將

會遺失、被毀滅或被移動。同樣地，在 *Rawlings v. Kentucky* 案中，對於警方已取得他們從內封鎖之屋子屋主的逮捕令，並且當其他警員正在申請搜索令時也同時拘禁了屋裡所有的居住者，本庭仍認定警方根據稍後取得之搜索令所查獲的證據爲合憲的呈堂證據。

然而，正如本庭前面所陳述的，警方扣押人民的物品只侵擾人民的佔有權益而非隱私權益，所以本庭對於隱私權益所賦予的較多保障，並不適用在探員對上訴人公寓進行扣押而非搜索的情況。因此本庭裁決探員基於相當事由並爲保全證據起見而在申請搜索令的同時對上訴人的公寓進行封鎖的行爲，並非是對上訴人的公寓或公寓內的所有物品作出不合理的扣押。但是本庭也重申，在沒有緊急狀況發生的情況下，警方沒有搜索令的搜索仍屬違法。

在本案中，紐約緝毒組的探員在他們進入上訴人公寓之前，已有充分的相當事由相信上訴人在其家中進行非法毒品交易，對此上訴人並未否認。探員已經監視上訴人好幾個星期，並且目睹上訴人離開公寓去販售古柯鹼。除了從長期監視中發現上訴人在販售古柯鹼之外，Rivudalla-Vidal 在 2 月 13 日被逮捕後也告訴探員在當天稍早上訴人曾販賣古柯鹼給他，但他並沒有將 Segura 願意販賣給他的古柯鹼全數買下，因此 Segura 可能有更多的古柯鹼藏在公寓裡。治安法官根據這個消息核發了搜索令，而聯邦地方法院和聯邦上訴法院均已確認這個搜索令的合法性。

在本案中，探員進入上訴人的公寓並從內封鎖公寓，當探員進行安全檢查並發現除了那些已被拘禁的人外就沒有其他人在上訴人公寓時，本庭認爲較聰明的做法是探員應立即離開上訴人的公寓，並以在上訴人公寓周邊「警戒盯梢」的方式來封鎖該公寓。但就「扣押」而言，探員實際上所採用的方法並不會因爲美國憲法第四條增修條文的規定而造成不同的結果。探員從內封鎖上訴人的公寓與在上訴人公寓周邊警戒盯梢，對於上訴人的佔有權益皆造成相同程度的侵擾。換句話說，不管探員最初進入上訴人的公寓是否違法，並不影響探員扣押上訴人公寓與公寓內之物品的合理性。不管探員是採取進入上訴人公寓並從內封鎖公寓或是採取在上訴人公寓周邊警戒盯梢的其中任何一種做法，探員皆控制了上訴人的公寓以等候搜索票，這兩種做法對於上訴人的佔有權益皆造成相同程度的侵擾。

當然，探員基於相當事由而在

最初所做出的合理扣押，也有可能因爲探員在上訴人公寓裡耽擱太久時間或其他原因，而演變成不合理的扣押。在本案，因爲探員在申請搜索令的過程中受到延誤，使得探員必須在上訴人公寓內等候整晚並持續等候到隔天。在大都市裡警方申請搜索令所受到的延誤是常有的事，因此就本案探員申請搜索令受到延誤的這件事而言，並非是探員惡意拖延，且上訴人也並未主張探員故意拖延取得搜索令的時間。

記錄上並無任何證據顯示探員在進入上訴人的公寓後便四處搜索，他們只是在上訴人的公寓裡等候搜索令的核發。再者，在這將近十九個小時的期間裡有一半的時間是從晚上十點到隔天早上十點，而這是一段可以合理假設法官無法像白天一樣能夠儘速核發搜索令的時間。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探員的扣押對佔有人之佔有權益所造成的侵擾，會根據其扣押的性質及範圍而有所不同。扣押可能在佔有人將財產交給第三人並放棄佔有後進行，或在佔有人仍持有或控制其財產時進行。在此案，因爲探員佔據上訴人公寓而使其佔有權益受到侵擾的上訴人 Colon 和 Segura 已被探員逮捕，並在探員佔據上訴人公寓的整段期間裡被羈押在緝毒組的總部，因此探員並沒有對上訴人佔有權益造成實際的侵擾。本庭並不認爲在這樣特定的情況下探員對於上訴人公寓的扣押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所禁止的不合理扣押。

上訴人又主張即使探員所扣押的系爭證據不因探員最初非法進入他的公寓並佔據該公寓而應予以排除，系爭證據也是從探員最初非法進入他的公寓因此衍生成爲毒樹果證據而應予以排除。然而，不論探員最初進入上訴人公寓的行爲是否違法，該行爲與系爭證據能否被聯邦地方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並無關連，因爲系爭證據是根據一個依據獨立消息來源而取得之搜索令所查獲和扣押的，因此在本案不能援引毒樹果實理論來排除系爭證據。

治安法官核發搜索令所依據的資訊並非來自於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所接觸到的任何人、事、物，或與探員非法進入該公寓所接觸到的任何人、事、物有關。治安法官核發搜索令所依據的資訊來自於與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完全無關的消息來源，並且這個消息來源在探員非法進入該公寓前就早已得知。探員並不需要也並未利用探員在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或在佔據該公寓時所發現的

任何資訊去取得搜索令，因此無庸置疑地探員在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前就已得知並據以取得搜索令而查獲系爭證據的資訊，是一個獨立消息來源。系爭證據是在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的隔天，依據合法搜索令搜索該公寓而查獲扣押的，那些證據是合法搜索下的產物，與探員最初非法進入該公寓的行爲毫無關連。探員依據合法搜索令搜索上訴人的公寓與探員先前之非法行爲區隔，且該合法搜索與探員先前之非法行爲之間薄弱的關聯性致使系爭證據因探員最初非法進入上訴人公寓而沾染的毒性被稀釋。如果探員自始就未曾進入上訴人的公寓，並且以在上訴人公寓周邊警戒盯梢的方式來防止任何人進入該公寓或毀滅證據，系爭毒品將會在同樣的地方被探員查獲和扣押。

本庭先例案件的裁決也支持本庭認爲系爭證據應採納爲呈堂證據的結論。本庭從未只因警方非法行爲所發現的證據，就認定這個證據是毒樹果證據。那樣的認定與本庭在 *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nited States* 案及其他的案件的裁決相牴觸。本庭在那些案件中裁決：即使警方在先前有做出非法的行爲，但若警方先前的非法行爲和警方後來發現的證據之間的薄弱關連已經使得該證據因警方先前非法行爲而沾染的毒性被稀釋，則該證據可以被法院採納爲呈堂證據。同樣地，本庭先例案件的裁決皆明白宣示，除非警方的非法行爲是發現某項證據的主要原因，否則該項證據不應該被排除。除非系爭證據是政府非法行爲的產物，否則沒有正當理由排除系爭證據。探員非法進入上訴人的公寓與探員後來依據搜索令而查獲的證據並沒有任何關連，因此很明顯的，「除非探員非法行爲是發現證據的主要原因」這個要件，在本案並不符合。

對於聯邦上訴法院認爲聯邦地方法院正確採納古柯鹼、現金、毒品交易紀錄，和槍彈等證據爲呈堂證據的判決，本庭再度確認。

27. Pate v. Robinson

383 U.S. 375（1966）

林利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的證據對被告殺害他妻子當時是否心智正常產生合理的懷疑，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沒有因此開庭檢視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保障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

   (The evidence raised a sufficient doubt as to respondent's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so that respondent was deprived of due process of law und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by the trial court's failure to afford him a hearing on that issue.)

   A. 將沒有足夠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被告定罪，侵害了憲法第十四條增修條文所保障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

      (The conviction of a legally incompetent defendant violates due process.)

   B. 當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之證據對於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這個爭議顯示「善意的懷疑」時，法官應自行選定陪審團並且開庭檢視被告是否心神喪失，不能因為被告在法庭上行為正常，或因為案件雙方既已約定該心理醫師 Dr. Haines 若出庭將會針對他在審判前幾個月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作證，即認為該約定是證明被告了解他被指控的罪名並且也能與其辯護律師合作的一些證據，法院就因此無需開庭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

      (In view of evidence raising a doubt on the competence issue, the court was required to impanel a jury and conduct a sanity hearing

and could not rely in lieu thereof on respondent's demeanor at trial or on the stipulated medical testimony.)

2. 由於很難回溯認定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 (尤其當本案已經過六年)，因此開庭檢視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已不合宜；除非伊利諾州檢方在合理的時間內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對被告重新審判，否則聯邦地方法院必須將被告無罪開釋。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of retrospectively determining the issue of an accused's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particularly where, as here, the time lapse is over six years), a hearing limited to that issue will not suffice; respondent must therefore be discharged unless the State gives him a new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關 鍵 詞

sanity hearing（對精神狀態問題的聽證會）；stipulation（訴訟雙方的辯護律師對有關審理的任何事項所達成的協議）；due process of law und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正當司法程序）；mental capacity（心智能力）； writ of habeas corpus（人身保護令）；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defense of insanity（心神喪失的抗辯）；bona fide doubt（善意的懷疑）；impanel the jury（從陪審員候選人名單中選定陪審員）。

（本案件判決由 Clark 大法官主筆撰寫）

事 實

被告 Robinson 在 1959 年因爲殺害他的普通法妻子 Flossie May Ward 被定罪，並且被判處終身監禁。由於被告家境窮困，因此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指派一名公設辯護律師爲他辯護。被告辯護律師在審判中承認被告槍殺他的妻子，但是

主張被告開槍時是處於心神喪失的狀態，並且也主張被告沒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在上訴到伊利諾州最高法院時，被告辯護律師質疑伊利諾州地方法院否決他所提出之被告心神喪失和被告沒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這兩點主張，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保障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伊利諾州最高法院確認被告的定罪判決，認爲被告辯護律師並未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開庭檢視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而且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讓伊利諾州地方法院自行開庭檢視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也不足以對被告殺害他妻子當時是否心智正常產生合理的懷疑。被告隨後向伊利諾州北區的聯邦地方法院提出人身保護令申請也被拒絕。聯邦上訴法院撤銷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認爲伊利諾州地方法院不當地匆忙審理，使被告辯護律師無法取得心理醫師的證詞，也無法在法庭上對被告開槍殺害他妻子當時是處於心神喪失的狀態以及被告也沒有足夠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這些事實進行更詳盡的陳述。因此聯邦上訴法院將此案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更審，指示聯邦地方法院指派一名公設辯護律師爲被告辯護，並要求聯邦地方法院開庭檢視被告殺害他妻子當時的精神狀態；如果聯邦地方法院認定被告開槍殺害他妻子當時是處於心神喪失的狀態，聯邦地方法院必須在對被告現在的精神狀態做心理檢驗之後釋放被告。聯邦上訴法院也要求聯邦地方法院開庭審理美國憲法所賦予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是否因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沒有開庭檢視他有否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而遭受侵害；如果聯邦地方法院認爲被告的這項權利遭受侵害，聯邦地方法院必須釋放被告，除非伊利諾州檢方在合理的時間內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對被告重新審判。

本庭同意受理此案，並且裁決被告 Robinson 享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賦予之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來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開庭檢視他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因爲本庭認爲即使伊利諾州地方法院現在開庭檢視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在經過這麼多年後也很難認定被告當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所以本庭指示聯邦地方法院釋放被告，除非伊利諾州檢方在合理的時間內要求伊利諾州地方

法院對被告重新審判。因此，除了聯邦上訴法院要求聯邦地方法院開庭檢視被告殺害他妻子當時之精神狀態的判決以外，本庭確認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

判　決

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應予維持。本案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更審。

理　由

1. 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的證據對被告殺害他妻子當時是否心智正常產生合理的懷疑，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沒有因此開庭檢視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保障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
   (a) 將沒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被告定罪，侵害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保障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
   (b) 記錄顯示被告並沒有自願放棄他沒有足夠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抗辯。
   (c) 當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之證據對於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這個爭議顯示「善意的懷疑」時，法官應自行選定陪審團並且開庭檢視被告是否心神喪失，不能因爲被告在法庭上行爲正常，或因爲案件雙方既已約定該心理醫師 Dr. Haines 若出庭將會針對他在審判前幾個月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作證，即認爲該約定是證明被告了解他被指控的罪名，並且也能與其辯護律師合作的一些證據，法院就因此無需開庭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
2. 由於很難回溯認定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尤其當本案已經過六年)，因此開庭檢視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已不合宜；除非伊利諾州檢方在合理的時間內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對被告重新審判，否則聯邦地方法院必須將被告無罪開釋。

I

被告 Robinson 在 1959 年因爲殺害他的普通法妻子被定罪，並且被判處終身監禁。被告辯護律師在審判中承認被告槍殺他的妻子，但是主張被告開槍時是處於心神喪

失的狀態，並且被告沒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事實明確顯示，被告長期行爲失常，曾被關在精神病院，並且曾犯下殺害仍在襁褓中的兒子和企圖自殺等暴力行爲。四位辯方證人皆作證說被告心神喪失，然而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拒絕採納檢方想要證明被告心智正常而提出的心理醫師反駁證詞，伊利諾州地方法院認爲檢方與被告辯護律師既已約定該心理醫師若出庭，將會針對他在審判前幾個月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時被告了解他被指控的罪名，並且也能與其辯護律師合作來作證，這些約定就已足夠提供陪審團作出正確的判斷，無需該心理醫師再出庭作證。在上訴時，被告辯護律師質疑伊利諾州地方法院否決他所提出之被告心神喪失的主張，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保障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伊利諾州最高法院確認被告的定罪判決，認爲被告辯護律師並未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開庭檢視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且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讓伊利諾州地方法院開庭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也不足以對被告殺害他妻子當時是否心智正常產生合理的懷疑。聯邦地方法院拒絕了被告隨後向其提出的人身保護令申請。聯邦上訴法院則撤銷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裁決伊利諾州地方法院不當地匆忙審理，並沒有提供被告辯護律師證明被告心神喪失的公平機會，因此聯邦上訴法院將此案發回聯邦地方法院，並要求聯邦地方法院針對被告殺害他妻子當時的精神狀態，和美國憲法是否賦予被告權利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開庭檢視他有否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這兩項爭議更審。

II

伊利諾州檢方承認，將沒有足夠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被告定罪，侵害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保障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也認爲伊利諾州所制定的程序法必須適切地保護被告的這項權利。然而伊利諾州檢方堅持被告 Robinson 未向伊利諾州地方法院要求開庭檢視他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即是自願放棄這項權利。檢方也堅持，就被告辯護律師所呈堂的證據看來，伊利諾州地方法院並沒有自行開庭檢視被告是否有足夠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義務。

被告辯護律師傳喚的四位證人皆指出被告長期行爲異常。被告

的母親作證說在被告 7、8 歲時，曾被一塊從三樓掉下的磚頭打到頭而昏迷並且血流不止，「從此他就行爲不正常」。那塊從三樓掉下的磚頭也將被告的眼睛撞成歪斜，因此他母親帶他去給眼科醫師接受治療。因爲那次磚頭重擊事件，被告在他小時候常常頭痛。

在 1946 年或 1947 年，被告從軍中休假回家探視母親時，被告的行爲就變得明顯的古怪。當被告和客人同坐聊天時，他會突然跳起來，然後跑去吧台，把吧台踢出一個洞再跑回來。他母親問他「你到底是怎麼了？」被告就瞪著她然後雙手插在褲袋裡在屋裡踱步。在其他場合，被告看起來神情恍惚、眼睛怒視前方，不講話也不回答任何問題。在 1951 年，被告在退伍後幾天，突然喪失理性，來回踱步地喃喃自語說有東西在追殺他，這件事發生在被告的阿姨家，因爲無法忍受被告的行爲，被告的阿姨在早晨 6 點打電話給被告的母親，於是被告的母親來探視被告，但被告卻阻止阿姨打開大門，被告說：「有人要來槍殺我，有人要進來追殺我。」被告的母親作證說，在她進門後，朝被告走去並抱抱他，問他到底怎麼了，被告卻把她推開，叫她走開，並說有人要槍殺他。當被告辯護律師詰問被告母親當時被告的神情時，被告的母親說被告當時正怒視著她並且口吐白沫，最後被告的母親和阿姨只好叫警察來，警察用計程車將他們三人送到 Hines 醫院，在途中被告企圖跳車，到達醫院時被告非常激動，醫護人員只好將被告綁在輪椅上，被告隨後被救護車送到郡立的精神病院，之後又再被轉送到 Kankakee 州立醫院。

從 Kankakee 州立醫院出院後，被告不正常的行爲變得更加嚴重。被告祖父作證說被告是和他一起做油漆工作的助理，「被告有時會突然從階梯上下來，然後就走出去，從來不說他要去哪裡，他一出去就是兩三個小時並且神情恍惚，當被告回來時就恢復正常。他說他沒有做任何事情，但我注意到他完全不是他自己。」被告的祖父還提到有一晚在他家，被告的妻子和被告爭吵後，逃到被告祖父的臥房躲起來，被告首先試圖把門踢開，然後被告把他妻子的衣服從他們房間拖出去丟到後院，並在衣服上縱火。後來被告變得無法控制，祖父只好叫警察來把被告抓起來關進警局。

被告在 1953 年和他妻子分居，被告帶著他們 18 個月大的兒子到阿姨家請求在那裡待上幾天。被告的阿姨注意到被告當時處

於非常緊張、情緒激動的狀態，並且目光呆滯。隔天被告的阿姨外出工作時，被告槍殺了他的兒子並且企圖舉槍自盡。

被告因爲槍殺他的兒子在獄中服刑將近四年，在 1956 年 9 月出獄後幾個月，被告開始跟他妻子住在她家裡。在 1957 年或 1958 年的夏天，被告撲向他的一名親戚並將他打成重傷。他妻子前往警局並爲警方作證以向法官取得逮捕被告的逮捕令。被告妻子形容被告的行爲異常，並且告訴警官「被告似乎心理不正常」。

被告槍殺他妻子大約發生在案發當天晚上 10 點 30 分，在被告妻子工作的小烤肉店。當時店裡有 10 個客人，6 個坐在櫃臺。記錄顯示被告手中拿著一把槍走進店裡，當被告接近櫃臺時，被告妻子說：「你今晚不要鬧了。」被告怒視了他妻子一分鐘後，被告朝店後方走去，把頭放在櫃臺上，然後又突然朝店門口衝去，經過其他兩位在櫃臺工作的員工，朝他妻子開了一槍或兩槍，被告妻子跳過吧台往前門跑去，被告追殺在後，被告妻子被路人發現死在人行道上。被告在這三、四分鐘的槍殺事件中完全不發一語。

被告的辯護律師所提出的四位證人皆表示被告心神喪失。在舉反證時，檢方只提出了如果心理醫師 Dr. Haines 出庭，他會針對被告了解對他指控的罪名並且能夠和他的律師合作而作證，他在審判前的兩、三個月前曾檢視過被告。然而，因爲 Haines 醫師即使出庭所言的證詞也並未確實認定被告處於心神喪失的狀態，因此檢察官便建議法院「我們應該讓 Haines 醫師出庭，針對被告是否心神喪失而作證，有可能被告在殺害他妻子當時是處於心神喪失的狀態但仍能瞭解指控他的罪名，也能與他的辯護律師合作。庭上，我認爲應採納 Haines 醫師認爲當他檢視被告時被告是心智正常的證詞爲證據。」但是法官告訴檢方：「你已有足夠的證據，我不認爲你需要 Haines 醫師的證詞。」在辯護律師做總結時，辯護律師強調：「我們的抗辯很清楚，被告在犯案當時是處於心神喪失的狀態而且現在仍舊是處於心神喪失的狀態。」法院最後判決被告有罪，並且判處被告終身監禁。

檢方堅持被告 Robinson 未依據伊利諾州的法律向伊利諾州地方法院要求開庭檢視他殺害他妻子當時是否心神喪失，即是自願放棄他沒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抗辯。然而伊利諾州檢方主張被告也許沒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卻又主張被告是

自願放棄由法院決定他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這兩點主張是相互矛盾的。無論如何，記錄顯示被告辯護律師在訴訟程序中從頭到尾都堅持被告槍殺他妻子當時是處於心神喪失的狀態。被告辯護律師在直接詰問被告母親有關被告的精神狀態時，即已表明被告有精神方面的問題。被告辯護律師並且向法官主張辯方證人的證詞顯示被告心神喪失，因此不應被認定爲有罪。再者，檢方在法庭上也建議法官應允許心理醫師針對被告的精神狀態出庭作證。從這個記錄看來，本庭認爲被告並沒有自願放棄他沒有足夠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抗辯。

III

本庭認爲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的證據，足以使被告有權利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開庭檢視他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沒有因此開庭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即是剝奪了被告享有公平審判的憲法權利，而伊利諾州的法律極力捍衛這樣的憲法權利。當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之證據對於被告是否有足夠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的這個爭議顯示「善意的懷疑」時，法官應自行選定陪審團而且依據伊利諾州的法律開庭檢視被告是否心神喪失。根據被告與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法官「談話」的靈敏度與理解能力，伊利諾州最高法院認爲被告辯護律師所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讓伊利諾州地方法院開庭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但是本庭認爲這並不足以構成忽略被告長期明顯行爲異常的正當理由。雖然被告在法庭的行爲也許與被告是否心神喪失的最後決定有關，但是不能因爲被告在法庭上行爲正常，伊利諾州地方法院就無需開庭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同樣地，雙方既已約定該心理醫師 Dr. Haines 若出庭將會針對他在審判前幾個月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作證。該約定雖然是證明被告了解他被指控的罪名並且也能與其辯護律師合作的一些證據，但是檢方也承認，根據法庭上所呈現的事實，心理醫師 Dr. Haines 若出庭作證所言的證詞，並不是決定被告是否心智正常的決定性因素。

在認定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沒有開庭檢視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因而剝奪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保障被告享有正當司法程序的權利，本庭指示聯邦地方法院必須核發人身保護令給被告，並且將被告無罪開釋，除非伊利諾州檢方在合理的時

間內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對被告重新審判。伊利諾州檢方要求本庭允許伊利諾州地方法院現在開庭檢視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如果伊利諾州地方法院認定被告當時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則聯邦地方法院無需撤銷被告的定罪判決。但是本庭認爲很難回溯認定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因爲陪審團無法觀察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的行爲舉止，且辯方證人只能根據原有的記錄作證，六年後才開庭檢視被告在 1959 年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更增加了回溯認定的困難度。

如果伊利諾州檢方決定對被告重新審判，被告辯護律師當然會對被告在日後受審時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提出質疑，並且要求伊利諾州地方法院開庭檢視被告現在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倘若伊利諾州地方法院懷疑被告是否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則法院必須開庭檢視被告的精神狀態。如果伊利諾州地方法院認定被告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則被告 Robinson 將可提出適用於其他一般被告的所有抗辯。

本案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根據本庭判決更審。

28. Goldberg v. Kelly

397 U.S. 254（1970）

史慶璞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福利給與乃係基於法律所賦予符合資格者領受之頭銜。其終止涉及州府裁決重要權利之行為，而程序性正當程序適用於福利給與之終止。程序性正當程序須提供予領受人之範圍受其「被迫忍受重大損失」之範圍所影響，亦取決於領受人防免損失之利益是否大於政府即為裁決之利益。正當法律程序之基本要件為聽證陳述之機會，而聽證必須於有意義之時間以有意義之方式為之。聽證陳述機會必須依陳述人之能力及情狀而裁製。

   （Welfare benefits are a matter of statutory entitlement for persons qualified to receive them and their termination involves state action that adjudicates important rights, and procedural due process is applicable to termination of welfare benefits. Extent to which procedural due process must be afforded welfare recipient is influenced by extent to which he may be condemned to suffer grievous loss and depends on whether recipient's interest in avoiding that loss outweighs governmental interest in summary adjudication. Fundamental requisite of due process of law is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and hearing must be at meaningful time and in meaningful manner. Due process requirement of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must be tailored to capacities and circumstances of those who are to be heard.）

2. 裁決者關於領受人合格性之結論，必須完全本於於聽證中所引用之法則與證據。同時，為顯現已符合此一基本要求，雖然其陳述無須等同於完整之意見，甚或正式的事實認定及法律結論，裁決者仍應

說明其決定之理由與指明其所依賴之證據。

（Decisionmaker's conclusion as to welfare recipient's eligibility to public assistance payments must rest solely on legal rules and evidence adduced at pre-termination hearing. And,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that requirement, decisionmaker should state reasons for his determination and indicate evidence he relied on, though his statement need not amount to full opinion or even formal findings of fact and conclusions of law.）

關 鍵 詞

public welfare benefits（公共福利給與）；procedural due process of law（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hearing（聽證）；opportunity to be heard（聽證陳述機會）；rights of confront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對質與交互詰問權利）；property interest（財產利益）。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Brennan 主筆撰寫）

事 實

本案系爭問題爲州政府未提供聽證機會，即對於特定領受人終止公共援助給付，是否係屬拒絕收受人之程序性正當程序而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正當程序條款。

本訴訟係於紐約南區地區法院，由紐約市依據聯邦資助撫養子女家庭援助計劃或紐約州一般住居疏困計劃而領受金融資助之居民所提起。其起訴狀宣稱，紐約州及紐約市辦理上開計劃官員終止或即將終止此類資助，因其未予事前通知及聽證，故而係拒絕其正當法律程序。在起訴時，並無於終止金融資助前應有任何形式的事前通知或聽證之規定存在。然而，州及市於起訴後均採行通知及聽證之程序，原告即被上訴人因而在此對於上述程序之憲法妥當性提出質疑。

紐約州社會服務局修正州社會服務部之行政規則，要求經辦停

止或中止領受人金融資助之地區社會服務官員應遵守修正規則第351.26條第（a）項或第（b）項之作業程序。紐約市選擇第（b）項並發布爲地區作業程序。該項與本案相關部分規定，地區作業程序必須包括於生效日至少七日前給予領受人計劃內停止或中止之理由之通知，領受人於通知外得要求該計劃由具有較批准計劃內停止或中止之主管更上一級之地區福利官員審查，甚且，爲審查之目的，領受人得提出敘明其補助爲何不應被停止或中止之書面陳述。審查官員所爲停止或中止資助之決定必須儘速以書面通知領受人。該項條文並明確規定，資助不得於決定之通知寄送於領受人或其代表人之前，如有停止或中止計劃生效日，或在其之前，二者擇其較後者，停止或中止之。

依據（b）項規定，紐約市社會服務局發布第 68-18 號作業程序。對於領受人繼續合格存疑之辦案人員首先須與領受人討論此事。如辦案人員認定領受人不再合格，他將給予單位主管終止資助之建議。如經後者同意，他將寄送一份陳述計劃終止資助之書面函件予領受人，並告知領受人得於七日以內連同自行檢具或由律師或他人協助之書面陳述請求上級官員審查案卷。如不合格之決定經審查官員確認，資助隨即停止，領受人經由函件告知此一作爲之理由。被上訴人對於此一作業程序之質疑，乃著重於領受人於審查官員之前的親自出席，證據的口頭提示，以及與對立證人的對質和交互詰問等規定之欠缺。然而，上述函件確實告知領受人得請求一個終止後之「公平聽證」。這是一個由一位獨立之州府聽證官員主持之程序，於該程序中，領受人得親自出席，提出口頭證據，與不利於他之證人對質及交互詰問，以及製作聽證筆錄等。領受人如於「公平聽證」中獲勝，他將受付所有違誤扣發之資金。Hew Handbook, pt. IV, §§ 6200-6500; 18 NYCRR §§ 84.2-84.-23. 未依公平聽證之決定而回復其資助的領受人，得提請司法審查。 N.Y. Civil Practice Law and Rules, Art. 78（1963）. 領受人獲得如上所述之告知。 18 NYCRR §84.16.

判　決

原判決確定。

理　由

I

本案應予決定之憲法爭點乃限縮於在終止給與前，憲法正當程序條款是否要求應給予領受人一聽證之機會。地區法院宣告惟有終止前之聽證始符合憲法的要求，同時拒絕州府及市府官員所提終止後「公平聽證」與終止前審查告知之混合足以處理掉所有正當程序主張之論辯。該法院表示：縱使終止後之審查有所關連，但仍有一個掌控本案之壓倒性事實存在。假設一位福利領受人貧窮無資產，單就停止在表面上「急迫需要」之福利領受人而未給予某種形式之事前聽證即屬不正當，除非有優勢之考量正當化前述之不當。Kelly v. Wyman, 294 F.Supp. 893, 899, 900（1968）. 該法院拒絕爲保護公共歲入所必要而作爲「優勢性考量」要件之爭辯。「保護公共資金之正當化需求，必須權衡個人在此特殊情況下不受不當剝奪其資助之優勢性需要。雖然額外經費之問題須謹記在心，該問題仍無法使拒絕符合正當程序通常標準之聽證正當化。基於所有情狀，吾等宣示於終止福利給與前，正當程序要求一個適當之聽證，而有一個後續的憲法公平程序之事實，並不足以改變此一結果。」Id. at 901. 雖然州府官員於本訴訟中爲共同被告，惟僅紐約市社會福利局長提起上訴。吾等註記相當管轄權以裁決本案爲三位法官在原則上意見不一致之重要爭點。吾等確認之。

上訴人並未爭論程序性正當程序不適用於福利給與之終止。此種給與乃係基於法律所賦予符合資格者領受之頭銜。其終止涉及州府裁決重要權利之行爲。憲法上之疑義無法藉由公共資助給與係爲「特權」而非「權利」之論辯而獲得答案。 Shapiro v. Thompson, 394 U.S. 618, 627 n. 6 （1969）. 相關憲法限制多適用於因喪失失業補償資格所爲公共資助給與之扣發、否決稅則減免或解除公共聘僱等。 Sherbert v. Verner, 374 U.S. 398（1963）; 357 U.S. 513（1958）; Slochower v. Board of Higher Education, 350 U.S. 551 （1956）. 程序性正當程序須提供予領受人之範圍受其「被迫忍受重大損失」之範圍所影響，亦取決於領受人防免損失之利益是否大於政府即爲裁決之利益。 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 v. McGrath, 341 U.S. 123, 168 （1951）. 茲此，考量在任一特定情狀下應給予何種程序性正當程序，須從決定政府所涉職能及受政府行爲所影響私人利益之確切本質著手。 Cafeteria & Restaurant Workers Union, etc. v. McElroy, 367 U.S. 886, 895（1961）;

Hannah v. Larche, 363 U.S. 420, 440（1960）.

誠然，某些政府給與得未經給予領受人終止前聽證而在行政上予以終止。但吾等同意地區法院之意見，即唯有終止前聽證可提供領受人程序性正當程序。參照 Sniadach v. Family Finance Corp., 395 U.S. 337 （1969）. 對於合格之領受人而言，福利提供獲得基本食物、衣服、住居及醫療照顧之方法。是以，就本文而論，其關鍵因素—不存在於黑名單內之政府承包商、解僱之政府員工、稅則減免經否決之納稅義務人或其他在實質上其政府頭銜被停止者等案件之因素—乃爲終止關於合格性爭執尚待解決之資助，得剝奪一位合格領受人在等待期間賴以生活的唯一方法。由於他缺乏獨立之來源，其處境乃隨即變得極爲困頓。其集中心力尋找日常生計方法之需要，將因而對其尋求福利機構救濟之能力造成不利地影響。

甚且，重要政府利益得因提供領受人終止前聽證而被提昇。自建國以來，國家之基本責任乃在供給在其領域內所有人民之尊嚴與均足。吾等漸已承認非屬窮人所得控制之力量將助長其貧窮。針對我國傳統背景，此一理解已重大地影響了當代公共援助制度之發展。藉由滿足生計之基本需求，福利可協助提供給窮人與他人相同的實質參與社區生活之機會。同時，福利可阻擋來自普遍的不當挫折感與不安全感所引發之社會憂鬱。是故，公共援助不僅只是施捨，更是一種「爲吾人及後代提昇公眾福利及保障自由權利福祉」之方法。相同的政府利益促成福利之規定，亦同時促成對於合格領受人不中斷福利之規定；終止前聽證爲達成該目的所不可或缺之要件。

上訴人並未質疑上述考量之力量，但爭論其爲保護財政及行政資源之相對政府利益所勝過。其爭論此種利益使任何延宕至停止給與後之聽證成爲正當。於發現足信領受人不再合格之理由時，即爲裁決立即止付將可保護公共財政。由於大多數之終止均未經質疑而被接受，即爲裁決可藉減少實際召開聽證之次數而同時節省財政及行政上的時間與精力。

然而，吾等同意地區法院意見，即上述政府利益不足以超越福利論述之上。事前聽證要求無疑的將涉及某些較大之經費，且因領受人之資格多傾向於以判決證明，故付予聽證中尚待決定之不合格領受人的給與將無法收回。但是政府並非不具減少所增加成本之武器。多數財政及行政資源之流失，

可藉由研發即時終止前聽證程序及有效使用人員與設施而減少。實際上，紐約住居疏困計劃所提供終止後聽證之特別規定本身，即足以證明該州承認改正合格性決定及因此所定程序性保障的公共利益之優越性。是以，合格領受人無中斷領受公共援助之利益，連同其給付不被違誤終止之州利益，明顯勝過州所提防止任何財政及行政負擔增加之對立考量。如同地區法院所爲正確地結論，「允許終止資助前未給予領受人任何機會，該賭注將對福利領受人而言明顯過高，且善意違誤或輕易誤判之可能性過巨，如經其請求，應充分告知針對他的案件，使他得以論爭案件之立論基礎並提示證據反駁之。」

II

然而，吾等亦同意地區法院之見解，即終止前聽證無須採行司法或準司法訴訟之形式。吾等謹記法定的「公平聽證」將提供領受人完整之行政審查。從而，終止前聽證僅有一項功能：提供福利局停止支付基礎合法性之初始決定以保障領受人免受其給與之違誤終止。參照 Sniadach v. Family Finance Corp., 395 U.S. 337, 343. 是故，主要爲便利司法審查及引導未來決定而提示之完整筆錄及整體意見，即無必要於終止前階段予以提出。吾等亦承認福利主管機關及領受人二者均具有相對快速解決合格性問題之利益，他們慣於非正式地與對方打交道，以及某些福利局還負擔非常沉重的案件數量。上述考量可正當化限縮終止前聽證至最低之程序性保障，使其適應福利領受人之特殊性格及待決爭執之特定性質。吾等與不同意見者一致，願意附帶承認在此發展中的法律領域內，不課予州及聯邦政府任何逾越基本正當程序要求的程序性規定之重要性。

「正當法律程序之基本要件爲聽證陳述之機會。」Grannis v. Ordean, 234 U.S. 385, 394（1914）. 聽證必須「在一個有意義之時間及以一個有意義的方式」爲之。Armstrong v. Manzo, 380 U.S. 545, 552（1965）. 於本論述中，上述原則要求一位領受人應有載明計劃內終止理由的即時與適當之通知，以及一個與任何對立證人對質及口頭提出其論爭與證據之有效抗辯機會。如領受人質疑計劃之終止係植基於不正確或經誤導之事實基礎或不當適用法則或政策於特定案件的事實，則此種權利對於類此案件應屬重要。

雖然在某些案件中，公平理念

將要求給予更長的時間，吾等仍不準備表示紐約市目前所提供七日之通知係爲憲法上的當然不足。吾等亦未於通知之內容及格式看到任何憲法上之欠缺。紐約使用信函及與案件承辦人面對面協商二種方式告知領受人引發其持續合格性之確切問題。證據顯示領受人已被告知該局所存疑之法律與事實基礎。此一混合可能是與領受人溝通最有效的方法。

目前市的作業程序不允許領受人在作成最終持續合格性決定的官員面前親自協同或不協同律師出席。是故亦不允許領受人向該官員口頭地提示證據或與對立證人對質或交互詰問。上述疏漏對該程序之憲法正確性而言係屬致命。

聽證陳述機會必須依陳述人之能力及情狀而裁製。福利領受人得經由案件承辦人以書面或二手表述向裁決者表示其情況仍不可謂足夠。對欠缺得以有效書寫所必要之教育成就及無法取得專業協助的大多數領受人而言，書面表件是一種不眞實的選擇。甚且，書面表件無法提供口頭表示之彈性；它們不允許領受人針對裁決者顯然視爲重要之爭點修正其論爭。特別在當可信度與正確性成爲爭點時，由於書面表件必然存在於許多終止程序中，它們乃成爲作成決定完全不足採信之基礎。藉由案件承辦人向裁決者之二手表述本身即有其缺陷；蓋案件承辦人通常會蒐集不合格指控所依據之事實，領受人一方爭執之表述無法安全地任由他作成。是故，領受人必須被允許以口頭方式陳述其情況。非正式的程序即爲已足；在本論述中，正當程序並未要求一種特定的證據規則或提示證據之模式。參照 HEW Handbook, pt. IV, §6400(a).

在大多數重要裁決成爲系爭事實之案件，正當程序要求與對立證人對質及交互詰問之機會。 ICC v. Louisville & N. R. Co., 227 U.S. 88, 93-94 （1913）; Willner v. Committee on Character & Fitness, 373 U.S. 96, 103-104 （1963）; Greene v. McElroy, 360 U.S. 474, 496-497 （1959）. 是以，福利領受人必須被給予與該局所信賴的證人進行對質及交互詰問之機會。

「在許多案件裡，聽證陳述權利將顯得效益不大，如其未包含由律師陳述之權利。」 Powell v. Alabama, 287 U.S. 45, 68-69 （1932）. 吾等非謂律師必須提供於終止前之聽證，而僅謂領受人如有此需求，必須被允許聘請律師。律師可協助描述爭點，以井然有序地方式提出事實爭論，行使交互詰問，以及概況地保障領受人之利

益。吾等未預期該協助將全然延宕或以其他方式阻礙聽證。參見 45 CFR §220.25, 34 Fed. Reg. 13595（1969）.

最後，裁決者關於領受人合格性之結論，必須完全本於於聽證中所引用之法則與證據。Ohio Bell Tel. Co. v. PUC, 301 U.S. 292 （1937）; United States v. Abilene & S. R. Co., 265 U.S. 274, 288-289 （1924）. 爲顯現已符合此一基本要求，雖然其陳述無須等同於完整之意見，甚或正式的事實認定及法律結論，裁決者仍應說明其決定之理由與指明其所依賴之證據。Wichita R. & Light Co. v. PUC, 260 U.S. 48, 57-59 （1922）. 同時，理所當然地，一位公平的裁決者確屬必要。In re Murchison, 349 U.S. 133 （1955）; Wong Yang Sung v. McGrath, 339 U.S. 33, 45-46 （1950）. 吾等同意地區法院意見，即先前於某些層面涉及本案將不必然阻止福利官員作爲一位裁決者。然而，他不應參與作成接受審查之決定。

原判決確定。

（大法官 Black, Burger, Stewart 之不同意見書略）

29. Perry v. Sindermann
408 U.S. 593（1972）

史慶璞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單就欠缺在契約上或長聘性質之續聘權利乙節，不足以推翻其所提未予更新其契約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四條之主張。受到程序性正當程序保障之「財產」利益不以某些嚴格與技術面的形式為限。甚且，「財產」涵攝受「現存法則或認知」所保證的廣大範疇之利益。如有類如可支持其就給與具有資格的主張及得訴諸於聽證之法則或相互明確認知存在，則一個人在給與上之利益就正當程序目的而言係為一項「財產」。

Lack of a contractual or tenure right to re—employment, take alone, did not defeat respondent's claim that the nonrenewal of his contract violated his free speech right under the First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Property" interests subject to procedural due process protection are not limited by a few rigid, technical forms. Rather, "property" denotes a broad range of interests that are secured by "existing rules or understandings." A person's interest in a benefit is a "property" interest for due process purposes if there are such rules or mutually explicit understanding that support his claim of entitlement to the benefit and that he may invoke at a hearing.

關 鍵 詞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言論自由權利）；procedural due process right（程序性正當程序權利）；hearing（聽證）；opportunity to be heard（聽證陳述機會）；property interest（財產利益）。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Steward 主筆撰寫）

事　實

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九年間，被上訴人勞伯辛德曼於德州州立學院擔任教師。於德州大學任教二年及聖安東尼初級學院任教四年後，他在一九六五年成爲政府及科學初級學院歐迪薩校區之教授。以一系列一年期契約爲基礎，他在該學院連續受聘四年。他曾一度被成功地任命爲其所屬學系之主任。

然而，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學年度期間，被上訴人與學院行政當局間之爭執於焉產生。被上訴人被選任爲德州初級學院教師協會之主席。由於此一職位，他在某些場合會離開教師職務而至德州立法部門的各委員會作證，且涉及對於學院董事會政策之公開反對。具體言之，他參與一個爲學院升格四年制而辯護的團體，惟此種改變恰爲董事會所不許。同時，在某次高度批評董事會的報紙廣告裡出現了他的名字。

最後，於一九六九年五月，被上訴人之一年期聘約屆滿，董事會投票決定不對他提出下一學年度新契約之要約。董事會發佈新聞稿指摘被上訴人的不順從[1]。但是他們並沒有提供他其契約未予更新之理由之正式說明。甚且，他們亦未允准他針對未更新基礎提出異議之聽證陳述機會。

被上訴人因而向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他主張董事會不續聘之決定係基於其公開批評學院行政當局的政策，從而侵犯了他的言論自由權利。他同時主張他們怠於提供其聽證陳述之機會，違反憲法第十四條增修條文程序性正當程序之保證。上訴人—董事會成員及學院校長—否認其決定係爲報復被上訴人之公開批評而作成，且辯稱他們無提供聽證之義務[2]。基於前開答辯及被上訴人所提三件簡要宣誓書[3]，地區法院以即爲判決

[1] 例如，該新聞稿表示，當學院官員明白拒絕同意他為該目的而請假時，被上訴人藐視上司出席立法部門委員會會議。

[2] 上訴人在請求即為判決時主張，不予雇用被上訴人之決定確係基於其不順從的行為。見前註 1。

[3] 即為判決宣告勝訴之上訴人未提任何宣誓書。被上訴人之宣誓書非常簡短，且基本上係重覆其起訴狀內的聲明。

宣告上訴人勝訴。該判決認爲「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並無訴訟理由，蓋其聘僱契約於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終止，且歐迪薩初級學院尚未採用長聘制度。」[4]

上訴法院廢棄地區法院之判決。(430 F.2d 939.)。首先，該法院指出，不計被上訴人之欠缺長聘，其契約之未予更新如事實上確係基於其受保障之自由言論，則將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由於董事會決定的眞正理由在答辯中陷入「全盤爭議」，該法院針對此系爭事實爭點發回本案進行一次完整之聽審程序（Id. at 942─943.)。其次，上訴法院宣稱，不計被上訴人之欠缺長聘，如被上訴人可顯示其有續聘之期待，則怠於允准他一個聽證陳述機會，將違反憲法程序性正當程序之保證。是以，該法院指示此一事實爭點亦應發回更審（Id. at 943─944. ）。

判　決

本院同意上訴法院意見，本案發回地區法院更審。

理　由

I

本案呈現的第一個問題爲單就被上訴人欠缺在契約上或長聘之續聘權利乙節，是否足以推翻其所提未予更新其契約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四條之主張。本院認其爲否。

至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本院已明確表示儘管一個人對於有價值的政府給與並無其「權利」，且政府甚至得以任何數量之理由拒絕對其給與，但仍有某些原因使政府不得倚求上述理由。政府不得在侵犯其憲法保障利益—特別是其言論自由利益—之基礎上拒絕對於一個人之給與。蓋政府如可因其憲法保障之言論或結社而拒絕對於一個人之給與，其上述自由之行使將會受到實際的處罰及箝制。如此將允許政府造成其可直接掌控之結果（357 U.S. 513.)。此種憲法權利之干涉係不受認可的。

本院適用此一通則於拒絕免稅，失業給與及福利給付等案件（357 U.S. 513; 374 U.S. 398; 394 U.S. 618; 403 U.S. 365; ）然而，本院亦經常適用此一原則拒絕政府之聘僱（330 U.S. 75, 100; 344 U.S. 183, 192; 364 U.S. 479, 485─486;

[4] 地區法院之認定及結論—僅若干行之篇幅—為非官方地報告。

367 U.S. 488, 495–496; 367 U.S. 886, 894; 368 U.S. 278, 288; 377 U.S. 360; 384 U.S. 11, 17; 385 U.S. 589, 605–606; 389 U.S. 54; 389 U.S. 258; 391 U.S. 563, 568.)。本院不計政府受僱人對於某一職務在契約上或其他主張而適用該項原則（比較 391 U.S. 563; 364 U.S. 479.)。

是以，被上訴人之欠缺一九六九—一九七 0 學年度契約上或長聘之續聘權利與其言論自由之主張無關緊要。實際言之，本院曾二度明確宣示公立學校非長聘教師一年期契約之未予更新，不得被斷定爲係關於其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四條權利之行使。本院在此再度確認上述宣示。

誠然，被上訴人於本案尚未顯示不予更新其契約之決定係因報復其行使言論自由之憲法上權利而作成。當同意即爲判決之聲請時，地區法院已排除使其顯示上述事實之任何機會。因此，本院無法於此時宣告董事會之行爲係爲無效。

然而本院同意上訴法院所稱「在此存在一項眞正的爭議，即學院拒絕更新教學契約是否係基於一個類如報復行使憲法保障權利不受認可之基礎」（430 F.2d, at 943.)。被上訴人宣稱其未受續聘係因其在立法部門委員會作證及其他公開批評董事會政策之陳述。他並宣稱其所爲之公開批評，係屬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及第十四條言論自由保障之範圍。上述主張無疑地呈現了一個善意之憲法訴求。蓋本院曾宣示教師對其上司所爲有關公眾關切事務之公開批評得受憲法地保障，且因而得成爲終止其聘僱不受認可之基礎。391 U.S. 563.

本於上述理由，吾等宣示，未經充分敘明此爭點而同意不利於被上訴人即爲判決之聲請，係爲不適當。

II

縱然被上訴人欠缺在歐迪薩初級學院關於續聘之正式契約或長聘的保證與其自由言論之訴求無關，然而卻與其程序性正當程序之訴求有高度關聯，但可能仍無法全面處理。

吾等今在董事會訴羅斯案中已宣示，除非可顯示不予聘僱之決定多少剝奪其在「自由權」上之利益或其在續聘上有「財產」上之利益，否則憲法並未要求在不予更新非長聘教師前提供聽證陳述之機會。 408 U.S. 564. 在羅斯案中，該名教師未顯示上述任何一點以

正當化有利於己之即爲判決。

綜言之，被上訴人在此尚未顯示其所享有可訴諸程序性正當程序保障之利益已被剝奪。與羅斯案相同，僅僅顯示他在某一特定職務上不被續聘，並不等同於自由權喪失之顯示[5]，亦不等同於財產損失之顯示。

然而被上訴人之主張—在此訴訟階段吾等解釋須最有利於被上訴人—確實提起一個關於其在歐迪薩初級學院繼續聘僱的利益之眞正爭點。他宣稱該利益雖未經正式契約上長聘條款所保證，但已被學院行政當局提供的不亞於具拘束力之認知所保證。申言之，被上訴人宣稱學院是有一個事實上的長聘計劃，而依據該計劃，他已享有長聘保障。他主張他及其他人合法地信賴一個於學院官方教員手冊存在多年之不尋常條款：「教師長聘：歐迪薩學院無長聘制度。如其教學符合要求，如其對同事及上司表現合作態度，以及如其於工作上愉快，學院行政當局希望教員感受到他已享有永久之長聘。」

甚且，被上訴人亦主張對於德州學院及大學協調委員會所訂頒的準則之合法信賴。該準則規定一個經州立學院及大學系統聘僱爲教師達七年或以上之人，如同他自己，享有某一形式之職務長聘資格[6]。茲此，被上訴人欲證明一位在此特定州立學院具有如他服務年限之教師，享有相當於一位在其他學院具正式長聘資格教師有關續聘之「財產」利益，且至少享有敘明理由及於學院官員作成不續聘決

[5] 上訴法院建議，被上訴人僅需向學院官員堅持他們的決定係基於其憲法保障之行為，則可得而享有某種形式之正當程序權利。 430 F.2d, at 944. 吾等已在董事會訴羅斯案中否決此一取向。408 U.S. at 575 n. 14.

[6] 協調委員會以「政策文件一」名稱自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所頒行之準則，其相關部分規定：「A. 長聘

長聘係指除經依正當程序所定程序之公平聽證顯現解聘之適當原因，一位資深教員所得期待其學術職位可以繼續之保證。

特定教員長聘制度促進每一學術機構之完整。於德州公立學院及大學，此一長聘制度應包含：（1）起聘全職講師以上等級教師，其教員試用期不得超過七年，在此期間於所有高等教育機構之適當全職服務亦包含在內。本規定受以下條款之拘束，亦即在一所或多所機構試用服務年資逾三年而受聘於其他機構之教員，得以書面同意其新職之試用期不超過四年（縱使因此而使該人員在學術專業之試用期逾越通常之七年最高年限）。…（3）解聘長聘教員之適當原因得因顯現無專業知能、道德違反或重大輕忽專業責任而成立。」

被上訴人宣稱，由於他在德州學院及大學系統受聘為全職講師或教授十年，依據上述條款應具長聘資格。

定前之聽證陳述等程序性正當程序權利。

本院於羅斯案曾明確表示，受到程序性正當程序保障之「財產」利益不以某些嚴格與技術面的形式爲限。甚且，「財產」涵攝受「現存法則或認知」所保證的廣大範疇之利益。如有類如可支持其就給與具有資格的主張及得訴諸於聽證之法則或相互明確認知存在，則一個人在給與上之利益就正當程序目的而言係爲一項「財產」（408 U.S. 564, at 571─572, 577. ）。

除非顯示充分「原因」，一紙附隨明確長聘條款之書面契約，明顯地係爲支持教師具續聘資格主張之證據。然而，欠缺類此明確契約條款仍不得排除一位教師就續聘享有「財產」利益之可能性。例如，在如非全部即爲大多數州的契約法管轄領域早已使用一項程序，即合意，縱非以書面格式，亦得爲「默示」。明確契約條款得由「斟酌周遭環境，自承諾人之言語及行爲」所默示之其他合意補充之。同時，承諾人言語及行爲之意涵，應連結其過去之使用而爲認定（3 A. 科爾賓契約法§561─572A （1960）.）。

一位如同被上訴人保有其職位多年之教師，得自該服務環境─及其他有關事實─顯示其就職務長聘資格具有一合法的訴求。正如本院認定，應存在一種在特定工業或特定工場之普通法得以補充集體協商之合意，是故，在特定大學得存在一個使某些受僱人應具等同長聘資格之不成文普通法。此一情形特別在類似歐迪薩初級學院之學院及大學尤甚，其雖無明確長聘制度，甚至對其資深教師亦同，但儘管如此，仍得在實作上建立類此制度[7]。

在本案中，被上訴人宣稱，由州府官員所訂頒及提供之現存法則及認知，得正當化其欠缺「充分原因」即具續聘資格之合法訴求。就目前爲止本院不同意上訴法院，因其認爲單純主觀之「期待」足以受到程序性正當程序之保障，但本院同意須給予被上訴人「斟酌機構之政策及實作」證明其類此資格訴求的合法性之機會（430 F.2d, at 943.）。此種財產利益之證明，當然將無法使其恢復原

[7] 參見 C. Byse & L. Joughin, 於美國高等教育之長聘制度 17-28 (1959).
吾等並未於此時宣示被上訴人具有職務長聘資格之類此合法訴求。蓋財產利益究非由憲法所創設。甚者，它們之創設及其範疇之界定，係由出自類如州法等個別法源的現存法則或認知為之。408 U.S. at 577. 如德州法律規定，一位如被上訴人情況之教師就職務長聘未具契約上或其他訴求，則被上訴人之主張將被駁回。

職。但類此證明將促使學院官員依其要求同意聽證，在聽證中被上訴人可被告知其不續聘之基礎及對他們的充分性提出異議。

綜上，雖然本院未盡同意上訴法院之意見，其將本案發回地區法院之判決仍被確認。

原判決確定。

大法官 Marshall 部分不同意見書

被上訴人於歐迪薩初級學院董事會決定不予更新其契約前，是一位在德州州立學院系統任教十年之教師。他於聯邦地區法院提起此一訴訟，主張不續聘之決定係爲報復其對於學院行政當局之公開批評，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同時，由於未給予其理由之敘明及聽證，學院拒絕其由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所保證之正當法律程序。地區法院以即爲判決宣告上訴人勝訴，但上訴法院廢棄原判決並將本案發回爲進一步之程序。本院確認上訴法院之判決。

本人同意本院判決第一部分關於被上訴人提出善意增修條文第一條訴求且應由地區法院爲全盤考量之意見，然而，基於本人於董事會訴羅斯案不同意見書所陳述之理由，本人願修正上訴法院之判決，指示地區法院即爲判決，給予被上訴人契約未予更新理由之敘明及關於系爭事實之聽證。

30. Washington v. Texas

388 U.S. 14（1967）

林利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聯邦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可藉由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正當司法程序條款適用於美國各州的刑事被告。
   (The right under the Sixth Amendment of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case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witnesses in his favor applies to the States through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2. 德州檢方剝奪了本案件的上訴人得以要求法院用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因為德州檢方恣意地否決被告提出一個證人為其所目擊之事件作證的權利，而該證人之證詞對於上訴人的辯護是相關且重要的。
   (The State arbitrarily denied petitioner the right to have the material testimony for him of a witness concerning events which that witness observed and thus denied him the right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witnesses in his favor.)

關 鍵 詞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of the Sixth Amendment（增修條文第六條之與證人對證條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第十四條增修條文之正當司法程序條款）；right to compulsory process（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principal（正犯）；accomplice（共犯）；accessory（從犯）；fair trial（公平審判）；incorporate（納入）；compel witness to

testify（強制證人出庭作證）；witnesses testimony（證人證詞）；perjury（偽證）。

（本案件判決由大法官 Warren 主筆撰寫）

事　實

上訴人 Jackie Washington，在德州達拉斯郡被以惡意謀殺的罪名定罪，並被陪審團判處五十年的有期徒刑。檢方的證據顯示，這名十八歲的上訴人曾和一名叫 Jean Carter 的女孩約會，直到那女孩的媽媽禁止他們交往爲止。那名女孩於是開始和另一位男孩約會，也就是本案的死者。基於嫉妒，在 1964 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上訴人和其他幾個男孩在達拉斯的市區內開車到處尋找槍枝。他們最後找到 Charles Fuller，於是 Fuller 持散彈獵槍加入他們。從別處得到子彈後，那群男生前往 Jean Carter 的家，那時 Jean 和她的家人及死者正在吃晚餐。那群男孩中有些人向屋子丟磚塊，然後躲回車內，只留下上訴人和拿著散彈獵槍的 Fuller 站在屋子前。聽到磚塊撞牆的聲音，死者和 Jean 的媽媽便跑到門廊勘查。上訴人或 Fuller 兩人中的其中一人發射散彈獵槍，而死者受到致命槍傷。不久之後上訴人和拿著那支散彈獵槍的 Fuller 跑回其他男孩等候的車上。

上訴人在法庭上爲自己作證，他辯稱酒醉的 Fuller 拿走他手上的槍，而他曾試著勸 Fuller 在發生槍擊事件前離開，但沒有成功。上訴人說 Fuller 堅持一定要向某人開槍，在勸阻 Fuller 無效後，上訴人便跑回車上。在他開始跑回車上之際，他看見那女孩的媽媽走出大門，隨後他就聽到槍聲，當時他以爲 Fuller 槍殺的是那個女人。爲了證實他的事實敘述，上訴人提供 Fuller 的證詞。紀錄顯示 Fuller 將會作證說上訴人曾拉住他並試著勸他離開，且上訴人在 Fuller 發射那致命的一槍前就已經跑開了。

Fuller 的證詞無疑地是相關且重要的，並且該證詞是上訴人最重要的抗辯。Fuller 是除了上訴人以外，唯一知道究竟是誰發射那致命的一槍，和知道上訴人是否在槍擊事件發生前最後關頭試圖阻止開槍的人。然而，Fuller 在稍早前已經被以相同的謀殺罪名定罪，且被

判處五十年的有期徒刑，並在達拉斯郡監獄服刑。在這個案件審判時，有兩條德州法規規定在同一個罪行中以共犯被起訴或定罪的人，不能互相爲對方作證，但是他們可以爲德州檢方作證。基於這二條法規的規定，初審法院法官接受德州檢方對上訴人要提出 Fuller 證詞所表示的異議，並且拒絕允許 Fuller 作證。之後，上訴人被定罪，而德州刑事上訴法院在上訴時維持原判。

本庭同意受理此案件來決定（1）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聯邦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是否能藉由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正當司法程序條款適用於美國各州的刑事被告；(2）規定同一個罪行中以正犯、共犯、或幫助犯被起訴的人不能相互爲對方作證的州程序法規，是否侵害了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

判　決

本庭撤銷德州刑事上訴法院維持原判的判決。

理　由

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聯邦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可藉由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正當司法程序條款適用於美國各州的刑事被告。

德州檢方剝奪了本案件的上訴人得以要求法院用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因爲德州檢方恣意地否決他提出一個身體心理均有能力作證的證人爲其所目擊之事件作證的權利，而該證人之證詞對於上訴人的辯護是相關且重要的。

I

上訴人 Jackie Washington，在德州初審法院陪審團陪審的司法審判中，被以謀殺罪名定罪，並被判處五十年的有期徒刑。在審判中，上訴人辯稱在稍早前已經被以相同的謀殺罪名定罪且被判處五十年有期徒刑的另一名共犯，才是槍殺死者的人，而他在槍擊事件發生前曾試圖阻止開槍。爲了證實他的事實敘述，上訴人辯稱 Fuller 願意爲事實作證，上訴人要提供 Fuller 的證詞。以德州法規規定在同一個罪行中以共犯被起訴或定罪的人不能互相爲對方作證爲理由，德州檢方對上訴人要提出

Fuller 的證詞表示異議，初審法院因此拒絕允許 Fuller 作證。之後，上訴人被定罪。上訴人主張德州初審法院拒絕允許 Fuller 作證，侵害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他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他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德州刑事上訴法院在上訴時維持原判。

本庭認（表達了八位大法官意見）：

(1)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聯邦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可藉由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正當司法程序條款適用於美國各州的刑事被告。

(2)德州檢方剝奪了本案件的上訴人得以要求法院用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因爲德州檢方恣意地否決他提出一個身體心理均有能力作證的證人爲其所目擊之事件作證的權利，而該證人之證詞對於上訴人的辯護是相關且重要的。

II

本庭尚未有機會裁決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聯邦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這項權利是否對於公平審判而言是基本且必要的，因此應被包括在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正當司法程序條款中。曾經有一段時期，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被認爲不能適用在美國各州的刑事審判中，但那項看法已不符合時代潮流，在近幾年來本庭已逐漸參酌增修條文第六條的特定保障，來決定美國各州的刑事審判是否符合正當司法程序。本庭曾裁決正當司法程序賦予刑事被告律師協助辯護的權利，及與不利於他之證人對證的權利，和迅速及公開審判的權利。

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聯邦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和本庭先前裁決適用於美國各州刑事被告之增修條文第六條裡的其他權利一樣重要。本庭曾在 In re Oliver 案件中陳述正當司法程序的基本要件：一個人有合理獲悉被控訴之罪名的權利，和有機會爲自己辯護的權利(在法院受審的權利)，這二項權利是美國法制的基礎；而這二項權利至少包括詰問對他不利之證人的權利，提供證詞或證據的權利，和由律師協助辯護的權利。

提出證人之證詞的權利，以及在必要時強制那些證人必須出庭作證的權利，很明顯地就是源自於

爲己辯護的權利。被告有權向陪審團描述事實經過，而檢方也有權向陪審團描述事實經過，再讓陪審團來決定事實眞相到底爲何。如同被告爲了質疑檢方證人之證詞的可信度而有權與檢方證人對證，被告也有權聲請傳喚證人來爲自己辯護，這項權利是正當司法程序的基本要件。

既然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聯邦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適用於德州的這個刑事訴訟，待解決的爭議就是上訴人的該項權利在本案的情況下是否被侵犯。德州州法院拒絕 Charles Fuller 爲上訴人作證，不是因爲德州檢方拒絕強制要求他出庭，而是因爲不論他是否在法庭作證，德州法規規定共犯的證詞不得呈堂。本庭因此被要求裁決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是否賦予刑事被告在任何情況下有聲請傳喚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和賦予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要解決這個爭議，本庭需要對制憲者制定增修條文第六條當時之普通法的時代背景做些探討。

Joseph Story 在他對美國憲法所做的著名評論裡，認爲制憲者在人權法案中賦予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是爲了反制當時普通法禁止犯下叛國罪或重罪案件之被告聲請傳喚證人爲其辯護的規定。雖然普通法禁止犯下叛國罪或重罪案件之被告提供證人爲其辯護的規定，已於 1787 年之前在英國被法規廢除，制憲者仍認爲有必要在人權法案中明文賦予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好讓陪審團評估刑事被告證人和檢方證人之證詞的可信度。

儘管英國廢除了普通法禁止犯下叛國罪或重罪案件之被告聲請傳喚證人爲其辯護的規定，但普通法仍制定一些限制身心健全之證人出庭作證的規定，如果這些規定被適用，其結果就如同先前已廢除之禁止犯下叛國罪或重罪案件之被告提供證人爲其辯護的普通法規定一樣，使事實眞相無法眞實呈現。基於彼此間之利益衝突的理由，因同一事件而被起訴的被告和共同被告是被限制出庭作證之身心健全證人中的最大族群。因爲擔心民事或刑事案件的當事人會在法庭上作僞證，因此民事或刑事案件的當事人被禁止在法庭上爲自己作證。雖然起初民事或刑事案件的共同被告僅是基於其爲該案件之當事人的理由而被禁止出庭作

證，且在某些州若是當被告與共同被告的案件是分別審理，被告或共同被告才被允許出庭作證爲彼此辯護或相互指控，其他州仍認爲從犯或共同被告的案件即使分開審理，從犯或共同被告仍不得出庭作證爲彼此辯護，即使法規允許被告在法庭上爲自己作證。民事或刑事案件的被告與共同被告之所以被規定禁止相互出庭作證，是因爲當時一般人普遍認爲如果允許兩個被起訴同樣罪名的人相互出庭作證，雙方皆會試圖爲對方脫罪。這項規定和其他認爲被告與共同被告因爲利益衝突的理由不得相互出庭作證的規定一樣，是基於一個沒有明述的前提，即法院防止證人作僞證的利益較民事或刑事被告提供證人爲其辯護的利益重要，而防止陪審團做出錯誤裁定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陪審團聽到任何僞證，即使該證詞是與該案件之重要爭議有關的唯一證詞。

儘管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美國聯邦地方法院仍將禁止民事或刑事案件被告或共同被告相互出庭作證的限制適用了一段時期。在 *United States v. Reid* 案件中，本院需要解決的爭議，是在公海上犯下謀殺罪而被起訴的被告與共同被告是否得以傳喚對方爲證人。雖然本庭明白制憲者制定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是爲了要廢除普通法中某些不合理的法則，尤其是拒絕允許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提供證人爲其辯護的法則，但本庭仍裁決在 1789 年司法法案通過當時，適用於聯邦法院的證據法爲聯邦法院所在處之州的證據法，其中規定被一同起訴的被告與被告之間不得傳喚對方爲證人。因爲 *United States v. Reid* 的裁決不符合時代需求，因此本庭以拒絕依循 1789 年不合理的普通法爲由，在 1918 年 *Rosen v. United States* 案件中將 *United States v. Reid* 推翻，並且指出：現在大眾普遍認爲唯有允許知情或涉案的所有人出庭作證，並讓陪審團或法院評估這些人之證詞的可信度，才能使眞相大白。

雖然 *Rosen v. United States* 的判決並非與禁止被告和共同被告相互出庭作證的規定是否合憲有關，但是本庭認爲本庭在該案件中對於被告和共同被告應被允許相互出庭作證的分析，符合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的精神。基於普通法的歷史和在 *Reid* 案件中本庭明白表示制憲者制定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是爲了賦予被告提供證人爲其辯護之權利的見解，很難認定檢方

以程序法禁止被告提供任何證人出庭作證爲其辯護的作法，沒有違反增修條文第六條中強迫證人出庭作證條款的規定。

不允許共犯爲被告辯護的法則，不能以可合理地隔開一群極可能串通作僞證的人的理由來辯解。這個法則不合理之處可由其所制定之例外來證明，例如被起訴的共犯可以被檢方傳喚出庭陳述對被告不利的證詞。由常理可知，該名共犯爲檢方作有利的僞證比爲對檢方作不利的僞證對他有較大的利益，尤其是當他還在等候自己的審判或判刑時。若是認爲罪犯會爲了解救他的同夥而說謊，而不會爲了從檢方那裡獲得對他們自己有利的好處而說謊，這樣的想法的確是將犯罪者賦予即使在一般人也很難找到的高尚品格。再者，在德州法規下，被起訴的共犯在自己的審判中被宣判無罪開釋後，他就可以爲他的共犯作證。既然他不可能再一次被以同一項罪名起訴，他就可以自由地爲他的夥伴作證，說出許多自證其罪的證詞。德州法律在他有較強動機作僞證的情況下讓他自由作證，而在他較沒有作僞證動機的時候卻不准他作證。

本庭認爲本案件的上訴人得以要求法院用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被剝奪，因爲德州檢方恣意地否決他提出一個身體心理均有能力作證的證人爲其所目擊之事件作證的權利，而該證人之證詞對於上訴人的辯護是相關且重要的。制憲者無意制定能賦予被告確保證人出庭的權利卻又同時禁止該證人之證詞呈堂的無意義憲法。德州刑事上訴法院的定罪判決必須撤銷。

大法官 Harlan 之協同意見書

本席贊同本案的判決結果，但是本席認爲在本案中德州初審法院侵害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上訴人正當司法程序的保障，並不是因爲德州初審法院侵害了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予上訴人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上訴人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

31.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a

462 U.S. 919（1983）

蔡懷卿 節譯[1]

判 決 要 旨

「立法否決」條款違反咨送總統批准條款及兩院制設計等憲法關於立法權行使之程序規定，此程序係憲法權力分立架構下整體不可或缺之一部份，因此立法否決之規定違憲無效。

(The "legislative veto" provision violates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of Presentment Clause and Bicameralism for legislative action. This procedur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design for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Therefore, it is unconstitutional.)

---

[1] 譯者註：本案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83 年審理一個外國人居留權上訴案時，作出將美國國會行之已有五十年歷史的「立法否決」(legislative veto)運作模式推翻的重大決定。美國憲法明白賦予行政部門介入立法過程之「總統否決」(presidential veto)權力，但並未有對應條文使立法權得以干涉和否決行政部門之決定。唯自三０年代經濟大蕭條危機時起，胡佛總統為爭取國會充分授權進行政府改造計畫，即已與國會協商，同意國會於授權行政部門制定法規命令時，可以保留最終審查和否決之權力。此種立法模式逐漸變成一種慣例，見諸於各式各樣之立法授權裏。而此種生殺大權往往由國會單院，甚至只要一個委員會，即可主導否決；長久下來，導致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的齟齬，遂有本案雙方訴諸憲法訴訟解決。Chadha 一案多數意見書以這種立法模式違反權力分立原則為理由將之宣告違憲，因此導致當時其他兩百個含有立法否決之各種不同法律亦因同樣理由而將面臨失效，影響層面不可謂不大。有鑑於此，Powell 大法官主張司法自制，他提出的協同意見書以另一種判決理由（國會於本案之情形其實是在審判，侵犯了司法權，所以違憲）將判決效果只侷限於 Chadha 個案事實，而不去觸及整個立法否決之合憲性問題。

本案多數意見書之第 I 部份為事實敘述；第 II 部份係程序爭議部份，茲不詳介，僅予以節譯；第 III、IV 部份係實體爭議部份，對於立法權與行政權彼此在權力分立原則下之互動關係有深入討論，因此全文翻譯。Powell 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對於司法權之本質多所著墨，因此也一併全譯。不同意見書省略未譯。

關 鍵 詞

Legislative Veto（立法否決）；Presentment Clause（咨送總統批准條款）；Bicameralism（兩院制）；Separation of Powers（權力分立）。

（本案判決由首席大法官 Burger 主筆撰寫）

事 實

移民及歸化法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簡稱 INA) §244(c)(2) 授權國會兩院之任一院，得以決議推翻行政部門經國會授權，准許特定外國人停止遣送出境之決定。被上訴人 Chadha 係一東印度人，生於肯亞，持有英國護照。他於 1966 年以合法學生簽證進入美國，1972 年 6 月 30 日簽證過期後，他逾期非法居留，因此於 1973 年 10 月 11 日被移民局提起遣送出境之法律程序。Chadha 未否認逾期非法居留之事實，但依 INA§244(a)(1) 申請停止遣送出境。該條規定司法部長有裁量權停止遣送外國人出境，並調整其身份成爲合法永久居留，如該外國人提出申請，並能證明其於提出申請之前已於美國連續居住達七年以上，具有良好品德，且其遣送出境將對具有美國公民或合法永久居留權身份之配偶、父母、子女造成極端之困境。

移民法官於聽證程序之後，認爲 Chadha 符合§244(a)(1)所有停止遣送出境之要件，遂於 1974 年 6 月 25 日下令停止遣送 Chadha 出境，並依照§244(c)(1)之規定提交報告於國會。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依據§244(c)(2)審查 340 件個案之後，認爲 Chadha 以及其他五件不符合法定要件，尤其是極端困境之要件，遂將六案一併送交院會處理。眾議院會通過決議，否決了移民法官停止遣送出境之裁定。由於眾議院係依§244(c)(2)行事，因此該項表決並未被視爲是一種憲法第一條所規定之立法行爲，它未被送交參議院再度表決，亦未被提請總統行使否決權。

眾議院否決了司法部長停止遣送出境之決定後，移民法官重新啓動遣送 Chadha 出境之法定程序，而 Chadha 也隨即提出停止遣

送程序之申請，其理由是§244(c)(2)之規定違憲無效。但是移民法官宣稱其無權審查法律之合憲性[2]，並依照眾議院之指示遣送 Chadha 出境。Chadha 向移民上訴法庭之上訴，亦以該機關並無違憲司法審查權之同一理由遭到駁回。Chadha 遂向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請求審查遣送其出境之行政處分，而移民局於訴訟過程中亦同意 Chadha 之論點，認爲該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律 INA§244(c)(2)爲違憲無效。基於所涉及問題之重要性，聯邦上訴法院邀請參眾兩院提出法庭之友答辯狀（amicus curiae briefs）。

經充分書狀和言辭辯論之後，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判決國會無權下令遣送 Chadha 出境，因此指示司法部長停止所有遣送出境之步驟。其主要理由爲 INA§244(c)(2)違反權力分立原則是一個違憲的法律，國會之否決不發生拘束力，因此維持移民法官之原判。

爲釐清相關憲法爭議，移民局以 Chadha 等爲對造將本案提出上訴，編號 80—1832 號案件。而美國眾議院則以移民局等爲對造提出 80—2170 號聲請案，美國參議院亦以移民局等爲對造提出 80—2171 號聲請案。三件併案審理。

判　決

本院先前對 80—2170 號及 80—2171 號聲請案核發移審令，並延緩考慮對 80—1832 號上訴案之管轄爭議。茲確定前審判決。

理　由

I

在處理§244(c)(2)國會單院否決權合憲性之重要問題前，我們首先考慮一些對本院處理系爭案件權限之質疑。

A. 上訴管轄權

依照 28 U.S.C.§1252 本院有權受理移民局所提之 80—1832 號上

[2] 譯者註：美國移民局原隸屬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911 紐約世貿大樓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於 2002 年成立國境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移民局現已改隸屬國境安全部。其下設有一個移民案件覆審處（Executive Office of Immigration Review），由移民法庭（Immigration Court）和移民上訴法庭（Board of Immigration Appeal）兩單位構成。雖稱移民「法庭」，但其實為我國「訴願」和「再訴願」之行政程序性質。所謂移民「法官」，並非憲法第三條授權之真正的聯邦法官，故並不擁有違憲司法審查權力。

訴案。該法規定：當美國政府或其所隸屬之任一機關係當事人之一時，「任何當事人」得自「任何聯邦法院」於「任何民事訴訟、官司、或程序」中宣告國會所制定法律爲違憲無效之判決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聯邦上訴法院係§1252意義內之美國法院，系爭前審程序係一民事訴訟、官司、或程序，移民局係一美國政府機關並且爲當事人之一，而系爭前審判決宣告一個美國國會制定之法律違憲無效。更且，爲決定移民局是否爲§1252 上訴管轄權意義內之「任何當事人」，移民局因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禁止其採取依法之行爲，而權利充分受有損害。政府機關作爲§1252 權利受侵害當事人之地位，不因其可能認同上訴法院宣告系爭法條違憲之看法而有所改變。

B. **可分離性**

§244(c)(2)可自其餘之§244 抽離。移民法§406 規定若該法任何特定條文被宣告無效，其它剩餘部份不受影響。因此成立一推定，國會無意使該法或其任何一部份之效力取決於§244(c)(2)之否決權是否無效。此推定可從§244 之立法沿革獲得支持。況且，一條文將被推定爲可分離的，如果分離後剩餘之條文仍爲一部可完全運作之法律。在此，§244 於沒有國會單院否決權之情形下，仍可保存爲一部「完全運作」和有用之行政機制。

C. **訴訟適格**

Chadha 有權質疑§244(c)(2)之合憲性，因爲他已證明「事實上受有傷害，以及其所尋求之司法救濟相當有可能將可排除或補償其所請求之傷害。」

D. **替代救濟管道**

Chadha 可能有其他法律救濟之事實並不排除其質疑§244(c)(2)合憲性之權利，特別是當其他救濟管道頂多只是臆測性質的時候。

E. **司法管轄權**

聯邦上訴法院依照移民法§106(a)對本案有管轄權，該條規定在上訴法院聲請覆審「應是針對滯留美國外國人之移民法§242(b)行政程序……所有遣送出境的最後命令唯一與專屬之司法審查程序」。§106(a)包含所有遣送出境之最後命令尚未定案之案件，並非只限於那些在遣送出境聽證會上作成之裁定。在本案中，Chadha 之去留取決於其所質疑之立法否決權效力，而遣送出境之最後命令已被下達以執行該否決權。

F. **訟案或爭議**

本案存在著一個訟案或爭議。從眾議院正式介入之時點開始，就有一具體之兩造對立性質；而在眾議院介入之前，雖然當時僅有移民局和 Chadha 兩個當事人，但是已經存在妥當之憲法第三條對造性要件。移民局雖然同意 Chadha 之主張，但此並不改變若無上訴法院之判決移民局仍會將 Chadha 遣送出境之事實。更且，當一個政府機關作爲負責執法之被告卻同意原告法條違憲之見解時，國會是替法條效力辯護之妥善當事人。

G. **政治問題**

本案不存在著無法裁決之政治問題，因爲 Chadha 只是質疑國會在憲法移民條款及必要適當權力條款下之授權範圍。帶有濃厚政治意味之憲法議題並不自動就引發政治問題原則。解決三權之一質疑其憲法權力界限之爭訟案件是法院無法迴避之責任，並不能僅因該爭議帶有政治意涵即不去面對它。

H.

關於訴訟適格與管轄權之異議已經被徹底檢視，我們認爲當事人有權要求本院審理案件。重要議題均已提出完全之書狀陳述並經過兩度之言辭辯論。正如首席大法官 Marshall 在 Cohens v. Virginia,一案所作宣告，本院之義務是很清楚的：

「有些可能發生的問題我們都樂於規避，但我們無法不去面對它。我們所能作的，就是依我們的最佳判斷，認眞負責地履行我們的義務。」

II

A.

我們現在回到國會單院之§244(c)(2)系爭作爲是否違反憲法之嚴格規定這一個問題。當然，我們首先必須將系爭法條作合憲有效之推定。此推定之智慧不在本院審查範圍，如果聲請人未能舉證系爭作爲違反憲法，其效力就必須被確定：

「一旦立法意旨被察覺且其合憲性被確定，司法程序即將終結。我們並非一個審查委員會，亦未被授與否決立法之權。」

同理，若某一法律或程序違反憲法，僅因其對增進政府功能爲有效率、方便、有用，此本身單獨並不足以拯救其失效命運。方便與效率並非民主政府之首要目標－或其標誌－而我們的質疑將更加尖

銳而非緩和，因爲國會否決權之規定於國會對行政機關或獨立機關授權立法之法條中出現頻率增加之事實：

「自 1932 年立法否決之規定首次被制定於法律當中以來，295 則國會否決型態之程序已被置入於 196 個不同的法律如下：1932 起迄 1939，5 個法律被涉及；1940 至 1949，19 個法律；1950 至 1959，34 個法律；19601 至 1969，69 個法律。從 1970 至 1975，至少 163 個此類規定被包括於 89 個法律之中。」

大法官懷特嘗試證明國會單院否決權是一種有用「政治發明」的論點，我們無須與其爭辯，我們甚至可以承認此一功利論點，雖然這種政治發明之長久智慧尚待考驗。它經過激烈辯論，而比較雙方之對立觀點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啓示。但即便是有用之政治發明的政策論點亦須通過憲法檢驗，憲法界定了政府各部門權力，並規定這些權力應如何行使。

明確而毫不含糊的憲法條文規定了國會以及行政部門在立法過程的功能職權。因爲這些我們已經熟悉的憲法條文對於解決系爭案件極爲關鍵，我們在此再將它逐字敘述。憲法第一條規定：

「憲法所授予之立法權，均屬於參議院與眾議院所組成之美國國會。第一條第一項（強調之斜體字部份係作者添加）」

「凡眾議院與參議院所通過之法案，於成爲法律之前，應咨送美國總統。.... 第一條第七項第二款（強調之斜體字部份係作者添加）」

「凡必須經參議院及眾議院同意之命令或決議或表決（休會之問題除外）應咨送美國總統。該項命令或決議或表決於發生效力前，應經總統批准，如總統不批准，應依照與法案有關之規則與限制，由參議院及眾議院議員三分之二人數再通過之。第一條第七項第三款（強調之斜體字部份係作者添加）」

這些第一條的相關規定是憲法整體權力分力設計之一部份。本院最近提到「權力分立原則不僅只是制憲者心中之抽象一般原則；它被納入 1787 年夏天在費城所起草的那部文件裏。」正如我們於 Backley 一案中依據憲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之條文規定來證立權力分力原則，我們亦可見到第一條第七項第二、三款咨送總統批准條款、及第一條第一項與第七項第二款兩院通過要件背後之意義和目的，指引我們解決本案所存在之重要問題。憲法第一條、第二條及第

三條授權與分權之架構爲權力分立概念提供了極佳之例示。我們現在回到第一條的討論。

B. 咨送總統批准條款

制憲大會的記錄顯示，所有立法於生效前必須咨送總統批准之規定係得到全體制憲代表一致的支持。咨送總統批准以及總統的否決權是如此被重視，因此起草者特別用心以確保這些規定不會被刻意迴避。在第一條第七項第二款的最後辯論時，詹姆士·麥迪遜表達其憂慮，有心人也許可以用「決議」或「表決」取代「法案」來稱呼一項新立法。因此，第一條第七項第三款被加入。

制憲者授與總統一個有限度和修正之權力可以否決國會單向提議之立法，此係基於其確信，授與國會之權力是應當要最小心加以限制的權力。立法權無疑的應由國會兩院與總統分享。在聯邦論者73號文件，漢彌爾敦強調總統在立法時的角色：

「即使我們未發現立法機關有侵犯行政權之傾向，合理的推論以及理論之妥當性本身都告訴我們，行政權不應被置於看立法權臉色行事的地位，而應擁有一憲法上之有效自衛權。」

總統在立法過程之角色規定亦反映出制憲者戒慎恐懼之努力以制衡國會可能制定出壓迫式的、草率的、甚或不懷好意的法律規定。總統否決權在立法過程的角色稍後在各州議會爲確認憲法條文所舉行之公共辯論會上被描述如下：

「它建立一個對立法機關健全的制衡，經心設計來保護社會免於黨派之爭、輕率躁進、或任何對公共利益不友善之一時鹵莽衝動的後果，這些因素都可能發生而影響立法機關之多數意見。」

「授與行政部門系爭權力之主要誘因是使其有能力自衛；其次是增強社會對付立法者因匆忙草率、不謹慎，或故意通過惡法的機會。」

本院過去亦提到咨送總統批准條款符合一重要目的，以確保「國家」觀點被植入於立法過程：

「總統是人民的代表，正如同參議院和眾議院議員是人民代表一樣，而有時可能在某些議題上，由全民選出來的總統比兩個立法機關的成員，其選民係局部而非全國的，更具有代表性。」

C. 兩院制

憲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七項兩院表決之規定受到制憲者之重視絕不亞於總統否決權之規定，兩者

其實是互相依存的。規定所有法案未經國會兩院同時以多數決通過就不能生效，制憲者再度強調其已在咨送總統批准條款裏所提到的觀點，即一個立法不應成立生效，除非它是經過全民選出的代表詳細全盤的考量。在制憲大會關於兩院制立法的辯論會上，日後成爲本院大法官的詹姆士·威爾遜評論道：

「專制主義以不同形式降臨人類社會，有時是行政專斷，有時是軍事極權。有無可能發生立法專制？理論上和實務上都顯示有可能。如果立法權不受任何克制，社會將無自由與安定；而只有將它本身分成明白區隔的獨立分部才能限制它的權力。單一國會沒有人能制衡它，即使有的話也只是其成員品德、常識之反省，誠然不足。」

漢彌爾敦認爲由單院組成之國會與憲法之目的背道而馳。他警告如果美國接受一部由單一立法機關構成的憲法：

「最後我們將積聚於一個單一機關主權國家所擁有最重要的特權，因而留給我們後代子孫一個人類妄想所能發明的最拙劣形式的政府。因此我們將於現實中創造出我們新憲法熱切激辯雙方所極力要避免的那個暴君。」

此一觀點係根源於一個對人性缺點普遍之懷疑論，稍後由約瑟夫·史多利評論如下：

「公共機關就如同私人一樣，有時亦會受到強烈熱情與激動情緒之左右；欠缺耐性的、急躁的、鹵莽的……。如果一立法機關除自身意志外不受任何制約，它很少有堅定立場對某一議題持續探索所有與社會攸關之方向和關聯。」

這些意見與許多制憲代表所表達的觀點是一致的，而沒有比麥迪遜所指出的需要切割和分散權力以保障自由的觀點更中肯：

「在一個共和政府，立法權必然要佔優勢地位。矯正之道是把立法機關切割成不同的部門；經由不同選舉方式和運作原理，使其彼此之間聯繫盡量降低到僅止於其相通功能和共同社會依存度所允許之程度。」

如論這些觀點是已經爲人所如何熟知，在此指出，除了擔心特殊利益團體的意見可能會凌駕公共需求之外，制憲者亦顧慮當時小州所持的觀點仍然是有幫助的。這些小州擔心大州的集體利益可能會對其不利。反之，大州的代表則對於一個立法機關可能通過偏袒少數意見的法律一事同感疑慮不安。在此無庸重述的大和解，由國會一個院代表人民而另一個院代

表各州，化解了大小州各方的憂慮。

因此我們見到制憲者深知兩院表決的規定與咨送總統批准條款將具有重要憲法功能。總統在立法過程的參與將保護行政部門免於國會的壓迫，並保護全民免於國會通過不妥當的法律。將國會分割成兩個不同機關可以確保僅於有機會在不同環境下分別經過徹底研究和辯論之後，立法權才得以行使。總統的單方否決權依序又受制於國會兩院三分之二多數之覆決權，因此避免單一個人最終之咨意行爲。明顯地，憲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七項關於立法作爲的規定反映出制憲者已決定，聯邦立法權的行使只能按照唯一的、精心設計與考量的步驟進行。

III

憲法把授權新聯邦政府之權力分爲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範疇，俾確保每個政府部門儘可能侷限於自己所被指定之責任範圍。內在於每一部門欲脫逸出其權力界限之壓力必須受到抑制，即使是爲達到有益目的亦不能例外。

雖然彼此之間並非「密封」隔絕，授與三部門之職權功能是可區分辨別的。當任何一個部門有所作爲時，我們推定它是在行使憲法所授與之權力。當行政部門採取作爲，它將被推定係依憲法第二條定義之行政或管理地位而作爲。而如同本案之情形，當國會單院採取作爲，我們亦推定它是在所被指定之責任範圍內行動。

從此一推定出發，但我們必須證明系爭§244(c)(2)之作爲是一種適用憲法第一條第七項程序要件之作爲。並非每一國會作爲皆須經兩院表決機制或符合咨送總統批准要件。國會任何一院之作爲於法律上或事實上是否爲立法權之行使，並非取決於其外觀形式，而是取決於「其是否含有應被適當視爲立法性質或效果之內容」

檢視國會單院於此依照§244(c)(2)之所爲，顯示其性質或效果基本上是立法的。當它行使憲法第一條第八項第四款以建立「統一的移民歸化規則」時，眾議院係在採取一種作爲，具有改變他人之權利、義務和法律關係之目的和效果；這包括了司法部長、行政部門官員和 Chadha 先生，他們皆是立法部門以外之他人。§244(c)(2)使國會單院有權命令司法部長遣送一位依§244 其他規定得以合法居留之外國人出境。國會單院否決權在此案件裏推翻了司法部長之行政決定，命令 Chadha 被遣送出境。

若無國會之作爲，Chadha 將得以滯留於美國；國會採取作爲，而其作爲改變了 Chadha 之法律地位。

國會單院否決權於此案之立法性質，可由它所欲取代之國會作爲而更爲突顯。若無§244(c)(2)之否決條款，一旦司法部長行使其經立法授權賦予之權力決定一外國人可居留於美國，參眾兩院之任何一院，或兩院聯手，皆再也無法有效地規定司法部長遣送外國人出境。若無系爭§244(c)(2)之規定，這只能再經由立法來下令遣送出境。相同地，§244(c)(2)之國會單院否決並不能被視爲只是一種修改§244(a)(1)所設標準，抑或是廢除§244 適用於 Chadha 之企圖。修改或廢除法律與制定法律一樣，都必須符合於憲法第一條之規定。

於本案國會單院否決所作成決定之性質，更進一步彰顯了其立法之本質。經過長時期笨拙、耗時之私人法案[3]程序，國會經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授權給行政部門，特別是司法部長，使其有權於某些特定情況下允准應被遣送出境之外國人得以留居美國。當事人雙方並未爭議此種授權正是一種只能依照憲法第一條程序規定作成之決定。國會反對司法部長對於 Chadha 遣送出境所作成之決定— 亦即，國會欲遣送 Chadha 出境之決定— 涉及的是一種與國會原先授權司法部長作成決定時同樣之政策決定，其只能以一種方式實施：兩院通過並呈送總統批准。國會必須遵守自身之授權，直到該授權經由立法加以改變或撤銷。

最後，我們見到當制憲者欲授權國會之任一院單獨作爲，或脫離其所規定之兩院立法模式，制憲者都是很狹隘地、精確地爲這種作爲來規定程序。在憲法裏有四處這樣的規定，國會單院可獨自行動不受司法審查亦不受總統否決：

(a) 眾議院單獨被授與發動彈劾之權（憲法第一條第二項第五款）；
(b) 參議院單獨被授與審判和定罪之權，於眾議院發動彈劾之後（憲法第一條第三項第六款）；
(c) 參議院單獨被授與對總統所提人事任命案批准或否決，而不受任何再審查之終極權力（憲法第

[3] 譯者註：美國國會沿襲英國國會之傳統，擁有 private bill 之個案立法特權。此非立法常態，但在早期移民人數尚不多的年代，因為憲法明文授與國會移民權，故均是以這種 private bill 的方式由國會（而非由行政部門）來審查和個案立法批准移民之申請。迄二十世紀初移民人口暴增，國會無力負荷大量移民審查，才通過 1924 年及 1948 年移民法將此權力下放給司法部長和其所轄之移民局。

二條第二項第二款）；

(d)參議院單獨被授與追認總統對外所談判條約，而不受任何再審查之權力（憲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

很明顯地，當憲法起草者欲授與國會單院一種特殊權力免受制於另一院或總統，他們會使用明確、毫不含糊之文字。上述這些經過仔細規定之咨送總統批准條款與兩院制之例外，強調了國會立法功能與其他憲法裏所規定之單向但重要之只需國會單院即可生效作爲之差異。這些例外皆很狹隘、明確，並有其個別正當化之理由；它們沒有一項可適用於本案系爭作爲。相反地，它們爲國會之授權不得以暗示的方式，以及§244(c)(2)之否決權並非憲法設計裏賦與立法部門權力之結論，提供了支持的理由。

既然很明顯地國會依§244(c)(2)所採之作爲並不在憲法明示授權國會單院作爲之任何例外之列，同樣明顯地這是一種立法權之行使，因此該作爲必須遵守憲法第一條所制定之標準：兩院議決、咨送總統批准條款、總統否決、以及國會複決權之行使，這些強制規定之步驟皆是用以在各權力部門間建立一長久的制衡，保護人民免於不當之權力行使。欲保存這些制衡機制並維持權力之區隔，各部門之間精心設定之權力界限絕對不能被侵蝕。要達到國會單院於本案所欲作成者，必須遵守憲法對立法行爲所規定之明示程序要件：國會兩院多數決通過，並咨送總統批准。

從許多方面來看，§244(c)(2)之否決權無疑地是一種很方便的捷徑；表面上，國會與行政部門以這種方式「分享」對外國人之審查權是一種很有說服力的妥協。從純務實的角度來看，國會單院作爲毋需送總統批准顯然是方便多了；但是制憲大會的記錄、當時之文章與辯論，在在顯示了制憲者所追求的是一種比效率還要高的價值。制憲大會的記錄以及各州議會於批准憲法前辯論之記載，強調了當時國人共同希望界定並限制這個新創造聯邦權力的行使，因爲它將對各州及人民發生重大影響。他們毫無疑問地表達一個決心，全國國會所制定之法律必須是一步一腳印，經過深思熟慮的過程。

我們從制憲大會歷史所察覺之抉擇，對於政府施政過程課以負擔，常常被認爲是笨拙不靈活的、無效率的、甚至是不可行的。但是這些痛苦決定是由曾經生活在一種無制衡、恣意作爲之政府形式下的人們有意作成的。憲法或本院之判決並未曾表示，國會或總統可以

規避因遵守憲法明示規定所招致之累贅與延遲。雖然有種種的延遲、紊亂、甚或可能濫權等明顯缺陷，本院尚未發現一種比規定權力之行使必須受制於憲法的精心設計更好的方式來維護自由。

IV

本院宣告§244(c)(2)之國會否決權可從移民及歸化法中單獨抽離，而該部份條文是違憲的。因此，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確定。

大法官 Powell 之協同意見書

本院基於憲法第一條第七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理由所作成之判決，顯然地將使每一使用立法否決之法條違憲失效。這樣一個判決所造成的廣泛影響使我們必須駐足深思。溯及 1930 年代起，國會已經將這樣的一種否決條款加入於上百個法律之中。國會很明顯地認爲此程序於授權給行政機關時是極重要的控制程序。本院也許可以不同意國會對於否決權功能之看法，但是對於相對應政府部門判斷應有之尊重使我們必須很小心謹慎地作出判決，不能超出決定系爭案件應有之範圍。依本人之看法，本案可以於一個較爲限縮的基礎上作成判決。當國會認爲某一特定人士不符合永久居留於美國之法定要件時，它是在行使一種司法功能而違法了權力分力原則。因此，本人只能同意多數意見之判決結果。

I

A.

制憲者覺察到「集立法、行政、司法所有權力於一身，無論是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無論是世襲、自我加冕、或經由選舉，皆可以稱之爲暴政。」他們的擔憂並非毫無道理的。在英國的統治下，美洲殖民地居民飽受無制衡之行政權力的蹂躪，而其至少被公認爲應歸罪於世襲國王。在邦聯時期，對應之道是把權力從行政部門移轉至民選的立法者。但是許多立法者被證明其實比國王好不到那裏去。「立法權優越被認爲只是朋黨優先和一群見風轉舵多數派之暴政。立法者掠奪沒收人民財產，浮濫印製紙鈔，並凍結尋常的討債方法。」

邦聯時期一個常見的濫權是由州議會來行使司法權。制憲者對於決定一個人權利取決於「一群見風轉舵多數派之暴政」的危險其實是了然於胸的。Jefferson 認爲他所出身的 Virginia 州民大會代表並未

被排除行使司法權力，因此他們常在許多場合決定了應當留給司法爭議去解決的權利。同樣的顧慮亦可以在監察會議， 一個有權決定 Pennsylvania 議會是否遵守州憲法的機關，所提出的報告中看出來。該會報告認爲當時「憲法所保障的陪審權利被違反，憲法所未授予之權力被行使……屬於司法部門的案件經常被提到立法機關去審查並作成決定。」

正是爲避免這種濫權之一再發生，制憲者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授與不同之部門。他們對於立法者不應實質單方剝奪個人權利的顧慮，不僅見諸於這個權力之一般分配，更可在憲法特定條文裏的詳細規定，例如憲法第一條第九項第三款 Bill of Attainder 條款裏見到。正如本院於 United States v. Brown, 381 U.S. 437 (1965)一案所揭示「Bill of Attainder 條款並非意在僅爲一種狹隘、技術性的……. 限制，而是要落實權力分立，一個廣泛性的保障以避免立法權行使司法功能，或是更簡單地說，就是— 立法者審判。」此一條款以及權力分立之一般原則，反映出制憲者擔心立法者審判欠缺防止權力濫用所必要之保護機制。

B.

憲法並未精確定義三大政府部門之權力界限，而是如大法官 Jackson 所說的：「雖然憲法分散權力以確保自由，它同時卻又企盼各分散之權力在實務上將整合成一個可資運作的政府。它要求各部門雖然分離但相互依存，獨立自主但對等互惠。」因此本院常記於心，各部門之權力界限應當「依常識和內在於政府分工合作所需」而決定。但是當一個部門侵犯或是行使一種其他部門之核心權力，本院從不遲疑貫徹此一權力分立原則。

於職權功能上，此原則可能以兩種方式被違反。一部門也許不當地干涉其他部門履行其憲法指定之職權功能；或是當一部門主張行使一種職權功能，而其應當更適切地是被託付給其他部門，權力分立原則也許被違反。本案屬於後者。

II.

在我們考慮國會是否不當地行使一種司法功能之前，讓我們先簡單地回顧國會之作爲。肯亞公民 Chadha 於其學生簽證到期之後違法滯留於美國。雖然他被排定時間遣送出境，他申請移民局停止遣送，因爲他符合永久居留於美國之法定要件。移民局於受理申請並舉

行審查聽證會之後批准其申請，並 — 依國會保留否決權所規定者— 送交國會一份報告。

除了關於 Chadha 之報告外，國會還收到另外 399 名停止遣送出境者之報告。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認定其中 6 人，包括 Chadha，不應得到居留權。因此，它向院會提交一份決議文，內容簡單陳述「眾議院不批准下列名單上外國人之永久居留權。」121 期眾議院記錄 40800 號（1975 年）。這份決議文在表決之前並未分送各個眾議員，但是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之移民、歸化及國際法小組召集人向院會作如下之口頭報告：

「本委員會於審查 340 個案件之後，認爲列名本決議文上之外國人不符合法定要件，特別是關於困境之規定；本委員會之意見是這些人的遣送出境程序不應被停止。」（Eilberg 眾議員之意見）。

未經進一步解釋和記名表決，眾議院駁回移民局認爲這六人符合法定要件之裁定。

就其外觀而言，眾議院之作爲明顯的是司法性質。眾議院並未制定一般規則；而是就六個特定之人不符某些法定要件一事作成一個決定。因此它作成一種決定，而這種類型之決定傳統上是保留給其他部門來作的。即使眾議院不是作成一個全新的決定，而只是審查移民局的調查結果，它仍然是在行使一種通常是由聯邦法院來行使的職權功能。參見美國聯邦法典第五冊§704（關於終局行政處分接受司法審查之規定）。同時參見 Foti v. INS, 375 U.S. 217 (1963)（宣告聯邦上訴法院有管轄權審理移民局駁回停止遣送出境申請之決定）。正如本案，當國會行使一種權力「不可能被視爲只是在輔助國會的立法職權功能時」，本院曾判決國會係不當主張一種憲法已託付給其他部門的權力。

國會行使這種職權功能之不妥，可由其所引致之危險正是制憲者所欲防止者 — 行使未受制衡之權力 — 此一事實確認之。當決定 Chadha 是否應當被遣送出境時，國會並未有任何內部制約避免其恣意剝奪 Chadha 之居留權。不像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國會並不受制於任何明定之實體規則。同時它亦不受程序保護之約束，例如律師辯護權利、公正法庭審判權利等，這些都是當一個法院或行政機關在決定個人權利時，當事人所擁有的保障。惟一對國會權力構成有效制約的是政治力，但是國會最能負政治責任的是，當它作成具有一般適用性規則的時候。當它規定特定人權利的時候，這些人的權利是

取決於「一群見風轉舵多數派之暴政」。

首席大法官 Marshall 嘗謂:「立法者的特定領域係在爲治理社會制定一般性的規則；把這些規則適用到社會大眾則是其他部門的作爲義務。」就我的觀點看來，當國會把它自己制定的規則適用到 Chadha 身上時，它踰越了憲法所授權的範圍。但是我將不去觸及立法否決是否因違反咨送總統批准條款而全盤無效這個更廣泛的問題。

32. Nixon v. Fitzgerald

457 U.S. 731（1982）

黃義豐 節譯

判 決 要 旨

上訴人，為美國的一位前總統，因其任內之公務行為而被訴應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享有絕對的免責權。

(That petitioner, as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titled to absolute immunity from damages liability predicated on his official acts.)

關 鍵 詞

President（總統）；Congress（國會）；absolute immunity （絕對的免責權）；qualified immunity（附條件的免責權）；separation of powers（權力分立）。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Powell 主筆撰寫）

事 實

一九七０年一月，被上訴人費茲傑爾（A. Emest Fidzgerald）失去他的工作，當時他是美國空軍總部的管理分析師。費茲傑爾之被解僱，係由於該總部重組及精簡兵力，他的工作因此被裁掉。空軍宣稱：重組係爲促使軍隊更節省及有效率。

被上訴人之被解僱，引起國會及新聞界非常的注意。因爲在此一年多前，當詹森總統最後憂暗的幾個月，費茲傑爾即曾受到全國的注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費茲傑爾出現在美國國會共同組成的經濟委員會中“關於政府節約問題小組”。在該小組中，費茲傑爾證稱：C-5A 型運輸機過於浮濫的成本約有二十億美元。他並公開表示，在發展該型飛機時，技術上

碰到非預期的一些困難。此舉使其國防部的一些長官感到困擾。

由於費茲傑爾可能係因他在國會上述作證，而遭到報復，基於關心，“關於政府節約問題小組”就費茲傑爾之被解僱，召集公開之聽證會。新聞界就此公聽會做顯著的報導，如同報導他的工作被國防部裁掉時之情形一樣。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的新聞記者會中，尼克森總統被問到費茲傑爾被迫離開政府公職的事情。總統答應要注意此事。在新聞記者會後不久，上訴人（即尼克森）要求白宮幕僚長海德曼(Haldeman)安排費茲傑爾到其他的行政部門工作。另外亦顯示：總統曾向預算局局長建議，在預算局爲費茲傑爾安排一個位置。但爲費茲傑爾在行政部門中重新安排工作之計劃，卻遇到阻力。一九七０年一月二十日，在一份內部的便箋中，白宮助理巴特菲爾(Butterfield)向白宮幕僚長海德曼報告：“費茲傑爾雖然無疑的是成本方面的專家，但在忠誠方面，應給他很低的分數。畢竟這是個忠誠事件。”巴特菲爾因此建議：“我們應讓他流點血，至少亦要一段時間。”在巴特菲爾提出上述便箋後，並沒有證據顯示白宮努力重僱費茲傑爾。

由於沒有其他聯邦工作的邀請，費茲傑爾乃向公務員服務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ttee)訴願。在一九七０年一月二十日的訴願狀中，費茲傑爾稱他被解僱，係對他在國會中之小組所作誠實之證言所採取之非法報復。一九七一年五月四日，公務員服務委員會就費茲傑爾所稱的內容，召集秘密的聽證會。但費茲傑爾卻寧願將他的委屈，公諸於世。在他提起並獲勝訴之不作爲假處分後，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務員服務委員會舉行公開的聽證會。此聽證會再度引起公眾的注意，大部分注意集中到當時美國空軍司令西門斯(Seamans)的證詞。西門斯證稱：在費茲傑爾的工作被裁掉前，他曾接到來自白宮的一些意見。但空軍司令拒絕說明更詳細的情形，對於許多問題，他都引用“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予以回應。

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新聞記者會中，尼克森總統被問到關於西門斯的證詞時，尼克森總統表示，就費茲傑爾被解僱的事情，他個人承擔責任，他說：

“我完全知道費茲傑爾將被解僱或被要求辭職。我同意如此做。西門斯必定已經與某人談過，該人曾就此事與我討論。此事件，並不是下面某個人決定他該走，此事件之決定，曾提到我這裡，是我

決定的，我堅持如此。”

但隔天，白宮新聞辦公室發表聲明，撤回尼克森總統上述說法。依據新聞發言人所言，尼克森總統係將費茲傑爾與另一前行政人員混淆。該發言人表示，他代表總統，關於費茲傑爾的事情，尼克森未曾做任何決定。

在審閱超過四千多頁的證詞後，公務員服務委員會的主任審查員，提出關於費茲傑爾事件的決定。主任審查員認爲：解僱費茲傑爾，違反有關公務員服務的規定。主任審查員之決定，係基於他發現：費茲傑爾因部門組織重組而失去工作，雖係以節約措施爲名，予以實現，但事實上，其動機純粹出於對被上訴人個人的理由。以此爲由，精簡兵力，係不被容許的，主任審查員建議：費茲傑爾應准予復職，或重新分發到相當之機關工作。但主任審查員亦明確表示，他的結論，與被上訴人所建議應認定被上訴人係因到國會作證受到報復，尚有所不同，因爲公務員服務委員會所查結果，認爲本案之證據，尚無法支持費茲傑爾所宣稱：其工作被廢除，係爲報復其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關於政府節約問題小組”中，公開C－5A運輸機成本過於浮濫之證言所致。

公務員服務委員會做成決定之後，費茲傑爾向美國聯邦地方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在訴訟中，他提出與其向公務員服務委員會所爲相同之主張，列名爲被告者，有國防部八位官員、白宮助理巴特菲爾及其他一個或數個未知其名的白宮助理。

聯邦地方法院駁回費茲傑爾的訴訟，因爲已超過哥倫比亞特區（華府）三年的時效期間。費茲傑爾上訴，哥倫比亞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除巴特菲爾部分外，維持聯邦地方法院之判決。聯邦上訴法院認爲：一九七二年以前，費茲傑爾並沒有任何理由懷疑白宮介入他被解僱的事件，但在該年，令人懷疑的合理事由已經出現，因爲巴特菲爾曾建議：在提供費茲傑爾其他行政機關的工作前，至少要讓他流點血的便箋，被公布。本於隱匿不法行爲，時效期間停止進行之法則，聯邦上訴法院判決，要求聯邦地方法院就該訴訟對於巴特菲爾部分，繼續審理。

聯邦地方法院乃繼續審理，並廣泛調查證據後，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五日，費茲傑爾提出第二次的修正訴狀。在此次的修正訴狀中（此時已逾其因被解僱而向公務員服務委員會訴願後八年），費茲傑爾首度將上訴人尼克森列爲被告。此次被列爲被告者，尚有白宮助理哈

羅（Harlow）及尼克森政府中的其他官員。調查程序持續進行，到一九八０年三月，僅剩下三位被告：上訴人尼克森、白宮助理哈羅及巴特菲爾。聯邦地方法院判決駁回尼克森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之聲請，並認爲本案應進行審理。該院於同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命令認爲：費茲傑爾已依兩個聯邦法律及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敘明可以審理之訴因。聯邦地方法院亦認爲：尼克森無權主張絕對的免責權。

尼克森就聯邦地方法院之命令，關於免責權部分，向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提起上訴。聯邦上訴法院予以簡易駁回。該法院如此判決，係依據本院一九八一年 Halperin v. Kissinger 案的判決，因爲在 Halperin 案中，本院否決季辛吉（Kissinger）所主張之免責權之抗辯。

因爲本院對於美國總統免責權的範圍如何，未曾加以裁判，因此，本院決定審理此一重大問題。

判　決

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應予廢棄並發回，本案應依聯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之意見裁判。

理　由

I

原告即被上訴人費茲傑爾提起本件訴訟，向美國前總統請求民事損害賠償，其請求權所主張之行爲，係前總統在其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爲。本案之爭點爲：美國總統所享有之免責權之範圍如何。

II

在討論本案之實體爭點前，我們首先討論關於本院是否有權審理本案的兩個質疑。被上訴人反對上訴人聲請提審（certiorari）本案，首先質疑：由於聯邦地方法院判決上訴人所辯其有絕對的免責權之命令，並非終局的裁判，本院無權審理本案。其次，我們亦要考慮：被上訴人主張：因爲兩造當事人間已有和解，兩造之爭執已不存在（moot）。

A

上訴人引用美國聯邦法律彙編第二十八編第一二五四條，做爲本院審理本案之依據。依該條規定，本院有權審理聯邦上訴法院之案件。本案上訴人請求本院審理的，係中間性質之命令

（interlocutory order），此命令否認上訴人所辯解的其有絕對的免責權。聯邦上訴法院係以欠缺審判權而駁回上訴人在該院之上訴，而爲該中間性質之命令。由於審判權是聯邦上訴法院中間性質之命令之基礎，被上訴人主張：聯邦地方法院之命令，並不屬於該第一二五四條所規定得上訴於上訴法院之案件。我們不同意被上訴人此項見解。

依據一九四九年 Cohen v. Beneficial Industrial Loan Corp. 案所創立“附隨命令”（Collateral order）法則，某些中間性質之命令，得立即上訴至上訴法院。這些命令包括：對於有爭執之問題所爲的具有確定性質的命令、雖非對訴訟實體但係對於重要爭點所爲的命令，及某些於終局判決上訴時已不得加以審理的命令。此外，Cohen 案亦認爲：對於中間性質之命令得立即附隨上訴者，須該命令係對於重大、未決的問題所爲之命令。依照 Cohen 案所設定的標準，本院至少曾兩次裁判認爲：否定絕對的免責權主張之命令，係得上訴。例如：一九七九年的 Helstoski v. Meanor 案中，依據言論及討論條款主張免責權，一九七七年的 Abnez v. United States 案中，以一事不再理條款主張免責權。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以往的案件亦認爲：否定絕對的免責權之命令，依 Cohen 案的標準，係屬得上訴。

本件聯邦上訴法院駁回上訴人在該院之上訴，該院認爲上訴人之上訴，在 Cohen 案中之法則之外，因爲本案並無重大、未決的法律問題。此亦係被上訴人所持之理由。被上訴人要求聯邦上訴法院，依該院一九七九年之 Halperin v. Kissinger 案之判決意見爲基礎，駁回上訴人在該院之上訴。

但本件之情形，本院不同意關於上訴人之中間上訴並未產生重大、未決問題的說法。雖然在 Halperin 案中，上訴法院認爲總統並不享有絕對的免責權，但本院並未曾如此裁判。本案上訴人之上訴被駁回時，對於 Halperin 案請求提審之聲請，正繫屬於本院。由於在本案，上訴人主張，稱此案涉及在權力分立（the separation of powers）的制度中，有危害重要的總統特權之問題，我們認爲上訴人已說明本案涉及一個重大、未決及可向上訴法院上訴法院之案件，且屬本院得予以提審審理之範圍。

B

在上訴人聲請本院提審此案，及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聲請，表示異議後不久，雙方就損害賠償

達成和解。在和解的條件上，上訴人尼克森給付被上訴人費茲傑爾十四萬二千美元。此外，被上訴人同意：如果本院判決認爲上訴人不享有絕對的免責權，他僅再收二萬八千美元，但如本院判決支持上訴人享有免責權的辯解，上訴人不必再爲其他的給付。

依上述雙方間和解的內容來看，本院對於雙方間之問題所爲之決定，仍會對於上訴人及被上訴人有財務上之利益關係。由於被上訴人在本案仍繼續尋求金錢上之救濟，因此，本案仍有具體、確定，所涉及之法律關係，在當事人間，有對立之法律上利益。

III

A

本院持續不斷的承認：對於當事人所提起之民事損害賠償之訴訟，政府官員享有某種程度的免責權。在一八九六年的 Spalding v. Vilas 案中，本院審理過郵政總局局長是否享有免責權。該案是對於總局長之職務行爲而請求損害賠償。雖然免責權之法則，係源自英國普通法的案例，在 Spalding 案中，本院判決認爲：爲了人民的利益，需要賦與公共官員絕對的免責權，因爲如無免責權，行政官員在行使其裁量權之行爲，將會較爲猶豫，而危害特定人民的請求，縱使公眾的利益，係要求官員要大膽、不要猶豫的行爲，亦可能如此。考慮到公共政策及方便，司法機關應該承認：官員若因其公務行爲，而被提起訴訟，應享有免責權。本院於該案之判決中說道：

“行政部門的首長，在執行其職務時，若維持在其權限範圍內，不應該讓他感到憂慮他的行爲隨時可能成爲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追究的對象。若行政首長要面臨此種限制，將嚴重癱瘓行政部門對公共事務之適當及有效的執行。”

Spalding 案以後的判決，將訴訟中免責權之抗辯，擴及到普通法案件以外的案件。一九五一年的 Tenney v. Brandhove 案，本院審理的問題爲：聯邦法律彙編第四十二編第一九八三條之通過（註），是否剝奪州的立法者依普通法所享有的特權，而該條並沒有明定給任何官員免責權。Tenney 案之判決認爲：並沒有剝奪。檢討第一九八三條之立法，並參酌我國尊重立法權自由行使之政治歷史及傳統，本院認爲：在法律本身並無明確表示其意思之情況下，如果認爲國會有意侵犯在歷史上有如此良好基礎的傳統，是不能採信的。同樣的，一九六七年的 Pierson v. Ray 案，係對

一個州法院法官提起第一九八三條的訴訟。在此案，本院判決認爲：法官在司法角色範圍內所爲之行爲，應繼續享有絕對的免責權。此種絕對的免責權，不是爲了保護不良或腐化的法官或其利益，而係爲了公眾的利益，公眾的利益，在於法官應能獨立、自由的行使其職權，且對其判決之結果，無後顧之憂。在 Pierson 案，本院亦判決：警察人員如基於善意、執行公務之行爲，而被提起訴訟時，亦有權受附條件免責權之保護。

一九七四年的 Scheuer v. Rhodes 案，本院審理的問題爲：州行政官員是否享有免責權。該案係主張憲法上之權利被侵害，而依前述第一九八三條起訴請求。該案中，本院依據 Spalding 案之原則，否決州行政官員所辯稱之其有絕對的免責權。本院判決認爲：若原告主張憲法上之權利被侵犯，而依第一九八三條起訴請求，州行政官員僅對其基於善意而爲之行爲，才能享有免責權。權衡第一九八三條之立法目的，及免責權存在之公共政策，本院在該案判決：政府行政部門的官員，應視其情況而賦與附條件的免責權。各種可免責的內容或範圍，應視該官員的職責與其得行使裁量之範圍，及該官員行爲當時之所有情況所顯現其合理應負之責任而定。

依隨後的案件來看，對於第一九八三條所提起之訴訟，Scheuer 案將免責權之抗辯分成兩種。對於大部分的行政官員，Scheuer 案認爲僅賦與附條件的免責權。此種免責權得免責的範圍大小，應視該官員功能之性質及該官員之決定是否可被認爲善意而定。此種視官員之功能而定其得免責之範圍之方法，係屬第二種的免責權。另外，某些特定的官員，其職務持別敏感，如法官及檢察官，則需要繼續承認其等應享有絕對的免責權。如一九七六年的 Imber v. Pochtman 案判決認爲：州檢察官對於其發動或進行偵查所爲之行爲，享有絕對的免責權。一九七八年的 Stump v. Sparkman 案判決認爲：法官就其所有的司法行爲，享有絕對的免責權。

一九七八年的 Butz v. Economou 案，對上述免責權的分類方法，再加以審酌。Butz 案，是本院首次審理聯邦政府官員被訴違反憲法之規定時，應享有何種免責權。Butz 案中，有人依據聯邦官員因普通法上之侵權行爲被訴所爲之判決，辯稱：對於因被訴違憲而被請求損害賠償之所有聯邦高階官員，均應享有絕對的免責權。但我們否決上述辯解。由於如果承

認全部的聯邦行政官員有絕對的免責權，與州官員僅享有附條件的免責權，有所差異。因此，我們判決認爲：對於第一九八三條之案件，聯邦官員與州官員一樣，通常僅享有附條件的免責權。但該判決中，我們仍重申：某些官員，尤其是法官及檢察官，因爲他們職務的特殊性質，需要完全的免責。在 Butz 案的判決，我們亦認爲：對於某些從事於類似法官或檢察官功能的官員，應給與絕對的免責權，但對於其他聯邦官員，是否得主張因爲公共政策之需要，而完全免責之問題，本院並未做成決定。

B

本院關於政府官員能否免除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判決，係依據憲法、聯邦法律及我國歷史之指引。此外，若憲法或國會之法律無明文規定時，本院關於免責權之判決，參考普通法。我們亦注意並重視有關的公共政策，尤其是已顯現在我們過去的歷史及我們政府的架構的。

在本案中，上訴人辯稱：對於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美國總統受絕對的免責權之保護。關於總統的問題，如從歷史與政策上去探討，會合而爲一。在普通法發展的過程中，很少有關於總統職位方面的問題。任何從歷史方面來分析總統的問題，均必須從我國憲法上的傳統或結構尋求證據。歷史性方法的探討，一開始幾乎就與聯邦法院所採取的“公共政策”的分析方法相結合。此種探討，自然涉及一些政策及原則，此等政策及原則，可能涉及在憲法所明定的權力分立制度下，爲達成有效率的政府，在有組織之結構中，總統職位之性質。

IV

本案，前總統主張他有兩種對於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之免責權。他在一個依憲法提起之直接訴訟，及兩個依聯邦法律提起的法律訴訟，被列爲被告。但到目前爲止，國會亦未曾立法，明確表示，總統對其公務行爲應負民事責任。本於本院就此類訴訟案件所爲之原則，我們判決：上訴人，做爲美國的一位前總統，因其職務行爲而被訴應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享有絕對的免責權。我們認爲此種免責權，係因總統特殊的職位，在功能上必要的附隨物，它之根基，在於憲法上之權力分立，在我國的歷史上，亦受到支持。大法官 Story 於一八三三年之下述分析，仍具有說服力，他說：

“有些附隨的權力，屬於行政

部門，此係由於功能之性質，基於需要而來。其中包括爲履行其功能之權力。因此，當總統係執行其職務時，總統對於因逮捕、羈押、入獄，均不必負責。爲了此目的，他個人應被認爲具有公務上的不可侵犯性，至少在民事事件應如此。”

A

在憲法的架構中，總統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憲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行政權賦與美國總統。”本於此項授權，設置總統，做爲行政部門之首席憲法上官員，託付他許多重大或敏感的監督或政策職責，包括執行法律。憲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應注意法律被忠實的執行。”此外，總統亦負責外交事務，此外交領域，法院一貫認爲：如果行攻機關已採取適當的措施，加以保密的事項或行爲，法院如果沒有相關的資料，卻要審理，甚至宣告無效，是不能容忍的。另外，總統有權力管理行政部門，爲執行此項工作，總統必須賦與無限制的權力，可以解僱爲其執行最重要職責之最重要部屬。

被上訴人雖然依據前述一九七八年的 Butz 案、一九七四年的 Scheuer 案，此等案件，我們承認州長及閣員享有附條件的免責權，主張：總統亦僅能享有附條件的免責權。但上述案件之法則，於本案並不適當，因爲在憲法中，總統具有特殊的地位，與其他行政官員，並不相同。

由於總統的職責非常重要，如果將他的精力分散，去關注一些個人所提起的訴訟，將對其有效履行政府功能造成特別的危險。就如同處理檢察官及法官的案件一樣，此部分，現在已認爲享有絕對的免責權，總統亦應將他自己關注於會引起高度注意的事務上。我們的判決已經承認，此等判決亦詳細的認爲：爲了公眾最大的利益，應賦與官員最大的能力，可以毫無憂慮及公正的執行其職務。有此理念，才能使政府官員，在憲法制度之託付下，做最敏銳及宏觀的決定。我們不能忽略總統職位之重要性。從總統職位的能見度，及其所爲之決定會影響無數的人民來看，總統將很容易成爲民事訴訟被起訴之對象。如果總統個人常受此種訴訟的折磨，將會癱瘓總統的公務，受害的，不僅總統及其職位，亦包括總統所要服務的國家。

B

法院傳統上承認總統在憲法上之職責及地位，以做爲司法審查時儘量予以尊重或自制之考量因

素，例如：法院通常係依據普通法，來決定官員於作證時應享有之特權之範圍，但一九七四年的 United States v. Nixon 案中，本院判決認爲：總統作證方面所享有之特權，其依據爲憲法上之權力分立。依本院過去的一些判決可知，權力分立原則，並不是禁止本院每一次都不得對美國總統行使審判權，但本院的判決亦顯示，如要對總統行使審判權，必須從憲法上來衡量審理所可能之利益，及介入審理對行政部門之權威及功能可能之危害。當司法行爲可以促進廣泛的公共利益，例如法院之行爲，不會破壞權力分立，且可以維持各種權力之適當的平衡，或爲確保公共利益，而進行刑事訴訟，法院才對總統行使審判權。而本案，僅係個人因總統之公務行爲，而提起請求民事損害賠償之訴訟，我們決定不對總統行使審判權。

C

關於官員絕對的免責權之範圍，本院認爲：官員可受保護之行爲之範圍，須與該免責權所要達成之目的有密切之關係才可。本院過去的判決，僅將官員的絕對的免責權，賦與執行特定功能的某些行爲。但除了依據過去的歷史，或法理上有理由加以支持者外，何種官員可以享有絕對的免責權，本院也沒有做明確的功能界線的劃分。例如，前述之 Stump 案中，雖然司法人員之行爲，超出通常司法程序之範圍，仍然賦與該案之司法人員司法特權。由於總統憲法上之職位及功能，非常特殊，我們認爲：總統若因其公務職權邊緣所爲之行爲，而被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賦與總統絕對的免責權，是適當的。

依據美國聯邦憲法及法律，總統在許多不同的領域，擁有裁量權限，其中許多高度敏感性。有許多案件，亦很難認定，在特定的行爲中，含有總統數不清的功能中之何種功能。例如：本案，被上訴人主張其被解僱，係對其在國會作證之報復，而違反美國法律彙編第五編第七二一一條及第十八編第一五０五條。但空軍辯稱：係基於機關重組，以提升效率。縱認上訴人命令機關重組，被上訴人因此失去他的工作，進而要探求總統發布此命令之動機，無可避免的，要再探究雙方所分別主張的“功能理論”。而若探究雙方所主張的功能理論，法院實介入太深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在沒有其所稱之爲促進服務效率之理由下，命令解僱一位依法律有權保有職位之受僱人，其所爲已超出其職務邊緣。因爲國會已立法保障，沒

有任何聯邦官員，可以在其職務邊緣，不依法律所規定之程序，使費茲傑爾被解僱。

但此種說法，將使每次個人主張總統之行爲非法、或總統之行爲係爲應受禁止之目的，而提起訴訟時，總統均應參與該訴訟。若採此說，將剝奪絕對的免責權，喪失其原來的效果。很明顯的，依據憲法及法律，總統有權命令國防部長應如何處理空軍之業務。因爲此種職位上之命令，亦應包括指示機關重組及精簡兵力之權限。我們認爲：上訴人被訴的錯誤行爲，仍屬於其權限邊緣內。

V

賦與總統絕對的免責權，並不會使國家因行政首長之不當行爲，而無法受到充分的保護。因爲憲法尚有關於彈劾之規定，以資救濟。此外，亦有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可以檢視總統的行爲，雖然這些方法，對其他行政官員適用時，效力並不相同。總統不斷的受新聞界的審查。國會的強力監督，也可以嚇阻總統濫權，或經查證後，決定是否予以彈劾。其他避免總統不當行爲之原因，如總統均關心贏得第二任選舉，維持聲望（此爲維持總統影響力的重要因素），以及傳統上，每位總統關心他的歷史地位。

由於有其他可能的救濟途徑及嚇阻因素，賦與總統絕對的免責權，並不會置總統於法律之上。賦與總統絕對的免責權，如同賦與法官、檢察官一樣，僅排除特定宣稱總統有不當行爲、個人爲了救濟而提起之訴訟，但可以促進必要的公共目的。

【註】美國聯邦法律彙編第四十二編第一九八三條：因權利被剝奪而提起民事訴訟：

此條文最早制定於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幾經修正，現行條文譯文如下：

“任何人在美國任何州或領域或哥倫比亞特區，藉任何法律、規則、規定、習慣法或習慣之名，使或致使任何美國公民或上開領域內之任何人，喪失其受憲法或法律保障之任何權利、特權或免責權者，對於被害人依法律提起之訴訟、依衡平法提起之請求或依其他適當程序請求之救濟，應負責任；除非該訴訟係對於司法人員在其司法權責內之行爲或不作爲而提起；除非有違反確認性質命令或不可能取得確認性質之救濟，不應准許不作爲處分之救濟。爲了本條之目的，國會通過但單獨適用於哥倫比亞特區之法律，視爲哥倫比亞特

區自己所訂之法律。

Section 1983. Civil action for deprivation of rights

Every person who, under color of any statute, ordinance, regulation, custom, or usage, of any State or Territory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subjects or causes to be subjected, any citizen of the Unites States or other person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to the deprivation of any rights,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secur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shall be liable to the party injured in an action at law, suit in equity, or other proper proceeding for redress, except that in any action brought against a judicial officer for an act or omission taken in such officer's judicial capacity, injunctive relief shall not be granted unless a declaratory decree was violated or declaratory relief was unavail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any Act of Congress applicable exclusively to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a statute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33. U.S. v. Belmont

301 U.S. 324（1937）

簡資修 節譯

判 決 要 旨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未經合理補償，私人財產不得被剝奪。此條所隱含的公共政策，在美國領域外，並不發生效力。他國政府係以何種方式取得其國民的財產，只要其不涉及美國國民的權利，即非美國法院應考慮的問題。

(The public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declared in the Fifth Amendment that private property shall not be taken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has no extraterritorial operation and what another country has done in the way of taking over property of its nationals is not a matter for judicial consideration, so long as no rights of American nationals, other than as mere custodian of a fund so appropriated, are involved.)

關 鍵 詞

treaty（條約）；release and assignment（讓與）；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Fif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foreign relations（外交）。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Sutherland 主筆撰寫）

事 實

上訴人在聯邦地區法院起訴主張，Petrograd Metal Works 此一俄羅斯公司所存於 August Belmont & Co.的款項，被上訴人應該返還於伊。緣由 Petrograd Metal Works 將

此一款項經由紐約市私人銀行家 August Belmont，存於 August Belmont & Co.。而 August Belmont 死於 1924 年，被上訴人則是經過正當程序任命的其遺囑執行人。聯邦地區法院以上訴人所列事實不足以構成有效的訴因，駁回了訴訟，本院的下級法院也維持了此一判決。

該俄羅斯公司在 1918 年以前存於 Belmont 的款項，是上訴人所要訴請返還的。1918 年蘇維埃政府發佈了一道命令，解散並清算了此公司（其他公司也是如此），將此公司的資產，不管其種類或位於何處（包括了其存於 Belmont 的款項），皆收歸爲國有。因此，此一款項成爲蘇維埃政府的財產。1933 年 11 月 16 日，蘇維埃政府將其對美國國民所享有的債權，包括了此一系爭款項，讓與於上訴人。但被上訴人拒絕了上訴人此項給付要求。

此一債權讓與，是美國政府與蘇維埃政府經過外交折衝所達成的。此一協定主要目的，是要將蘇維埃政府與美國間的相互請求，作最終的解決。兩國同意，蘇維埃政府對美國國民不採取任何追討行動，但將這些給付請求讓與美國政府，而美國政府則要將其因之實現的給付金額，適時通知蘇維埃政府。此一讓與通知協定，是兩造間爲了解決相互請求大計劃中的一部份。蘇維埃政府對這些讓與債權的實現，顯然仍持續具有利益。也因此，本案涉及了公共利益。本案的裁決可能會影響及於外國政府對美國是否具誠信的觀感。

本院的下級法院認爲，系爭銀行帳款是位於紐約州境內，而不可能是在蘇維埃境內的無體財產權。此外，其認爲此一收歸國有的命令，如果付諸實行，無異構成徵收。最後，該法院認爲，如果本案判決美國政府勝訴，其結果將違反紐約州的重要公共政策。被上訴人甚至主張，連美國的公共政策都要受到侵害了。

判　決

原判決廢棄。

理　由

首先，本院不去探討紐約州的公共政策是否受到侵害，因爲本院不認爲任何州的政策可以勝過本案所涉及的國際協約。本院已經宣示過，任一主權國家都應該承認其他主權國家的獨立性，而且一國的法院不應該去審查他國政府在其自己領土內的行爲。

本院亦曾經宣示，根據憲法的規定，外交是政治部門的權責，而且此一政治權力的行使當否，並不受司法審查；誰是某領土內的的主權者，並非一個司法問題，而是政治部門的決定，法院應絕對尊重之；政治部門的此一承認，具有溯及效力，因此獲得承認的外國政府的行爲，自始即是有效的。

政府就內政的權力是分配在中央與各州，但就外交的權力則完全是由中央壟斷。就本案系爭事項，行政部門完全有權代表整個政府對外發言。本案系爭讓與以及有關協定，並非憲法中條約條款的條約，因此無須參議院的諮商與同意，即有效。

本院曾說過，此種國際協定雖非條約，因此無須參議院批准，但因其係總統行使職權，經過國際談判，所發佈的，所以是上訴巡迴法院法（the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Act，26 Stat. 826）中的「條約」（treaty），從而如果直接上訴至本院，本院是可審查其適用的。

在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範圍內，只要其係依規定行使，必然享有最高而不受質疑的地位。因此雖然法院被用來鞏固此一最高地位，法院就此的探求或裁決，是與各州的憲法、法律或政策無關的。

現在來看第二個問題。被上訴人主張，美國憲法規定，未經合理補償，私人財產不得被剝奪，因此本案若判上訴人勝訴，將危及美國的公共政策。但問題是，美國的憲法、法律以及政策，除非涉及了美國國民，並不具域外效力。

34. Florence Dolan v. City of Tigard
512 U.S. 374（1994）

謝哲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本院認為像是「約略比例原則」（rough proportionality）這個用語可以把本院所認定為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的要求作最好的詮釋。雖然並不要求經過精確的數學計算，但是 Tigard 市必須要就這個要求設置和提出的開發計劃所造成的衝擊在本質上和範圍上（in nature and extent）的關聯作一些各別的決定。

（We think a term such as "rough proportionality" best encapsulates what we hold to be the requirement of the Fifth Amendment. No precise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is required, but the city must make some sort of individualized determination that the required dedication is related both in nature and extent to the impact of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關 鍵 詞

essential nexus（根本的連結）；reasonable exactions（合理的負擔）；reasonable relationship（合理的關係）；rational basis（理性的基礎）；rough proportionality（約略比例原則）；uncompensated taking（未予補償的徵收）。

（本案判決由首席大法官 Rehnquist 主筆撰寫）

事 實

相對人 Tigard 市的城市計劃委員會（City Planning Commission）對於聲請人 Dolan 擴充商店和塗鋪

停車場的申請許可附加條件，要求聲請人就其土地（1）沿著 Fanno 河留設公共綠地（a public greenway），用以儘量減少伴隨聲請人的開發而增加的不滲透地面（impervious surfaces）所可能惡化的泛濫（flooding），以及（2）設有行人／腳踏車專用道（pathway），用以緩和 Tigard 市中央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交通壅塞。聲請人對該委員會拒絕她的要求變更標準向土地使用訴願委員會（Land Use Board of Appeals）（簡稱「土地使用訴委會」）提起訴願，主張委員會對於在這個在土地上要有所設置的要求與聲請人提出的開發計劃並無關聯，並因而對於聲請人的財產構成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的未予補償的徵收。「土地使用訴委會」認爲（1）開發和留設綠地的要求彼此間有合理的關係存在，因爲較大的建築和塗鋪的停車場會增加不滲透地面的範圍並因而會增加溢流到河裏的水量，（2）減輕因開發增加交通流量而造成的衝擊和要求設置專用道作爲交通的替代方式彼此間有合理關係存在。奧勒岡州上訴法院以及奧勒岡州最高法院都維持這個看法。

聲請人對奧勒岡州最高法院的判決提起上訴，該判決認爲 Tigard 市可以對聲請人的建築許可附加條件，要求聲請人就其部分土地要做防洪控制（flood control）及交通改善的設置。本院受理此一上訴。

判　決

廢棄奧勒岡州最高法院判決，其與本院見解不符部分發回更審。

理　由

在進行衡量聲請人的主張之前，本院必須首先決定「合法的州利益」（legitimate state interest）和這個城市所強加的許可條件之間究竟是否有「根本的連結」（essential nexus）。如果本院發現有連結（nexus）存在，那麼我們必須接著判斷這個強加負擔和這個提出的開發計劃所預期造成的衝擊之間必要的關聯程度（the required degree of connection）爲何。

毫無疑問地，防止 Fanno 河沿岸的泛濫和減少中央商業區的交通壅塞都該當本院所認可的合法公共目的（legitimate public purpose）類型。Fanno 河沿岸的防洪和限制河流 100 碼範圍內防洪原（floodplain）的開發以乎同樣明顯

地有連結（nexus）存在。聲請人申請加倍擴充她的零售店，並且塗鋪她現在爲碎石礫表面的停車場，這樣因此就會增加土地上不滲透地面的範圍並增加暴風雨雨水溢流到 Fanno 河的水量。Tidard 市試圖以提供交通的替代方式來減少交通壅塞的情形彼此間也是一樣有連結存在。

本院分析的第二部分得要決定，Tigard 市許可條件所強加負擔的程度和聲請人提出的開發計劃所預期造成的衝擊之間是否有必要的關係（required relationship）。

本院認爲由多數州法院所採取的「合理的關係」（reasonable relationship）檢驗標準反而還要更接近聯邦憲法基準（federal constitutional norm）。但是本院並非就要採取這個檢驗標準，一部分的理由是因爲「合理的關係」這樣的用語似乎和憲法第十四增補條文平等保護條款之下的檢驗最低標準（minimal level of scrutiny）用語「理性的基礎」（rational basis）有容易造成混淆的類似。本院認爲像是「約略比例原則」（rough proportionality）這個用語可以把本院所認定爲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的要求作最好的詮釋。雖然並不要求經過精確的數學計算，但是 Tigard 市必須要就這個要求設置和提出的開發計劃所造成的衝擊在本質上和範圍上（in nature and extent）的關聯作一些各別的決定。

如果聲請人提出的開發計劃已經某程度地越界占用了這個城市現有的綠地空間（greenway space），那麼要求聲請人提供她的土地或其他土地來作爲一些給公眾的替代綠地空間將會是合理的。然而本案的情形並非如此。本院認爲，由 Tigard 市的決定依據來看，這並不足以表現出留設防洪原（floodplain easement）和聲請人申請的新建築之間有必要的合理關係（required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關於行人／腳踏車專用道，Tigard 市認爲聲請人所提出的較大零售設施計劃將會增加在中央商業區街道的交通流量，本院並不質疑這個看法的正確性。Tigard 市估計這個開發計劃將會造成每日多出約 435 進出人次。要求就街道、人行道以及其他公共通道進行設置一般來講是屬於避免由於土地使用計劃造成〔交通〕過於壅塞的合理負擔（reasonable exactions）。然而從本案的卷證資料來看，Tigard 市並未能盡到說明因聲請人開發增加的汽車和腳踏車額外進出人次和 Tigard 市要求留設行人／腳踏車專用道（pedestrian/bicycle

pathway easement）之間有合理關聯的義務。Tigard 市只是單純地認爲設置專用道「可能可以抵銷一些交通需求…並減輕交通壅塞增加的情形。」

廢棄奧勒岡州最高法院判決，與本院見解不符部分發回更審。

大法官 Stevens 主筆，大法官 Blackmun 及 Ginsburg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

（1）本院的約略比例原則檢驗標準（a）過於著重在財產所有權人的排他權利，（b）對 Tigard 市執行一個公認合法、全面的土地使用計劃課予新的舉證責任，以及（c）讓一個依實質正當程序分析所加以否認的類型復活；（2）甚至在本院新的檢驗標準之下，本院在本案裏面所發現的缺失，最多也不過是無傷的錯誤罷了。

大法官 Souter 之不同意見書

當本院宣示了一個關於對土地利益強加的政府負擔和對於開發造成的負面效果之間必須的關聯程度的檢驗標準，本院（1）並沒有將這個檢驗標準適用到系爭案件的事實上，因爲這個案件並沒有本院所說的問題；（2）不當地給 Tigard 市課予提出關係證據（evidence of relationship）的負擔；並（3）因而移轉了舉證責任，不當地得出 Tigard 市敗訴的結論。

35. City of Montery v. Del Monte Dunes at Monterey, Ltd., and Monterey-Del Monte Dunes Corporation

526 U.S. 687（1999）

謝哲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Dolan 案適用的原則考慮到的是對開發許可附加為一定設置的要求究竟和這個開發所預期造成的衝擊之間是否合乎比例。這個原則並不是用來說明，也不準備適用到，那些土地所有人爭執的並不是負擔過重而是開發被拒（如同本案）這種大不相同的問題上。

（The rule applied in *Dolan* considers whether dedications demanded as conditions of development are proportional to the development's anticipated impacts. It was not designed to address, and is not readily applicable to, the much different questions arising where, as here, the landowner's challenge is based not on excessive exactions but on denial of development.）

關　鍵　詞

all economically viable use（所有經濟上可行之使用）；exactions（負擔）；inverse condemnation（準徵收）；regulatory taking（管制準徵收）；rough-proportionality（約略比例原則）；takings claim（徵收主張）；Takings Clause（徵收條款）。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Kennedy 主筆撰寫）

事　實

聲請人 Monterey 市在五次駁回由相對人 Del Monte Dunes 及其前手擁有的土地的開發申請中，每駁回一次就強加更爲嚴苛的要求，之後 Del Monte Dunes 依據 42 U.S.C. §1983 提起訴訟。Del Monte Dunes 主張 Monterey 市要不是構成管制準徵收（regulatory taking）就是以對於損失未予補償或未予提供適當後續救濟的不法行爲侵害財產權，聯邦地方法院將 Del Monte Dunes 的這個主張交由陪審團審判。法院對陪審團的指示是，如果發現 Del Monte Dunes 有被拒絕財產的所有經濟上可行之使用（all economically viable use）或者 Monterey 市駁回最終的開發提案（final development proposal）的處分（decision）並沒有實質地促進合法的公共目的（a legitimate public purpose），那麼陪審團可以作有利於 Del Monte Dunes 的認定。陪審團後來作有利於 Del Monte Dunes 的認定。聯邦第九巡迴法院維持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尤其是認爲聯邦地方法院將 Del Monte Dunes 的徵收主張交由陪審團認定並沒有錯誤，因爲依據 42 U.S.C. §1983 的規定，Del Monte Dune 有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認爲 Del Monte Dunes 究竟有無被拒絕財產的所有經濟上可行之使用以及 Monterey 市駁回最終的申請案究竟有無實質地促進合法的公共利益（legitimate public interests），是適於交由陪審團認定的事實問題；並且認爲陪審團可以合理地對於這之中的任一問題作有利 Del Monte Dunes 的認定。

判　決

維持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

理　由

聲請人爭執管制準徵收的主張不應該交由陪審團認定，聯邦上訴法院對於管制準徵收責任適用了錯誤的標準（standard）。本院毋須在此就聲請人提出的所有問題進行認定，也毋須就聯邦上訴法院維持原案的判決中的每一個爭點進行檢視。最主要的問題是，究竟系爭主張交由陪審團認定是否適當。本院認爲答案是肯定的，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應予維持。

Monterey 市在聲請中提出以下幾個問題（1）究竟 Del Monte Dunes 主張的管制準徵收中的責任爭點是否適於提交陪審團認定，

（2）究竟聯邦上訴法院是否不被允許根據一個讓陪審團重新衡量 Monterey 市土地使用處分合理性的標準來作出判決，以及（3）究竟聯邦上訴法院在這個案件裏面採取 Dolan v. City of Tigard 案的「約略的比例原則」（rough-proportionality）是否有誤。本院受理 Monterey 市的聲請，並反序地針對這些問題說明如下。

雖然一般來說對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的重視可以對於憲法上的徵收條款（the Taking Clause）有促進的作用，但是本院並未將 Dolan 案「約略比例原則」的檢驗標準擴張超出強加負擔的特別情形－對開發許可附有在土地上爲一定設置供公眾使用條件的土地使用處分。Dolan 案適用的原則考慮到的是對開發許可附加爲一定設置的要求究竟和這個開發所預期造成的衝擊之間是否合乎比例。這個原則並不是用來說明，也不準備適用到，那些土地所有人爭執的並不是負擔過重而是開發被拒（如同本案）這種大不相同的問題上。因此本院相信 Dolan 案的「約略比例原則」並不適合適用到像本案這樣的案件上。本院認爲聯邦上訴法院並沒有必要討論「約略比例原則」的必要。這樣的討論與本院對本案的判決無關。

Monterey 市爭執聯邦上訴法院讓陪審團可以認定 Monterey 市對最後開發計劃的拒絕與合法的公共利益之間並無合理關聯的判決。Monterey 市認爲聯邦上訴法院採用了一個讓陪審團可以揣測公共土地使用政策（to second-guess public land-use policy）的管制準徵收責任的法定標準。

本院認爲對陪審團的指示並沒有要求就 Monterey 市的分區法規（zoning ordinances）或是政策是否不合理進行認定，而只是要求就「Monterey 市駁回原告 190 單位的開發提案是否並非實質地促進合法的公共目的」來認定，也就是說要求認定究竟「Monterey 市駁回……提案和合法的公共目的之間是否不具合理的關係」。陪審團並非被賦予可以任意就 Monterey 市的土地使用政策進行揣測的權利。反而，陪審團受到的指示是 Monterey 市所主張的許多不同目的都是屬於合法的公共利益（legitimate pubic interests）。因此，很清楚地聯邦上訴法院並沒有適用那種允許法官或陪審團全面介入都會土地使用政策、法律或是日常管制處分（routine regulatory decisions）的徵收法原則。如此一來 Monterey 市主張，就法律上來講，它的土地使用處分在任何情況

下都不受司法審查，這樣的立場與既定的管制準徵收原則（settled regulatory takings principles）有違。本院駁回這樣的主張。

本院接著要討論聯邦地方法院將 Del Monte Dunes 主張的管制準徵收的責任問題交由陪審團認定是否適當。如同聯邦上訴法院所認定，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取決於 Del Monte Dunes 是否有受陪審團審判的法律上或憲法上權利，如果有，也要取決定這個權利的性質和範圍。Del Monte Dunes 主張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來自 42 U.S.C. §1983 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

依據先前判例所指，「在詢問是否有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的適用之前，我們必須首先確認是否透過法律的解釋即可達到目的，如果是的話，那麼就沒有討論憲法問題的必要了。」雖然 42 U.S.C. §1983 的特性對於本院就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的分析不可或缺，但是本院認爲這個條文本身並沒有賦予相對人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

因而本院必須討論到這個憲法問題。首先，本院必須討論這個案件是否是屬於歸普通法法院審理的訴因（cause of action），或者至少是相類的訴因。如果系爭案件是歸普通法法院審理，那本院接下來要討論是否有交由陪審團來加以審理的必要。

在決定了 Del Monte Dunes 依 42 U.S.C. §1983 提起的訴訟歸普通法法院審理（an action at law）之後，本院必須決定有關責任的特定爭議是否適於交由陪審團認定。本院認定關於一個土地所有人是否被剝奪了財產上所有的經濟上可行之使用的問題主要是事實問題。由普通法法院審理的訴訟（in actions at law），除非是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規範範圍以外的，不然這個問題會歸由陪審團審判。

在我們的管制準徵收原理的意義範圍內去認定一個土地使用處分是否實質地促進合法的公共利益時，陪審團的角色呈現出一個更爲困難的問題。雖然本案的問題很清楚地包含有根本上是事實的成分在內，但是無疑地，也有法律面的問題存在，所以說可以理解爲是事實和法律混合的問題。

在本案之中，提交陪審團的問題限於認定，從歷次開發申請程序的漫漫過程以及前後背景來看，Monterey 市駁回一個特定的開發計劃的處分與它先前的決定是否有合理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本院認爲將這個已經限縮，侷限於事實的問題交由陪審團認定是適當的。

綜上所述，聯邦上訴法院的判

決予以維持。

大法官 Scalia 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1）只要是關於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所有依42 U.S.C. §1983提起的訴訟都應該同等對待，（2）只要是提起請求金錢損害賠償的訴訟，這樣的權利就存在，以及（3）本案將爭議提交陪審團認定是適當的。

大法官 Souter 主筆，大法官 O'Connor、Ginsburg 及 Breyer 連署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1）同意（a）「約略比例原則」不應該一般地擴張作爲重新檢視土地使用管制的標準，以及（b）42 U.S.C. §1983 並不足以作爲受陪審團審判的法律上權利；然而（2）認爲（a）在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之下，或者依土地所有人依 42 U.S.C. §1983 主張的管制準徵收（regulatory taking）－或者是準徵收（inverse condemnation），土地所有人並不具有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因而（b）聯邦地方法院將這個主張交由陪審團認定是有誤的。

36. Anthony Palazzolo v. Rhode Island

533 U.S. 606（2001）

謝哲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當一個土地所有人必須給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機會去運用它的裁量權（discretion）時，一旦很清楚呈現：這個機關欠缺許可任何開發的裁量權、或者對於財產的許可使用有某程度的確定時，徵收主張很可能已經成熟。

   （While a landowner must give a land-use authority an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its discretion, once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agency lacks the discretion to permit any development, or the permissible uses of the property are known to a reasonable degree of certainty, a takings claim is likely to have ripened.）

2. 假如本院接受了州這樣的原則（rule），那麼只要在法規制定後的所有權移轉都將會免除州要辯護限制土地使用行為的義務，不論這是多麼地極端或是不合理。州將會，在事實上，被允許對憲法徵收條款設有截止日期。這樣的原則不應該被採用。未來的世代也同樣有權去挑戰對土地使用和價值不合理的限制。

   （Were we to accept the State's rule, the postenactment transfer of title would absolve the State of its obligation to defend any action restricting land use, no matter how extreme or unreasonable. A State would be allowed, in effect, to put an expiration date on the Takings Clause. This ought not to be the rule. Future generations, too, have a right to challenge unreasonable limitations on the use and value of land.）

關 鍵 詞

all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use（所有經濟上有益的使用）；compelling public purpose（迫切的公共目的）；final decision（最終的處分）；inverse condemnation action（準徵收訴訟）；reasonable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合理的投資報酬期待）；regulations（管制命令）；takings claim（徵收主張）；Takings Clause（徵收條款）。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Kennedy 主筆撰寫）

事 實

爲了要取得本案系爭的羅德島州（Rhode Island）濱水區土地，聲請人及其合資人（associates）在 1959 年成立 Shore Gardens 有限公司（簡稱 SGI）。在 SGI 購買系爭土地之後，聲請人收購了合資人的持股並成爲公司唯一的股東。系爭土地的大部分在當時，以及現在，都是屬於會有潮水泛濫的鹽沼地（salt marsh）。這些溼地（wet ground）和有滲透性的土壤（permeable soil）需要經過相當填土〔工程〕才能興建重大的建築物。過去幾年來，SGI 對系爭土地斷斷續續的開發申請都被不同的政府機關駁回。在 1966 年之後，已經超過十年以上沒有進一步的申請案了。不過，有二個介入事件對於本案現在的爭點具有重要性。首先是，在 1971 年，羅德島州（the State）設立了相對人羅德島州海岸資源管理會議（Rhode Island Coas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Council）（簡稱「管理會議」）負責保護州的海岸財產。管理會議發布的管制命令（regulations），被稱爲羅德島州海岸資源管理計劃（Rhode Island Coas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Program）（簡稱「管理計劃」），指定像是 SGI 土地那樣的鹽沼地爲受保護的「海岸溼地」（coastal wetland），在那上頭的開發計劃會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其次是，在 1978 年，SGI 的公司許可被撤銷，系爭財產所有權移轉到公司唯一的股東聲請人這裏。在 1983 年聲請人向「管理會議」申請許可建造一個木造堤岸並對他全部的鹽沼土地地區進行填土〔工程〕。

「管理會議」駁回這項申請，其中的理由尤其是認爲這項申請牴觸「管理計劃」。在 1985 年，聲請人向「管理會議」提出了一項新的申請，申請許可對系爭 18 英畝溼地中的 11 英畝進行填土〔工程〕以便建造一個私人海灘俱樂部。「管理會議」依然駁回這項申請，理由是申請內的提案並不符合可以對鹽沼地進行填土〔工程〕的「特別例外」(special exception) 的標準，這個標準要求提案中的活動 (the proposed activity) 必須要具有迫切的公共目的 (a compelling pubic purpose) 才行。之後，聲請人便向羅德島州高等法院 (Rhode Island Superior Court)提起準徵收訴訟(an inverse condemnation action)，主張州的溼地管制命令 (wetlands regulations)，如「管理會議」適用到他土地上的那些，已經對財產權構成違反憲法第五及第十四增補條文的未予補償的徵收。該訴訟主張，「管理會議」的行爲已經剝奪了聲請人財產權的「所有經濟上有益的使用」(all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use)，構成了必須予以補償的徵收 (a total taking)。羅德島州高等法院判決聲請人敗訴，州最高法院也予以維持，認爲 (1) 聲請人的徵收主張 (takings claim) 尚未成熟(ripe)；(2)當聲請人在 1978 年繼受了系爭財產在法律上的所有權時，他就沒有權利去挑戰在那之前發布的管制命令；(3) 既然有不爭執的證據顯示聲請人在系爭土地的高地 (upland) 部分仍保有 $200,000 的開發價值，那麼他就無法以財產的所有經濟的使用被拒來主張構成徵收；(4) 由於糸爭的管制命令發布在聲請人取得系爭財產所有權之前，所以聲請人對於系爭財產的開發並不會有合理的投資報酬期待 (reasonable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也因此他無法依據 1978 年的 Penn Central Transp. Co. v. New York City 一案來獲得救濟。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重新檢視原判決，主張羅德島州最高法院駁回他的徵收主張有誤。本院予以受理。

判　決

羅德島州最高法院的判決部分予以維持，部分予以廢棄，其中與本院見解不符部分並發回更審。

理　由

在一開始，本院首先要面臨到二個在州法院駁回〔聲請人徵收〕主張時所訴諸的考量：〔案件〕成熟性 (ripeness) 的問題以及管制命

令發布後取得（acquisition）〔所有權〕的問題。

在 1985 年 Williamson County Regional Planning Comm'n v. Hamilton Bank of Johnson City 這個案子裏，本院認爲案件必須成熟（ripe）是徵收主張的要件。本院判決認爲挑戰適用土地使用管制命令的徵收主張不能算是已經成熟，除非「負責執行管制命令的政府主體已經就關於對系爭財產適用管制命令作成了最終的處分（a final decision）」。依 Williamson County 案及其他相關判決，解決成熟性爭議的中心問題在於〔認定〕，是否聲請人從決定許可土地使用的「管理會議」那獲得了最終的處分。

在「管理會議」的管制命令之下，對全部土地進行填土〔工程〕的提案並不會被接受，而且也不該當所謂「特別例外」（special exception）的情形。「管理會議」認爲第二次提出的使用申請（海灘俱樂部）並不符合「迫切的公共目的」（compelling public purpose）的標準。也沒有跡象顯示，假使聲請人提案的海灘俱樂部占用較小的地區，「管理會議」將會接受這個申請。相反地，「管理會議」還認定這個提案活動並不符「迫切的公共目的」；申請對溼地進行填土〔工程〕是屬於牴觸「管理計劃」的活動。

當一個土地所有人必須給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機會去運用它的裁量權（discretion）時，一旦很清楚地，這個機關欠缺許可任何開發的裁量權，或者對於財產的許可使用有某程度的確定時，徵收主張很可能已經成熟。〔聲請人〕不須提出更進一步的申請來讓案件達到成熟。

本院轉而討論拒絕聲請人徵收主張的第二個依據。當「管理會議」發布溼地管制命令時，系爭土地並非由聲請人所有，而是由以聲請人爲唯一股東的公司所有。當所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移轉給聲請人時，這些溼地管制命已經生效。州法院認爲，在命令發布後取得的所有權無從主張被剝所有的經濟的使用，也無法援用 Penn Central 案的主張。

以法規制定後（post-enactment）的購買人不能依據憲法徵收條款（the Takings Clause）來挑戰管制命令的論述作爲基礎的理論似乎是這樣認爲的：財產權是由州所創造的。因此，這個論述繼續推論，州在未來的立法中可以形成並決定財產權的內容，以及決定什麼是合理的投資報酬期待，身爲後手的所有權人無從從已經失去的價

值中再受有任何損害。畢竟他們購買或取得的是已知受有限制的權利。

假如本院接受了州這樣的原則（rule），那麼只要在法規制定後的所有權移轉都將會免除州要辯護限制土地使用行爲的義務，不論這是多麼地極端或是不合理。州將會，在事實上，被允許對憲法徵收條款設有截止日期。這樣的原則不應該被採用。未來的世代也同樣有權去挑戰對土地使用和價值不合理的限制。

既然這個案件已經成熟，而且所有權移轉的日期也不會因而禁止聲請人的徵收主張，那麼本院現在要處理的是羅德島州最高法院在徵收主張的判決中所採取的另一個立論。羅德島州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爲由於系爭土地的高地部分仍可加以利用，土地的所有經濟上有益的使用（all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use）並未被剝奪。就這一點而言，本院同意羅德島州最高法院的判決。

據上論結，州最高法院認爲聲請人的主張不成熟並認爲在管制命令生效日後取得財產權不得爲徵收的主張，本院認爲判決有誤。州法院認爲聲請人尚未被剝奪所有經濟的價值，因爲土地仍保有用來建築住宅相當可觀的價值，本院認爲判決無誤。由於這個主張尚未依 Penn Central 案的分析進行檢視，因此本案應予發回更審。

羅德島州最高法院的判決部分予以維持，部分予以廢棄，其中與本院見解不符部分並發回更審。

大法官 O'Connor 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1）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並不是說，和所有權取得有關的管制命令的制定時間與 Penn Central 案原則的分析無關；而是（2）申請人取得所有權時的管制制度有助於形成申請人投資報酬期待的合理性，而這只是 Penn Central 案分析裏面其中的一個考量因素。

大法官 Scalia 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存於購買人財產所有權取得時限制（restriction）的事實－不是指成爲州財產法基本原則的一部分的限制－不論這個限制是否重要到足以構成徵收，都不應該納入決定的考量。

大法官 Stevens 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1）如果「管理會議」的管制命令規定或者「管理會議」本身不許對溼地進行填土〔工程〕並因此構成了個人所主張的徵收，那麼只有在這個管制命令生效時的財產所有人才遭受到可受補償的損

害；(2) 即使徵收是發生在個人取得所有權之後，當個人對土地進行填土〔工程〕的最終申請遭受「管理會議」拒絕，(a) 這些管制命令至少就建立了一個原則，那就是這些受管制的土地不能進行填土〔工程〕，除非「管理會議」運用它的職權在特定情況下爲例外地允許，(b) 個人因此所取得的只是一個由「管理會議」任意決定是否許可，許可什麼的權利；(3) 原判決應予全部維持。

大法官 Ginsburg 主筆，大法官 Souter 及 Breyer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

系爭土地的高地部分的許可開發本質和範圍不明－並且這個徵收主張因而尚未成熟－因爲 (1) 關於高地部分土地許可使用範圍的卷證資料不清楚；(2) 依個人在州法院的徵收主張來看，州沒有理由進一部去採究潛在的高地開發；而且 (3) 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以對個人有利的判決來解決此卷證資料不清楚的情況。

大法官 Breyer 之不同意見書

(1) 同意大法官 Ginsburg 對於個人的徵收主張仍未成熟的看法；(2) 同意大法官 O'Connor 認爲的 (a) 單純財產權利移轉的事實並不總是會自動造成徵收主張被拒，而是 (b) 相當地決定於所有權移轉的時間和情況是否影響或者如何影響任何可能存在的其它合理投資報酬期待。

37. Blau v. Lehman
368 U.S. 403（1962）

何曜琛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合夥關係人既非公司之職員亦非持股 10%以上之股東，因而不符合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所規範之主體。…法院認為該條規範適用主體不能做擴張之解釋。

(The partnership was neither an officer nor a 10% stockholder of the corporation, and it cannot be held liable as a director under 16 (b)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this Court cannot extend the coverage of 16 (b) so as to include a partnership of which a director is a member.)

關　鍵　詞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證券交易法)；stockholder(股東)；“short-swing”profits (短線交易之利益)；insider trading(內線交易)；partnership(合夥關係)。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Black 主筆撰寫)

事　實

Water Tide 公司的股東 Blau 依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之規定，代表公司對於 Water Tide 公司之董事 Thomas 和證券商 Lehman Brothers 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行使歸入權，以要求被告給付公司其短線交易所得利益，亦即其於六個月內買進賣出所得之利益，並主張被告知悉（realized）

此 Water Tide 股份交易。被告有二：一是 Lemon Brothers 從事投資銀行和證券經紀商和證券交易自營商的合夥團體；二是 Thomas，爲其 Lemon Brothers 之一員，亦爲 Water Tide 的董事。原告在訴狀中主張，Lehman Brothers 指使（depute）Thomas 爲基於代表 Lehman Brothers 利益之 Water Tide 董事，並且因爲有了 Thomas 爲 Water Tide 之董事的緣故，Lehman Brothers 於 1945 至 1955 年間之六個月期間，獲得 Water Tide 的內線消息，致使其買賣 Water Tide 之股票多達 50,000 張（即所謂內線交易），並且在短時間買進賣出 Water Tide 公司股票，以獲取短線利益（其期間少於 6 個月），其所得之利益共 98,686.77 美元。

聯邦地區法院依據證據顯示，認定 Lehman Brothers 在 Thomas 擔任 Water Tide 董事期間內，確有短線交易獲利之事實。但是並沒有證據證明 Lehman Brothers 有指使 Thomas 爲 Water Tide 之董事，及運用內線消息獲利；Lehman Brothers 購買股票是基於 Water Tide 的公告得知，且沒有和 Thomas 討論。基於這些事實發現，地區法院並沒有判決說要 Lehman Brothers 或 Thomas 需單獨給付其短線交易獲利之$98,686.77 利得。儘管 Thomas 特別放棄其可享 Lehman Brothers 交易 Tide Water 股票獲利的權利，第一審仍然認爲 Thomas 符合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的定義，且其仍分享因其在 Lehman Brothers 所佔合夥比例，而分得部分 Lehman Brothers 交易 Tide Water 股票的獲利。於是地區法院判決 Thomas 需返還依其在 Lehman Brothers 所佔合夥比例的獲利$3,893.41，但不用負擔利息。二審巡迴法院仍維持一審之判決。

原告得到 SEC 支持以下列三點理由認爲法院判決有誤，提起上訴：（1）拒絕判決 Lehman Brothers 合夥團體必須負擔他們從買賣 Tide Water 股票所得短線交易 $98,686.77 獲利。（2）拒絕判決 Thomas 返還全部 $98,686.77 獲利。(3) Thomas 返還依其在 Lehman Brothers 所佔股份之獲利，但未負擔利息。

判　決

原判決維持。

理　由

由於一二審法院並未能從相關事實中，找到足以證明被告有內

線交易情事之證據，且本院只能依據下級審法院所發現之事實發現來認定；因此，本院只能審查到底被告是否符合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要件，以決定被告是否需返還其短線交易所得利益。

首先，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所用詞語並非意圖要把特別的賠償責任加諸於任何「人」身上，無論其是否爲「受任人」，只要其爲系爭公司董事、職員、或持股 10％以上股東，即爲本條規範之主體。Lehman Brothers 並非爲系爭公司之職員，亦非持股 10％以上股東，但是原告和 SEC 都主張 Lehman Brothers 雖身爲一合夥，但其指派 Thomas 爲 Water Tide 之董事，即應該被認定爲 Lehman Brothers 本身即爲系爭公司 Tide Water 之董事。其所持理由有三：（1）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中，第 3(a)(9) 條提供了何謂「人」（person）之定義，其中包括了合夥。而第 3(a)(7)條定義何謂「董事」：所謂董事，係指任何代表公司之人或任何人執行關於組織的相同職務，無論其爲法人或非法人。因此，原告和 SEC 都主張 Lehman Brothers 透過 Thomas 來執行 Tide Water 的職務，故 Lehman Brothers 爲 Tide Water 的董事。但是本院和一二審法院一樣，都不接受這種見解。因爲並無證據證明證券商 Lehman Brothers 指示 Water Tide 公司的董事 Thomas 於 Water Tide 公司之董事會中代表其利益。（2）接下來原告和 SEC 認爲第 3(a)(9)條所定義之「人」，包括合夥，此即表示本條立法意旨把合夥當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實體。而因爲 Thomas 是此不可分割團體內的一員，是一個內部人，所以他們主張合夥團體也要被視爲內部人。但是本院認爲，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3(a)(9)條的眞正意旨，僅僅說明合夥可以被當作是一個實體而受規範，並不是說合夥團體一定就受到規範。所以若再配合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解釋，其更不能解釋爲：因爲 Thomas 是 Lehman Brothers 合夥之成員之一，而其又爲 Water Tide 之董事，遂 Water Tide 爲 Lehman Brothers 之董事，進而成爲符合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之規範主體。事實上，美國國會在規定其視合夥爲一整個主體來看待，有其本身之意義，即無庸置疑的是當合夥視爲一整體來對待時，其合夥之主體不必爲其合夥之成員其個人所爲之私人商業上之行爲，負其責任或是財務上之負擔。（3）原告和 SEC 都主張，基於政策理由，不

論 Lehman Brothers 是否是董事、職員或持股 10%股東，其皆需負責任，如此才能符合國會立法當時所欲達成的立法目的，亦即避免從股東、職員或董事身上所得到的內線消息，被不公平的使用。但是本院並不認同此一見解。因爲，若依據原告和 SEC 之主張，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的適用主體，將包括所有人。但是在國會當初通過立法時，國會就有考慮到不可以規範到所有人，而是有意僅規範董事、職員或持股百分之十之股東的。準此，原告和 SEC 的主張，明顯與國會立法之目的不符。

事實上，在此案例之前，於 1952 年時即有一案例，Rattner Case 之案例事實與本案極爲相近，其爭點亦在於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的規範主體。所以若 Lehman Brothers 並非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之所規範之「董事」，亦非該條其他之規範主體：如自然人個人、或受信託者、經理人或持有該公司股份超過百分之十者。所以 Lehman Brothers 並非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其規定違反內線交易之主體。

除了規範主體之爭議外，事實上聯邦地區法院與巡迴法院並無發現內線交易之事實。Lehman Brothers 於交易 Water Tide 公司之股票前，並無諮詢董事 Thomas，且於交易事後，董事 Thomas 放棄了 Lehman Brothers 交易之 Water Tide 股票所得利益中其應得之部分；且法院認爲 Lehman Brothers 會買 Water Tide 公司之股票，並非因爲 Thomas 爲董事而所爲之內線交易，而是因爲 Water Tide 對外公開募股。所以今天即使 Thomas 非爲 Water Tide 之董事，Lehman Brothers 依然會獲得其交易 Water Tide 股票之利益，所以 Thomas 完全是獨立於 Lehman Brothers 交易 Water Tide 股票之外，且事先亦不知情。根據以上述種種證據顯示，有關聯邦地區法院與巡迴法院並無發現內線交易之事實，堪稱允當。

關於第二個爭議，原告與 SEC 認爲對於 Water Tide 董事 Thomas 之部分，應返還因 Lehman Brothers 交易 Water Tide 股票所獲得之全部利益，共 98,686.77 美元。本院認爲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第 16 條第 b 項規定的很清楚，其董事必須返還的是就其所知短線交易所得之部分。其中「就其所知」之部分爲關鍵，因爲並無任何證據足以顯示 Thomas 知其這次 Lehman Brothers 交易 Water Tide 股票，不能僅因爲其爲 Lehman Brothers 合

夥之一員，於是認定其知情。所以第一審判決 Thomas 不需負返還 Lehman Brothers 交易 Water Tide 股票所獲得之全部利益責任，並無不當。

關於第三個爭議，法院判決 Thomas 返還以其在 Lehman Brothers 合夥之比例來賠償因 Lehman Brothers 短線交易 Water Tide 公司股票所得之利益，依 Thomas 於 Lehman Brothers 之合夥比例言之，若依 Lehman Brothers 短線交易所得之利益算之，Thomas 其共須賠償 38,493.41 美元，但不用負擔利息。但是原告認爲應該負擔利息而提起上訴。本院認爲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 16 第 b 項並沒有提到關於利息是否應該負擔及負擔之方式。若依嚴格的損害賠償的定義來解釋，對於利息之負擔並不是爲了去填補損害，而是去考慮其公平上之因素。第一二審法院既然認爲 Thomas 不用負擔利息，就無需推翻之。

原判決維持。

38. TSC Industries, Inc. v. Northway, Inc.

426 U.S. 438（1976）

黃偉峯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依據 1934 年之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4（a）條所制定之 14a-9 規則明定，”委託書的徵求…不應是在有重大事實的虛偽陳述或誤導的情形下，或就陳述內容非為虛偽或誤導所必須揭露之重大事實有所遺漏之情形下作成。”
（Rule 14a-9, promulgated under 14（a）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provides that no proxy solicitation shall be made “which …is false or misleading with respect to any material fact, or which omits to state any material fact necess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ments therein not false or misleading.”）
2. 最符合 14a-9 規則之政策之一般重大性原則，並非如聯邦二審法院所適用之標準，而其標準應如下：漏未揭露之事實，若係具有實質可能性之使一合理之股東認為其係於決定如何投票時之重要因素者，則其係屬重大。此標準與 Mills 案中關於重大性之概括性描述：「該瑕疵具有影響投票過程之重大傾向」，係完全符合。該標準不要求對於漏未揭露之事實所可能造成一合理投資者改變其投票之實質可能性提出證明。然而係著眼於實質可能性之存在，而於所有情況下，認定該漏未揭露之事實係一合理之股東於考量做出決定時之實質重要之因素。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materiality best comporting with Rule 14a-9’s policies is not the standard appli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s but is as follows: An omitted fact is material if there is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a reasonable shareholder would consider it important in

deciding how to vote. This standard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materiality as a requirement that "the defect have a significant propensity to affect the voting process." Mills v. Electric AutoLite Co., 396 U.S. 375, 384. It does not require proof of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disclosure of the omitted fact would have caused the reasonable investor to change his vote, but contemplates a showing of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und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the omitted fact would have assumed actual significance in the reasonable shareholder's deliberations.）

3. 如何認定重大的爭議是一個法律和事實的混合問題，涉及到法律上的標準在特定一連串事實上的應用，尚且，唯有在確立之未揭露訊息對於投資者而言，係「如此明顯的重要」，以致於「一個合理之人對於該重大性之認定不會有所爭議」之情況下，始有涉及是否以法律上之簡易判決適當地解決重大性認定之根本爭議。

（The issue of materiality is a mixed question of law and fact, involving as it does the application of a legal standard to a particular set of facts, and only if the established omissions are "so obviously important to an investor that reasonable minds cannot differ on the question of materiality" is the ultimate issue of materiality appropriately resolved "as a matter of law" by summary judgment.）

關 鍵 詞

proxy solicitation（委託書之徵求）；Securities Exchange Act（證券交易法）；false or misleading（虛偽陳述或誤導）；material（重大的）shareholder meeting（股東會）；acquisition（收購）。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Marshall 主筆撰寫）

事　實

案例的爭端起源在於上訴人（petitioner）National Industries（以下簡稱 National）收購 TSC Industries（以下簡稱 TSC）。在 National 從 TSC 的創立人、主要股東及家族身上，購買了百分之三十四有表決權之股份。而該創立人和其兒子立即在 TSC 的董事會上辭去董事職位，由 National 提名的五位人選取代，其中包括隨後分別成爲 TSC 董事會主席和執行委員會主席之 National 的總裁和執行副總裁。之後，TSC 的董事會通過一項清算和賣掉 TSC 所有資產之決議，其方法爲以 TSC 的普通股和特別股（common and preferred stock）來交換 National 的特別股及可購買 National 普通股之認股權證。TSC 和 National 之後聯合發表委託書徵求聲明（proxy statement）給他們的股東，建議他們承認這項提案。委託書的徵求狀況很成功，TSC 因而開始進行清算程序，其股份的轉換也產生效力。被上訴人（respondent）是一位 TSC 的股東，對 TSC 和 National 的行爲提出訴訟，主張損害賠償、回復原狀及其他之救濟，主張他們公開徵求委託書的共同聲明並不完整且有重大誤導（materially misleading）之情形係違反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4（a）條及 14a-9 規則規定，因爲該委託書徵求聲明就 National 對於 TSC 之控制程度之重大訊息有所遺漏（換言之，該委託書徵求聲明並未揭露 National 的總裁和執行副總裁在 TSC 所擔任之職位，及關於 National 和 TSC 向聯邦證券管理委員會陳報 National 可被認爲是 TSC 母公司之報告），另關於 TSC 被收購的有利程度對股東說明（亦即，該徵求書怠於揭露某些不利之資訊，包括一封來自投資銀行的建議信函，該投資銀行早期對於提案之有利意見在委託書徵求聲明中係已被揭露的；另外，亦怠於揭露關於 National 和某信託基金（mutual fund）近期對於 National 普通股股票之購買，有操縱證券市場之疑慮）。聯邦一審法院拒絕被上訴人聲請作成簡易判決之請求。聯邦二審法院撤銷之，認爲該遺漏未說明的部分在法律上得認爲係重大的（were material as a matter of law），並就重大訊息定義爲"一個合理的股東可能會認爲重要的所有事實"（all facts which a reasonable shareholder might consider important）。

判　決

聯邦一審法院拒絕被上訴人聲請作成簡易判決之請求，聯邦二審法院撤銷之，本院撤銷二審判決（512 F.2d 324），發回更審。

理　由

I

本件涉及上訴人 National 併購另一上訴人 TSC，在 1969 年 2 月從 Charles E. Schmidt 和他的家人身上，購買了 TSC 百分之三十四的有表決權的股票。Schmidt 先生曾經是 TSC 企業之創立人和主要股東，隨即和他的兒子在 TSC 的董事會上辭職。而 Stanley R. Yarmuth，任職 National 之總裁和執行長，變成 TSC 董事會之主席，而 Charles F. Simonelli，任職 National 之執行副總裁，成爲 TSC 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在 1969 年的 10 月 16 日，在 TSC 的董事會上，在 National 之提名人棄權的情況下，通過清算和出賣 TSC 所有資產給 National 的提案。該提案之主旨係提出以 TSC 的普通股和系列 1 的特別股交換 National 系列 B 的特別股和認股權證。[1] 在 1969 年的 11 月 12 日，TSC 和 National 發布聯合聲明給他們的股東，建議股東們承認該項提案。這件委託書的徵求很成功，TSC 進行股份之交換亦被實施。

此訴訟由被上訴人 Northway（TSC 的一位股東）對 TSC 及 National 提出，主張 TSC 和 National 之共同委託書徵求聲明，係未完整且重大誤導股東而違反 1934 年之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4（a）條 [2]，及依該法規制定之 14a-3、14a-9 規則

---

[1] 每一股 TSC 普通股，得換發 0.5 股之 National 之系列 B 特別股及 1.5 單位之 National 認股權證。每一股 TSC 系列 1 之特別股，得換發 0.6 股之 National 之系列 B 特別股及 1 單位 National 認股權證。National 之系列 B 特別股可轉換為 0.75 股之 National 普通股。一個 National 認股權證賦予持有人得於截至 1978 年 10 月前，以特定金額購買一股之 National 普通股。

[2] 第 14(a)條規定：「任何人藉由郵件之使用、或州際貿易之任何方法或手段、或任何國家證券交易之設備或其他方式，違反證券交易委員會可能認為對公眾利益或保護投資大眾係必要或適當之法律及規則，去徵求或允許他人以其姓名去徵求任何與依據第 781 章規定登記之證券（免除登記義務之證券”exempted security”不在此限）有關之任何委託書、同意書或授權書。」

[3]。其主張如下：依第 14a-3 規則之規定，該委託書徵求聲明並未盡到說明 Schmidt 先生將其所持有 TSC 之股份移轉給 National 已造成 National 擁有對於 TSC 之控制權。[4]依 14a-9 規則之要求[5]，本案所涉及的範圍係 TSC 和 National 於委託書徵求聲明中關於 National 對 TSC 的控制程度，及說明該提案對 TSC 股東有利的條件等重大訊息之漏未揭露（the favorability of the terms of the proposal）。[6]

被上訴人 Northway 在 1969 年 12 月 4 日，於預定針對提案交易行爲舉行股東會議的前一天，向伊利諾州北區聯邦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被上訴人之前係請求禁制令，未曾向法院提出訴訟，於 1972 年被上訴人修改其請求爲主張金錢損害賠償、回復原狀或其他衡平法上的救濟。不久之後，Northway 就 TSC 和 National 應負的責任請求簡易判決。聯邦地方法院否決此項請求，但根據 28 U.S.C. 1292（b）法規准予其有上訴之權利。聯邦第七巡迴二審法院同意聯邦一審法院

---

[3] Northway 於其起訴狀中亦主張，National 進行詐欺計畫以低於公平價值收購 TSC 之行為，係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0(b)條及依該規定制定之第 10b-5 條規則之規定。Northway 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並未繼續為上述主張。Northway 亦對 Charles Schmidt 及其家人提起訴訟，控告他們幫助及教唆被告公司違反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聯邦地方法院對被告 Schmidt 作成簡易判決，聯邦上訴法院維持原判。原訴訟之主張並未向本院提出。

[4] 第 14a-3(a)條規則規定：「除非被徵求之每一人係同時或事先被附以載明附件 14A 中規定內容之書面委託書徵求聲明，否則依據本規則規定，不得為徵求之行為。」，附件 14A，第 5 (e)項規定：「若當事人知悉其徵求行為將改變其自上一個會計年度起對於委託書發行者之控制權，則該委託書徵求聲明上應載明取得控制權之當事人姓名、控制權之基礎、日期及交易之說明、或取得控制權之交易及當事人現在對於委託書發行者所擁有之有表決權之股權比例。」

[5] Northway 也依第 14a-9 條規則主張，委託書徵求聲明中關於 TSC 董事會已通過交易提案之主張乃構成重大誤導。首先，其主張該提案並未依據可適用之州法規定而合法的通過；其次，無論如何，該聲明皆應揭露該提案僅獲得四票贊成票，且 National 之提名人皆曾受 National 法律顧問之應投反對票之警告。上訴法院並未同意第一個主張，且認為第二個主張不適當作成簡易判決。前述二主張皆未向本院提出。

[6] 第 14a-9(a)條規則規定：「依據本規則規定，委託書之徵求不得透過任何委託書徵求聲明、委託書之表格、會議之通知或其他通訊方式，無論係以書面或口頭之形式，在其作成之情況下判斷，係含有任何對於任何重大事實之虛偽陳述或誤導、或就必要的得以防止導致虛偽或誤導之重大事實之漏未陳述、或就必要的得以導正在先前通訊中，關於該委託書徵求之聲明，在其他相同會議或議題中將被認為構成虛偽或誤導之重大事實。」

的判決，認爲就 National 購買 Schmidt 在 TSC 的股份，是否造成控制權的變更，確實存在一個事實上的爭議，因此針對 14a-3 法規之主張，法院受理簡易判決之要求係不適當的。但聯邦二審法院撤銷聯邦一審法院拒絕對於 Northway 關於 14a-9 規則主張作成簡易判決之請求，認爲系爭未揭露的訊息在法律上係屬重大也（512 F.2d 324）。

我們認爲上訴有理由因聯邦二審法院在解決何謂重大訊息所適用之標準，與其他聯邦二審法院在適用該標準上係有衝突的（參 423 U.S. 820）。因此我們作出授予 Northway 一部簡易判決之命令是錯誤的。

II

A

就如同我們在許多案件中指出的，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4（a）條之目的乃在"藉由確使委託書之徵求過程，包含了對於股東解釋關於向其取得股東表決權之表決內容之眞實性質，以促使股東得自由行使其投票權"。參 Mills v. Electric Auto-Lite Co. 案（396 U.S. 375, 381）；J. I. Case Co. v. Borak 案（377 U.S. 426, 431）。在 Borak 案中，本院認爲在第 14（a）條中之廣義救濟目的，涵蓋就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27 條（15 U.S.C 78 aa）之違反即影射個人起訴權利之認可（即訴因），乃屬當然。還有在 Mills 該案中，我們某種程度地嘗試去澄清違反第 14（a）條之個人訴因之構成要件。在一訴訟中，於挑戰因贊成合併之委託書徵求聲明是否足以該當第 14（a）條及 14a-9 規則時，我們認爲並不需要就委託書徵求聲明上的缺失對於投票行爲有決定性的影響作出證明。只要不實陳述或遺漏的訊息是重大的，違反和損害之因果關係已經足以確立，因此我們結論，"如該委託書之徵求本身，…與交易行爲的完成有實質的關聯就足以認定二者有因果關係（was essential link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ansaction）。"（396 U.S. at 385）。自 Mills 案後，有關「重大性」的見解認定增加其重要性。[7]

[7] 我們過去案件並未考量且我們亦無機會於本案考量，就公司之發行產生重大誤導之委託書徵求聲明或個人之涉及準備具有重大誤導性質之委託書徵求聲明，於第 14(a)規定之構成要件之違反須具備何種可責性。參 Gerstle v. Gamble-Skogmo, Inc.案, 478 F.2d 1281,

B

毫無疑問的，所謂「重大」的議題是客觀（objective）的問題，它牽涉到一個遺漏或不實陳述的訊息（an omitted or misrepresented fact）對合理投資者（a reasonable investor）的重要性。關於重大性之一般標準要件中之可變因素，通常發生於決定某一訊息應重要至何程度，或者該訊息應明確至何程度以至於會影響一個合理投資者的判斷之節骨點上。

聯邦二審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s）在本案中將重大訊息認定爲「一個合理的投資者會認爲重要的所有訊息」（512 F.2d 第 330 頁）。這種重大性之檢驗標準至少被兩個法院判決明確拒絕適用，認爲如此將使行爲人依 14a-9 規則負責之標準門檻太低，[8] 如 Gerstle v. Gamble-Skogmo, Inc.（478 F.2d 1281）和 Smallwood v. Pearl Brewing Co.（489 F.2d 579）。在這些案子中，聯邦第二和第五巡迴法院之合議庭（panels），傾向於用一般侵權行爲的檢驗標準來認定重大（the conventional tort test of materiality），──該不實陳述或漏未揭露的訊息，是否造成一個合理行爲人於決定如何行爲時之重要因素。參閱 Restatement（Second）of Torts 538（2）（a）。及 American Law Institute, Federal Securities Code 256（a）, 及前面提及之 Gerstle v.

1298-1301 (CA2 1973)；Richland v. Crandall 案, 262 F. Supp. 538, 553 n. 12 (SDNY 1967)；R. Jennings & H. Marsh, Securities Regulation: Cases and Materials 1358-1359 (3d ed. 1972)；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 案, 425 U.S. 185, 209 n. 28 (1976)。

[8] 這個標準或與此接近之標準，在涉及證券交易法不同章節之案例中已被廣泛地援用。參 Chris-Craft Industries, Inc. v. Piper Aircraft Corp.案, 480 F.2d 341, [426 U.S. 438, 446] 363 (CA2 1973)；John R. Lewis, Inc. v. Newman 案, 446 F.2d 800, 804 (CA5 1971)；Gilbert v. Nixon 案, 429 F.2d 348, 355-356 (CA10 1970)；Rogen v. Ilikon Corp.案, 361 F.2d 260, 266 (CA1 1966)；SEC v. Texas Gulf Sulphur Co.案, 401 F.2d 833, 849 (CA2 1968)，拒絕作成裁量上訴受理令狀；Coates v. SEC 案, 394 U.S. 976 (1969)；List v. Fashion Park, Inc.案, 340 F.2d 457, 462 (CA2)，拒絕作成裁量上訴受理令狀；List v. Lerner 案, 382 U.S. 811 (1965)；Kohler v. Kohler Co.案, 319 F.2d 634, 642 (CA7 1963)。惟參 Sonesta Int'l Hotels Corp. v. Wellington Associates 案, 483 F.2d 247, 251 (CA2 1973)。在前述數個案例中，法院亦將重要性定義為包含『依合理及客觀的預期判斷係可能影響股票之價值』之事實。參 Rogen v. Ilikon 案, supra; SEC v. Texas Gulf Sulphur 案；List v. Fashion Park, Inc.案；Kohler v. Kohler Co.案。上訴法院於本案採用之標準已適用於 Kohn 案及 Ronson Corp 案。Kohn v. American Metal Climax, Inc.案, 458 F.2d 255, 269 (CA3 1972) (10 (b)),及 Ronson Corp. v. Liquifin Aktiengesellschaft 案, 483 F.2d 846, 851 (CA3 1973) (14 (e))。

Gamble-Skogmo, Inc.等案中，也認同下列標準，而該等標準之形成係就有爭議之投票選舉事項之通知而來。該標準即爲"用切合實際的觀點來看，就誤述或漏未陳述的事實，是否會存在一種實質可能性，而可能導致一個股東授權其委託書於徵求人或相反的拒絕授權，若於前述這些事實不存在時是否會導致他採取相反之行爲"。General Time Corp. v. Talley Industries, Inc., 403 F.2d 159, 162（CA2 1968）, cert. Denied, 393 U.S. 1026（1969）。

聯邦二審法院在此案中大量援引前面提到本院於 Mills v. Electric Auto-Lite Co.案中之看法，而將重大事實廣泛定義爲以一個合理的投資者可能會認爲是重要的。但此援引是有錯誤的。Mills 案中法院的確就重大性具體認定爲:"至少可具體的下結論認爲，該瑕疵之特性係足以令一個合理的股東在他決定如何投票之過程中認爲是重要的"參 396 U.S.,at 384。即使將 Mills 案中法院之任何用語解讀爲重大性之概括觀念之建議，其亦僅僅能被視爲重大性意見之次要參考資料如"該瑕疵是否具有影響投票過程之重要傾向之要件"。因該要件即爲本院所認定之"適足的符合目的論來確保訴因（cause of action）不會僅因微不足道之瑕疵或與被尋求同意權之交易行爲無關連之證據而成立，尚且，此種對於該瑕疵或責任之加諸所爲之修正並非第 14（a）條所欲進而保護之利益"。 然而，即使應解讀 Mills 案中法院之用語，亦應在理解本院特別明確的拒絕採用 Mills 案中對於遺漏資訊重大性之認定之前提下爲之。此部份關於重大性的參考，僅是我們初步對於本案主要問題的考量—就委託書徵求聲明中漏未揭露部分之重大性之證明，是否須輔以該瑕疵確實已致影響投票之結果以爲認定。然而，很清楚的，在 Mills 案中，法院並無意排斥就 14a-9 規則中關於重大性之意義佐證其他之要件。[9]

[9] 上訴法院所引之 Affiliated Ute Citizen 案(Affiliated Ute Citizens v. United States, 406 U.S. 128 (1972)）亦未作成決定。本院於該案中主張，違反第 10b-5 條規定涉及揭露義務之違反者，"信賴之積極證據非請求回復原狀之先決條件。真正必要者係該被遺漏之事實係屬重大的訊息，而係合理之投資者於作出決定時可能會認定為重要者。" 前述括號中文字所涵蓋之結論即係指出，當重要性已被明確建立時，信賴之積極證據即非必要，且為了該當此結論，明確表示重要性之精確定義亦非必要，而僅僅須提出符合該觀念之理解。除此之外，括號中文字亦不蘊含須符合其他要件之目的。

C

爲形成 14a-9 規則下重大性的標準，我們當然的受到 Borak 和 Mills 案中對於該規則廣義救濟目的之認知所支配。但該目的並非僅僅以司法之手段來確保交易行爲所涉及之實際條件是否公平適當，而係以公司經營之揭露義務使股東能作出已受合理告知之決定來確保之。參 Mills 案，396 U.S., at 381。基於此理論之提出，法院在此種訴訟中所最爲迫切需求扮演之角色爲：因本案爲交易行爲完成後所生紛爭，故法院只需決定該提案是否實際上會爲股東所同意且非係在不實陳述或漏未揭露重大訊息下所完成者。但如同我們由 Mills 案中所認知的，此問題並非須取決於百分之百之確認（such matters are not subject to determine-ation with certainty）。對於不實陳述或漏未揭露訊息之重大性之認定產生質疑乃稀鬆平常之事。尤其基於 14a-9 規則預防性規範目的之觀點，及委託書徵求內容係屬於公司經營之控制範圍內之事實言，將這些質疑用符合該規範所欲保護之目的論來尋求解決之道是適當的。

然而，本院了解關於委託書制度之揭露政策之具體化，係有限制的。惟堅持揭露某些重要性不確定之資訊，其結果可能係弊多於利。違反 14a-9 規則所應承擔之潛在責任實爲巨大，且若重大性認定的標準係不必要地低，則不僅可能造成公司及其管理階層受制於就不重要之遺漏或不實陳述皆有說明的義務，尚且可能造成管理階層因置身於實質責任之恐懼而使股東淹沒於大量瑣碎資訊之中，造成難以對於股東就被告知之資訊作出決定有所幫助。本院以爲聯邦二審法院在本案中就重大性事實之認定所採用的標準--「一個合理的股東可能（might）會認爲是重要的事實者」，將會明顯地產生前述之危險。我們同意法官 Friendly 在 Gerstle 案之聯邦二審法院所提出之看法，認爲「可能」（might）之用語與僅僅具有「可能性」（possibility）相較而言，較具暗示意味，然而此區別係不太可能加以認定的（however unlikely）” 478 F.2d, at 1302。

本院認爲最符合 14a-9 規則之政策之一般重大性標準如下：漏未揭露之事實若係具有實質可能性，而使一合理之股東認爲其係決定如何投票的重要因素者，則其係屬重大。此標準與 Mills 案中關於重大性之概括性描述：「該瑕疵具有影響投票過程之重大傾向」，係完全符合。該標準不要求對於漏未揭露之事實所可能造成一合理之

投資者改變其投票之實質可能性提出證明。然而係著眼於實質可能性之存在，而於所有情況下，認定該漏未揭露之事實係一合理之股東考量做出決定時之實質重要之因素。換句話說，漏未揭露之事實須具有使合理之投資者視其得重大改變全部資訊之效益之實質可能性。[10]

D

有關重大性的爭議可被認定爲一法律和事實之混合問題，涉及到法律的標準對特定事實的應用。於考量就此爭點做出簡易判決是否適當時[11]，我們必須謹記於心的是，通常不具爭議性之根本客觀之事實即係根本的決定重大性之原點。該決定需要詳細評估提供予一個合理之股東之資訊是會引起該合理之股東認爲一組事實及該被提供之資訊係重大的，且該評估即係須特別就事實審理者，即爲事實認定之問題（the trier of fact）。[12]唯有在確立之未揭露訊息對於投資者而言，係「如此明顯的重要」，以致於「一個合理之人對於該重大性之認定不會有所爭議」（so obviously important to an investor, that reasonable minds cannot differ on the question of materiality ）之情況下，始涉及是否以法律上（as a matter of law）之簡易判決適當地解決重大性認定之根本爭議。

III

聯邦二審法院認爲本案所遺漏的事實導致重大性誤導之結果，於法律上係涉及兩個一般性之爭議：於委託書徵求時 National 對 TSC 之控制程度及提案交易之條件對 TSC 股東之有利性。

A、National 對 TSC 的控制權

聯邦二審法院認爲本案關於

---

[10] 當然，本院為定義 14A-9 規則所規定之重要性，同意就證券交易委員會根據廣泛法律授權所制定之規則加以解釋，以促進公共利益及投資人之保護。參 Cf. 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 案， 425 U.S., at 212 -214。在這些情形之下，證券交易委員會針對適當性揭露確保之需要及為避免民事責任因設定過低門檻而造成反效果之需要間，所採取之適當衡平之觀點，應一併列入考量。

[11] 聯邦民事訴訟法第 56(c)條規定，僅於對任何重大事實無實質爭議時，始允許法院作出簡易判決。

[12] 在類似之情況下，在過失案中，陪審團以適用合理之人之標準來排除法院簡易判決之作成，係通常地被認為屬其特有之權限。

National 對 TSC 之經營管理具有潛在之影響及控制之兩個漏未揭露的訊息，在法律上係可認爲是重大的。第一點，在徵求委託書的說明，未能於該委託書發布時明白表示 TSC 董事會之主席係由 National 的總裁和執行長之 Stanley Yarmuth 擔任，且 TSC 執行委員會之主席係由 National 的副執行總裁 Charles Simonelli 擔任。第二點，該聲明亦漏未揭露關於 TSC 及 National 向證券交易所（SEC）陳報的檔案報告中所指出之 National 可被認定爲 1933 年聯邦證券法所定義之 TSC 之母公司（parent）。[13] 二審法院指出 TSC 之股東係仰賴 TSC 董事會來代表他們和 National 協商最佳之換股比例。而後聯邦二審法院基於認定下述事由乃具說服力之指引，而認爲該遺漏之事實係屬重大：”TSC 之董事會係實質上在 National 之控制下，且 National 因而就換股比例之確定係「球員兼裁判」（sat on both sides of the table）”。

本院並不同意就委託書徵求聲明中漏未揭露之這些事實即得以授權法院對於 TSC 及 National 作出如本案訴訟紀錄（on this record）之簡易判決。本院之結論

[13] 括號中文字係出自於 National 之表單 13D 中，該表格之製作與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3（d）條規定相符。大致上相同之文字敘述亦出現於 TSC 之表單 10-K 中，並被表格 8-K 列為參考資料，兩者之製作皆與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13（d）條規定相符。”母公司(parent)”一詞於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則 12b-2(a)、(f)、(k)，及 17 CFR 240. 12b-2(a)、(f)、(k)（1975）中之定義如下：

“除了另有規定，以下名詞，係被使用於包含本規定或 13A 或 15D 規則中、或係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2、13 或 15（d）規定所製作之聲明或報告之表單中時，應具有本規則下述個別之定義：

“（a）關係企業（Affiliate）：所謂特定企業之關係企業或從屬於特定企業者，係指特定企業直接或間接經由一個或多個中間媒介以控制、或被該特定企業控制、或與該特定企業具有一般之控制關係者而言。

“（f）控制（Control）:”控制”此一名詞（包括控制中”controlling”、被控制”controlled by’及具有控制關係”under common control with”），係指直接或間接的持有主導或產生主導企業之管理和策略之權力，惟其係透過有表決權股票之持有或契約或其他方式為之者，在所不論。

“（k）母公司（Parent）。所謂特定企業之母公司係屬一直接控制或間接透過一個或數個媒介控制該特定企業之關係企業。

根據 1933 年證券交易法制定之規則，亦包含相同的定義。17 CFR 230.405(a)、(f)、(n)（1975）。

將不因漏未揭露之訊息係被單獨或一併的考量而有所不同。

委託書徵求聲明中明顯的揭示 National 擁有 TSC 百分之三十四有表決權的股份，而且無其他股東持股超過百分之十。另外該說明書也很明顯的揭露出十位股東中有五位係出自 National 之提名，其中亦提及 National 所提名之人在 National 之職位，指出 Stanley Yarmuth 是 National 的總裁及董事，Charles Simonelli 是 National 的副總裁和董事。這些揭露事實皆已明白顯示 National 和 TSC 的實質關係且達到使合理之股東認知到 National 對 TSC 企業有一定之影響力。綜觀這些已揭露的事實，本院當然的不認爲「Stanley Yarmuth 是 TSC 董事會的主席和 Charles Simonelli 是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之補充事實在本案之訴訟紀錄（on this record）中是如此明顯重要的以致於合理之人皆認爲其具有重大性。

本院亦不認爲 TSC 及 National 漏未就向證券交易所陳報之檔案中指出「National 可被認定爲 TSC 之母公司」之資訊揭露，係在法律上構成重大性誤導。如同本院已注意到的，聯邦一審法院及二審法院皆認爲是否應拒絕就基於第 14a-3 條對系爭之主張做出簡易判決，乃取決於在委託書徵求時，National 是否對於 TSC 有實質控制權之事實上單純爭點。現今爲解決此爭點之目的，本院必須做出假設來討論，若假設當時 National 對 TSC 無控制權，則很明顯地 TSC 和 National 並無此揭露義務，因其根本不具備控制權存在之基本要件。如果該委託書徵求聲明欲揭露其向證券交易所之陳報中之「National 可能會被視爲 TSC 之母公司」時，則即使是不需要揭露之狀況下，因該揭露涵蓋了 National 對 TSC 有控制權之否認聲明或 National 對 TSC 是否有控制權之理解之否認聲明，亦屬適當。[14] 然而，總體來說，委託書徵求聲明中是否有此否認聲明之資訊，並非如此明顯的重要，因爲與委託書徵求聲明中之其他事實相較，該未揭露並不

[14] National 和 TSC 當時之狀態係"有鑒於 National 和原 TSC 之管理階層間…從未劃清明確之分野，是故無人得以知悉在 Schmidt 之股權購買行為至完成股東會決議通過購買 TSC 資產之整個期間中，誰最終能控制 TSC 公司"。

會造成委託書徵求聲明在法律上使人產生重大性之誤解。[15]

B、條件對 TSC 股東之有利性

聯邦二審法院亦認爲該委託書徵求聲明，就提案交易條件之對於 TSC 股東有利情況之說明中，怠於揭露相關之兩組事實，而造成該委託書徵求聲明之重大性瑕疵。第一個漏未揭露之訊息，係來自一封由投資銀行出具之意見信而該意見被聯邦二審法院認爲係對 TSC 之股東來說屬"壞消息"（bad news）之資訊；該投資銀行早期對於提案交易行爲之公平性之有利意見在委託書徵求聲明中係有被揭露的。第二個漏未揭露之訊息係關於 National 和 Madison Fund 之大型信託基金（mutual fund）公司在委託書徵求聲明發布之二年前，即已購買 National 普通股之事實。

1

委託書徵求聲明就 Hornblower & Weeks-Hemphill 投資銀行任職的 Noyes 對於 TSC 與 National 之換股比例之公平性所提出之有利意見已揭露之。委託書徵求聲明中亦提及該意見中，投資銀行所考量之點如下：「....除了其他之項目，尚包括兩家公司現時股票之市價、National 系列 B 特別股之高贖回價、兩家公司之股利和債券條件、現時市價與提供予 TSC 股東之股票價格之高額溢價（substantial premium）以及增加之股利收入。」

聯邦二審法院將焦點集中於該參考意見中指出之「提供予 TSC 股東之股票價格之高額溢價」，並表示任何 TSC 的股東可根據委託書徵求聲明後四頁之現時市值表，計算出顯而易見之溢價收入。以 1969 年 11 月 7 日之收盤價爲基礎，該委託書徵求聲明發布之五日前，顯而易見之溢價收入詳如後述。每一 TSC 系列 1 之特別股得以每股 12 元之收盤價，換得每股

[15] 本院強調本院並無意暗示具有潛在性控制之事實，僅僅於事實上確有控制權之存在時即應被揭露之。舉例言之，若本案中之委託書徵求說明中怠於揭露 National 對 TSC 享有 34% 之股權利益及在 TSC 董事會中有五位 National 提名人之存在，則其遺漏即使該委託書徵求說明書構成法律上之重大誤導，不論 National 是否得被認定為有實質上控制 TSC。其理由分為以下兩個部分。第一，在委託書徵求說明發布時，控制權存在之程度，對於準備製作委託書徵求說明之責任者而言係仍存有疑問的，本院不願以對於明顯地具有潛在性控制之事實之揭露義務來解決該疑問。第二，或許更明確的說，即使 National 並沒有"控制"TSC，其所持有之股權及在 TSC 董事會所擔任之職位，即已清楚的顯現其對 TSC 享有某些對 TSC 股東而言係明顯重要之影響力。

15.23 元 National 系列 B 之特別股和認股權證，因而有每股 3.23 元之溢價收入，亦即對 TSC 系列 1 特別股市價有百分之二十七之獲利。而每一 TSC 之普通股得以每股 13.25 元之收盤價，換得每股 16.19 元 National 系列 B 特別股和認股權證，因而有每股 2.94 元之溢價收入，亦即對普通股市價有百分之二十二之獲利。

在委託書徵求聲明中，指出 National 在 1969 年 11 月 7 日認股權證之收盤價爲 5.25 元。聯邦二審法院認爲 TSC 企業的股東係被誤導，因委託書徵求聲明漏未揭露關於該公司出具有利意見信函之兩星期後，Hornblower 公司復揭露其所以認定 National 提供予 TSC 之價格係屬公平乃基於該交易所涉及之認股權證之價格並非現時之市價，而大約是 3.5 元。若該認股權證之價格係 3.5 元而非 5.25 元，並依其他股票在 11 月 7 日的收盤價，依法院之估算，該顯而易見之溢價收入應實質上減少爲—在 TSC 特別股部分由 3.23（27%）元降至 1.48（12%）元，在 TSC 普通股部分由 2.94（22%）元降至 0.31（2%）元。"簡而言之"， 聯邦二審法院認爲，TSC 和 National 從投資銀行處同時收受一些好消息和一些壞消息。惟他們選擇只公布好消息而遺漏壞消息。

然而，自其隨後與 Hornblower 公司之通信中可發現，聯邦二審法院所認爲之"壞消息"，不包含任何新的訊息。，1969 年 10 月 16 日，即 Hornblower 意見信發布之首日，在當日 TSC 之董事會上，一位兼任 TSC 董事和 Hornblower 公司合夥人之 Blancke Noyes 明白指出，National 認股權證（warrants）的市價具有因涉及換股所額外發行之認股權證而下跌之可能性，並再次確認其就換股比例係公平之斷定將不受影響。之後 Hornblower 又發布一封由 Noyes 簽署之信函，其目的僅在解釋先前 10 月 16 日所發布有利意見之根本的計算基礎。"在該信函中，關於 National 對於 TSC 之出價是否公平之建議，Noyes 表示:「我們認爲系爭認股權證之價格大約係 3.5 元。」[16] 因此就其信函文義而言，Hornblower 公

[16] Hornblower 隨後於 1969 年 10 月 31 日，由 Mr. Noyes 寫給 National 總裁 Stanley Yarmuth 之信件之主文內容如下：

"你曾經要求我們就你們提案收購 TSC 公司而發行之認股權證之價值，提出意見。我們明白這些認股權證具有與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之 National 認股權證相同之條件，而允許認

司之後發布信函，並未顯示有任何足以改變先前 10 月 16 日所發布信函中之有利意見—包括 TSC 股東因股票之換發所能獲得之"高於現時市價之高額溢價收入"（substantial premium over current market values）之斷定。

然而眞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 Hornblower 公司在其後之信函中變更其原來之意見。而係其在於，10 月 16 日會議上提出之建議及其在之後之信函中表示 National 認股權證（warrants）之市價有下跌之可能而以精確之數字降低先前之估算之資訊，是否應該揭露之，以作爲委託書徵求聲明中關於「TSC 股東因股票之換發所能獲得之高於現時市價之高額溢價收入」之參考資料，俾以澄清其要旨。本院最初注意到該委託書徵求聲明中所指出之高額溢價收入，僅是 Hornblower 公司所作出換股條件之有利意見之數個參考因素之一。尚且，本院不能推定 TSC 股東僅將焦點置於該有利意見之"底線"（bottom line）上，而排除其他作出該意見之考量因素。

TSC 和 National 堅持該高額溢價之參考資料無需澄清或補充，因即使 National 之認股權證被假設其價值爲 3.5 元，高額溢價收入確係存在。惟聯邦二審法院採取相反之見解，不顧 TSC 股票在 1969 年 10 月初確定換股比例後，至 1969 年 11 月 7 日間，股價上漲之情形，而認爲該股價之上漲係有利之換股比率公開後所造成之結果。當委託書徵求聲明寄出時，TSC 和 National 聲稱，TSC 股票的市價已經反應部分溢價收入，正如 Hornblower 公司就換股條件所提出之有利意見中所指出者相同。因此，TSC 和 National 指出 Hornblower 公司就提案交易估算出其具有公平性之意見乃係參考 TSC 特別股、TSC 普通股及

股權證持有人在 1978 年 10 月 31 日前，得以每股 21.4 元之價格購買 National 普通股。我們亦明白你希望我們在 1969 年 10 月 9 日作出決定。

"我們對於認股權證之評價係基於股東之角度而作出，而我也是 TSC 公司之董事。在對 TSC 就 National 公司之要約之公平性提出建議時，該權證的價值是否反映仍未出售之 487,000 單位之認股權證在該日之市場價格，係有必要加以決定的。因此我們基於額外的大約 26 萬單位之認股權證皆於併購後發行之假設，加以決定前述爭點。

"經過對於其他已公開交易之認股權證之價格關係之研究，並參考認股憑證評價之慣用系統，及考量提案收購之項目，我們做出結論認為該系爭認股權證之價值大約為 3.5 元。

"如果您對於我們的評估意見有任何疑問，請隨時來電洽詢。"

National 特別股在 10 月初之市價作成。基於上述股價和涉及換股交易之面額 3.5 元之認股權證爲基礎，TSC 和 National 主張溢價收入係實質存在的。每一股 TSC 特別股在 10 月初得以 11 元賣出並得依此價格換購 National 每股 13.10 元的特別股和認股權證，因而得獲取溢價收入 2.10 元，亦即百分之十九之獲利。每一股 TSC 的普通股在 10 月初得以每股 11.63 元賣出，並得依此價格換購 National 每股 13.25 元之特別股和認股權證，因而得獲取溢價收入 1.62 元，亦即百分之十四之獲利。因此本院必然地不能說此溢價收入在法律上係無實質價值的。尚且，若當本院必須假設於考量授與簡易判決之適當性時，自 TSC 股票在 10 月初至 11 月間之股價上漲反映出市場對於議定換股比例之反應，即得認爲該委託書徵求聲明中所指出之高額溢價收入在法律上不構成重大之誤導。

然而還是存在一種可能性，雖然 TSC 及 National 以面額 3.5 元之認股權證及其他涉及該交易股票之 10 月初市價爲基準，所主張高額溢價收入之存在係正確的，但該委託書徵求聲明卻誤導 TSC 股東預測計算之溢價收入，超過實質之溢價收入。其溢價收入如依 10 月初之股票市價及 National 面額 3.5 元認股權證價格計算之──TSC 特別股可獲利百分之十九，普通股可獲利百分之十四，皆明顯的少於如委託書徵求聲明之以 11 月 7 日之收盤價計算—TSC 特別股可獲利百分之二十七，普通股可獲利百分之二十二。但是本院不願承認基於上述基礎而對 Northway 授與之簡易判決。反之，若本院承認之，則必須就下列兩點在法律上作出決定：第一點，該委託書徵求聲明已誤導 TSC 股東以 11 月 7 日之市價爲基礎去計算他們的溢價收入；第二點，依委託書徵求聲明所計算出之溢價收入與依 10 月初之股票市價及 National 面額 3.5 元認股權證價格計算出之溢價收入間之差異乃係重大的。本院認爲這些問題是事實認定之問題（即非法律審）。

2

最後本院關切之遺漏事實乃關於 National 及 Madison Fund 信託基金（mutual fund）購買 National 普通股一事。[17] Northway 指出 National 董事會的主席是 Madison Fund 的董事，尚且，身兼 Madison

[17] 受僱於 1967 年，Merkle 最初之年薪為 2500 美金（至 1968 年增加為美金 12,000 元）並持有可認購 National 公司 10,000 股普通股之選擇權。

Fund 總裁及執行長之 Edward Merkle 受雇於 National，並依其雙方之協議依 National 的請求於每月提供至少一天的服務。Northway 主張該委託書徵求聲明中，在向 TSC 股東介紹涉及提案交易之股票之市價時，應揭露關於 National 普通股在委託書發布之二年前即已被 National 及 Madison Fund 購買之事實。[18] 尤其是 Northway 主張 TSC 的股東在法律上應就於 National 之收購 Schmidt 股份至該委託書徵求提出之期間內，購買該交易高達百分之八點五之 National 普通股之訊息，應被告知。Northway 前揭主張所欲彰顯之理論在於，該委託書對於其購買行爲之揭露，將會明確指出其對於 National 普通股股價之預謀性操縱行爲，而可能影響涉及提案交易之 National 特別股和認股權證的市價之情況的存在或至少有存在之可能。（The theory behind Northway's contention is that disclosure of these purchases would have pointed to the existence, or at least the possible existence, of conspiratorial manipulation of the price of National common stock, which would have had an effect on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National preferred stock and warrants involved in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在聯邦一審法院判決之前，Northway 試圖證明 National 與 Madison Fund 之購買 National 股票之行爲是事先協調好的。然而，聯邦一審法院認爲是否有協調之存在乃本案事實之實質爭點。聯邦一審法院基於認定協商行爲之存在對於 Northway 主張之理論而言係必要的，因此拒絕對本案作出簡易判決。

聯邦二審法院同意聯邦一審法院關於「是否有共謀之爭點尚未明確建立」（collusion is not conclusively established）之觀點。然認爲「共謀之存在係無疑的可被推定的」（it is certainly suggested），聯邦二審法院因而認爲該購買行爲之漏未揭露在法律上構成重大誤導之行爲，聯邦二審法院進而解釋道：

[18] 在委託書徵求聲明中之"股東資產合併申報"之項目中，指出 National 公司在 1968 及 1969 年間，一共取得該公司自己普通股約 83,000 股，同期間其因股票選擇權計畫、僱傭契約、和認股權證而售出約 67,000 股。該委託書徵求聲明中並未就 Madison 在該兩年期間收購 National 公司普通股約 170,000 股一事、或是在委託書徵求之一年前 Madison 收購 200 萬美金之 National 公司可轉換成普通股之公司債一事加以揭露之。

"股東們於考慮該以特別股轉換成普通股的股份和認股權證之要約時，應被通知關於傾向於指出所涉及之普通股之現時賣價可能會因顯見之市場操縱行爲而改變之狀況。這對股東而言，該普通股之市價是否屬股東於考量轉換特別股或認股權證時之因素相關或 Madison Fund 及 National 之行爲實質上到底是否屬操縱行爲，應交由股東自行決定之。

簡而言之，當聯邦二審法院認爲該購買行爲之重要程度僅等同於得以推定有操縱 National 普通股股價之嫌，並且認知是否有操縱行爲乃本案事實之實質爭點之存在，聯邦二審法院卻仍認爲應揭露該購買行爲，俾使股東自行決定是否有操縱行爲之存在。

聯邦二審法院之決定將造成以基於漏未揭露之資訊得以被推定爲有市場操縱行爲之存在而准許課以民事責任，即使公司管理階層明知事實上並無市場操縱行爲之存在亦然。本院不同意 14a-9 規則需要產生此種結果。14a-9 規則所關切的僅在於委託書徵求聲明是否有關於重大事實之表示而產生使人誤導的情形。如果我們必須對簡易判決之請求做出假設的話，National 和 Madison Fund 的購買行爲並不存在共謀或操縱（collusion or manipulation），──也就是說，如果該購買行爲是完全獨立地基於適當的公司治理及投資之目的，則依 Northway 所表明清楚之認知，得認爲他們就明列於委託書徵求聲明中之市價之健全及可靠性不負任何義務[19]，因此該部分之漏未揭露不能被認定爲重大的誤導。[20]

當然，這並不是說證券交易委員會不能明確的制定法規，就如同本案之購買行爲特別加以規定必須要揭露之，無論該購買行爲是否有共謀或操縱行爲之顯現。本院僅認爲於本案例中若欲基於漏未揭

[19] 或許其於其他案件中會有此主張，惟於本案而言，系爭之購買假設無操控或共謀之行為，則其無任何重大性議題之認定，而且也未有任何跡象顯示於委託書徵求聲明發布時有任何引起人懷疑之操控或共謀行為之存在。

[20] 法院於主張 National 和 Madison 之未揭露其股權購買之行為在法律上係違反第 14a-9 條規則時，聯邦二審法院不僅認為不需考慮是否有事實上共謀或操縱行為之存在，亦認為不需考慮該購買行為對於 National 之普通股之股價或甚而對於涉及提案交易之 National 之特別股和認股權證之價格，是否有產生任何重大之影響。就操控是否有阻卻下簡易判決之爭議，既然本院認為其為事實認定之問題，因此本院毋庸就聯邦二審法院之其他事項予以審酌。

露得推定有市場操縱之購買行爲構成誤導之理論而課以責任，則必須在事實上有市場操縱之顯現。[21]

IV

總而言之，截至目前的訴訟紀錄顯示，被主張漏未揭露而違反 14a-9 規則之事實中，無一屬於法律上重大誤導的事實，Northway 不應被授與一部簡易判決。二審法院判決駁回並發回更審，且不得變更本院之見解。

以上爲本院之判決。

[21] 當然，此處所謂之顯示可能被視為間接及直接證據，則其購買股份之行為即可能會被一併列入考慮。

39. Touche Ross & Co. v. Redington
442 U.S. 560（1979）

林秋琴　節譯

判　決　要　旨

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並不能作為損害賠償訴訟之私法請求權基礎。

There is no implied private cause of action for damages under 17 （a）.

A. 由文義來看，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下稱第十七條 a 項）僅要求證券自營商與經紀商須保存財務報告，並將其依證券管理委員會之規定編送委員會，完全無意創造一個請求權基礎。由條文本身觀之，該條文之立法原意是為了提早對證券管理委員會、證券交易所、與其他有關單位提出警告，使其能及時在證券自營商與經紀商的財務發生重大變故前，採取適當的行動保護投資者。惟即便是在管制機關未能及時達成其任務，而無法對證券自營商與經紀商破產作出任何糾正措施的情況下，該條文仍然完全無意賦予任何請求權基礎。

（ In terms, 17 （a） simply requires broker-dealers to keep such records and file such reports as the SEC may prescribe, and does not purport to create a private cause of action in favor of anyone. The [442 U.S. 560, 561] section's intent, evident from its face, is to provide the SEC, the Exchange, and other authorities with a sufficiently early warning to enable them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protect investors before a broker-dealer's financial collapse, and not by any stretch of its language does the section purport to confer private damages rights or any remedy in the event the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re unsuccessful in achieving their objectives and the broker-dealer becomes insolvent

before corrective steps can be taken.）

B. 衡諸證券交易法之立法歷史、及證券交易法體系中明白賦予私法請求權基礎的其他章節，亦可得出第十七條 a 項並未隱含私法請求權基礎之相同結論。

（ The conclusion that no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is implicit in 17 （a） is reinforced by the fact that the 1934 Act's legislative history is entirely silent on whether or not such a right of action should be available. This conclusion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statutory scheme under which other sections of the Act explicitly grant private causes of action. More particularly, a cause of action in 17 （a） should not be implied that is significantly broader than the one granted in 18 （a）, which provides the principal express civil remedy for misstatements in reports but limits it to purchasers and sellers of securities.）

C. 對於本案，本院只需探究條文文義與立法歷史，一旦得出國會並無意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創設私法請求權基礎的結論，本院任務即已告終。繼續探詢隱含私法救濟之「必要性」與執行該救濟所需要之適當方法，與本案決定並不相關。

（ The inquiry in a case such as this ends when it is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statutory language and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that Congress did not intend to create, either expressly or by implication, a private cause of action. Further inquiries as to the "necessity" of implying a private remedy and the proper forum for enforcement of the asserted rights have little relevance to the decision of the case.）

D.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七條與該法所欲達成之救濟目的並無法提供聯邦法院充分之依據，就上訴人違反第十七條 a 項之行為賦予被上訴人救濟途徑。泛言證券交易法中之「救濟目的」，並不足以說服本院就該條文為「廣於語言與規範體系合理允許範圍」之解釋。

（Section 27 and the remedial purposes of the 1934 Act do not furnish a sufficient ground for holding that the federal courts should provide a

damages remedy for petitioner's alleged breach of its duties under 17（a）. Section 27 merely grants jurisdiction to federal district courts over violations of the Act and suits to enforce any liability or duty thereunder and provides for venue and service of process. It creates no cause of action of its own force and effect and imposes no liabilities. And generalized references to the "remedial purposes" of the Act do not justify reading a provision "more broadly than its language and the statutory scheme reasonably permit."）

關 鍵 詞

statutory construction（條文解釋）；implied cause of action（隱含之請求權基礎）；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legislative intent（立法意旨）；legislative history（立法歷史）。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Rehnquist 主筆撰寫）

事 實

Weis Securities, Inc（下稱“Weis”）爲在證券管理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登記有案之證券經紀商，且爲紐約股票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下稱“股票交易所”）之會員。上訴人 Touche Ross & Co.（下稱“Touche Ross”）會計師事務所爲 Weis 所僱用，負責查核 Weis 之會計事務，並依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以下簡稱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及相關法令編送證券商之年度財務報告送交委員會。由於 Weis 的財務發生困難，被上訴人 Redington 依證券投資人保護法（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以下簡稱“SIPA”）之相關規定被指派爲 Weis 清算業務受託人。在清算過程中，Weis 名下之現金與有價證券，連同由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SIPC”）依 SIPA 規定所預

先支付之資金，並不足以償還 Weis 顧客所付出之資產或資金。SIPC 與受託人於是對上訴人向聯邦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要求上訴人賠償其因未適當查核 Weis 的財務報告所造成之損害，並稱上訴人該不當行爲已違反其於普通法（common law）中對 SIPC 與受託人 Redington 等所負之義務，並違反了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及相關規定。被上訴人並認爲上訴人該不當行爲使得 Weis 眞實的財務狀況未被即時公開，而無法防止清算之發生、或減少對 Weis 投資者的損害。聯邦地方法院駁回被上訴人之要求，認爲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不能被援引爲請求權基礎（cause of action），判決被上訴人敗訴。聯邦上訴巡迴法院廢棄原判決，認爲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對會計師課以法定義務，而此法定義務之違反得作爲證券自營商與證券經紀商之顧客在損害賠償訴訟中之請求權基礎，上訴法院並且認爲 SIPC 與受託人可以 Weis 顧客之名義提起訴訟。

判　決

原判決廢棄，並發回更審。

理　由

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並不能作爲損害賠償訴訟之私法請求權基礎，因爲無論是由文義、立法歷史或規範體系觀之，國會完全無意在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中創設一個私法請求權基礎。

我們再一次被要求得否自未明示賦予救濟途徑之條文中引申得出私法救濟途徑之爭議作出決定。光是在本年度我們發予移審令（certiorari）的案件中，我們已經不下五次被要求就類似事件作出決定。[1] 本案我們要決定的是，證券經紀商經主管機關要求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編送財務報告，而於報告中含有之錯誤事項時，其顧客得否基於前揭條文對負責查核該報告之會計師提出損害賠償之請求。[2]

---

[1] 請參照 Chrysler Corp. v. Brown, 441 U.S. 281 （1979）; Cannon v. University of Chicago, 441 U.S. 677 （1979）; Southeastern Community College v. Davis, ante, p.397; Transamerica Mortgage Advisers, Inc. v. Lewis, No. 77-1645, cert. Granted, 439 U.S. 952 （1978）.

[2] 一九七二年，第十七條 a 項（收錄於 15 U.S.C. 78 q（a）（1970 eds.））之條文內容如下：每一個全國性的證券交易所、每一個會員、每一個透過任何會員從事股票交易之證券自營商或經紀商、與每一個依據本法登記之證券自營商或經紀商，均須依照委員會在權限範圍

I

上訴人 Touche Ross & Co.（下稱 Touche Ross）爲會計師事務所。Weis Securities, Inc. （Weis）爲在證券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登記有案之證券經紀商，並爲紐約股票交易所（以下簡稱交易所）會員。Weis 自 1969 年至 1973 年間雇用 Touche Ross 爲其獨立之會計師，由 Touche Ross 負責查核 Weis 的會計帳簿、並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及相關法規編送的年度財務報告予委員會。Touche Ross 亦負責爲 Weis 就交易所要求其會員回答之財務問題準備答覆。

本案爭議乃因 Weis 發生破產與清算而生。在 1973 年，委員會與交易所得知 Weis 發生財務困難，以及 Weis 公司與其主管人員有可能違反證券交易法。1973 年 5 月，委員會以 Weis 違反證券交易法爲由，申請禁制令阻止 Weis 公司與其五名主管繼續營業並獲得法院准許。[3] 在此同時，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以下簡稱 SIPC）亦依法向聯邦地方法院紐約州南部分院提出申請，請求法院裁定 Weis 之顧客需要證券投資者保護法（SIPA）所授予之保護措施。地方法院准許其請求，並指定被上訴人 Redington （以下簡稱爲受託人）爲受託人，負責依據證券投資者保護法清算 Weis 公司之財產。

清算過程中發現 Weis 公司現有之現金與證券並不足以退還所有在 Weis 公司有存款顧客之存款金額，SIPC 於是依據證券投資者保護法預先支付一千四百萬元予受託人，在條文所准許之範圍內，清

內所頒布之規定，製作、保存並維護帳目、通聯紀錄、備忘錄、報告與其他紀錄，並製成相關報告，以促進公益暨保護投資者。前述帳目、通聯紀錄、備忘錄、報告與其他紀錄將不定時或定時受到委員會指派之檢查人或代表之定期、特別、或其他檢查，以促進公益暨保護投資者。

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其後為一九七五年證券法修正條例（Securities Acts Amendment of 1975）大幅更改。目前的第十七條 a 項第一款保留了一九七二年版本之第十七條 a 項第一句。

[3] SIPC 為由證券商組成之非營利組織，由國會依據證券投資保護法於一九七〇年成立。SIPC 名下擁有之資金係由其組成會員所繳納，用於賠償證券經紀商顧客由於經紀商破產所遭受一定額度內之損失。如 SIPC 認定一會員無法償還其顧客或有無法償還之虞，且認定五項規定財務不穩定的要件中之有一項符合，SIPC 得向有管轄權之法院申請法院裁定該會員之顧客需要證券投資者保護法（SIPA）所授與之保護措施。SIPA 亦規定清算證券經紀商之程序。

償大約 3,4000 名 Weis 公司顧客與其他債務人。但即使如此，仍有大約上百萬元之顧客債權未獲清償。

SIPC 與受託人於 1976 年以 Touche Ross 爲被告，向聯邦地方法院紐約州南部分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其訴狀上之共同主張爲：某些 Weis 公司之主管，共謀透過僞造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所要求編送交予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隱瞞該公司自 1972 年以來之巨額營業損失。SIPC 與受託人因而以 Touche Ross 不當查核認證 Weis 1972 年之財務報告及不當答覆交易所之問題爲由，請求 Touche Ross 爲賠償損害。訴狀上宣稱 Touche Ross 之不當行爲，違反其對 SIPC、受託人與其他人所負之普通法義務及第十七條 a 項相關法規之義務，且 Touche Ross 之瀆職使 Weis 眞正的財務狀況一直未被公開，以致無法防止清算的發生、或減少清算對 Weis 顧客所產生的財務衝擊。受託人以 Weis 名義與因受託人無法全數償還而致權益受損之 Weis 顧客名義，要求 Touche Ross 賠償五千一百萬元，而 SIPC 以依據證券投資者保護法受讓已獲清償之 Weis 顧客權利之受讓人名義、或自己名義，要求 Touche Ross 賠償一千四百萬元。兩者援引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爲請求權基礎向聯邦法院起訴，起訴狀中亦同時指稱會計師之過失、違約與違反保證義務之行爲，違反多項州之普通法規定。

聯邦地方法院駁回原告之訴，判決第十七條 a 項並不隱含任何私法之請求權基礎，故原告之訴無法獲得救濟。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以相當分歧之意見廢棄該判決，認爲第十七條 a 項確實課予會計師義務而據此作出結論。上訴法院認爲基於本院判決 Cort v. Ash, 422 U.S. 66, 78 （1975）， 會計師如違反其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所課予之義務，在損害賠償訴訟中，該條可作爲證券自營商與證券經營商主張權利之私法請求權基礎，然而上訴法院也承認「該條文之立法歷史並未就此問題表達任何意見」。就上訴法院判決 SIPC 與受託人可以 Weis 顧客名義援引隱含於第十七條 a 項中之請求權基礎據爲主張，我們同意核頒移審令，並廢棄上訴法院之判決。

II

某條文中是否存在請求權基礎，係屬條文解釋的問題。SIPC 主張其私法之請求權基礎可由侵權法之一般原則導出，實屬錯誤。正如本院最近所強調的，「並非凡有

違反聯邦法律導致有人受損害的情形，即可認爲有一可供被害人主張權利之私法請求權基礎自動產生。」本院的任務僅止於認定國會是否有意創設 SIPC 與受託人現所主張之私法請求權基礎，而如同所有涉及條文解釋的案件，條文的分析必須始於該條文用語本身。與本案有關的第十七條 a 項之相關部分爲：

「每一個全國性的證券交易所、每一個會員…與每一個依據本法登記之證券自營商或經紀商，均須依照委員會在權限範圍內所頒布之規定，製作、保存並維護帳目、通聯紀錄…與其他紀錄，並製成相關報告，以促進公益暨保護投資者。」

就文義觀之，第十七條 a 項僅要求證券經紀商或自營商等依據委員會之規定，保存前揭紀錄並編送相關報告，自其文義視該條文並未創設一可供任何人主張權利之私法請求權基礎。我們在過去的案件中，確曾認爲在某些情況下，私法請求權基礎可由一未明示賦予請求權之法條中引申而出，但於此等案件中，系爭條文至少對於某些行爲予以明文禁止、或於條文內創設得由私人主張之聯邦法權利。相對地，第十七條 a 項既未賦予私人任何權利，亦未禁止任何行爲。

第十七條 a 項之立法意旨看起來十分明顯，其如同許多其他法律條文一樣，僅要求被管制對象保存紀錄並定期編送報告，使主管機關得以達成管制任務。這些報告與紀錄提供主管機關必要的資訊，以監督被管制對象遵循相關法規。本案中，依第十七條 a 項所編送之報告，連同檢查行爲與其他資訊，係幫助委員會與交易所確保「資本淨額原則」（net capital rule）之落實，使委員會與交易所得據以監督證券經紀商之財務健全狀況、保障顧客存放現金與證券於證券經紀商或自營商處之權益。第十七條 a 項所要求編送之報告中所含之資訊，是爲了提供委員會、交易所與其他有關單位充分的訊息，使其得以在證券經紀商或自營商發生財務困難之前，得採取適當的行動保護投資者權益。然而，第十七條 a 項完全無意於主管機關未能達成其管制目的，亦即當證券經紀商破產而主管機關未能採取適當措施時，賦予一私法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任何救濟途徑。就文義觀之，第十七條 a 項之規定強調事前預防而非事後救濟，其目的在於防止破產的發生，而非在破產事件發生後提供賠償。簡單地說，自第十七條 a 項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完全無法引申出一可供任何人主張權利之民

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

如同上訴法院所承認，證券交易法的立法歷史完全未記載於本案類似情形發生時，第十七條 a 項是否賦予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但 SIPC 與受託人卻指稱，正因爲國會未明白否認第十七條 a 項可作爲私法之請求權基礎，本院應得據此推衍出該請求權基礎之存在。然而，由國會的沉默而引申出一私法請求權基礎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當本院必須在條文明示的文義與須經推衍始能得出之私法救濟兩者間擇一時，因立法歷史中全然未提第十七條 a 項得作爲損害賠償訴訟之請求權基礎，故此更強化了本院不作如此引申之決定理由。

由證券交易法之體系，亦可得出不採 SIPC 與受託人主張之理由。首先，第十七條 a 項前後皆爲明文賦予請求權基礎之條文，很顯然地，如果國會希望賦予損害賠償請求權，自會予以明文規定。

其次，第十八條 a 項創設出一可向會計師主張之私法請求權基礎，該請求權在會計師於任何須編送委員會的報告或文件中作成明顯誤導之陳述時即成立，惟得主張權利之人僅限於信賴該誤導之陳述、且證券之買賣價格確受到該陳述影響的買賣者。[4] 既然 SIPC 與受託人並未主張 Weis 公司顧客買賣證券之行爲係基於其對系爭第十七條 a 項報告的信賴，自不能援引第十八條 a 項控告 Touche Ross。被上訴人的主張爲 Weis 顧客並未得到如依第十七條 a 項編送之財務報告爲眞實時，所會產生的執行利益。SIPC 與受託人辯稱，第十八條 a 項的請求權基礎明文限制得主張請求權之人爲買賣證券者，而國會不可能意圖以第十八條 a 項剝奪其他人（例如本案被上訴人所代表的顧客）因第十七條 a 項報告中之不實陳述而應得主張之請求權。

---

[4] 第十八條 a 項（收錄於 15 U.S.C. 78 r (a)）規定：

誤導陳述之責任

(a)於任何依本章或相關法規所製作的報告或文件中，或於依本法第七十八條 d 項所製作之登記文件之條項中，於製作當時可認為於文件中作成或使作成不實或誤導陳述者，應對信賴該陳述，而以受該陳述影響之價格買入或賣出證券之人，賠償其因信賴所受之損害。但能證明該不實或誤導陳述之作成係出於善意，或不知該陳述為不實或誤導者，不在此限。前述有請求權之人，得於有管轄權之法院請求金錢損害賠償或請求債務人為一定行為。而法院得於訴訟中要求請求權人提供擔保金，擔保訴訟進行之費用與其他合理費用，包括兩造之律師費。

認爲所有凡須編送委員會的報告中(包括第十七條 a 款之報告)有不實陳述之情形，均可依據第十八條 a 項請求救濟的看法，並非空穴來風。誠然，如 SIPC 與受託人所指出，並沒有證據顯示立法意旨欲將第十七條 a 項排除於第十八條 a 項的救濟範圍外。但本院所需決定的，並非國會是否希望於第十七條 a 項編送之報告中有不實陳述時，當事人亦得以第十八條 a 項爲救濟途徑。因爲國會除就報告中不實陳述設有第十八條 a 項主要之救濟方法，又同時制定了第十七條 a 項，而國會將前者之救濟限於買賣證券者方得以主張時，本院十分不願意從第十七條 a 項中去引申出一個範圍比國會提供的救濟方法還廣的請求權基礎。

SIPC 與受託人主張法院之分析並不應僅止於此，而此主張亦爲上訴法院所採。被上訴人援引 Cort v. Ash 案中所列舉之因素，指稱我們尚必須考量是否需要以引申出一私法救濟途徑的方法來「達成立法目的」。SIPC 與受託人認爲，以引申方式推衍出私法救濟途徑，爲達成第十七條 a 項之必要手段，而且第十七條 a 項之執行應屬聯邦、而非州之執掌範圍。惟本院並不需要就被上訴人之此項主張再多加討論，因爲這些問題與本案之決定並無關聯。在 Cort v. Ash 案中，本院確實列舉了四個判斷得否由一未明示賦予私法救濟之條文引申出私法救濟的相關要件，但是本院並未說明是否每一個要件都應被視爲同等重要。在此，最關鍵的問題仍爲國會是否意圖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創設一個私法請求權基礎。誠然，Cort 案中所討論的前三個要件—條文所使用的語言與關注的焦點、立法歷史與立法目的，均是傳統判斷立法意旨的方法。惟本案之系爭條文中並未賦予任何團體私法權利，亦未禁止任何行爲，而當事人與上訴法院均同意，證券交易法的立法歷史就第十七條 a 項的救濟方式完全未予著墨。本案我們的詢問應到此爲止，就國會是否明示或暗示地意圖創設一私法請求權基礎這個問題，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最後，SIPA 與受託人主張，本院在 J. I. Case Co. v. Borak 案中，曾要求自第十七條 a 項引申出一私法請求權基礎。在 Borak 案中，本院認爲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a 項中可引申出一損害賠償請求權基礎，此請求權得由因違反第十四條 a 項之不實委託書招募行爲受到損害的股東主張。SIPC 與受託人強調 Borak 案中對於證券交易法的救濟目的與該法第二十七條（該法賦予

聯邦地方法院，就違反該法與其他相關法規之行爲，有專屬審判權）的討論，[5] 主張 Touche Ross 既然違反了第十七條 a 項及相關法規所課予之義務，聯邦法院便應該針對違反義務之行爲提供受害者損害賠償救濟途徑。

SIPC 與受託人援引第二十七條實屬錯誤。第二十七條賦予聯邦法院審判權，並規定管轄地與送達程序，惟條文本身並沒有創設任何請求權基礎，亦未課予任何人任何義務。如果原告所主張之權利來源確實存在，其必須自證券交易法實體規定中得出，而非自規定審判權或管轄權之條文中得出。本院於 Borak 案中雖自第十四條 a 項引申出請求權基礎，但我們傾向不將該判決作擴張解釋，尤其反對將之擴張到幾乎得自所有證券相關法規中的每一條文引申出私法請求權基礎。

SIPC 與受託人援引證券交易法之救濟目的爲其主張之依據同樣不妥。本院已強調僅泛言證券交易法之救濟目的，並不足以說服我們將一個條文作「廣於語言與規範體系之合理允許範圍」的解釋。而僅以第十七條 a 項係爲保護證券經紀商之顧客所設爲由，並不足以導出得由該條引申出一私法請求權基礎的結論。針對我們於本案之分析與 Borak 案不同之處，可解釋爲自從 Borak 案以後，我們在一系列的案件中，就私法請求權基礎的引申乙事，採取了一個較以往嚴格的標準，而在本案中亦然。本案最終要解決的問題爲國會意圖，而非本院是否認爲自己能使國會制定的規範體系更加完善。

SIPC 與受託人宣稱我們這樣的結論是不正義的。但即使如此，其主張係提出在錯誤的場域，因爲我們並非可以恣意立法。如果在本案的情形下應該存有一損害賠償請求權，那國會就必須如是規定。「我們並不能填補國會所留下的縫隙。」本院之決定顯然並未阻止國會爲因第十七條 a 項報告中不實陳述受到損害的證券經紀商顧客，創立一私法請求權基礎，但國會如意欲這些顧客享有此聯邦法

[5] 第二十七條（15 U.S.C. 78aa ）規定：

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及其他受美國聯邦法院管轄之地區之聯邦法院，對於違反本章或相關法規之行為，與所有主張金錢損害賠償或請求債務人為一定行為之訴訟，有專屬審判權。刑事訴訟得於違法行為發生地之法院提起。依據本章或相關法規請求損害賠償或申請禁制令禁止違法行為之訴訟，得於被告所在地、住所地、或從事交易地之法院提起，而得於被告之住所地或所在地送達。（下略）

請求權，其應十分明白要如何去落實這個想法。

上訴法院之判決廢棄並發回更審。

大法官 Brennan 之協同意見書

本席同意多數意見的決定。上訴法院自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引申出被上訴人得代表破產證券經紀商之顧客向上訴人 Touche Ross 請求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惟根據本院過去判決所建立之原則，第十七條 a 項並不應引申出任何請求權基礎。雖然 Cort v. Ash 案中的分析與本案有重疊之處，本席同意多數意見的看法，認爲當法條並未明白「創設原告得主張之聯邦法權利」，亦即當原告「並非法條所意欲保護之對象時」，且當立法歷史中並未「記載任何明示或暗示創設該救濟方法之立法意旨」時，Cort 案中所列舉之其他兩個要件並不能獨立成爲引申出請求權基礎之依據。

大法官 Marshall 之不同意見書

在決定得否自一未明白賦予救濟方法之法條中，引申出私法請求權基礎時，本院一向考量四個要件：

「第一、原告是否爲該法條所欲保護的對象？亦即法條有無創設出一得由原告主張之聯邦法權利？第二、立法意旨是否明示或暗示創設救濟方法或否認救濟方法之存在？第三、自法條引申出原告得主張之救濟方法是否符合立法規範之目的？最後，此請求權基礎是否傳統上認爲屬於州法規範的範圍、或屬於州必須考量的事件，而致使基於聯邦法引申出請求權基礎並不適當？」

考量這些因素，本席認爲本案被上訴人應有權對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 a 項之會計師提起訴訟。

被上訴人既係以證券經紀商顧客之名義提起救濟，我們首應討論這些顧客是否爲規範體系下意欲保護的對象。依據第十七條 a 項，經紀商必須編送「證券交易委員會依法認定爲保護投資者所必須的報告」。而基於此條之規定，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經紀商提供財務報告，並透過獨立的會計師確認該報告。如同委員會所一再強調地，這些規定之目的在於使規範者得以「監督經紀商之財務健全狀況，並防止顧客因存放現金或證券於經紀商或自營商處而受到損害。」另，於本案事實發生期間，政府頒布了行政命令，要求經紀商告知顧客其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是否曾揭露經紀商財務處理程序之

任何重大缺失。故經紀商顧客爲行政命令之保護對象應無庸置疑，符合了 Cort v. Ash 案的第一個要件。

至於 Cort 案中的第二個要件，立法歷史中並未明白提及第十七條是否賦予損害賠償請求權，然而多數意見卻從規範體系中導出拒絕賦予私法請求權的立法意旨。本院僅因證券交易法中非與本案相關的條款就違反條文的情形明白賦予請求權基礎，便認爲國會如果有意在第十七條中賦予請求權，亦會予以明文規定。但正如我們最近在 Cannon v. University of Chicago, 441 U.S. 677, 711 （1979）所表示意見：「即使在一個複雜的規範體系底下，有其他的條文明文賦予救濟方法，亦不能持此爲充分的理由拒絕自不同條文中引申出一適當的救濟方法」。此外本院亦從證券交易法第十七條與第十八條的相互關係臆測國會立法的意旨。第十八條 a 項就編送委員會報告中之不實陳述，明白賦予救濟方法，但亦規定該救濟方法僅適用於證券之買賣者，且僅限於其所買賣之證券價格受到不實陳述影響之情況。由此規定，多數意見認爲我們不應該自第十七條中引申出容許更多主張的請求權，然而，第十八條與在證券交易行爲中受損害的投資者有關，而第十七條則與可能因經紀商破產而受損害之顧客有關。基於不同的關注焦點，第十八條不會對違反第十七條情形所得提起之救濟方法作出任何限制；而既然對於經紀商之財務狀況作不實報告並不會影響經紀商顧客持有之證券的價格，第十八條自然亦不會提供這些人任何的救濟。本席並不願意假設「國會欲保護一群人，但卻又同時剝奪其所享有的保護」。

在本案，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存在符合立法體系的目的。由於委員會缺乏資源去監督所有經紀商編送的文件，其必須依賴會計師的查核認證。自第十七條引申出私法請求權基礎不但能幫助委員會落實其職責，也使會計師能夠盡責地執行其認證的任務。

最後，落實證券交易法編送報告的系統傳統上並非屬於州之事務，而是與聯邦法規息息相關。且如同上訴法院之意見，既然經紀商破產所造成的問題是全國性的，管理財務公開的標準也必須是全國一致的。

簡而言之，直接適用 Cort 案中所列舉之四個要件，會得出維持原判決的結論。因爲本院錯誤地適用此判決前例，並忽略第十七條明顯的立法目的，本席謹呈不同意見如上。

40. Chiarella v. U.S.

445 U.S. 222（1980）

黃偉峯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儘管法條用語及立法理由並未特別指出未揭露行為之合法性，行政及司法機關已作出相關解釋，確立有關買賣證券等行為所生之沉默，得依證券交易法第 10（b）條之規定，構成可起訴之詐欺。惟該責任係以交易當事人間之信賴及保密關係所生之揭露義務為前提，例如公司內部人對其公司股東之揭露義務。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have established that silenc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securities may operate as a fraud actionable under 10（b） despite the absence of statutory language or legislative history specifically addressing the legality of nondisclosure. However, such liability is premised upon a duty to disclose （such as that of a corporate insider to shareholder of his corporation）[445 U.S. 222,223] arising from a 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confidence between parties to a transaction.）.

2. 關於收購公司之計畫，上訴人並無揭露資訊之積極義務。其非公司內部人，且未由目標公司收受機密資訊。因其與出售目標公司股票之出賣人間事前並無交易行為，既非出賣人之代理人、亦非對出賣人負有忠實執行業務義務之人、亦非與出賣人有信賴及保密關係之人，故上訴人與出賣人間不生任何義務。單純持有非公開之市場資訊並不生第 10（b）條之揭露義務。

   （Petitioner had no affirmative duty to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as to the plans of the acquiring companies. He was not a corporate insider, and he received no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rom the target companies.

Nor could any duty arise from petitioner'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ellers of the target companies' securities, for he had no prior dealings with them, was not their agent, was not a fiduciary, and was not a person in whom the sellers had placed their trust and confidence. A duty to disclose under 10 （b） does not arise from the mere possession of nonpublic market information.）

3. 因擇一理論（alternative theory）並未向陪審團提出，本院無須判斷該理論是否支持上訴人違反對收購公司之義務係有罪之理由。陪審團之判斷顯示，其僅因上訴人未揭露非公開之資訊予出售目標公司之出賣人，即認定上訴人有罪。因擇一理論未向陪審團提出，故無法基於該理論而維持有罪判決。

（This Court need not decide whether petitioner's conviction can be supported on the alternative theory that he breached a duty to the acquiring corporation, since such theory was not submitted to the jury. The jury instructions demonstrate that petitioner was convicted merely because of is failure to disclose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to sellers from whom he bought the stock of target corporations. The conviction cannot be affirmed on the basis of a theory not presented to the jury.）

關 鍵 詞

manipulative（操控）；defraud（詐欺）；security（證券）；insider（內部人）；insider trading（內線交易）；mere possession（單純持有）；fiduciary（忠實執行業務義務）；silence（沉默）；catchall clause（概括條款）；harmless-error doctrine（不影響判決之錯誤之理論）；misappropriate（濫用）；tip（機密消息）；warehousing（倉庫效應）；caveat emptor（買受人自負瑕疵結果、貨物既出概不退換）；inherently unfair（本質上不公平）。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Powell 主筆撰寫）

事　實

1934 年之證券交易法第 10(b) 條規定，“有關買賣任何證券之行爲”禁止使用“違反證券交易委員會所定規則之任何操控、詐欺或詭計”，依據第 10（b）條規定，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制定第 10b-5 條規則：“有關買賣任何證券之行爲”，任何人（any person）“利用任何（any）計策、計畫或詭計去詐欺”或“參與任何構成或可能構成詐欺或欺騙他人之任何（any）行動、實行行爲或商業行爲”係違法的。上訴人 Chiarella 受僱於財務印刷公司，該公司受託爲特定公司印刷收購標單。上訴人藉由收購公司交付給印刷公司之文件中之資訊，推測出目標公司之名稱後，未揭露其所知悉之資訊而購買目標公司之股票，並於該收購資訊公開後立即拋售股票。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其交易活動後，上訴人與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協議，返還利益予出售前開股票之出賣人。其後上訴人被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10（b）條及其規則 10b-5 起訴並判有罪。聯邦地方法院之指示，允許陪審團於認定上訴人知悉即將發生之收購計畫將使目標公司之股票更有價值而故意不告知出賣人時，得認定上訴人有罪。聯邦上訴法院維持原判。

判　決

原判決應予廢棄。

理　由

本案之爭點在於，某一人由他公司機密文件中了解該公司計畫取得另一公司控制權，若該人未於購買目標公司股票前向出賣人揭露即將發生之收購計畫，是否違反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0（b）條。

I

上訴人係印刷工人，於 1975 年及 1976 年在 Pandick Press 財務印刷公司擔任檢查員（markup man）。上訴人處理的文件中有五家匿名公司之收購標單。當這些文件交給印刷公司時，收購公司和目標公司之名稱皆係空白或假名，實際的名稱在完成印刷前最後一晚才送交印刷公司。

然而，在完成印刷前，上訴人可由文件中之其他資訊推論出目

標公司之名稱。上訴人未揭露其知悉之資訊予出賣人而購買目標公司之股票，並於收購消息公開後立即出售該股票[1]。藉由這種方法，上訴人在十四個月內輕易獲得超過三萬元之利益。證券交易委員會遂開始調查其交易活動。於 1977 年五月，上訴人與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協議，返還所得利益予出售前開股票之人[2]。同時間，上訴人遭 Pandick Press 公司解雇。

1978 年一月，上訴人之十七項行爲被控告違法 1934 年證券交易法及 SEC 第 10b-5 條規則[3]。上訴人未獲不起訴[4]，所有行爲皆被起訴並判有罪。

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判（588 F.2d 1358 （1978））。本院認爲上訴有理由（441 U.S. 942 （1979）），廢棄原判決。

II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0（b）條規定，“有關買賣任何證券之行爲”禁止使用“違反證券交易委員會所定規則之任何操控、詐欺或詭計”。”依據該條規定，證券交易委員會就相關事項制定第 10b-5 條規則[5]：“直接或間接，藉由使用州際貿易之任何方法或手段，或任何郵件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設施而爲下列行爲者，係屬違法…（a）利用任何計策、計畫或詭計去詐欺…，或（c）有關買賣任何證券之行爲，參與任何構成或可能構成詐欺或欺騙他人之任何行動、實行行爲或商業行爲。

本案爭點在於上訴人沉默之法律效果。聯邦地方法院之指示，允許陪審團於認定上訴人知悉即將發生之收購計畫將使目標公司之股票更有價值而故意不告知出賣人時，得認定上訴人有罪[6]。爲決定該情況下之沉默是否違反第 10（b）條，須檢視該條用語、立法

---

[1] 五項交易中，四項涉及股份收購，一項涉及合併。

[2] SEC v. Chiarella. No.77 Civ. Action No. 2534 (GLG) (SDNY May 24, 1977)

[3]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32 (a)條規定，故意違反 Act. 15 U.S.C. 78ff(a) (1976 ed., Supp. II)法案者，處以罰金。上訴人因收到十七張確認買股票之信函，故該十七項行為被控違反前開法案。

[4] 450 F. Supp. 95 (SDNY 1978).

[5] 僅第 10b-5(a) 及 (c)規則 是本案爭點。依第 10b-5(a)規則所示，為確保陳述不致產生誤導，就重要事實為不實陳述或隱匿、遺漏者，構成違法行為。17 CFR 240. 10b-5(b) (1979)。基於該規定而起訴之部分被駁回，因為上訴人就購買股票之事，根本未為任何陳述。

[6] 審判筆錄 682-683,686.

理由，及證券交易委員會與聯邦法院之解釋。

儘管本院先審查法條用語（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 425 U.S. 185, 197 （1976)），但是第 10（b）條並未規定，沉默是否可能構成操控或詐欺行爲。第 10（b）條係以概括條款之立法方式預防詐欺行爲。425 U.S., at 202, 206.但立法理由或法條本身皆未就解答本案提供特定之指引。1942 年制定第 10b-5 條規則時，證券交易委員會並未討論不提供資訊是否有違背第 10（b）條規定之可能性[7]。

證券交易委員會在第 10（b）條之發展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其認爲交易經紀人及其公司於出售股票時，若自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處（兼爲股票經紀公司之代表人）獲得資訊卻未揭露者，即違反該條規定。在 Candy, Roberts & Co.案中，證券交易委員會認爲，除非公司內部人事先揭露所知悉之所有重要的內部資訊外，應禁止其買賣該公司之股票。該揭露或禁止之義務係基於：

“揭露資訊之積極義務，傳統上係加諸於公司內部人，尤其是經理人、董事或對公司有控制權之股東。本院一致認爲內部人必須揭露其職務上所知悉但其他交易相對人不知且會影響投資決策之重要事實。”

證券交易委員會強調產生揭露義務係因：（1）有特定關係可取得僅爲公司目的始可獲得之內部資訊，（2）公司內部人利用未揭露之資訊爲交易係不公平的[8]。

公司內部人與公司股東間之關係會產生揭露義務並非法律之非常態。依普通法規定，以誘使信賴爲目的而爲之不實陳述即屬詐欺。但未於交易完成前揭露重要資訊，僅限於當事人有揭露義務時，始構成詐欺行爲。此外，因當事人間有忠實執行業務義務、或其他類似信賴、保密關係，致他方當事人有權知悉一方當事人之資訊時，即

[7] SEC 證券交易法第 3230 號解釋 (May 21, 1942), 7 Fed. Reg. 3804 (1942).

[8] Cady, Roberts 案中，交易經紀人依第 10(b)條規定應負責任，因其自發行股票公司之內部人處，收受非公開之資訊。內部人不得使用該資訊，內部人若兼為股票經紀公司之合夥人亦不得使用之。Cady, Roberts 案中涉及出賣股票予原非會成為公司股東之人。（40 S. E. C., at 913, and n. 21）。證券交易委員會同意判決之理由，即“董事或經理人對該交易之買方負有忠實執行業務義務。雖然董事或經理人僅於買方成為公司股東後，始負忠實執行業務義務，仍不應允許董事或經理人利用職務優勢去引誘買方成為公司股東。” 914, n. 23, quoting Gratz v. Claughton, 187 F. 2d 46, 49 (CA2), cert. denied, 341 U.S. 920 (1951).

生揭露義務[9]。在 Candy, Roberts & Co.案中，證券交易委員會認爲藉由公司職位獲得機密資訊之公司內部人與公司股東間具有信賴或保密關係[10]。該關係產生揭露義務，因爲有必要禁止公司內部人不當欺騙未獲通知之小股東。（Speed v. Transamerica Corp., 99 F. Supp. 808, 829 （Del. 1951））

聯邦法院認爲（參見證券交易委員會控告 Texas Gulf Sulphur 公司之案例），公司內部人爲個人利益使用未揭露之資訊，係違反第 10（b）條。（E. g., SEC v. Texas Gulf Sulphur Co., 401 F.2d 833 （CA2 1968）, cert. denied, 404 U.S. 1005 （1971）.）。該案強調，依據普通法規則，“起訴當事人未揭露市場資訊，須因其有義務揭露之”。（ Frigitemp Corp. v. Financial Dynamics Fund, Inc., 524 F.2d 275, 282 （CA2 1975）.）。因此，應認爲股票之買方對賣方並無義務揭露重要資訊，因買方非公司內部人，亦非對賣方負有忠實執行業務義務之人。（General Time Corp. v. Talley Industries, Inc., 403 F.2d 159, 164 （CA2 1968）, cert. denied, 393 U.S. 1026 （1969）.）[11]

本院與 Affiliated Ute Citizen

---

[9] 重申侵權行為法第 551(2)(a) (1976). 參 James & Gray, 不實說明, Part II, 37 Md. L. Rev. 488, 523-527 (1978). 關於證券交易，美國律師協會認為，有義務說明卻沉默時，可構成詐欺行為。ALI, Federal Securities Code 262 (b) (Prop. Off. Draft 1978).

[10] 參 3 W. Fletcher, Cyclopedia of the Law of Private Corporations 838 (rev. 1975)；3A id., 1168.2 1171, 1174； 3 L. Loss, Securities Regulation 1446-1448 (2d ed. 1961): 6 id., at 3557-3558 (1969 Supp.). 另參 Brophy v. Cities Service Co., 31 Del. Ch. 241, 70 A. 2d 5 (1949). 另參 generally Note, Rule 10b-5: Elements of a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43 N. Y. U. L. Rev. 541, 552-553, and n. 71 (1968); 75 Harv. L. Rev. 1449, 1450 (1962); Daum & Phillips, The Implications of Cady, Roberts, 17 Bus. L. 939, 945 (1962).

大法官 BLACKMUN 不同意見書中建議，當一方當事人較他方當事人獲有資訊優勢時，“特殊事實原則”（special facts doctrine）可適用於沉默構成詐欺行為之認定，但法院未採此說。於 Strong V. Repide 案中（Strong v. Repide, 213 U.S. 419, 431 -434 (1909)），該法院適用特殊真相原則以得出公司內部人對股東有揭露義務之結論。該案例中，公司多數股東秘密地向其他股東購買股票，但未揭露公司在公司內部人之指示下將出售資產且股價將大幅上漲之消息。Strong V. Repide 案係以公司內部人與股東間具有忠實執行業務義務之前提而作成判決。（另參 Pepper v. Litton, 308 U.S. 295, 307 , n. 15 (1939)）

[11] 參 SEC v. Great American Industries, Inc., 407 F.2d 453, 460 (CA2 1968), cert. denied, 395 U.S. 920 (1969); Kohler v. Kohler Co., 319 F.2d 634, 637-638 (CA7 1963); Note, 43 N. Y. U. L. Rev., supra n. 10, at 554; Note, The Regulation of Corporate Tender Offers Under Federal Securities Law: A New Challenge for Rule 10b-5, 33 U. Chi. L. Rev. 359, 373-374 (1966). See generally Note, Civil Liability under Rule X-10b-5, 42 Va. L. Rev. 537, 554-561 (1956).

案亦持相同見解（Affiliated Ute Citizens v. United States, 406 U.S. 128 （1972））。一群印地安人設立一間公司以管理部落公同財產，該公司發行股票予其印地安人股東且指定一家當地銀行作爲股務代理人。因公司資產具投機性及股份實際價值計算之困難性，公司要求銀行向股東強調股份保留之重要性。銀行的二位副理幫助股東處分其股票，該副理知悉股票係分別在二個市場中交易，一爲印地安人透過銀行出售給非印地安人之主要市場，另一爲非印地安人所組成之零售市場。印地安人賣方控告副理違反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因副理未通知賣方，在零售市場盛行著較高之售價。法院認爲若銀行僅單純擔任股務代理人者，並無揭露義務。但銀行也同時擔任股東之代理人，且出售股份時印地安人賣方信任該銀行人員。因銀行之經理人被控對股東有責任，故經理人未告知股東有更有利之非印地安人市場存在時，即不得自爲市場創造者去引誘印地安人出售股票。

因此，儘管法條用語及立法理由並未特別指出未揭露行爲之合法性，行政及司法機關已作出相關解釋，確立有關買賣證券等行爲所生之沉默，得依證券交易法第 10（b）條之規定，構成可起訴之詐欺。惟該責任係以交易當事人間之信賴及保密關係所生之揭露義務爲前提。公司內部人有義務將股東之利益置於其私人利益之前，交易前之揭露義務在確保公司內部人不會藉由詐欺性使用重要非公開之資訊以謀取私人利益 [12]。

III

本案，上訴人被認爲違反第 10（b）條，雖然其非公司內部人且未由目標公司取得機密資訊；甚者，上訴人取得之市場資訊僅係收購公司之計畫，與目標公司之獲利能力或營運並無關係 [13]。本院認

[12] 自公司內部人獲悉機密資訊之人（Tippees），被認為負有第 10(b)條之義務，因其負有不使用明知為機密，及明知或可得而知來自公司內部人之資訊以謀取利益之義務。（Shapiro v. 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 & Smith, Inc., 495 F.2d 228, 237-238 (CA2 1974)）。公司內部人違反忠實執行業務義務後，接受機密資訊之人（Tippees）即被認為屬參與者，即負有上述義務。（Subcommittees of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ection of Corporation, Banking, and Business Law, Comment Letter on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Oct. 15, 1973), reprinted in BNA, Securities Regulation & Law Report No. 233, pp. D-1, D-2 (Jan. 2, 1974).）

[13] 參 Fleischer, Mundheim, & Murphy, An Initial Inquiry in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Disclose Market Information, 121 U. Pa. L. Rev. 798, 799 (1973).

爲，除非上訴人於交易前有積極之揭露義務，上訴人使用該資訊依第10（b）條規定應非屬詐欺行爲。以本案而言，聯邦下級法院未對陪審團就該積極揭露義務之明確性作說明。事實上，聯邦地方法院指示陪審團，上訴人對任何人、對整體市場之所有賣方皆有揭露義務。陪審團僅單純的被告知去確定“當上訴人了解股票交易市場上之其他人無法取得相同之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時”，是否使用該資訊。

聯邦上訴法院以“任何人無論其是否爲公司內部人，只要是定期收受重大之非公開資訊，不得於無負積極的揭露義務時，使用該資訊以買賣股票”爲由，維持原判。雖然聯邦上訴法院表示，其審查之範圍僅侷限於定期收受重大之非公開資訊之人，惟該限制之理由與揭露義務之存在與否並無關係[14]。聯邦上訴法院如同聯邦地方法院般，未確認上訴人與賣方間之關係是否可能產生揭露義務。聯邦上訴法院作成判決僅因其認爲，聯邦證券交易法係爲“建立一個可提供平等取得資訊管道之制度，以使合理且明智之投資決定能據以作成”。其認爲，任何人使用非一般人可取得之重要資訊即構成詐欺，因爲該資訊使特定之買方或賣方較未受通知之買方或賣方獲有不公平之優勢。

聯邦上訴法院之理由有兩點瑕疵。首先，非任何財務不公平之例子皆構成第10（b）條規定之詐欺行爲（Santa Fe Industries, Inc. v. Green, 430 U.S. 462, 474 -477（1977）.）；其次，本案欠缺該“揭露”之義務。因上訴人與出售目標公司股票之出賣人間事前並無交易行爲，故上訴人與出賣人間之關係

[14] 聯邦上訴法院認為，“取得市場資訊之一般管道”之檢驗方式，將建立有用之法則以採納“在市場中佔有策略地位之人”之說法（588 F.2d, at 1365.）。惟這些考量是不足以支持上訴人應負揭露義務。揭露義務係出於當事人間之關係（參前揭註9, 10,及 [445 U.S. 222, 232]上下文），非僅單純因市場地位獲得之收購資訊即負有責任。

聯邦上訴法院亦認為，收購公司係為股份收購之要約人，其創造而非收受資訊，並承擔收購失敗之實質經濟風險，故不得成為市場之內部人（588 F.2d, at 1366-1367）。再者，聯邦上訴法院亦未適當地說明上訴人具有揭露義務。聯邦上訴法院曾與本院之分析一致，亦認為股份收購人若於事前宣布收購計畫者，因收購人與賣方間無關係存在，故收購人不違反第10(b)條之規定。

“本院認為法律並未規定，非內部人且非賣方所信賴之股份收購人，對可能提高賣價或終止收購之資訊負揭露義務。”（General Time Corp. v. Talley Industries, Inc., 403 F.2d 159, 164 (1968), cert. denied, 393 U.S. 1026 (1969).）

不生任何義務。上訴人非出賣人之代理人、非對出賣人負有忠實執行業務義務之人、亦非與出賣人有信賴及保密關係之人。事實上，上訴人完全是一個在客觀交易市場上與出賣人交易之陌生人。

未認可在交易市場上之所有參與者間，就重大之非公開資訊負有一般義務去停止交易前，本院無法維持上訴人之有罪判決。無明確證據以確定立法者之意圖者，不應建構廣泛之義務。建構廣泛之義務形同背離當事人間須有特定關係始生義務之原則。

因本院於第 10（b）條用語或立法理由中未發現任何建構廣泛義務之證據，且國會（即立法院）或證券交易委員皆未採用資訊平等原則（parity-of-information rule）；相反地，濫用市場資訊引發之問題，已藉由詳細、複雜的規範，以認可當使用該市場資訊時，不會危害證券市場之運作。例如，威廉法案（Williams Act）[15] 限制但未完全禁止股份收購之要約人於收購消息公開前收購目標公司之股票。國會於此及其他領域[16] 之謹慎行事，與本院於本案被要求採取之擴張責任之原則係相反的，有些地方更呈緊張關係。

確實，支持上訴人被定罪之理論有別於證券交易委員會就第 10（b）條之看法，其看法爲第 10（b）條之適用係針對賣方與上訴人之購買行爲，具有相同效果之活動。一公司事先對機構投資人告知其公開收購目標公司股份之意圖時，將產生“倉庫效應（Warehousing）”，此時，機構投資人可在收購消息公開及股票價格飆漲之前購買目標公司之股票[17]。本案如同倉庫效應般，買方基於賣方所不知之市場資訊購買目標公司之股票。於以上兩種情況下，若賣方知悉非公開之資訊者，則可能改變其行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認可依第 10（b）條所爲之行爲會依些微不同之理論（somewhat different theory）解決，而非如以前般習於將內線交易視爲詐欺行爲後，證券交易委員會依管理公開收購[18] 之職權，禁止倉

[15] Title 15 U.S.C. 78m (d) (1) (1976 ed., Supp. II)，允許股份收購人於揭露收購計畫前，購買目標公司之 5%之股票。

[16]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1 條規定，原則禁止。

[17] Fleischer, Mundheim, & Murphy, 前揭註 13, at 811-812.

[18] 1 SE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Study Report, H. R. Doc. No. 92-64, pt. 1, p. xxxii (1971).

庫效應之適用。[19]

本院於本案中並未發見有適用上述新的、不同的責任理論之基礎。如同本院以前所強調，1934 年證券交易法不得作出“比法條用語及法律體系所合理許可更廣泛”之解釋（Touche Ross & Co. v. Redington, 442 U.S. 560, 578（1979）, quoting SEC v. Sloan, 436 U.S. 103, 116（1978）.）。第 10（b）條被巧妙地描述爲概括規定，但仍須限於詐欺行爲。當一行爲被控係未揭露資訊之詐欺行爲時，若無揭露義務者，即非詐欺行爲。本院認爲，僅單純持有非公開之市場資訊不生第 10（b）條之揭露義務。反對說並未獲得第 10（b）條立法理由之支持，且違反立法院規範證券市場之謹愼規畫（Cf. Santa Fe Industries, Inc. v. Green, 430 U.S., at 479 .）[20]。

IV

美國政府提出擇一理論（alternative theory）以支持上訴人有罪，其主張當上訴人因擔任收購公司聘僱之印刷公司之受僱人而擁有職務優勢去取得資訊並進而爲交易時，即違反對收購公司應盡之義務。違反上述義務依第 10（b）條規定，對收購公司及賣方即構成詐欺。

本院無須決定擇一理論是否可採，因該理論並未向陪審團提出。陪審團被告知，依據第 10b-5 規則之用語，若認爲上訴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上訴人即有罪：（1）利用任何計策、計畫或詭計去詐欺；或（2）參與任何構成或可能構成詐欺或欺騙他人之任何行動、實行行爲或商業行爲。聯邦地方法院認爲“詐欺計畫”係指藉由詐欺或欺騙

---

[19] SEC Proposed Rule 240.14e-3, 44 Fed. Reg. 70352-70355, 70359 (1979).

[20] BLACKMUN 大法官不同意見書中，對違反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應負民刑事責任，提供下列判斷標準：擁有取得他人無法合法取得之機密、重要資訊管道之人，原則上應禁止其利用資訊優勢去買賣受影響之證券。

BLACKMUN 之觀點與聯邦上訴法院之理論實質上並無不同，聯邦上訴法院認為定期收受重大之非公開資訊之任何人，若未負起積極揭露義務，不得使用該資訊去買賣股票（588 F.2d, at 1365）。依理由 III 所述，不應採該見解。此外，有法院認為，依第 10(b)條規定，若禁止特定之不明確行為者，將造成民刑事被告是否應被充分告知其涉及不法行為之問題。（Cf. Grayned v. City of Rockford, 408 U.S. 104, 108 -109 (1972).）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顯然是依第 10(b)條未揭露之規定，科處買方刑事責任之第一個案例。上訴人被處一年有期徒刑，暫停交易一月，緩刑五年。（588 F.2d, at 1373, 1378 (Meskill, J., dissenting).）

以獲取金錢之計畫，並認爲“Chiarella 未揭露與購買股票有關之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即構成欺騙”。因此，陪審團被指示，“若 Chiarella 未揭露與購買股票有關之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 即屬有計畫之詐欺行爲。

另一方面，陪審團被指示，“若 Chiarella 被指控之購買股票卻未揭露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將對或已對賣方產生如同詐欺之效果”。聯邦地方法院之法官之前已表示，詐欺“包含靈活之人可利用之所有手段、方法，及個人藉由錯誤之不實陳述、建議，或隱瞞事實而由他人獲取利益之所有手段、方法”。

依陪審團之判斷顯示，上訴人僅因未揭露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予出賣目標公司股票之賣方即被認爲有罪。上訴人對賣方以外之人應負揭露義務之性質或要素，陪審團並未受指示。因本院無法基於未向陪審團提出之理論而認定上訴人有罪，所以本院毋庸審酌是否存在該揭露義務、是否違反揭露義務、或違反揭露義務是否觸犯第 10（b）條[21]。

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應予廢棄。

大法官 Stevens 之協同意見書

違反第 10b-5 條規則科處民刑事責任之前，有必要指出被告違反了何種義務。有爭論地，當上訴人於公開市場購買證券時，其是否已違反（a）對出賣目標公司股票之出賣人應負之揭露義務且，（b）對收購公司應負之沉默義務。筆者同意本院有關上訴人對賣方無揭露義務之見解，及有罪判斷係基於上訴人對賣方負有義務之錯誤假設之見解。因此，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應予廢棄。

本院就第二個問題並未有任

[21] 首席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僅係依據陪審團判斷中所稱，上訴人於印刷公司中擔任負有保密義務之職位（confidential position），即爭執陪審團已受有“濫用非公開資訊之人即有揭露資訊或禁止交易之積極義務”理論之適當指示。首席大法官依據本文所作之論點，並未向陪審團說明上訴人對其雇主或收購公司所負義務之性質及範圍（若有義務的話），亦未說明濫用行為之侵權行為要素。陪審團之判斷亦未指出負有保密義務之職位是上訴人違法行為的必要要素。因此，本院不認為 “濫用理論”是被陪審團指示中所涵蓋的。
縱使陪審團已被指示得因下列情形認定上訴人有罪：(1)未對賣方揭露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或(2)違反對收購公司之義務，本院認為有罪判決亦應被廢棄。若不可能主張被告是否為了非犯罪行為而已受罰，本院即無法維持有罪判決。（United States v. Gallagher, 576 F.2d 1028, 1046 (CA3 1978); see Leary v. United States, 395 U.S. 6, 31 -32 (1969); Stromberg v. California, 283 U.S. 359, 369 -370 (1931).）

何之說明係正確的，上訴人是否違反其沉默之義務（上訴人毫無疑問地對其雇主及雇主之客户負有該義務）係決定其是否構成第 10b-5 條規則之刑事責任。肯否兩說皆可能提出可觀之支持論點。一方面，假如本院假設收購公司交付機密資訊予上訴人雇主，而上訴人違反對收購公司之義務時，上訴人買賣任何股票之行爲構成詐欺或欺騙收購公司之合理之法律爭點可能被提出[22]；另一方面，鑑於收購公司既非目標公司股票之買方亦非賣方，收購公司可能無法由違反第 10b-5 條規則之上訴人處獲得補償，故不違反第 10b-5 條規則之論點亦可能被提出。筆者認爲法院將本爭點留待他日解決是明智的。

筆者僅單純強調一個事實，即本院無須決定上訴人之行爲是否應予許可，亦無須決定類似之行爲在未來是否可能合法。相反地，本院僅須主張，不得以上訴人違反其不應負擔之義務而認定其刑事罪責。

筆者同意本院之意見。

大法官 Brennan 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筆者認爲，本院判決“僅單純持有非公開的市場資訊不生第 10（b）條之揭露義務”係正確的。然而，在作成此主張前，本院認爲，若未違反買賣雙方間忠實執行業務關係所生之義務者，即不違反第 10（b）條。筆者無法同意該見解。相反地，對筆者而言，首席大法官不同意見書中之第 I 部分，似乎正足以說明得適用之法則，亦即不當取得或轉變爲圖利自己之意思而取得非公開資訊，並用以買賣證券者，即違反第 10（b）條規定。

筆者雖同意首席大法官不同意見書中之第 I 部分，但不同意第 II 部分。筆者同意本院多數說之意見，因爲筆者認爲首席大法官所提之法律意見，與提出於陪審團之部分並非同一。就筆者的理解，法院許可陪審團宣告之有罪判決，僅因發現上訴人未揭露有關購買股票之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筆者並未能發現法院曾指示陪審團，有關犯罪構成要件之一爲，以該非公開資訊圖利自己或濫用之。起訴狀中含糊不清的記載，及檢察官於審判開

[22] 參 Eason v. General Motors Acceptance Corp., 490 F.2d 654 (CA7 1973), cert. denied, 416 U.S. 960.。Eason 案之判決不被他案所採，參 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421 U.S. 723 .。然而，因私人行為被科處罰金之回復請求權之限制不適用於 Blue Chip 案，參 Piper v. Chris-Craft Industries, Inc., 430 U.S. 1, 42 , n. 28, 43, n. 30, 47, n. 33.

始及終結時之陳述，皆未爲適當之指示、說明。該瑕疵既非對判決無影響之錯誤，亦非嗣後得推定補正之事項，故該瑕疵無法治癒。事實上，對陪審團未爲適當的指示即維持原判，形同直接認定上訴人係有罪，因此本院無法贊同。

首席大法官 Burger 之不同意見書

筆者認爲陪審團判定本案違反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係正確的。筆者維持有罪判決。

I

原則上，市場上交易行爲之任一當事人對他方並無揭露資訊之義務，除非當事人間具有保密或忠實執行業務義務之關係（W. Prosser, Law of Torts 106 （2d ed. 1955）.）。該原則允許商人利用其經驗及技術以確保及評估相關資訊，以期對努力工作、謹慎分析及敏銳預測提供誘因。但該原則亦強調應限制其範圍。特別是有利資訊之取得非因卓越之經驗、遠見或努力，而係以非法之方法取得時，即不應適用該原則。一評論家 Keeton 指出：「買方取得資訊而對賣方隱瞞，則其取得之方式應屬重大情勢。該資訊之取得可能係出於買方之卓越知識、智慧、技巧或科技性判斷，亦可能僅出於偶然的機會，或侵權行爲。若出於違法行爲所取得之資訊，似乎即應認爲有揭露義務。」（Keeton, Fraud - Concealment and Non- Disclosure, 15 Texas L. Rev. 1, 25-26 （1936））

筆者就第 10（b）及 10b-5 條之規定，歸納出下列原則：濫用非公開資訊之人有揭露該資訊或禁止交易之積極義務。

第 10（b）及 10b-5 條規定之用語清楚地支持上述見解。該條文之用語，涵蓋涉及詐欺陰謀之任何人。其明顯之用語否定了立法意旨有意侷限於內線交易或公司資訊之詐欺行爲[23]。就如同立法者並無意對白領階級之內部人員或藍領階級之人，建立兩套公平交易之標準。第 10（b）及 10b-5 條規定之用語重複使用「任何（any）」已明

[23] 近年來之學術論文，區分反映預期之獲利或資產之「公司資訊（corporate information）」與「市場資訊（market information）」。參 e. g., Fleischer, Mundheim, & Murphy, An Initial Inquiry in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Disclose Market Information, 121 U. Pa. L. Rev. 798, 799 (1973).。由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之用語及立法理由清楚地看出，並無上述區分。參 Brudney, Insiders, Outsiders, and Informational Advantages Under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93 Harv. L. Rev. 322, 329-333 (1979).。

顯表示包含任何人的意思。（Affiliated Ute Citizens v. United States, 406 U.S. 128, 151 （1972）.）

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之立法理由亦支持上述見解。反詐欺條款係以廣義方式立法，以確保證券交易在投資人間係公平且無不當偏袒或不當優勢（H. R. Conf. Rep. No. 94-229, p. 91 （1975）.）。該規定禁止“爲完成無助益功能（no useful function）所爲之操控及詐欺行爲”（ S. Rep. No. 792, 73d Cong., 2d Sess., 6 （1934）.）。濫用非公開資訊而購買證券之人，擁有不當之交易利益；只要是犧牲他人之利益以獲得自己之利益者，其行爲即相當明確地達成無助益功能之目的。

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之解釋並非新的轉變，仍依循證券交易委員會於Cady, Roberts 案中所發布之法律原則。證券交易委員會依據下列兩要素認爲公司內部人應負揭露義務：（1）有接觸資訊之管道，該資訊係爲公司目的而非個人利益始能取得（強調之重點），（2）利用交易相對人無法取得之資訊爲交易，係不公平。當一當事人就由非法手段取得資訊優勢時，上述兩要件即爲浮現[24]。證券交易委員會於 In re Blyth & Co., 43 S. E. C. 1037 案中引用 Cady, Roberts 規則。該案中，交易經紀人藉由聯邦銀行（即美國中央銀行）雇員處獲得之財政部機密資訊去買賣政府債券。證券交易委員會判定該交易係“不當使用內部資訊”，違反第 10（b）條及 10b-5 條規則。證券交易委員會毫不猶豫地將 Cady, Roberts 規則延伸適用於由政府內部人員取得機密消息之人[25]。

最後，證券交易委員會強調其對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之見解不影響合法交易之慣例。因

[24] 參 Financial Analysts Rec., Oct. 7, 1968, pp. 3, 5 (interview with SEC General Counsel Philip A. Loomis, Jr.)，內部消息之必要特徵係指：收受之資訊應予保密，不得作為圖利個人且損害投資大眾之用途；另參 Note, The Government Insider and Rule 10b-5: A New Application for an Expanding Doctrine, 47 S. Cal. L. Rev. 1491, 1498-1502 (1974).

[25] 美國法律協會（ALI）Louis Loss 教授最近負責草擬之聯邦證券交易法中亦發現支持反詐欺條款解釋之論點。ALI 法規彙編中將反詐欺條款解釋為包括「準內部人（quasi-insiders）」，亦即包括法官之法律助理藉由未宣告之判決理由而為交易或政府機關之受僱人藉由機密報告而為交易。參 ALI Federal Securities Code 1603, comment 3 (d), pp. 538-539 (Prop. Off. Draft 1978).。準內部人概念之特徵為，藉由非法且非社會鼓勵之合法經濟活動以獲得資訊優勢。

此，反詐欺條款於股份收購者收購目標公司股票達 5%前之猶豫期間，不要求股份收購者對收購計畫負揭露義務。其亦不禁止倉庫效應（warehousing）。（SE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Study Report, H. R. Doc. No. 92-64, pt. 4, p. 2273 （1971）.）同樣地，市場專家就其每日之市場交易活動中，亦不受限於揭露或限制之義務。這些例子，交易皆根據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而完成，且該資訊並未爲謀取個人利益之目的而非法圖利。

II

筆者以爲，本院之見解仍未解決第 10（b）及 10b-5 條是否禁止濫用非公開資訊爲交易之問題[26]。反而，本院顯然認爲本案之理論並未向聯邦上訴法院之陪審團提出。依本院之見解，上訴法院就不管以何方式取得之非公開資訊而未揭露即爲詐欺行爲之錯誤觀念爲基礎而向陪審團作出其指示。因聯邦上訴法院之錯誤指示爲基礎，陪審團未被指示，上訴人取得之資訊優勢之手段（即違反對收購公司負有之義務）爲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基礎要件。

本院對聯邦上訴法院判決之理解係不當地被限縮。持平而論，審判過程中法院已指示陪審團審查上訴人是否濫用雇主之客户資料以獲取交易利益。陪審團判定“上訴人不當利用其任職 Pandick Press 印刷公司負有保密義務之職位時所取得之資訊，且於上訴人了解股票交易市場之其他人無法取得相同資訊且該資訊對股價影響係重大時，秘密地使用該資訊。”該段用語與起訴書相同，且陪審團於審議時已有該起訴書，因此陪審團判定上訴人交易時“未揭露受僱時所取得之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檢察官於陳述起訴要旨時，亦對陪審團明確強調上述情形。於檢察官陳述：“總之，起訴被告之部分爲其不當使用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以謀取個人利益；及利用其受信任之職位，且被告明知該行爲係不當。本案事實如上，且案情就是如此簡單。”後，筆者認爲，任何陪審員皆不致誤會本案之情形。甚者，有經驗的

[26] 本院之意見中，有部份用語表示僅“上訴人與賣方間之關係可產生揭露義務”。然而，法院之意見應有許多的限制，亦即單純持有重大之非公開之資訊不足以產生揭露或限制交易之義務。因此，筆者認為法院並未否決先前之觀點，亦即濫用非公開資訊之行為產生揭露或限制交易之積極義務。

上訴人之律師亦未對此部分有任何異議，也未反駁對陪審團之指示有任何不足之處。

不管如何，即使假設法院對陪審團就未對上訴人濫用部分之指示做精確且充分告知，就本案證據顯示，就合理懷疑之理論而言，該缺失並不會影響本案判決。查，上訴人已自承藉由解讀雇主客户交付給雇主之機密、重要資訊，以取得資訊優勢。且承認交易所依據之資訊係機密，不得用於謀取個人利益。對筆者而言，依據上訴人之自白，殊難想像不充分的指示可能影響陪審團作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Chapman v. California, 386 U.S. 18, 23 （1967）.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 Park, 421 U.S. 658, 673 -676 （1975）.）。此參上訴人之辯護律師之下述結辯亦可得知，“首先，Chiarella（即上訴人）供稱「我使用我工作時取得之線索，我研究並解讀這些不同的文件並用以購買股票。」這是毫無疑問，毋庸爭辯的。他承認了，這沒什麼神秘可言。”

本院審理時，辯護人亦承認“我們不爭執 Chiarella（即上訴人）違反身爲收購公司代理人不得爲個人利益而使用機密資訊之義務”，並於答辯狀中重述之。 這些陳述相當於正式承認上訴人的資訊優勢係非法取得。此外，成文法規定有關犯罪必要構成要件之自認即可被陪審團認定爲已經明確證明之事實。（8 J. Wigmore, Evidence 2590 （McNaughton rev. 1961）; United States v. Houston, 547 F.2d 104 （CA9 1976）.）

總之，證據毫無疑問地顯示，在印刷廠警示下工作的上訴人，竊取並濫用交付給他並應極度保密之珍貴非公開資訊。被告隨後即利用非法取得之資訊優勢於市場上購買證券。筆者認爲該行爲明顯違反第 10（b）條及 10b-5 條規則。因此，筆者維持聯邦上訴法院之判決。

大法官 Blackmun 主筆，大法官 Marshall 連署之不同意見書

雖然筆者同意首席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第 I 部分中大部分之理由。但筆者認爲毋須依濫用理論（misappropriation theory）以認定上訴之人罪責，故另擬不同意見書。上訴人竊取（purloined）【或首席大法官所稱之 “竊取”（stole）】預計收購股票者之資訊是上訴人構成詐欺罪責的最戲劇性證據。上訴人坦承認錯，且上訴人及其印刷廠之同事曾被雇主特別警告此種行爲係不當且被禁止的。縱使上訴人在進行圖利計畫前已獲得雇主

之委託人的同意，筆者亦認爲上訴人的詐欺行爲係屬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0（b）條及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則第 10b-5 條規範之範圍。筆者認爲上訴人操控交易之獨特行爲，無論有無獲得雇主之委託人的同意，皆屬證券交易法所欲禁止的行爲之核心。

本院並於最近的判決中尋求支持之理由，試圖將第 10（b）條由概括規定轉變爲少數使投資新手於投資股票時無不必要風險之不當行爲。（e.g., 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 案，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案）。在法律並未明文規範應負揭露義務或禁止藉由重大之非公開資訊爲交易之前，本案已透過不合理要求須具有類似忠實執行業務義務之特別關係而實現上述限制[27]。本院承認法條用語或立法理由並未授權作成上述結論。然而，本院居然未嘗試就證券交易法之立法目的去闡釋其判決之正當性，或將長期以來遭濫用作擴張解釋而非限縮解釋之聯邦證券交易法之法則予已匡正。（參 Affiliated Ute Citizens v. United States，Superintendent of Insurance v. Bankers Life & Casualty Co.及 SEC v. Capital Gains Research Bureau）

筆者當然同意本院有關信託關係可構成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之揭露義務之見解，但不同意未揭露資訊僅於違反信託關係之義務時，方違反第 10b-5 條規則。本案，本院不當地忽視上訴人有一般誠實投資人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合法取得機密資訊之管道之重要性。如此一來，將造成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之解釋，欠缺完整含意。雖然，本院由特定之判例中尋求支持其見解之理由，筆者認爲本院之判決既未完全符合普通法中詐欺之發展，亦未完全遵循行政及司法機關對第 10b-5 條規則中內線交易之適用。

普通法中可被訴追之不實說明，長期以來將持有特殊事實（special facts）視爲應負揭露義務之主要要件（Strong v. Repide, 213 U.S. 419, 431 -433 （1909）; 1 F. Harper & F. James, Law of Torts 7.14 （1956）.）。傳統上，此一主

[27] 本院未指出，特殊關係之義務是否係參與不法詐欺交易行為之人所具備之義務；亦未指出其認定之法則，是否包括下級法院長期以來認為收受證券交易機密者具有衍生義務之見解。（ante, at 230, n. 12; cf. Foremost-McKesson, Inc. v. Provident Securities Co., 423 U.S. 232, 255 , n. 29 (1976). ）

要要件係異常明顯的在涉及保密關係或忠實執行業務義務關係之相關案例（該等案例中，一方當事人之資訊劣勢及平等對待原則是法律認定之重要事項），以及一方當事人被告知，他方當事人係出於對重要事實之誤信而爲交易之相關案例中。（Frigitemp Corp. v. Financial Dynamics Fund, Inc., 524 F.2d 275, 283（CA2 1975）; see also Restatement of Torts 551（1938）.）。然而，即使普通法亦有傾向於避免嚴守買受人自負瑕疵結果（caveat emptor）之趨勢，並更有彈性、不拘泥形式地解釋揭露義務之意義（e. g., Keeton, Fraud - Concealment and Non-Disclosure, 15 Texas L. Rev. 1, 31 （1936）.）。現在也有朝“特殊事實理論”適用之趨勢，其適用於更廣泛之處，例如在一方當事人擁有基礎事實而具備較多資訊，然交易時未揭露者，被視爲不公平。（James & Gray, Misrepresentation - Part II, 37 Md. L. Rev. 488, 526-527 （1978）; 3 Restatement（Second）of Torts 551（e）, Comment l （1977）; id., at 166-167（Tent. Draft No. 10, 1964）. See also Lingsch v. Savage, 213 Cal. App. 2d 729, 735-737, 29 Cal. Rptr. 201, 204-206 （1963）; Jenkins v. McCormick, 184 Kan. 842, 844-845, 339 P.2d 8, 11 （1959）; Jones v. Arnold, 359 Mo. 161, 169-170, 221 S. W. 2d 187, 193-194 （1949）; Simmons v. Evans, 185 Tenn. 282, 285-287, 206 S. W. 2d 295, 296-297（1947）.）

本院對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採狹義解釋，閒置聯邦證券交易法，與立法者制定證券交易法之目的背道而馳（Cf. H. R. Rep. No. 1383, 73d Cong., 2d Sess., 5（1934）.）。筆者不同意證券交易法及證券交易委員會之規則應如此限縮。本院已注意到證券交易法並無意限縮於忠實執行業務義務關係之範圍而已。（Santa Fe Industries, Inc. v. Green, 430 U.S. 462, 474 -476 （1977）.）。相反地，證券交易法之目的在確保非關個人因素之國內證券交易市場具有公平誠信之機能以彌補普通法保障之不足。（Cf. United States v. Naftalin, 441 U.S. 768, 775_（1979））。因立法者明白，確保證券交易是公平且於投資人間無不當偏袒或優勢，係證券交易法缺一不可的立法目的。（H. R. Conf. Rep. No. 94-229, p. 91 （1975）.）。

獲得重要事實管道之重要性，一再出現於行政及司法機關對第 10b-5 條規則中內線交易之適用。證券交易委員會及法院一直強

調內部人不當使用機密之資訊係違法行爲之指控要點。筆者認爲本院不當忽視以前判決中之此項觀點。

Cady, Roberts & Co., 40 S. E. C. 907 （1961）案中，本院討論之過程中提供了一個例證。於該案中，證券交易委員會依據下述兩要件界定負有揭露或禁止義務之內部人之範圍：

1. 具有直接或間接接觸資訊管道之關係，該資訊僅爲公司目的而非任何個人利益之目的始能取得，2. 一方當事人明知交易相對人無法取得資訊而利用該資訊者，涉及不公平。

因此，證券交易委員會關心的內部人關係，主要係擁有取得非公開資訊之管道，而非僅限於普通法之忠實執行業務義務或類似義務。該見解之趨勢被視爲符合普通法主流之原則，亦即反詐欺條款之文義不應侷限於細微區別及嚴格分類。禁止交易或揭露之義務，非僅發生於忠實執行業務義務事件，亦發生於機密資訊轉變爲圖利個人致生本質上不公平之情形。該等對第 10b-5 條規則之理解在 Inverstors Management 公司（44 S. E. C. 633, 643 （1971））案中被支持，該案特別拒絕爭論涉嫌違反義務者與內部資訊管道間之特別關係是應負責任的必要條件。

類似的見解亦被其他法院所採。（In SEC v. Texas Gulf Sulphur Co., 401 F.2d 833, 848 （CA2 [445 U.S. 222, 250] 1968）（en banc）, cert. denied sub nom. Coates v. SEC, 394 U.S. 976 （1969））。在 SEC 控告 Texas Gulf Sulphur 公司之案例中，法院明確指出，普通法之特殊事實理論爲第 10b-5 條規則之法源之一，其認爲該條規則係“基於證券交易市場正當期待之政策，亦即所有投資人於客觀交易中有相對平等取得重要資訊管道。”（Lewelling v. First California Co., 564 F.2d 1277, 1280 （CA9 1977）; Speed v. Transamerica Corp., 99 F. Supp. 808, 829 （Del. 1951）.）。此外，相關案例中（Myzel v. Fields, 386 F.2d 718, 739 （CA8 1967）, cert. denied, 390 U.S. 951 （1968）, and A. T. Brod & Co. v. Perlow, 375 F.2d 393, 397 （CA2 1967））亦已強調第 10（b）條及第 10b-5 條規則適用於任何人的任何詐欺行爲。內部人之概念係有彈性的，當機密資訊被濫用時，防禦措施即隨之發生。（e. g., Zweig v. Hearst Corp., 594 F.2d 1261 （CA9 1979） （financial columnist）; Shapiro v. 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 & Smith, Inc., 495 F.2d 228（CA2 1974）（institutional

investor）; SEC v. Shapiro, 494 F.2d 1301 （CA2 1974） （merger negotiator）; Chasins v. Smith, Barney & Co., 438 F.2d 1167 （CA2 1970） （market maker）. See generally 2 A. Bromberg & L. Lowenfels, Securities Law & Commodities Fraud 7.4 （6） （b） （1979）.）

筆者認爲，第 10b-5 條規則之揭露義務採廣義解釋，在 Affiliated Ute Citizens 案中已被確認（Affiliated Ute Citizens v. Untied States, 406 U.S. 128 （1972））。該案例認爲銀行之代理人出賣 Ute Indian 發展公司股票時，對混血印地安人客户應揭露，在賣方客户未被告知之非印地安人市場中，客户股票有較高價格之情事。該法院認爲法條及規則重複使用 “任何”之用語，明顯欲包括任何情形。雖然法院認爲，銀行之代理人與印地安人賣方間具有信託關係，但因銀行及其代理人在交易市場上具有關鍵地位，故法院仍明確地認爲他們應受第 10b-5 條規則之規範。印地安人賣方不知有非印地安人市場之存在；惟銀行之代理人卻相當熟悉其主動推廣的非印地安人市場，且該市場可使銀行之代理人及其銀行獲有利益。在此情況下，法院認爲第 10b-5 條規則，銀行及其代理人對印地安人賣方負有揭露市場資訊之積極義務，且後者有權知悉其股票在另一市場可賣得較高價格之情事。

筆者認爲本院對 Affiliated Ute Citizens 案作出不當之狹義解釋。筆者就該案所持之法律意見更加深對一原則之支持，該原則即爲“重大資訊取得管道之結構上不平等係第 10b-5 條規則下，不論是揭露資訊之義務或禁止交易之義務之產生之重要因素。根據該案例之實際狀況，並不須解決交易當事人間欠缺信託及保密關係時，結構上不平等是否可能會產生揭露義務之問題。不過，筆者認爲 Affiliated Ute Citizens 案所建立之原理明確指出上述問題應採肯定說。雖然筆者不完全接受聯邦上訴法院所建立的市場內部人之分類，筆者仍認爲擁有他人無法合法取得之機密重要資訊管道之人，依第 10b-5 條規則，應禁止其利用資訊優勢以買賣受影響之證券。就筆者而言，若作相反之判決或主張只會放任操控及欺騙行爲擴大其範圍。（See Blyth & Co., 43 S. E. C. 1037 （1969）; Herbert L. Honohan, 13 S. E. C. 754 （1934）; see generally Brudney, Insiders, Outsiders, and Informational Advantages [445 U.S. 222, 252] under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93 Harv. L. Rev. 322（1979）.）[28]

不論第 10-5 條規則之限制爲何，Chiarella 之上訴案符合結構分析範疇之核心。上訴人與股份收購公司間之關係，使其擁有取得重要資訊之管道，且該資訊係嚴禁公眾取得之資訊。套用 Cady, Roberts & Co., 40 S.E.C. 案中對“資訊”之用語係“僅限公司目的而非私人利益所能取得者”。再者，上訴人了解，交易相對人無法取得該資訊之情事。上訴人藉由人爲的資訊落差於收購公開後立即出售股票，故其完全無交易風險。於任何合理之定義下，上訴人之交易行爲皆屬本質上不公平之行爲。其濫用機密資訊之情形已清楚地向陪審團提出。因此，上訴人有罪判決應予維持，筆者不同意本院廢棄原判決。

[28] 本院認為聯邦證券交易法之許多規定，限制但不禁止持有非公開市場資訊之特定投資人為交易行為。本院並主張“立法者及證券交易委員會皆未採用資訊平等原則（parity-of-information）。依筆者判斷，上述兩主張皆未與筆者就第 10b-5 條規則之解釋極力所為之概述有背道而馳之情形。法院所引註之證券交易法之規定顯示，立法者對利用結構性資訊優勢之行為，並無不加以規範之意圖。將第 10b-5 條規則視為概括條款以確保立法者承認之少數例外不會因規避法律而擴張。再者，資訊平等（parity of information）與重要資訊取得管道（parity of access to material information）之平等，於概念上有重要之區別。後者對取得特定資訊優勢不加控制；而前者可能限制之，因此努力或聰明之差異將導致資訊不平等。確實地，藉由限制操控機密關係或訴諸秘密行動來獲取利益，取得管道之地位平等會幫助來確保利益係透過誠實之方法取得。

41. Herman & Maclean v. Huddleston

459 U. S. 375（1983）

林秋琴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一九三三年證券法第十一條明文提供之救濟途徑，並未排除被詐欺之證券購買人援引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為請求權基礎之可能性。（The availability of an express remedy under 11 of the 1933 Act does not preclude defrauded purchasers of registered securities from maintaining an action under 10（b） of the 1934 Act.）

A. 兩條文涉及不同性質之請求權基礎，係針對不同違法行為所創設。依據第十一條規定，原告僅須證明申報文件中含有重大不實之陳述或應申報而未申報之資訊，其請求權即足以推定成立，該項請求必須由證券購買人提起，且僅能以特定人為被告。相對地，第十條 b 項為禁止詐欺之概括條款，要求證券買賣者須證明被告明知其所為之陳述不實。

（The two provisions involve distinct causes of action and were intended to address different types of wrongdoing. Under 11, a plaintiff need only show a material misstatement or omission in a registration statement to establish a prima facie case. Such an action must be brought by a purchaser of a registered security, and can only be brought against certain parties. In contrast, 10（b） is a "catchall" antifraud provision and requires a purchaser or seller of a secur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ause of action, to prove that the defendant acted with scienter.）

B. 認為不能依據第十條 b 項對違反第十一條之行為提起救濟，與一九三三年證券法欲提供證券購買人更多保護之基本目的有違。一

行為同時為兩種法律所禁止，並非不尋常之事，而在不同的法律中創設多重的救濟途徑，亦可由以下事實得見：當國會於一九七五年大幅修改證券法之際，聯邦法院已一致認為即使第十一條與其他法條明文規定了救濟途徑，第十條 b 項仍得被援引為私法請求權基礎。在證券法規中創設多重救濟途徑，符合廣開救濟之門的立法目的。

（To exempt conduct actionable under 11 from liability under 10（b）would conflict with the basic purpose of the 1933 Act: to provide greater protection to purchasers of registered securities. It is hardly a novel proposition that the two Acts prohibit some of the same conduct. A cumul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remedies under the Acts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when Congress comprehensively revised the securities laws in 1975, federal courts had consistently recognized an implied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under 10（b） even where express remedies under 11 or other provisions were available. A cumul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urities laws also furthers their broad remedial purposes.）

2. 依據第十條 b 項請求賠償之原告，其舉證責任僅須達到優勢證據標準即可，而不須達到「明顯而令人信服之證據標準」。優勢證據標準向為證券法規中私法救濟行為的證據法則，於本案中並不需特別提高普通法民事詐欺訴訟中之舉證責任。聯邦證券法規之重要目的之一，係透過對證券業採取較高的行為標準，以修正普通法保護不足之缺失。採取優勢證據標準係權衡了本案雙方當事人之權益，因為此標準使雙方當事人得以大致上平均分擔錯誤之風險（risk of error）。雖然被告須承擔如詐欺行為成立所伴隨的不名譽之風險，但被詐欺之投資者是證券法保護的對象，故只要原告證明其被詐欺的可能性大於未被詐欺，其便應獲得賠償。

（Persons seeking recovery under 10（b） need prove their cause of action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only, not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e preponderance standard has been consistently employed in private actions under the securities laws. Reference to the traditional use of a higher burden of proof in civil fraud actions at common law is unavailing here. An important purpose of the federal securities statutes was to rectify perceived deficiencies in the available common-law protections by establishing higher standards of conduct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The balance of the parties' interests in this case warrants use of the preponderance standard, which allows both parties to share the risk of error in roughly equal fashion. While defendants face the risk of opprobrium that may result from a finding of fraudulent conduct, defrauded investors are among the very individuals Congress sought to protect in the securities laws, and if they prove that it i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they were defrauded, they should recover.）

關 鍵 詞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1934 （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 （證券法）；fraud （詐欺）；misrepresentation （不實陳述）；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優勢證據標準）；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明顯而令人信服之證據標準）。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Marshall 主筆撰寫）

事 實

德州國際運輸公司（Texas International Speedway, Inc., 以下簡稱 TIS）於一九六九年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編送登記文件與公開說明書，公開發行共值$4,398,900 美元之證券，發行所得將用於集資建造一條快速道路。所有發行之證券

均於發行日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售罄，但 TIS 之營運並不成功，而於一九七 0 年十一月三十日申請破產。

原告 Huddleston 與 Bradley 於一九七二年於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德州南部分院以自己與其他 TIS 證券購買人之名義提起集體訴訟，於訴狀中指稱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與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規則（以下簡稱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之情事。原告控告許多參與公開發行之人，包括 Herman & MacClean 會計師事務所，因其所撰寫有關若干財務報告與形式資產負債表（pro forma balance sheet）之意見被刊載於登記資料與公開說明書中。原告宣稱被告從事詐欺行爲，就有關 TIS 財務狀況之重要事項（material facts）如建造快速道路之成本等，爲不實陳述（misrepresent）或刻意隱瞞（conceal）。

歷經三星期的審判，地方法院法官將案件中有關賠償責任之部分提交專門陪審團（jury on special interrogatories）決定。法官指示陪審團，惟有被告之行爲係出於明知（scienter）方須負賠償責任。在陪審團就系爭事項判原告勝訴之後，法官即判決 Herman & MacLean 及其他人因於 TIS 登記資料中爲詐欺之不實陳述，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與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地方法院並就此決定了賠償金額。

被告上訴後，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判定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得作爲詐欺之不實陳述或應爲陳述而未陳述等行爲之請求權基礎，即使原告得援引證券法第十一條就同一行爲請求救濟。惟上訴法院有關第十條 b 項舉證責任標準之意見與地方法院不同，認爲原告之舉證責任必須達到「明顯而令人信服之標準」，故上訴法院廢棄地院判決並發回更審。

本院核發移審令，以審查就證券法已明文提供私法救濟之行爲，原告得否仍援引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爲請求權基礎（對此本院過去並未表示意見），以及援引第十條 b 項請求時原告適當之舉證責任爲何。

判　決

本院維持上訴法院關於原告得援引證交法第十條 b 項作爲請求權基礎之決定，但就舉證責任部分則予以廢棄。

理　由

I

這一系列的案件觸及了關於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以下簡稱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的兩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爲購買在全國證券交易所登記有案之證券的購買者，如聲稱其因申報資料中所含之不實陳述而受詐欺時，得否在一九三三年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第十一條已明文提供救濟途徑的前提下，援引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爲救濟之請求權基礎。第二個問題爲依據第十條 b 項之請求權人於證明該請求權存在時，其舉證責任是否須達到「明顯而令人信服」之證據標準（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而非「優勢證據標準」（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I

一九三三年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與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券交易法）「構成聯邦規範證券交易體系之一環。」前揭法律明文創設數個私法請求權基礎，其中一項係規定於一九三三年證券法第十一條中。除了證券法與證券交易法所明文創設的私法請求權外，聯邦法院尚自此兩項法律之規定中引申出私法救濟途徑。與本案最具關聯性者，爲自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與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所引申出之私法救濟途徑，此種作法已有三十五年的歷史，故此私法救濟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

本案爭點爲當事人是否因爲系爭詐欺行爲亦該當證券法第十一條損害賠償之要件，便不得援引證券交易法前揭請求權作爲救濟。欲解決此爭點，首須了解兩條文實涉及兩種不同的請求權，且係規範不同的不法行爲。

證券法第十一條允許購買已登記有價證券之人，在有不實或誤導資訊出現於申報資料中時，得控告條文中列舉之當事人（enumerated parties）。該條藉由課予直接參與發行過程之當事人嚴格的賠償責任，以確保證券法中告知條款之落實。如原告係依據登記資料而購買證券，其僅須證明資料中含有重大不實或應陳述而未陳述之資訊，賠償責任即推定成立。證券發行人之賠償責任幾乎是絕對的，即使其就該不實陳述之作成並無過失，至於其他被告則須自行舉證證明其已盡適當之注意義務（due diligence）。

雖然第十一條之適用範圍有

限，但第十一條僅要求原告負最基本的舉證責任。反之，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爲一概括之反詐欺條款，然原告之舉證責任卻相形增加。第十一條之請求權人限爲購買已登記之有價證券者，其購買行爲必須基於含有不實或應陳述而未陳述資訊之登記資料，且僅能以某些對象爲被告，但第十條 b 項之請求權人得爲買賣「任何證券」之人，被告得爲任何使用「任何操控或詐欺方法」從事與買賣證券有關事務之人。然而，第十條 b 項之請求權人負有較第十一條請求權人更重之舉證責任。更重要的是請求權人必須證明被告明知（scienter），亦即其須具有欺騙、操控或詐欺之故意。

既然證券法第十一條與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係規範不同之不法行爲，本院並不認爲僅因申報資料中所發生之詐欺行爲已爲第十一條所規範，即須於第十條 b 項下設置例外，以排除對該行爲之適用。主張此行爲不受第十條 b 項規範將會牴觸證券法提供購買已登記證券者更多保護之立法目的。如認爲證券法所賦予購買已登記證券者之特別保護意味著剝奪可供所有買賣證券之人主張之第十條 b 項請求權，顯不符常理。

雖然某些行爲得同時援引第十一條與第十條 b 項作爲請求權基礎，然一般向來認爲證券交易法與證券法係「就某些相同行爲加以禁止」，而「兩法有重疊之處並非不尋常之事。」在證券法與證券交易法之規定中，國會並未接受對於證券相關法律所明文提供之救濟途徑會排除所有其他請求權的看法。證券法第十六條清楚規定「本條所提供之權利與救濟方法與其他存在於現有法律規範中所有的權利與救濟方法並存。」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亦有類似之條文。這些條文確認了每一項法律中所賦予之救濟方法彼此之間係互爲補充的。

本院於 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 案之判決論理亦支持這個結論，該案判決第十條 b 項之請求權要求行爲人必須「明知」，僅是過失行爲是不夠的。於該判決中，本院強調證券法中所明文規定之每一項允許就過失行爲請求賠償的私法救濟，均必須受制於程序上的限制，而這樣的限制並不適用於第十條 b 項之請求權。本院強調如允許第十條 b 項亦包含過失行爲，會使其他針對過失行爲提起之損害賠償請求均轉而援引第十條 b 項主張救濟，「因而使規範這些救濟方法的程序要件失去效用」。於論證第十條 b 項之請求權須以明知

爲要件，以防止請求權人規避其他請求權程序要件時，本院想當然爾係假設這些救濟方法得以並存，否則也就沒有其他請求權之程序要件會因之失效的顧慮。換言之，如第十條 b 項之請求權有要求證明「明知」之額外條件，援引第十條 b 項作爲請求權基礎將不會有導致適用其他請求權之程序要件失效的問題。

國會於一九七五年大幅度修改證券有關法律時，便已存在一系列的司法判決肯認原告即使於有其他的救濟方法存在的情形，仍得援引第十條 b 項起訴，此亦爲證券法與證券交易法救濟方法並存之另一佐證。一九七五年國會進行了「自一九三四年制訂證券交易法以來，國內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證券法律修法。」當國會修法時，聯邦法院已陸續允許原告在其得援引第十一條或其他條文救濟時，仍可依據第十條 b 項提起訴訟。有鑑於司法解釋已確立這個原則，國會最後決定保留第十條 b 項，此即透露了國會追認第十條 b 項請求權得與其他請求權並存之意旨。

允許證券法規中之救濟方法並存亦符合廣泛賦予救濟之立法意旨。當制定證券交易法時，國會表示其立法目的係「增加得使管制與監控證券更加完整且有效之要件」。爲了達成此目的，第十條 b 項禁止使用「任何操控或詐欺方法」從事與買賣證券有關之行爲。如第十條 b 項之適用案例受到排除第十一條規範之限制，則將削弱第十條 b 項欲廣泛管制詐欺行爲之有效性。然而本院已再三肯認證券法規中禁止詐欺之規定「不應過於拘泥技術性的解釋限制其適用，應將之作有彈性的解釋以符合其救濟之意旨」。因此本院於解釋證券法規時，拒絕作出排除依據第十條 b 項請求救濟之解釋。

職是之故，本院判決證券法第十一條所提供之救濟，並不排除受詐欺而購買已登記有價證券之人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提起救濟的機會。

III

在一典型請求金錢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中，原告必須負優勢證據之舉證責任（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同樣地，證管會在訴訟中對符合證券法第十七條 a 項詐欺要件之舉證責任，本院亦判定其必須達到優勢證據之舉證標準。「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向採優勢證據標準。」同樣的標準亦適用於證管會之行政程序，並向爲下級法院採用於處理與證券法規相關之私法

訴訟所採。

然上訴法院卻判定第十條 b 項請求權人之舉證責任必須達到「明顯而令人信服之證據標準」。上訴法院的考量，主要爲在普通法中，對民事詐欺訴訟傳統上要求較高的舉證責任，然而在本案中參考普通法並不適當，因爲傳統認爲必須符合較高舉證責任標準的考量並不適用本案，而且證券相關法律中之反詐欺條款與普通法領域之詐欺並不相容。聯邦證券法規之一項重要目的爲透過對證券業採取較高的行爲標準，修正普通法之缺失。因此本院認爲依據普通法標準並不適當。

當國會未制定適當的舉證責任標準，且憲法亦未就此規定一特別的標準時，本院便必須提供一適當的標準。本院注意到舉證責任標準係「爲了公平分配訴訟當事人間可能錯誤之風險（risk of error），並展現其對最終決定之相對重要性。」因此，本院對於涉及特別重要之個人利益或權利的訴訟案件，要求原告之舉證責任須達到「明顯而令人信服的標準」。相對地，即使該訴訟涉及嚴厲的行政處分，但如未涉及特別重大權益，則舉證責任通常僅要求原告達到優勢證據標準。因此，在解釋 Steadman v. SEC 案中之一項條文時，本院判定證管會行政程序中，對於違反詐欺條款行爲之舉證，應採優勢證據標準。該程序得對認定違法者處以包括永久吊銷執業執照之處分。而在 SEC v. C.M. Joiner Leasing Corp. 案中，本院判定原告證明證券法第十七條 a 項中「詐欺」之要件，僅須達到優勢證據之舉證責任標準即足。

優勢證據標準使訴訟當事人雙方能「大約平等地分擔可能錯誤的風險。」其他標準則表示了對於某一方權益的特別注重。衡量本案之雙方權益後，採取優勢證據標準是適當的，因爲一方面被告面臨如詐欺行爲成立所伴隨的不名譽之風險，但此風險與依據第十七條 a 項提起訴訟之被告的風險是相同的，而第十七條 a 項原告之舉證責任僅須達到優勢證據標準。證券案件中被告的權益與被指控違反其他聯邦法規如反托拉斯法或民權法（civil rights law）之被告權益，並沒有質的差別，而在這些訴訟的舉證責任均以優勢證據原則爲標準。另一方面，此種訴訟中原告的權益是非常重要的，被詐欺之投資者是國會透過證券法所欲保護的對象，故只要原告證明其被詐欺的可能性大於未被詐欺，其便應獲得賠償。

本院因此拒絕於本案中偏離

一般民事訴訟採取優勢證據標準之原則。上訴法院關於適當舉證責任標準之判決部分應予廢棄。

IV

上訴法院判決部分維持，部分廢棄，而廢棄部分應發回更審。

42. Landreth Timber CO. v. Landreth
471 U.S. 681（1985）

黃偉峯　節譯

判　決　要　旨

1. 西元（以下同）1933 年聯邦證券法第 2（1）條之登記條款及 1934 年聯邦證券交易法第 3（a）（10）之反詐欺條款定義之「證券」包含了「股票」及其他之契據。雖然以「股票」本身作為契據並不足以完全使其符合前揭法規所定義之「證券」，惟該契據兼具「股票」之名稱及股票一般通常之特質（United Housing Foundation, Inc. v. Forman 案，421 U.S. 837 針對此特質有所定義）者，買方得合理地推定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查本案系爭之股票乃具有傳統普通股股票之所有特質。尚且，將本案之股票賣賣交易之行為解釋為適用證券法，亦與立法機關制定法律以保護投資大眾之目的不謀而合。（Section 2(1) of the 1933 Act and 3(a)(10) of the 1934 Act define a "security" as including "stock" and other listed types of instruments. Although the fact that instruments bear the label "stock" is not of itself sufficient to invoke the Acts' coverage, when an instrument is both called "stock" and bears stock's characteristics as identified in Forman, supra, a purchaser justifiably may assume that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 apply. The stock involved here possesses all of the characteristics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common stock. Moreover, reading the securities laws to apply to the sale of stock at issue here comports with Congress' remedial purpose in enacting the legislation to protect investors.）
2. 當契據兼具「股票」之名稱及所有股票一般之特質時，法院即不需要探究該交易行為之經濟本質以決定該股票是否屬於聯邦證券法

所定義之「證券」。因此，就不易被認定為證券之非通常契據，本院（即大法官）過去判決亦顯示本院不支持與上述理論相反之見解。聯邦證券法亦非如本案被上訴人所主張，認為僅被動的投資者（passive investors）及不涉及經營權移轉於企業主之私人協調性交易（not privately negotiated transactions involving the transfer of control to "entrepreneurs" ）始為聯邦證券法所涵蓋。

（When an instrument is labeled "stock" and possesses all of 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tock, a court is not required to look to the economic substance of the transac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tock is a "security"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Acts. A contrary rule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Court's prior decisions involving unusual instruments not easily characterized as "securities". Nor were the Acts intended, as asserted by the respondents, to cover only "passive investors" and not privately negotiated transactions involving the transfer of control to "entrepreneurs".）

3. 當契據兼具「股票」之名稱及所有股票通常之特質時，乃係屬聯邦證券法所規範之證券定義中，依其文義解釋最清楚為該法規所涵蓋之情形。「股票」與其他法規中所列示之契據種類係屬明顯可資區別的，因而於解釋聯邦證券法關於「股票」之定義時，股票得被視為一獨立契據之種類。

（An instrument bearing both the name and usual characteristics of stock presents the clearest case for coverage by the plain language of the definition. "Stock" is distinguishable from most if not all of the other listed categories, and may be viewed as being in a category by itself for purpose of interpreting the Act's definition of "stock".）

4. 營業讓與理論（"sale of business" doctrine）之是否適用取決於經營權是否因買賣股份而隨同移轉於買方。縱然百分之百之公司股權移轉通常即生經營權之隨同移轉，本案買方並無意自行獨立經營鋸木場；尚且，若本案有該理論之適用，則其他低於百分之百公司股權

移轉之案件勢必亦會有適用該理論之可能，則將不可避免的造成該理論適用之界限畫分之困難。如同 Gould v. Ruefenacht 案之第 701 頁中所揭示者：在大部分之情形，當事人於為股份交易之行為時，對於該行為是否為聯邦證券法所涵蓋，係非當事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此聯邦證券法適用標準之不明確，應非法所容許。

（Application of the "sale of business" doctrine depends on whether control has passed to the purchaser. Even the transfer of 100% of a corporation's stock normally transfers control, the purchasers here had no intention of running the sawmill themselves. Moreover, if the doctrine were applied here, it would also have to be applied to the cases in which less than 100% of a company's stock was sold, thus inevitably leading to difficult questions of line-drawing. As explained in Gould v. Ruefenacht, post, p. 701, coverage by the Acts would in most cases be unknown and unknowable to the parties at the time the stock was sold. Such uncertainties attend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Acts would be intolerable.）

關 鍵 詞

security（證券）；instrument（契據）；economic substance of the transaction（交易行為之經濟本質）；the transfer of control（經營權之移轉）；entrepreneur（企業主）；sale of business doctrine（營業讓與理論）；unknown or unknowable（非明知或可得而知）。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Powell 主筆撰寫）

事 實

本案被上訴人（respondents）父親及其兒子擁有其經營之木材公司之全部股權，並委託證券經紀

人銷售其股權。之後該公司所有之鋸木廠因失火而受損，惟潛在之股權收購者（purchasers，下稱買方）被告知該工廠將會被重建及更新。其後，移轉全部股權之買賣合約簽署生效，最後形成以買方爲股東所組成之上訴人（petitioner）公司。然被上訴人父親同意於一定之期間繼續擔任該公司之顧問以協助處理工廠日常經營運作。然而在收購完成後，工廠之營運不如買方之預期。最後，上訴人以虧損之價格將工廠賣出後，該公司隨即宣告破產。之後上訴人即對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撤銷股票之買賣交易行爲及損害賠償，主張被上訴人違反 1933 年證券法（以下稱"1933 年法規"）之登記條款及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以下稱"1934 年法規"）之反詐欺條款之規定。（1933、1934 年法規兩者以下合稱"聯邦證券法"）

一審法院作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認爲基於營業讓與理論（sale of business doctrine）之規定下，買方收購百分之百公司股權時，因公司之經營控制權亦隨同移轉，是故根據聯邦證券法之目的言，不能認爲該「股票」係屬於「證券」而得適用聯邦證券法。一審法院進而認爲該交易行爲應屬商業之風險（commercial venture）而非典型之投資行爲（typical investment）（即認該交易行爲非屬聯邦證券法保護之範疇）。二審法院採相同之意見，駁回上訴人之訴訟。本院受理上訴。

判　決

原判決應予廢棄。即交易行爲係屬聯邦證券法所規範之證券交易之行爲而受該法規之保護。

理　由

I

承前事實所述（相同部份不再贅述），本案之買方主要爲兩位股東，一位爲 Samuel Dennis 麻州（Massachusetts）之稅務律師，基於徵求信所述之改建計畫、工廠之預估生產量、現存之契約、可期待之利潤等，Dennis 對於該股權之購買產生興趣。Dennis 並與其以前之客户 John Bolten 提及此事，邀請他一同調查購買該公司股權之可行性。經過對該工廠進行審查及調查之程序後，Dennis 簽署購買該工廠全部普通股股份之買賣契約。並根據該買賣契約之約定，Dennis 將其股權全部移轉於其爲了要收購木

材公司股權用所設立之 B&D 公司，B&D 公司接著與該木材公司（即被上訴人原所擁有之公司）合併，成立上訴人公司 Landreth Timber Co.。Dennis 與 Bolten 之後收購上訴人公司 85%之股份（Class A stock），爲最大股東，其餘 15%之股份（Class B stock）由其他 6 位投資人購得。

經過收購之行爲結束後，工廠之營運不如買方之預期。重建之費用超過了當初之預算，且新組件與原有機器無法相容。最後，上訴人將工廠賣掉蒙受損失後宣告破產而被接管。上訴人遂對法院提起訴訟主張撤銷股份買賣之行爲並請求美金貳佰伍拾萬（US $ 2,500,000）元之損害賠償，主張被上訴人未經登記之程序而公開發行銷售股票，係違反 1933 年法規之規定，且上訴人復主張被上訴人因過失或故意作出不實之陳述（misrepresentation）、且對於該工廠之實際價值及遠景等狀況未做出具體確實之陳述，係屬違反 1934 年法規之規定。

被上訴人請求法院作出簡易判決，依據營業讓與理論判斷，認爲本案並無聯邦證券法之適用，因其認爲本案之上訴人所購買者係非屬聯邦證券法所規範之證券。一審法院（the District Court）接受被上訴人之請求作出簡易判決，並基於欠缺聯邦管轄權（want of federal jurisdiction）爲由駁回原告之請求。一審法院知悉聯邦證券法有規定契據中之「股票」係構成「證券」，且知悉本案係爭之股票具有所有傳統股票之特質。然而，該法院參與所謂"多數法院"之意見而認爲百分之百之股權購買即相當於擁有公司經營權者無聯邦證券法之適用。該法院依據 United Housing Foundation, Inc. v. Forman, 421 U.S. 837（1975）（下稱 Forman 案）及 SEC v. W. J. Howey Co., 328 U.S. 293（1946）（下稱 Howey 案）之判決主張，股票本身不能被認定爲證券，除非買方對於所涉及之交易行爲具有以經由他人之努力以獲取利潤之期待者始屬之。該法院認爲本案之股權交易已涉及經營管理權之實質移轉，從而認爲該交易行爲係屬商業風險而非屬一般之投資行爲，因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

二審法院（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肯定一審法院判決之見解，同意本案有營業讓與理論之適用，且認同法院應受判決先例（Forman 案、Howey 案）之拘束，從而於判斷以股票爲契據時是否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時，應於每一個案中，視該交易行爲之經濟本

質判斷之。然而因二審法院對於百分之百之股權購買是否構成證券之交易而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存有歧見，因此本庭（三審法院）於1984 年准予核發裁量上訴受理令狀，撤銷原判決。

II

本庭認爲於個案判斷是否有相關法規之適用時，其出發點係該法規文義之解釋，此乃法理之當然（參 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421 U.S. 723, 756（1975）案大法官 Powell 之偕同意見書及 Teamsters v. Daniel, 439 U.S. 551, 558（1979）案中有相同之見解）。1933 年法規第 2（1）條中規定「證券」之定義如下：

「任何票據、股票、庫藏股、債券、公司債券、負債證明、紅利證明文件或參與分紅之契約、擔保信託證明文件、公司籌備處設立之證明文件或認股書（preorganization certificate or subscription）、可轉讓之股份、投資契約、股權信託證明文件、證券保管之證明文件、畸零未分割對於石油、瓦斯或其他礦藏權之利益，…或大體說來，任何利益或契據有證券之名稱或任何利益或參與分配之證明文件、暫時性或過渡性保證之證明文件、保證之憑據或對於任何前述事項有徵求或購買之許可或權利者。」[1]

就如同我們過去之觀察，證券之定義相當寬廣，參 Marine Bank v. Weaver 455 U.S. 551, 556（1982），並且包含了兩種具有明確定義名稱之契據，蓋越是具備有價值性特質之契據，越是需要被賦予一特殊描述性之名稱，如同「投資契約」（investment contract）和一般常被認定爲「證券」（security）之契據。參 SEC v. C. M. Joiner Leasing Corp., 320 U.S. 344, 351（1943）。自股票（stock）之文義解釋來看，應可認爲股票係屬聯邦證券法所規範之「證券」（security）之範疇。如同我們自 Forman 案觀察得知者，大部分具有傳統名稱之契據皆很可能的爲聯邦證券法所定義之證券所涵蓋。

如同我們自 Forman 案所認知的，契據若僅僅具有股票之名稱並不足以證實該契據係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反之，我們認爲於判斷

[1] 法院已重複的做出判決認為 1934 年法規之第 3（a）（10）及 1933 年法規第 2（1）條中關於證券之定義實際上係相同的且法院於判決中，對於該證券定義之範圍之處理，亦將如此認定。參 Marine Bank v. Weaver，455 U.S. 551, 555，n. 3 （1982）及 Forman 案（1975）。

是否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時，尚須判斷該契據是否具有「一些通常與股票相關之重要特質」(some of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stock)，並認知若某一契據係兼具有股票之名稱及股票之一般特質，則買方可合理的推定該交易行爲有聯邦證交法之適用。我們確認那些通常與普通股股票相關之特質如下：(i) 依收益分配獲取分配股利之權利(the right to receive dividends contingent upon an apportionment of profits)；(ii) 可轉讓性 (negotiability)；(iii) 可作物權抵押擔保 (the ability to be pledged or hypothecated)；(iv) 被授與依持股比例享有表決權 (the conferring of voting rights in proportion to the number of shares owned)；(v) 具有增值之能力 (the capacity to appreciate in value)。[2]

根據 Forman 案之事實，我們決定該案系爭之契據非屬聯邦證券法所規範之證券。該案係涉及買方因股份買賣交易而獲得承租合作公寓之權利。該股票不具有任何前述通常與傳統股票相關之特質，因而，我們認爲在該案之情形下，買方應不可能因使用「股票」之名稱而被誤導的認爲該交易行爲係爲聯邦證券法所支配。該案買方之目的係爲取得自用之低價房屋，而不可能會認爲其係購買具有投資性質之證券。

反之，無爭論的，本案所涉及之股票係具有我們於 Forman 案中所認定之全部傳統上普通股股票相關之特質。的確，一審法院亦如此認爲。然而，與 Forman 案不同點在於，本案所涉及之交易行爲之內容—公司股票之買賣，係屬一種適用聯邦證券法之交易行爲之基本態樣。因此本案之投資人較 Forman 案之投資人更有可能會認爲其交易行爲係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在本案之情形下，依法規定義之文義解釋，即可認爲本案之股票係爲聯邦證券法所規範之「證券」。

認定本案之股票交易適用聯邦證券法，與國會基於補救目的，使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律，強制要求關於在商業上一般可認知爲證券之契據之發行須盡完全且公平之揭露義務，以達保護投資大眾之目的相符。參 SEC v. W. J. Howey

[2] 雖然法院於 Forman 案中未如此明確的表示出來，本庭希望在此明確的指出這些特質係通常與一般商業買賣行為所涉及之普通股（common stock）相關。惟多種類型之特別股（preferred stock）可能具有其不同之特質，仍應為聯邦證券法所涵蓋。

Co., 328 U.S., at 299（1933）。雖然我們認爲國會並無意提供一個全面的聯邦救濟手段於所有的詐欺行爲，參 Marine Bank v. Weaver 案，我們認爲將國會全面的對於證券之定義限縮解釋而認爲本案所涉及之傳統之股票非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係不妥當的。

III

在其他之情形下，我們可能會認爲根據前所概述之法規分析即足以使法院作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決。[3] 然而，被上訴人極力主張根據前審法院之見解包括 Forman 案在內，均要求我們於判斷是否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時，應超越本案所涉及之契據之「股票」名稱及特質，應進而探究該經濟行爲之本質以爲決定。甚而，二審法院亦不接受依據法規之文義解釋即足以決定本案之股票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之見解，因其認爲如此一來會造成「無原則之適用」（no principled way），而無法合理的說明股票與該規定證券定義中之其他範疇如票據、債券等認定方式爲何不同。以下我們茲將這些爭點分別論述。

A

我們可以公平的說法院並沒有一具體明確之標準來認定契據是否爲證券。本院已做出之許多判決中，係存有以交易行爲之經濟本質來判斷，而非僅以其形式來判斷是否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之案例。舉例言之，於 SEC v. C. M. Joiner Leasing Corp. 案中，本院就鄰近鑽油區土地之租賃利益之買賣，於判斷有無 1933 法規之適用時，表示租賃之利益係屬「證券」，本院進而指出該法規之涵蓋範圍並非僅及於法規文義之表面而已。（the reach of the Act does not stop with the obvious and commonplace）。反而，本院於該案即認爲非常態之設計（unusual devices）如租賃權（leaseholds），若可予事實證明其係在如同「投資契約」之條件或程序下被公開要約或處理者，或其係屬一般被認知爲「證券」之任何利益或契據者，則其亦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if it be proved as matter of fact that they were widely offered or dealt in under terms or courses of dealing which established their character on

[3] 羅司教授（Professor Loss）認為依該法規之分析來判斷是否為聯邦證券法所涵蓋即為已足。參羅司教授著，證券法規 212（1983）之基礎，第 693-694 頁。

commerce as “investment contract”, or as any interest or instrument commonly known as a “security”）

如同 Howey 案， 進一步闡明了該案法院之建議，認爲非通常性之契據，若依交易行爲之個別狀況本身判斷，即得認其屬於證券交易者，則該契據即得被認定爲「證券」。在 Howey 案中，其事實係涉及柑橘林開發單位之投資合約之徵求，投資人依契約取得柑橘栽培、行銷之利益。該案審理之法院認爲該股權之徵求係屬於 1933 年法規所規範投資契約（investment contract）之性質，因視該交易行爲之經濟本質係涉及以金錢投資於一般之企業、並係具有完全藉以他人之努力以獲取利潤之性質（the transaction involved an investment of money in a common enterprise with profits to come solely from the efforts of others）。

所謂的 Howey 測試（Howey test）構成了本院對於 Forman 案判決的第二個部分之基礎，此亦爲本案被上訴人一開始所主張之部分。同前所述，參Ⅱ之討論，本院於 Forman 案所做出判決之第一部分認爲，該案系爭之契據雖具有傳統「股票」之表面名稱，然因其並未具有股票所擁有之通常特質，是故認定其並非屬於「證券」。接著本院進入討論該契據是否屬於「投資契約」之爭論。適用 Howey 測試之結果，本院探究該交易行爲之經濟本質，發現買方參與投資之目的，係爲了獲得一滿足個人消費目的之商品，而並非爲了藉由他人之努力以獲取利益，是故本院基於投資契約之本質，認定該契據並非屬於「證券」。

被上訴人主張本院根據 Forman 案及相關之案例，應拒絕適用以契據之名稱及特質據以認定其即屬「證券」之見解[4]，甚而主張本院應就本案所涉及交易行爲之經濟本質加以判斷是否符合 Howey 測試之檢驗。根據被上訴人

[4] 本案被上訴人亦引用 Tcherepnin v. Knight，389 U.S. 332（1967） 及 Marine Bank v. Weaver，455 U.S. 551（1982） 案之見解，作為支持其爭論認為法院已做出判決認定任何案件於決定是否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時皆應檢視該交易行為之經濟實質以為決定。然而本庭認為被上訴人所援引之案例，皆係非屬聯邦證券法所明確例示出來屬於證券定義範疇之契據而係屬非通常之契據。Tcherepnin 案涉及可撤銷之對於州立存貸機構之資本股權交易。Weaver 案涉及存託憑證及私人協議之股權利益分配契約之交易。詳參 Weaver 案中關於為何該案所涉及之「存託憑證」（the certificate of deposit）非屬聯邦證券法定義中之「關於證券之存託憑證」（certificate of deposit, for security）。

之說法，本案上訴人清楚的係爲了取得該公司之經營控制權而非意圖藉由他人之努力而獲取利益。上訴人並非屬於國會立法所欲保護之被動消極之投資者，而係意圖尋求使用、消費該企業之主動之企業主，就如同 Forman 案中之買方取得股權係欲獲取公寓之使用權相同。是故被上訴人主張本案並無聯邦證券法之適用。

我們並不同意被上訴人對於本案之解讀。首先，釐清相關案件法院作出決定之內涵是很重要的。被上訴人所援引之相關案件皆係涉及不易被認定爲「證券」之契據。因而，若聯邦證券法適用於那些案件，則勢必係因爲該交易行爲之經濟本質反映出該契據係屬通常所認定之證券也。相反的，就本案而言，所涉及的係傳統之股票，文義上即爲聯邦證券法之定義所涵蓋。是故本案不需要遵從先前之案例，探究超越契據之特質以決定是否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

與被上訴人之主張相反的，本院從不否定自股票本身所欲成爲之性質去認定其係屬證券之可能性。參 SEC v. C. M. Joiner Leasing Corp.案， 320 U.S. 344（1943），本院指出：「對於聯邦證券法之解釋毋需辭費，逕予適用之。在一些案例中，證明一些文件屬於證券或許可能藉由該文件本身之名稱例如票據、公司債券或股權等直接證明之。此原則於 Forman 案中應做相同之解釋。被上訴人對於本院在 Forman 案中避開以「字面」（literal）之解釋認爲具有股票名稱之契據即構成聯邦證券法之適用之理解是正確的。然而，Forman 案並非排除本院對於”契據於具有其名稱所表彰之特質時，決定該契據即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之權能。」

第二點，我們必須指出 Howey 案中關於經濟實質之測試係爲了決定特殊性質的契據是否屬於投資契約而設計，而非適用於檢驗聯邦證券法所例示之全部種類之契據是否屬於證券之用。本案即與此觀點一致。[5] 參 Teamsters v. Daniel 案，439 U.S., at 558 （該案適當的轉換 Howey 測試於決定特殊之財

[5] 為了舉出法院支持被上訴人所主張「法院已做出命令指出關於判斷契據是否屬證券時皆應適用 Howey 測試」，被上訴人引用了法院於 Teamsters v. Daniel， 439 U.S 551, 558， n. 11（1979） 案中之陳述，表示「法院於所有判決中定義證券之定義時，Howey 測試乃係法院判定認為構成證券之實質表徵。」本庭對於前述見解不與被上訴人採取相同廣泛之解釋。我們於 Forman 案中對於買方之爭論作出見解表示「若系爭契據不屬於股票或投資契約，則其必須屬於聯邦證券法定義中之證券，始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我們亦表示，決

務關係是否構成投資契約）。尚且，將 Howey 測試適用於傳統之股票及所有其他聯邦證券法所例示之契據，將會使聯邦證券法之例示性證券種類之設計徒勞無功。參 Golden v. Garafalo 案, 678 F.2d 1139（CA2 1982）。另參 Tcherepnin v. Knight 案，389 U.S. 332, 343（1967）。

最後，我們不能同意被上訴人所稱系爭聯邦證券法僅僅係爲了保護「被動消極之投資者」（passive investors）且不包括涉及經營權移轉於「企業主」（entrepreneurs）之私人協議性商業交易。1934 年法規包括了特別規範收購行爲之數個條文中，其內容包括公司董事及主要股東之揭露義務及其違反短線交易所得利益之補償責任。限縮解釋聯邦證券法關於「證券」之契據之定義，而認爲涉及經營權移轉於買方者不屬證券交易者，實則否定了前述關於收購行爲之特別規範之立法目的也。參 Daily v. Morgan 案, 701 F.2d 496, 503（CA5 1983），採相同之見解。另外，雖然 1933 年法規第 4（2）條，排除非公開買賣之交易行爲適用聯邦證券法關於登記之規定，反詐欺條款並無相同之排除適用。因此，系爭聯邦證券法之架構及文義解釋即反駁了被上訴人之主張。[6]

B

現在我們進入討論關於二審法院認爲「以可證明之特質來判定股票係屬於證券之一種特定之種類，因而其他聯邦證券法所例示出之其他契據，例如票據，亦須以相同之方法檢驗認定之」之見解。雖然我們不決定票據或其他之契據之是否得以其所具備之名稱及特質來證明其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我們必須指出一些使我們認爲股票係與其他聯邦證券法定義所

定是否屬於前述見解中之投資契約，我們認為現今對於認定投資契約及通常得被認定為證券者，其區別標準仍模糊不清。是故法院並非認為於決定契據是否屬於證券時皆應以 Howey 測試檢驗之，而係指「當系爭契據不具有股票之名稱，而法院認為無法合理的區別該契據是否屬於投資契約或其他接近於聯邦證券法所定義之證券之其他契據時」，Howey 測試始有適用之餘地。

[6] 羅司教授（Professor Loss）同意此處關於營業讓與理論之評論。他認為營業讓與理論關於私人交易行為無反詐欺條款之適用之見解是危險的趨近於異端之陳述，按顯然的並沒有任何人敢說買賣公共企業而買方以分發股票給賣方股東之交易，如清償性之股息或紅利，不涉及證券之交易。參羅司教授著，證券法規 212（1983）之基礎。

例示出之其他種類契據存有可區別性之理由。

對於我們來說，具有股票之名稱及所有通常特質之契據，依據聯邦證券法定義規定之表面文義解釋言，乃係最清楚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之案例。第一點，傳統之股票對許多人而言，不論其是否接受過商務之訓練，皆代表著係證券之一種範例。參 Daily v. Morgan 案。因此從事股票交易之人多對於其交易係屬聯邦證券法所支配者具有高度之期待。第二點，如同我們在 Forman 案中明白指出的，股票因其本身即與證券之定義具有一致性，是故相當容易的辨識。（“stock” is relatively easy to identify because it lends itself to consistent definition.） 因此，不若其他之契據，傳統之股票係較被容許的得依文義解釋該當證券之定義。

羅司教授（Professor Loss）亦同意股票與其他種類之契據係可資區別的。他不認爲（goes against the grain）適用 Howey 測試即得據以決定契據是否屬於傳統股票之投資契約。羅司教授進而解釋道：

「我門必須區別的是，典型的共同公寓居住者所購買者係房子，而非證券；或並非任何之分期付款買賣之票據（note）皆構成證券；或一個人以信用卡支付餐廳其消費之款項並非構成出賣證券，雖然其簽字確係爲其負債之證明（evidence of indebtedness）。然而股票（除了係表彰居住權者外）係如此精粹的屬於證券而無待於經過其他理論之分析。」

我們於 SEC v. C. M. Joiner Leasing Corp. 案中得知，法院將票據、債券與股票視爲同等，因聯邦證券法將其同列於證券之定義之種類，是故藉由其名稱本身即足以解釋其該當證券之定義。雖然如此，在 Forman 案中，我們援引了 Joiner 案中之見解作爲意見（dictum）。如同我們最近曾於 Securities Industry Assn. v. Board of Governors 案中所提出不同內容之意見，票據可能被視爲一個相當廣泛之名詞包含了許多具有不同特質之契據，而視其係被發行於消費性內容、如商業票據或其他之投資性內容而定。我們現在明白表示將聯邦證券法證券定義中之「票據」、「債券」或其他之契據是否能藉由該契據之名稱本身即足證明其係屬於證券此問題留至他日討論，本庭對此不表示意見。參 SEC v. C. M. Joiner Leasing Corp. 案，第 355 頁。我們僅僅主張於意圖解釋聯邦證券法「證券」定義之範圍時，股票本身即可被認定爲屬於證券之範疇。（We hold only that

"stock" may be viewed as being in a category by itself for purposes of interpreting the scope of the Act's definition of "security".）

IV

我們亦可以理解在本案之情形下不適用營業讓與理論（the sale of business doctrine）之強大政策性理由。[7] 在被上訴人之承認下，該理論之是否適用決定於經營控制權是否有隨同買賣行爲移轉於買方。於本案可能被爭論的是，該理論應即適用，因百分之百股權之移轉通常即伴隨經營控制權之隨同移轉。然而，我們認爲該主張雖仍存有討論之空間，本案之買方 Dennis 及 Bolten 並不具有自行經營該鋸木廠之意圖。Ivan Lendreth 顯然仍負責管理業務經營之日常事務。一些支持營業讓與理論之評論家認爲若買方有能力對經營控制權產生影響力卻選擇不控制之，則他理應受聯邦證券法之保護因他僅僅係一被動之投資者且未從事於業務之日常經營管理。在本案中，一審法院於下判決前，就事

[7] 大法官 Stevens 提出其不同意見，基於認為國會意圖使聯邦證券法規之反詐欺條款不適用於私人間涉及實質企業之所有權利益者，僅因聯邦證券法所規範者係指股權之交易行為而非企業資產之交易行為。大法官 Stevens 所提出關於 1933 年及 1934 年法規之立法沿革係原本僅在規範於公開交易市場買賣之證券交易行為，參 Forman 案第 849 頁，此見解是正確的。大法官 Stevens 所指出於立法沿革中並無指示出國會認為本案及 Gould v. Ruefenacht 案涉及之契據為聯邦證券法所涵蓋，此見解亦是正確的。

然歷史係單純沉默的，該聯邦證券法在經立法後超過將近半世紀而被證券交易委員會及司法解釋適用於其他種類之契據。唯一應強調的是該委員會擴張解釋 1934 年法案第 10（b）條及增訂第 10b-5 條。在此援引法院於 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421 U.S. 723（1975） 案中與本案相關之見解如下：

「當我們基於法規第 10b-5 條規定處理私人之行為時，我們處理者係一長大之司法橡樹，而非僅係當初立法時之橡子。如此之成長應係與國會之立法與聯邦司法單位解釋法規之立場有緊密之關連，參 J. I. Case CO. v. Borak 案，但若認為 1934 年之國會或 1942 年之證券交易委員會預先設想到現今關於該法規第 10b-5 條之狀態，乃係不切實際的。除了我們已討論過之因素外，我們應加以妥當考量的是，我們從國會法令或行政法規未提供決定性指標所挑出的法條背後的政策考量。」另參 Ernst v. Hochfelder 案，425 U.S. 185 （1976）。於本案當中，關於法規第 10b-5 條之解釋與 Blue Chip Stamps 案之不同在於，我們以 1933 年法規作為我們解釋之理論基礎。在 Forman 案中，我們認知到股票此一名詞係可依一般對該名詞意義之了解，包括 Forman 案中所提及之特色被解讀之。此外，如同 Blue Chip Stamps 案中所表示的，法院在解釋這些法規時，就政策性理由加以考量是妥當的，就如同本庭現今所為的一樣。

實認定之調查被要求爲詳盡之進行，更有甚者，法院亦被要求就經營控制權之事項所伴隨之事實及備忘錄等爲詳盡之事實調查。

然而，更重要的是，若本案有營業讓與理論之適用，則其他低於百分之百股權移轉之案件勢必亦會有該理論之適用，則將不可避免的造成該理論適用之界線畫分之困難。於判斷是否有聯邦證券法之適用應非僅以股權移轉之百分比作爲標準，而亦應考量買方之人數及雙方當事人關於表決及否決權合意之相關規定等因素。如同我們於 Gould v. Ruefenacht 案中解釋較爲完整的，該案與本案具有相似性而可參照之。該案判決指出當事人於爲股份交易之行爲時，對於該行爲是否爲聯邦證券法律所涵蓋，於多數之案例中，係非當事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職此之故，聯邦證券法適用標準之不明確，恐非交易行爲任一當事人之最佳利益也。參 Cf. Marine Bank v. Weaver 案, 455 U.S., at 559, n. 9（法院不贊成系爭之存託憑證一經提供擔保，即如同變色蜥蜴般，轉換成證券之性質。）本案被上訴人爭執若採用上訴人之請求，將會因轉換原屬州及普通法之反詐欺訴求爲聯邦證券法訴求而增加聯邦法院之工作。然而，我們認爲，試想交易行爲之當事人對於其行爲是否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須對於難以捉摸之控制權移轉之爭點展開擴大性調查行動及訴訟程序時，始得加以確認者，此不明確性更令本院覺得甚爲驚恐。參 Golden v. Garafalo 案，有相同之見解。

V

簡而言之，本庭決定本案系爭之股票係屬於「證券」而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之範圍內，且本案不適用營業讓與理論。本庭因此將第九巡迴二審法院之判決撤銷之。

大法官 Stevens 之不同意見書[8]

依我所見，國會並不意圖使聯邦證券法規之反詐欺條款適用於涉及 1933 年法規第 2（1）條所描述證券定義之每個交易行爲：[9]

「證券一詞之定義係指任何

[8] 此不同意見書亦適用於第 84-165 號判決書，以及 Gould v. Ruefenacht 案。

[9] 參 Cf. Milnarik v. M-S Commodities, Inc.案（大法官 Stevens 同意該法院之判決：我們不認為每一符合字典意義之投資契約之可相信之安排皆係屬聯邦證券法所欲規範之對象），裁量上訴受理令狀被拒絕，409 U.S. 887（1972）。

票據、股票、庫藏股、債券、公司債券、負債證明、紅利證明文件或參與分紅之契約……投資契約、股權信託證明文件……或大體說來，任何利益或契據一般得被認定爲係屬於證券者。」15 U.S.C 77b（1）

參前法規（立法理由），第 686 頁，國會或許採用此概略之證券定義之原因，在於防止金融圈爲規避受法律之限制而新創其他之契據，而非在避免法院基於目的性理論去解釋適用法規。此外，此廣泛之法規定義係優先適用的，進一步再檢驗該契據之內容是否含有其他之要件以爲決定其是否屬於證券之範疇。參 Marine Bank v. Weaver 案，455 U.S. 551, 556（1982）。

1933 年及 1934 年法規之立法沿革清楚的顯現國會最初之立法目的乃在使證券交易行爲限於公開市場交易者。在 Forman 案中該法院發現如下：

「1933 年及 1934 年法規最初之立法目的乃在於避免就未規範之證券市場之嚴重濫用。聯邦證券法之焦點乃著眼於企業體系之資本市場譬如：以證券交易買賣來增加資本以達賺取利潤之目的、證券交易市場上之證券買賣，以及避免詐欺及保障投資人利益之規範之需求等。因爲證券交易本身即具有經濟上之特質，國會意圖將適用聯邦證券法者，繫於該交易行爲之經濟本質而定，而非僅依其所繫附之名稱即決定適用之。」

我相信國會所希望能保護之對象，係指無法獲取內部資訊且無法以適當之契約保證來防止被詐欺之投資人。

在分析之某些層面，國會必須提供基礎以劃分界限區別聯邦證券法之適用範圍。經濟本質之探究得加以決定某一非通常之契據及一般之商業本票是否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舉例言之，個人設有不動產抵押之本票，當然並非聯邦證券法所涵蓋，雖然票據係屬於聯邦證券法定義中之契據之一。參考 Chemical Bank v. Arthur Andersen &Co.案，裁量上訴受理令狀駁回（cert. denied），469 U.S. 884（1984）。然而，對於公開市場販售大批抵押貸款，則可能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參 Sanders v. John Nuveen & Co.案，裁量上訴受理令狀駁回，409 U.S. 1009（1972）。

我深信整體交易行爲之特質對於決定以股票交易之交易行爲是否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是直接相關的，就如同對於涉及票據、投資契約或其他混合性證券所應進行之檢驗一樣。提供用以規範公開

發行股票交易之法規，乃國會立法規劃之核心，不論其係於交易平台（on an exchange）或櫃檯交易市場（in the over-the-counter market）公開販售，甚而私人間買賣前述之公開發行股票亦係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然而，我並不認爲，國會意圖將聯邦證券法所涵蓋私人間涉及企業經營權移轉之協議性交易行爲，而該企業之股票係從未經由公開市場販售或被承銷者。在後來之案例中，較爲注重的是當事人利益之種類，以其所涉及之交易行爲係屬股票交易形式之買賣抑或屬企業資產之買賣，且法院判決通常係以與聯邦證券法規無關之稅務責任、政府執照或其他非實體資產之可分配性、關於該運營企業（going concern）之已發生的或未知的責任之分配等來作爲判斷其是否適用聯邦證券法之關鍵要點。若國會係意圖提供一反詐欺行爲之救濟手段予所有關於運營企業或其資產之買賣行爲，則國會就不會仍允許雙方當事人對於聯邦司法之適用可能性加以爭執。

簡而言之，我認爲聯邦證券法規之反詐欺條款之適用，惟有於交易行爲涉及（i）在公開交易市場進行之證券買賣；或（ii） 投資人無法立於協商之地位取得適當契約性保證且亦無法主張於交易行爲成就前獲取內部信息（inside information）者。當然，在經由一系列之訴訟程序確立出一精確之標準前，是否爲聯邦證券法所涵蓋之不確定性將會無法避免的存在。雖然如此，我認爲賦予適用法規之確定性及可預測性以一簡單明確之界限之利益並不足以正當化擴張責任義務範圍遠至立法機關關切範圍外之其他實質不法行爲。[10]參 Sutter v. Groen 案， 687 F.2d。

這些案例皆係涉及接近持有整家公司之股權買賣。在每個案例

[10] 在最後之分析，法院基於政策性考量來做出評斷。當我們覺得政策性考量與解釋聯邦證券法規有關聯時，我們原則上仍會選擇以立法沿革所反映出之國會政策為基礎來解釋。若非固有之考量發生效力，我們將會對於具有衝突性之政策採取較為不同之評斷，因為我們深信本庭應該知道聯邦證券法律並無意取代州政府之權力，除非國會明白的表示此意圖。參 Bennet v. New Jersey 案，470 U.S. 632, 654（1985），Stevens 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參 Garcia v. United States 案，469 U.S. 70, 89 （1984），Stevens 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參 Michigan v. Long 案，463 U.S. 1032, 1067（1983），Stevens 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參 United States v. Altobella 案，Stevens 大法官同意該法院之判決；參 Cf. Minnesota v. Clover Leaf Creamery Co.案，449 U.S. 456, 477 （1981），Stevens 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

中該交易行爲成就前皆係經過買賣雙方相互理解之協商。而並不存在買方無法取得適當之保證或無法主張在雙方參與交易行爲前獲取交換及獨立之相關於金融訊息評價之情形。[11] 我不認爲國會意圖將聯邦證券法適用於實質擁有運營企業利益之私人買賣，僅因該交易行爲係屬於股票之交易而非屬資產之交易，即得據以決定。

基於上述理由，我肯定二審法院第 83-1961 號之判決，並認爲應撤銷第 84-165 號之判決。

[11] 事實上，在第 83-1961 號判決，契約當事人所簽屬之長期性之股權買賣契約係包含了多方面之保證及其他之保障買方之約定。

43. Virginia Bankshares, Inc. v. Sandberg
501 U.S. 1083（1991）

黃慶源 節譯

判 決 要 旨

明知不實之理由、意見或信念之聲明，縱然形式上為結論性的陳述，依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4（a）條規定，仍可以其屬證券管理委員會規則第 14a-9 條所稱之關於重要事實之不實陳述，而提起訴訟。

（Knowingly false statements of reasons, opinion, or belief, even though conclusory in form, may be actionable under 14（a） as misstatements of material fact within the meaning of Rule 14a-9.）

關 鍵 詞

“freeze-out” merger（強取合併）; proxy solicitation（委託書之徵求）; informational statement （資訊聲明）; materially false or misleading statement （重大不實或誤導之聲明）;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1934 年證券交易法）;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 Rule （證券管理委員會規則）; essential link （重要關聯）; conclusory （結論性的）; corporate action （公司行為）; congressional intent （國會意思）; implied private cause of action （默示私訴因）; nuisance litigation （濫訟）。

（本案判決由大法官 Souter 主筆撰寫）

事 實

First American Bank of Virginia（以下簡稱「銀行」）為 First American Bankshares, Inc.（以下簡

稱「FABI」）完全控股之子公司，在「銀行」與上訴人 Virginia Banks, Inc.（以下簡稱「VBI」）的合併案中，「銀行」的執行委員會及董事會同意以每股 42 元之價格，購買少數股東的持股，少數股東於合併後，即喪失其於「銀行」之股權。雖然維吉尼亞州法律僅要求合併案於向股東發出訊息聲明書後，即可交付股東會表決，上訴人（petitioner）「銀行」之董事會仍徵求委託書以表決該合併案。徵求書要求通過合併案，並聲明由於少數股東可就其持股獲得「高」價，該案已獲董事會核可。被上訴人（respondent） Sandberg 拒絕提出委託書，並於合併案核准後，向地方法院起訴，以上訴人違反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以下稱「證交法」）第 14（a）條及證券管理委員會規則（以下稱「證管會規則」）第 14a-9 條之規定，以重大不實或誤導之聲明徵求委託書爲由，請求損害賠償。被上訴人主張董事認爲如欲保持其職位，除建議合併外，別無選擇。在審理程序中，法官指示陪審團，只要被上訴人所指控者爲重大不實聲明，且委託書之徵求在合併程序中屬「重要關聯」（essential link），被上訴人不須證明其信賴該不實聲明，即可獲勝。被上訴人獲得持股報價與實際公平價格間之差額之判決。其他被上訴人於另案提起類似請求並獲勝訴。上訴法院以徵求委託書的某些聲明，包括股價之聲明，屬重大誤導，即使完成合併不需被上訴人之表決權數，被上訴人仍得提起訴訟爲由，而維持原判決。

判　決

上訴法院的判決廢棄。

理　由

1.明知不實之理由、意見或信念（belief）之聲明，縱然形式上爲結論性（conclusory）的陳述，依證交法第 14（a）條規定，仍可基於其屬證管會規則第 14a-9 條所稱之關於重要事實之不實陳述，而提起訴訟。

（a）該等聲明依第 14（a）條之規定，並非當然（per se）不得起訴。公司董事就其建議行爲所作的確信聲明，或對其建議之理由的說明可能相當重要，因爲一個合理的股東極可能在決定如何表決時，認爲該聲明或解釋是重要的。

（b）理由、意見或信念之聲明，爲證管會規則所稱「有關重要事實」的聲明。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案並不支持上訴

人之觀點，亦即不認爲前述聲明基於政策之理由，應置於證管會規則的範圍之外。在前述案件中，只有眞正的股票買賣者才有權依證交法第 10（b）條提起訴訟。因非確定性的買賣者可能製造假設性訴訟（hypothetical action）請求，不受獨立證據的約束，而有濫訟（nuisance litigation）的風險，相對的，董事會建議的理由或信念的聲明，是董事會依其所述理由或所持信念而行事的事實聲明，或有關其所述理由或信念的主題的聲明，因此，這些聲明是必須記載的公司記錄，可受到非原告所能控制的客觀證據的支持或攻擊。商業上結論性用詞（conclusory terms）亦應具有事實基礎。可證明的事實提供支持或否定結論性判斷（conclusory judgment）的理由。正如同更爲明確之事實聲明，該等判斷之措辭可以在知其爲事實或虛僞不實的情況下記載，並透過正統的證據程序接受防禦或攻擊。在本案，被上訴人提出有關「銀行」資產的事實及實際與潛在營運水準，以證明董事會之聲明對於股價有誤導之情形，且董事會之信念具有錯誤。但僅憑董事的懷疑（disbelief）或未透露的動機，並不足以支持第 14（a）條的訴訟。

（c）即使委託書資料透露不實聲明之事實基礎，亦不能限制不實聲明之責任，除非其不一致情形極爲明顯而足以抵銷誤導之結論對合理股東之影響。本案證據不足以使陪審團認定不實聲明表面上的重要性已被抵銷。

2.被上訴人不能證明依第 14（a）條規定，得請求損害賠償之因果關係。

（a）對於其表決權數依法或依公司章程並非核可徵求委託書之公司行爲所需之股東，如容許其得依 J.I. Case Co. v. Borak 案提起默示私人訴訟（implied private action），則會將 Borak 案之訴因範圍擴大至前述 Mills v. Electric Auto-Lite Co.的範圍之外（後一案件認爲委託書之徵求與董事建議及依法核可相關行爲所需之表決權數有關聯時，該委託書之徵求屬「重要關聯」），由於證交法及其立法背景均不能證明國會有意承認訴因（cause of action）之範圍至被上訴人所主張的那樣廣闊，擴張 Borak 案之權利有嚴重窒礙。任何違反聯邦法律的訴訟私權（private right of action），最終有賴國會擬給予私人救濟（private remedy），見 Touche Ross & Co. v. Rodington, 442 U.S. 560, 575 一案。獲得承認之權利，其範圍一般而言不得逾越國會所預期之程度。不過，本院於

面對擴張（round out）默示私人訴訟範圍應給予平等對待之要求時，應依政策原因決定權利的外部界限。

（b）被上訴人主張有重要關聯，因爲 VBI 及 FABI 爲防止少數股東之惡意，不願在取得委託書所表彰的核可前，進行合併。本院不採此說法。正如同 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之情形，透過董事取得不具實質意義的表決權數（cosmetic vote）的意願去推論是否有關聯的理論（theory），本來就有發生投機性請求（speculative claims）及程序困難之可能。是否有因果關係牽涉到董事會如未獲少數股東核可時，會有何想法及做法的推論。這些問題並不清楚，其訴訟費時曠日，且其解答並不可靠。

（c）被上訴人不能依賴委託書聲明在本案中構成重要關聯的理論，因爲該聲明是依維吉尼亞州法律避免訴訟的方法之一，依該法律規定，對於董事有利害衝突的交易，倘少數股東於該交易之重大事實及利害衝突之情形揭露後，仍核准該交易，則股東不得撤銷該交易。對於股東因不實或誤導之委託書聲明而喪失州法的救濟時，第 14（a）條是否提供聯邦法的救濟，由於法律及本案事實均未表示委託書之徵求造成此種救濟之喪失，本院不必解答此問題。

撤銷 891 F. 2d 1112 案。

本　文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第 14（a）條授權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證管會」）採納徵求委託書之規則，並禁止違反這些規則。在 J.I. Case Co. v. Borak 案中，我們首度就違反第 14（a）條（由證管會規則第 14a-9 條實施），承認有默示的訴訟私權。第 14a-9 條規定禁止以重大不實或誤導之聲明徵求委託書。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以解釋董事建議某項公司行爲之原因爲目的，用結論性或說明品質的措辭（qualitative terms） 所表達的聲明，是否會構成證管會規則 14a-9 條所定義的重大誤導，以及依 14（a）條可賠償之損害，其因果關係是否可由依法或依公司章程其表決權數並非爲核准徵求委託書之公司行爲所需之少數股東之一名成員予以證明。我們認爲明知不實之理由聲明，縱然在形式上爲下結論式的陳述，亦可起訴，但國會未表示將第 14（a）條的私人訴訟擴大至該等股東，因此被上訴人無法證明擴大適用所需的衡平法理由。

I

FABI 爲銀行控股公司，在 1986 年 12 月，開始進行「強取」合併（freeze-out merger），將「銀行」（First American Bank of Virginia）併入 FABI 完全控股之子公司 VBI。VBI 持有「銀行」85%之股份，其餘 15%由大約 2000 名少數股東所持有。FABI 委託投資「銀行」公司 Keefe, Bruyette & Woods（以下簡稱「KBW」）就少數股東持股的適當價格提供意見，而少數股東於完成合併後，將喪失其於「銀行」之股權。KBW 依照市場報價及來自 FABI 未經查證的資料，向「銀行」執行委員會提出意見，認爲少數股東持股的公平價格爲每股 42 元。執行委員會核准以該價格進行合併計畫，全體董事接著同意。

雖然維吉尼亞州法律僅要求合併案於向股東發出訊息聲明書後，交付股東會表決，但董事會卻徵求委託書，將合併案於 1987 年 2 月 21 日之股東會表決。在徵求書中，董事會要求通過合併案，並聲明由於少數股東可以獲取「高額」股價，他們已核准該案，但董事會於其他場合則形容該股價爲「公平」價格。

雖然大部份少數股東提出委託書，但被上訴人未提出，在合併案通過後，被上訴人向維吉尼亞州東區地方法院對 VBI、FABI 及「銀行」董事會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提出二項指控（counts），其一爲徵求委託書違反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 14（a）條及證管會規則第 14a-9 條，其二爲董事會依州法對少數股東構成違反受任人義務。就第一項指控，被上訴人主張董事會不認爲其提出之價格爲高價或合併條件爲公平，但僅爲保有其職位之目的，不得不建議合併。在審理程序中，被上訴人援引本院於 Mills v. Electric Auto-Lite Co.案之意見，獲法院指示陪審團，只要被上訴人指稱的不實聲明屬重大事實，且徵求委託書在合併程序中具「重要關聯」，被上訴人不須證明其信賴該聲明，即可獲得有利之判決。

陪審團認定所有被告均違反證管會規則第 14a-9 條，且「銀行」董事會違反受任人義務，並就被上訴人的二項指控，作出對其有利之決定。陪審團認爲倘被上訴人之持股經適當評估，其價格應爲 60 元，因此認定被上訴人應獲得 18 元之差額。

在被上訴人之案件審理中，數名其他未提出委託書的少數股東，根據類似主張，另向哥倫比亞

區地方法院對上訴人提起訴訟，此案被移送維吉尼亞州東區地方法院。上訴人之案件審理終結後，這些股東成功獲得簡易判決。

本案上訴後，第四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判決，認爲徵求委託書的某些聲明依證管會規則屬重大誤導，雖然被上訴人的表決權數非完成合併所需，仍得提起訴訟。由於本案所涉問題具重要性，本院准許上訴。

II

上訴法院確認上訴人須對重大誤導而違反證交法第 14（a）節的兩項聲明負責，其一爲「董事會已核准合併計畫，因爲該計畫爲「銀行」的大眾股東提供取得高股價的機會。」上訴人主張措詞不確定及無法證實之意見或信念聲明，依證管會規則第 14a-9 節之定義，並非可起訴之有關重大事實之不實陳述，且記載該意見或信念聲明之委託書徵求書，如含有足以使讀者自行獨立判斷之事實聲明時，不得就該意見或信念聲明起訴。

A

我們首先審酌理由、意見或信念之聲明是否當然可以起訴。由於該項聲明依其定義係爲表達發言者心中的感覺，我們解讀陪審團之認定爲認定董事會在作成信念及意見之聲明時，明知其並無該等信念及意見，我們僅討論這樣的聲明。此等聲明具有重要性，並無重大疑問。關於構成證交法第 14（a）條責任之重要性要求的定義，我們認爲一件事實具有重要性，「如合理的股東極可能在決定如何表決時，認爲該事實具有重要性。」我們認爲公司董事會對其建議之行動，或建議該行動之理由所表達之信念，具有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股東瞭解董事會的知識及專業通常遠超過一般投資人，由於州法通常要求董事作出判斷時，應以股東之利益爲依歸，董事所被認知具有判斷的優勢更屬顯然。因此當股東面臨徵求委託書之請求時，當然認爲知悉董事對其建議採取之行動之信念及其促請股東接受該行動的特定理由具有重要性。

B

1.

倘該聲明具重要性，接下來的問題爲：理由、意見或信念之聲明是否爲「有關重大事實」之聲明而屬證管會規則之範圍。上訴人主

張，如本院因爲董事會非因其所述之理由而建議合併，從而認定其構成責任，則本院將爲可證明事實範圍之外的不確定爭點，浪費訴訟。上訴人並引述 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案，請求本院確認（recognize）將前述聲明排除於證管會規則之外具合理政策理由。

本院同意 Blue Chip Stamps 案具啓發性質，它能說明在事實的爭訟中易處理及不易處理者之分界線，但不認爲該案支持上訴人之主張。Blue Chip Stamps 案的爭點爲對於違反證交法第 10（b）節（禁止於買賣某些證券時有操縱及詐欺之行爲而違反證管會規則），那些類別之原告得以默示私訴因（implied private cause of action）尋求救濟。在該案中本院反對將原告之範圍，從眞正的買受人及出賣人擴大納入信賴不實銷售資料而未實際買賣之買受人及出賣人。我們認爲尋求賠償而提出控訴之眞正買受人及出賣人必須說明其買賣股份的特定數目，以計算並限制隨後之補償。如承認對於未確定的投資人亦須負責，將使法院窮於應付不受可證明事實節制，而依據原告有關其可能買賣「主觀假設」股數之訴訟，擴大濫訟（nuisance litigation）之風險，而這些訴訟可能因拖延發現事實程序（discovery），及請求係依未附證明之個人主張而更加複雜，且不願提早解決。除了法條及先例分析外，Blue Chip Stamps 案更依據這些政策考量而移轉了濫訟的威脅，該等訴訟幾乎都必須仰賴口頭證言去證明模糊不清的事實。

但對於董事會理由或信念聲明之攻擊，不需承受這些威脅。此等聲明從兩種意義而言，屬於事實之聲明，其一爲該聲明爲董事會依其所述理由或所持信念行事之聲明，其二，該聲明爲關於其表達之理由或信念之主題之聲明。該等聲明之證明或反證均與 Blue Chip Stamps 所表達的疑慮無涉。這些疑慮源自原告製造假設性訴訟請求之能力，而不受獨立證據之約束。相對的，董事會建議的理由或信念之聲明是必須記載的公司紀錄，可受到非原告所能控制之歷史事實證據之支持或攻擊。這些證據不僅包括公司會議記錄及董事會的其他聲明，且包括與事實有關的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可證明用來支撐其主張之理由的事實，和根據該等理由爲建議或爲其他行使該等證據之聲明是否誠實，而此點在這些理由或信念與金錢評估有關時，格外清晰。

上訴人辯稱本案產生責任之聲明並非以金錢表示理由，而是以

「不明確且無法證實」之用詞「高」價值來表示，與合併之條件對股東是「公平的」之主張相類似，這樣的主張並無可採。上訴人的反對意見忽略了一項事實，即在商業上此等結論性用詞可合理瞭解具有事實基礎，可證明這些用詞是正確的，若無該事實基礎，這些用詞會造成誤導。可證明的事實可提供支持或否定結論性商業判斷（conclusory commercial judgment）之理由，正如同更爲明確之聲明，該等判斷之措辭可以在知悉其爲眞實或虛僞不實的情況下表達，並透過正統的證據程序接受防禦或攻擊，而此程序可證明前述商業判斷是否具有正當性。……在本案，對少數股東而言，42 元是否「高價」，合併計畫是否「公平」，均視有關「銀行」資產及其實際及潛在經營水準（levels of operation）之可證事實，於依公認之估價方式評估時是否證明其價值高於、低於或大約爲 42 元而定。

被上訴人提出前述事實之證據，證明該聲明之主題有誤導之情形，並爲董事會理由之不實表達。雖然委託書聲明說明 42 元高於帳面價值及市價，但證據顯示，依「銀行」持有不動產之增漲價值計算其帳面數字，該金額並無溢價之情形。有關市價重要性的證據顯示，KBW 承認市場是封閉的（closed）、清淡的，且爲 FABI 所主導，但聲明上並無此等事實之記載。實際上，證據指出「銀行」之繼續經營（going concern）價值爲每一普通股高於 60 元，此一事實亦從未揭露。無論董事會之聲明係用如何結論性的措詞，因其可接受非原告控制或製造之普通證據之攻擊，所以容許被上訴人主張稱 42 元爲「高價」有誤導之情形而可獲得賠償，不致造成無限責任或濫訟之不當風險。

此項分析符合本院於 TSC Industries 案就同一問題所表達之最近意見。在該案中，本院撤銷對原告有利之簡易判決，該案原告係針對一項將少數股東的補償形容爲「較現有市價高出相當多」的陳述提起訴訟。本院認爲依該案未爭議之事實，結論性的形容詞「相當多」在法律上並無重大誤導之情形。但本院發回更審，係假設該陳述符合證管會規則第 14a-9 條所稱的重大誤導，並得依證交法第條 14（a）起訴。

2.

因此，依證交法第 14（a）條，即使特定理由之聲明是以結論性用詞敘述，原告亦得證明該聲明有明知爲不實或發生誤導之不完整

之情形。在獲致此結論時，我們已審酌在此舉例說明的此種理由聲明，該聲明錯誤敘述表達者的理由，並對於其所述主題（即股價）有誤導之情形。信念之聲明只有在前者的情形可加以反對，但只有在該聲明錯誤敘述表達者相信其所述事項的心理事實時，始有適用。在本案，上訴法院有提到此種有限的虛僞不實（limited falsity），亦即「陪審團當然有理由相信董事會不認爲每股 42 元的合併價格符合少數股東的利益，他們是爲了別的理由，也就是爲了保持他們的董事席位而表決。」

另一問題是，如缺乏前述種類的客觀證據，證明該聲明亦明示或默示主張有關其主題之虛僞不實或誤導之事項，而僅僅是懷疑（disbelief）或未透露的信念或動機，是否足以構成支持第 14（a）條訴訟的基礎。我們認爲，僅是懷疑或未透露之信念之證明，不足以構成 14（a）條之責任，如果本案沒有其他的要求或證明，我們將以該理由廢棄原判。

從某方面而言，只有懷疑或未透露動機的證據，而不能進一步證明該聲明之主題有瑕疵的案件，是罕見的。雖然我們不認爲董事會之明白承認懷疑不足以證明委託書聲明有虛僞不實或誤導情形，但此種不尋常的承認通常不會單獨成立，我們要求原告證明該聲明就其主題所明示或默示宣告的事項，有虛僞不實或誤導之情形，不會實質縮小訴因。

在另一方面，不能證明委託書對其主題有虛僞不實或誤導之情形，而僅憑懷疑或未透露之動機課以責任，會使第 14（a）條的訴訟包括只處理所謂董事「不乾淨的心」（unclean heart）的「雜質」（impurities）。我們認爲這超越了 Blue Chip Stamps 所畫下的界線……因此，我們認爲僅有懷疑或未透露之動機，不足以符合第 14（a）條所要求的事實要素。

C

上訴人的備位（fall-back）主張採取我們於以上第 II-B-1 部份所述的結論性判斷及其基本事實間的關係。上訴人辯稱即使理由或信念的結論性聲明依第 14（a）條可以起訴，我們亦只能在委託書資料未透露不實聲明之事實依據的情形下，始能課以責任。如果股東已獲得委託書建議之聲明理由有誤導情形之證據，並有機會自行作出該結論，則不應給予司法救濟。

此項主張的答案視單純的誤導聲明與重大誤導之聲明間的差

異而定。雖然誤導之聲明不因加入其他眞實部份而失去其欺騙之性質，但眞實的聲明可明顯的使其他聲明不足爲信，因而將眞正受騙的風險降爲零。由於第 14（a）條的責任必須含有詐欺及重要性兩項因素（即具有使合理投資人決定如何表決的重要性），上訴人主張在委託書聲明公佈正確事實可使誤導之敘述無足輕重而不致發生責任確屬的論。

但並非每一混合眞相之聲明均可抵消（neutralize）其欺騙性質，如需財務分析師始能發現兩者間的不一致（tension），仍具實質誤導性質，並構成責任。．．．委託書的目的在於告知而非挑戰讀者的鑑別智慧。惟有在不一致的情形足以消除誤導之結論對合理股東之影響時，第 14（a）條之訴訟始能因不具備重要性之因素而不成立。

本案上訴人提出之證據不足以使陪審團認爲誤導之聲明表面上的重要性已被抵消。例如，董事會主張他們已表示想在合併後保留席位，此種陳述已足以說明其建議的進一步理由，可是至少一名董事在作證時承認，若非支持該合併建議，他們不期待會被保留席位，此一事實卻未揭露。雖然委託書聲明形容合併價格高於最近銷售的股價符合事實，但並未提到被 FABI 掌控的封閉市場。董事會指出的這些已揭露的事實，只是半眞半假，且記錄顯示，他們提出的另一項事實聲明甚至更糟。證據顯示由於「銀行」不動產增值，因此公司的帳面價值高於董事會所承認者，此一事實導致合併價格高於帳面價格的主張顯有爭議。最後，委託書徵求聲明並未提到，相對於 42 元的合併價格，「銀行」的繼續經營價值超過每股 60 元。總之，本案聲明是否正確，較本案聲明是否重要，更有令人信服的證據。

III

第二個問題是，透過第 14（a）條之默示私訴訟權利應受補償的損害，是否可由一群少數股東之一員證明因果關係，而依法或依公司章程，這些股東的表決權並非核可系爭交易所需。這個問題在 Mills v. Electric Auto-Lite Co. 案中，並未解決。J.I. Case Co., v. Borak 案並未處理因果關係的要件，或定義那一類原告可依 14（a）條訴訟，但其意見認爲某類股東可獲得私訴因，此意見在 Mills 案因有較確定的因果關係概念而變得更清晰明確，我們在該案中討論系爭合併主張徵求委託書之不實聲明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有充份證據。

雖然 Mills 案的多數股東控制剛好過半數股份，但核准合併之提議需有三分之二投票數之同意。在委託書取得並辦理合併後，少數股東提起訴訟。問題是，原告對於因 14（a）條之違反而受有損害的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是否必須證明徵求委託書之瑕疵「對於表決具有決定性影響」。．．．Mills 案的審理法院認爲，藉著證明核可公司行爲的必要充分少數委託書是依據徵求之本旨而提供，可以確定損害與委託書之重大不實聲明有因果關係。爲形容該因果關係，法院稱委託書之徵求爲「完成交易的重要關聯（essential link）」。相對於針對不具核可建議行動依法律或章程所需表決權之一群少數股東之徵求，法院發現該案之徵求具有重要性，並留待日後決定該少數股東是否可證明因果關係。

在本案，被上訴人針對 Mills 案未解答的問題提出兩個論據（theories），主張依 Mills 案因果關係的檢驗標準，董事會向他們提出的委託書之徵求具「重要關聯」。首先，他們主張該關聯存在，因爲若非少數股東委託書所表彰之核可，VBI 及 FABI 將不願進行合併，而如果不是因爲明顯不實的徵求聲明及誤導性遺漏，該等股東不會提出委託書。關於此理由，因果關係取決於是否有避免不良股東的願望或公共關係而定，而因果關係的特性並非來自當事人可執行與公司的權益關係，而是來自一方是否了解他方的惡意。

被上訴人又辯稱委託書聲明爲董事會建議與合併之間的重要關聯，因爲這是符合州法規定需少數股東同意之方式，以避免合併因「銀行」董事 Jack Bedow 的利益衝突造成合併得撤銷（Jack Bedow 投票贊成合併但同時擔任 FABI 之董事）。依 Va. Code Ann. 13.1-691（A）（1989）規定，少數股東在關於交易之重大事實及董事之利害關係揭露後之核可，是防止合併嗣後因利益衝突而受攻擊的三個途徑之一，另外兩個途徑爲類似揭露後「銀行」董事會之追認，以及證明合併對公司是公平的。關於此論據，因果關係取決於利用委託書聲明以取得足以阻止少數股東展開宣佈合併無效之程序所需之表決權數。

雖然被上訴人提出這兩項論據證明因果關係，主張委託書聲明爲「重要關聯」，但這些論據並未顯示就 Mills 案的原因結果（causal sequence）意義而言，爲具有重要性，在該案中，委託書之徵求將董事會建議和核可建議行動依法所需之表決權串連，因此，如採納任

一前述論據，Borak 案的訴訟範圍將擴大到 Mills 案的範圍之外，並將有權提起 Borak 案訴訟之原告，擴張爲包含某些股東，而這些股東的核可並非徵求委託書之交易所需。

在評估前述擴大或擴張的合法性時，須適用某些規範聯邦法規默示規定之訴訟權利之承認的基本原則，其中第一項事實上並非 Borak 案意見的重點。自從 Borak 及 Mills 案判決的數年以來，新的原則爲：對於違反聯邦法律的訴訟私權的承認，最終有賴國會提供私人救濟之意旨，其必然的結果爲一旦權利範圍獲得承認，一般而言，不得擴張至國會預期的範圍之外。

此原則及必然之結果對被上訴人嚴重不利，因爲我們看不出國會有意承認訴因（或原告之類別）至被上訴人的因果關係論據所主張的那麼大的範圍。Borak 案的法院意見表示「保障投資人」的法律目的，促使國會產生於「必要」時提供司法救濟的意思。但 Borak 案對國會想法的探索並未眞正針對訴訟私權．．．．事實上，探索授予訴訟私權之意旨的重要性直到後來才變得清晰，到了更後面，此意旨才在決定承認私人救濟的諸多考量中，占最重要地位。在處理依證交法第 17（a）條所主張的私權時，我們說明了「主要的問題仍爲國會是否有意創設私人訴因」。

從證交法內容及立法歷史，並不能幫助瞭解任何私權的預定範圍。依眾議院報告（House Report），國會有意促進股東表決權之「自由行使」，並保障「公平的公司投票權」不致因爲諸如委託書徵求聲明對於表決事項的「眞相」有所隱匿而遭濫用。雖然這些報告清楚顯示國會確有保障投資人使其不受不實資訊的影響而受損的意思，但國會對於以私人訴訟方式維護此種保障的範圍，並未規定。由於沒有規定，或許可以主張若第 14（a）條之受益人不能參加爲私人訴訟當事人，該條規定恐無法有效執行。但是此種推斷國會意旨的主張，其效力視國會認爲的必要程度而定。但由於國會於證交法第 9（a）、16（b）及 18（a）條明文規定訴訟私權，推論國會有依賴默示之私人訴訟以阻止違反第 14（a）條之迫切性，是有困難的。

因此，國會的緘默對於擴張 Borak 案所認知的因果關係，雖是重大障礙，但未必是不可克服的障礙。本案並不是近年來想要擴張國會最初從證交法推定但無「確定指引」（conclusive guidance）的訴訟範圍的第一個案件，我們可以參考稍早的案例（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找到對此擴張範圍的請求的適當回應。在該案中，法院同意私人法定權利（private statutory rights）的法律架構（structure）未清楚顯示國會意旨時，如其結果對持有與先前已獲承認之主張相類似的請求權的可能原告顯然不公者，該架構之輪廓（contours）不必完全凍結（frozen）。在該案中，面對擴張（round out）默示法定訴訟私權的範圍應給予平等對待的請求，法院依賴政策理由以決定該權利的外部界限（outer limit）。在本案，法院面臨被上訴人對於私人救濟之請求，使其和擁有最初公司行爲所需之投票權之股東立於平等地位，將循前例處理。

A

…被上訴人的第一個論據爲：避免少數股東惡意之意願，足以證明承認委託書聲明與少數股東之間有必要之因果關係係正當的。在 Blue Chip Stamps 案中，法院對於允許依證交法第 10（b）條及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規定，根據假設的（hypothetical）買受人及出賣人對一連串從未發生之事實可能會採取之行動的證據而准予損害賠償的實際後果，表示疑慮，並預見任何此種擴張之責任將啓動「模糊的」（hazy）爭議而引來自助的（Self-Serving）證詞，干擾性訴訟（strike suit）、 長的證據調查程序，而在審判前程序中，沒有機會合理解決惡意問題。這些都是在國會沒有明顯相反意願時，拒絕認可此等請求的好理由。

被上訴人基於董事會希望取得不具實質意義的表決權數（cosmetic vote）而有因果關係之論據，即具有投機性請求及程序困難之威脅。因果關係可能啓動對於公司董事會未獲得非授權公司行爲所需之少數股東核可時的做法及想法的推斷。不滿意的少數股東有權主張若非誤導聲明所獲的表面上核可，由於經營階層的怯懦，公司行動注定（doomed）失敗，而董事會方面有關假設性怯懦或假設性大膽之相反主張，在一般案件可能提供充份的證詞，導致除非在審判後由法官就證據可信度（credibility）加以判斷，否則無法取得任何司法解決。可靠的證據很少存在。董事會會瞭解有必要就計畫作出一些聲明，而不需少數股東的背書，即可進行，而證據調查程序只是探索與官方聲明相左的口頭會話記憶，希望就董事會在未獲得少數核可時，可以忍受多少批評，爲事後的臆測找到證明。這些

問題並不清楚，其訴訟曠日費時，且其解決並不可靠。如有選擇機會，我們會拒絕採納會引起這些情況的任何因果關係論據，而我們在本案亦拒絕此論據。

B

源自有關合併後追認的維吉尼亞州法律的因果關係必要性理論，其目的爲從徵求委託書的功能找出其重要的特徵，該功能爲取得少數核可，以避免少數股東爲攻擊合併而提起之訴訟。由於關聯性爲阻止某類股東尋求其於其他情況所可獲得的州法救濟程序的一個步驟，因果關係之理論繫於一項政策主張（proposition of policy），即倘虛僞不實或誤導之委託書聲明，造成以股東身份起訴之原告依州法喪失行使州法權利之救濟時，第 14（a）條應提供聯邦法之救濟。被上訴人同意證管會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法律顧問之建議，在少數股東受誤導之委託書聲明之誘引而投票核可某項交易，致喪失估價救濟（即請求買回等）州法權利，或該股東因委託書聲明之不實陳述，致無法取得其原可取得之禁止造成損害交易之命令時，應認爲有因果關係。被上訴人主張本案中，基於 Va. Code Ann. 13.1-691（A）（2）（1989） 應承認前述因果關係關聯，該條款規定若干條件，以避免少數股東基於 Beddow 案的利害衝突理由主張合併無效。

但本案法院無須認定第 14（a）條是否因喪失州法救濟而產生一訴因，因爲根據法律或事實，該委託書之徵求均未造成此種損失。假設被上訴人主張委託書聲明形容有重大誤導之情事是合理的，依維吉尼亞州的前述條款，即使根據該委託書聲明取得少數股東贊同票，該合併案以後仍得因利害衝突之理由而受到攻擊。如果少數股東在交易的重要事實及利害衝突情形均已揭露後仍予追認該交易，則州法禁止股東再根據董事有利害衝突而主張交易無效。假設關於合併之重大事實及 Beddow 案的利害關係未正確揭露，由於少數表決權依州法不足以核可合併，並無喪失州法之救濟可言，因此也就無法將委託書的徵求，與少數股東無法依州法彌補之傷害連結在一起。此外，本案主張該聲明書造成被上訴人錯誤之確信，認爲一直到提起訴訟的時效期間經過後，始有機會撤銷合併，此項主張亦不成立。

本院廢棄上訴法院之判決。

（其他法官意見略）

44. U.S. v. O'Hagan
521 U.S. 642（1997）

黃慶源 節譯

判 決 要 旨

對機密資訊之資訊提供者違反受任人義務而不當挪用該資訊，以謀求私利而交易證券之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及證券管理委員會規則第 10b-5 條。

（A person who trades in securities for personal profit, using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misappropriated in breach of a fiduciary duty to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may be held liable for violating §10（b）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and SEC Rule 10b-5.）

A. 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禁止（1）使用任何「詐欺方法」，（2）以從事「與買賣任何證券有關」、並違反證管會規定之行為。證管會依第十條 b 項之授權而制定規則第 10b-5 條；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所禁止之行為，並未超出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之授權範圍。

（ Section 10（b） of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proscribes （1） using any "deceptive device" （2）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urchase or sale of any security," in contravention of SEC rules. The Commission adopted Rule 10b-5 pursuant to its §10（b） rulemaking authority; liability under SEC Rule 10b-5 does not extend beyond conduct encompassed by §10（b）'s prohibition.）

B.「不當挪用」是第十條 b 項之適當主題，因其符合條文中之要件—「與證券交易相關」之「詐欺方法」。

（Misappropriation is the proper subject of a §10（b） charge because it meets the statutory requirement that there be "deceptive" conduct "in connection with" a securities transaction.）

關 鍵 詞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 Rule 證券管理委員會）；misappropriation （不當挪用）；fiduciary duty （受任人義務）；tender offer （公開收購股份要約）

（本判決由大法官 Ginsburg 主筆撰寫）

事 實

在 Grand Metropolitan PLC 公司（以下簡稱 Grand Met 公司）聘請 Dorsey & Whitney 法律事務所代表 Grand Met 進行對 Pillsbury Company 公司（以下簡稱 Pillsbury 公司）公開收購普通股之要約後，Dorsey & Whitney 法律事務所（以下簡稱 Dorsey & Whitney）中非承辦該案之合夥人（即被告）O'Hagan，開始購買 Pillsbury 公司之買入選擇權（call option）及股票。於 Dorsey & Whitney 法律事務所終止對該客户之代表權後，Grand Met 公司對外宣布其公開收購股份要約，Pillsbury 公司股價因此遽升，O'Hagan 便售出其買入選擇權及持股，獲利逾 430 萬美元。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簡稱「證管會」）調查後，對被告提出共計 57 項控訴，包括 O'Hagan 詐欺其法律事務所及客户 Grand Met 公司，爲圖利個人進行交易而不當挪用關於前述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之重要非公開資訊，構成證券詐欺（Securities Fraud），違反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以下簡稱證券交易法）之第十條 b 項與證券管理委員會規則第 10b-5 條（SEC Rule 10b-5，以下簡稱證管會規則）而構成證券詐欺（Securities Fraud），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及證管會規則第 14e-3 條 a 項而構成詐欺交易，以及違反聯邦郵件詐欺及洗錢法。陪審團宣判前述罪狀均成立，O'Hagan 被判刑入獄。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廢棄前判決，認爲證券交易法第 10 條 b 項及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之法律責任，並不能建立在檢察官所依據之證券

詐欺「不當挪用理論」之上；證管會規則第 14e-3 條 a 項逾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之授權範圍，因證管會規範該條規定並未以違反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obligation）爲要件；而郵件詐欺及洗錢罪之成立係以違反證券交易法爲前提，故當證券詐欺罪不成立時該等罪亦不能單獨成立。

判　決

原判決廢棄並發回更審。基於本院關於證券詐欺之判決，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對郵件詐欺罪狀之決定應予廢棄。O'Hagan 基於不同理由對郵件詐欺判罪之質疑，尚未經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審理，因此仍待發回後審理。

理　由

1. 對機密資訊之資訊提供者違反受任人義務而不當挪用該資訊，以謀求私利而交易證券之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及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

（a)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禁止（1）使用任何「詐欺方法」,（2）以從事「與買賣任何證券有關」、並違反證管會規定之行爲。證管會依第十條 b 項之授權而制定規則第 10b-5 條;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所禁止之行爲，並未超出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之授權範圍。依照內線交易之「傳統」或「古典理論」，當公司內部人士利用其職務取得之重大機密資料而交易該公司證券，即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此種交易符合使用「詐欺方法」之條件，因公司股東與該內部人士間存在著信賴與信任之關係，基此而產生了告知義務與避免交易之義務。而依據政府在此主張之「不當挪用理論」，當公司之「外部人士」基於證券交易目的而挪用機密資訊，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及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是因其違反對該資訊提供者 （而非交易相對人）之受任人義務。

（b）上述定義之「不當挪用」，是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之適當主題，因其符合條文中之要件—「與證券交易相關」之「詐欺方法」。第一，不當挪用者藉由詐欺進行交易：受任人假裝對當事人忠誠，卻暗中利用委任人的資訊圖謀私利，此即詐欺委任人。公司機密資訊爲專屬公司之財產，未告知之資訊不當挪用與侵占類似。未告知之欺騙爲不當挪用理論法律責任的重點。因此，此理論與 Santa Fe Industries, Inc. v. Green, 430 U.S.

412, 473-476 判決一致，該判決強調第十條 b 項並非一禁止違反受任人義務之規範，而是禁止操控（manipulation）或詐欺之行爲。反之，充分的告知（full disclosure）則免除法律責任：此乃因爲詐欺爲該理論之重點，而詐欺涉及對資訊提供者假裝忠誠，如果受任人告知資訊提供者其有意利用前述資訊進行交易，則「詐欺」並不存在，亦不違反第十條 b 項。第二，第十條 b 項之要件爲不當挪用資訊進行「與買賣證券有關」之行爲，其要件該當於不當挪用者在未告知委任人的情況下利用該資訊買賣證券之時，而非於其取得機密資訊時。因此，即使被詐欺之主體並非交易之相對人，而係未公開資訊之資訊提供者，交易與義務之違反發生時點仍然一致。由於利用非公開資訊進行未告知的交易，不但欺騙了資訊提供者，亦對投資大眾造成傷害，前述理論符合證券交易法的立法目的：確保一誠實的市場，從而增進投資人信心。如認爲 O'Hagan 是代表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之標的公司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就違反第十條 b 項，而如其事務所代表要約人便不違反，此種論點並不合理，且從該法條內容亦不能導出如此結論。

（c）第八巡迴上訴法院錯誤地認爲前述不當挪用理論不符合第十條 b 項之規定。首先，該法院將該理論理解爲不以「不實陳述」或「未告知」爲要件，然而如本院所解釋，詐欺的未告知爲構成第十條 b 項法律責任之重要要件。具體而言，O'Hagan 行爲之所以該當第十條 b 項之詐欺行爲，是因爲其未對 Grand Met 及 Dorsey 告知其個人交易，違反其應盡之義務。其次，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誤讀本院之判決前例，而判定依據 Chiarella v. U.S., 445 U.S. 222, 230, 232, 233、Dirks v. SEC, 463 U.S. 146, 655、與 Central Bank of Denver, N.A. v. First Interstate Bank of Denver, N.A., 511 U.S. 164, 191，唯有違反對證券交易當事人或其他市場參與者如投資人等之受任人義務時，始足以該當第十條 b 項之法律責任。Chiarella 明白表示不當挪用理論適用於類似本案情形是否妥當尚待討論，Dirks 亦未就不當挪用理論是否適用於類似本案之情形加以明述，而 Central Bank 之判決僅涉及依據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提起之民事訴訟，無涉刑事責任。

（d）與本院認爲刑事責任得依前述不當挪用理論成立之意見密切相關的是證券交易法中關於故意之規定，即政府須證明行爲人係故意（willfully）違反證管會規則

第 10b-5 條規定，及證券交易法規定如被告證明自己不知道規則規定，即不得被判刑入獄。前述法規中犯罪故意之要件，削弱了 O'Hagan 主張依據該理論決定刑事責任過於空泛之說服力。於本案發回後，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得就 O'Hagan 針對其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罪名之其他主張，作進一步審理。

2. 與本案有關的是，證管會於規則第 14e-3 條 a 項中，未要求證明系爭交易違反受託人義務，並未超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之授權範圍。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禁止「與任何公開收購股份要約相關之詐欺行爲」，並授權證管會「定義此種行爲，並制定合理措施防止之」。基於前述授權，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禁止任何人利用有關公開出售股權要約之重要非公開資訊，且其明知或可得而知該資訊係來自要約公司或發行公司之內部人士或爲其工作者，以進行交易，但如在買賣證券前之合理期間內，前述資訊及資訊提供者已對外公開該資訊者，則不在此限。依據證管會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無論交易人是否負有受託人義務而須尊重前述資訊之機密性，均應負告知或避免交易之義務。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認爲證管會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無效，理由之一是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授權證管會辨識及規範「詐欺」行爲，而非自行定義「詐欺」；其亦認爲依據 Schreiber v. Burlington Northern, Inc., 472 U.S. 1, 7-8，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之解釋應主導第十四條 e 項之解釋；且依據 Chiarella，未告知資訊要構成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之詐欺，只有在因其基於委任或其他同樣建立在信賴與信任之關係中有告知義務的情形，始得該當。本院毋需決定證管會在證管會規則第 14e 條中定義詐欺，是否逾越第十條 b 項之授權，因爲證管會規則第 14e-3 條 a 項適用於本案之案件類型時，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要求其「制定得合理防止」利用有關公開出售股份要約之非公開資訊進行詐欺交易行爲之措施。預防措施本就會將被禁止之核心活動以外之活動包括在內。依據第十四條 e 項規定，即使依普通法或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規定該行爲並非詐欺，證管會仍得禁止。因此，本院必須尊重證管會在這一方面的判斷，除非其判斷有武斷、反覆無常或顯然違法之情形。在本案中，證管會的判斷並無前述情形。認爲利用重大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往往涉及違反對出價人（bidder）或收購標的公司或其代表之保密義

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由於證管會明白手段高明的交易者往往得因證明不易而設法逃避責任，因此在證管會規則第 14e-3 條 a 項中規定「告知或避免交易」之要求時，不特別要求對受任人義務之違反乙事加以舉證。就防範如 O'Hagan 被控之挪用行爲而言，前述規定係證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規定適當行使防範之權力（prophylactic power）。就 O'Hagan 所提出有關證管會規則第 14e-3 條 a 項之其他質疑，即證管會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禁止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提出前之交易，與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規定不符且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問題，本院拒絕作出第一審決定。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得針對 O'Hagan 此項主張於發回時加以審理。

本　文

本案係有關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及第十四條 e 項之解釋與執行，以及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以下簡稱證管會）依上開法條訂定的證管會規則 （SEC Rule，以下簡稱規則）第 10b-5 條及第 14e-3 條 a 項。本案涉及兩個主要問題，其一是關於挪用重要非公開資訊進行證券交易，其二則是關於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中之詐欺行爲。特別要討論及解決的議題是：（1）行爲人利用其違反其對資訊提供者之所負之受託人義務（fiduciary duty）所取得之機密資訊交易證券以圖私利，是否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及證管會規則第 10b-5 條規定？（2）證管會制定之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禁止行爲人利用未公開之有關公開收購股份要約（tender offer）之資訊交易證券，即使其並不負有告知義務，是否逾越了證管會之被授權範圍？本院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爲「是」，關於第二個問題，就本案情況而言，答案爲「否」。

I.

被告 O'Hagan 原爲明尼蘇達州 Dorsey & Whitney 法律事務所（下稱 Dorsey & Whitney）合夥人之一。於一九八八年七月，英國倫敦的 Grand Met PLC 公司（下稱 Grand Met），由於考慮對總部設於明尼亞波利市之 Pillsbury 公司公開收購普通股，委任 Dorsey & Whitney 擔任當地代理人。Grand Met 及 Dorsey & Whitney 均採取措施保護 Grand Met 之公開收購股份計畫的機密性。O'Hagan 並未參與代理 Grand

Met之事務。Dorsey & Whitney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九日不再代理Grand Met之事務。未及一個月後，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四日，Grand Met對外宣布其公開收購Pillsbury股份之要約。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當時Dorsey & Whitney仍爲Grand Met之代理人，O'Hagan開始買進Pillsbury股份之買入選擇權，每一單位選擇權賦予O'Hagan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之特定日期前購買100股Pillsbury股份的權利。O'Hagan之後於八月和九月，陸續買進更多Pillsbury股份之買入選擇權，迄九月底，其已持有2,500單位未到期之Pillsbury股票選擇權，顯然多於任何其他投資人所持有者。O'Hagan並於一九八八年九月，以低於每股39美元的價格，買進約5,000股Pillsbury普通股。當Grand Met於十月宣佈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時，Pillsbury股價上漲至每股近60美元。O'Hagan於是賣出其持有之Pillsbury買入選擇權及普通股，獲利逾430萬美元。

證管會對O'Hagan的交易展開調查，並提出共計達57項控訴。O'Hagan因利用Grand Met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之重要非公開資訊（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進行交易以圖私利，被控詐欺其法律事務所及該法律事務所之客户Grand Met。根據前項指控，O'Hagan利用此筆利潤，掩飾其先前侵占與盜用其他客户信託基金的行爲。O'Hagan並被控廿項郵件詐欺罪（mail fraud）、十七項證券詐欺罪（securities fraud）、十七項進行有關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之證券交易罪（fraudulent trading in connection with a tender offer）、三項違反聯邦洗錢法之罪（federal money laundering statutes）。陪審團宣判O'Hagan五十七項罪狀均成立，判處四十一個月有期徒刑。

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以相當分歧的意見，推翻O'Hagan的一切罪名。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認爲，證券交易法第十條b項及證管會規則第10b-5條規定之法律責任，不能建立在檢察官所援引之證券詐欺不當挪用理論（misappropriation theory）。上訴法院亦認爲，證管會規則第14e-3條a項禁止於持有有關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之重要非公開資訊期間進行交易，逾越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e項授權證管會之權限，因證管會之規則中並未以違反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爲要件。第八巡迴上訴法院進而認爲，O'Hagan之郵件詐欺及洗錢罪名係以違反證券法規爲前提，一旦證券詐欺罪被推翻，前述罪名亦不成

立。法官 Fagg 撰寫不同意見書，認爲應承認及適用不當挪用理論，並認爲證管會制定規則第 14e-3 條 a 項未要求證明違反受任人義務，並未逾越其被授權範圍。

上訴法院的決定，無視適用不當挪用理論於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十條 b-5 項規定之妥當性及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制定之規則第十四條 e-3 項 a 款之合法性。我們同意核頒移審令，並廢棄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

II.

本院首先探討上訴法院推翻 O'Hagan 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罪名部分。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追隨第四巡迴上訴法院，拒絕以不當挪用理論作爲第十條 b 項法律責任之依據。本院見解則與其他上訴法院相同，認爲第十條 b 項之刑事責任得建立於不當挪用理論之上。

A.

與本案有關之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之相關部分爲：

「不得直接或間接運用任何跨州商業、郵件或任何全國性證券交易所設備作爲工具（any means or instrumentality of interstate commerce or of the mails, or of any national securities exchange），—

……

（b） 於買賣任何於全國性證券交易所登記或未登記之證券時，使用任何操控（manipulative）或詐欺（deceptive）之方法，違反證管會爲促進公益或保障投資者所制定之規範。」

該條文禁止（1）使用任何詐欺方法（2） 違反證管會之規定買賣證券。條文文義並未侷限於欺騙證券交易之買方或賣方，而是包括與買賣任何證券相關之任何詐欺方式。

證管會依據第十條 b 項之授權，制定規則第 10b-5 條，與本案相關之規定爲：

「不得直接或間接運用任何跨州商業、郵件或任何全國性證券交易所設備作爲工具，使用任何方法（device）、計畫（scheme）或計謀（artifice），或……

從事以詐欺或欺騙他人之任何行爲、業務、商業，進行有關任何證券之買賣。」

我們過去的判決顯示，規則第 10b-5 條之法律責任範圍，並未逾越第十條 b 項之禁止範圍。

依據內線交易責任之「傳統」或「古典」理論，企業內部人士根

據重要非公開資訊買賣其所屬企業之證券，即違反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之規定。本院曾確認，根據此類資訊進行交易，即符合第十條 b 項所稱之「詐欺方式」，原因在於「公司股東與藉職位之便取得機密資料之企業內部人士間存有信賴與信任之關係（relationship of trust and confidence）」。本院認爲，基於這樣的關係，「產生了告知或避免交易之義務（duty to disclose or abstain from trading）」，以「防止企業內部人士……利用不知情股東獲利」。前述古典理論不僅適用於企業內之高階主管、董事、其他常設職務之內部人士，亦適用於律師、顧問與其他該企業之暫時受任人。

「不當挪用理論」則認爲，個人不當挪用機密資訊進行證券交易，因而違反了對該資訊提供者（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之責任，即爲從事與證券交易「相關」之詐欺，違反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規定。根據該理論，受任人未告知委任人，私下利用委任人之資訊買賣證券，違反忠實保密義務，詐取了委任人對該資訊之專用權。不當挪用理論因而並非建立於公司內部人士與買賣該公司股票者之受任人關係之上，而是因爲後來變成交易者之受任人（a fiduciary turned trader）欺騙了給予其接近機密資訊機會之委任人。

前述兩種理論是互補的，二者均討論利用非公開資訊買賣證券之情形。古典理論著重於公司內部人士違反其作爲交易相對人之股東之義務；不當挪用理論則基於公司「外部人士」（outsider）利用重要非公開資訊交易，係違反其對資訊提供者、而非交易對象之義務爲由，而禁止該交易行爲。因此，不當挪用理論是爲了保護證券市場之誠實性（integrity），使其免於受到可取得能影響公司證券價格之機密資料、但對該公司股東無受任人義務或其他義務之「外部人士」的濫用。

在本案中，O'Hagan 被指控違反對其所屬之 Dorsey & Whitney 法律事務所及其客户 Grand Met 之信任與信賴義務（duty of trust and confidence），利用 Grand Met 計畫對 Pillsbury 提出公開收購普通股要約之非公開資訊，進行證券交易。政府指控前述行爲構成與買賣證券相關之詐欺方法。

B.

我們同意政府之主張，認爲如上定義之不當挪用理論，滿足第十條 b 項之要件，即被控行爲係屬「與

買賣證券相關」之「詐欺方法」。首先，如政府所言，不當挪用者係以詐欺方式進行交易。受任人「假裝」對委任人忠誠，私下卻利用委任人之資訊圖利自己，而「欺騙」（dupe）或「詐欺」（defraud）了委任人。

本院曾於 Carpenter v. United States, 484 U.S. 19（1987）討論同類之詐欺行爲。該案涉及違反郵件詐欺法中之禁止「任何詐欺之計畫或計謀」。本院維持依據該法成立之罪名，認爲當受雇人將該資訊透露給共謀者圖利時，即違反其對其雇主機密資料保密之承諾。在 Carpenter 案中，本院認爲公司之機密資訊爲公司有專用權（right of exclusive use）之財產。未經告知而利用此類資訊，不但違反受任人義務，且構成類似侵占之詐欺（fraud akin to embezzlement），「不當挪用他人委託之金錢或物品爲個人目的之使用」。政府指出，在 Carpenter 案中關於濫用機密資料之討論於本案特別切題，因郵件詐欺法（如同第十條 b 項）一向被認爲必須以詐欺、而非僅以受任人義務之違反爲要件。

未告知之詐欺（deception through nondisclosure）爲政府所主張之法律責任理論重心所在。正如政府之訴訟代理人於言詞辯論中所說明的：「爲符合普通法關於受託人不得使用委託財產之要求，同意是必要的。爲符合證券法關於不得詐欺之規定，告知是必要的」。

政府所主張不當挪用理論與 Santa Fe Industries, Inc. v. Green, 430 U.S. 462 （1977）案之判決一致，該案判決強調第十條 b 項並非一禁止違反受託人義務之規範，而是禁止操控（manipulation）或詐欺行爲之規範。相對於本案政府之主張，在 Santa Fe Industries 案中，被控違反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規定之被告已告知所有相關的事實，因而並不存在前述規定所規範之未告知詐欺行爲。同理，充分告知免除了不當挪用理論下之法律責任：因爲詐欺爲不當挪用理論之重點，而詐欺涉及對資訊提供者假裝忠誠，如受任人告知資訊提供者其有意利用前述資訊進行交易，則「詐欺」並不存在，即不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雖然後來變成交易者之受任人可能因違反忠誠義務（duty of loyalty）而違反該州法律。

其次，本院就第十條 b 項中要求不當挪用者之詐欺使用資訊須「與證券買賣相關」之要件。此要件該當於挪用者在未告知委任人的情況下利用該資訊買賣證券之時，而非於其取得機密資訊時。證

券交易與責任之違反係同時發生，即使被詐欺之主體並非交易之相對人，而係未公開資訊之資訊提供者。簡而言之，不當挪用資訊者利用重要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係透過詐欺而取得其優勢之市場地位；其欺騙了資訊提供者，也同時傷害了投資大眾。

不當挪用理論所欲規範者，係得使不當挪用者透過買賣證券而獲取無風險投資的那些資訊。如不當挪用者將前述資訊用於他處，則未必違反該法規之禁止規定。不當挪用理論並未涵蓋涉及機密資訊的一切詐欺類型，而是規範利用此類資訊從事交易證券之詐欺投資行爲。

政府亦指出第十條 b 項關於詐欺類型之其他限制：「不當挪用理論不適用於個人以詐欺行爲使銀行同意貸款、或侵占他人金錢以購買證券之情形。」政府主張於前述案例中，「對行爲人而言，該犯罪所得除得以被用於證券買賣以外，尚有其他價值，而詐欺行爲完成於其取得金錢之際」。易言之，金錢可以購買多種物品，因此，對於金錢之不當挪用與其後之證券交易行爲得被視爲互相獨立，因此不符合第十條 b 項中的「與……相關」（in connection with）之要件。

不同意見書認爲不當挪用理論自相矛盾，因爲資訊和資金同樣有多種用途。此主張失之偏頗。證券交易法之立法目的，部分是在於「確保一公平而誠實之市場」，故如詐欺行爲係與證券交易有關，則對於機密資訊之詐欺使用無疑地將違反第十條 b 項之禁止規定。將適用於對某類型資訊之詐欺使用行爲的原則適用於對金錢之詐欺使用行爲，並不合理。

不過不同意見書倒是正確地指出政府有誇大其詞的現象。政府認爲金錢得以被用於各種目的與買賣，因而主張本案系爭之機密資訊價值僅來自其對於證券交易之功用。本院認爲如將「僅」替換爲「通常」，政府主張即有其可採之處。

多數意見對於政府強調「僅」字爲誇大其詞之承認，引起了不同意見書對塑造一「新理論」的要求。然而，不同意見書所援引之 Motor Vehicle Mfrs. Assn. of United States, Inc. v. State Farm Mut. Automobile Ins. Co., 463 U.S. 29（1983）判決卻正證明了此項主張太過極端。在 State Farm 案中，本院依據「武斷與反覆無常」之標準，就機關廢止一命令之行爲加以審查，而該標準同樣適用於機關制定命令之行爲。本院判決認爲該機關未適度說明其行爲，提醒「複審

法院不應試圖自行補足此項缺失」。相對地，在本案中，規則第10b-5 條之制定行爲並未受到質疑，故本院僅就政府主張 O'Hagan 被控之詐欺罪名該當前述規則規定及證券交易法第十條 b 項規定乙事加以考量。就此而言，本院坦承政府之訴訟代理人在爲政府之命令解釋權與條文辯護時，的確就一正確觀點過於小題大作，雖然律師、甚至法官都難免有此傾向。

不當挪用理論與第十條 b 項之條文用語相符，因條文要求詐欺行爲「與買賣證券有關」，而非詐欺特定之買方或賣方。該理論亦符合證交法的立法目的，即確保一誠實之證券市場，以提昇投資人的信心。儘管在證券市場中，資訊擁有之不對稱性難以避免，然而如法律放任使用未公開之資訊交易證券之行爲，一般投資人對於是否要投入資金，將會再三猶豫。一般投資人之資訊劣勢，相對於擁有重要未公開資訊之不當挪用者，係源於計謀（contrivance）而非運氣；此種劣勢並無法透過市場研究或投資技巧予以克服。

總之，考量未公開資訊對參與證券交易市場之負面衝擊與第十條 b 項之立法目的，認爲如 O'Hagan 是代表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標的公司之法律事務所律師，就違反第十條 b 項，而如其事務所代表要約人（bidder）便不違反，此種論點顯不合理，且從該法條內容亦不能導出如此結論。適用本案之不當挪用理論於第十條 b 項規定是適當的，因爲其符合條文中要求「詐欺行爲需與證券買賣有關」之要件。

C.

上訴法院拒絕適用不當挪用理論，主要基於兩項理由。第一，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將該理論理解爲不以不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或未告知（nondisclosure）爲要件。然而，如同前述，詐欺的未告知（deceptive nondisclosure）爲構成第十條 b 項法律責任之重要要件。具體而言，O'Hagan 之行爲所以該當第十條 b 項之詐欺行爲，是因爲其未對 Grand Met 及 Dorsey 告知其個人交易，違反其應盡之義務，因而構成第十條 b 項之「詐欺」。

上訴法院認爲，第二點同時也是「更顯而易見」的是，不當挪用理論並未鎖定第十條 b 項中「詐欺行爲需與證券買賣有關」之要件。依據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之主張，有三件本院過去之判決認爲第十條 b 項之法律責任，並不能建立在對未

公開資訊之資訊提供者之義務上。上訴法院的結論是，「惟有違反對證券交易當事人、或對如投資人等其他市場參與者之義務，始足以該當第十條 b 項之法律責任」。本院對該法條及本院過去判決之解讀，與上訴法院並不相同，本院並再次強調第十條 b 項所指的是「任何證券買賣」，而非可特定之證券買方或賣方。

Chiarella 案涉及影印店職員所爲之證券交易。該職員自其負責影印之宣布企業收購文件，自行推論出標的公司名稱，並在收購消息發布之前，購買標的公司股票，利用收購消息發布後之股價漲升機會賺取利潤。在系爭交易中，該影印店職員並未告知證券賣方（標的公司股東）其據以交易之非公開資訊，因而被判違反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規定。我們廢棄了上訴法院維持該判決之決定。

法官指示 Chiarella 案之陪審團，如被告故意未將收購要約可能推升股價的訊息告知標的公司股東，便應被判有罪。本院強調該影印店職員與證券售出人間，並無代理或其他委任關係，而法律責任不能建立在這麼廣泛的理論上。本院解釋，第十條 b 項並未「課予所有參與市場交易者放棄根據重大、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之義務」。依據現存之法律學說，本院認爲告知或避免交易之義務係存在於雙方當事人之特定關係上。

但在 Chiarella 案中，本院並未認爲惟有企業內部人士與股東之間的關係，才足以構成利用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之法律責任。此由本院對於該案中政府主張之反應可得而知。政府主張影印店職員基於證券交易之目的，不當挪用自其僱主取得之資訊，違反其對收購要約人之保密義務，構成與證券交易相關之詐欺，該當第十條 b 項規定，然本院未依據此理論決定影印店職員之法律責任，原因是該理論並未經陪審團審查。然而，有四名大法官認同前述理論，而第五位大法官則表示，法院「明智地將本議題留待下回解決」。

Chiarella 案因此明白將不當挪用理論適用與否之問題延至今日決定。然而，Chiarella 案中的部分主張使第八巡迴上訴法院於本案作出這樣的結論：第十條 b 項之法律責任完全係以是否違反對證券買方或賣方之義務爲前提。在 Chiarella 案中，本院表示，第十條 b 項之法律責任，「乃基於交易當事人間之信任與信賴關係所生之告知義務」，並指出該影印店職員並非「賣方信任與信賴之對象」。此見解拒絕認爲第十條 b 項得擴張到

「課予全部參與市場交易者放棄根據重大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之義務」，而本院亦將此見解限定於該特定情況。簡而言之，第八巡迴上訴法院所仰賴之段落，係出現於一刻意將不當挪用理論之正當性留待日後決定之判決中，因此並不能被解釋爲本院已排除適用該理論的可能性。

Dirks 案亦將不當挪用理論之適用留待至類似本案案例中加以決定。在 Dirks 案中，一名投資分析師自與其業務無關之「前」企業內部人士處獲得資訊，而該資訊顯示該企業涉及集體詐欺。分析師對該詐欺事件進行調查，並自該企業員工處得到證明詐欺之資訊。分析師於其調查期間，與其客户及投資人討論其發現，部分客户及投資人因而出售該分析師懷疑有不法行爲之公司股票。

證管會對該分析師協助（aiding）及唆使（abetting）其客户及投資人基於該分析師持有關於系爭公司之非公開資訊而出售股票之行爲作出處分，認其違反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證管會認爲，分析師作爲該企業內部人士之消息受領人（tippee），依據第十條 b 項及規則第 10b-5 條規定，有義務避免將此消息透露予可能將根據此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之人。本院則認爲此種義務並不存在，並重申在 Chiarella 案之重點：「並未課予全部參與市場交易者放棄根據重大、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之義務」。

在 Dirks 案中，並無證據顯示消息告知者（tipper）因對分析師透露前僱主之非公開資訊而違反任何義務。且該案內部人士之行爲動機不是圖利個人，而是要揭發企業內部的集體詐欺。而如本院所述，Dirk 案與本案最密切相關的是：「對分析師會對該資訊保密的期待並不存在。分析師亦未不當挪用或非法取得前述資訊」。因此，Dirks 並未認爲，如行爲人違反受任人義務，不當挪用其取得之非公開資訊，未告知資訊提供者而利用該資訊進行交易，得以不負第十條 b 項之法律責任。

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認爲否定不當挪用理論之適用的三件判決中的最後一件，Central Bank，判定「一私人原告（private plaintiff）並不能援引第十條 b 項之協助與唆使（aiding and abetting）要件提起訴訟」。本院在 Central Bank 案中明白警告，證券市場中之次要行爲人（secondary actor）亦爲證券法之規範對象：「任何個人或機構，包括律師、會計師、或銀行，如使用操控方法，或對證券買賣者仰賴之訊

息爲重大之不實陳述（或應爲陳述而不陳述），如其行爲該當規則第10b-5條主要責任（primary liability）之要件時，得被視爲違反規則第10b-5條規定。」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就上開段落斷章取義，作出第十條b項僅涵蓋對證券買賣者、或其他市場參與者所仰賴之訊息爲重大不實陳述（或應爲陳述而不陳述）情形之結論。然而，觀諸Central Bank案之爭點，本院於上開括引之段落僅係澄清，次要行爲人即使不該當「協助與教唆」，某些行爲仍得爲第十條b項與規則第10b-5條所處罰。

進一步言之，Central Bank案之討論僅及於援引第十條b項與規則第10b-5條所提起之民事訴訟，而不及刑事責任。Central Bank案對證券買賣者之提及必須自長久以來限制私人民事訴訟的觀點加以理解。在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421 U.S. 723（1975），本院判決只有實際買賣證券之人得援引第十條b項與規則第10b-5條提起民事訴訟。本院如此限制第十條b項之私人請求權基礎，係基於「政策考量」。特別要注意的是，Blue Chip Stamps案承認，那些由未實際買賣證券、而宣稱如沒有他人之詐欺行爲其將會從事買賣之投資人所提起之訴訟，往往可能有權利濫用與舉證的問題。刑事訴訟並沒有本院於Blue Chip Stamps案中所擔心的危險，所以該案判決並不適用於因違反第十條b項與規則第10b-5條而被起訴之情形。

總之，如以上檢討及說明所述，不當挪用理論符合條文及本院判決前例。本院在此強調，與本院認爲刑事責任得依不當挪用理論成立之意見密切相關的是兩項國會對於「明知」（scienter）要件之規定。如欲成立規則第10b-5條之刑事責任，政府必須證明被告「故意」（willfully）違反該項規定。此外，如被告證明本人不知道前述規定的存在，即不得因違反規則第10b-5條規定而入獄服刑。據此，O'Hagan主張該理論過於模糊，不能作爲刑事責任之理論依據，即不足採，因爲該理論非但僅將得處罰之人界定爲違反特定義務之人，且條文「以存在犯意（presence of culpable intent）爲必要要件，足以駁斥認爲適用該法規」於類似O'Hagan之案件是不公平的論點。

第八巡迴上訴法院錯在認爲不當挪用理論與第十條b項規定不一致。於本案發回後，上訴法院得就O'Hagan針對其第十條b項及規則第10b-5條罪名之其他主張，作進一步審理。

III.

接下來本院就上訴法院廢棄判決O'Hagan違反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e項及規則第14e-3條a項「從事有關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之詐欺交易」部份加以審理。本院所面對的唯一問題是：證管會是否如上訴法院所判定，因爲未於規則第14e-3條a項中要求證明系爭交易違反受任人義務，而逾越第十四條e項之授權範圍？本院認爲就與本案相關部分而言，證管會並未逾越其權限。

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e項與本案相關之規定爲：

「不得……從事與任何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有關之任何詐欺性、欺騙或操控之行爲（fraudulent, deceptive or manipulative acts or practices）。[證管會]基於本項規定之目的，應以行政命令定義何謂詐欺、欺騙或操縱行爲，並訂定合理措施防止之。」15 U.S.C. §178n（e）。

第十四條e項首句即禁止從事與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有關之詐欺行爲；此禁止規定爲威廉法（Williams Act）所增補於證券交易法之數條條文中之一條。該條第二句則賦予證管會定義及制定防範性措施之權限；國會於一九七O年修正威廉法時，增訂第十四條e項之授權。

藉由威廉法中第十四條e項與其他關於告知之規定，國會旨在確保股東「面對現金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時，不致於必須在沒有足夠資訊的情況下做出回應。」國會將威廉法設計爲使「告知，而非法院所施加的『公平』或『人爲』原則（principles of "fairness" or "artificiality"）……成爲規範市場之較佳方式」。本院認爲第十四條e項「補充了威廉法中其他更明確之告知規定，同時亦較第十條b項更明確地針對公開收購股份要約要求告知。」

證管會依據前述第十四e項之授權，於一九八O年訂定規則第14e-3條a項，規定：

「（a）於任何人已採取重要步驟（substantial step or steps）以提出或將提出公開收購股份要約後，其他任何人，如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持有有關公開收購要約之重大資訊，且其明知或可得而知該資訊係直接或間接來自：

（1）該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人，

（2）收購標的公司股票之發行人（issuer），或

（3）收購股份要約人或收購標的公司股票發行人之任何高層主管、董事、合夥人或受雇人、或

代表前述要約人或發行人之任何其他人處，

而買賣或使買賣（cause to be purchased or sold）前述證券、或任何可轉換或交換前述證券之證券、或任何可取得或處分前述證券之任何選擇權或權利，將構成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之詐欺、欺騙或操控行爲。但如此等資訊及其消息來源於買賣前合理期間內，經新聞稿或其他方式對外界公開，則不在此限。」17 CFR 1240.14e-3（a）（1996）。

如同國會所述，規則第 14e-3 條 a 項要求告知或避免交易。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言簡意賅地描述該規定之精華：

「任何人利用有關公開收購股權要約之重要非公開資訊而從事證券交易，且其明知或可得而知該資訊係『直接或間接』來自於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人或收購標的公司股票發行人之內部人士、或代表該要約人或發行人之人，即違反規則第 14e-3 條 a 項規定。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爲一關於告知之規定，其課予規定範圍內之交易人避免交易或告知之義務，無論該交易人先前是否已負有對前述資訊保密之受任人義務」。United States v. Chestman, 947 F. 2d 551, 557（1991）；Cert. denied, 503 U.S. 1004 （1992）。

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認爲，由於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無論對交易違反或不違反受託人義務之兩種情形均有適用，因此該規定逾越了第十四條 e 項對證管會之授權。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並援引第十四條 e 項之條文與本院 Schreiber 及 Chiarella 案之判決內容，以支持其意見。

第八巡迴法院如此解釋第十四條 e 項關於訂定命令之權限：

「該法條授權證管會『定義』『詐欺性行爲』及『制定得合理防止該行爲之措施』」。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認爲證管會得就有關公開收購要約之情事，「辨識及規範」（identify and regulate） 法律界定之「詐欺行爲」。然而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堅持認爲證管會不得「自行定義何謂詐欺」。

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認爲，本院在 Schreiber 案中判定第十四條 e 項中之「詐欺、欺騙、或操控行爲」中「操控」一詞之意義，與第十條 b 項相同：如無不實陳述或未告知之情形，便不能指控一行爲爲操控行爲。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認爲，第十條 b 項之解釋主導了第十四條 e 項之解釋，並引述本院於 Schreider 案之意見，認爲第十四條 e 項「之廣泛禁止詐欺規定，係以第十條 b 項與規則第 10b-5 條之禁止詐欺規

定爲準則。」

關於第十條 b 項中「詐欺」之意義，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則援引 Chiarella，而認爲本院在該案中判定，惟有「基於受任人義務或其他類似之信任關係」所產生之告知義務存在時，未告知資訊才可能構成第十條 b 項之「詐欺」。Chiarella, 445 U.S., at 228。第八巡迴上訴法院的結論是，正如第十條 b 項要求證明受任人義務之違反，此義務之違反亦爲第十四條 e 項之要件。

關於證管會依第十四條 e 項規定有權「制定得合理預防」詐欺行爲之措施，，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認爲：「實際上，此條文僅說明證管會在公開收購股份要約領域中的規範權限甚廣，然而，法律條文的意義是既定的，證管會不能以行政命令改變之」。

政府主張，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對第十四條 e 項之解讀誤解了證管會定義詐欺性行爲之權限及證管會防止該行爲之權力。政府認爲，如果證管會就詐欺行爲之定義不得廣於普通法下之詐欺概念（而此已爲第十四條 e 項之第一句所分別規範），則證管會定義詐欺之權力將形同具文。

政府主張證管會定義第十四條 e 項定義詐欺性行爲之權力，廣於其依第十條 b 項之授權範圍，並質疑上訴法院對 Schreiber 案的解讀。政府指出，Schreiber 案中的關鍵字爲「操控」（manipulative）；政府認爲，「操控」不同於「詐欺」，當用於描述與證券市場有關之事務時，「操控」一字大有學問。政府認爲最重要的是，Schreiber 案涉及被指控違反第十四條 e 項首句，而該句的用語與第十條 b 項規定類似。但授權證管會制定命令之第十四條 e 項第二句，並非承繼第十條 b 項，因第十條 b 項僅授權證管會禁止「操控或詐欺之工具或伎倆」。事實上，第十四條 e 項中之授權規定，是承繼證券交易法第十五條 c 項 2 款 D 目，15 U.S.C. 1780（c）（2）（D），該項是規範櫃檯市場之經紀自營商（broker dealer）之行爲。自一九三八年起，第十五條 c 項 2 款賦予證管會「定義經紀自營商之詐欺、欺騙或操控行爲，並制定得合理防止該行爲之措施」。15 U.S.C. 1780（c）（2）（D）。政府聲稱，當國會於一九七 O 年加入授權證管會之文字時，證管會早已使用第十五條 c 項 2 款所賦予之權力規範超越普通法詐欺概念之行爲。

在本案中，我們毋需決定證管會依第十四條 e 項「定義……詐欺行爲」之權限，是否廣於其依第十條 b 項定義詐欺之權限，因爲本院同意政府的意見，即規則第 14e-3

條 a 項適用於如本案之案件時，符合第十四條 e 項所謂之「制定得合理防止」之措施，以防止於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情形中，利用重大非公開資訊進行詐欺性交易。此乃預防措施，故其任務是防止某行爲之發生，因而會將被禁止之核心活動以外之活動亦包括在內。如同本院在 Schreiber 案中所指出的，即使在操控一字乃大有學問的情形，第十四條 e 項之授權仍賦予證管會相當的「裁量空間」，規範非欺騙性活動以作爲防止操控行爲之合理措施，而未改變「操控」一詞本身的意義。基此，本院判定依據第十四條 e 項，證管會得就依普通法或第十條 b 項規定非屬詐欺之行爲予以禁止，只要該禁止爲得合理防止……詐欺行爲之措施。

由於國會於第十四條 e 項中授權證管會制定命令，本院必須尊重證管會的決定。因此，在決定規則第 14e-3 條 a 項規定之「告知或避免交易」要件，是否爲合理防止詐欺行爲之措施，本院必須尊重證管會的判斷，除非其有武斷、反覆無常或顯然違法之情形。Chevron U.S.A. Inc.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Inc., 467 U.S. 837, 844 （1984）。就本案而言，本院認爲證管會的判斷，並無以上情形。

關於「告知或避免」的規定，證管會的解釋爲：

「本會先前已表示、並持續嚴重關切個人利用與公開收購股份要約相關之重大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之行爲。前述行爲造成市場資訊之不公平落差，且破壞市場秩序。與其進行證券買賣交易者，實際上被剝奪了因告知所帶來的利益與威廉法之保護。如果獲得該資訊，前述證券持有人將能做出妥善的 （informed） 投資決定，從而可能延後買賣該證券，直到重大資訊被廣爲傳布，或直到公開收購股份要約開始進行或中止爲止」。45Fed. Reg. 60412 （1980）。

證管會因此認爲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爲確保威廉法有效落實之必要且適當方法（necessary and proper）。

政府強調，規則第 14e-3 條 a 項涵蓋「有可能違反義務但證明不易」之交易。「特別是在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之情形」，第十巡迴上訴法院認爲：「擁有機密資訊的人相當多」，978 F. 2d at 1167，尤其是涉及建構（structure）交易者如律師、投資銀行人士、會計師。擁有前述資訊可能導致濫用，因爲「如有消息顯示不久將出現公開收購股份要約，即使只是小小的徵兆，都可能使收購標的公司之股價飆漲」。

SEC v. Materia, 745 F. 2d 197, 199。作爲被委以非公開資訊之人，特別是那些與發行公司並不具有長期忠誠關係之人，會認爲利用前述資訊進行交易的誘惑實在難以抗拒，因爲「迅速大賺一筆」的機會就在眼前。

「間接證明行爲人基於重大非公開資訊交易也許是可能的，但要證明交易者是透過違反交易者對資訊提供者或內部人士之受任人義務的方式取得該資訊，卻幾乎是不可能的。舉例來說，一消息受領人透過其自內部人士得到的資訊從事交易，依據規則第 10b-5 條，只有在內部人士違反其對股東之受任人義務而透露資訊給消息受領人時，該消息受領人才對公司股東負有不得基於此重大非公開資訊交易之受任人義務。Dirks, 463 U.S. at 660. 因此，如欲證明消息受領人基於有關公開收購股權要約之非公開資訊交易，違反受任人義務，則不僅必須證明該內部人士違反受任人義務，且須證明該消息受領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有此違反義務之情事。」Peters, 978 F. 2d, at 1167。

總之，認爲利用重大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往往涉及違反對出價人（bidder）或收購標的公司或其代表之保密義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由於證管會明白手段高明的交易者往往得因證明不易而設法逃避責任，因此在規則第 14e-3 條 a 項中制定「告知或避免交易」之要件時，不特別要求對違反受任人義務乙事加以舉證。本院認爲，此規定適用於本案時，確爲「合理防止」在公開收購股份要約之情形，利用重大非公開資訊進行交易之措施。因此，就防範如 O'Hagan 被控之不當挪用行爲而言，前述規定係證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e 項規定適當行使防範之權力（prophylactic power）。

O'Hagan 提出另一個維持第八巡迴上訴法院判決的理由，認爲規則 14e-3 條 a 項應爲無效，因其禁止於公開收購股份要約尚未提出前進行交易（一般認爲當收購要約之重要步驟展開（substantial step to commence）時，要約即開始），但第十四條 e 項係禁止「與任何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有關」之詐欺行爲。O'Hagan 進而辯稱，規則第 14e-3 條 a 項範圍包括了收購要約提出前之行爲，因而「就兩個層面而言，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規則該項規定未明確提出「在公開收購股份要約提出之前多久的一段時間內，爲違反第十四條 e 項規定」，而且「其去除（dispose of）任何關於明知（scienter）之要件」。上訴法

院未處理前述論點，而 O'Hagan 亦未於其對上訴法院提出之書狀中提及關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論點。本院拒絕就此作出第一審決定，上訴法院得就O'Hagan此項主張於發回時加以審理。

IV.

由於上訴法院推翻O'Hagan之證券詐欺罪名，其亦推翻依 8 U.S.C. §1341 條規定成立 O'Hagan 郵件詐欺之判決。上訴法院承認，推翻證券交易之定罪，「不表示依法亦應推翻其郵件詐欺定罪」。然而，上訴法院認定在本案中，政府起訴的方式使得該院無法將郵件詐欺罪名與證券詐欺罪名分開審理，而在證券詐欺不成立的情形下，「郵件詐欺罪名便失其依據」。

政府主張上訴法院的立場與 Carpenter 案不一致：如同 Carpenter 案，本案「郵件詐欺罪名與證券交易罪名互相獨立，即使兩者是建立於同一組事實上」。本院不必在此耽擱，因爲基於本院在證券交易詐欺部分之判決，上訴法院關於郵件詐欺罪之判決必須廢棄。

本院要特別指出，O'Hagan 曾以不同理由，在上訴法院中就郵件詐欺罪提出質疑，其尚未經第八巡迴上訴法院處理的論點，仍可由下級法院於發回時加以審理。

第八巡迴上訴法院之判決廢棄並發回更審。

（大法官 Scalia 及 Thomas 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略。）

45. 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 v. Reid
490 U.S. 730（1989）

林利芝 節譯

判 決 要 旨

要確定一著作是否為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聘僱著作，法院首先應適用普通法之代理法則來確定該著作的完成者為受僱人（雇員）或者是獨立承攬人，等確認著作完成者之身份後，法院再根據著作完成者之身分，來選擇適用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的第一款，或第二款。

(To determine whether a work is a "work made for hire" within the §101 definition, a court should first apply general common law of agency principles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work was prepared by an employee or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and, depending upon the outcome, should then apply either §101(1) or §101(2).)

關 鍵 詞

the Copyright Act of 1976（1976 年美國著作權法）；author（著作人）；copyright ownership（著作權所有權）；works made for hire（聘僱著作）；the work for hire doctrine（聘僱著作學說）；freelance creators（無特別合約的自由創作者）；within the scope of employment（僱傭（職務）範圍之內）；a work specially ordered or commissioned（特別訂做或委託製作的著作）；collective work（結合著作）；audiovisual work（視聽著作）；translation（翻譯）；supplementary work（補充著作）；compilation（編輯著作）；instructional text（教材）；answer material for a test（測驗的解答）；employee（受僱人）；employer（僱

用人）；the conventional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傳統的主僕關係）；the common-law agency doctrine（普通法的代理學說）；independent contractor（獨立承攬人）

（本案件判決由 Marshall 大法官主筆撰寫）

事　實

本案的上訴人爲 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 （CCNV）和 Mitch Snyder。CCNV 是一個致力於幫助美國遊民得以獲得安頓的非營利性及非法人組織，Snyder 是 CCNV 的一名成員兼理事。在 1985 年的秋天，CCNV 決定以贊助一件能表現遊民困境之展示品的方式，來參加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所舉行的年度聖誕節和平遊行。Snyder 和 CCNV 的成員構想出關於展示品的主題：取代傳統耶穌基督家庭的一座現代家庭聖誕雕塑，此家庭爲黑人家庭（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大多數遊民爲黑人），人物採眞人實體大小，兩個成年男女抱著嬰兒蜷曲在街道旁的蒸氣爐邊，而蒸氣爐將被放置放在一平台上或基座上，並以特效儀器釋放蒸氣環繞人物雕塑的四周。他們並將雕塑命名爲「第三世界的美國」，並在基座刻上「旅館依然客滿」的文句。

在構想出關於展示品的主題之後，Snyder 開始打聽能製作這個雕塑的藝術家，而被介紹給一位居住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雕刻家 James Earl Reid。Snyder 和 Reid 經過二次電話交談後，Reid 答應雕刻這座三人雕塑，而 CCNV 同意製作蒸氣爐和基座，Reid 提議此雕塑應該用青銅鑄造，總計花費約 10 萬美金，需時 6 到 8 個月完工，然而 Snyder 拒絕了這項提議，因爲 CCNV 並沒有足夠的經費，且該雕塑必須在 12 月 12 日以前完工才能如期參展。Reid 因此建議此雕塑用 “Design Cast 62” 的聚合材質作成，並著以仿青銅色，來符合 CCNV 在經費及時間上的限制，Snyder 也同意了，雙方並且同意製作費用不超過 1 萬 5 千美元，其中不包括 Reid 的工資，Reid 自願捐獻他的工資，但是雙方並未簽訂書面契約，也沒有提及雕塑著作權的歸屬。

在收到三千美元的前金後，Reid 製作了幾尊不同姿態人像的

粗坯。應 Snyder 的要求，Reid 將其中一尊人像粗坯寄給 CCNV，好讓 CCNV 藉此粗坯募集製作雕塑所需之經費，也同時讓 Snyder 來決定 Reid 所製作的雕塑是否合他的意，而 Reid 也希望找黑人家庭做爲該雕塑的模特兒，在 Snyder 的建議下，Reid 拜訪了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CCNV 收容所裡的某個黑人家庭，但認爲只有他們的新生兒是合適的模特兒。Reid 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時，Snyder 帶他去看露宿街頭的遊民，爲求眞實呈現，Snyder 要 Reid 注意遊民爲了取暖，大多躺在蒸氣爐邊，而不是站著或坐著，之後 Reid 只製作臥躺姿勢的人像粗坯。

在 1985 年 11 月及 12 月的前兩個星期中，Reid 專心製作雕塑，在旁協助他的是 Reid 以 CCNV 分期付給他的錢所僱用的十多名助手。在此期間中 CCNV 的成員數次拜訪他，以確定雕塑的進度，並調整雕塑基座的建造，CCNV 拒絕 Reid 提出將黑人家庭雕塑的家庭私人用品放置在行李箱或購物袋中的建議，而堅持放置在手推車中。在 CCNV 數次的拜訪中，雙方仍未討論雕塑著作權歸屬的問題。

1985 年 12 月 24 日，即約定交付雕塑日期後的第 12 天，Reid 將完成的雕塑送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與 CCNV 所製作的蒸氣爐和基座結合，並陳列在遊行預定地附近。CCNV 付給 Reid 餘款，然後雕塑開始進行爲期一個月的展示。在 1986 年的 1 月底，CCNV 將雕塑送回 Reid 在巴爾的摩市的工作室做小部份的維修。經過幾週後，Snyder 計畫帶著雕塑去幾個城市巡迴展覽來爲遊民籌措經費，Reid 反對，認爲“Design 62”材質無法禁得起如此的長途跋涉，他力勸 CCNV 花費 3 萬 5 千美金將雕塑以青銅重鑄，或花費 5 千美金製作一個模具，不過 Snyder 拒絕花更多 CCNV 的經費在此項企劃上。

在 1986 年 3 月，Snyder 要求 Reid 歸還該雕塑，卻遭到 Reid 的拒絕，Reid 以自己的名義提出「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雕塑的著作權登記申請，並宣布一項帶著雕塑巡迴展覽的計劃，而 Snyder 也以 CCNV 理事的身分隨即提出相同的著作權登記申請。

Snyder 與 CCNV 因此對 Reid 和他的攝影師 Ronald Purtee 提出訴訟，要求歸還雕塑並確認雕塑著作權的歸屬。聯邦地方法院核發審判前禁制令，命令 Reid 歸還雕塑，經過二天沒有陪審團陪審而由法官獨任審理的司法審判後，聯邦地方法院認爲該雕塑是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聘僱著作」，

而身爲 CCNV 理事的 Snyder 則是該雕塑的著作權所有人。聯邦地方法院認爲因爲 CCNV 促成該雕塑的製作，因此在 1976 年著作權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的第一款下，Reid 爲 CCNV 的受僱人（雇員）。聯邦地方法院認爲 Snyder 和 CCNV 的其他成員構思出這個雕塑，並且提供 Reid 足夠的指示來確保 Reid 完成 CCNV 所要的雕塑。

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撤銷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並發回更審。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認爲 Reid 擁有「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雕塑的著作權，因爲該雕塑不是聘僱著作。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援引聯邦第 5 巡迴上訴法院在 *Easter Seal Society for Crippled Children & Adults of Louisiana, Inc.* v. *Playboy Enterprises* 案件中所作之著作權法的文義解釋，認爲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採取一種簡易的二分法來區別受僱人（雇員）與獨立承攬人。因爲根據代理法的規定，Reid 爲一名獨立承攬人，因此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認爲此件雕塑並非是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的第一款中由受僱人（雇員）所完成的著作。再者，此件雕塑亦不是屬於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的第二款中所列的 9 種著作類型的任何一種，且雙方當事人並沒有訂立書面協議約定此件雕塑爲聘僱著作。但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巡迴上訴法院認爲此雕塑也許可被視爲是 CCNV 和 Reid 的共同著作，因此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將案件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更審，要求聯邦地方法院決定該雕塑是否爲 1976 年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共同著作。

本庭同意受理此案件來解決不同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間對於 1976 年著作權法中聘僱著作規定之詮釋意見的分歧。

判　決

本庭確認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

理　由

要確定一著作是否爲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聘僱著作，法院首先應適用普通法之代理法則來確定該著作的製作者爲受僱人（雇員）或者是獨立承攬人，等確認著作完成者之身份後，法院再根據著作製作者之身份，來選擇

適用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的第一款，或第二款。雖然 1976 年著作權法中並未定義「受僱人（雇員）」或「僱傭（職務）範圍」等詞彙，然而法院必須推測美國國會意欲採用這些詞彙在普通法下的確切含義，因爲聘僱著作規定中文字用語並未顯示美國國會採用「受僱人（雇員）」、「僱傭關係」等詞彙是意指"傳統主僕關係"以外的任何關係。再者，本庭必須依據普通法的一般代理法則，而非依據任何州之代理法來解釋這些詞彙的意義，因爲 1976 年著作權法是統一適用於全國的聯邦法，其法位階高於州的著作權法規定及普通法的著作權法規定。本庭因此贊同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見解，認爲「受僱人（雇員）」這個詞彙應以普通法的一般代理法則來理解。

「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雕塑並非是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聘僱著作」。Reid 是一個獨立承攬人，而不是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第一款下的受僱人（雇員），雖然 CCNV 給予 Reid 足夠的指示確保 Reid 所製作的作品符合 CCNV 的要求，但是所有其他因素皆顯示 Reid 和 CCNV 之間並沒有僱傭關係。Reid 是一名專業的雕塑家；他使用自己的雕塑工具；在自己位於巴爾的摩市的工作室工作，使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 CCNV 不可能天天監督 Reid 的工作；Reid 只被僱用非常短的時間；Reid 有絕對自主權決定何時工作及工作時間的長短，也有僱用助手及支付助手的決定權；再者，CCNV 無權分派其他企劃給 Reid；CCNV 以支付獨立承攬人酬勞的方法付給 Reid 1 萬 5 千美元；製作雕塑並非是 CCNV 的例行業務，CCNV 的確也並非是任何行業；CCNV 並沒有支付薪資或社會福利稅，沒有提供任何勞工福利，也沒有提撥失業救濟金或勞工補償金。而上訴人也坦承此件雕塑並不符合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中第二款的條件。

然而，如果聯邦地方法院在更審時，認爲 CCNV 和 Reid 在製作這件雕塑時，有意使各自貢獻的部份結合成爲一個不可分割而互相依賴的整體著作，CCNV 也許可被視爲是「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雕塑的共同著作人，因此是此件雕塑著作權的共同所有人。

本庭認爲（表達九位大法官的意見）：在 1976 年著作權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的規定下，CCNV 並非是「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雕塑的著作人，因爲（1）要確定一著

作是否爲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聘僱著作，法院首先應適用普通法之代理法則來確定該著作的完成者爲受僱人（雇員）或者是獨立承攬人，等確認著作完成者之身份後，法院再根據著作完成者之身份，來選擇適用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的第一款，或第二款。雖然 1976 年著作權法中並未定義「受僱人（雇員）」或「僱傭（職務）範圍」等詞彙，然而法院必須推測美國國會意欲採用這些詞彙在普通法下的確切含義，因爲聘僱著作規定中的文字用語並未顯示美國國會採用「受僱人（雇員）」、「僱傭關係」等詞彙是意指"傳統主僕關係"以外的任何法律關係。再者，本庭必須依據普通法的一般代理法則，而非依據任何州之代理法來解釋這些詞彙的意義，因爲 1976 年著作權法是統一適用於全國的聯邦法，其法位階高於州的著作權法規定及普通法的著作權法規定。本庭因此贊同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見解，認爲「受僱人（雇員）」這個詞彙應以普通法的一般代理法則來理解；（2）「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雕塑並非是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所規定的「聘僱著作」。Reid 是一個獨立承攬人，而不是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第一款下的受僱人（雇員），雖然 CCNV 給予 Reid 足夠的指示以確保 Reid 所製作的作品符合 CCNV 的要求，但是所有其他因素皆顯示 Reid 和 CCNV 之間並沒有僱傭關係。Reid 是一名專業的雕塑家；他使用自己的雕塑工具；在自己位於巴的摩爾市的工作室工作，使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 CCNV 不可能天天監督 Reid 的工作；Reid 只被僱用非常短的時間；Reid 有絕對自主權決定何時工作及工作時間的長短，也有僱用助手及支付助手的決定權；再者，CCNV 無權分派其他企劃給 Reid；CCNV 以支付獨立承攬人酬勞的方法付給 Reid 1 萬 5 千美元；製作雕塑並非是 CCNV 的例行業務，CCNV 的確也並非是任何行業；CCNV 並沒有支付薪資或社會福利稅，沒有提供任何勞工福利，也沒有提撥失業救濟金或勞工補償金。而上訴人也坦承此件雕塑並不符合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中第二款的條件；（3） 然而，如果聯邦地方法院在更審時，認爲 CCNV 和 Reid 在製作這件雕塑時，有意使各自貢獻的部份結合成爲一個不可分割而互相依賴的整體著作，CCNV 也許可被視爲是「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雕塑的共同著作人，因此是此

件雕塑著作權的共同所有人。

1976 年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所有權“自始歸屬於著作之著作人或共同著作人”。一般而言，著作人爲實際創作著作的人，也就是說，著作人是將某構思轉化爲可受到著作權保護之具體、有形的表達。然而 1976 年著作權法將「聘僱著作」規定爲著作人是實際創作著作者的重要例外。如果某著作爲受雇完成的著作，僱用人（雇主）或該著作是爲其所創作之人則被視爲著作人，並享有著作權，除非當事人另有書面協議。將某著作歸類爲「聘僱著作」不但決定其著作權的自始歸屬，也決定著作權的保護期限、著作人的延續權、著作權的終止權、和從國外進口擁有著作權之某些商品的權利。聘僱著作學說因此對藝術家、作家、攝影家、設計家、作曲家、以及電腦程式專家等自由職業創作者非常重要，對出版、廣告、音樂以及其他委託他人創作之行業也深具影響力。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規定，在兩種情形下某著作爲「聘僱著作」:（1）由受僱人（雇員）在其僱傭（職務）範圍內完成之著作；或者（2）依特別訂做或委託完成之著作，用來做爲某結合著作之部分貢獻、某電影或其他視聽著作的一部份、某翻譯著作、某補充著作、某編輯著作、某教材、某測驗、某測驗之解答、或某地圖，並且是聘用人與受聘人簽署書面協議約定同意該著作爲聘僱著作。

上訴人並未主張此件雕塑符合 1976 年著作權法第 101 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中第二款的條件，很顯然的，此雕塑並不符合那些條件。雕塑並不屬於該款所列“特殊訂做或委託”之 9 種著作類型的任何一種，且雙方當事人並沒有訂立書面協議約定「第三世界的美國」這件雕塑爲聘僱著作。

本案件的爭議因此爲「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雕塑在 1976 年著作權法關於聘僱著作的規定的第一款下，是否是受僱人（雇員）在僱傭（職務）範圍內所完成的聘僱著作。1976 年著作權法沒有提供「受僱人（雇員）」與「僱傭（職務）範圍」的明確定義，在缺乏明確定義下，對於「受僱人（雇員）」與「僱傭（職務）範圍」出現了四種不同的解釋。在第一種解釋下，只要僱用人（雇主）擁有對此作品的控制權，則此作品就被視爲是受僱人（雇員）完成的著作。上訴人 CCNV 和 Snyder 持此看法。在與第一種解釋相關的第二種解釋下，只要僱用人（雇主）對創作此作品擁有實際控制權，則此作品就被視爲是 1976 年著作權法關於聘僱著作

的規定的第一款中由受僱人（雇員）所完成的著作。這個解釋是聯邦第 2 巡迴上訴法院在 *Aldon Accessories Ltd. v. Spiegel, Inc.* 案件中對於「受僱人（雇員）」與「僱傭（職務）範圍」的解釋，並且聯邦第 4 巡迴上訴法院在 *Brunswick Beacon, Inc. v. Schock-Hopchas Publishing Co.* 案件中及聯邦第 7 巡迴上訴法院在 *Evans Newton, Inc. v. Chicago Systems Software* 案件中援引這個解釋。上訴人 CCNV 和 Snyder 也曾持此看法。在第三種解釋下，受僱人（雇員）的定義爲普通法的一般代理法則中受僱人（雇員）的定義。聯邦第 5 巡迴上訴法院在 *Easter Seal Society for Crippled Children & Adults of Louisiana, Inc. v. Playboy Enterprises* 案件中及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在本案件中援引這個解釋。最後，在第四種解釋下，受僱人（雇員）僅指有正式支領定期薪水的人。被上訴人 Reid 和 Purtee 持此看法。

本庭對於法條的解釋往往從其文字用語開始，1976 年著作權法中並未定義「受僱人（雇員）」或「僱傭（職務）範圍」等詞彙。然而已確定的是“當美國國會採用在普通法下已累積確切含義之詞彙時，除非法規有其他明確之指示，法院必須推測美國國會意欲採用這些詞彙在普通法下的確切含義。以往，當美國國會於未定義之情況下採用「受僱人（雇員）」一詞時，本庭皆認爲美國國會是意指在普通法之代理學說下的傳統主僕關係。聘僱著作規定中的文字用語並未顯示美國國會採用「受僱人（雇員）」、「僱傭關係」等詞彙是意指“傳統主僕關係”以外的任何法律關係。

在以往涉及法律條文解釋之案件中，當本庭認爲美國國會於法條中使用「受僱人（雇員）」、「僱用人（雇主）」、及「僱傭（職務）範圍」等詞彙，是意欲採用這些詞彙在代理法下之意義，本庭就依據普通法的一般代理法則而非依據任何州之代理法，來解釋這些詞彙的意義，這樣的做法是反映“聯邦法應統一適用於全國”的事實，而 1976 年著作權法是統一適用於全國的聯邦法，其法位階高於州的著作權法規定及普通法的著作權法規定。本庭因此贊同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見解，認爲「受僱人（雇員）」這個詞彙應以普通法的一般代理法則來理解。

要確定一著作是否爲 1976 年著作權法所規定的聘僱著作，法院首先應適用普通法之代理法則來確定該著作的完成者爲受僱人（雇

員）或者是獨立承攬人，等確認著作完成者之身份後，法院再根據著作完成者之身份，來選擇適用著作權法第101條聘僱著作條款中對於僱傭（職務）著作的規定（第101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的第一款），或受聘著作的規定（著作權法第101條關於聘僱著作規定的第二款）。

要決定某受僱人（雇員）是否爲代理法下所認定的受僱人（雇員）時，本庭考量僱用人（雇主）是否有權決定用何種做法或方法來創作著作。其他考量之相關因素包括：創作著作所需的技能；儀器與工具的來源；創作著作的處所；受僱期間的長短；僱用人（雇主）是否有權分派其他企劃給受僱人（雇員）；受僱人（雇員）是否有權決定何時工作以及工作時間的長短；付款方式；受僱人（雇員）是否有權僱用助手及決定助手的薪資；系爭著作是否與僱用人（雇主）的例行業務有關；僱用人（雇主）是否提供受僱人（雇員）任何福利；以及受僱人（雇員）的稅目等。以上任何一項均非決定性因素。

依上述這些因素來考量本案的情況後，本庭贊同聯邦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見解，認爲Reid是一個獨立承攬人，而不是CCNV的受僱人（雇員）。的確，CCNV雖給予Reid足夠的指示以確保Reid所製作的作品符合CCNV的要求，但是僱用人（雇主）對於作品細節的控制程度並不是決定因素。實際上，所有其他因素皆顯示Reid和CCNV之間並沒有僱傭關係。Reid是一名專業的雕塑家；他使用自己的雕塑工具；在自己位於巴爾的摩市的工作室工作，使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CCNV不可能天天監督Reid的工作；Reid只被僱用少於2個月（非常短）的時間；在雕塑的創作期間及完工後，CCNV無權分派其他企劃給Reid；除了完工的期限外，Reid有絕對自主權決定何時工作及工作時間的長短；基於「第三世界的美國」這個特定工作的完成，CCNV付給Reid 1萬5千美元，這是支付獨立承攬人酬勞的方法；Reid有僱用助手及支付助手的決定權；而製作雕塑並非是CCNV的例行業務，CCNV的確並非是任何行業；最後，CCNV並沒有支付薪資或社會福利稅，沒有提供任何勞工福利，也沒有提撥失業救濟金或勞工補償金。

因爲Reid是一個獨立承攬人，因此「第三世界的美國」是否爲聘僱著作，取決於雕塑是否符合1976年著作權法第101條關於聘僱

著作規定中第二款的條件，而上訴人坦承此件雕塑並不符合那些條件。因此在 1976 年著作權法聘僱著作規定下，CCNV 不是「第三世界的美國」的著作人。然而，如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巡迴上訴法院所述，若聯邦地方法院在更審時，認爲 CCNV 和 Reid 在製作這件雕塑時，有意使各自貢獻的部份結合成爲一個不可分割而互相依賴的整體著作，則 CCNV 就會是此雕塑的共同著作人。

本庭確認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的判決。

譯 者 簡 介

（按姓氏筆劃排序）

王 玉 葉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王 郁 琦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法學博士
世新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史 慶 璞

美國堪薩斯州華斯本大學法學博士、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暨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何 曜 琛

美國南美以美大學法律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暨法律學研究所教授

林 利 芝

美國芝加哥羅耀拉大學法學博士
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助理教授
美國紐約州、伊利諾州律師

林 秋 琴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陳 瑞 仁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黃 偉 峯

美國杜蘭大學法學博士、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

黃 義 豐

美國羅優拉大學（紐奧良）法學博士、最高法院法官、政治大學風險管理及保險學系兼任副教授

黃 慶 源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代表合夥人

程 法 彰

美國北俄亥俄大學法學博士、聖約翰科技大學專任助理教授、東吳大

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鄭 津 津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法學博士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潘 維 大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立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法律系專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

蔡 秋 明

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蔡 懷 卿

美國加州戴維斯法學院法學博士、玄奘大學法律系專任講師

劉 靜 怡

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律組專任副教授

謝 哲 勝

美國威斯康新大學法學博士
中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簡 資 修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法律系合聘副教授

判決名稱索引

I-第一輯 II-第二輯
III-第三輯 IV-第四輯
V-第五輯

A

A&M Records v. Napster III-165
Adarand Constructors, Inc. v. Peña III-16
Albertsons, Inc., v. Kirkingburg V-45
Allen v. Wright I-92
Allied Structural Steel Co. v. Spannaus I-276
Anthony Palazzolo v. Rhode Island V-288
Arizona v. Evans V-183
Aspen Skiing Co. v. Aspen Highlands Skiing Corp. II-230
Atherton v. FDIC II-139
Atkins v. Virginia V-172

B

Baker v. Carr I-121
Barrows v. Jackson I-97
Basic Incorporated, et al., v. Max L. Levinson et al. III-146
Blau v. Lehman V-294
Blue Chip Stamps v. Manor Drug Stores II-169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IV-451
Board of Regents v. Roth I-273
Bowers v. Hardwick IV-138
Broadcast Music, Inc. v. CBS II-207
Brodenkircher v. Hayes II-86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Brown I) IV-65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Brown II) IV-77
Burlington Industries, Inc. v. Ellerth I-245
Bush v. Gore (531 U.S. 1046) IV-194
Bush v. Gore (531 U.S. 98) IV-200
Bush v. Palm Beach County Canvassing Board IV-185

C

Califano, Secretar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v. Goldfarb V-1
California v. Acervedo II-35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II-285
Cantrell v. Forest City Publishing Co. IV-289
Chandler v. Florida I-326
Chevron v. Echazabal V-57
Chiarella v. U.S. V-330
Chimel v. California II-16
City of Boerne v. Flores II-95
City of Cleburne v. Cleburne Living Center III-27
City of Indianapolis, et al. v. James Edmond et al. III-136
City of Montery v. Del Monte Dunes at Monterey, Ltd., and Monterey-Del Monte Dunes Corporation V-283
Clark v. 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e I-354

Cleveland Board of Education v. Loudermill I-288
Clinton v. City of New York IV-458
Community for CreatVe Non-Violence v. Reid V-412
Continental T.V. v. GTE Sylvania Inc. II-252
Corning Glass Works v. Brennan I-153
Cox Broadcasting Corp. v. Cohn IV-300
Craig et al. v. Boren, Governor of Oklahoma, et al. III-8
Cruzan v. Director, Missouri Department of Health I-249

D

Dames & Moore v. Regan II-102
Dandridge v. Williams III-19
Davis v. Bandemer I-140
Davis v. Mississippi V-177
Due & Bradstreet, Inc. v. Greenmoss Builgers Inc. I-338

E

Edmond v. U.S. II-127
Eisenstadt v. Baird V-61
Eldren v. Ashcroft IV-517
Ernst & Ernst v. Hochfelder II-175
Estes v. Texas IV-360
Everso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Ewing Township IV-333
Ex Parte McCardle I-56

F

Faragher v. City of Boca Raton I-241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Morton Salt Co. II-257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the Borden Co. II-273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 Anheuser-Busch, Inc. II-262
Feist Publications v. Rural Telephone Service III-214
Flast v. Cohen I-62
Florence Dolan v. City of Tigard V-229
Florida Bar v. Went For It Inc. III-102
Freedman v. State of Maryland I-314
Frontiero et vir v. Richardson, Secretary of Defense, et al I-147
Frothingham v. Mellon I-59
FTC v. Indiana Federation of Dentists II-291
FTC v. Superior Court Trial Lawyers Association IV-514
Furman v. Georgia V-160

G

Geduldig, Director,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v. Aiello, et al. III-1
Gideon v. Wainwright IV-428
Goldborg v. Kelly V-227
Goldwater v. Carter I-137
Gratz v. Bollinger V-20
Gregg v. Georgia V-166
Grisword v. Connecticut IV-130

H

Harris v. Forklift Systems, Inc. I-233
Herman & Maclean V. Huddleston V-351
Home Building & Loan Association v. Blaisdell I-298
Hurley v. Irish-American Gay Group of Boston III-82
Hustler Magazine v. Falwell IV-294

I

Illinois v. Gates II-7
Illinois v. Perkins II-81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 Chadha V-249
International Salt Co. v. United States III-156

J

J.E.B. v. Alabama ex rel. T. B. IV-29
Jacobson v. United States II-52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 2 v. Edwin G. Hyde IV-508
Johnson v. Transportation Agency IV-36

K

Kahn v. Shevin IV-1
Katz v. United States II-1
Kern County Land Co. v. 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 II-200
Kevin Wiggins v. Sewall Smith IV-436
Keystone Bituminous Coal Association v. Debenedictis II-303

L

Laird v. Tatum I-108
Lakewood v. Plain Doaler, V-113
Landreth Timber Company v. Landreth V-360
Lawrence v. Taxas IV-156
Lemon v. Kurtzman IV-344
Lochner v. New York I-264
Loretto v. Teleprompter Manhattan CATV Corp. II-306
Lorian Journal Co. v. United States II-227
Lotus Development v. Borland International III-243
Loving v. U.S. II-116
Loving v. Virginia IV-93

M

Madsen v. Women's Health Center, Inc. V-128
Maislin Industries, U.S. v. Primary Steel II-287
Mapp v. Ohio IV-407
Marbury v. Madison I-35
Maryland v. Jerome Edward Buie II-40
Mastrobuono v. Shearson Lehman Hutton, Inc. II-146
Matsushita Electric Industrial Co. v. Zenith Radio Corp. II-237
Matthew Bender v. West III-297
McCulloch v. Maryland I-44
McDonnell Douglas Corporation v. Green I-178
Member of City Council v. Taxpayers for Vincent IV-314
Meritor Savings Bank v. Vinson I-228
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 & Smith v. Curran II-181
Meyer v. State of Nebraska V-37
Michael Heffron v.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ina Consciousness, Inc. IV-305
Michael M. v. Sonoma County Superior Court IV-17
Michigan v. Long I-111
Miranda v. Arizona II-60
Mississippi University for Women v. Hogan IV-23

Montague & Co. v. Lowry II-204
Murphy v. United Parcel Service, Inc. V-42
Muskrat v. United States I-100

N

NCAA v. Board of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Oklahoma et al II-215
Near v. State of Minnesota I-302
Nebbia v. New York I-269
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 IV-260
New York v. Quarles II-76
New York v. U.S. II-91
Nix v.Williams (Williams II) III-123
Nixon v. Administrator of General Service I-293
Nixon v. Fitzgerald V-264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mpany v. United States III-159
Northwest Wholesale Stationers, Inc. v. Pacific Stationery & Printing Co. II-222

O

Oncale v. Sundowner Offshore Services, Inc. I-237
Orr v. Orr I-169

P

Pate v. Robison V-218
Penn Central Transp. Co. v. City of New York II-300
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v. Yeskey II-136
Perpich v. Department of Defense II-109
Perry v. Sindermann V-235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 I-201
Playboy v. George Frena III-204
Plessy v. Ferguson IV-41
Poe v. Ullman I-103
Police Department of the City of Chicago et al v. Mosley III-62
Posadas De Puerto Rico Associates v. Tourism Co. of Puerto Rico I-331
Powell v. McCormack I-134
Price Waterhouse v. Hopkins V-9
Printz v. U.S. II-99

Q

Quality King Distributors v. L'anza Research International III-219

R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 Diamond Multimedia III-183
Reed v. Reed, Administrator I-144
Religious Technology Center et al. v. Netcom On-Line et al. III-261
Reno,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et al. v.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et al. III-70
Reynolds v. Sims I-130
Reynolds v. U.S. V-140
Roe v. Wade I-191
Romer v. Evans I-173
Rostker, Director of Selective Service v. Goldberg et al. III-12

S

S.E.C. v. Variable Annuity Co. II-149

Saenz v. Roe III-58
Scheiber v. Burlington Northern, Inc. II-163
Schlesinger v. Ballard IV-5
Schlesinger v. Reservists Committee to Stop the War I-69
Schneckloth v. Bustamonte II-30
Sega v. MAPHIA III-273
Segura v. U.S. V-206
Shaw v. Reno IV-104
Simon & Schuster v. Members of N.Y. State Crime Victims Board IV-250
Slaughter-House Cases (Butcher's Benev. Ass'n v. Crescent City Live-Stock Landing and Slaughter-House Co.) I-258
Sneep v. United States I-320
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II-256
Sony v. Connectix III-231
Spectrum Sports v. Mcquillan II-248
Steffel v. Thompson I-118
Sun Microsystem v. Microsoft III-188
Sutton v. United Air Lines, Inc. IV-99

T

Tasini v. New York Times III-225
Terry v. State of Ohio II-18
The Florida Star v. B.J.F. V-103
Thomas et al. v. Chicago Park District IV-327
Touche Ross & Co. v. Redington V-318
Toyosaburo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IV-85
Toyota Motor v. Williams V-48
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v. Thurston I-184
TSC Industries, Inc. v. Northway, Inc. V-299
Turner v. Safely V-93

U

U. S. Airways, Inc. v. Barnett V-53
U.S. v. Belmont V-176
U.S. v. Chadwick V-68
U.S. v. O'Hagan V-391
U.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n II-211
U.S. v. Virginia I-160
UMG Recordings et al v. MP3.com III-198
United States v. Borden Co. II-267
United States v. Causby I-281
United States v. Eichman I-366
United States v. Leon III-128
United States v. Nixon IV-485
United States v. O'Brien I-345
United States v. Topco Associates, Inc. III-153
United States v. White II-46
Utah Pie Co. v. Continental Baking Co. II-276

V

Vacco v. Quill III-53
Valley Forge College v. Americans United I-73
Village of Belle Terre v. Boraas I-285
Virginia Bankshares, Inc. v. Sandberg V-377

W

Warth v. Seldin I-83
Washington v. Glucksberg III-55
Washington v. Texas V-242
Watchtower Bible &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Inc. v.Village of Stratton V-150
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III-31
Whalen v. Roe III-47
Willianson v. U.S. V-191
Wisconsin v. Mitchell III-95
Wong Sun v. United States III-118

Y

Younger v. Harris I-115

Z

Zablocki, Milwaukee County Clerk v. Redhail V-80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 V-122

關鍵詞英中索引

I-第一輯 II-第二輯
III-第三輯 IV-第四輯
V-第五輯

A

a case in law or equity（普通法或衡平法上的個案） I-100
a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公開播送） III-184
a matter of public（公共事務） I-59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充分證據；優勢證據）III-123；V-10
a prima facie case（推定成立） II-276
a reasonable time, place, or manner restriction of expression（對於表現自由合理之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 I-354
a reasoned choice（深思熟慮的選擇） IV-436
a superior, paramount law（最高法） I-37
a trusted accomplice（心腹共犯） II-47
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政教分離的隔牆） IV-334
a work specially ordered or commissioned（特別訂做或委託製作的著作） V-412
abatement（排除） I-303
abortion clinic（墮胎診所） V-129
abortion regulations（墮胎管制措施） III-32
abortion right（墮胎權） I-203
abortion（墮胎） I-193
abridge free speech（限縮言論自由） I-345
abrogation of a treaty（條約廢止） I-137
absolute immunity（絕對的免責權） V-264
accessory（從犯） V-242
accomplice（共犯） V-242
accusatory stage（控訴程序） V-178
acquiescence（默示） II-102
acquisition（收購） V-300
active member（積極性會員） II-204
acts of congress granting jurisdiction（司法管轄之立法分配權） I-56
actual damages（實際損害） I-320
actual injury redressed by the court（可獲法院補償之實際損害） I-73
actual malice（惡意；真實惡意；實質惡意） I-338；IV-261, 289, 295
actual purchasers（實際購買人） II-169
actual sellers（實際出賣人） II-169
adequancy and independence of state law（充分而獨立之州法） I-111
adequate and independent state grounds（充分而獨立之州法基礎） I-111
administrative appeal（訴願） I-288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行政便利） I-147
administrative delay（行政延誤） V-207

administrative leeway
（行政便宜之舉） V-57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證據能力；證據可採納性）
II-81；V-207
admissible（有證據能力） V-193
admission guidelines
（入學申請審核準則） V-20
admission（自白） III-119
advancement（晉升） V-53
adversary proceeding; adversary process
（辯論式訴訟程序；對等訴訟程序）
I-314；III-123
adversary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採對抗制度的刑事審判） IV-429
advertising of casino gambling
（賭場廣告） I-331
aesthetic（市容、美學的） IV-315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affirmative action（少數族裔保障方案；少數族裔優惠保障方案）III-16；IV-37
affirmative defense
（免責抗辯；負責抗辯）
I-241, 246；V-57
affirmative（優惠性） IV-1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of 1967
（一九六七年就業年齡歧視法）II-136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就業年齡歧視法） I-185
age discrimination（年齡歧視） I-185
age verification（年齡確認） III-71
agency law（代理法則） I-234
agreement-in-principle
（原則性協議） III-147
aid for family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未成年子女家庭津貼） III-19
alimony（贍養費） I-169
all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use
（所有經濟上有益的使用） V-289
all economically viable use
（所有經濟上可行之使用） V-283
alternative benefits（替代利益） II-292
alternativ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替代溝通管道） V-129
alternative（替代方案） I-293
altitude（高度） I-281
amateurism（業餘精神） II-216
amblyopia（弱視） V-45
ambulance chasing
（追逐救護車之招攬客戶手法）III-103
Amendment to Constitution
（憲法增修條文） I-173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即 ADA）
II-136；IV-99；V-43, 45, 49, 53, 57
amicus curiae
（訴訟參加人，法院之友） IV-67, 78
an action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著作權侵權訴訟） III-188
annuity contract（年金契約） II-149
annuity（年金） II-149
answer material for a test
（測驗的解答） V-412
anticompetitive（反競爭） II-216

antifraud provisions
（反詐欺條款） III-147
appealable（上訴可能性） IV-488
appellate jurisdiction
（上訴(審)管轄權） I-36,103
appointment clause（任命條款） II-127
appointment of counsel
（指派一名公設辯護律師） IV-428
apportionment（分配） I-130
appropriation（竊用） V-123
arbitrary and without reasonable relation to any end within the competency of the state（恣意專斷且和州所欲達成之目的無合理關聯） V-37
arbitration provision
（仲裁條款） II-146
arbitrator（仲裁人） II-146
armed robbery（持械搶劫） V-166
arrest（逮捕） II-41
assisted-suicide ban
（協助自殺禁令） III-55
assisted-suicide（協助自殺） III-53
association（社團） I-83
attachment（扣押） II-102
attempt to monopolize
（意圖獨占） II-249
Audio Home Recording Act, AHRA
（家用錄音法） III-183
audiovisual work（視聽著作） V-412
author（著作人） V-412
authorize、delegate（授權） IV-458
automatic liability
（自動法律責任） I-241
automobile exception
（汽車搜索例外；機動車輛搜索的例外） II-35；V-70
avoiding Intrafamily controversy
（避免家庭內部爭議） I-144

B

balancing approach
（成本效益比較理論） III-130
balancing test（平衡原則） II-96
bank（銀行） II-139
benign, compensatory purpose
（善意和有補償性目的） IV-23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伯恩公約） IV-518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超越合理懷疑） V-166
Bicameralism（兩院制） V-250
bifurcate the sentencing
（就罪刑分別審判） IV-436
bifurcated procedure（雙階程序） V-166
bigoted thought（偏激思想） III-96
Bill of Attainder Clause
（剝權法案條款） I-293
Bill of Rights（人權法案；權利法案） III-153, IV-428; IV-130, 334
billboard（告示板） IV-315
bisexual（雙性戀） III-83
blanket license（概括授權） II-207
bona fide doubt（善意的懷疑） V-219
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
（真誠職業資格） I-185
bona fide seniority system
（真誠的年資制度） I-185

bona fide（good faith）（善意） II-262
boycott(s)（杯葛） II-223, 227; IV-514
Brady Handgun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of 1993（一九九三年布瑞迪手鎗暴力防制法） II-99
broadcast coverage of criminal trials（刑事審判報導） I-326
burden of showing（舉證責任） IV-23
burdens of proof（舉證責任） V-10
business necessity（執行業務必要） V-57
but-for causation（「若非因為」因果關係） V-10
by-laws（章程） II-204

C

"case or controversy" requirement（「個案與爭議」要件） I-70
canon of construction（解釋準則） II-136
canvasser（兜攬人員） V-150
capital felony（處死重罪） V-166
capital punishment（死刑） II-116；V-160, 172
carpel tunnel syndrome（腕骨隧道症候群） V-49
case and controversy（個案和爭議；案件與爭議） I-73, 97, 100, 103
case or controversy（個案或爭議） I-83, 92
case-and-controversy doctrine（個案與爭議原則） I-63
cash tender offer（現金公開收購股份要約） II-201
catchall clause（概括條款） V-331
Caucasian（白種人） V-20
caveat emptor（買受人自負瑕疵結果、貨物既出概不退換） V-331
cease and desist order（停止處分令） II-273
certification（證書） V-43
certiorari（上級法院調閱下級法院判決的命令;移審狀；裁量上訴受理令狀；移審令；調卷令） II-249; IV-186, 194, 202, 294, 428
chain supermarket（連鎖超市） III-153
checkpoint program（公路檢查哨專案） III-136
checks and balances（權力制衡） IV-489
child pornography（孩童猥褻物品） II-52
chilling effect（寒蟬效應） I-315; III-96; IV-261
choice-of-law provision（準據法條款） II-146
church-affiliated school（教會學校） IV-346
citizen standing（公民訴訟當事人適格） I-70
citizenship（公民權） I-258
citizen-soldier program（公民/軍人課程） I-160
civil remedies（民事救濟） II-175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一九六四年民權法） V-10
Civil Rights（民權） IV-44
civil servant（公務員） I-288
civility code（禮貌準則） I-237
claim forms（保險給付申報表） II-292
class action（集體訴訟） I-108；II-169；V-20

class representative
（集體訴訟的代表） V-20
classified information
（經保密之資訊） I-320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明顯而令人信服的證據；明顯而令人信服之證據標準） I-249；V-353
clerical errors（事務性錯誤） V-183
close/strict judicial scrutiny
（嚴密/嚴格的司法審查） I-147
cocaine（古柯鹼） V-207
collateral statements（附隨陳述，即附隨於不利陳述之陳述） V-193
collective point（共同訴求） III-83
collective work（結合著作） V-412
combat（戰鬥） III-12
Commerce Clause, Const. Art. I, §8, cl. 3（通商條款） II-91
commercial speech
（商業言論） I-331; III-103
Commodity Exchange Act
（商品期貨交易法） II-181
common law（普通法） II-139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of 1996
（一九九六年傳播通訊管理法） III-71
comparison of fingerprint（比對指紋） V-178
compatibility provisions
（相容性條款） III-188
compel witness to testify
（強制證人出庭作證） V-242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迫切的政府利益） IV-104；V-20
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
（重大政府利益） II-96
compelling interest（重大且迫切之利益；重大利益） IV-6, 250
compelling public purpose
（迫切的公共目的） V-289
compensation
（補償；賠償） I-281; IV-289
compensatory damages
（補償性損害賠償） IV-452
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 V-219
competition（競爭） II-273
compilation or collective work
（編輯或彙整著作） III-226
compilation(s)
（編輯作品；編輯著作） III-215, 298；V-412
compulsory retirement
（強制退休） I-185
computerized data（電腦資料） III-47
concerted action（一致性行為） II-237
concerted refusal（一致拒絕） II-223
conclusive discretion（專屬裁量） I-36
conclusory（結論性的） V-377
concrete injury（具體損害） I-70
conduct（行為） III-96
conflict-of-interest（利益衝突） I-293
Congress（國會） V-264
congressional enforement power under U.S. Const. 14th Amend., §5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第五項國會執行權） II-96
congressional intent（國會意旨；國會本意；國會意思） I-293；V-57, 377
congruence and proportionality standard of review（"一致和比例"

審查標準） IV-518
conjure up（揣摩） III-287
consent searches（經同意之搜索） II-30
conspiracy（共謀罪） II-276
conspire to monopolize（共謀獨占） II-249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counsel（憲法賦予刑事被告之律師協助辯護的權利） IV-428
constitutionality of a statute "on its face"（法律之形式合憲性） I-115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legislative act（國會行為的合憲性） I-100
constitutionality（合憲性） IV-23
constructive trust（擬制信託） I-320
contemporary legal context（當代法律背景） II-181
content control（內容控制） III-64
content neutral（內容中立） V-94, 129
content-based regulation（內容管制；基於內容的管制） III-64；V-129
contraband（違禁品） V-207
contraception（避孕） V-63
contraceptives（避孕器材） IV-130
contract clause（契約條款） I-276
contract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限制交易契約） II-211, 215
contractual obligation（契約義務） I-276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契約關係） I-276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輔助侵權） III-167, 256, 261, 274, 298
controversies（爭議） I-62
Cooperative Federalism（合作聯邦主義） II-91
Copyright and Patent Clause（美國憲法著作權與專利權條款） IV-517
Copyright Clause's limited times prescription（美國憲法著作權條款之"有限期間"的規定） IV-517
copyright duration（著作權存續期） IV-517
copyright ownership（著作權所有權） V-412
corporate action（公司行為） V-377
corrective and mitigating measures（矯正及減輕殘障措施） IV-99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mates（受刑人互相通信） V-94
corroboration（佐證） III-119
cost difference（成本差異） II-267
cost justification（成本抗辯） II-267, 273
cost-containment measures（內含費用措施） II-292
court martial（軍事審判） II-116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armed forces（軍事上訴法院） II-127
credit report（徵信調查報告） I-338
crime victim（犯罪被害人） IV-250
criminal prosecution（刑事訴訟） IV-428
criminal statute、criminal law（刑法） I-118
cross examination（交互詰問） III-123, 130
cross petition（反訴） I-288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殘酷且不尋常處罰） V-172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殘酷且不尋常之刑罰） V-160, 166
culpability（可責性） V-172
custodial arrest（為羈押嫌犯而對嫌犯進行的逮捕） V-70
custodial interrogation（拘禁狀態下之訊問） II-61, 76, 81

D

damages（損害賠償） II-169, 181
dangerous probability（極度可能） II-249
database（資料庫） III-215
death penalty（死刑） V-160, 166
declaratory judgment（宣示性判決） I-118
declaratory relief（宣示性救濟） I-118
decree（衡平判決） IV-67, 78
defamation cases（毀謗案件） I-338
defense of insanity（心神喪失的抗辯） V-219
defense of truth（真實抗辯） IV-261
deferential analysis（順從式分析） I-160
defraud（詐欺） V-331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交通部） V-43
derivative evidence（衍生證據） V-207
derivative works（衍生著作） III-226
destruction of evidence（證據的滅失） V-70
detached and neutral magistrate（超然中立之治安法官） III-130
deterrent effect（遏止效果） V-183
differentials（差異行為） II-262
digital audio recording device（數位錄音裝置） III-184
direct infringement（直接侵權） III-167
direct injury（直接損害）
direct threat（直接威脅） V-57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就業上身心障礙歧視） IV-99
disability insurance（失能保險） III-2
disability status（身心障礙之狀態） V-49
disability（身心障礙） V-43
disability-neutral rule（身心障礙中立規則） V-53
disabled persons（身心障礙者） V-43
discouraging effect（寒蟬效應） I-315
discretion of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立法裁量） I-45
discretion（裁量） I-288; III-64
discretionary authority（裁量權） IV-459
discrimination in price（價格差異制度） II-257
discrimination（差別待遇、歧視） II-257, 262; III-83; IV-44
discriminatory classification（歧視性分類） IV-23
disparate treatment（差別待遇） I-237
disposition to commit a criminal act（從事犯罪行為之意向） II-42
disproportionate（顯不相稱） V-166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doubt（憲法疑義原則） II-136
doctrine of territoriality（屬地主義） III-219
double damages（雙倍損害賠償） I-185
double security（雙重保障） II-99
draft（徵兵） III-12

drinking and driving（酒後駕車） III-8
drug control（藥物管制） III-47
drug paraphernalia（與毒品交易有關的配備） V-207
drug trafficking（毒品交易） V-207
dual sovereignty（雙重主權） II-99
due process clause（正當程序條款） V-2
due process clause; due process of law clause（正當法律程序條款） I-169, 193, 263, 285, 288, 303; III-55; IV-6, 93, 139,162, 407, 428
Due Process Clause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正當法律程序條款） V-80
due process of law und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正當司法程序） V-219
due process of law（正當法律程序） I-97, 258, 264, 269; IV-362, 428, 489； V-38
due process（正當程序） I-249, 326, 331; IV-334
durationalresidency requirements（最低設籍期間） III-58
dvisual acuity（視力敏銳度） V-45

E

easement or servititude（地役權） I-281
economic freedom（經濟自由） III-153
economic substance of the transaction（交易行為之經濟本質） V-362
educational affirmative action（教育保障名額方案） IV-23
educational diversity（教育多元化） V-21
effective price competition（有效價格競爭） II-276
Eigh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 V-160；166
election contest（選舉訴訟） IV-186, 202
electoral college（總統選舉人團） IV-202
electronic database（電子資料庫） III-226
electronic eavesdropping（電子竊聽） II-47
electronic surveillance（電子監察） II-2, 47
electronically overheard statements（電子聽得之陳述） II-47
emergency（緊急狀態） I-298
eminent domain（徵收） II-300, 303, 306
emotional distress（精神痛苦） IV-295
employee expectation（受僱者期待權） V-53
employee（受僱人） V-412
employee-management relations（勞資關係） V-53
employer liability（雇主法律責任） I-229, 234, 237, 241, 246
employer（僱用人） V-412
employment decision（聘僱決定） V-10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就業歧視） I-229, 237
enforcement power（執行權） II-99
entanglement between government and religion（政府與宗教間之糾葛） IV-346
entrapment（誘陷犯罪） II-52

entrepreneur（企業主） V-362
equal application（平等適用） IV-93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I-233; IV-99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 V-57
Equal Pay Act of 1963（一九六三年同酬法） I-153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平等保護條款） IV-23
equal protection clause（平等保護(障)條款） I-97, 160, 169, 249, 285; IV-6, 93
equal protection doctrine（平等保護原則） I-293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法律平等保護；平等法律保護） I-258; IV-44, 66, 78
equal protection（平等保障；平等權；平等保護） I-130, 140, 144, 331; III-2; IV-104, 202；V-2, 63
equal wages for equal work（同工同酬） I-153
equality of status（地位平等） III-64
erosion of confidence in the profession（對律師產生反感） III-103
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必要設備原則） II-230
essential link（重要關聯） V-377
essential nexus（根本的連結） V-279
essential postulates（重要基本原則） II-99
establishment clause;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clause（禁止設立國教條款） IV- 334; 346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歐洲人權法院） IV-162
euthanasia（安樂死） III-53, 55
every defendant stands equal before the law（所有被告在法庭之前一律平等） IV-429
evidential hearing（採證） I-273
evidentiary hearing（證據聽證） II-292
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進化中的正當行為標準） V-166, 172
exactions（負擔） V-283
exceedingly persuasive justification（極具說服力的(重大)正當理由） IV-23, 30
excessive and unnecessary penalty(過度且不必要之刑罰） V-160
excessive（過度） V-166, 172
exchange self-regulation（交易行為自律原則） II-223
exclusion of evidence（證據排除法則） II-61, 76
Exclusion Order（驅離令） IV-87
exclusionary rule（證據排除法則） III-119, 123, 130; IV-407；V-178, 183
exclusionary zoning practices（排他性區域計畫） I-83
exclusive contract（獨家（排他）契約） IV-511
exclusive right（專屬權） IV-518

exculpatory statement
（對被告或嫌疑人有利之述） II-61
executive committee
（執行委員會） II-204
Executive Privilege
（總統行政特權） IV-488
exempting（豁免） III-64
exemption provision（豁免條款） II-149
exercise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立法裁量權之行使） I-285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隱私權之期待） II-47
expression（表達） III-243; IV-518
expressive activity（表意活動） IV-315
expressive conduct
（表現(性質的)行為） I-354, 366
expressive purpose（表達目的） III-83
extra-territorial enforcement
of antitrust law
（反托拉斯法之域外執行） II-237

F

fact intensive analysis
（以事實為準之分析） V-53
factor other than sex
（除性別以外之因素） I-153
fair and substantial relation
（相當且實質的關連） IV-1
fair comment（合理評論） IV-261
fair representation
（公正的代表性） IV-37
fair trial（公平審判）
I-326; IV-362, 428；V-242
fair use defense
（合理使用的抗辯） IV-518
fair use（合理使用）
III-167, 199, 205, 231, 256, 274, 287
false light（誤導） IV-289, 295
false or misleading
（虛偽陳述或誤導） V-300
Federal antitrust laws
（聯邦反托拉斯法） II-276
Federal Arbitration Act(FAA)
（聯邦仲裁法） II-146
Federal Declaratory Judgment Act
（聯邦宣示性判決法） I-118
federal injunction
（聯邦禁制令） I-115
federal law（聯邦法） I-111
federal questions
（聯邦權限爭議問題） IV-186
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17
（c）（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七條
第 C 項） IV-489
Federal Social Security Act
（聯邦社會安全法） III-19
Federal Trade Comission
（聯邦貿易委員會） II-262, 292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5
（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五條） IV-514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 II-291
feeble-minded（精神耗弱） III-27
felony（重罪） II-40
fiduciary duty（受任人義務） V-392
fiduciary obligation（忠誠義務） I-320
fiduciary（忠實執行業務義務） V-331
Fifth Amendment

（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
I-281, IV-362；V-276
fighting words（挑釁言語；挑釁言論）
III-96；IV-261
filed rate doctrine
（申報費率原則） II-287
final decision（最終的處分） V-289
finality requirements
（終局性要件） IV-488
financial burden
（經濟負擔） IV-250
findings（事實認定） II-292
fingerprint evidence（指紋證據） V-178
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I-331, 345,
First Amendment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V-105, 123；V-150
First Amendment's free speech guarantee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
言論自由保障） III-103; IV-517
354, 366; III-64; IV-250, 261, 289,
294, 301, 305, 327, 346, 514
first impression（第一次表達） III-243
first sale doctrine
（第一次銷售原則） III-219
fiscal integrity（財政完整性） III-2
fixed return（固定收益） II-149
Flag Protection Act
（國旗保護法） I-366
flight（飛行） I-281
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 II-102
foreign relations（外交） V-276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知識基礎） II-8
Fourteenth Amendment
（(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
II-19, 30; III-47, 64, 103; IV-44, 66,
78, 261, 289, 295, 301, 362, 407, 428,
452；V-123,160,166
Fourth Amendment（憲法增修
條文第四條） II-2, 19, 30, 40
franchise agreement
（經銷加盟契約） II-252
fraud（詐欺） V-353
fraudulent conduct（詐欺行為） II-181
Free Exercise Clause; Free Exercise
Clause, Const. 1st Amend.
（信教自由條款） II-96; IV-346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宗教自由）V-150
free speech（言論自由） V-150
free will（自由意志） III-119
freedom of association
（結社自由） IV-130
freedom of expression（表現自由；
言論自由；表意自由；表達自由）
I-314, 345, 366; III-64; IV-305；V-94
freedom of press(出版自由;新聞自由)
IV-261；V-113
freedom of speech（言論自由）
I-108; IV-261, 327；V-113
freedom of the press（新聞自由；出版
自由） II-227；V-150
freelance creators（無特別合約的自由
創作者） V-412
frozen assets（資產凍結） II-102
fruit of poisonous tree

（毒樹果實） III-119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毒樹果實理論） V-207
full disclosure of material Information（重大訊息充分公開） II-175
functional equivalent（功能等同） III-199
functional test（功能測試） I-293
fundamental right to marry（結婚的基本權利） V-94
fundamental rights（基礎權利） IV-139, 162
futures trading（期貨交易） II-181

G

gay（男同性戀者） III-83
gender classification（性別分類） IV-17
gender-based classification（性別區分；性別分類；依據性別的分類） III-8；IV-1, 23
general damages（補償性賠償） IV-261
general interest in crime control（犯罪控制下之一般利益） III-136
general welfare（公共福利） I-269
gerrymandering（畸形選區劃分） IV-104
golden parachute agreement（金跳傘合約） II-163
good faith exception（善意例外） III-130
government censorship（政府審查） III-64
government of the Union（聯邦政府） I-45
governor（州長） II-109
grand jury（大陪審團） III-130
grandfather clause（不追溯條款） II-223
grievance procedure（申訴程序） I-229
grocery store chain（連鎖商） II-267
gross negligence（重大過失） II-139
grossly excessive（極端過當） IV-452
group boycott（集體杯葛） III-160
Guarantee Clause, Const. IV, § 4（保證條款） II-91
gubernatorial veto（州長否決權） II-109

H

habeas corpus petition（人身保護令的申請） IV-428
habeas relief（人身保護救濟） III-123
Habitual Criminal Act（慣犯條例） II-86
handbill（傳單） IV-315
Health insurance（健康保險） IV-511
hearing（聽證） I-288；V-228, 235
hedging（避險） II-181
heightened judicial scrutiny（嚴格司法審查標準） IV-517
heightened scrutiny（加強審查；較嚴格審查標準） I-160；V-129
hostile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 I-228, 223, 246
homosexuals（同性戀(者)） I-173; IV-139, 162
horizontal restraint（水平限制） II-216
Hostage Act（人質法） II-102
hostile environmeharmless-error

doctrine
（不影響判決之錯誤之理論） V-331
hostile or abusive work environment
（敵意或惡劣之工作環境） I-237
hot pursuit（追躡人犯） II-2, 19

I

illegal *per se* rule
（本身違法原則） II-253
illegal *per se*
（本質違法；當然違法） II-207, 216
illegitimate teenage pregnancy
（非法的青少年懷孕） IV-17
imminent danger（立即危險） I-293
immutable characteristic
（不可改變的特徵） I-147
impairments（肢體或精神損害） V-43
impairment of contract
（契約損害） I-298
impanel the jury（從陪審員候選人名單中選定陪審員） V-219
impermissible motive
（不受允許的動機） V-10
implied cause of action
（隱含之請求權基礎） V-320
implied power（默示授權） I-45
implied private cause of action
（默示私訴因） V-377
implied rights of action
（默示請求權） II-181
important governmental objective
（重要施政目標） III-8
in camera inspection
（密室調查） IV-489
in custody（拘禁中） II-61, 76
in predatory tactics
（掠奪性手段） II-276
inadmissible
（無證據力；無證據能力） II-61; 76
incorporate（納入） V-242
incriminating statement; inculpatory statement（對被告或嫌疑人不利之陳述） II-61, 76
indecent（不雅） III-71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獨立承攬人） V-413
independent contracts（獨立承包商）V-57
independent source
（獨立來源） III-119, 123
independent source（獨立消息來源）V-207
independently owned store
（獨立商） II-267
Indiana Dental Association
（印第安娜州牙醫協會） II-292
indigent criminal defendant
（貧窮的刑事被告） IV-514
indigent defendant
（貧窮的被告） IV-428
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
（個別判斷） V-49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針對個人的特質作出個別考量）V-21
indivisualized suspicion
（個體懷疑） III-136
induce commission of a crime
（誘導犯罪） II-52
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無效的律師協助辯護） IV-436
inevitable discovery
（必然發現） III-123

inferior officer（下級官員） II-127
informational statement （資訊聲明）V-377
informed consent
（告知後同意原則） I-249
inherently suspect
（本質上具有違憲嫌疑） I-147
inherently unfair（本質上不公平） V-331
injunction（禁制令或禁止處分；
強制令；禁制令）
I-118, 303; II-227, 276
injury in fact（事實上之損害） I-73
injury（損害） I-92
inmate marriage（受刑人結婚） V-94
insane（心神喪失） III-27
inside Information（內部消息） II-201
insider trading（內線交易） V-294, 331
insider（內部人） V-331
instructional text（教材） V-412
instrument（契據） V-362
insurance（保險） II-149
integrity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司法程序之完整性） I-326
intent of Congress（國會意旨） II-181
interest at stake（訴之利益） I-288
interlocutory appeal（中間上訴） II-96
intermediate scrutiny
（中密度審查標準） III-16,
intermediate scrutiny（中度審查標
準；中度審查） V-129, 150
intermediate-level scrutiny
（中密度審查基準） III-27
International Exhaustion
（國際耗盡） III-219
Internet（網際網路） III-71, 184
interracial marriage（異族婚姻） IV-93
interrogation（訊問） V-178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州際貿易法） II-287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州際貿易委員會） II-287
interstate commerce（州際商業） II-227
intra-branch dispute
（機關內部爭議） IV-489
intrabrand restraints on distribution
（相同品牌產品間之經銷限制）
II-252
intrusion on privacy
（隱私的侵犯） III-103
inverse condemnation action（準徵收訴
訟） V-289
inverse condemnation（準徵收） V-283
investigatory stage（調查程序）V-178103
investment risk-taking
（投資風險承擔） II-149
investor（投資人） II-181
invidious discrimination
（不公正歧視） III-2
invidious, archaic and overbroad
stereotypes（不公平、
古老且過廣的刻板印象） IV-30
involuntary servitude
（非自願性勞務） I-258
irrational, arbitrary or capricious
（不理性、獨斷或專擅） I-269
irreparable harm
（無可回復之損害） IV-194
item veto（條項否決） IV-458

J

Jim Crow Laws
（黑人歧視法） IV-44, 67, 78
job evaluation system

（工作評估制度） I-153
job qualification（工作資格） V-45
job security（就職安全） V-53
joint venture
（合作企業） II-207, 216
judge（法官） II-127
judicial act（司法行為） I-56
judicial duty（司法責任） I-36
judicial power（司法權） I-100
judicial remedies（司法救濟） II-181
judicial review（司法審查）
I-108, 288; IV-327
judicial self-governance
（司法自我約束） I-83
judicial self-restraint
（司法自制原則） V-160
judicial warrant（司法搜索令） V-70
judicially created remedy
（司法機關以判決創立之
救濟途徑） V-183
jurisdiction（(司法)管轄權）
I-56, 63, 111, 122, 169
juror（陪審員） IV-30
just compensation
（合理補償） I-169, 285
Justiciability（可司法性） IV-489
justiciability（可訟性；達於可訴訟狀
態；可裁判性） I-62, 103, 122
justiciable character
（可訟性質） I-59
Jehovah's Witness
（耶和華的見證人） V-150

L

land use（土地利用） I-285
Landmarks Preservation Law
（地標保存法） II-300
landowner（土地所有權人） I-281
lawmaker（立法者） I-293
lawyer advertising（律師廣告） III-103
lawyer referral service
（律師仲介服務所） III-103
layman（不懂法律的外行人） IV-428
lease（出租） I-285
least restrictive means
（最少限制方法） II-96
legal representation（法律代理） III-103
legal vote（合法有效選票） IV-202
legislative act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law
（違憲立法無效） I-36
legislative findings（立法發現） V-49
legislative history（立法歷史） V-320
legislative intent（立法意旨） V-320
legislative punishment（立法裁罰） I-293
Legislative Veto（立法否決） V-250
legitimate government interests
（合法政府利益） III-55
legitimate objectives（正當目的） III-64
lesbian（女同性戀者） III-83
liberty and property Interests
（自由及財產利益） I-273
liberty of press（新聞自由） I-303
liberty of speech（言論自由） I-303
liberty to contract（締約自由） I-264
licenses and permits
（執照和許可制度） V-113
life imprisonment（終身監禁） V-172
like grade and quality

（同級及同品質） II-273
limitation of judicial power
（司法權限） I-73, 115
limited power（限制權力） I-36
list prices（協議價格） II-204
logical connection（邏輯關連性） V-94
long-term impairment
（長期身心受損） V-49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Policy Amendments Act of 1985
（一九八五年低輻射廢料政策修正法） II-91

M

machine recount
（機器重新計票） IV-186, 202
Magna Carta（大憲章） III-153
major competitive weapon
（主要競爭武器） II-276
major life activities（主要生活活動） V-43
major life activity
（主要生活活動） IV-99
mandamus（強制處分令） I-36
mandate（法院命令） IV-202
mandatory preference
（強制性優越地位） I-144
manipulative act（操縱行為） II-163
manipulative（操控） V-331
manual recount
（人工重新計票） IV-186, 202
marital privacy（婚姻隱私權） IV-130
market power
（市場力量） II-230, 249; IV-511
material（重大的） V-300
materiality（重要性） III-147
materially false or misleading statement
（重大不實或誤導之聲明） V-377
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
（公共關心事項） I-338
media（媒體） V-123
medical diagnosis（醫療診斷） V-49
medium（媒介） IV-315
mental capacity（心智能力） V-219
mentally retarded（智障者；心智障礙） III-27；V-172
menu command hierarchy
（分層功能表指令） III-243
mere possession（單純持有） V-331
message（資訊） IV-315
method of operation
（操作方法） III-243
militia（民兵） II-109
Miranda rights（依米蘭達案享有之權利事項） II-61, 76
Miranda warnings
（米蘭達警告） II-61, 76, 81
misappropriate（濫用） V-331
misappropriation（不當挪用） V-392
miscegenation（異族通婚） IV-93
misrepresentation（不實陳述） II-169；V-353
mitigating evidence
（減刑的證據） IV-436
mitigating measures（減緩措施） V-43
monopolistic position
（獨占地位） II-276
monopolization（獨占行為） II-230
monopolize（獨占） II-249
monopoly（獨占；壟斷）

II-211, 227, 230; III-157
morality risk（死亡風險） II-149
motive to conspire（共謀動機） II-237
motive（動機） III-96
motives of the legislature
（立法動機） I-56
murder（謀殺） V-166
music market（音樂市場） III-287

N

（not）similarly situated
（處境（不）相當） IV-17
narcotics（毒品） V-70, 207
narrowly tailored means
（較低程度限制） V-105
narrowly tailored（仔細審酌；經過嚴密設計） IV-104；V-129
national consensus（全國共識） V-172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affairs
（國防與軍隊事務） III-12
national guard（國民兵） II-109
nativism（國族主義） IV-93
natural advantages（天然優勢） II-276
navigable airspace（可航行空間） I-281
NCAA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協會） II-215
necessary and proper
（必要而適當） I-45
necessary means（必要手段） I-45
negligence per se（當然過失） V-105
Negotiated Rates Policy
（協議式費率政策） II-288
neutral magistrate
（中立的治安法官） V-70
neutral statements（中立陳述，利與不利之間中立） V-193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紐約證券交易所） II-222
newspaper（報紙） V-105
nominal damages（名義損害） I-320
noncommercial recording
（非商業性錄影重製） III-256
nonjusticiability（欠缺可裁判性） I-122
nonpossession regulation
（未持有管制） I-345
nonpregnant persons
（不懷孕的人） III-2
nonprice vertical restraint
（非價格性垂直限制） II-252
nonpublic school（非公立學校） IV-346
non-resident member
（通訊會員） II-204
nuisance litigation（濫訟） V-377

O

obligation of contract（契約義務） I-298
obscene（猥褻） III-71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SHA) of 1970（一九七〇年職業安全與衛生法） V-57
offensive thought（冒犯性思想） III-96
one person, one vote
（一人一票） IV-104
one step at a time（一次一步） III-2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聽證陳述機會） V-228, 235
option（選擇權） II-201
optional customer service
（額外顧客服務） II-267
ordinance（鄉鎮市規約） V-150

original and supreme will
（原初、最高意志） I-37
originality（原創性） III-298; IV-518
otherwise qualified individual
（其他適格之個人） V-53
overbreadth（限制過廣） IV-315
overbroad generalization
（過廣的一般化） IV-17
overbroad（過於廣泛） III-96
overreaching（過度廣泛） III-19

P

parallel importation（平行輸入） III-219
parody（口水歌） III-287
partnership(合夥關係) V-294
patently offensive
（明顯令人不悅） III-71
patently unconstitutional on its face
（明顯違憲） III-64
paternalism（干涉或家父主義） III-103
paternity（親子關係） IV-30
patient- identification（病人識別） III-47
penalty enhancement（刑之加重） III-96
Pennsylvania Nonpublic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賓夕法尼亞州非公立中小學教育法） IV-346
Pennsylvania Subsidence Act
（賓州塌陷法） II-306
pension（養老金） I-276
penumbra（月暈效果） IV-130
per se rule（當然違法原則） IV-514
per se（本質上） V-45
peremptory strike（任意反對權） IV-30
perjury（偽證） V-243
permanent impairment
（永久身心受損） V-49
permanent injunction（永久禁令） I-173
permanent physical occupation
（永久直接管領） II-303
permissible restriction
（可容許限制） IV-305
personal effects（私人物品） V-70
petition for writ of habeas corpus
（申請人身保護令） IV-436
petition（裁量上訴） IV-194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身體虐待與性侵害） IV-436
physical evidence（有形證據） III-119
physical or mental impairment
（肢體或心智缺陷） IV-99
picket（站崗糾察） V-129
picketing（持標語牌抗議） III-64
plain view （一目了然） V-70, 207
police power（警察權）
I-169, 264, 285; II-300, 303, 306, IV-44
political act（政治行為） I-36
political gerrymander
（將議員選區劃成不規則形狀） I-140
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政治問題「不受司法審查」之原則） I-134
political question（政治問題）
I-122, 137, 140
polygamy（一夫多妻） V-141
possessory interests（佔有權益） V-207
possessory taking（占有性取得） II-303
post-conviction relief
（撤銷或更正定罪裁決） IV-436

potential life（潛在生命） I-193, 203
Power Act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II-102
power of taxation to be concurrently exercised（徵稅權競合） I-45
power of taxation（徵稅權） I-45
precedent（判決先例） I-111
predatory or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奪掠性或反競爭行為） II-249
predatory pricing（掠奪性訂價） II-237
predisposition（犯罪傾向） II-52
preference stock（優先股） II-201
preferential treatment（優惠待遇） III-16
pregnancy（懷孕） III-2
prejudice（偏見） V-166
preliminary injunction
（初步禁令） I-173
preliminary merger discussions
（初期合併談判） III-147
premarital sexual relations
（婚前性行為） V-63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優勢證據標準） V-353
present a mitigation case
（提出減刑的請求） IV-436
present interest of property
（財產上現有利益） I-83
Presentment Clause（呈送條款；咨送總統批准條款） IV-458；V-250
President（總統） V-264
Presidential election（總統選舉） IV-186, 194, 202
presidential elector（總統選舉人） IV-202
pressing public necessity
（迫切之公共必要） IV-87
presumable coerced environment
（可推定受脅之環境） II-76
presumed damages
（推定的損害賠償） I-338
previous restraint
（事先審查、事先限制） I-303
price control（價格控制） I-269
price difference（價格差異） II-262
price discrimination（價格差別待遇） II-267, 273, 276
price fixing（聯合定價；價格固定） II-207, 211; III-160
price manipulation（價格操縱） II-181
prima facie case of age discrimination
（年齡歧視證據確鑿案件） I-185
prima facie cas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種族歧視證據確鑿案件） I-179
primary jurisdiction（初審管轄權） I-36
principal（正犯） V-242
prior restraint
（事前審查）I-314, 320; IV-327；V-129
Prison Motivational Boot Camp
（監獄激勵訓練營） II-136
privacy interests（隱私權益） V-70, 207
privacy（隱私；隱私權） III-47; IV-130；V-63, 105
private cause of action
（私法起訴理由） II-181
private contract（私契約） I-276
private party（私人） II-181
Private Pension Benefits Protection Act
（個人養老給付保護法） I-276
private property（私有財產） I-281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不自證己罪之特權） II-61
privilege of employment（僱用特權） I-185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特權及豁免權） I-258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clause（特權及豁免權條款） III-58
probable cause(相當事由／相當或相信被告之犯罪合理根據；相當理由；相當原因） II-8；35, 41；III-119, 130；V-70, 207
probate courts（遺產法院） I-144
procedural due process of law（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 V-228
procedural due process right（程序性正當程序權利） V-235
procedural due process（程序性正當程序） I-273
procedural safeguards（程序保障措施） IV-327
procompetitive（有益競爭的） II-216
profit of crime（犯罪所得） IV-250
prompt judicial review（立即性司法審查） I-315
proof of pretext（藉口的證明） I-179
property interest（財產利益） V-228, 235
proprietary brand（商標專屬） II-276
protected status（受保護之身分） III-96
protective sweep（保護性掃描） II-41
proxy solicitation（委託書之徵求） V-300, 377
public accommodation（公眾住宿場所；公共運輸） III-83；V-49
public airwaves（公共頻道） III-256
public broadcast of a trial（公開司法程序） I-326
public defender（公設辯護律師） IV-436
public display（公開展示） III-205
public domain（公共財產） IV-517
public education（公共教育） IV-67, 78
public employees and facilities（公立醫療院所人員與設施） III-32
public entity（公法人） II-136
public forum（公共論壇；公共場所） III-64; IV-327；V-129
public fund（公費補助） III-32
public moral（公序良俗） I-298
public nuisance（公害） I-303
public order（公共秩序） III-64
public policy（公共政策） V-276
public property（公共財產） IV-315
public safety（公眾安全） II-76
public school（公立學校） IV-67, 78
public transportation（公共設施） V-49
public trial（公開審判） IV-362
public welfare benefits（公共福利給與） V-228
public welfare; public intrest（公眾福祉） I-276
punitive damages（懲罰性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懲戒性賠償） I-320, 338; II-146; IV-261, 289, 295, 452

Q

qualification standards（適格標準） V-57
qualifications of Congress members（國會議員資格） I-134
Qualified immunity（附條件的免責權） V-264
quasi-suspect classification（準違憲嫌疑分類） III-27
quid pro quo sexual harassment（互為性騷擾） I-246
quid pro quo（以物易物之交換條件） IV-518

R

racial classifications（種族分類） V-21
racial discrimination（種族歧視；種族歧視(差別待遇)） I-92, 179, 237; IV-93；V-20
racial preference（種族偏好） V-20
racial prejudice（種族偏見） IV-87
racial restrictive covenant（以種族為限制條件之協定） I-97
ratification of a treaty（條約批准） I-137
rational basis review（合理審查基準） IV-162
rational basis（理性的基礎） V-279
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合理關聯性審查標準） IV-23
rational relationship（合理關係） I-144
reapportionment（重新分配） I-130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合理處置或措施） V-49
reasonable basis（合理基礎） III-2
reasonable belief（合理相信） II-41
reasonable care（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I-241, 246
reasonable exactions（合理的負擔）V-279
reasonable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合理的投資報酬期待） V-289
reasonable mind（理性人） II-292
reasonable person（合理個人） I-234
reasonable possibility（合理的可能性） II-257
reasonable professional judgment（合理之專業判斷） IV-436
reasonable rates（合理送運費率） II-211
reasonable relationship（合理關係） I-269
reasonable relationship（合理的關係）V-279
reasonable scrutiny（合理審查基準） III-27
reasonable victims（合理被害人） I-234
reasonable, not arbitrary（合理而非恣意） I-144
reasonableness under prevailing professional norms（現行專業基準的合理性） IV-436
reasonable-relationship standard(合理關係標準） V-94
reassignment（調職） V-53
redeem（贖回） I-298
re-employment（再僱用） I-179
refuse to deal（拒絕交易） II-230
regarded as disabled（被認為身心障礙） V-43
registration（備徵登記） III-12
regulations（行政規則；管制命令） V-45, 289

regulatory interpretations
（對行政規則之詮釋） V-49
regulatory taking（管制準徵收；
管制性取私產為公用）
II-300, 306；V-283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
（一九七三年復健法） V-53
relation of a taxpayer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個別納稅人與
聯邦政府關係） I-59
release and assignment（讓與） V-276
relevant market（有關市場） II-249
religious belief（宗教信仰） V-141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3（一九九三年宗教自由復興法）
II-96
religious opinion（宗教意見） IV-305
remand（發回） I-179; II-249
remedial nature of the Enforement
Clause（執行條款之補救性質） II-96
remedial plan（補救方案） I-160
remedy of past economic discrimination
（補償過去的經濟歧視） IV-1
remedy（賠償；救濟） I-298; IV-78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政府的共和體制） I-122
requirement of "injury in fact."
（「具體損害」要件） I-70
respondeat superior
（僱主責任） IV-289
restrained trade（限制貿易） II-204
restraint of trade（限制交易） III-157
restriction on the place and manner
（對地點及方式之限制） IV-305
reverse engineering
（還原工程） III-231
reverse（廢棄） I-140, II-249
revision（改作） III-226
Rhode Island Salary Supplement Act
（羅德島州薪資補助法） IV-346
right exhausted（權利耗盡） III-219
right of privacy（隱私權） V-80
right to abortion（墮胎權） III-32
right to assistance of counsel
（刑事被告要求律師協助辯護
的權利） IV-428
right to compulsory process（刑事被告
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
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 V-242
right to counsel
（請辯護人之權利） II-61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言論自由權利） V-235
right to marry（結婚權） V-80
right to privacy
（隱私權） II-2; IV-289, 301
right to terminate the pregnancy
（終止懷孕之權利） I-203
right to travel（遷徙自由） III-58
right to vote（投票權） IV-202
rights of confront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對質與交互詰問
權利） V-228
rights to 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免於受到差別待遇的權利） V-20
robbery（強盜罪） II-40
Robinson-Patman Act
（羅賓森派特曼法案） II-223, 262
romantic paternalism

（浪漫的父權主義） I-147
rough proportionality
（約略比例原則） V-279；283
routine legal service
（例行性法律業務） III-103
rule of reason（合理法則）
II-216, 222, 253, 292
rule-making（制定行政規定） V-57
rules of standing
（當事人適格法則） I-83
Rule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證券商公會規則） II-146

S

"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
（主要物流原則） III-256
safe harbor
（空檔期；免責條款） IV-186, 202
sale of business doctrine
（營業讓與理論） V-362
sanity hearing
（對精神狀態問題的聽證會） V-219
saving of welfare costs
（福利成本之撙節） III-2
scienter（犯意，詐騙故意） II-175
scope of the license（授權範圍） III-188
search and seizure
（搜索與扣押） II-2, 16, 19, 35
search incident to a lawful arrest（合法逮捕的附帶搜索） V-70
search warrant
（搜索狀，搜索票） II-8, III-130
search（搜索） II-41
searches incident to lawful arrests
（合法逮捕而為附帶搜索） II-16
secret negotiation（祕密協商） II-288
Securities Act of 1933（證券法） V-353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1934
（證券交易法） V-353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Rule 證券管理委員會） V-392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證券交易法；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
V-294, 320, 392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證券交易法） V-300
securities（證券） II-149
security（證券） V-331, 362
segregations（種族隔離措施）
IV-44, 67, 78
selective exclusion
（選擇性排除） III-64
selective suppressing
（選擇性壓制） III-64
self-censorship
（自我事前審查） IV-261
self-executing（自動施行） II-96
self-fulfillment（自我實現） III-64
self-inculpatory statements
（對己不利陳述） V-193
self-serving statements
（對己有利陳述） V-193
seniority system（年資制度） V-53
separate but equal（區隔但平等）
III-16; IV-44, 67, 78
separation of powers（權力分立）
I-92; II-116; IV-459, 489；V-250, 264
Serial Copy Management System , SCMG（連續複製管理系統） III-184

Severable
（可分開處理且互不影響效力）V-113
sex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就業上性別歧視） I-233, 241, 245
sex discrimination（性別歧視）
I-153, 229, 237
sex stereotyping（性別成見） V-10
sex-based discrimination
（性別歧視） III-2
sex-based distinction(基於性別的區分）
V-2
sexual assault victim（性侵害受害者）V-105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工作場所性騷擾） I-228, 241, 245
sexual harassment（性騷擾） I-228, 237
sexual orientation（性別取向） III-83
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
（色情資訊） III-71
shareholder meeting（股東會） V-300
Sherman Act（休曼法） IV-514
short-swing profits
（短線交易利益） II-200
silence（沉默） V-331
Silver Platter Doctrine
（銀盤原則） IV-407
simple negligence（單純過失） II-139
single-sex admissions policy
（單一性別入學政策） IV-23
single-sex education
（單一性別教育） IV-23
Sixth Amendment right to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與被告得以要求律師有效協助辯護的權利） IV-436
Sixth Amendment
（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 IV-428
Small Business Act
（小型企業法） III-16
social security（社會安全） V-2
sodomy law（肛交禁止法；肛交法）
IV-139, 162
solicitation restriction
（招攬業務限制） III-103
solicitation（招攬人員） V-150
Son of Sam law
（「山姆之子」法律） IV-250
sovereign immunity（主權豁免） II-102
sovereign power
（主權；公權力） I-276, 298
sovereign state（主權州） I-45
sovereignty（主權） I-45
Special Prosecutor（特別檢察官） IV-489
specific and articulable facts
（特定及可敘明的事實） II-19, 41
speculator（投機者） II-181
Spending Clause, Const. Art. I, §8, cl. 1（開支條款） II-91
squeeze-out merger（強取合併） II-163
stakeout（警戒盯梢） V-207
standard of judicial review
（司法審查的標準） V-21
standing to make that challenge
（質疑之適格） I-315
standing to sue
（訴訟當事人適格） I-70
standing（當事人適格）
I-62, 73, 92, 97, 122, 169
stare decisis（遵循判決先例原則；

先例遵循原則；判例先例拘束原則；判例拘束原則）
I-203; III-32; IV-162, 407；V-160
state law preempted by federal regulation（聯邦法優先於州法適用）
II-91
state law（州法） I-111
state's chie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州執法首長） II-99
status quo（現狀） V-207
statutory construction（條文解釋） V-320
statutory mitigating or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法定減輕或加重事由） V-166
statutory rape（準強制性交） IV-17
stay order（停止命令） IV-202
stay（停止命令） IV-194
stereotype view（陳腐觀念） IV-23
stereotype（刻板印象） I-147
sting operation（執法人員誘人犯罪勾當） II-52
stipulation（訴訟雙方的辯護律師對有關審理的任何事項所達成的協議） V-219
Stock Exchange Act（證券交易法案） II-223
stockholder(股東) V-294
stop and frisk（攔阻與拍搜） II-19
strategic decision（辯護策略決定） IV-436
street（街道） IV-315
strict judicial scrutiny（嚴格的司法審查） III-2
strict scrutiny equal protection test（平等保護高密度審查標準） III-16
strict scrutiny（嚴格審查標準） V-21, 129
subcontractor compensation clause（次承攬人補償條款） III-16
Subpoena duces tecum（提出證據傳票） IV-488
substantial government interest（實質政府利益；實質的政府政策目的） I-354；III-64
substantial governmental interest（重大政府利益） III-103
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實質上非侵權使用） III-256
substantial similarity（實質相似(性)） III-205, 298
substantially limits（相當程度限制） V-43
substantially related（實質關連） III-8
substantive-due-process（實質正當法律程序） III-55
summary judgment（扼要判斷；簡易判決；即決裁判）
II-223；IV-301；V-43, 45,53
supervisory sexual harassment（管理監督者所造成之性騷擾；主管性騷擾） I-241, 246
supplementary work（補充著作） V-412
suppression hearing（審判前之證據排除聽審） V-183
suppression of evidence（禁止證據呈堂） V-207
supreme law of the land（最高國法） I-36
Surface Transportation and Uniform Relocation Assistance Act of 1987（一九八七年地面交通與統一徙置

補助法） III-16
survivors' benefits（死亡給付） V-2
suspect classification
（嫌疑分類，分類違憲）
III-2, 53; IV-1
suspicionless searches or seizures
（無懷疑情形下之搜索或扣押）
III-136
sweat of the brow（血汗論） III-215
symbolic acts（象徵性行動） III-83
symbolic speech（象徵性言論） I-345
syndicated right（聯合配銷權） III-256

T

takeover（購併） II-201
taking（取得） I-281
takings claim（徵收主張） V-283, 289
Takings Clause（徵收條款） V-283, 289
target corporation（目標公司） II-200
targeted directed-mail solicitation of business（向特定對象寄發招攬業務信件） III-103
tax exemption（賦稅減免） IV-1
tax-exempt（免稅） I-92
taxpayer standing
（納稅人訴訟當事人適格） I-70
taxpayer（納稅人） I-63
tax-raised funds（加稅基金） IV-334
telephone directory（通訊錄） III-215
televising court proceedings
（電視轉播訴訟） IV-362
temporarily disabled（暫時失能） III-2
temptation of a crime（犯罪誘惑） II-52
tender offer（收購要約；公開收購股份要約） II-163；V-392
terminate the pregnancy
（終止懷孕） I-193
tests of viability（胎兒獨立存活能力之檢驗標準） III-32
textually demonstrable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textual commitment
（憲法明文承諾） I-134
the against penal interest exception
（違反刑事利益陳述之傳聞例外） V-193
the common-law agency doctrine
（普通法的代理學說） V-413
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of the Sixth Amendment（增修條文第六條之與證人對證條款） V-242
the conventional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傳統的主僕關係） V-413
the Copyright Act of 1976（1976 年美國著作權法） V-412
the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doubt
（憲法疑義原則） V-172
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第十四條增修條文之正當司法程序條款） V-242
the Eighth Amendment
（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 V-172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美國憲法第十四條增修條文的平等保護條款） V-20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s
（平等保護條款） V-80
the exclusionary rule
（證據排除法則） V-207
the first amendment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V-141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增修條文第十四條） V-37
the four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 V-141
the right of publicity（公開權） V-123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 Rule（證券管理委員會規則） V-377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1934 年證券交易法） V-377
the transfer of control（經營權之移轉） V-362
the work for hire doctrine（聘僱著作學說） V-412
Thirteenth Amendment（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 IV-44
threat-to-others（對他人造成威脅） V-57
threat-to-self（對本身造成威脅） V-57
three great divisions of power in the government（三權分立） I-100
tie product（搭售商品） IV-511
time, place and manner regulation（關於管理發表言論之時間、地點或方法之規則） IV-327
time-place-manner-based regulation（時間、地點、方法管制） III-64
time-shifting（時段挪移） III-256
tip（機密消息） V-331
tithes（什一稅） IV-334
Title Ⅶ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民權法第七編） IV-37
Title Ⅶ（第七章） V-10
Title VII-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一九六四年民權法第七章） I-179, 229, 233, 238
to grant habeas corpus（提審） I-56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提升科學與實用性文化的發展） IV-517
torts（侵權行為） I-281
traffic（交通） IV-315
transaction cost（交易成本） II-207
transaction（交易） II-273
translation（翻譯） V-412
treaty（條約） V-276
treble damages（三倍損害賠償） II-276
trespass（非法侵入） II-2
trial lawyers association（審判律師協會） IV-514
trimester framework（三分期架構） I-193, 203
trustworthiness of the evidence（證據的可靠性） V-178
two laws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規範衝突） I-36
tying arrangement(s)（搭售） III-160; IV-511
tying product（主要商品） IV-511
tying（搭售） III-157

U

"undue burden" test（「不當負擔」審查標準） I-203
uncompensated taking（未予補償的徵收） V-279
unconstitutional（違憲） I-36; III-64
undercover agent; undercover detective（臥底警察、臥底人員） II-81

underinclusive(ness)
（過度狹隘） III-2, 19
under-inclusive
（規範對象範圍不周延） V-63
underrepresentation（代表性不足） IV-37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
（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 V-20
underwriting of risk（承保風險） II-149
undue hardship（不當困難） V-53
unequal but benign
（不平等但善意） III-16
unequal treatment（不平等待遇） III-64
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
（不公平競爭方法） II-291
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 and Service Act（三軍訓練與服務法） I-345
unknown or unknowable
（非明知或可得而知） V-362
unlawful detention（非法拘禁） V-178
unlawful search or seizure
（非法搜索或扣押） III-130
unlawful search（非法搜索） III-119
unlimited discretion（無限制的裁量） V-113
unprotected expression
（不受保護之表達） I-314
unreasonable practice
（不合理作為） II-288

V

validity of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
（國會所通過的立法之有效性） I-100
variable annuities（變額年金） II-149
verbal evidence（言詞證據） III-119
viability（獨立存活能力） I-193, 203
vicarious infringement
（替代侵權） III-167, 256
vicarious liability（(於代理關係下)本人之法律責任；替代責任） I-241, 246；III-262
victimless crimes
（無被害人犯罪） IV-139
victims of an accident or disaster
（車禍或災變事故受害者） III-103
vindictiveness（報復） II-86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維吉尼亞軍校） I-160
vision standards（視力標準） V-45
visual clutter（視覺侵擾） IV-315
vital interest（重大利益） I-298
voluntarily given statement; voluntary statement（自願性供述） II-61
voluntariness（自願性） II-30
vote dilution（選票稀釋） IV-104
voting right（選舉權） IV-104

W

waiver（豁免） V-45
wantonly（恣意） V-166
warehousing（倉庫效應） V-331
warrantless search（無搜索令的搜索） V-70
welfare benefits（福利金） III-58
welfare recipient（福利受益人） I-273
White Supremacy
（白人至上主義） IV-93
wholesale dealer（批發商） II-204
within the scope of employment
（僱傭（職務）範圍之內） V-412
witnesses testimony（證人證詞） V-243
work rule（作業準則） II-292

working conditions（工作條件）　I-153
workplace paternalism
（工作場所父權思想.）　V-57
works made for hire（聘僱著作）　V-412
writ of certiorari（移審令）　I-169, 173
writ of error（錯誤復審令）　IV-44
writ of habeas corpus
（人身保護令）　I-56; II-86；V-219
written constitution（成文憲法）　I-36

Z

zoning（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I-285
1976 Copyright Act
（1976 年著作權法）　IV-517
1998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
（1998 年著作權存續期延長法案）
IV-517
“freeze-out” merger（強取合併）　V-377
“short-swing”profits
(短線交易之利益)　V-294

關鍵詞中英索引

I-第一輯 II-第二輯
III-第三輯 IV-第四輯
V-第五輯

一劃

1934 年證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V-377
1976 年著作權法（1976 Copyright Act） IV-517
1976 年美國著作權法（the Copyright Act of 1976） V-412
1998 年著作權存續期延長法案（1998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 IV-517
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一九九〇年美國身心障礙人士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II-136; IV-99；V-43, 45, 49, 53, 57
一九九三年布瑞迪手鎗暴力防制法（Brady Handgun Violence Prevention Act of 1993） II-99
一九九三年宗教自由復興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of 1993）II-96
一九九六年傳播通訊管理法（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of 1996） III-71
一九八七年地面交通與統一徙置補助法（Surface Transportation and Uniform Relocation Assistance Act of 1987） III-16
一九八五年低輻射廢料政策修正法（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Policy Amendments Act of 1985） II-91
一九六七年就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of 1967） II-136
一九三四年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V-320; 392
一九六三年同酬法（Equal Pay Act of 1963） I-153
一九六四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V-10
一九六四年民權法第七章（Title VII-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I-179, 229, 233, 238
一九七〇年職業安全與衛生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SHA) of 1970） V-57
一九七三年復健法（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 V-53
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 IV-104
一次一步（one step at a time） III-2
"一致和比例"審查標準（congruence and proportionality standard of review） IV-518
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 II-237
一致拒絕（concerted refusal） II-223
一夫多妻（polygamy） V-141
一目了然（plain view） V-70; 207

二劃

人工重新計票
（manual recount） IV-186, 202
人身保護令（writ of habeas corpus）
I-56; II-86；V-219
人身保護令的申請（habeas corpus petition） IV-428
人身保護救濟（habeas relief） III-123
人質法（Hostage Act） II-102
人權法案
（Bill of Rights） III-153; IV-428
入學申請審核準則（admission guidelines） V-20

三劃

「山姆之子」法律
（Son of Sam law） IV-250
三分期架構（trimester framework）
I-193, 203
三軍訓練與服務法（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 and Service Act） I-345
三倍損害賠償（treble damages） II-276
三權分立（three great divisions of power in the government） I-100
下級官員（inferior officer） II-127
上級法院調閱下級法院判決的命令
（certiorari） IV-428
上訴(審)管轄權
（appellate jurisdiction） I-36,103
上訴可能性（appealable） IV-488
口水歌（parody） III-287
土地利用（land use） I-285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zoning） I-285
土地所有權人（landowner） I-281
大陪審團（grand jury） III-130
大憲章（Magna Carta） III-153
女同性戀者（lesbian） III-83
小型企業法
（Small Business Act） III-16
工作條件（working conditions） I-153
工作場所父權思想.（workplace paternalism） V-57
工作場所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I-228, 241, 245
工作評估制度
（job evaluation system） I-153
工作資格（job qualification） V-45
干涉或家父主義（paternalism） III-103

四劃

不公平、古老且過廣的刻板印象
（invidious, archaic and overbroad stereotypes） IV-30
不公平競爭方法（unfair method of competition） II-291
不公正歧視
（invidious discrimination） III-2
不可改變的特徵
（immutable characteristic） I-147
不平等但善意
（unequal but benign） III-16
不平等待遇（unequal treatment） III-64
不合理作為（unreasonable practice）
II-288
不自證己罪之特權（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II-61
不受允許的動機（impermissible

motive） V-10
不受保護之表達
（unprotected expression） I-314
不追溯條款
（grandfather clause） II-223
不理性、獨斷或專擅（irrational, arbitrary or capricious） I-269
不雅（indecent） III-71
不當困難（undue hardship） V-53
「不當負擔」審查標準
（"undue burden" test） I-203
不當挪用（misappropriation） V-392
不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 II-169；V-353
不影響判決之錯誤之理論
（harmless-error doctrine） V-331
不懂法律的外行人（layman） IV-428
不懷孕的人
（nonpregnant persons） III-2
中立的治安法官
（neutral magistrate） V-70
中立陳述，利與不利之間中立
（neutral statements） V-193
中度審查（intermediate scrutiny） V-150
中度審查標準（intermediate scrutiny） V-129
中密度審查基準（intermediate-level scrutiny; intermediate scrutiny） III-16, 27, 103
中間上訴（interlocutory appeal） II-96
互為性騷擾（*quid pro quo* sexual harassment） I-246
什一稅（tithes） IV-334
內含費用措施（cost-containment measures） II-292
內容中立（content neutral） V-94, 129
內容控制（content control） III-64
內容管制
（content-based regulation） III-64
內部人（insider） V-331
內部消息（inside information） II-201
內線交易（insider trading） V-294; 331
公司行為（corporate action） V-377
公平審判（fair trial） I-326; IV-362, 428；V-242
公正的代表性
（fair representation） IV-37
公民/軍人課程
（citizen-soldier program） I-160
公民訴訟當事人適格
（citizen standing） I-70
公民權（citizenship） I-258
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 IV-67, 78
公立醫療院所人員與設施（public employees and facilities） III-32
公共事務（a matter of public） I-59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V-276
公共秩序（public order） III-64
公共財產（public domain; public property） IV-315, 517
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 IV-67, 78
公共設施（public transportation） V-49
公共場所（public forum） IV-327
公共運輸（public accommodation） V-49
公共福利（general welfare） I-269
公共福利給與（public welfare benefits） V-228
公共論壇（public forum） III-64；V-129

公共頻道（public airwaves） III-256
公共關心事項
（matters of public concern） I-338
公序良俗（public moral） I-298
公法人（public entity） II-136
公害（public nuisance） I-303
公務員（civil servant） I-288
公眾安全（public safety） II-76
公眾住宿場所
（public accommodation） III-83
公眾福祉（public welfare;
public intrest） I-276
公設辯護律師
（public defender） IV-436
公費補助（public fund） III-32
公開司法程序
（public broadcast of a trial） I-326
公開收購股份要約（tender offer） V-392
公開展示（public display） III-205
公開審判（public trial） IV-362
公開播送（a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III-183
公開權（the right of publicity） V-123
公路檢查哨專案
（checkpoint program） III-136
分配（apportionment） I-130
分層功能表指令（menu command
hierarchy） III-243
分類違憲（suspect classification） III-53
反托拉斯法之域外執行
（extra-territorial enforcement of
antitrust law） II-237
反詐欺條款
（antifraud provisions） III-147
反訴（cross petition） I-288
反競爭（anticompetitive） II-216
天然優勢（natural advantages） II-276
少數族裔保障方案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III-16
少數族裔優惠保障方案
（affirmative action） IV-37
心神喪失（insane） III-27
心神喪失的抗辯（defense of
insanity） V-219
心智能力（mental capacity） V-219
心智障礙（mentally retarded） V-172
心腹共犯（a trusted accomplice） II-47
月暈效果（penumbra） IV-130
欠缺可裁判性
（nonjusticiability） I-122
水平限制（horizontal restraint） II-216

五劃

比對指紋（comparison of
fingerprint） V-178
主要生活活動（major life activity;
major life activities） IV-99；V-43
主要物流原則（"staple article of
commerce" doctrine） III-256
主要商品（tying product） IV-511
主要競爭武器（major competitive
weapon） II-276
主權（sovereignty） I-45
主權；公權力
（sovereign power） I-276, 298
主權州（sovereign state） I-45
主權豁免（sovereign immunity） II-102
以事實為準之分析（fact intensive

analysis） V-53
以物易物之交換條件
（quid pro quo） IV-518
以種族為限制條件之協定（racial restrictive covenant） I-97
仔細審酌（narrowly tailored） IV-104
代表性不足
（underrepresentation） IV-37
代理法則（agency law） I-234
充分而獨立之州法（adequancy and independence of state law） I-111
充分而獨立之州法基礎（adequate and independent state grounds） I-111
充分證據（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II-123
出版自由（freedom of press; freedom of the press） IV-261；V-150
出租（lease） I-285
加強審查（heightened scrutiny） I-160
加稅基金（tax-raised funds） IV-334
功能測試（functional test） I-293
功能等同
（functional equivalent） III-199
占有性取得（possessory taking） II-303
可分開處理且互不影響效力
（severable） V-113
可司法性（Justiciability） IV-489
可容許限制
（permissible restriction） IV-305
可航行空間
（navigable airspace） I-281
可推定受威脅之環境（presumable coerced environment） II-76
可訟性；達於可訴訟狀態；可裁判性
（justiciability） I-62, 103, 122
可訟性質（justiciable character） I-59
可責性（culpability） V-172
可獲法院補償之實際損害(actual injury redressed by the court） I-73
古柯鹼（cocaine） V-207
(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
I-56, 63, 111, 122, 169
III-19, 29, 53, 58, 64; IV-6, 93
司法自我約束
（judicial self-governance） I-83
司法自制原則
（judicial self-restraint） V-160
司法行為（judicial act） I-56
司法救濟（judicial remedies） II-181
司法責任（judicial duty） I-36
司法程序之完整性（integrity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I-326
司法搜索令（judicial warrant） V-70
司法管轄之立法分配權（acts of Congress granting jurisdiction） I-56
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
I-108, 288; IV-327
司法審查的標準
（standard of judicial review） V-21
司法機關以判決創立之救濟途徑
（judicially created remedy） V-183
司法權（judicial power） I-100
司法權限（limitation of judicial power） I-73, 115
外交（foreign relations） V-276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II-102
失能保險（disability insurance） III-2
市容、美學的（aesthetic） IV-315

市場力量（market power） II-230, 249; IV-511
平行輸入（parallel importation） III-219
平等法律保護（equal protection of laws） IV-44, 66, 78
平等保障(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 I-97, 160, 169, 249, 285;
平等保障；平等權（equal protection） I-130, 140, 144, 331; III-2; IV-104, 202
平等保護（equal protection） V-2; 63
平等保護原則（equal protection doctrine） I-293
平等保護高密度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 equal protection test） III-16
平等保護條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s） V-80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I-233；IV-99；V-57
平等適用（equal application） IV-93
平衡原則（balancing test） II-96
必要手段（necessary means） I-45
必要而適當（necessary and proper） I-45
必要設備原則（essential facilities doctrine） II-230
必然發現（inevitable discovery） III-123
本身違法原則（illegal *per se* rule） II-253
本質上（*per se*） V-45
本質上不公平（inherently unfair） V-331
本質上具有違憲嫌疑（inherently suspect） I-147
本質違法（illegal *per se*） II-207, 216
未予補償的徵收（uncompensated taking） V-279
未成年子女家庭津貼（aid for family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III-19
未持有管制（nonpossession regulation） I-345
未獲得適當代表的少數族群（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 V-20
正犯（principal） V-242
正當目的（legitimate objectives） III-64
正當法律(司法)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due process） I-97, 258, 264, 269; IV-334, 362, 428, 489
正當法律(司法)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 due process of law clause） I-169, 285, 303; III-55, 193, 263, 288; IV-6, 93, 139, 162, 407, 428
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V-38
正當程序（due process） I-249, 326, 331
正當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 V-2
民兵（militia） II-109
民事救濟（civil remedies） II-175
民權（Civil Rights） IV-44
民權法第七編（Title Ⅶ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IV-37
永久身心受損（permanent impairment） V-49
永久直接管領（permanent physical occupation） II-303
永久禁令（permanent injunction） I-173
犯意，詐騙故意（scienter） II-175
犯罪所得（profit of crime） IV-250
犯罪控制下之一般利益（the general interest in crime control） III-136

犯罪被害人（crime victim） IV-250
犯罪傾向（predisposition） II-52
犯罪誘惑（temptation of a crime） II-52
申報費率原則
（filed rate doctrine） II-287
申訴程序（grievance procedure） I-229
申請人身保護令（petition for writ of habeas corpus） IV-436
白人至上主義
（White Supremacy） IV-93
白種人（Caucasian） V-20
目標公司（target corporation） II-200
立即危險（imminent danger） I-293
立即性司法審查
（prompt judicial review） I-315
立法否決（Legislative Veto） V-250
立法者（lawmaker） I-293
立法動機
（motives of the legislature） I-56
立法發現（legislative findings） V-49
立法裁量（discretion of the national legislature） I-45
立法裁量權之行使（exercise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I-285
立法裁罰
（legislative punishment） I-293
立法意旨（legislative intent） V-320
立法歷史（legislative history） V-320

六劃

交互詰問
（cross examination） III-123, 130
交易（transaction） II-273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II-207
交易行為之經濟本質（economic substance of the transaction） V-362
交易行為自律原則（exchange self-regulation） II-223
交通（traffic） IV-315
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V-43
休曼法（Sherman Act） II-207, 211, 222, 227, 249; III-153; IV-514
仲裁人（arbitrator） II-146
仲裁條款（arbitration provision） II-146
任命條款（appointment clause） II-127
任意反對權（peremptory strike） IV-30
企業主（entrepreneur） V-362
先例遵循原則（stare decisis） III-32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協會
（NCAA） II-215
全國共識（national consensus） V-172
共犯（accomplice） V-242
共同訴求（collective point） III-83
共謀動機（motive to conspire） II-237
共謀罪（conspiracy） II-276
共謀獨占
（conspire to monopolize） II-249
再僱用（re-employment） I-179
刑之加重（penalty enhancement） III-96
刑事被告要求法院以強制手段促使有利於被告之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
（right to compulsory process） V-242
刑事被告要求律師協助辯護的權利
（right to assistance of counsel） IV-428
刑事訴訟（criminal prosecution） IV-428
刑事審判報導（broadcast coverage of criminal trials） I-326

刑法（criminal statute、criminal law） I-118
印第安娜州牙醫協會（Indiana Dental Association） II-292
同工同酬（equal wages for equal work） I-153
同性戀(者)（homosexuals） I-173; IV-139, 162
同級及同品質（like grade and quality） II-273
向特定對象寄發招攬業務信件（targeted directed-mail solicitation of business） III-103
名義損害（nominal damages） I-320
合作企業（joint venture） II-207, 216
合作聯邦主義（Cooperative Federalism） II-91
合法有效選票（legal vote） IV-202
合法政府利益（legitimate government interests） III-55
合法逮捕而為附帶搜索（searches incident to lawful arrests） II-16
合法逮捕的附帶搜索（search incident to a lawful arrest） V-70
合理之專業判斷（reasonable professional judgment） IV-436
合理而非恣意（reasonable, not arbitrary） I-144
合理使用（fair use） III-167, 199, 205, 231, 256, 274, 287
合理使用的抗辯（fair use defense） IV-518
合理法則（rule of reason） II-216, 222, 253, 292
合理的可能性（reasonable possibility） II-257
合理的投資報酬期待（reasonable investment-backed expectation） V-289
合理的負擔（reasonable exactions） V-279
合理的關係（reasonable relationship） V-279
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 II-41
合理個人（reasonable person） I-234
合理送運費率（reasonable rates） II-211
合理基礎（reasonable basis） III-2
合理處置或措施（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V-49
合理被害人（reasonable victims） I-234
合理評論（fair comment） IV-261
合理補償（just compensation） I-169, 285
合理審查基準（rational basis review; reasonable scrutiny） IV-162; III-27
合理關係（rational relationship; reasonable relationship） I-144; 269
合理關係標準（reasonable-relationship standard） V-94
合理關聯性審查標準（rational relationship test） IV-23
合夥關係（partnership） V-294
合憲性（constitutionality） IV-23
地位平等（equality of status） III-64
地役權（easement or servititude） I-281
地標保存法（Landmarks Preservation Law） II-300
安樂死（euthanasia） III-53, 55

州法（state law） I-111
州長（governor） II-109
州長否決權（gubernatorial veto） II-109
州執法首長（state's chie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II-99
州際商業（interstate commerce） II-227
州際貿易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I-287
州際貿易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 II-287
年金（annuity） II-149
年金契約（annuity contract） II-149
年資制度（seniority system） V-53
年齡歧視（age discrimination） I-185
年齡歧視證據確鑿案件（prima facie case of age discrimination） I-185
年齡確認（age verification） III-83
成文憲法（written constitution） I-36
成本抗辯（cost justification） II-267, 273
成本差異（cost difference） II-267
成本效益比較理論（balancing approach） III-130
扣押（attachment） II-102
收購（acquisition） V-300
收購要約（tender offer） II-163
有形證據（physical evidence） III-119
有足夠的心智能力接受司法審判（competence to stand trial） V-219
有效價格競爭（effective price competition） II-276
有益競爭的（procompetitive） II-216
有證據能力（admissible） V-193
有關市場（relevant market） II-249
次承攬人補償條款（subcontractor compensation clause） III-16
死亡風險（morality risk） II-149
死亡給付（survivors' benefits） V-2
死刑(capital punishment; death penalty） II-116；V-160, 172；V-160, 166
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 II-76, 81
自由及財產利益（liberty and property interests） I-273
自由意志（free will） III-119
自白（admission） III-119
自我事前審查（self-censorship） IV-261
自我實現（self-fulfillment） III-64
自動法律責任（automatic liability） I-241
自動施行（self-executing） II-96
自願性（voluntariness） II-30
自願性供述（voluntarily given statement; voluntary statement） II-61
色情資訊（sexually explicit material） III-71
血汗論（sweat of the brow） III-215
行政延誤（administrative delay） V-207
行政便利（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 I-147
行政便宜之舉（administrative leeway） V-57
行政規則（regulations） V-45
行為（conduct） III-96

七劃

佐證（corroboration） III-119
佔有權益（possessory interests） V-207
作業準則（work rule） II-292

伯恩公約（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IV-518
免於受到差別待遇的權利（rights to non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V-20
免責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 I-241, 246
免責條款（safe harbor） IV-202
免稅（tax-exempt） I-92
判決先例（precedent） I-111
判例(先例)拘束原則（stare decisis） IV-162, 407
判例拘束原則（*stare decisis*） V-160
利益衝突（conflict-of-interest） I-293
即決裁判（summary judgment） V-43; 45; 53
呈送條款（Presentment Clause） IV-458
告示板（billboard） IV-315
告知後同意原則（informed consent） I-249
扼要判斷（summary judgment） II-223
批發商（wholesale dealer） II-204
投票權（right to vote） IV-202
投資人（investor） II-181
投資風險承擔（investment risk-taking） II-149
投機者（speculator） II-181
改作（revision） III-226
沉默（silence） V-331
汽車搜索例外（automobile exception） II-35
男同性戀者（gay） III-83
私人（private party） II-181
私人物品（personal effects） V-70
私有財產（private property） I-281
私法起訴理由（private cause of action） II-181
私契約（private contract） I-276
肛交(禁止)法（sodomy law） IV-139, 162
言詞證據（verbal evidence） III-119
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liberty of speech; free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I-108, 303; IV-261, 327；V-94,113,150
言論自由權利（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V-235
身心障礙（disability） V-43
身心障礙中立規則（disability-neutral rule） V-53
身心障礙之狀態（disability status） V-49
身心障礙者（disabled persons） V-43
身體虐待與性侵害（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IV-436
車禍或災變事故受害者（victims of an accident or disaster） III-103

八劃

事先審查、事先限制（previous restraint） I-303
事前審查（prior restraint） I-314, 320, IV-327
事前審查（prior restraint） V-129
事務性錯誤（clerical errors） V-183
事實上之損害（injury in fact） I-73
事實認定（findings） II-292
依米蘭達案享有之權利事項（Miranda rights） II-61, 76

依據性別的分類（gender-based classification） IV-23
例行性法律業務（routine legal service） III-103
兩院制（Bicameralism） V-250
具體損害（concrete injury） I-70
「具體損害」要件（requirement of "injury in fact."） I-70
其他適格之個人（otherwise qualified individual） V-53
刻板印象（stereotype） I-147
制定行政規定（rule-making） V-57
協助自殺（assisted-suicide） III-53
協助自殺禁令（assisted-suicide ban） III-55
協議式費率政策（Negotiated Rates Policy） II-288
協議價格（list prices） II-204
取得（taking） I-281
受任人義務（fiduciary duty） V-392
受刑人互相通信（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mates） V-94
受刑人結婚（inmate marriage） V-94
受保護之身分（protected status） III-96
受僱人（employee） V-412
受僱者期待權（employee expectation） V-53
固定收益（fixed return） II-149
委託書之徵求（proxy solicitation） V-300; 377
宗教自由（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V-150
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 V-141
宗教意見（religious opinion） IV-305
忠誠義務（fiduciary obligation） I-320
忠實執行業務義務（fiduciary） V-331
性別分類（gender classification; gender-based classification） IV-1, 17
性別成見（sex stereotyping） V-10
性別取向（sexual orientation） III-83
性別歧視（sex discrimination; sex-based discrimination） I-153, 229, 237; III-2
性別區分（gender-based distinction） III-8
性侵害受害者（sexual assault victim） V-105
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 I-228, 237
所有被告在法庭之前一律平等（every defendant stands equal before the law） IV-429
所有經濟上可行之使用（all economically viable use） V-283
所有經濟上有益的使用（all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use） V-289
承保風險（underwriting of risk） II-149
拒絕交易（refuse to deal） II-230
招攬人員（solicitation） V-150
招攬業務限制（solicitation restriction） III-103
拘禁中（in custody） II-61, 76
拘禁中之訊問（custodial interrogation） II-76, 81
於代理關係下)本人之法律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 I-241, 246
明顯令人不悅（patently offensive） III-71
明顯而令人信服之證據標準（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V-353
明顯而令人信服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I-249

明顯違憲（patently unconstitutional on its face） III-64
杯葛（boycott(s)） I-227; II-223, IV-514
歧視性分類（discriminatory classification） IV-23
法定減輕或加重事由（statutory mitigating or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V-166
法官（judge） II-127
法律之形式合憲性（constitutionality of a statute "on its face"） I-115
法律代理（legal representation） III-103
法律平等保護（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I-258
法院命令（mandate） IV-202
爭議（controversies） I-62
直接侵權（direct infringement） III-167
直接威脅（direct threat） V-57
直接損害（direct injury）
知識基礎（foundation of knowledge） II-8
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 V-2
社團（association） I-83
空檔期（safe harbor） IV-186
肢體或心智缺陷（physical or mental impairment） IV-99
肢體或精神損害（impairments） V-43
股東（stockholder） V-294
股東會（shareholder meeting） V-300
臥底警察、臥底人員（undercover agent; undercover dectective） II-81
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 I-173
初期合併談判（preliminary merger discussions） III-147
初審管轄權（primary jurisdiction） I-36
表現(性質的)行為（expressive conduct） I-354, 366
表現自由；言論自由；表意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 I-314, 345, 366; III-64
表意活動（expressive activity） IV-315
表達（expression） III-243; IV-518
表達目的（expressive purpose） III-83
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 IV-305
金跳傘合約（golden parachute agreement） II-163
長期身心受損（long-term impairment） V-49
附條件的免責權（Qualified immunity） V-264
附隨陳述，即附隨於不利陳述之陳述（collateral statements） V-193
非公立學校（nonpublic school） IV-346
非自願性勞務（involuntary servitude） I-258
非明知或可得而知（unknown or unknowable） V-362
非法拘禁（unlawful detention） V-178
非法的青少年懷孕（illegitimate teenage pregnancy） IV-17
非法侵入（trespass） II-2
非法搜索（unlawful search） III-119
非法搜索或扣押（unlawful search or seizure） III-130
非商業性錄影重製（noncommercial recording） III-256
非價格性垂直限制（nonprice vertical restraint） II-252

九劃

信教自由條款（Free Exercise Clause, Const. 1st Amend.） II-96; IV-346
侵權行為（torts） I-281
保險（insurance） II-149
保險給付申報表（claim forms） II-292
保證條款（Guarantee Clause, Const. IV, § 4） II-91
保護性掃描（protective sweep） II-41
冒犯性思想（offensive thought） III-96
咨送總統批准條款（Presentment Clause） V-250
契約條款（contract clause） I-276
契約損害（impairment of contract） I-298
契約義務（contractual obligation; obligation of contract） I-276, 298
契約關係（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I-276
契據（instrument） V-362
孩童猥褻物品（child pornography） II-52
宣示性判決（declaratory judgment） I-118
宣示性救濟（declaratory relief） I-118
律師仲介服務所（lawyer referral service） III-103
律師廣告（lawyer advertising） III-103
持械搶劫（armed robbery） V-166
持標語牌抗議（picketing） III-64
指派一名公設辯護律師（appointment of counsel） IV-428
指紋證據（fingerprint evidence） V-178
挑釁言語(論)（fighting words） III-96; IV-261
政府的共和體制（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I-122
政府與宗教間之糾葛（entanglement between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IV-346
政府審查（government censorship） III-64
政治行為（political act） I-36
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 I-122, 137, 140
政治問題「不受司法審查」之原則（political question doctrine） I-134
政教分離的隔牆（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V-334
毒品（narcotics） V-70; 207
毒品交易（drug trafficking） V-207
毒樹果實（fruit of poisonous tree） III-119
毒樹果實理論（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 V-207
為羈押嫌犯而對嫌犯進行的逮捕（custodial arrest） V-70
相同品牌產品間之經銷限制（intrabrand restraints on distribution） II-252
相容性條款（compatibility provisions） III-188
相當且實質的關連（fair and substantial relation） IV-1
相當原因;相當理由；相當事由（相當或相信被告之犯罪合理根據）（probable cause）

II-8, 35, 41; III-119, 130；V-70, 207
相當程度限制（substantially limits） V-43
約略比例原則（rough proportionality） V-279; 283
美國憲法第十四條增修條文的平等保護條款（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V-20
美國憲法著作權條款之"有限期間"的規定（Copyright Clause's limited times prescription） IV-517
美國憲法著作權與專利權條款（Copyright and Patent Clause）IV-517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First Amendment） V-150
耶和華的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 V-150
胎兒獨立存活能力之檢驗標準（the tests of viability） III-32
衍生著作（derivative works） III-226
衍生證據（derivative evidence） V-207
負責抗辯（affirmative defense） V-57
負擔（exactions） V-283
軍事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armed forces） II-127
軍事審判（court martial） II-116
迫切之公共必要（Pressing public necessity） IV-87
迫切的公共目的（compelling public purpose） V-289
迫切的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IV-104；V-20
重大不實或誤導之聲明（materially false or misleading statement） V-377
重大且迫切之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s） IV-6
重大利益（compelling interest; vital interest） I-298; IV-250
重大的（material） V-300
重大政府利益（compelling（substantial）governmental interest） II-96; III-103
重大訊息充分公開（full disclosure of material information） II-175
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 II-139
重要性（materiality） III-147
重要施政目標（important governmental objective） III-8
重要基本原則（essential postulates）II-99
重要關聯（essential link） V-377
重新分配（reapportionment） I-130
重罪（felony） II-40
限制交易（restraint of trade） III-157
限制交易契約（contract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II-211, 215
限制貿易（restrained trade） II-204
限制過廣（overbreadth） IV-315
限制權力（limited power） I-36
限縮言論自由（abridge free speech） I-345
音樂市場（music market） III-287
飛行（flight） I-281
個人養老給付保護法（Private Pension Benefits Protection Act） I-276
個別判斷（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 V-49
個別納稅人與聯邦政府關係（relation of a taxpayer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59
個案和爭議；案件與爭議（case and controversy） I-73, 97, 100, 103
個案或爭議（case or controversy） I-83, 92
「個案與爭議」要件（"case or controversy" requirement） I-70
個案與爭議原則（case-and-controversy doctrine） I-63
個體懷疑（indivisualized suspicion） III-136
剝權法案條款（Bill of Attainder Clause） I-293
原初、最高意志（original and supreme will） I-37
原則性協議（agreement-in-principle） III-147
原創性（originality） III-298; IV-518
「若非因為」因果關係（but-for causation） V-10

十劃

倉庫效應（warehousing） V-331
家用錄音法（Audio Home Recording Act, AHRA） III-183
差別待遇（disparate treatment; discrimination） I-237; II-257, 262; III-83
差別待遇、歧視（discrimination） IV-44
差異行為（differentials） II-262
弱視（amblyopia） V-45
恣意（wantonly） V-166
恣意專斷且和州所欲達成之目的無合理關聯（arbitrary and without reasonable relation to any end within the competency of the state） V-37
時段挪移（time-shifting） III-256
時間、地點、方法管制（time-place-manner-based regulation） III-64
晉升（advancement） V-53
根本的連結（essential nexus） V-279
浪漫的父權主義（romantic paternalism） I-147
特別訂做或委託製作的著作（a work specially ordered or commissioned） V-412
特別檢察官（Special Prosecutor） IV-489
特定及可敘明的事實（specific and articulable facts） II-19, 41
特權及豁免權（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258
特權及豁免權條款（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Clause） III-58
病人識別（patient- identification） III-47
真誠的年資制度（bona fide seniority system） I-185
真誠職業資格（bona fide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 I-185
真實抗辯（defense of truth） IV-261
真實惡意（actual malice） IV-261
祕密協商（secret negotiation） II-288
站崗糾察（picket） V-129
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II-222
納入（incorporate） V-242
納稅人（taxpayer） I-63

納稅人訴訟當事人適格
（taxpayer standing） I-70
訊問（interrogation） V-178
財政完整性（fiscal integrity） III-2
財產上現有利益
（present interest of property） I-83
財產利益（property interest） V-228; 235
追逐救護車之招攬客戶手法
（ambulance chasing） III-103
追躡人犯（hot pursuit） II-2, 19
酒後駕車（drinking and driving） III-8
針對個人的特質作出個別考量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V-21
除性別以外之因素
（factor other than sex） I-153
高度（altitude） I-281

十一劃

偽證（perjury） V-243
停止命令
（stay order; stay） IV-194, 202
停止處分令
（cease and desist order） II-273
健康保險（Health insurance） IV-511
偏見（prejudice） V-166
偏激思想（bigoted thought） III-96
兜攬人員（canvasser） V-150
動機（motive） III-96
區隔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 III-16
商品期貨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 II-181
商業言論
（commercial speech） I-331, III-103
商標專屬（proprietary brand） II-276
國民兵（national guard） II-109
國防與軍隊事務（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affairs） III-12
國族主義（nativism） IV-93
國會（Congress） V-264
國會本意（congressional intent） V-57
國會行為的合憲性（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legislative act） I-100
國會所通過的立法之有效性（validity of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 I-100
國會意旨（congressional intent; intent of Congress） I-293; II-181
國會意思（congressional intent） V-377
國會議員資格（qualifications of Congress members） I-134
國旗保護法
（Flag Protection Act） I-366
國際耗盡
（International Exhaustion） III-219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 Act） II-102
基於內容的管制（content-based regulation） V-129
基於性別的區分
（sex-based distinction） V-2
基礎權利（fundamental rights） IV-139, 162
執行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 II-204
執行條款之補救性質（remedial nature of the enforement clause） II-96
執行業務必要（business necessity） V-57
執行權（enforcement power） II-99

執法人員誘人犯罪勾當（sting operation） II-52
執照和許可制度（licenses and permits） V-113
婚前性行為（premarital sexual relations） V-63
婚姻隱私權（marital privacy） IV-130
密室調查（in camera inspection） IV-489
專屬裁量（conclusive discretion） I-36
專屬權（exclusive right） IV-518
將議員選區劃成不規則形狀（political gerrymander） I-140
強制令（injunction） II-227, 276
強制性優越地位（mandatory preference） I-144
強制退休（compulsory retirement） I-185
強制處分令（mandamus） I-36
強制證人出庭作證（compel witness to testify） V-242
強取合併（squeeze-out merger; “freeze-out” merger） II-163；V-377
強盜罪（robbery） II-40
從犯（accessory） V-242
從事犯罪行為之意向（disposition to commit a criminal act） II-42
從陪審員候選人名單中選定陪審員（impanel the jury） V-219
掠奪性手段（in predatory tactics） II-276
掠奪性訂價（predatory pricing） II-237
控訴程序（accusatory stage） V-178
推定成立（a prima facie case） II-276
推定的損害賠償（presumed damages） I-338
授權（authorize、delegate） IV-458
授權範圍（the scope of the license） III-188
採對抗制度的刑事審判（adversary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IV-429
採證（evidential hearing） I-273
排他性區域計畫（exclusionary zoning practices） I-83
排除（abatement） I-303
救濟（remedy） IV-78
教材（instructional text） V-412
教育多元化（educational diversity） V-21
教育保障名額方案（educational affirmative action） IV-23
教會學校（church-affiliated school） IV-346
條文解釋（statutory construction） V-320
條約（treaty） V-276
條約批准（ratification of a treaty） I-137
條約廢止（abrogation of a treaty） I-137
條項否決（item veto） IV-458
深思熟慮的選擇（a reasoned choice） IV-436
理性人（reasonable mind） II-292
理性的基礎（rational basis） V-279
現行專業基準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 under prevailing professional norms） IV-436
現狀（status quo） V-207
現金公開收購股份要約（cash tender offer） II-201
異族婚姻（interracial marriage） IV-93
異族通婚（miscegenation） IV-93
移審令（writ of certiorari） I-169, 173
移審狀（certiorari） II-249; IV-294

第一次表達（first impression） III-243
第一次銷售原則
（first sale doctrine） III-219
第七章（Title Ⅶ） V-10
第十四條增修條文之正當司法程序條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V-242
終止懷孕
（terminate the pregnancy） I-193
終止懷孕之權利（right to terminate the pregnancy） I-203
終局性要件
（finality requirements） IV-488
終身監禁（life imprisonment） V-172
處死重罪（capital felony） V-166
處境（不）相當
（(not) similarly situated） IV-17
被認為身心障礙
（regarded as disabled） V-43
規範對象範圍不周延（under-inclusive） V-63
規範衝突（two laws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I-36
貧窮的刑事被告（indigent criminal defendant） IV-514
貧窮的被告（indigent defendant） IV-428
通訊會員（non-resident member） II-204
通訊錄（telephone directory） III-215
通商條款（Commerce Clause, Const. Art. I, §8, cl. 3） II-91
連鎖商（grocery store chain） II-267
連鎖超市（chain supermarket） III-153
連續複製管理系統（Serial Copy Management System , SCMG） III-183
陪審員（juror） IV-30
陳腐觀念（stereotype view） IV-23
章程（by-laws） II-204

十二劃

備徵登記（registration） III-12
最少限制方法
（least restrictive means） II-96
最低設籍期間（durationalresidency requirements） III-58
最高法（a superior, paramount law） I-37
最高國法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I-36
最終的處分（final decision） V-289
勞資關係（employee-management relations） V-53
單一性別入學政策（single-sex admissions policy） IV-23
單一性別教育
（single-sex education） IV-23
單純持有（mere possession） V-331
單純過失（simple negligence） II-139
報紙（newspaper） V-105
報復（vindictiveness） II-86
媒介（medium） IV-315
媒體（media） V-123
寒蟬效應（discouraging effect, chilling effect） I-315; III-96; IV-261
就業上身心障礙歧視（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IV-99
就業上性別歧視（sex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I-233, 241, 245
就業年齡歧視法（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 I-185

就業歧視（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I-229, 237
就罪刑分別審判（bifurcate the sentencing）IV-436
就職安全（job security）V-53
惡意（actual malice）I-338
揣摩（conjure up）III-287
提升科學與實用性文化的發展（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useful art）IV-517
提出減刑的請求（present a mitigation case）IV-436
提出證據傳票（Subpoena duces tecum）IV-488
提審（to grant habeas corpus）I-56
普通法（common law）II-139
普通法或衡平法上的個案（a case in law or equity）I-100
普通法的代理學說（the common-law agency doctrine）V-413
智障者（mentally retarded）III-27
替代方案（alternative）I-293
替代利益（alternative benefits）II-292
替代侵權（vicarious infringement）III-167, 256
替代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III-261
替代溝通管道（alternativ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V-129
期貨交易（futures trading）II-181
殘酷且不尋常處罰（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V-172; 160; 166
減刑的證據（mitigating evidence）IV-436
減緩措施（mitigating measures）V-43
測驗的解答（answer material for a test）V-412
無可回復之損害（irreparable harm）IV-194
無限制的裁量（unlimited discretion）V-113
無效的律師協助辯護（in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IV-436
無特別合約的自由創作者（freelance creators）V-412
無被害人犯罪（victimless crimes）IV-139
無搜索令的搜索（warrantless search）V-70
無懷疑情形下之搜索或扣押（suspicionless searches or seizures）III-136
無證據能力（inadmissible）II-61, 76
猥褻（obscene）III-71
發回（remand）I-179; II-249
短線交易之利益（“short-swing”profits）V-294
短線交易利益（short-swing profits）II-200
程序性正當法律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 of law）V-228
程序性正當程序（procedural due process）I-273
程序性正當程序權利（procedural due process right）V-235
程序保障措施（procedural safeguards）IV-327
結合著作（collective work）V-412
結社自由（freedom of association）IV-130
結婚的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 to

marry） V-94
結婚權（right to marry） V-80
結論性的（conclusory） V-377
絕對的免責權（Absolute immunity）V-264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reasonable care） I-241, 246
善意（bona fide、good faith） II-262
善意例外
（good faith exception） III-130
善意和有補償性目的（benign, compensatory purpose） IV-23
善意的懷疑（bona fide doubt） V-219
腕骨隧道症候群（carpel tunnel syndrome） V-49
著作人（author） V-412
著作權存續期
（copyright duration） IV-517
著作權所有權（copyright ownership）V-412
著作權侵權訴訟（an action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II-188
虛偽陳述或誤導（false or misleading） V-300
街道（street） IV-315
裁量（discretion） I-288; III-64
裁量上訴（petition） IV-194
裁量上訴受理令狀；移審令；調卷令
（certiorari） IV-186, 194, 202
裁量權（discretionary authority） IV-459
視力敏銳度（dvisual acuity） V-45
視力標準（vision standards） V-45
視覺侵擾（visual clutter） IV-315
視聽著作（audiovisual work） V-412
詐欺（defraud） V-331
詐欺（fraud） V-353
詐欺行為（fraudulent conduct） II-181
訴之利益（interest at stake） I-288
訴訟參加人，法院之友
（amicus curiae） IV-67, 78
訴訟當事人適格
（standing to sue） I-70
訴訟雙方的辯護律師對有關審理的任何事項所達成的協議（stipulation）V-219
訴願（administrative appeal） I-288
象徵性行動（symbolic acts） III-83
象徵性言論（symbolic speech） I-345
買受人自負瑕疵結果、貨物既出概不退換（caveat emptor） V-331
超然中立之治安法官
（detached and neutral magistrate） III-130
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V-166
逮捕（arrest） II-41
進化中的正當行為標準（evolving standards of decency） V-166; 172
鄉鎮市規約（ordinance） V-150
開支條款（Spending Clause, Const. Art. I, § 8, cl. 1） II-91
集體杯葛（group boycott） III-160
集體訴訟（class action） I-108; II-169；V-20
集體訴訟的代表（class representative） V-20
雇主法律責任（employer liability） I-229, 234, 237, 241, 246
順從式分析（deferential analysis） I-160
黑人歧視法
（Jim Crow Laws） IV-44, 67, 78

傳單（handbill） IV-315
嫌疑分類
（suspect classification） III-2; IV-1
意圖獨占
（attempt to monopolize） II-249
搭售（tying; tying arrangements）
III-157; 160, IV-511
搭售商品（tie product） IV-511
搜索（search） II-41
搜索狀(票)（search warrant）
II-8; III-130
搜索與扣押（search and seizure）
II-2, 16, 19, 35

十三劃

傳統的主僕關係（the conventional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 V-413
損害（injury） I-92
損害賠償（damages） II-169, 181
新聞自由（liberty of press; freedom of the press; freedom of press） I-303; II-227；V-113
業餘精神（amateurism） II-216
極具說服力的(重大)正當理由
（exceedingly persuasive justification） IV-23, 30
極度可能
（dangerous probability） II-249
極端過當（grossly excessive） IV-452
概括授權（blanket license; catchall clause） II-207；V-331
毀謗案件（defamation cases） I-338
準強制性交（statutory rape） IV-17
準違憲嫌疑分類（quasi-suspect classification） III-27
準徵收（inverse condemnation） V-283
準徵收訴訟（inverse condemnation action） V-289
準據法條款
（choice-of-law provision） II-146
當代法律背景（contemporary legal context） II-181
當事人適格（standing）
I-62, 73, 92, 97, 122, 169
當事人適格法則
（rules of standing） I-83
當然違法（illequal per se) II-207
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rule） IV-514
當然過失（negligence per se） V-105
畸形選區劃分
（gerrymandering） IV-104
禁止設立國教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clause）
IV-334, 346
禁止證據呈堂（suppression of evidence） V-207
禁制令或禁止處分
（injunction） I-118, 303
經同意之搜索（consent searches） II-30
經保密之資訊
（classified information） I-320
經過嚴密設計（narrowly tailored） V-129
經銷加盟契約
（franchise agreement） II-252
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 III-153
經濟負擔（financial burden） IV-250
經營權之移轉（the transfer of control）

V-362
聘僱決定（employment decision） V-10
聘僱著作（works made for hire） V-412
聘僱著作學說（the work for hire doctrine） V-412
補充著作（supplementary work） V-412
補救方案（remedial plan） I-160
補償（compensation） I-281
補償性損害賠償（compensatory damages） IV-289, 452
補償性賠償（general damages） IV-261
補償過去的經濟歧視（remedy of past economic discrimination） IV-1
解釋準則（canon of construction） II-136
資料庫（database） III-215
資訊（message） IV-315
資訊聲明（informational statement） V-377
資產凍結（frozen assets） II-102
較低程度限制（narrowly tailored means） V-105
較嚴格審查標準（heightened scrutiny） V-129
違反刑事利益陳述之傳聞例外（the against penal interest exception） V-193
違禁品（contraband） V-207
違憲（unconstitutional） I-36; III-64
違憲立法無效（legislative act contrary to the constitution is not law） I-36
遏止效果（deterrent effect） V-183
過度（excessive） V-166; 172
過度(於)廣泛 （overreaching; overbroad） III-19, 96
過度且不必要之刑罰（excessive and unnecessary penalty） V-160
過度狹隘（underinclusiveness; underinclusive） III-2, 19
過廣的一般化（overbroad generalization） IV-17
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 IV-44, 67, 78
電子資料庫（electronic database） III-226
電子監察（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I-2, 47
電子聽得之陳述（electronically overheard statements） II-47
電子竊聽（electronic eavesdropping） II-47
電視轉播訴訟（televising court proceedings） IV-362
電腦資料（computerized data） III-47

十四劃

僱主責任（respondeat superior） IV-289
僱用人（employer） V-412
僱用特權（privilege of employment） I-185
僱傭(職務)範圍之內(within the scope of employment) V-412
奪掠性或反競爭行為（predatory or anticompetitive conduct） II-249
實際出賣人（actual sellers） II-169
實際損害（actual damages） I-320
實際購買人（actual purchasers） II-169
實質上非侵權使用（substantial noninfringing use） III-256
實質正當法律程序

（substantive-due-process） III-55
實質政府利益，實質的政府政策目的（substantial government interest） I-354; III-64
實質相似(性)（substantial similarity） III-205, 298
實質惡意（actual malice） IV-289, 295
實質關連（substantially related） III-8
對己不利陳述（self-inculpatory statements） V-193
對己有利陳述（self-serving statements） V-193
對他人造成威脅（threat-to-others） V-57
對本身造成威脅（threat-to-self） V-57
對地點及方式之限制（restriction on the place and manner） IV-305
對行政規則之詮釋（regulatory interpretations） V-49
對於表現自由合理之時間、地點及方式之限制（a reasonable time, place, or manner restriction of expression） I-354
對律師產生反感（erosion of confidence in the profession） III-103
對被告或嫌疑人不利之陳述（inculpatory statement; incriminating statement） II-61, 76
對被告或嫌疑人有利之述（exculpatory statement） II-61
對等訴訟程序（adversary process） III-123
對精神狀態問題的聽證會（sanity hearing） V-219
對質與交互詰問權利（rights of confront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 V-228
慣犯條例（Habitual Criminal Act） II-86
撤銷或更正定罪裁決（post-conviction relief） IV-436
監獄激勵訓練營（Prison Motivational Boot Camp） II-136
福利成本之撙節（saving of welfare costs） III-2
福利受益人（welfare recipient） I-273
福利金（welfare benefits） III-58
種族分類（racial classifications） V-21
種族歧視（racial discrimination） I-92, 179, 237; IV-93
種族歧視（差別待遇）（racial discrimination） V-20
種族歧視證據確鑿案件（prima facie cas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179
種族偏好（racial preference） V-20
種族偏見（racial prejudice） IV-87
種族隔離措施（segregations） IV-44, 67, 78
管制命令（regulations） V-289
管制性取私產為公用（regulatory taking） II-300, 306
管制準徵收（regulatory taking） V-283
管理監督者所造成之性騷擾；主管性騷擾（supervisory sexual harassment） I-241, 246
精神耗弱（feeble-minded） III-27
精神痛苦（emotional distress） IV-295
緊急狀態（emergency） I-298
網際網路（Internet） III-71, 184

維吉尼亞軍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I-160
與毒品交易有關的配備（drug paraphernalia） V-207
誤導（false light） IV-289, 295
誘陷犯罪（entrapment） II-52
誘導犯罪（induce commission of a crime） II-52
賓夕法尼亞州非公立中小學教育法（Pennsylvania Nonpublic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IV-346
賓州塌陷法（Pennsylvania Subsidence Act） II-306
輔助侵權（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III-167, 256, 261, 274, 298
銀行（bank） II-139
銀盤原則（Silver Platter Doctrine） IV-407

十五劃

價格固定（price fixing） III-160
價格差別待遇（price discrimination） II-267, 273, 276
價格差異（price difference） II-262
價格差異制度（discrimination in price） II-257
價格控制（price control） I-269
價格操縱（price manipulation） II-181
增修條文第十四條（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V-37
增修條文第十四條正當法律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V-80
增修條文第六條之與證人對證條款（the confrontation clause of the Sixth Amendment） V-242
墮胎（abortion） I-193
墮胎診所（abortion clinic） V-129
墮胎管制措施（abortion regulations） III-32
墮胎權（abortion right; right to abortion） I-203; III-32
審判前之證據排除聽審（suppression hearing） V-183
審判律師協會（trial lawyers association） IV-514
廢棄（reverse） I-140; II-249
徵收（eminent domain） II-300, 303, 306
徵收主張（takings claim） V-283; 289
徵收條款（Takings Clause） V-283; 289
徵兵（draft） III-12
徵信調查報告（credit report） I-338
徵稅權（power of taxation） I-45
徵稅權競合（power of taxation to be concurrently exercised） I-45
敵意(工作)環境性騷擾（hostile environment sexual harassment） I-228, 223, 246
敵意或惡劣之工作環境（hostile or abusive work environment） I-237
數位錄音裝置（digital audio recording device） III-183
暫時失能（temporarily disabled） III-2
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V-162
潛在生命（potential life） I-193, 203
締約自由（liberty to contract） I-264
編輯作品（compilation） III-215

編輯或彙整著作（compilation or collective work） III-226
編輯著作（compilation） V-412
編輯著作（compilations） III-298
請辯護人之權利（right to counsel） II-61
調查程序（investigatory stage） V-178
調職（reassignment） V-53
賠償（compensation） IV-250
賠償（remedy） I-298
賦稅減免（tax exemption） IV-1
賭場廣告（advertising of casino gambling） I-331
質疑之適格（standing to make that challenge） I-315
適格標準（qualification standards） V-57
遷徙自由（right to travel） III-58
養老金（pension） I-276

十六劃

憲法明文承諾（textually demonstrable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textual commitment） I-134
憲法疑義原則（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doubt） II-136；V-172
憲法增修條文（Amendment to Constitution） I-173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 （First Amendment; First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I-331, 345, 354, 366; III-64; IV-250, 261, 289, 294, 301, 305, 327, 346, 514 V-105, 123, 141
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言論自由保障（First Amendment's free speech guarantee） III-103; IV-517
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Eighth Amendment） V-160, 166, 172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Thirteenth Amendment） IV-44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Fourteenth Amendment） II-19, 30; III-47, 64, 103；IV-44, 261, 289, 295, 362, 407, 428, 452, 301； V-123; 160; 166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的正當司法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und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V-219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第五項國會執行權（congressional enforement power under U.S. Const. 14th Amend., §5） II-96
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Fifth Amendment） I-281, 362；V-276
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Sixth Amendment） IV-428
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賦與被告得以要求律師有效協助辯護的權利（Sixth Amendment right to effective assistance of counsel） IV-436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Fourth Amendment） II-2, 19, 30, 40；V-141
憲法賦予刑事被告之律師協助辯護的權利（constitutional right to counsel） IV-428
戰鬥（combat） III-12
操作方法（method of operation） III-243
操控（manipulative） V-331

操縱行為（manipulative act） II-163
機動車輛搜索的例外（automobile exception） V-70
機密消息（tip） V-331
機器重新計票（machine recount） IV-186, 202
機關內部爭議（intra-branch dispute） IV-489
獨占（monopoly; monopolize） II-211, 230; III-157, 249
獨占地位（monopolistic position） II-276
獨立存活能力（viability） I-193, 203
獨立來源（independent source） III-119, 123
獨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s） V-57
獨立承攬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 V-413
獨立消息來源（independent source） V-207
獨立商（independently owned store） II-267
獨佔行為（monopolization） II-230
獨家（排他）契約（exclusive contract） IV-511
積極性會員（active member） II-204
衡平判決（decree） IV-67, 78
親子關係（paternity） IV-30
謀殺（murder） V-166
遵循判決先例原則（stare decisis） I-203
選票稀釋（vote dilution） IV-104
選擇性排除（selective exclusion） III-64
選擇性壓制（selective suppressing） III-64
選擇權（option; voting right） II-201; IV-104
選舉訴訟（election contest） IV-186，202
遺產法院（probate courts） I-144
錯誤復審令（writ of error） IV-44
默示（acquiescence） II-102
默示私訴因（implied private cause of action） V-377
默示授權（implied power） I-45
默示請求權（implied rights of action） II-181
優先股（preference stock） II-201
優惠性（affirmative） IV-1
優惠待遇（preferential treatment） III-16
優勢證據（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V-10
優勢證據標準（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V-353
擬制信託（constructive trust） I-320
濫用（misappropriate） V-331
濫訟（nuisance litigation） V-377
營業讓與理論（sale of business doctrine） V-362
矯正及減輕殘障措施（corrective and mitigating measures） IV-99
總統（President） V-264
總統行政特權（Executive Privilege） IV-488
總統選舉（Presidential election） IV-186, 194, 202
總統選舉人

（presidential elector） IV-202
總統選舉人團
（electoral college） IV-202
聯合定價（price fixing） II-207, 211
聯合配銷權
（syndicated right） III-256
聯邦反托拉斯法
（federal antitrust laws） II-276
聯邦仲裁法（Federal Arbitration Act(FAA)） II-146
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十七條第 C 項
（Federal Rule of Criminal Procedure 17（c）） IV-489
聯邦法（federal law） I-111
聯邦法優先於州法適用（state law preempted by federal regulation） II-91
聯邦社會安全法（Federal Social Security Act） III-19
聯邦宣示性判決法(Federal Declaratory Judgment Act） I-118
聯邦政府
（government of the Union） I-45
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I-262, 292
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II-291
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第五條（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5） IV-514
聯邦禁制令
（federal injunction） I-115
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
（Fourteenth Amendment） IV-66，78
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四條之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IV-23
聯邦權限爭議問題
（federal questions） IV-186
舉證責任（burden of showing; burdens of proof） IV-23；V-10

十七劃

豁免（exempting） III-64
豁免（waiver） V-45
豁免條款（exemption provision） II-149
購併（takeover） II-201
避孕（contraception） V-63
避孕器材（contraceptives） IV-130
避免家庭內部爭議（avoiding intrafamily controversy） I-144
避險（hedging） II-181
還原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 III-231
隱含之請求權基礎（implied cause of action） V-320
隱私（privacy） III-47
隱私的侵犯
（intrusion on privacy） III-103
隱私權（right to privacy; privacy; right of privacy） II-2; IV-130, 289, 301；V-63, 80, 105
隱私權之期待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II-47
隱私權益（privacy interests） V-70; 207
禮貌準則（civility code） I-237
簡易判決（Summary Judgment） IV-301
藉口的證明（proof of pretext） I-179

十八劃

翻譯（translation） V-412
醫療診斷（medical diagnosis） V-49

雙性戀（bisexual） III-83
雙重主權（dual sovereignty） II-99
雙重保障（double security） II-99
雙倍損害賠償（double damages） I-185
雙階程序（bifurcated procedure） V-166
額外顧客服務
（optional customer service） II-267

十九劃

壟斷（monopoly） II-227
懲戒性賠償，懲罰性（損害）賠償
（punitive damages） I-320, 338; II-146; IV-261, 289, 295, 452
懷孕（pregnancy） III-2
羅賓森派特曼法案（Robinson-Patman Act） II-223, 262
羅德島州薪資補助法（Rhode Island Salary Supplement Act） IV-346
藥物管制（drug control） III-47
證人證詞（witnesses testimony） V-243
證券（securities; security） II-149；V-331, 362
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V-300
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 V-294, 353
證券交易法案
（Stock Exchange Act） II-223
證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 V-353
證券商公會規則（Rule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II-146
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Rule）） V-392
證券管理委員會規則（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 Rule）V-377
證書（certification） V-43
證據可採納性（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V-207
證據的可靠性
（trustworthiness of the evidence）V-178
證據的滅失（destruction of evidence）V-70
證據能力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II-81
證據排除法則（exclusion of evidence; exclusionary rule） II-61, 76; III-119, 123, 130; IV-407 V-178, 183, 207
證據聽證
（evidentiary hearing） II-292
關於管理發表言論之時間、地點或方法之規則（time, place and manner regulation） IV-327
嚴格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V-21; 129
嚴密/嚴格的司法審查
（close/strict judicial scrutiny, heightened judicial scrutiny） I-147; III-2; IV-517

二十劃

攔阻與拍搜
（stop and frisk） II-19
競爭（competition） II-273
警戒盯梢（stakeout） V-207
警察權（police power） I-169, 264, 285, II-300, 303, 306; IV-44
贍養費（alimony） I-169

屬地主義
（doctrine of territoriality） III-219

二十一劃

辯論式訴訟程序
（adversary proceeding） I-314
辯護策略決定
（strategic decision） IV-436

二十二劃

驅離令（Exclusion Order） IV-87
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I-92; II-116; IV-459, 489；V-250, 264
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 IV-489
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 IV-130
權利耗盡（right exhausted） III-219
聽證（hearing） I-288；V-228, 235
聽證陳述機會
（opportunity to be heard） V-228; 235
贖回（redeem） I-298

二十三劃以上

竊用（appropriation） V-123
變額年金（variable annuities） II-149
邏輯關連性（logical connection） V-94
顯不相稱（disproportionate） V-166
讓與（release and assignment） V-276